1921-2011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万山红遍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万山红遍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
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万山红遍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第五卷　万山红遍

主　编：于风政　郑　毅
副主编：姜建东　杨凤义
编辑部：闫志弘　董文娜　曲　菁　杨　朔　马振宇
编　者：闫志弘　董文娜　曲　菁　刘德宝　母稷祥
江书田　李树峰　李玉君　孙英南　刘　明
陈胜林　华云海　张德宇　汤廷惠　李显峰
韩应亮　易修权　白海龙　李茜林　佟　俊
潘大军　刘铁军　陈术国　高　路　张晓丹
夏野红　邵丽萍　丛　琳　郑　军　朱丽萍
刘　伟　许雪飞　佟欣荣　张陆慧　邹永军
赵　德　华雅琴　黄佳慧　罗　红　李晓荣
王德强　郤中和　杨　朔　马振宇
统　稿：丁永惠　谢志远

目　录

第六章 土地改革和各解放区的经济政治形势

第七章 整党整军运动和国共军事力量逆转

第八章 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

第九章 中央政治局会议 济南战役胜利

第十章 战略决战 三大战役胜利完成

第十一章　七届二中全会召开　国共和平谈判

第十二章　夺取全国胜利　国民党统治垮台



重庆谈判的国际背景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举行投降签字仪式。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世界局势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世界政治格局也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帝国主义的力量大大的削弱，苏联在二战中虽然也受到了重大的创伤，却成为战后唯一可以与美国在军事上相对抗的国家，世界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这些变化对于战后的中国政局也有着深刻的影响。重庆谈判在这个时候召开，其实也是国际关系在中国的表现。而当时能对中国政局走向起作用的国家就只剩下美苏两大国，美苏两国在战争快结束时，双方已经开始为战后做准备，全球战略和本身意识形态的不同，使得两国必然会对立起来，但是在处理中国问题上，双方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选择了合作。重庆谈判就是美苏合作干预中国内政的具体表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大大削弱了帝国主义力量。六个帝国主义强国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被打败了，英国和法国被严重削弱了，只有美国在战争中发了横财，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这也使得美国的全球战略有了坚强的后盾。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称霸世界的目标也开始铺开。

而中国则成为其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太平洋战争后期，随着对日战争趋向结束，美国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将对华政策的重心逐步从对日作战转移到政治方面。美国从其战后的世界战略出发，力图取得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领导权，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在战后建立一个相对稳定而对美友好的政府，作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伙伴，在国际事务中坚定地支持美国，并为美国提供巨大的市场和原料。罗斯福在1943年曾对蒙巴顿说过："有5亿中国人站在我们这一边，这在紧接着战争结束以后的时期，是会非常有用的。"[①]但美国要实现它的计划，并非没有障碍。在中国内部，

国共两党的斗争愈演愈烈，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在战后政治更趋腐败，人心涣散，士气消沉，其统治体系已是风雨飘摇。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高举为中华民族彻底解放而奋斗的旗帜，在八年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中迅速崛起，越战越强，已成为关系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决定性因素。美国政府在制订对华政策时，对于这种情况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尤其国民党在豫湘桂的大溃败，使得美国不得不正视现实，中共才是抗日的主力，如果要想解决战后问题，抛开中共是不可能的。腐败不堪的国民党及其军队，在没有做好十足的准备，是不可能战胜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在国际上，一方面日军仍占领着中国广大地区，对日决战正在进行之中，美国必须付出一定代价，才能将日本势力彻底从中国清除出去，另一方面，随着德国法西斯的崩溃，苏联开始愈来愈积极地介入远东事务。美国意识到，一旦苏军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在远东必将处于非常有力的地位，对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渗透也将进一步深入，这势必对美国独占中国的计划构成严重威胁。

面对中国内部和国际上如此错综复杂的局势，美国为了实现其对华的既定目标，决定尽快解决国共矛盾，帮助蒋介石用政治方式统一中国各派力量，造成稳定的政治局面。这样既有利于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对日作战，又可以堵塞苏联向中国渗透渠道。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美国开始直接介入国共斗争。而大战刚结束，美国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在战时如果发生内战，必然大大削弱抗日力量；即使在战后发生，也将对美国不利，不但使美国失去广大市场和原料基地，还可能造成美苏在中国各支持一方的对峙局面。这是美国极不愿看到的。美国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的、基本上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中国。”② 而且在处理中国的问题上，美国也清楚的意识到，如不恰当处理与苏联的关系，美国就什么事也做不成。所以，早在雅尔塔会议前，美国为在外交方面争取苏联支持它的对华政策，曾多次派代表与苏联领导人接触，企图摸清苏联远东政策的底牌，以期与苏联协调行动，最终双方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共识，在处理中国的问题上，都倒向了蒋介石这一边。这样美国开始大胆的直接帮助蒋介石，促成美、蒋、日、伪的合流。战后直接帮助蒋介石运输兵力，接收日本所侵占的中国领土。杜鲁门曾供称：“如果我们告诉日本人立即放下武器，走向海岸，那么整个国家将被共产党所接收，……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非法的步骤，利用敌人作为守卫，……我们曾训令日本人守住他们的地点并维持秩序。”③

苏联——战后唯一可与美国相对抗的国家。苏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主力之一，它经受住了战争的严峻考验，变得更加强大了。在战争结束时，苏联与美国一样，都开始关注到中国的问题。早在二战结束之前，英美苏三方就在雅尔塔召开会议，对于中国问题达成了共识，在没有中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他们私自决定了中国的未来，美国不愿再因为战争牺牲太多，这就要苏联的帮助，作为苏联参加同盟军对日作战的条件，其条件为“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以维持。二、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对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享有优越权。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④]这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的侵犯，而蒋介石却对此一无所知。美苏在战后要做的只是让蒋介石接受《雅尔塔协定》，所以才会有中苏谈判。

原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宣布了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的结束。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此时苏联成为世界上唯一可与美国在军事上相对抗的国家，这就使得双方在各自的全球战略中势必会有相冲突的地方。但此时双方出于各自的想法采取了合作的方式。美国不愿自己牺牲太大，而希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而苏联一旦进入东北，势必就会加大他在中国的影响，对于美国在东亚的整体战略将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而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力量在抗日战争中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和中共很可能联合。这是美国最不愿看到的，为了使苏联可以支持国民党，美国作出了让步，才会有《雅尔塔协定》的出台。而苏联这一时期对华政策的主要出发点是维护远东和平与苏联东部边界的安全，所以也不愿意与美国有直接的冲突，而且这个时候，在苏联方面看来，国民党政府比中共更有力量统治中国，所以，实际上战后，苏联是支持蒋介石政府来管理中国的。为了能获得其在《雅尔塔协定》里的权益，苏联对国民党采取拉拢和中立政策，阻止国民党在美国指示下积极反苏。由于苏联领导人轻视中国人民的力量，对美蒋在中国的力量估计太高，以致将外交重心几乎完全放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其结果必然事与愿违，无助于在中国形成稳定的政治局面。斯大林在 1948 年曾坦率地承认苏联的错误，他曾经认为在中国进行武装斗争没有前途，中国共产党应同蒋介石达成协议，解散军队，加入国民党政府。但事实证明中国同志是正确的，苏联的估计是错误的。斯大林在这里确实指出了苏联对华政策的症结。

因此，这一时期，苏联一直专注于同蒋介石的谈判，而对于蒋介石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苏联队中共的处理态度。在谈判过程中，蒋介石所提出的对

苏交涉要点中第七和第八条都提到了中共的问题，“中国为求国家之统一，对于全国之军令、政令必须彻底统一，不使具有武力之政党——共产党，假借政党之名义，掩护其武力之割据，而妨碍国家统一与抗战之胜利。苏联为希望中国之统一起见，对于今日犹在武力割据妨碍中国统一之中国共产党，不做任何国际舆论上、政治上及物质上之支持，并愿设法劝告中共将武力交还政府，统一指挥，以利对日作战。”⑤对此，苏联也作出明确回复，“关于中共：史认为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并表示此后援助中国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唯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予共党。”但强调“在中共军队和国民政府军队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要苏联支持国民政府是十分困难的。”⑥最终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相关文件中，与中共相关的条款并不少见。在“照会”中，明确规定：“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⑦通过上面我们所说的也可以看到，苏联已经占到国民党一边，至少是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的。苏联无论在道义、军事还是经济上，均表示完全支持国民党政府。中苏条约签订后，美国终于完成了长期策划的，在国际上孤立中国共产党的计划，使苏联支持国民党政权的保证以条约的形式公诸于世。8 月 15 日，蒋介石将中苏条约签订的消息通知赫尔利，并告诉他：中苏条约表明，苏联将支持国民党政权，并愿意帮助他统一中国军队。赫尔利当即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 月 27 口，赫尔利乘机亲往延安，迎接中共代表，以示隆重。

苏联在和国民党谈判的同时，也没有中断和中共的联系。因为它认为中国现在还是资本主义民主时期，所以统治中国的自然应该是国民政府，而且中央政府也有这个能力，所以，在这个时期，苏联与中共通信的主要目的是想劝说中共与国民党合作，让中共主动放弃与蒋介石争夺领导权。斯大林连发两份电报，“表明中国不可以打内战，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边缘。”“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再三地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⑧

战后美苏的举动对于中国政局的影响非同小可。美国和苏联都一边倒，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但同时又不愿意中国

立即爆发内战，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民党得到了美苏的支持，更是信心百倍，有恃无恐，但是在美苏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做出和谈的低姿态，而中共在苏联的影响下，也考虑和谈，在这种国际背景下，重庆谈判的召开就势在必行了。

注释：

①［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8页。

②前引《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第19～20页。

③郑德荣、黄景芳、孙友葵：《重庆谈判》，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版，第6页。

④马洪武、王德宝、孙其明、戴金生：《抗日战争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02页。

⑤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上面只是一部分），第734～738页。

⑥《行政院长宋子文自莫斯科呈蒋主席报告与史达林会谈关于解决外蒙、新疆、东三省及中共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45年7月9日，8月10日），前引《战时外交》（二），第609页。

⑦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329～1320页。

⑧师哲、李文海：《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国民党当局坚持独裁内战方针

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处于一片欢腾之中。中国历史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但国民党当局坚持独裁内战方针，使国内的前途变得扑朔迷离，一片迷茫，内战的阴影再一次笼罩了全中国。国民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国民党统治集团参加抗日战争，一方面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其在中国的独裁统治。战后，它的根本目标就是使中国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即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是它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障碍，因而国民党统治集团便处心积虑的消灭共产党。

早在抗日战争之前，蒋介石就一直致力于剿灭共产党的任务中，即使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仍然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只是由于日本的入侵严重威胁到他的统治利益，并在西安事变的推动下，才不得不顺应民意与中共合作抗日。抗战八年，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挑起纠纷，制造麻烦，掀起一次次的反共浪潮，但是还维持着合作的关系，一旦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就立马将矛头转向中国共产党，坚持内战独裁的方针也就是必然的了。为了战后可以顺利的统一全国，早在抗日战争后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就消极抗日，把自己的主要力量放到西南的大后方，为胜利后的顺利接收做准备。

就在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还来不及品尝这"胜利"的滋味时，蒋介石就把一盆冷水浇到了人民的头上。在日本发出乞降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一连下了两个命令：一个给他的嫡系部队，要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个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要他们"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蒋介石是要自己的嫡系部队垄断接收日军投降的大权，而不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收缴日伪的武器装备，收复失地。蒋介石就是想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直接挑起了与中共的矛盾。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与日、伪军迅速合流。1945 年 8 月 11 日，蒋介石发出了一道授权所谓“地下军”等敌伪汉奸“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固守所辖地区，阻止我抗日军队实行受降的命令。在蒋介石的授权下，敌伪南京的傀儡们立即发表声明说，他们决定担任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前这时间的政治与治安工作。蒋介石把伪南京傀儡政府的全副班子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在蒋介石的卵翼下，那些残杀中国人民的汉奸部队，摇身一变成为“国军”；那些为日本帝国主义当走狗的汉奸卖国贼，被封官加委。变成了什么“总司令”、“总指挥”、“绥靖司令”、“先遣军司令”。如全国出名的大汉奸周佛海被蒋介石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伪第二方面军司令孙良成被委任为“第二路军总司令”。不久，五十余万伪军被蒋介石收编为帮助其抢夺胜利果实的“先遣军”。除此之外，他还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向中共投降，还要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作“有效之防卫”，如日伪驻地被中共部队攻占，日军应负责“将其收回”。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还发表谈话，指责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所发限期日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当陈布雷将所拟出的受降接收人员名单呈送给蒋介石的时候，蒋一看名单上面有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的名字时，不假思索的直接将其划掉。这时的陈布雷说：“先生，中共代表只有一人，加上为好，这样对内对外也可以说得过去。”可蒋介石并不理睬他们的建议，反而沉着脸说：“先让朱德待命好了……”一走出蒋介石的办公室，陈布雷立即嘟囔到：“先生连这点气量都没有，结果必然弄巧成拙……”[①]，历史也证明了陈布雷的话。

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同美国合作，借助于美国的实力，迅速接收在日伪控制下的城市。有统计资料统计短短的一个月中，国民党政府借助美国的飞机运送大批国民党军队至内战前线，并且借助于美国的实力抢占战略要地和主要铁路交通线。而且这一时期，美国还给予蒋介石大量美元援助，供给大量的军火。在美、日、伪军的帮助下，蒋介石不仅抢夺了上海、南京、杭州、北平、天津等大城市，而且在九月到十月间的一个月，就抢占了已被我军解放的县城及重要车站、村镇数十处。全然不顾中国共产党的抗议。

既然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方针已定，为什么还要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共商建国大计呢？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人心所向和当时的政治形势了。我们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时，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就是争和平，求团结。《新华日报》发表的一位读者来信充分的反

映了人民的愿望："在抗战时期，没有饿死，可是流亡、穷困使我们对于战后和平的期望，就像饥饿的人等饭吃那样的急迫。……我们反对内战，不管用什么法律来解释，我们还是反对，如果内战，全中国人民都要遭受无穷的损害。"[②]对于民意蒋介石不得不认真考虑，否则一意孤行，只会导致完全的孤立，这点相信他比谁都清楚。

除此之外，这时的世界舆论也都希望战后的中国实现和平，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希望现在的中国立即爆发内战，否则，赫尔利就不会努力奔走于国共之间，美苏也不会在雅尔塔上达成共识，苏联也不会在战后同蒋介石签订同盟条约，支持蒋介石了。美苏两国是战后对中国有最大影响力的国家，他们的这种态度使蒋介石喜出望外。同时也使蒋介石坚信，有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特别是斯大林明确允诺不支持中共，使蒋认为中共在国际舞台上就没有多大的活动空间了，战胜中共是绝对有可能的，中共只剩下就范一条路可走。但是这时的美国知道如果中国打内战，那么对于美国的对华战略是不利的，所以蒋介石还要顾及到美国的态度而不能立即发动战争。

但是蒋介石和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蒋介石自身还没有准备好。尽管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早已确定，并已开始付诸实施，但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尚有许多需要客服的困难。首先，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把自己的大部分兵力都放在远离战场的西南大后方，日本的突然投降，使得蒋介石措手不及，不能及时的将部队调到前线，即使有美国的支持，他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做准备，此外，蒋介石自己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幻想，企图借助于美苏几个大国的支持，对中共施加压力，通过谈判迫使中共妥协，用政治方法削弱或彻底瓦解中共的力量，争取不战而胜。

正是出于上述种种考虑，蒋介石先挂出了"和平"的招牌，主动向毛泽东发出了"邀请"。这就出现了蒋介石抗战胜利初期三次电邀毛泽东来渝商谈建国大计的一幕。陶希圣的话正好印证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想法。他说："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办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就更有文章可做。"[③]实际上，陶希圣的话说出了蒋介石的真实的想法：真内战，假和谈。由此也可以看出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一直都没有变。谈判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一旦准备完毕，就会发动内战。



蒋介石谈判本身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当他发出第一封电报，通过在延安充当联络参谋的周励武和罗伯伦二人那里得知毛泽东并不愿意来渝谈判，便在第二封电报和第三封电报中摆出更高的姿态，说的十分冠冕堂皇，以显示他邀请中共商谈建国大计的诚意。我们从第三封电报也可看出端倪：“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④这封电报使得全国人民都看到了蒋介石的“诚意”，蒋介石本想着通过这三份电报的公开，得到人民的支持，然后在毛泽东拒绝之后，就可以把“不要和平”、“不肯合作”的帽子扣到中共头上，可见“邀请”是假，“挑战”是真。中共当然也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毅然赴渝参加谈判。毛泽东接受邀请来渝同蒋介石谈判，这使得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没有得逞。

弄巧成拙的蒋介石有苦难言，不得不硬着头皮出面应酬，同时尽量压低接待规格，尽可能缩小毛泽东重庆之行的影响。对毛泽东到达重庆的时间，也是极力封锁，不让更多的人去机场迎接。他还向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发出指示，要他们对“有关谈判的报导，要登的少，登的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⑤但是蒋介石不可能一手遮天，在毛泽东到达重庆之后，除了国民党中央的喉舌《中央日报》外，各大报纸都对此事进行了全面的报道。

政治谋划失败之后，蒋介石试图通过军事上的打击使得中共在谈判桌上屈服。所以，就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第二天，蒋介石就授意其亲信何应钦，大量印发他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反革命“围剿”时所炮制的“剿匪手册”，发给国民党军官。用“赤匪不灭，军人之羞”的法西斯教条，加紧在军队中实施反共内战动员，并密令其部下“努力进剿”解放区。九月初，国民党军傅作义部进攻我察哈尔解放区，迫近张家口。九月下旬，国民党军阎锡山先后以十三个师的兵力向我晋东南解放区的上党地区进攻。在国民党匪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据不完全统计，被国民党军火烧、活埋、剥皮而死的就有七八十人，被捕失踪的百余人，牲畜财物也被洗劫一空。蒋介石为了进攻解放区，不仅指挥伪军充当反共内战的急先锋，而且穷凶极恶，卑鄙无耻的指使大量的日寇帮他打内战。日本投降已经三个月，美蒋控制下的日军94%，不但没被缴械，反而在蒋介石“恢复失地”的命令下，变成“剿共”的第一线兵力。青岛的日军公然进攻被我军解放了的即

墨、胶县；济南的日军攻占我军解放的淄博矿区。阎锡山的两万军队编为“山西先遣队”，并任命日本军官到晋绥军区充当军官和顾问。在进攻上党的时候，阎锡山的部队就是在日寇华北驻屯军十四旅团的支援下，从临汾、浮山、冀成等第出发，攻占我上党盆地中心的长治市及其周围的全部县城，把上党军民在抗日战争期间用血汗换回来的胜利果实抢过去。

在政治和军事双方面都没有取得任何有利的形势下，蒋介石才被迫坐在谈判桌前，认真的和中共开启了谈判的进程。最终在中共和人民的抗争下签订了《双十协定》。但是，在这期间，蒋介石对中共的攻击，对民主的破坏一直都没有听过。当蒋介石内战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之后，便毅然撕毁协定，发动了第三次国内战争，他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也真切的摆在了全国人民面前。蒋介石从来就没有放弃他所坚持的内战独裁方针，抗战胜利后，他所进行的不管是与日伪军合流，军事上的进攻，还是政治上的假意争取和谈，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内战，为了建立独裁政府做准备。

注释：

①孙其明：《和谈、内战交响曲——毛泽东喊胜利初期和在蒋介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9 页。

②③④⑤《重庆谈判纪实》（一九四五年八——十月），重庆出版社，1984 年版，第 84 页，第 419 页，第 36 页，第 420 页。

中国共产党力争战后和平民主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中日民族矛盾也随之不存在了。而中国人民同美国所支持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内战随时威胁着中华民族。中国面临着一场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蒋介石在坚持内战独裁方针的同时，中共也给予了有力的回击，采取一切措施来争取战后的民主、和平，使中华民族免于又一次灾难。

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建国这一方针是在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需要在民主基础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中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同时讲道：国民党"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①]这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的政治主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治形势的特点是，由中日矛盾为主转为国内矛盾为主，国共两党的关系成分为国内斗争的主要内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是争取"和"，准备"打"，并将工作的基点放在"打"上。只有这样才能进退有据，保证中共及人民军队立于不败之地。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了乞降照会。随后，中共中央在8月11日发表的《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以及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演中都清楚地阐明了上述观点。在讲演中，他深刻的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战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

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2]这就明确的指出了战后中国基本的政治形势，首先要使党内对目前的政治形势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同时，毛泽东也预见到虽然内战的危险性很大，但是国内暂时出现和平的局面还是有可能。所以，党的方针是，争取和平，但同时也要准备应付蒋介石发动内战，并且把全部工作的基点，放在壮大自己的力量，应付最坏的可能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要特别注意不能再犯国民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革命再受一次损失。我们所采取的方针，不是要以忍让来求和平，而是要“寸土必争，针锋相对”、“以战求和”。通过这次讲演党内人士的思想觉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

同时，毛泽东在这里也指出：“除了我们的觉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今天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也已经是大大地提高了。我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高。但是，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蒋介石也在努力散布这种幻想。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3]中共之后所采取的许多措施都是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尤其是毛泽东在明知蒋介石的和谈只是拖延之计，仍飞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虽然是为了尽力争取和平，但是更主要的为了在人民面前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这样才能使人民更好的与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方针作斗争，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这样。

中共当时之所以确定争取“和”、准备“打”的方针，主要是基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国家经济破坏，人口伤亡严重，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有的垮台、有的削弱；战前各国之间积累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人民需要和平，统治集团也需要和平，都希望世界出现一个互相妥协的稳定局面；国内经过八年抗战，人民早已是伤痕累累，对于战争更是避之不及。国际国内此时都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疗治战争创伤。而且，当时的美国政府从它战后的利益考虑，希望战后的远东有一个和平的局面。最主要的是此时，国共双方力量对比，中共处于较弱的一方。当时国民党握有全国政权，军队多，装备好，控制的地区不仅大，而且都是资源丰富的地区，外加上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中共还不能贸然与之发生正面冲突。据此，中共提出争取和平的方针是有必要的，有

益的。为此中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战后，蒋介石在命令自己的嫡系部队尽快的到达沦陷区“接收”日军投降时，也发出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原地待命”的命令，试图阻止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沦陷区的接收。8 月 13 日，毛泽东就此在《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中，给以坚决驳斥，指出“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的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的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④8 月 16 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所写的一篇《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中明确指出：“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⑤毛泽东早就认为，蒋介石在战后独占抗战胜利果实和发动内战的方针已定，而蒋介石的命令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因此，中共必须带领人民针锋相对，坚决反对内战，极力争取和平。但同时也要做好应战的准备，不让大革命的失败再次重演。

为了回击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备不测。在蒋介石两手准备的同时，中共也是两手准备，一方面，积极争取和平，向人民揭露蒋的内战真面目，另一方面，号召各个解放区军民对日伪开展全面大反攻，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积极的收缴日伪的武器装备，要求解放区军民，要提高警惕，充分做好应战准备。早在 8 月 10 日到 11 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接受日本投降。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号召下，八路军和新四军努力争取更大的胜利果实。“在两个月的英勇作战中，共毙伤俘日伪军二十三万余人，收复了张家口、邯郸、菏泽、烟台、威海卫、涟水、泰兴、淮阴、淮安等中小城市二百多座，并一度攻入保定、石家庄、归绥、天津火车战、上海火车站，包围和逼近了北平、天津、上海、青岛、太原等大中城市，切断了北宁、平绥、津浦、正太、平汉、广九等重要铁路线。”⑥国共双方都积极的接收沦陷区，迅速的扩展了自己的势力，内战似乎一触即发。

而就在这个时刻，蒋介石却又笔锋一转，分别于 8 月 14 日、20 日、23 日向毛泽东发出了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商讨和平建国大计。美苏在这个时候都不希望中国打内战，而且战后人民更是不希望内战的再次

发生，和平是民心所向。蒋介石为了抵制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摆出和平的姿态，试图把内战的罪名嫁祸给中共。而且蒋介石之所以摆出这么高的姿态，连续三次电邀，是因为他认为毛泽东根本不会来。蒋介石的高姿态，使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民再次欢呼起来，开始热切的盼望毛泽东可以来渝谈判。如果中共在这个时候一味地加以拒绝，不仅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无法理解，共产党也势必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动，甚至被孤立起来，正好中了蒋介石的圈套。从当时《大公报》发表的一篇社论我们就可以看出："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关注延安的态度。国家必须统一。不统一则胜利不完全，而建国则更困难……目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函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能由此开政治解决之门。"⑦为了进一步揭露美蒋的政治骗局，尽力争取和平，团结广大的人民。在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中国吉斯林们及其他反动分子们的各种危险活动，重大地威胁着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必须严重警戒与击破敌人的阴谋。"⑧同时还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应采取的紧急措施。2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个同志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一起，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心同意毛泽东去重庆。26日，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汇报了上一夜的决定，他说："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当日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到的一点就是苏联对延安的影响。在此之前，斯大林曾给中共中央发来一个电报，要求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邀请。电文中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毛泽东应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⑨毛泽东赴渝这一消息一宣布，得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拥护，同时也使得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没有得逞。但是，党内及其一些人民群众还是担心毛泽东的安危，对此，毛泽东认为，危险是有的，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最重要的是，中共的力量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壮大，人民强烈希望和平，以及世界各主要大国，都不希望中国打内战。这些客观形势的存在，使得毛泽东相信，蒋介石还不敢公然加害于他。8月28日，毛泽东毅然踏上飞往重庆的飞机，开启



了历时一个多月的重庆谈判之旅。

众所周知，蒋介石最善于使用两手，即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中共在破除蒋介石的政治阴谋的同时，在军事上也做了相应的准备。毛泽东在临行前，就此也做出了指示："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但是无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他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10]甚至，在他即将上飞机的那一刻，告诉那些担心他安危的人，说："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的越好。"历史最终也证明了这一点。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再次指示，要坚决反击一切敢于入侵解放区之敌，直至其缴械投降。正是这样正确的方针，才打退了国民党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上党战役。九月初，阎锡山在日伪军的支持下向我晋东解放区的上党地区进攻。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带领太行军民奋勇反击，在"必须把插进来的敌人消灭，保卫上党"的指导思想的指引下，同仇敌忾，团结战斗，最终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后方军事上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重庆谈判桌上的斗争。蒋介石企图利用军事上的胜利来威胁中国共产党以求扭转政治上的不利局面的阴谋也再次以失败告终，迫使蒋介石集团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与中共认真的进行磋商，最终才在一个多月之后签订了《双十协定》。

中共通过这些行动向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中共求和平的诚意，希望战后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意愿。它与国民党据理力争，揭露了其"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让广大人民看到蒋介石的真实面目，认清眼前的局势，揭穿蒋介石污蔑中共的谎言，这其实也是毛泽东此次赴渝参加谈判的重要目的。同时，也证明了一点，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作斗争，要"以斗争求和平，以斗争求团结"，一味的妥协退让只能让对方变本加厉。同时在斗争的时候，也要灵活的运用斗争方式，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对于敌人的和谈和发动战争都要有所认识，才可以在斗争中不至于处在被动的地位。

注释：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 年版，第 1029

页，第 170 页。

②③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 11 页，第 12 页。

④⑤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137 页，第 1138 页。

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大事月表》（修订本）（一九四五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3 页。

⑦孙其明：《和谈、内战交响曲——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初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2 ~23 页。

⑧四川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编：《重庆谈判资料选编》，第 1 ~2 页。

⑨《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 年 4 月版，第 180 页。

⑩《重庆谈判纪实》（一九四五年八——十月），重庆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6 页。

社会各界的和平呼吁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奉行内战独裁方针，迅速与日伪合流，借助于美国的势力，开始迅速进占华北、华中地区，抢占胜利果实，为内战做准备。而中共也不甘示弱，毛泽东针锋相对，拒绝执行蒋介石所下达的要八路军和新四军“原地待命”的指示，要求我军继续快速接收日伪所占领地区。而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时候，蒋介石要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而毛泽东明知道是“鸿门宴”，却毅然赴会。这里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民意。

中华民族在遭受连年的军阀混战、内战和八年的抗日战争之后，整个中华大地满目疮痍，人民也常年饱受战争之苦，当日本向同盟会发出乞降照会这消息传到人民耳中时，高兴和喜悦自是不言而喻。终于迎来了曙光，人民最希望的当然是和平、民主，建立一个统一的新中国。这就是当时中国人民最大的愿望。国共双方都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双方进行谈判，都是为了争取民意，使自己在政治上获取完全的主动权。

翻开当时的有关资料我们不难看出人民的想法，当时除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立场，社会各界，各个阶层的人民群众纷纷站出来表明自己对于和平的向往。载于《新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表明了当时人民的愿望：“我们要建国，所以我们要民主。……我们要建国，所以我们要和平。文明国家恪守主义法律，至少一国之内不相仇杀，内战之事，不但可耻，亦且表示无能。……我们要建国，所以我们要统一。……我们要民主！我们要和平！我们要统一！我们要进步！要！我们要！大家决心要！要即有！”①

首先，各党派都发表声明，摆出了自己要和平的观点，并且提出了自己对时局的主张：

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中，指出：“毫无疑问，我们坚决的要求民主，一切反民主的都是我们所不赞成的。毫无问题，我们要求一个完整的国家，凡一切可以制造分裂或引起内战

的姿态和措施，也是我们要坚决的排除的。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民主统一，和平建国。……今后一切的党派只有事事为着人民才有光明的前途，我们现在正是以人民的名义向你们叫出热烈的呼喊，请你们千万不要忽视。”为了实现“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八字口号，同时发表了自己的主张，要求：“修改国民大会的选举法和组织法，实行普选，回到南京堂堂正正的人民面前召开国民大会，颁宪法，举总统，成立宪法政府。回到南京后，要积极的开始筹备，并需要有全国的各方面共同参与；政府以明令重申保障人民的一切基本自由，包括各党各派的公开活动，并废止一切在战时不得已妨碍人民一切基本自由的法令与机构；主张由政府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解决当前一切紧急和重大的问题；主张在政治会议中，组织一个全国性的裁军委员会，本着公平原则，将军队裁减到国防所必需的限度，用于国家和平的建设。一切军队职能属于国家。在民主政府实现的条件下，一切军政令应该绝对的统一；主张切实注意经济的复原，对收复区人民的生活予以有效的救济，并扶助迁回收复区人民的复业。政府要对收复区在沦陷时所流通的货币，做以合适的处理，对原有的业主给以切实的保障，并调解其纠纷”[②]除此之外，还要求政府停止抓壮丁和对日审判时要听取全国人民的意见。

中国农工民主党领袖章伯钧在接受《新华日报》采访的时候，对目前的时局也发表了谈话：“现在战争结束，胜利到来，举国人民都一致希望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凡任何形式之内战及军事行动，不仅要遭受国人之坚决反对，且为友邦所不许。吾人深切希望当政十八年之国民党，顺应世界潮流，接纳人民要求，把握国家统一之重要关键，由民主大道，进行三民主义的建国工作。凡我全国党派，无论在朝在野，均应以和平建国为共同目标，不算旧账，不结新怨，更不以未来之威胁厉害观念，而阻挠当前民主统一事业之进行。”与此同时也发表了该党的政治主张：“国民党应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他还特别讲到，对“解放区之军队及政权问题之解决，须着眼于实际情况”，因为“此等军队与政权，系有当地人民取自敌人，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至于“行政系统之统一，军队还于国家”，其“实现条件在以全国政治能真正民主化”。他还建议盟国要彻底摧毁日本的侵略基础；对汉奸伪军“不可姑息利用”。[③]

中国青年党对目前的时局也发表了自己的主张：“从速召开建国会议



（或政治会议），以奠定团结基础。”[④]

上述各党派的言论，明确的表达了其要求和平和民主的想法，同时，也指出了谁要是破坏和平，挑起内战，谁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这些舆论不得不引起国共双方的注意。除此之外，其他的社会各界，如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等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指出：“我们需要和平团结，需要民主统一，需要休养生息，需要经济建设，从而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准与文化水准。这是经济界历经苦难后的愿望，也可以说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反之，任何妨害民主和平的行为，都非我们经济界所愿见，也一定是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所反对的。”同时他们也代表工商业者，对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提出要求：战后“需要和平，需要民主统一，需要休养生息，需要经济建设”，以适应“建设民主化工业化”的新时代。并要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事，取消“各种不合理的捐税和摊派”“严惩工商界附敌汉奸，并没收工厂、矿场、船舶、银行”，以补偿实业界因战事所受损失。[⑤]

中国妇女联谊会也向社会发出了对时局的宣言：“这个国家绝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因此也绝不容许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仍然停留在分裂、落后、不团结、不民主的局面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方面是如何巩固彻底的抗战胜利，另一方面则是怎样在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去和平建国。……中国人民，特别是我们妇女，在抗战中已付出了最大的代价，我们有权利要求在战后享受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的生活。……我们怎能容忍在已获得和平后，还被抛进贫困、饥寒、死亡、压迫里。”[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为庆祝胜利告国人书中称：“当全国人民用狂热，用笑泪并发的感情来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的今天”，“人民的心理依然波动着一股焦虑，甚至笼罩着愁云，人民有痛苦的负担，人民有深沉的愿望，当胜利突然来到的今天，严重的问题依然严重地横在面前”，因此，“就无法不在狂喜的同时感到焦虑，感到茫然，甚至感到悲怆了”。同时强调：“本会敢诚恳地提出处理国事的三大目标，曰团结、曰民主、曰和平、这是全国人民所祈望的目标，但它们的祈望能否实现，又以民主政治的能否实现为中心。本会要求一切政治力量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并且要求马上采取有效的步骤来确定实现的日程。要这样才能够一方面消灭全国人民所忧惧的内战危机，实现全国人民所期待的百年建国大计，使人民有所依附，……本会指出：紧急的时机不应放过，人民的愿望不应忽视，国家的打击不

应拖延。无论在朝者或在野者。凡是能够推动或阻碍这个伟大事业的人士，都应该知道，现在正是处在人民的迫切期待与严厉的的监督面前。”⑦

昆明各界人士为庆祝胜利及和平建设新中国发向全国同胞发表通电，通电中表明：“我们除开对这次谈判明确表示我们的态度，认为国共两党应该竭诚相见，以人民利益为重，采取公开方式，邀请其他民主党派及进步人士参与协商外，我们更应正视现实，贡献出一切力量，为这次谈判的圆满解决及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⑧

除此之外，还有《新华日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的社论，以及各党派的一些有识之士，如张澜、柳亚子等纷纷发表文章，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无一例外都是希望全国迅速建立起一个和平团结的国家，希望国共双方可以摒弃前嫌，坐下来真心实意的商谈。同时，还告诫了意图破坏和平的反动人士，不要忽视民意。

不仅国内如此，国外的爱国华侨和学生等也发表文章，呼吁要祖国和平，团结。要各方坚决杜绝内战的爆发。

纽约中国学生呼吁祖国团结，主张用民主方法制止内战危机，联名致电蒋委员长、中共领袖毛泽东和中国民盟主席张澜，向他们呼吁用和平方法解决中国内部问题。声称：“当此敌人投降、举世欢欣的时候，我们国内的内战危机似乎却愈来愈明显，愈急迫了。因此我们要向各党诚恳呼吁 ：立刻进行会商，用民主方法解决一切分歧之点，国运前途系此一举了。”⑨

加拿大九团体联名致电国共两党领袖，要求双方防止内战，取消一党专政，完成民主联合。电文声称：“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目前的谈判，结果能重新接近，以防止任何内战。现在最必要的，是立即取消一党专政，并尽早完成民主的联合。”⑩

纽约侨领李国钦致电毛泽东主席，“我们祈求先生尽最大的能力，使这一众人热望的情形能够实现，使我们受尽艰辛的民众能享受和平的果实，尽心尽力，贡献于战后我国的建设。我并不属于任何党派，仅以先生的同乡和旧同学的资格，向先生作个人的呼吁。”

这些无论是民主党派，还是无党派以及社会各界贤达和海外华侨均表达了自己的对于战后和平的期望，希望国共双方可以摒弃前嫌，和平建国。整个中华民族人民求和平团结的愿望如此强烈，使得国共双方在放开手脚做事的时候也不得不有所顾虑。就连毫无知识的农民和开明地主出于自身的利益也希望民主的到来。“毛泽东来了也好，这班收生的，发国难财的该下台

罗！”开明地主如是说。一位农民也说：“毛泽东来了，实行民主，乡长保长全要让我们重新选过。”大家在这里所说的话，不光是对毛主席的欢迎，更多的其实是对民主和和平的向往。因为只有这样，人民才可以过上好日子。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了把发动内战的罪名推向毛泽东，而向毛泽东发出了邀请，而毛泽东则是为了在人民面前揭露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而欣然赴重庆参加谈判。谁要是在这场角逐中获胜，谁就获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也就赢得了民心，取得了一半的胜利。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说重庆谈判的发生是必然的。

注释：

①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编：《重庆谈判资料选编》，1979 年版，第 51～52 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重庆谈判纪实》（一九四五年八——十月），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35～138 页，第 139～140 页，第 141 页，第 143～144 页，第 145～146 页，第 148～150 页，第 158 页，第 176 页，第 177 页。

重庆谈判中的双方博弈

重庆谈判是国共两党一场针锋相对的尖锐斗争，是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路线同国民党反动派卖国、内战、独裁路线的一场严重复杂的阶级斗争。同时也是双方力量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势力由强变弱，随后失去了民心，在短短的三年内便使得蒋家王朝轰然倒塌；而对于共产党来说，却是一个由弱变强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带领着广大人民群众奋勇反抗，打败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集团，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带领人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虽然毛泽东是 8 月 28 日到达的重庆，但是真正的谈判时从第二天开始的。也就是 8 月 29 日，直到 10 月 10 日《双十协定》的签订，历时 43 天的谈判从一开始便是困难重重，双方都观点明确，一开始就针锋相对，使得谈判陷入僵局，最终还是在中共的让步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次谈判，正式的谈判地点是在中山四路德安里 101 号，双方的谈判代表：中共的代表是周恩来和王若飞；国民党方面的代表除了张治中之外，还有邵力子、王世杰和张群。谈判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个是两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直接进行交换意见；另一个是两党谈判代表之间的磋商。在渝期间，毛泽东和蒋介石共会面 11 次，大多是公开场合，但两人几次重要的会谈都是秘密的，有时甚至没有其他人在场。

谈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8 月 28 日 ~9 月 3 日，因为蒋介石并没有想到毛泽东真会赴渝谈判，所以，事前没有做详细的准备，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具体的谈判方案出来，只是就政治、军事作一般性的意见交换，且未设专人记录。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和蒋介石就国共谈判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进行了直接商谈。双方互相提出自己的方案，为下一阶段的实质性谈判做准备。第二阶段，9 月 4 日 ~9 月 21 日，在这期间，由于中共在 9 月 3 日提出了具体的谈判方案，才使得国共双方在 9 月 4 日之后进入实质性的谈判期。就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第三阶段，9 月 22 日 ~10 月



10 日，这期间，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在中共多次作出让步之后，一周之后才重启谈判，最终在 10 月 10 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8 月 28 日，毛泽东在机场向新闻界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晚上，毛泽东与蒋介石的首次见面也是轻松、愉快。双方的交谈多以叙旧、寒暄为话题，没有涉及任何实质性问题。

第二天，也就是 8 月 29 日，双方才进入正式的交谈。但是从一开始，双方的分歧便立即暴露出来。首先中共谈判方针是十分明确的。“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但是具体的方案双方都没有。而蒋介石却说：“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但当毛泽东说：“中共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久和平能够实现……”，话还没有说完，蒋介石就立即打断说：“中国没有内战！”,[①]随后，毛泽东以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的大量史实给以有力的回击。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蒋介石根本就没有谈判的诚意，第一次交锋，便是这样短兵相接，谈判前景不容乐观。

经过最初的几天泛谈，9 月 3 日，毛泽东在约见王世杰时，对国共两党谈判提出了八项原则性意见。当晚，毛泽东与蒋介石就中共军队组编数目、军队驻扎、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之旧代表等问题进行商谈。同时，中共方面正式提出一份包括十一项内容的谈判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并于当天交给了国民党的代表，作为进一步商谈的基础。由此开始，第二天才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阶段。

9 月 4 日上午，蒋介石便召开会议，就此作出应对之策，亲拟《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的代表们，要他们据此拟出针对中共提案的具体对策。《要点》开头便说：“中共代表们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条尚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矛

盾，即不应提出。”[②]中共方案的第一、二条即表示中共要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蒋介石当然感到满意。但是除此之外，则完全拒绝。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根本就没有和谈的诚意，只是一味的要求中共接受他的安排。对此，中共制定的谈判方案是“据理力争”。

双方对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的基本原则都是一致的，但是一到如何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时，争论便无法避免。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解放区的军队和政权问题。中共的基本立场是：国民党政府必须承认人民的抗日武装和解放区的民主政权。而对此蒋介石就以“军令政令要统一”来加以破坏，不接受中共的要求。为了和谈从一开始不陷入僵局，尽力争取和平，中共不断的让步，修改自己的谈判方案。

在军队问题上，主要是军队数目和军队驻地的两点。首先在军队数目上，我们最初的方案是：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时，应允许中共的军队编为 16 个军 48 个师，占现在国民党军队总数的 1/6 左右。蒋介石在要点中就此指出：中共要缩编为 12 个师，这是最高限度。而谈判时，张治中则直接说数字太大，而拒绝接受。中共这是在扩充军队。为此，毛泽东决定做出让步。关于中国军队数目，中共仅要求达到全国军队的 1/7 即可，如国民党军队现为 263 个师，中共军队可缩编为 43 个师。以后国民党军队缩编，中共军队亦可以上述比例递减，如国民党军计划缩编到 120 个师，共产党的军队照比例减下来，可以缩编到 20 个师，占 1/6，甚至还可以少到 1/7。对此，在讨论中，国民党仍然是不能接受。张治中说：“关于军队问题，兄等要求太过，不必讨价划价。余以为此一问题，非距离大小问题，而为根本观点不同的问题。”关于军队驻军问题，中共最初指出军队当然要驻在解放区，但是之后又指出：可迅速将我党领导的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八个解放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线以北地区，之后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之军队撤退，而将中共所有之 43 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与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何以。张治中说：“不可笼统地说‘黄河以北地区’或‘陇海路以北地区’，要明确地指出。”王若飞的反驳反应了问题的实质，他说：“那么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

在解放区政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最初要求“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但是蒋介石在回答的时候，直接说“承认解放区，绝



对行不通"。之后，中共又提出，"在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参加东北行政组织。"而国民党认为这是地方割据。为此，中共再次做出让步，"在我党现有之地区实行普选。"最后，提出了"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交由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坦白言之，即欲请国共双方两方面以外之第三方面人士前往解放区实地考察，看看解放区是否真正实行民主，如果真正实行民主，则政府何必阻止地方行政职行政之进步。"即使是这样，国民党仍然没有答应，也被蒋介石借口"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而拒绝。

最终这两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对于中共的一再让步，国民党并没有给以认真的考虑和对待，因为不管怎样这些都是蒋介石集团所无法接受的。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中共最初提出的《对中共谈判要点》的十一项内容中，除了中共承认蒋介石的地位之外，蒋介石一概拒绝，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脑筋深受刺激"。

在重庆谈判的前前后后，美国一直插手其中。此时，面对国共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赫尔利再次站出来"协调"。9月21日，赫尔利从上海、南京视察后回到重庆，先与蒋介石会谈，随后又约见国共双方的谈判代表。在会谈中，赫尔利向中共施加压力，企图以再增加4个师的数额来换取中共交出解放区政权，并要求周恩来、王若飞立即请示毛泽东。对此，毛泽东在会见赫尔利时，明确指出，中共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可以想出合理的办法解决，不会向分裂的方向走"。他表示，对于中共部队编为20个师的提议，可以接受，但是在解放区问题上，还要进一步商谈。赫尔利的卑劣做法最终被中共给戳破，其"协调"失败。但是为了大局考虑，中共还是以委婉的姿态尽量解释，一方面大原则不动摇，另一方面也尽量做出让步，使得谈判不会完全破裂。

中共在做出很多让步的同时，也努力争取社会的同情。蒋介石在这一时期也认识到一味的高压政策是无法使中共屈服的。而这次举世瞩目的谈判如果一旦破裂或是无果而终的话，定难以向国内外交代。这使得蒋介石也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主动要求重开谈判。最终谈判在停止一星期之后重启，但是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周恩来意识到再谈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希望在毛泽东回延安之前可以向外界就双方这些日子的谈判发个布告。10月2日会谈

时，双方同意将一个多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其中总的方针、军事问题、政治会议问题等等或已双方同意，或彼此意见接近，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以解决人民之渴望。10 月 5 日，周恩来将他起草的《会谈纪要》提交讨论。

最终在我党积极努力、坚持斗争和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压力下，国民党反动派不得不表示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和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商讨结束一党专政的统治。最终双方在 1945 年 10 月 10 日在桂园客厅签订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随后毛泽东偕王若飞，在张治中的陪同下返回延安。周恩来留在重庆，王若飞很快从延安返回，与国民党继续商谈未达成协议的问题。至此，重庆谈判结束。

《双十协定》的产生，表明了此次重庆谈判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尽管许多关键性的问题还没有达成协议，尽管达成的协议还只是一纸空文，但是蒋介石总算是被迫接受了中共的某些请求，承认了和平民主的建国方针，它给了渴望和平民主的中国人民一个安慰，使人民感到还有希望。

同时，重庆谈判的事实，也告诉我们，对于反革命的顽固派，我们只能“针锋相对”，以斗争求团结，而不要奢望蒋介石集团的主动退让，不能再犯右倾的错误，一味的退让，只能使反革命者变得更加凶残，革命力量的损失更大，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者的仁慈上，和平是永远不会来到的。

注释：

①②《重庆谈判纪实》（一九四五年八——十月），重庆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89 页，第 189 ~ 228 页。

《双十协定》的签订及其意义

重庆谈判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双方在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两方面根本就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尽管中共已经做出重大让步，但是蒋介石仍然不满意，以“军令政令要统一”拒绝承认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使得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但是经过激烈的唇枪舌战后，蒋介石最终迫于国内外形势，仍不得不表面上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团结的方针。协定的条文基本上拟就后，国民党方面仍一拖再拖，后来由于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的军事进攻，在上党地区遭到惨败，再加上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强烈呼声以及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同意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由于签字这一天是10月10日，所以简称《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于1945年10月10日，在桂园签订，签字双方代表分别为：中共方面为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方面是邵力子、王世杰、张群和张治中。双十协定的具体内容为：

中国国民政府蒋主席于抗战胜利后，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先生，商讨国家大计。毛先生于8月28日应邀来渝，进见蒋主席，曾作多次会谈；同时双方各派出代表，政府方面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四先生，中共方面为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都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商谈。已获得下列之结果，并仍将在互信互让之基础上，继续商谈，求得圆满之解决。兹特发表会谈纪要如下：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第一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平之新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作，为达成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

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先采必要之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延缓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等三项主张。政府方面表示国民大会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其名额可使合理增加，和合法的解决，五五宪法草案，原曾发动各界研讨，贡献修改意见。因此双方同意成立协议。但中共方面声明，中共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坏团结，同时双方均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

一致认为政府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全部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皆有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

（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

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人民之权。

（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

双方同意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唯政府希望不以影响国民大会之召开。

（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应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维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为24个师，并表示迅速将其所领导下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各地之部队，由上述地区，逐次撤退，应整编的军队调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



皖北的解放区集中。

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20个师的数目，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中共方面提出中共及地方军人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应保障人事制度，任用部队人员为各级官佐，缩编军官佐、应实行分区训练，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编制度，并确定政治教育计划。

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项，均无问题，亦愿商谈详细办法。中共方面提出解放区民兵，应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政府方面表示，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时，酌量编制。为讨论计划上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

（十）关于解放区政府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方面开始提出三方案，为依照现在十八个解放区的情形，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并即以原由民选之各级地方政府名单，呈请中央加委，以维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重划省区变动太大，必须通盘筹划，非短时间所能决定。同时政府方面表示：依据蒋主席曾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国军令统一之后，中央可考虑中共推荐之行政人选；收复区内原有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为党派关系，而有所差别。于是中共方面，提出第二解决方案，请中央于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山西、山东、河北5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省府主席及委员；于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等6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省府副主席及委员（因以上11省或有广大解放区或有部分解放区）；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4市，得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副市长。于东北委中共推选之人参加行政。此事讨论多次后，中共方面对上述提议所列推选省府主席及委员者，改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4省，请推选省府副主席及委员者，改为晋、绥两省。政府方面表示中共对于其抗战军事著有劳绩，且在政府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决定任用之。倘要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副主席等，则即非真诚做到军令之统一。于是中共方面表示可放弃第二种主张，改提第三种解决方案，由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重行举行人民普选，在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监督之下，欢迎各党派各界人士选贤参加举办。凡一县有过半数区乡已举行人民普选，实行民选者，即举行县级民

选，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省级行政区级民选，选出之省区县级政府，一律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此省区加委方式，乃非谋政令之统一，惟县级民选加委，可以考虑，而省级民选，须待宪法颁布，省的 地位确定以后，方可实施，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即恢复常态。至此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种解决方案，各解放区，暂维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之民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而目前则规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之恢复。同时中共方面认为可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方面，则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之悬而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继续商谈。

（十一）关于奸伪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政府方面表示，此在原则上自无问题，惟惩治汉奸，要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妥慎办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

（十二）关于受降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①

由上面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其实《双十协定》并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大部分都是留待政治协商会议上继续商讨，大部分都是官方套话，在政治民主化问题上，原则上双方都同意，但是对于具体方案，是先军队国家化还是先政治民主化，双方的意见不一致。尤其是关于军队国家化和解放区政府问题，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双方只是把自己的想法都写在了协定里面。

但“双十协定”的意义，并不在于国共两党达成了什么妥协。实际上，国共两党多年的对立与分歧，两党对国内外形势与自身利害考量存在的差异，双方的矛盾不可能通过一次谈判而解决，协定达成的实际妥协十分有限（最具意义的妥协是召开政协），同时具体而细微地列出了双方对于各项问题看法的异同点。“双十协定”的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会见并发表公报的形式，中共承认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国民党也承认了中共及其军队的地位，双方都可以从这样的表述中获得对方认可并需要的东西。由于中共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此次会谈采取了双方平等的形式，签订了正式协定，中共的地位被首肯，因此相比较而言，中共对协定的



评价更为积极。此后的10月17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上指出："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无论如何，"双十协定"对于国共而言，虽然形式效应远大于实际内容，双方对于诸多已决和未决问题仍是各说各话，但毕竟缓解了一度似乎迫在眉睫的内战危机，对于刚刚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苦难与艰辛、迫切期待和平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安慰，这是事实。

由于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参加谈判，从而赢得了全国的民心，把中共积极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很好的展现出来，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毛泽东在当时即说："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打击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足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②

重庆谈判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赢得了各界人士对中共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期间，同中外人士广泛接触，不仅会见左派、中间派，还主动同国民党右派人物接触；不仅会见中国人，还宴请了一些外国人，参加茶话会，向外国记者发表讲话，通过这些耐心细致的工作，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最大限度的团结了各方爱好和平的人士。

通过这次谈判，毛泽东更清楚地认识到，实现和平还需要经过艰苦的斗争。他强调，写在纸上的"和平建国"和事实是矛盾的，"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际，还要靠我们的努力"。③回到延安后的第二天，他就起草了《中共关于双十协定后我党任务与方针的指示》，在指示中，他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解放区问题未能在这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能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为此，"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④重庆谈判使中共领导人更加

坚信必须坚决依靠人民，壮大人民革命力量，才能求得和平。只有这样，和平实现后，中共和解放区才会有利的地位。

总之，《双十协定》的签订是人民的胜利，是通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同的争取所取得的成果，蒋介石面对中共的“据理力争、争锋相对”，再加上各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妥协，而中共却在人民面前展示了自己的诚意，破除了蒋介石对中共的污蔑谣言。最重要的是，谁要是先破坏了《双十协定》，谁就先失去了民心，那么也就必然会输。

注释：

①《重庆谈判纪实》（一九四五年八——十月），重庆出版社，1984 年版，第 250～254 页。

②张群生：《解放战争全记录——和战之间》，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82 页。

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156 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324～325 页。

中共在重庆谈判期间的统战工作

毛泽东曾说中国共产党可以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是靠着三大法宝，法宝之一就是统一战线。中共历来就注重统战工作，不管是在大革命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不管是在解放区，还是在国统区；中共都特别注重联系各个党派、无党派人士，尤其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尽最大的努力，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重庆谈判期间，也不例外。有人评论说，毛泽东重庆之行的主要成果并非签订了《双十协定》，而是在于自己的行动击破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散布的中共不要和平的谣言。毛泽东到了重庆后，除了参加谈判外，还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会见了左、中、右的各方面人士，连最反共的顽固分子，如陈立夫、戴季陶等，他都去探望，使中共的威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毛泽东亲赴重庆参加谈判，这本身就是统战工作的一部分，他用实际行动打破了蒋介石的谣言，使得中共一举夺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中共在国统区一般民众心中的形象也因毛泽东之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长期以来，国民党拼命的宣传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的“土匪”和“魔鬼”，是不要祖宗，不要民族文化的“群氓”，而毛泽东则是“匪首”。抗日战争开始后，尽管国统区的人民从周恩来等到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了解到这些宣传都是国民党的污蔑，但是广大人民因为长期没有看到过毛泽东，使得他自己的形象还有中共的形象在国统区人民的心中依然受到歪曲。这次毛泽东用实际行动告诉国统区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爱好和平的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党。一时之间，毛泽东成为人民的大救星。

1945 年 8 月 28 日，毛泽东一下飞机就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在书面讲话中，阐明了重庆之行的目的就是同国民党当局商讨团结建国大计；指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是全国人民面临的迫切任务；号召全国人民，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建设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再一次，在人民面前，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

使得山城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感动不已。

毛泽东在渝期间，什么人都见，不管是左派民主人士，还是无党派人士，亦或是顽固的右派分子；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的老百姓，他都见。

当然，见得最多的还是那些著名的左派民主人士。当初，毛泽东一到重庆，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黄炎培和郭沫若等人就前去机场亲自迎接。随后，毛泽东也在第一时间拜访了这些人士。除以上所提到的人物，主要拜访的左派人士还有宋庆龄、冯玉祥、柳亚子等。毛泽东与他们无话不谈，经常一谈就是几个钟头。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中共的和平方针和解放区的各项建设，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内战独裁政策，鼓励他们坚持斗争。毛泽东前往民盟总部看望张澜的时候，张澜表示不相信蒋介石有和谈的诚意，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讲什么信义！前几年我曾认真劝过他，中国只有实行民主才有希望，可他说什么？他竟然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民主，张老先生是不是受了赤化影响?'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蒋介石也喊起'民主'来。"毛泽东回答："我看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之后，他详详细细地向张澜解释了8月25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我们的宣言，简言之，就是：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划定中共军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召开各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之后，又谈到了延安的政权建设、民主改革、人民福利，以及生产、教育等等。在去看望宋庆龄时，毛泽东向宋庆龄介绍了国共谈判的近况，他说："我们经过努力，有些问题，如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召开政治会议等。已大体有了眉目。而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国民党则说与国家政令军令统一的原则背道而驰，不肯做出让步。"宋庆龄听着，她推心置腹地对毛泽东说："我想你们对于人民来说是重要的，现在各民主党派、全国各界人士都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应当坚持，为中国保留一些民主的净土。"这时，周恩来又向宋庆龄介绍了国民党政府加紧运兵，准备内战的情况。之后，宋庆龄又去找蒋介石质询，使得蒋介石无言以对。通过这些走访谈话，使得各民主党派人士对于中共政策更加的了解。

除会见左派民主人士外，毛泽东还遍访国民党军各界显要人物。孙科、



于右任、白崇禧、陈诚、吴铁城等人，毛泽东都一一拜访，就连陈立夫、戴笠这样的极右分子，他都拜访。一些人对此无法理解。毛泽东解释道："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跟反动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

毛泽东在见陈立夫时，陈立夫便直接说："润之先生亲自到陪都来，我们很欢迎。不过，谈判要成功，关键在于中共要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放弃一党的武力和政权，与政府共图新中国之建设。不然，政府即使想和，也没有办法。"毛泽东说："和平不是共产党一家的事，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第一次国共合作你我都是过来人，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后来若不是蒋介石一脚把中共踢开，怎么会有十年内战。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他还谈到：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就这样，毛泽东在谈笑自若中，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巧妙地给以批评，同时也向陈立夫介绍了中共对于国内时局的主张，提醒国民党看清人心所向。面对毛泽东的词锋的议论，陈立夫窘迫无以措辞，他不得不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①蒋介石也去看戴季陶，小道相逢，与毛泽东贴面碰到，蒋问毛泽东要去哪里，毛泽东说去见了戴季陶，蒋先是一怔，随后佯笑说。"好，见见好，见见好。"②毛泽东的这些活动，使得中共的统战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周恩来、王若飞还先后邀请一些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关心国事，并向他们宣传新民主主义的财政经济政策。这些民族资本家渴望见到毛泽东，希望从毛泽东那里进一步了解中共对民族资本的政策。于是，由"迁川工厂联合会"和"西南实业协会"等 3 个团体派出几位代表请求接见。9 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桂园接见了他们。毛泽东向他们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能够得到发展的，只有外国资本和买办官僚资本。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国应该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在这样一个新中国里，民族资本的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前途。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工人阶级同资产

阶级是有矛盾的。如果不承认这个矛盾的存在，那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但是，在现阶段，我们并不主张没收资本家的产业，而是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毛泽东希望他们转告工商界，要搞好同工人的关系。中共对于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并不是当做敌人，而是作为朋友来对待的。毛泽东这一席话，不但擦亮了这些资本家的眼睛，而且稳定了他们不安的心情。临别的时候，他们都向毛泽东表示，要为建设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③]

冯玉祥是被蒋介石集团排斥打击的一位知名人士。他同周恩来、董必武早有来往。当他在重庆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同毛泽东久久握手，向毛泽东热情问候，举杯敬酒，称颂毛泽东的到来象征了国内团结、和平。随后，他又设宴欢迎毛泽东。毛泽东对冯玉祥进步倾向的赞许，鼓舞了他在晚年向人民靠拢的勇气。不幸的是，1949 年冯玉祥从美国动身回国准备参加中共领导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在中途因火灾遇难，没有实现他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愿望。

除了毛泽东自己去拜会各界人士之外，他也会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来向人民传达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党，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在重庆期间，回答了《大公报》《合众社》、《路透社》记者的谈话，通过新闻媒体向人民扩大宣传，而且在国民参政会的茶会上，发表演说，以此向这些国民参政员表达中共的态度，让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他说："今后当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的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坚决避免内战，除此方针之外，其他任何方针均属错误。因此各党各派应在上述方针之下，团结一致，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④]

毛泽东来到重庆，除了会见国内的各界人士，也会见了外国人士，比如说赫尔利大使，韩国临时政府诸负责人，英国大使，外国记者，还有美国的士兵。在接见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曼三位美国士兵的时候，不仅与他们照相，还问候了美国的友人史沫莱特等，询问了美国的情况，而且告诉他们，虽然有人破坏中美友谊，但是中美友谊会长存下去，希望他们可以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告诉告诉美国人民，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

除了这些谈话之外，毛泽东还出席各种社交活动，比如说苏联大使馆举行的茶话会，加拿大大使举行的茶话会。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酒会上，有来自于各党派、妇女界、文化界、新闻界、工商界的代表人物，都对毛泽东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毛泽东祝贺斯大林领导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取得的伟大胜

利；还在桂园设宴招待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在重庆的国际友好人士。毛泽东感谢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支持。[⑤]

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王若飞在谈判桌前与国民党代表唇枪舌战力争和平建国，毛泽东则除了和蒋介石做一些必要的谈话之外，在重庆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会见社会各界人士和参加社交活动上，他与大后方的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接触，一方面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推动着重庆谈判期间的政治形势更加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取得了第一手资料，掌握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思想动态。后来，毛泽东回到延安，曾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说，他在重庆时，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又说：“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通过这些谈话和活动，最终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愈加深入人民，团结了大后方各界群众，联合了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同时，也尽可能的争取外国进步势力，得到世界舆论的支持，把统一战线工作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注释：

①之春编著：《重庆谈判》，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25～126 页，第 129 页。

②④⑤《重庆谈判纪实》（一九四五年八——十月），重庆出版社，1984 年版，第 428～429 页，第 120 页，第 475～485 页。

③李勇编：《重庆谈判》，新华出版社，1990 年 6 月，第 31～32 页。

整军谈判

整军问题始终是国共谈判中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因为国共双方都强烈地意识到军队的重要性。中共在革命实践中领悟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中国军队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必须谨慎处理。”蒋介石更是把军队作为维护独裁专制统治的法宝.

在重庆谈判中没有解决的军队问题，再一次拿到了政治协商会议上做进一步的讨论，经过多方协商，最终通过了《军事问题案》的决议。但是对此中共却有一定的顾虑，中共担心在没有完全达成政治民主化的情况下，就实行军事国家化是很危险的，刘少奇指出：“以军队国家化换取国家民主化的思想有危险性，国民党是不会使它的军队国家化和民主化的，在这一点上，不可有幻想”[①]显然，中共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但是如果不执行已经通过的政协决议就会使中共背上破坏政协、破坏民主的罪名，所以必须对整编军队采取谨慎措施。蒋介石在回答记者招待会上的问题时也说：“中国共产党若不欲放弃其私有军队，则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之一切努力，均归无效，而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亦等于具文。”[②]整编军队是政协决议的要求，即使中共对此担心，也必须遵守，只有在具体谈判整编问题的时候再加以说明，使得蒋介石想要凭借“军令政令统一”而消灭共产党的阴谋不能实现，又能够尽最大可能争取和平。

整军谈判是在三人军事小组内进行的，政协会议后. 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和准备，2 月 14 日正式开始整军谈判，至 25 日达成协议。时间虽然不长，只有 11 天，但会上谈判，会外协商，个别交谈. 不断地紧张进行，几乎每天都在继续进行，直到协议达成和体现协议的正式文件签字为止。整军谈判是围绕着马歇尔草拟的整军方案展开的。

所谓的三人军事小组是指有国民党方面派出的张治中、中共方面派出的周恩来和美国方面派出的上将马歇尔，为了区别北平军调部派出的军事三人小组，有一段时间，三人军事小组被称为“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这个



组织的成立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国共军事问题，而整军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关于整军谈判前马歇尔所提出的整军方案，其实是有一个形成过程的。最初马歇尔给蒋介石的整军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有四点："一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是国家最高统帅，统率全国海陆空三军；二是全国陆军编为六十个师，其中二十个师由中共领导；三是中国海军接受来自中共领导的部队官兵，其比率最少占总兵力的30%；四是中国空军接受来自中共领导的部队官兵，其比率不少于总实力的30%。"③这个方案很少有人知道，由于这个方案与蒋介石所一直主张的中共军队的数目最高限度是12个师相距甚远，而且方案中的军队比例更是蒋介石所无法接受的。中共双方一直在谈的都是关于陆军的比例，当时的中共根本就没有海军和空军，所以中共也从未提过。而这个时候马歇尔提出的方案却要给中共海陆空军的30%，这是蒋介石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接受的。最终这个方案被否决掉。马歇尔又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另外提出一个方案，中共和国民党陆军的比例是1：5，海空军两项全删去。

围绕着马歇尔新拟出的整军方案，国共双方开始了谈判。国共双方在会上争论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整编后中共军队数字问题。在重庆谈判中军队数目问题一直都是双方争论的焦点，虽然中共一再做出让步，但是蒋介石却一口咬定中共军队最高数目只能是12个师，对自己的军队却没有任何要求，甚至是想把中国军队彻底消灭。由于双方分歧太大，所以在《双十协定》和《政协协议》军事部分只是说："20个师可以考虑，交军事三人小组拟定方案时讨论。"而马歇尔也自信满满地想着可以在自己的协调下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当到了真正谈判的时候，国民党方面又缩回去了，重弹整编为10个师，12个师为可以考虑的最高限度。而国民党这样做的理由依然是"军令政令的统一"、"要建设现代化国家就不应该保有这么多的军队"、"中共的要求是在扩军而不是缩编军队"，对此，中共也给以有力的驳斥，"中共的军队都是用来抗日的"、"建设国家需要裁减军队，为什么只要求中共一方裁减军队"、"中共在抗日时牵制了大量的日伪军，不增加军队如何取得胜利"等等。中共的言词恳切，理由充分，使得国民党方面无法驳斥，双方的差距最终使得没有取得很大的成果，但是在马歇尔的建议，迫使国民党在国共军队比例问题上再一次让步。经过讨价还价．国民党不得不接受按照5：1的比例整编军队．即在从协定签字至12个月终了时，国民党军队裁编为90个

师．中共军队裁编为 18 个师；整编全部完成后，国民党军应缩编为 50 个师．中共军队应缩编为 10 个师。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

第二，是关于伪军的问题。伪军问题的实质是国民党军队的问题。因为不仅汪精卫的伪军是为配合蒋介石而建立，而且不少还是从国民党部队投过去的。所以当中共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时，蒋介石就狡猾地说：“原则上自无问题，惟严惩汉奸必须依法行之，解散伪军必须妥慎处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到了军事三人小组，文字上则写成：“所有受日本之直接或间接主使而在中国成立之军队，以及政府及中共以外之个人或派系所保持之一切军队，应尽速解除武装并解散之。”连“伪军”两字都不用，而且把它与所谓杂牌军、地方军并列。而且在这以前，蒋介石为了快速接收日军所占领的沦陷区，已经迅速完成了与伪军的合流。汉奸部队摇身一变成为“国军”，汉奸首领直接被任命为“总司令”、“总指挥”、“绥靖司令”参加了战后的接收工作，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根本就不会除去伪军，因为这会影响到他的战略布局。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方面理屈词穷，无力辩解，但最后还是中共方面让步，讨论才得以继续进行。结果达成的整军方案中，把伪军问题同所谓的杂牌军、地方军并列。整军方案说：“所有受日本直接或间接主使而在中国成立之军队，应尽速解除武装并解散之。”④

第三，后勤补给问题。蒋介石出于限共、溶共的险恶用心，到抗战中期以后，就对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补给拒绝按章办理，克扣阻挠，无所不用其极，以至连美国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都一再表示不满。中共方面指出：“自 1940 年以来，政府即无颗弹、片药、分钱、粒米之接济”，要求在盟国援助中国的武器弹药中公平分配给所有抗日部队。重庆谈判时，中共正式要求：“实施公平合理之补给。”到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上，中共重提旧事。国民党方面，初则诿之于“军需独立，补给须遵照经理法规”。后在理屈词穷之下，只得同意一旦整编完毕，补给照国民党军办理，并答应各补给区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在补给区开会时，双方军队的军长、师长均有权参加会议，讨论决定补给事宜。

第四，关于整编和统编的时间问题。整军分两阶段进行，首先是整编阶段，国共军队分别进行各自的整编，整编阶段结束时，国民党军队应编为 90 个师，中共军队编为 18 个师，双方军队比例为 5∶1。接着进入统编阶段，国民党军队进一步缩编为 50 个师，中共军队缩编为 10 个师，双方军队之比仍为 5∶1。由于国民党试图以“整编”为名吞并中共军队，所以提出



在12个月完成统编与整编。而共产党需要时间去争取政协决议的贯彻和联合政府的建立，因而主张中共军队在第一阶段12个月完成整编，然后再在为期六个月的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军队一道统编。马歇尔也说："在讨论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的问题时表露了共产党对统编过速的忧虑和国民党对尽快实现完全整编的愿望。""但中共并不反对统编"⑤双方争执不下，最后采纳了马歇尔提出的折中方案，达成协议：在本协定公布后之12个月内，应编成4个集团军，每集团军包括国民党1个军，中共1个军，每军3师，分别于第7、9、10、11月各编成一个集团军。各集团军之参谋人员，国共军官应约各占半数。上述12个月之时期完毕后之六个月内，国民党军队之比（以师为单位），东北为14∶1，西北为9∶0，华北为11∶7，华中为10∶2，华南（包括台湾）为6∶0。⑥

第五，整军方案中双方部队的配置和驻地问题，实质上是解放区、根据地问题。这是个最棘手的、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中共奉行的是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方针，自然非建立根据地不可。抗日战争开始，中共部队深入敌后，建立了更多的根据地，国民党对此是从来不肯承认的。到重庆谈判时，更一再要求，为了政令统一，所有根据地一律并入地方政府；为了军令统一，一切游击部队、地方部队，都归所在战区管辖。还说："战争已过去，解放区不复存在。"蒋介石就更直截了当，"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中共方面自然不肯轻易同意，把千辛万苦、出生入死而建立起来的根据地、解放区、人民武装轻易交出。但为顾全大局，表示如国民党能接受中共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各项意见，则愿把"中共军队集中到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并可迅速将领导下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的八个地区让出，军队复员。到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上，由于这个问题太复杂，双方意见距离太远，根本无法达成协议，最终也没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第六，关于宪兵和铁路警卫队的职权和组成问题。国民党的宪兵实际上就是特务。周恩来提出，应在整军方案中规定保护民政不受宪兵的干扰，限制宪兵的数额，并限定其职责以军事为限。关于铁路警卫队，主要是由谁来组织的问题。周恩来对据传在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领导下组织18个团的铁路警卫队表示担心。他提出，应在交通部领导下组织18个团的铁路警卫队。对国民党来说，特务统治和控制铁路线是关系到其统治是否稳固的根本性问题。张治中表示不能接受周恩来的建议。最后双方一致同意由张治中向行政

院建议，授权他与周恩来商谈铁路警卫队问题，在宪兵问题上与铁路警卫队问题解决之前，恢复交通的协议继续适用，根据该协议，国共双方军队的指挥官在各自区域内保护铁路线。

此外，还有一些次要的问题，如协定名称问题，铁路沿线障碍问题等，都有讨论到，但是都不是实质性、重要性的问题。虽然在整军谈判中，国共双方意见相距甚远，分歧也很大。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外存在的主客观条件，以及中共在谈判中所作出的努力，最终在1945年2月25日，军事三人小组在重庆上清寺尧卢，签署了《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整军方案”。这个方案规定，在整编开始后的12个月终了时，全国陆军应缩编为108个师（每师不超过1．4万人），其中中共部队18个师；双方编余人员应全部复员。到18个月终了时，陆军总数为60个师，其中中共部队为10个师。此外，还规定了国共双方部队的统帅权、统一编制的时间、地区配置以及地方部队的组织等。在这个方案中，国共军队按5：1的比例进行整编，对于已拥有120余万兵力的人民军队是一种束缚和削弱；但方案中包含着地方自治的原则，部分人民武装可以借助这个原则成为各省保安部队，从而得以保存。

通过的整军方案，对中共来说有它的两面性。一方面，在这个方案中，规定国共军队的比例为5：1，规定了国共军队在各地区的配置，规定中共领导的军队要与国民党军队逐步混编，而国民党军队在编制上占绝对优势。这对人民军队的发展无疑都是束缚。方案还规定整编结束后留下的60个师，全部由美国提供装备和训练，其中包括中共领导的10个师。这就对人民军队的存在和发展，更是严重的障碍。装备虽好，但是一旦美国不供给汽油，那么这些看似被武装精良的部队，打起来就是一堆废铁。但另一方面它又使中共军队取得了与蒋军的平等地位，且地方自治原则又保障了“解放区人民自己的武装不受国家军队的干涉”而且方案对于国民党军的整编、复员和配置也同样作了具体的规定，这对积极准备和策动内战的国民党来说，也将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因此，我们说，整军方案仍是中共在国共谈判中取得的又一积极成果。对此，蒋介石在签字后三天的日记中悲哀地写道：“与中共商定统编所部为十八个师之方案，业已签字，此为政府最大之损失。”

“整军协定”是共产党以强大的武装为后盾，与国民党进行积极、顽强斗争的产物；也是共产党利用美国企图政治解决中共的政策，巧妙地使马歇尔为我所用的产物。它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都有利于人民、有利于中国共产

党的。所以蒋介石根本不打算付诸执行，整军方案又将是一纸空文。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0 页。

②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 38 卷，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 年版，第 200 页。

③余湛邦：《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9 月版，第 56 页。

④孟广涵主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卷，重庆人民出版社，1989 年 10 月，第 986 页。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 64 页。

⑥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1945. 8～1947. 3.）（增订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133～134 页。

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背景及其相关准备

1946 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战后争取和平民主的最主要成果之一。它标志着中国政治民主化发生了实质性的进步，在会上蒋介石公开承认了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使得中国由“训政”进入“宪政”时期。在这次会议中，人民的权利得到了进一步的满足，在争取和平民主道路上划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政治内在需求的一种表现。中国自从进入近代史阶段，人民就一直在寻求民主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把清政府赶下台之后，却紧接着面对的是北洋军阀的割据混战和蒋介石的一党独裁，人民的权利和要求根本得不到满足，这是不符合中国政治进步、社会发展和人民要求的。抗战胜利后，人民在经受了连年战火，尤其是日本的欺凌之后，更向往和平和民主，都要求建立一个各党派都参加的联合政府。而这个时候国民党一党独裁显然就是人们攻击的对象。所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的内在要求。为此，双方在重庆谈判时也对该问题进行了交涉。

其实，早在 1944 年 9 月 15 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就提出了召开党派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之后，在 1944 年到 1945 年初的国共谈判中，周恩来再次提出，先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讨论召开国事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的相关事宜。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反对，直至抗战结束，此种会议一直未能召开。抗日战争结束后，1945 年 9 月间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在重庆举行谈判中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很多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都声明要留到政治协商会议上再做商谈。在《双十协定》中的具体规定是：“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



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商谈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①]但是在这协定签订之后，蒋介石并没有认真履行相关规定，而是集结八十万国民党军向各解放区发出进攻，根本没有能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可能，使会议召开的期限无限期地向后拖延下去。中国共产党对于蒋介石的独裁方针，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军事上打败了国军对解放区的进攻，政治上也是在极力表明自己要和平，希望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愿望，“我们中国共产党不仅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因为这是目前各党派与社会贤达协商国是的一个必要步骤，而且十分重视这个政治协商会议，认为要使这个会议真能有益于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推进，那就必须给予参加会议的各党派与各界人士以必要的准备时期及条件，诸如内战的停止，政治犯的释放，人民言论集会自由权利的保取与提案的研讨等等。最近两月来，我们中国共产党无时无刻不在呼吁和平，要求人民自由权利的实施，以及提案的准备和研讨。”[②]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民的反对，人民一直呼吁停止内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5 年 11 月 2 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发表内战的讲话，“从前蒋主席说过：中共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个意思，是绝对正确的。……目前政府准备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共已经是同意的，其他一切党派也都是同意的。我们主张，政府应该再十天以内正式召集政治协商会议。” 11 月 12 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发布对时局宣言，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要求“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加强其权力由全国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根据两党会谈纪要，切实解决有关投降、驻军，及地方自治等问题。” 11 月 18 日，成都各大学 21 个团体发表制止内战宣言，要求“将军队从独裁或反人民集团的手中交还给人民。我们要争取政治协商会议的从速召开，并希望这会议能有充分的内容和有效的决定来建立一个联合的民主政府。”[③]这些都充分表达了人民要求国民政府停止独裁方针，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强烈愿望。

最终政治协商会议得以召开当然是各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除了全国人民的斗争，还有国际舆论的催促，特别是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正视现实，迅速公开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马歇尔就说，“到了 12 月，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和我使华任务的宣布，在中国报纸和一般中国人中，热衷于政协召开的情况不断出现，12 月 31 日，国民政府宣布，蒋委员长已决定 1946 年 1 月 10 日为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日期，会议召

开日期直到1月23日。"[4]由此可以看到美国在这次促使蒋介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上的作用。这一点不仅国共两党知道，就连中间党派也了解。民盟主席张澜在政协开幕词上就说："不可辜负盟友协助的好意。"这个盟友就是指"美国"。美国在一开始就支持蒋介石，内战一结束，就帮助蒋介石运兵到前线"接收"沦陷区中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同时给你实际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并且要求日军不得向中国共产党投降。尤其是美国批准继续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六个月的租借物资，继续运送抗战后期存于印度、缅甸准备供给中国的物资，同时还将存于中国西部的美军物资转交给国民党政府。这些无疑是增长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气焰。但是，美国却发现，内战真打起来，蒋介石却根本就没有取胜，反而使中共获得了更多的谈判筹码和政治上的主动权，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支持。这是对美国在中国利益的一大损害。于是，美国被迫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改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停"，是因为美国这个时候认为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争取中国的统一，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已经相当的大，武力解决问题会损失很大而且这个时候的美国人民对自己政府支持蒋介石要打内战的政策也是反对的。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总统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中，指出："（一）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以使整个中国完全恢复于中国人民有效的管制之下，包括立即遣送日军在内。（二）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当中国照上述方针向和平及团结前进之际，用美国准备以一切合理的方式帮助国民政府重建其国家，改进其农业及工业经济并建立一军事组织，俾能旅行中国为维持和平与秩序而担负之国内与国际上的责任。"马歇尔来华之前，杜鲁门总统在给马歇尔的信中说："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我都切望能尽快地以和平民主的方法达到中国的统一。我希望你，作为我的特使，以适当而可行的方式，运用美国的影响，以达成这个目的。我特别希望你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的统一，同时实行停战，特别是在华北要实行停战。"[5]而且在稍后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中国的部分，再一次重申了要求中国迅速改组国民政府的要求。由杜鲁门总统的声明以及里面谈到的马歇尔来华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不支持蒋介石立即打内战，如果蒋介石一意孤行，则将失去美国的援助，对此蒋介石虽有不满，但不得不重视，这也是导致蒋介石宣布1月1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直接原因也是重要原因。



和平和民主是无法分开的，要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现政治民主化，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没有稳定和平的环境，各方也就没有心思坐下来开会共商国是，所以国共双方停止内战就成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提条件。最终在马歇尔的调停下，经过国共双方的努力，在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之后，同日，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而在这之前，对于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人员也经过讨论之后才最终确定了最后的方案。

关于政协代表的名额问题，早在《双十协定》签订之后，10月20日，国共双方的谈判中，就这个问题已经做出了讨论，最终双方一致同意，政协代表的名额为36人，由四方面组成。其中国民党方面9人，共产党方面9人，民盟9人，无党派社会贤达9人。然而，到了政协开幕前夕，蒋介石在代表名额上却又一次发难。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民盟与中共的关系一直很好，在政协会议上可能完全倒向共产党一方。而对于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蒋介石却没有把握可以全部拉到自己一边，这样，蒋介石就不可能操纵政协会议了，这是他所不允许的。蒋介石试图通过分化民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参加民盟的主要是是三党三派，即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和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民盟组织的松散使得蒋介石有机可乘。虽说民盟大部分人和中共的关系很好，但是其中的青年党却是亲国民党，所以蒋介石就想方设法要分裂民盟。1945年12月的一天，国民党方面的张群和吴铁城突然邀约民盟一部分常委召开座谈会，左舜生在吴铁城和张群的支持下，在会上提出无理要求“青年党在中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最大的而且最有历史的大政党。它在民盟三党三派中当然是最大的一个党派。民盟九个代表名额，青年党要占五席。”这样一来，民盟中的其他党派和无党派的盟员就只剩下四个席位，对此，其他常委相当生气，认为无法接受。罗隆基则直接说：“你有什么理由一开口就要五席？况且，这是民盟内部的事。你有什么想法，应当回到盟内去商量。你不该在这种场合提出来。”而这个时候的张群则作为和事佬，说“倘若民盟在代表席位分配问题上，真有困难，青年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参加政协倒是一个办法。”⑥事后，大家才知道这是国民党分化民盟的阴谋。最终，周恩来在征得延安同意之后，提出：民盟仍保持9个代表名额，青年党也可另成单位，推选5个代表。为使名额总数不增加，国共双方可将名额让出来，中共让两名，国民党让一名，以此类推。最终，代表名额确定：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9人，青年党5人，社会贤达9人。代表总数则增加到38人。正式参加会议的分别是：国

民党为蒋介石、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等9人，共产党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7人，青年党为曾琦、陈启天、杨叔明、余家菊、常燕生等5人，民主同盟为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等9人，无党派人士为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等9人。他们分别代表三种势力：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国民党和青年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总之，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但是1946年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在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的时候却突然的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这里很重要的原因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政治协商会议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召开，而且出席会议的代表又代表着不同的力量，必然使得政治协商会议充满着尖锐的斗争，也必然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力量同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方针作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建国的一个重要机会。

注释：

①《重庆谈判纪实》（一九四五年八——十月），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250页。

②《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③⑤《停战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第353页，第355页，第310页，第312页，第313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页。

⑥参见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较量

1946 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一场复杂的政治较量。参加会议的 38 名代表，虽然是五方势力，但却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和建国方针。会议的过程，就是三种政治力量、三种国家政权主张、三条中国道路的一场复杂的较量的过程。在蒋介石、周恩来、张澜的开幕词中，就分别代表三个政治集团含蓄地申述了各自的基本主张和态度。

1946 年 1 月 10 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首先由蒋介石、周恩来、张澜、曾琦、邵从恩分别代表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五个方面致开幕词。之后，11 日和 12 日，国共代表分别报告停止军事冲突商谈经过和国共重庆谈判经过。14 日到 19 日，进行大会讨论和分组会议。25 日至 31 日，先后通过了军事问题、宪草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国民大会问题五项协议、31 日，会议结束。在这里特别要提的是蒋介石在开幕词中作出的"四个承诺"：（一）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二）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三）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四）释放政治犯；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①]中国共产党刚好借此要求释放政治犯，虽未营救出张学良和杨虎城，但是成功营救了廖承志和叶挺。之后，进入了正式进入了讨论阶段。

在三个星期的时间内，共开了十次大会。实际上讨论问题从第四次会议开始直到第九次会议结束，依照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宪法草案五项议题分组进行讨论。由于各党派，特别是国共两党的立场不同，分歧在所难免。各方争论的焦点，实际上仍是在重庆谈判时未能解决的两大问题上，即要不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及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

队国家化。尤其是在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具体方案上讨论更加的激烈，争议更多。这五个问题除了军事问题，其余四个其实都是关于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的问题。

争论首先是在政府改组的问题上。国民党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扩大政府组织方案"，在里面，"一、国民政府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1/3。二、国民政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充任之．三、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四、国民政府委员会讨论及议决之事项如下：甲、立法原则；乙、施政方针；丙、军政大计；丁、财政计划及预算；戊、主席交议算项；已、委员1/3以上连署提出之建议事项。五、国民政府主席对于国民政府委员之决议，如认为执行有困难时，得提交复议，复议时如有2/3以上委员仍主张维持原案，该案应予执行。六、遇有紧急情形时，国民政府主席得为权宜之处置，但应予处置后，报告国民政府委员会。"[②]这个提案连起码的用人权也不给委员会，却用大量的篇幅规定了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利，包括了用人权、紧急处置权在内的各种权利，使之根本不受国民政府委员会这一机构的约束，这样这个机构也就完全成了一个空架子，而国民政府却称其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这一方案的提出，不仅遭到了中共和民盟的反对，就连支持国民党的中国青年党也不敢贸然答应。中共在和民盟的代表讨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董必武说："国民政府委员会既成为最高决策机关，如果委员会无权用人那么政策决定了，仍交一党专政下的官僚去执行，结果还不是和从前一样，什么都推不动。所以既然是最高决策机关最好有权决定人选，至少是政府中重要职员应由委员会选定。……王先生又说国府委员人选由主席担交国民党中执会或中常会通过。如此则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形式，国民党中央直接干预国家最高决策机关的人选，不知由结束训政到实行宪政这一过渡时间与训改时国民党对国家的地位，究竟有何区别？紧急处置权并非国家元首必不可少之权，这在罗努生先生谈话中已提到了，我们认为主席的命令还是要经会议通过，而且要有人付署。以及对于要求改组政府应包括下属的各部院。"[③]民盟代表罗隆基和贤达人士代表郭沫若也发表了看法，反对国民党所提出的方案，虽然没有中共这么尖锐的指出，但是却一致反对国民党的方案，都认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太大。而国民党顽固派却不愿做出调整，国民党代表面对各方的质问也根本无力答复，经过多次的交锋，国民党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才使得这一问题最后基本上按中国的意见达成协议。



关于施政纲领。董必武首先说明了中共在16日正式书面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的基本内容及其精神。这个草案分总则、人民权利、中央机构、国民大会、地方自治、军事改革、复员善后、财经改革、文化教育改革、国际和平及保侨等十个部分，其中总则里面写了中共关于和平建国的总思想："确认国内各民主党派，应实行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国内任何政治的、民族的纠纷，均应以政治方法寻求解决。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导向，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在蒋主席领导下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为基础，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④讨论中，多数人主张叫和平建国纲领。民盟代表张申府认为这是政协最中心的内容，纲领等于一种"法"，各党派参加政府要有共同遵守的法。国民党代表吴铁城提出两个问题：一、他认为政协无"法"的根据，还认为是各党派"分赃"。二、是以什么做制定纲领的依据。他主张以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抗战建国纲领》、国民党"六大"的政治纲领、国民党1946年的施政方针等为依据。罗隆基不同意吴铁城的主张。他说："应把纲领与政权分为二事来看。分赃这个词在英文是Spoit System，这个词很易引起人误会，望少用。"接着他以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产生为例说明政协虽非人民代表，只要能订一个好纲领，真正适合人民的需要，就应看成是法的根据。他认为"中共提案虽看起来似乎太繁，但很切合需要"，可做讨论根据。民盟代表章伯钧主张以国民党"一大"宣言、训政时期约法为制定纲领依据，同时参考其他党派的纲领及各界人士的建议。国民党代表陈布雷主张不用刺耳的词句，直称"建国纲领"四字。社会贤达李烛尘着重提出一个民主的经济建设方案，批评了国民党扼杀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经过多方讨论协商，最终基本上依据中共的方案，于1月26日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

军事问题一直是讨论的焦点，实际是讨论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的关系这个老问题。1月16日青年党、民盟各提出一个方案，分别由陈启天、梁漱溟作了说明。青年党的方案主张二者并重、同时实行，而在陈启天的说明中实际只强调"军队国家化实为政治民主化之必要条件"，这是反应了国民党的需求。周恩来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并对二者的关系及如何处理这种关系问题作了深刻阐述。他指出："如果以为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那么，今天协商的问题将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平心静气来商讨，以达到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的目的"。他还强调了

“军队属于人民”这个原则。民盟也提出了《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主张两大原则：“一是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而是大量裁减常备军额。而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工业建设，而一面普及国民军训，以为现代国防根本之图。为实现上列第一原则及第二原则大量裁兵之一点，应即成立一整军计划委员会。”[⑤]周恩来代表中共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国家化。”而国民党则一直坚持的都是“军令政令要统一，要先政治民主化，然后再军队国家化。”，经过讨论，1 月 25 日达成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确定了建军、整军及治军的若干原则。

国民大会问题的讨论，争论最多。国民党十年前选出的代表是否仍然有效成了讨论的主要问题，并由此引出了国大是政治问题还是法统问题以及应如何解决等问题的论辩。1 月 17 日国民党代表张厉生公布了《国民党关于国民大会之意见》，并作了说明。在说明中，他竭力从所谓法理、情理、政治情势上为旧代表的“合法性”辩护，并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勉强不承认，那么今天我们认为各党派在过去彼此对于政治主张未能完全一致，尚且要苦心孤诣，由政府来召集政治协商会队然则这九百几十位的代表资格或是否认或是取消，他们是不是也要另外组织一个团体 7 假定组织一个国民大会党，同样像其他党派向政府表示他的意见和愿望，再来开一个甚至几个协商会的话政府将何以处置？所以政府对于法律上既无根据，在情理上在今日政治情势人不能不加以考虑，对于过去选出的代表无法不承认。”[⑥]此论一出，引起激烈批评。章伯钧说：“论法，国大组织法只规定任务，并不能因此而为维持旧代表之根据。论情势，团结统一、一团和气很重要，但不能忘记民主原则，来讲团结和谐。旧代表假使将来要成立团体，这是他们应有的自由，是另一问题。这正如不能以维持十年前的旧代表有效，来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一样”。[⑦]他重申了民盟 1945 年 3 月 10 日发表的五项主张，并引用了 1946 年1月4 日《大公报》主张重选国大代表的社论。中共代表邓颖超指出：“国民大会组织法、国大代表选举法和代表的选举，是十年前制定和举行的，已经不适合于十年后今天中国的情况，因此对旧的必须予以重新考虑，而不是拒绝考虑。”[⑧]吴玉章强调要顾到事实，政协必须以政治解决问题。“若要讲谁是合法的，谁是正统，恐怕永远也搅不清”，罗隆基从政治学和历史的观点论述了国大代表问题，反对代表有效。他提出了三条解决办法：（一）民意测验，（二）复决，（三）由各方共草宪提请人民投票公决，



不开国大。社会贤达邵从恩主张法统与事实兼顾。讨论中，邵力子引用了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对王世杰说的“中共坚持旧代表无效，惟不会得不到协议而不出席”这句话。周恩来发言说：“邵先生既然如此直率，我也应直率地来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承认不承认国大旧代表是一回事，是否因此而闹到分裂，这又是一回事”。“如果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下这个问题未得解决，是否为了这一个问题我就要与政府党分裂呢？当然不能。那天毛先生与王雪艇先生谈话的意思也就是这样。”由于邵力子旧话重提，周恩来也补叙了重庆谈判时的一句旧话：那时中共曾建议重选国大代表，并且说明相信国民党在选举中可以占多数。但邵先生时答复说“我们没有把握”。[9]最终经过讨论，1 月 31 日达成了《关于国大问题的协议》。

宪草问题是最后讨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分歧很大的问题，由于事涉国家体制，双方都很重视，尤其是国民党在这方面尤其的坚持，《新民报》的报道称：“蒋主席云，政府决心履行除修改宪草原则以外政协之一切决议。”[10]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宪草修改的重视。1936 年 5 月 15 日，国民党政府曾公布过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俗称“五五宪草”，这是一部使蒋介石个人独裁合法化的宪法，所以不为中国人民所承认。1 月 19 日，国民党代表孙科对《五五宪草》的要点作了说明，重申了国民党关于政权与治权，权能分职，五权与五院，总统既是国家代表又是行政首长等理论与主张。代表们主要讨论了宪草修改原则和如何防止个人独裁的问题。多数人认为：应限制总统权力，实行内阁制，中央与地方权限之划分采均权制、应保障而不要限制人权利。为了防止国大变成国民党的御用工具，张君劢在中共的帮助下，拟出了一个“五五宪草”修正案，其中包括十二条修改原则，独出心裁地想出了将“有形国大”变为“无形国大”的办法，即把创制、复决、选举、罢免四权直接交给选民行使，不用选举代表集会办法。这虽然和中共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有很大差别，但是因为当时历史条件的束缚，所以中共也接受了这一方案，毕竟这个要比国民党提出的独裁方案好多了。这个方案也得到了孙科点头称是，便被通过。这里孙科点头通过还涉及到孙科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最终由于蒋介石一时疏忽，使得这个方案得以通过。由于这不是我们论述的中心，所以这里不加赘述。

到此为止，政治协商会议上要讨论的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解决。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虽然马歇尔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又在关键时候单独找蒋介石谈话，表达了美国希望政协可以顺利召开，告诉他利害关系，对于蒋

介石的影响可以说不小，所以，马歇尔在这里是起到积极作用的。政协会议上所讨论问题的实质就是要不要彻底改变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不要彻底改变蒋介石的独裁专制。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 3 月版，第 133 页，第 175 ~ 176 页，第 169 ~ 170 页，第 186 页，第 207 页，第 242 页。

⑦⑧历史文献社编：《政协文献》，历史文献社，1946 年版，第 114 页，第 116 页。

⑨这是关于国民大会讨论时大家的争论，具体内容参考历史文献社编：《政协文献》，历史文献社，1946 年版，第 119 ~ 128 页。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 53 页。

《政协决议》的签订及对其评价

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二十二天的斗争，由于中共代表团针锋相对的斗争，对国民党的反革命阴谋给予了彻底揭露，同时也得到了民盟和一些社会贤达人士的支持，再加上马歇尔的作用，使得蒋介石不敢在这时公然与人民决裂，而且中共采取了灵活战术，坚持了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做出必要的让步，成功的争取和团结了中间势力，最终使得会议通过了五项决议，分别是《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和《宪法草案案》，他们被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

《政府组织案》主要内容为如下两点：(一)、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定为40人，国民政府委员由中国国民党党内外人士选任之。扩大国民政府委员会职权，所有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各部会长官及部会政务委员之任免、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之任用事项，均由国民政府委员会讨论、议决。还对国民政府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案和召开次数做了相关规定。(二)、关于行政院方面，行政院设政务委员，除各部会长官均为政务委员外，这些职位均可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三)、其他方面，主要是对国民参政会的名额问题和政府今后的用人标准上加以规定。附注里面对国民政府委员的选举和名额分配以及行政院各职位也做了相关规定。《政府组织案》使国民党承认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拥有人事决定权等诸项权力，其人选不限于国民党内，而且中国共产党和民盟在重大问题上具有否决权，取消了国民政府主席的紧急处置权。如果实行这样的政府改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政府就将发生变化，其他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将保有能够保障施政纲领不致被曲解、变更、撕毁的否决权，并拥有一定的实际用人权。

《和平建国纲领》包括总则、人民权利、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及财政、教育及文化、善后救济、侨务等9个方面的内容，共计53条，规定了国民政府改组后的施政纲领。在总则中规定：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

导原则；全国力量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确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之和平发展。在人民权利中规定：要确保人民享有应有的自由和权利，尤其是要保证妇女在政治上、社会上、教育上、经济上地位之平等。在政治中规定：要求提高行政效率，建设健全文官制度，确保司法权独立，厉行监察制度，实行地方自治，规定中央与地方采取均权主义。在军事方面主要是规定了军队属于国家，建设现代化国家，改善征兵制度，对于整军和遣送日军也做了相关规定。在外交方面主要是遵守国际公约，与其他国家合作反对法西斯和加强与英美苏的联系与合作，同各国订立平等的条约。在经济方面主要是说要促进中国工业化，防止官僚资本的发展，同时对于如何发展经济都做了规定。接下来介绍了具体发展教育的各项措施，善后和侨务的相关规定。《和平建国纲领》为战后我们建设国家提供了很详细的方案。

《军事问题案》共分四项内容，分别为建军原则、整军原则、实行以政治军办法、实行整编办法。根据这个决议，国共两党在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下，承认了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原则，军队国家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国民大会案》规定：当年5月5日召开国民大会，职权为制定宪法，宪法之通过须经出席代表3/4同意，原选代表1200名照旧，台湾、东北等新增各该区域及其职业代表共150名，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700名，行宪机关于宪法颁布后六个月内，依宪法之规定选举召集之。这一法案的通过，使得召开国民大会被具体规定下来，也使得蒋介石的“国民大会”成为泡影，有力的打击了他一贯的独裁方针。

《宪法草案案》规定：（一）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委员名额25人，由协商会议五方面每方面推5人，另外公推会外专家10人，根据协商会议拟定之修改原则，并参酌宪政期成会修正案，宪政实施协进会研讨结果，及各方面所提出之意见，汇总整理，在两个月内，制成五五宪草修正案，提供国民大会采纳。（二）宪草修改原则为：1. 所谓的国民大会就是是全国选民行使四权的地方，；在未实行总统普选制以前，总统由县级省级及中央议会合组选举机关选举或罢免。创制复决两权另行规定；2. 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3. 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由各省级议会及各民族自治区议会选举之，其职权为



行使同意、弹劾及监察权。4. 司法院即为国家最高法院，不兼管司法行政，由大法官若干人组织之，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各级法官须超出于党派以外。5. 考试院用委员制，其委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其职权着重于公务人员及专业人员之考试，考试院委员超出于党派以外。6. 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再提请解散立法院。7. 总统经行政院决议，得依法发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以内报告立法院；总统之划分依照均权主义规定，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但不得与国宪抵触。9. 凡民主国家人民应享之自由及权利，均应受宪法之保障，不受非法之侵犯；关于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规定，须出之于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为目的；工役应规定于自治法内，不在宪法内规定；聚居于一定地方之少数民族，应保障其自治权。10. 选举应列专章，被选年龄定 23 岁。11. 宪草上规定基本国策章，应包括国防、外交、国民经济、文化教育各项目。12. 宪法修改权属于立法监察两院联席会议，修改后之条文应交选举总统之机关复决之。①通过这个法案使得权利得到了制衡和约束，使得总统的权利得到了限制，更有利于民主的实现，“五院制”的建立效仿西方的民主建制，使得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向前更进一步。

国共双方对于此次政治协商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有着不同的看法：重庆《大公报》在第一时间表达了人民的喜悦之情，认为“这个会议确实是没有失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②毛泽东在 1946 年 2 月 9 日单独向美联社记者谈话时说：“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③延安权威人士对政协的评论是：“政协会议所获成果，是极其重大的。和平建国纲领是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之共同施政纲领，是过渡时期中全国所应遵循的民主改革的总方向。修改宪草原则确定了今后中国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基本原则。整军决议规定了全国一切军队国家化的基本原则，而改组政府及增加国大成分的决议，是保障共同纲领实施及国大制宪胜利完成的条件。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行，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即将开始脱离国民党一党专政而走上国家制度民主化的第一步。”④而这五项决议的达成对于国民党而言，却意味着一党独裁的地位即将失去，国民党的前景明灭不定，甚至极可能“使国民党与蒋先生于半年内崩溃”。为此，傅斯年劝王世杰退出政协，辞去外交部长一职，王世杰虽然没有答应，但是他也知道，“目前政局之难，虽在一方面须使政治

稳定，一方面又须使各党派参加政府。此两事表面上似是一贯，实际上则极易演成相反之结果。”⑤而在之后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上，直接有人说：“国民党的政协代表出卖了国民党”“政协决议的通过无异于‘党国自杀’”，由此可见，国民党内对于这次政协决议的反感。

政协五项议案的通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第一，继“双十协定”之后，它再一次确认了避免内战、和平建国的方针和以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的途径。这就又一次否定了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方针。第二，确认了国民党政府是一党政府，必须加以扩大，实际上是确定它必须在共同纲领基础上进行改组。同时，否定了国民党只请几个党外人士到政府做官而且还要经国民党中央机关认可的主张。第三，确认了人民应享有的若干自由权利和政府必须予以保障。第四，确定了国民大会召开的条件和程序，即制宪的国大必须在和平环境中召开，必须由改组后的政府召集而且要各党派共同参加，国大讨论的宪法草案必须是政协宪章审议委员会起草者。这就打乱了国民党所谓“召开国大还政于民”的如意算盘。第五，设计了国家实行议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方案。这种制度虽然不是人民民主制度，还只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具有进步性。所以说，五项协议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有利于民主。这也是国民党代表在会上竭力否定政协的“法”的根据，又是会后蒋介石称“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并亲手撕毁它的根本原因。

五项协议是斗争的产物。这是不言而喻的。它也是平等协商的结果。许多具有长期历史性的问题得到了（哪怕是暂时得到）政治解决，不能不归功于会议的协商精神。关于国大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整个会议的一个缩影。有人说它是政协“最有声色的一幕”，会议始终紧张，然而各代表“不是怀着争论的心情，以警辟精湛的语句征服对方，而是殚智竭虑，严守立场，同时也为对方设想，寻觅出路”⑥。这话颇有见地。面对世界和中国的现实，从实际出发，求同存异，切实协商，努力探求出路。这正是中共、民盟及其他民主分子所坚持的方针。五项协议的确体现了以党派平等协商、共同纲领、联合政府为基本内容的政协路线。这条路线实际上成了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一条正确途径。

从国共关系发展的历史看，政协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所达到的最高峰，是在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各党派和无党派人



士共同设计、部署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复兴民族经济文化大业的一次尝试。但是，由于当权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肯放弃阶级的私利，固执内战、独裁政策，致使这一尝试未能成功，破裂了十年的国共合作关系。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也一步步把自己推到了完全脱离人民的孤立境地，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灭亡。历史有力地证明：任何党派、集团和个人，要想生存发展，必须走历史必由之路。

同时，政协协议的通过，再次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对于顽固派来说，我们只有通过顽强的斗争才可以求和平，反动派才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被迫承认他所不愿意承认的条件。只有在斗争中，坚决的揭露敌人的反动性，用正确的政策，才可以团结教育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最大限度的扩大统一战线。同时也要意识到反动派的本质是不会变的，政协通过的决议大部分，都是蒋介石被动无奈接受的，对于这些不利于他们的承诺是不会遵守的，所以，在同顽固派作斗争的同时，即使签订了协议之后，也要时刻提高警惕，不可掉以轻心，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和人民的权益不受伤害，至少是尽可能的减到最低程度。

注释：

①③④⑤《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 3 月版，第 270～288 页，第 341 页，第 351 页，第 365 页。

②冯子超：《中国抗战史》，文海出版社，1972 年 5 月版，第 314 页、第 317 页。

⑥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年编印，第 262 页。

《停战协定》与军调处的成立

《双十协定》签订后，中共迅速实现谈判诺言，撤退江南的新四军，而这时的蒋介石想的不是如何履行“协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是如何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他带领下的人民军队。早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授意何应钦大量印发《剿匪手册》，下达“剿匪密令”，集结八十万军队向各个解放区不断发动进攻，意图通过军事的打压使得中共在谈判桌上屈服。但蒋介石的愿望落空。

《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于10月中旬电令胡宗南沿平汉、道清两线向我豫北解放区进犯，10月15日，蒋介石又电令刘峙负责“围剿”伏牛山、平汉路中段以西，黄河以南地区的人民解放区。10月下旬，蒋介石又命令高树勋、马法五等部联合伪军孙殿英等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和邯郸、石家庄一带进犯。同时，由同蒲路经正太路到达石家庄的国民党军队，在10月28日，沿平汉线南下，攻陷高邑等地，造成对中共军队南北夹攻局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为了使和平局面得以实现，便于国民党迅速停止内战，从10月23日起，开始了反击。毛泽东指出：“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①]同时在10月30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停止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的社论。社论里说明了蒋介石目前集结军队向各解放区进攻，以及他对中共的污蔑和在“军令政令要统一”的借口下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的事实，指出蒋介石从来就没有放弃反人民、反民主的旧方针，正是由于方针没有变，所以才有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军队同日伪军迅速合流和向共产党发出不合理的命令，最后指出“国民党当局这样的行为，危害了中国和平建国的前途，损害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国民党当局为中国和平前途计，为本身利益计，应该悬崖勒马，立即停止八十万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立即停止一切违背全

 

国人民意志的行为，并迅速履行双十协定。要知道目前的世界潮流和中国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抗阻的，谁要倒行逆施，一意孤行，一定会在人民反对内战、保护和平的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②

人民沉浸在《双十协定》签订的喜悦中还没有回神，战争的阴云就再一次笼罩了中华大地，全国各界人民强烈呼吁和平，停止内战。黄炎培先生致函国共会谈代表要立即停止冲突，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农工民主党、重庆学生以及各中国人民反内战同盟都发表声明，呼吁和平，反对国民党向解放区进犯。11 月 5 日，中国农业协进社、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世界科学社、农村科学出版社、寰球出版社等 6 个团体在重庆紧急呼吁"我们不能再有内战!"1945 年 11 月 9 日，重庆各党派各界代表五百余人集会，成立反对内战联合会，并发表宣言，号召各界人民，反对蒋介石破坏《双十协定》，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同时，国统区的人民也用实际行动来争取和平。1945 年 11 月 25 日晚，昆明市学生六千余人，于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国民党当局派军警包围会场，向场内开枪，并在学校附近戒严，禁止师生通行。26 日，昆明市三万余学生，为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抗议军警捣乱学生集会的暴行而举行了总罢课，并组织宣传而遭到了国民党的残酷镇压，最终酿成了"一二·一"惨案。惨案的发生，让人民看清了国民党的残暴和反动，全国各地声援昆明学生，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内战运动，这时，美国支持的蒋介石集团开始陷入了孤立的境地，这不得不引起国民党的注意。

而在这个时候，作为支持蒋介石的美国也并不支持蒋介石在这个时候立即发动内战。1945 年 12 月 21 日，马歇尔在南京与蒋介石首次会晤。在这次会晤中，蒋介石强调军事行动的重要性，认为中国不能统一是因为中共的地方割据，只有军事进攻，才可以促使中共言和。对此，马歇尔表示异议，提出国共和谈是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前提。他说："美国人民不愿干涉他国内政，此种情绪相当强烈，足以左右杜鲁门总统之行动，是以今后对中国援助，将视国共双方能否互相让步，达成协议而定。"③

蒋介石虽不满意马歇尔的答复，但是不得不重视美国的态度，再加上解放区自卫战争取得的胜利和国统区人民反内战运动的高涨，蒋介石不得不做出策略调整。23 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干部讨论形势，决定"对共方针，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只要共军受编与恢复交通，则其政治上之要求，决尽量容纳也。"④国民党对共方针发生变化——由

战而合。27 日，国共谈判重新恢复，主要议题为停止内战。参加谈判，中共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叶剑英；政府代表为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就在同一天，中共代表团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三项，国民党对此也作出了回复。30 日，马歇尔表示“愿参加国共停战办法之商讨”，并希望国民党政府“能提出三人小组（国共各一人美方一人）讨论停战及恢复交通等涉及受降义务之事项。”[⑤]由此马歇尔开始介入国共停战谈判。1946 年 1 月 2 日，马歇尔向蒋介石和毛泽东提出题旨为“停止战争行动”的备忘录，其内容为：“一、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二、在中国本部及满洲境内一切军队调动，皆须停止；中华民国国军，为重新建立在满洲主权而开入满洲及在满洲境内调动，当系例外。为必须之给养、行政及警卫而作之纯粹地方性的军队调动，亦属例外。三、破坏与阻挠各项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并须立即拆除诸陆路交通线之障碍物。四、在目前一切部队，皆维持其现时地位。五、此后将发布其他训令与命令。”[⑥]马歇尔的这一备忘录为 1 月 10 日的停战命令确定了基本蓝本。

在停战谈判过程中，东北问题和热河问题为国共争论的焦点。因马歇尔的居中调停，国共在如上问题上各有让步，为达成“停战协议”扫清了障碍。

在东北问题上，国民党拒绝将东北列入停战令规定的停止军队调动的范围内。马歇尔支持国民党的意见，认为美国有义务帮助国民党运兵去东北，主张“政府派兵接收满洲之行动应不受牵制”[⑦]。经过审慎考虑，中国共产党最终接受了马歇尔的意见。1 月 5 日，周恩来在与马歇尔会谈时表示：“中国共产党承认东北问题的特殊性，因为它关系到政府接收东北的主权，牵连到美国协助中国经海路运兵到东北境内，应由国民党政府直接与美苏办理，中国共产党不参与其事。”[⑧]

在热河问题上，因热河是进人东北的必经门户，国共均非常重视热河的战略地位。国民党极力主张将热河“必须视与满洲同等”，并要求接收东北与华北交通线上的战略要点赤峰和多伦。马歇尔也同意国民党的看法。中国共产党则以赤峰、多伦已在自己管理之下为由，提出如果国民政府一定要接收这两处，则冲突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一方。国共停战谈判一度因此而陷入僵局。王世杰力劝蒋介石在热河问题上让步。他说：停战可以使美国协助国民党接收东北，给予借款，帮助遣返日本战俘，恢复交通，建议蒋介石“断然接受美方提议（略予修正），以加强政府之国际地位与自身力量”，主



张“于必要时由蒋先生对马歇尔让步，以示宽大，且以坚中共对马歇尔之信任”[9]。9 日晚，蒋介石在与马歇尔的会谈中，在赤峰和多伦问题上让步，国共在停战问题上由此达成了一致。

10 日，张群和周恩来分别代表国共双方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和《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协议中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规定：“（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关于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之命令，依第二条之规定商定之。（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有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故应由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三）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各推定国共两党当事人以外之公正人士八人，组织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代表，分赴全国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10]随后，蒋介石与毛泽东下达停战命令，规定 1 月 13 日停战，“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但东北除外。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为保证更有效地实行停战命令，马歇尔 1 月 3 日提议，在北平设执行部，执行已取得协议的政策，监视停战，公正地做调查。执行部由国、共、美三人委员会组成，一切行动须根据一致协议，下设四个交通中心，八个小组。在 1 月 10 日国共签署的停战令中，明确规定：“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11]同日，国共双方达成《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就军调部的任务、组织、房舍与给养、地点、程序和有效期限等作出如下原则性规定：军调部的任务为执行已经商定之停战政策，本执行部为增订必要之附属规定，以确保停战命令更有效地实施，得为各种建议。军事调处执行部设委员三人，各有表决及互商权，其中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美国代表被邀请充任主席。在执行部内设立一执行组为推进工作之机构，实地监督各种协议的执行，提交报告，国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在执行组内应有同等人数，主任由美国军官担任之；三委员各有表决权，一切事宜，均须三人一致通过；执行组可设立分站，必要时应派遣监察

及报告小组，俾实行政策与协定；军事调处执行部继续存在，并执行其工作，直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或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经向对方适当之通知后，废止之时为止。1946 年 1 月 13 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抵达北平，开始正式工作。从 2 月到 5 月，军调部先后发布 5 项停战及有关停战的命令，发布 7 项有关停战的特别指令，达成 66 项停战协议。这对停战令的实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共是准备执行停战协定的。中共中央明令各部队严格遵守停战协定，“违者将受到处分”。当然，中共也并非相信蒋介石会放弃消灭共产党的方针，因此，中共中央告诫各解放区领导人，独裁还没有完全打破，蒋介石也不会真的成为民主派，“在武装斗争基本上结束以后，政治斗争与秘密的特务斗争必将更加激烈。我们必须学会这些为我们所不很熟悉的斗争形式，否则我们就会失败”。[⑫]最终，国民党在抢占战略要地的行动失败后，再加上国内外舆论对其的压力，被迫接受调处，内战的炮火终于得到了暂时的停止。

停战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基本前提。《停战协定》的达成，使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具备了基本条件。同时，这又成为约束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又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人民的又一伟大胜利。但是《协定》里面提到的关于东北问题特殊不包括在内，这使得之后东北成了国民党可以以“接收”的名义而往东北派兵。但是，《停战协定》签订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共双方确实都遵守了条约，使得政协顺利召开，这一点还是要肯定的。

注释：

①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057 页。

②《重庆谈判纪实》（一九四五年八——十月），重庆出版社，1984 年版，第 331 ~ 332 页。

③④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 1988 年版，第 907 页，第 909 页。

⑤⑦⑨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年版，第 237 ~ 238 页，第 241 ~ 242 页，第 244 ~ 245 页。

⑥《马歇尔特使上蒋主席提出国共双方停止军事冲突令稿之备忘录》（1946 年 1 月 2 日），前引《战后中国》（三），第 63 ~ 64 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 651 页。

⑩⑪《停战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3 ~ 4 页，第 5 ~ 6 页。

⑫《中共中央文献集》第 1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4 页。

国民党破坏政协和人民的反抗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本身是中国向政治民主化迈进的一大步，这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所一直奉行的坚持内战独裁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迫于国内外压力，尤其是美国对华声明的发表使得蒋介石被迫在 1946 年 1 月 10 日召开了这次会议，但是从会议召开的时候起，蒋介石就不断指使他的部下对政协加以破坏，即使通过了五项政协决议，蒋介石也并没有打算执行政协协议，而是一味的破坏，最后亲手撕毁了《政协决议》。

在政协会议召开之后，为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重庆各界组成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决定在政协会议期间，每天召开各界民众大会，请政协代表报告会议情况。民建成员胡厥文、章乃器、徐崇林为协进会的常务理事，民建出资 5 万元作为协进会的活动经费。受到邀请作报告的政协代表有章伯钧、罗隆基、李烛尘、郭沫若、张东荪、梁漱溟和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等。从 1 月 16 日到 1 月 19 日，不断有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1 月 16 日晚，是张东荪和郭沫若讲演，当张先生提到“我们要大裁兵，全国军队公平整编，以后的军队是国防军，而不再是党军”的时候，台下的壮汉指着张东荪说“国民党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是党军”；郭沫若讽刺道“今天的会议一片和气，倒不像今晚沧白堂这样杀气腾腾”，当他说到，“今后的军队要为人民服务，不能像现在这样鱼肉人民……”台下的特务开始不断的捣乱，最终讲演不得不结束。1 月 17 日，大批特务再次捣乱会场，在会场狂呼乱骂，高呼：“拥护国民党，打倒异党等口号，”之后结队而去。在会场发表演说的是刚回国不久的青年党代表李璜，他谈到美国的民主和人民享受到的自由权利，遭到会场上特务的破口大骂。18 日晚，演讲的是邵力子和王若飞，邵力子希望大家不要抹杀国民党这么多年的功劳，而王若飞主要是表达了希望和平团结解决问题，会场上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是特务却在会场外，殴伤两位前来听讲的年轻人；19 日，特务的破坏进一步升级，对演讲的梁漱溟当场投石子，这样的破坏持续了四天，这就是所谓的“沧



白堂事件"[①]

紧接着又出现了国民党宪警搜查政协代表黄炎培住宅的闹剧。1 月 26 日，几名便衣警察以怀疑黄炎培私藏枪支而并未经本人同意，就直接开始搜查，并且予以威胁，最后这些人一无所获。对此民盟代表强烈抗议，黄炎培也请张厉生查明真相给予交代，在政协还在召开的过程中，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人民自由的权利根本就得不到任何保障。

政协五项决议的通过，并没有使得蒋介石集团破坏政协、破坏民主的活动停止，反而变本加厉，直接发生了流血冲突，不承认宪草修改案，蒋介石也在大会上公然否定政协决议，"对履行政协决议唯一的反对来自一些国民党内重要而有势力的人物，这似乎是无疑问的"[②]

为了庆祝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和五项政协决议的通过，2 月 10 日，各届人民齐聚重庆的较场口参加庆祝大会。大会由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等 19 个团体发起，并邀请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为总指挥，推选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章乃器等 20 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大会还未开始时，就有一些人走上主席台要求赶快开会，扰乱会场，当李公朴、章乃器和施复亮前去交涉，提出大家应该好好协商而不是扰乱大会程序时，就有人高喊"他们扰乱会场"，紧接着十几个特务暴徒上前就打李公朴等人，一面打一面拖下台去，结果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都遭到了毒打，沈钧儒在大家的保护下免于被打，还有其他的群众也被毒打，面对如此情景，迟到的莫德惠说"难道庆祝政协的成功也要反对吗?"事后，这些暴徒自己召开了他们自己参加的"庆祝大会"，并且把罪责都推给了李公朴和陶行知开办的学校，这就是有名的"较场口血案"，血案的发生，引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对，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会向全国同胞发出控诉书，指出这次的血案完全是一场阴谋，要求国民政府惩办凶手，给人民交代。

紧接着，国民党北平当局策动所谓还乡请愿团在东北大街举行反共示威，并由特务率领闯入北平军调部，侮辱殴打中共办事员。第二天又煽动重庆上万学生举行反苏反共的游行，在游行中，还捣毁了《新华日报》和《民主报》的营业部。之后还捣毁了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限制人民自由和权利的表现，蒋介石在政协开幕时所做的"四项承诺"也根本就没有实现。

以上所有这些破坏政协的活动都不是蒋介石直接参与，而是通过指使特务和利用学生来完成的，蒋介石真正公开反对政协协议，是在之后召开的六

届二中全会上。

按照政协的规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个党派，应在政协会议结束后分别召开本党派的中央会议，批准政协决议，以确保决议得到完全的执行，于是国民党决定于3月1日到17日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国民党最不可接受的就是对宪草草案原则的修改，早在1月31日，政协决议已经通过准备交付晚上的政协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之前，国民党内部会议讨论时，蒋介石就说过："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原来是因为当时作为国民党代表的孙科为了自己的私利——行政院长，可以获得更大的权利，才点头答应了这个限制总统权力的宪草修改提案，而蒋介石是在事后才知道的，所以说从一开始蒋介石就没有同意过，所以推翻是必然的。会议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对政协协议提出了强烈的不满，尤其是宪草草案，认为根本无法接受。他们叫嚷："宪草修改原则推翻了总理遗教"、"政协会议不是制宪会议，无权修改宪法"、"政协代表不是'人民'所选，政协的决议也没有法律效力"。最终六届二届全会关于宪草问题的决议提出五点修正："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最基本之依据；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用集中开会之方式，行使建国大纲所规定之职权，其召集之次数，应酌予增加；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省无须制定省宪。"③这其实就等于否定了政协所通过的宪草草案。这次会议是对政治协商会议协议的全面否定。连马歇尔在了解了该会的内幕之后，都说："尽管中执委结束时，宣布它已完全批准了政治协议，但有迹象表明，此种批准受到许多保留条件的阻挠，而国民党内顽固分子则竭力破坏政协纲领"。

也正是因为六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使得中共提高了警惕，不可盲目乐观，为此，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及其破坏政协决议的反动活动，给予坚决地揭露和批判。3月17日中共中央发言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要修改宪法民主原则，我们坚决不能同意，我党毫不动摇地坚持政协的一切决议。并呼吁全国人民要准备为此神圣的任务进行奋斗。周恩来同志在3月18日的重庆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案的反动性。他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利用二中全会通过了很多重要的违反政协决议的议案。"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行动起来，监督政协决议的实现。"④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3月21日接受《新华日报》采访时，表明"任何人读其原文，只能有此解释。此种文字最少也表示有意含



糊混淆，而其目的无非在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与形式，把各党派参加政府变成请客，所以国民党二中全会违反政协的决议，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如果这些问题不弄清楚，我们同盟为对国民责任计，不愿贸然参加政府。”[5]《新华日报》社记者也作出评论，“该项报告（国民党二中全会政治报告）完全暴露出国民党专政的极端腐化的情形。”[6]马歇尔也说：“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坚持，在国民党宣布对已经通过的政协决议的任何修改并声明国民党负责确实履行修改后的政协纲领之前，拒绝推派人员出席国民政府委员会，以参加改组后的政府。同时，共产党将其原定于3月31日召开以通过政协决议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延期，并拒绝送交其全部军事单位的表册。”[7]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成了1946年春中国时局恶化的一个转折点，使得人民更加清楚的看清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尽管中共和全国人民都在痛斥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不遵守政协决议，但是蒋介石集团却充耳不闻，丝毫没有要改变的意思，而且他还变本加厉，更进一步的发表反动言论，破坏政协协议。他现在不但下决心要推翻政协决议，而且还要彻底撕毁停战协定、整军协定，挑起全面内战。

4月，国民党又召开了它一手包办的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共的参政员拒绝参加这次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了反共反人民的演说。这是蒋介石重新宣布独裁并进行大规模内战的自白书。这篇反革命演说有两个要点：一是撕毁“东北停战协定”。这个协定是在3月27日签订的。签订协定后仅三天时间，蒋介石就说：“东北的问题本质上是外交问题。”“我们中央对于东北的职责，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恢复主权行政的完整，这不仅是政府的责任，并且是国家民族的要求。”“东北停战，影响国家接收东北主权”，这就等于又重新向全国宣布他在东北还要进行内战。二是撕毁政协决议，蒋介石叫嚷：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更不能够代替约法。“国民政府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再三宣示此次扩充政府的组织是在国民政府现有的基础之上，要求各党派人士及社会贤达共同参加，来扩大政府的范围，而绝不是推翻现在国民政府的基础，另外来组织一小政府。”[8]这就等于重新向全国宣布他仍然要顽固地坚持独裁统治。4月17日，我党的《解放日报》发表了《驳蒋介石》的社论，尖锐地批驳了蒋介石，用事实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指出“蒋介石联合伪军，进攻东北民主联军，这本身就是冲突。在蒋介石看来，中国不是中国人民的，而是包括他在内一群人的。”并且指出对于蒋介石所说的政

协会议不是制宪会议这一点是决计不能接受的。蒋介石就是想继续实行他的独裁政策。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5月5日，上海各界12个人民团体成立联合会，提出停止内战，实行政协决议，拥护联合政府等十七项主张。6月25日，上海五万群众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等口号。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的反革命行动，从反面教育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群众，使反蒋爱国的民主运动更加向前发展。

蒋介石不断升级的对政协协议的破坏，一方面反应了他坚持内战独裁方针的本质，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蒋介石的内战准备已经完成。他再也不愿意披着“和平”的外衣与中共和全国人民周旋，要实现他对全国的统治。直到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亲手撕毁了政协协议。而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蒋介石破坏政协协议，是由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本性决定的，政治民主化本身与他的独裁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注释：

①③⑧《政治协商会议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438～444页，第407～408页，第433页。

②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5页，第83页。

④⑤⑥历史文献社编：《政协文献》，历史文献社，1946年版，第139～140页，第198页，第212页。



东北问题——三国四方竞技之地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主要矛盾从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变为中国人民同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反动集团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在日本发出乞降诏书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的发出命令要求他的军队快速“接收”沦陷区的各大城市。要说蒋介石“下山摘桃”，争夺抗战胜利果实，那么没有比东北这个桃子更大的了。

东北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十四年前，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得东北三省在不到半年的时候就沦陷到日军之手，东北人民沦为亡国奴，为了反抗日本的压迫，东北人民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一度成为这场斗争的中流砥柱。伴随着抗战的胜利结束，东北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局势也更加复杂。

东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一目了然，它北靠苏联，西接蒙古，东邻朝鲜，南面直接与关内相连接，再加上东北地区丰富的资源，以及广大的领土面积和人口，使得东北的位置更加重要，谁控制了东北，谁就可以充分地利用东北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及优越的地理位置，极大的加强自己的实力。不仅是中国国共两党知道它的重要性，那些觊觎中国的国家更知道。战后影响中国政局的除了国内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两大势力，还有就是美国和苏联。而他们的利益关系在东北地区尤其明显，一时间东北地区成为三国四方的竞技之地。

对于中共来说，在抗战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和长江以南的地区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根据地，但是主要力量大部分还是集结在北方，但是由于日本的占领，一直没有进入东北，如果可以进入东北，不仅可以利用那里的物资和人力，而且可以背靠苏联、朝鲜，与原有的冀热辽解放区和整个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使自己有一个稳固的战略后方，如果东北被国民党占据的话，那么极有可能使得中共军队陷入被动局面，不仅切断了中共与外部的联系，还将会使中共腹背受敌，被南北夹击，这将使中共处于极端不利的

局面。

对于国民党来说，东北亦同样重要。蒋介石说过："国民党的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和物产均甲冠天下。"[①]由此可见，对于国共双方来说，谁要是占有了东北地区，确实会更有利于自己今后的战略发展。

东北的重要性，也使得外国对东北垂涎已久。战后的美国一心想取代日本在中国的地位，独占包括东北在内的整个中国。但是这时的中国还有日本的100万军队，尤其是在东北地区，就有关东军70万之多，美国要想取胜，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人员伤亡和财力上的损失，所以美国希望由苏联出兵东北以减轻美军的伤亡。但是美国也知道，要想让苏联答应出兵东北，必须要答应相应的条件。于是双方在没有当事人中国在场的情况下，决定了中国东北的命运。苏联对于东北一向关注，早在清朝康熙年间，沙俄就不断入侵中国，进入近代之后，在与日本的争夺中失败，但是它从没有放弃对东北的干涉。二战期间，因为苏联一直集中精力忙于对德作战，无暇顾及东北，现在西线战局已定就可以腾出手来考虑东北的事情了。斯大林一边答应出战，一边提出出战的条件，即"维持内蒙古现状；恢复1904年之前原属于俄国的各项权利；千岛群岛交还苏联"。[②]最终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苏达成协议，美国为了让苏联出兵，基本上全部答应了苏联所提出的条件，而美国这时的政策就是坚持要苏联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

美苏虽然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但是这时的中国根本就不知道，直到1945年6月中旬，美国才通知国民政府同苏联谈判，目的就是向蒋介石施压，答应苏联的条件，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完成它在东亚的战略要求。在谈判的过程中，斯大林态度强硬，根本就是在下达命令，没有谈判的余地，因为蒋介石想获得苏联的支持，最后在苏联答应不支持中共的条件下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的签订，使得蒋介石认为自己这次得到了美苏两大国的支持，更加有恃无恐。

但是，这时的蒋介石没有意识到的就是，中共并不是完全听命于苏联，这时的苏联和延安之间的关系很微妙，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斯大林感到苏联的安全也受到了很大的威胁，为了保证苏联东部边界的安全，就需要同中国合作，而这个时候，在斯大林看来，可以拖住日本后退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所以，苏联这个时候选择支持国民政府。如果苏联在支持国民政府的时候还支持延安的话，这样蒋介石必然会不高兴，为此，斯大林在抗日战争时期把大部分军用物资都给了国民党，给中共的只是一些书籍，这就是



所谓的"给国民党的是飞机和大炮，给共产党的是马列主义"。对此中共也表示理解，但是苏联对于中共的干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在抗战时期，在1941年和1942年苏联先后两次因为得到日本有意要进攻苏联的消息后，而要求中共出兵阻击日军，而当时中共自己也是在最困难的时期，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力量来帮助苏联。苏联对于中共只是派出一小部分，还没有全力阻击的"不积极行为"很是不满，这就使得苏联对延安的信任度大大降低。斯大林甚至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人。"[③]甚至于同意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公开地宣布苏联支持的是国民党政府。一时之间，战后的东北成为美、苏、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三国四方"的竞技场。

日本发出乞降诏书的第二天，即1945年8月11日，毛泽东就连续发出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规定：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所部和冀热辽李云昌部，即日起，向辽宁、吉林进发，以配合苏军作战与接收东北日军和伪满军的投降。这个命令实际上吹响了中共进军东北的号角。在这之前，由于苏联红军已经进入东北，再加上中苏协定的存在，使得中共不敢贸然进入东北。但是在反复研究中苏条约及其附件之后，认为"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换一种方法可以理解为只要是中国人，苏联就不会过问。为此，中共中央及时调整政策，"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往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队等名义，不用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不必做火车进站大城市，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部队。"[④]同时明确规定"将情报通知红军，但不要勉强与红军正式的接洽与联络，亦不要求红军给我帮助，只要红军不做声，不坚决反对我之行动即好。不要使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⑤]但是在真正进入时，却遭到苏联的拦截，因为中共本身的政策有为苏联考虑，以及苏联不想让东北被蒋介石完全控制，最终经过双方的谈判，苏联允许中共进入东北，但是不以八路军的名义，且不在苏占区活动，这基本上就是中共当时的主张。既然中共和苏联方面已经达成协议，那么中共中央开始具体布置进入东北的相关步骤。经过反复讨论，9月16日做出了两项重大的决定就是：南下干部和部队立即折回，转赴东北，从各解放区抽调十万大军和数万干部挺进东北和建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如此大幅度地调动军队，其实就牵涉到了中央战略方针的调整。中共原定向南发展的战略由于日本的突然投降和急剧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而不得不作出调整。经过政治局会

议的讨论，19 日，经过毛泽东的同意，刘少奇即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部署》的文件，文件明确指出："目前我全党全军的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6]由此开始了十万大军"闯关东"的景象，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到了 11 月底和 12 月初，大规模的"闯关东"便告一段落。到这时为止，先后进入东北的，正规军将近十一万人，干部二万人。此外，原冀热辽先期出关的部队发展也极为迅速，已由最初的一万余人扩大到十万人左右。到 1945 年快要过去的时候，中共在东北已拥有二十万大军了。

就在中共积极往东北调军的时候，蒋介石还在想着用什么方法来调拨他的军队到东北。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了保存他的实力为战后做准备，将他的大部分部队都安排在了大西南、大西北这样远离战场的地方。日本的突然投降使得蒋介石对于东北鞭长莫及。而且蒋介石这一时期也太过于自信，认为和苏联签订了协定之后，苏军一定会按照条约的规定，将东北完整的交给他，打算通过外交接收东北。直到十月中旬，蒋介石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派熊式辉和蒋经国同苏军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是苏军同意国民党军队从营口和葫芦岛登陆进入东北。但是苏联暗地里已经将这两个地方让给中共来管理。当杜聿明去接收时才发现上当，这次惹恼了蒋介石，蒋介石开始通过外交给苏联施加压力，并且将谈判升级到重庆和莫斯科之间，以期引起国际的注意，苏联本身就没打算与国民党决裂，又不想让美国干涉，最终苏联作出让步。苏联开始向中共施压，要求中共退出苏军占领的大中城市。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改变了他之前的"外交接收"政策，转为"军事接收"，一时之间，内战开始蔓延到东北。蒋介石向杜聿明发出命令，要求他向山海关等地发动强攻，以便从中共手中夺回对北宁线的控制权，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11 月中旬，杜聿明带领国民党军向山海关进发，打响了武装占据东北的第一枪。虽然中共对此早有准备，但是由于兵力不足和武器的落后，面对国民党七万大军的强攻，还是不能取胜。东北初战遭受挫折，使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识到争夺东北这场战争的严重性和长期性，再加上这个时候苏联从东北撤出，要求中共军队退出中长铁路沿线城市，全部交予国民党，使得中共不得不再次调整策略。新方针的指导思想就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毛泽东对其做了全面阐述，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



建立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7]在这样的情况下，东北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战争，一旦发生战争，就会严重影响对美国在华政策，所以，杜鲁门紧急派马歇尔来华"调停"。

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取代日本，控制中国，将中国作为他在远东实行政策的基地，这样就需要一个听命于他的政府来控制中国，美国自然而然选择了蒋介石。最初，派赫尔利来到中国，帮助蒋介石政府，同时争取同共产党的合作。但是赫尔利在督促国共双方谈判的过程中，向共产党施压，蛮横不讲理使得中共大为不满；而这时美国对国民党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实际上增加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气焰，中国随时有可能发生战争，而美国也意识到了中共的力量，并不认为蒋介石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可以取胜，这是不利于美国在华利益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马歇尔"临危受命"于1945年底来华调停。

马歇尔一来到中国，就直接同蒋介石面谈，转达了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美国不希望中国打内战，要争取和平，只有这样，蒋介石才可以得到美国的援助，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宣布了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这之前，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双方首先签订了《停战协定》，而这个协定在东北则不起作用，从一开始，蒋介石就以东北是"接受主权"，不存在内战为由，要求东北不包括停战协定之内，虽然最后东北写入停战令内，但同时也承认了东北的特殊性。在下达停战令的时候，东北除外。紧接着就发生了"营口事件"，马歇尔要求派军事三人小组进入东北考察，而蒋介石却百般阻挠，这时正好马歇尔回国述职，等到马歇尔一个月回来之后，中国的政局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从2月中旬开始，国民党的军队在杜聿明的带领下分三路向东北联军进攻，为了打击蒋介石的嚣张气焰，毛泽东命令林彪打几场胜仗。最终，林彪带领中共军队取得了秀水河战斗的胜利，给国民党以不小的打击。由于中共军事上给予的打击，以及国内舆论的压力，再加上吉伦将军[8]的努力，使得蒋介石同意派遣军事小组前往调停，最终在1946年3月28日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协定》，协定里面通过由军调部派遣执行小组前赴东北到冲突地点实地考察，作出公平调处，使其停止冲突。但是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打算要执行它。协定签订后，仍然不允许执行组进入东北，而且蒋介石在随后4月1日的参政会上就公开的宣称"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战问题可言。……军事冲突的调

处，只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驶国家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9]这实际上就是把东北停战协定作为一张废纸。自此之后，蒋介石继续否认东北存在“内战问题”，只有所谓的“接收主权”问题。之后的蒋介石自恃实力雄厚，不断向中共军队发起进攻，但是毛泽东接受了挑战，蒋介石并没有达到他预想的效果，而马歇尔的“调解”也一直没有取得什么成果，虽然最后在1946年6月6日双方又发出东北暂时停战声明，但从声明中可以看到，中共和蒋介石对于问题的理解根本不同，蒋介石依然坚持“政府采取此一措施，绝不影响其根据中苏条约有恢复东北主权之权利。”[10]这就表明蒋介石的一贯方针根本就没有变化，直到内战全面爆发，东北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马歇尔的调处最后以失败告终。

东北在整个第三次内战的过程中都没有停止冲突，更成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前锋之地，东北对于国共双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中共的大反攻也是从这里开始，所以东北问题的难以解决也就理所当然。

注释：

①朱建华：《东北解放战争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②（苏）萨纳柯耶夫（Ш. П. Санакоев），（苏）崔布列夫斯（Б. Л. Цыбулевский）著：《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58页。

③《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 5～1945. 12 第1编 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4页。

④⑤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1941～194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第139页，第147～148页。

⑦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9～1180页。

⑧这期间，由于马歇尔回国述职，暂由吉伦将军代替。

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1941～194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5页。

⑩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编：《停战谈判资料选编》，1979年版，第23页。



参考文献：

[1] 朱建华：《东北解放战争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2] （苏）萨纳柯耶夫（Ш. П. Санакоев），（苏）崔布列夫斯基（Б. Л. Ц ыбулевский）著：《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 5 ~1945. 12 第 1 编 第 1 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

[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册（1941 ~ 194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

[5] 孙其明：《和谈、内战交响曲——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初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7] 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编：《停战谈判资料选编》，1979 年版。

[8] [美]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 ~ 1945）》，（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

[9]《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 ~ 1950）》

[10] 郑德荣，黄景芳，孙友葵：《重庆谈判》，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 年 1 月版。

[11] 马洪武，王德宝，孙其明，戴金生：《抗日战争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12] 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下）。

[13]《行政院长宋子文自莫斯科呈蒋主席报告与史达林会谈关于解决外蒙、新疆、东三省及中共等问题之谈话情形电》（1945 年 7 月 9 日，8 月 10 日），前引《战时外交》（二）。

[14]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3 册，三联书店，1982 年版。

[15] 师哲，李文海：《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

[16]《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 3 月版。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华书局，1981 年版。

[18] 历史文献社编：《政协文献》，历史文献社，1946 年版。

[19]《重庆谈判资料选编》，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1979 年版。

[20] 张群生：《解放战争全记录 一 和战之间》，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版。

[21]《停战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

[22]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年版。

[23]《马歇尔特使上蒋主席提出国共双方停止军事冲突令稿之备忘录》（1946 年 1 月 2 日），前引《战后中国》（三）。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

[26]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 年版。

[27] 余湛邦：《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9 月版。

[28] 孟广涵主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重庆人民出版社，1989 年 10 月。

[29] 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1945. 8-1947. 3.）（增订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30] 冯子超：《中国抗战史》，文海出版社，1972 年 5 月版。

[31] 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

[32] 之春编著：《重庆谈判》，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年版。

[33] 李勇编：《重庆谈判》，新华出版社，1990 年 6 月版。

[34]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

[35]《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大事月表》（修订本）（1945 年 7 月至 1949 年 10 月），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36]《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 年 4 月版。

[37] 纪亚光：《国共全面内战的缘起——抗战胜利之初美苏与国共和

战关系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年年版。

[38]《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下），重庆出版社，1989 年版。

[39]《重庆谈判纪实》（一九四五年八——十月），重庆出版社，1984 年版。

[40]《晋察冀日报》编：《军事调处执行情况汇编（1946. 1. 3—4. 15）》，1946 年版。

解放区加强备战工作

在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这个阶段内，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和平的和武装的各种形式相互交错的斗争。在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了适应形势发展的方针和策略。在这个阶段的前期，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全力争取和平和民主，同时不放松自卫战争的准备；在这个阶段的后期，当蒋介石集团破坏了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之后加紧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党中央为了保证党和人民在由国内和平向国内战争的转变过程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一方面揭露蒋介石集团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阴谋；另一方面也全力做好对付全面内战的各种准备。

政协协定和停战协定的先后签订，一度给人民带来了希望，以为内战可以避免。中共中央也曾一度认为和平已经到来，但是随着蒋介石破坏政治协议和停战协定的行动不断发生，使得中共中央很快清醒，改变之关于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判断，并且开始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带领全党逐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准备对付全面内战方面。中共中央在发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中，一再提醒全党：“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①]从 1946 年 5 月开始，加强了应战措施，积极进行扩军、练兵和生产、减租工作。此前，自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已经做了两手准备。

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的人民军队，长期处于分散的环境，基本上未脱离游击战争的性质。抗战胜利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军委要求所属各战略区，集中能够机动的兵力，组成旅和纵队，编组野战军，以便大量歼灭日伪军和准备对付国民党发动内战。为此发出了一系列指示。

1945 年 8 月 20 日，中共军委指出，《关于目前军队编制的决定》，就编组野战兵团，作了具体规定：为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各战略区应在现有兵力中，迅速抽出 1/2 到 3/5 编为野战兵团，其余编为地方兵团；



在野战兵团之下，应编为三三制的旅，每旅三团，每团三营，每营三连，再加以重机枪排。每连人数不超过142人，每旅不超过7 000人，以3个至5个旅编成1个纵队；野战兵团装备，各地区就已有兵器，按下列标准装备之：每连步枪不少于90支，轻机枪不少于3挺，掷弹筒不少于3个；每团配属一个机炮连，每旅一个山炮连。

遵照上述指示，各大战略区迅速的进行整编部队和编组野战军的工作。至1946年6月，全军共组成27个野战纵队及6个野战旅。

在整编军队的同时，并强调扩大兵员。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要求各地区，在人民可能负担的条件下，应迅速动员新兵入伍。其数字约为各区现有兵员的三分之一，要求于本年底完成。还规定各区脱离生产的兵员，最高不得超过全区人口的2%；并要大力发展民兵及自卫军。中共中央书记处也于9月21日，发出《关于补充与扩大兵员问题的指示》。该指示称，在日军宣布投降后我军解放百余城市，增加2 000余万人口，缴枪10万余支，军队的补充与扩大，不致加重人民的负担。因此中央特决定，在1945年10、11、12，三个月内，八路军、新四军应争取补充与扩大数十万人。新兵来源，主要是在民兵中进行动员，在新解放区可以个别动员，亦可争取伪军俘虏兵参加我军。

由于中共中央和各地区大力进行扩军工作，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内战全面爆发，人民解放军发展到近130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基本条件。

在扩大军队、编组野战军的同时，中共中央做出指示，要求解放区利用作战间隙加强练兵。中共中央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方针》中指出："各解放区野战军，一般业已组成，地方军亦不在少。目前扩兵一般应该停止，而应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不论野战军、地方军、民兵，都是如此。练兵项目，仍以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项技术程度为主，提高战术程度为辅，特别着重于练习夜战。练兵方法，应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②]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再次强调："为了保障国内和平，各地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万一被敌人破坏。"[③]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各个战略区普遍开展了练兵运动。华东军区部队开展"百日练兵"运动；练兵内容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晋察冀部队在练兵中开展群众竞赛活动；晋冀鲁豫军区练兵以"提高技术为主、提高战

术力辅”。各纵队还集中训练了千人左右的班级至团级的干部，掀起“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练兵热潮。根据形势的发展，为进一步作好战争准备，中共中央于 1946 年 5 月 1 日又发出《关于练兵的指示》该指示批评了对“练兵工作抓的很不紧”的地区，严格要求各部“立即下令全军练兵，上级督促检查，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④。在练兵内容上提出：“军事上练三大技术、练攻城、练守城、练夜战；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区之决心与信心。”

中央“五一”指示下达后，各战略区对练兵运动普遍进行了一次检查，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新的要求。许多单位领导干部带头以临战姿态进行练兵。刘伯承司令员还亲自带领高级干部进行实弹射击。而且各解放区的训练特别注重夜战的训练。同时遵照中央的指示，改进和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克服部队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此外，还建立和扩充了炮兵和工兵，重新调整了军队的后方勤务工作，整顿了军火弹药生产。这就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养和军事素质，增加了战斗力，为应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遵照中央的指示，从 1945 年秋冬开始，在新解放区，首先开展了反奸反特、清匪反霸，控诉汉奸、特务等政治斗争，摧毁旧的政权，建立民主政权和农会、公会等群众团体，接着转入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于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对于调动农民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团结各阶层人民坚持敌后抗日，起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新解放区，仍然以实行减租、减息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措施和土地改革的过渡步骤。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在《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就对土地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指示，指示中指出：“今（指 1945 年）冬明（指 1946 年）春，必须在一万万人民中，放手发动减租。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减租，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地方政府与提拔地方干部，以便迅速确立我党在基本群众中的基础，迅速巩固一切新解放区。”1945 年 11 月 17 日，中共中央在对党内的指示中，指出“留在后方的领导同志，除了作直接援助前线的许多工作之外，一定要不失时机，布置减租和生产两件大工作。务使整个解放区，特别是广大的新解放区，在最近几个月内（冬春两季）发动一次大的减租运动，普遍地实行减租，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同时，在一九四六年内，全解放区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务



使有一个新的发展。不要因为新的大规模战争而疏忽减租和生产；恰好相反，正是为了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要加紧减租和生产。”[⑤]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中共中央再次向各部阐述了减租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在新解放区，如无此项措施，而不能坚决地援助我党。在老解放区，则应复查减租减息的工作，进一步巩固老解放区。”[⑥]

根据上述指示精神，各解放区于1945年冬到1946年春，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复查减租运动。

有的地区根据当地情况，规定了若干具体政策。1946年3月，热河省委规定：“高额地租应减到不超过总产量的千分之三七五，押租押金则由地主退还，傍青地应由对半分减到四六分。晋绥解放区的汾阳、平介、文水、孝义等县，对减租和赎地的办法也做了相应的规定：一般按二五减租的规定办理；地主出土地、耕牛、农具、肥料、籽种，佃户只出劳动力，这种情况可少减租，二八或三七分或不减租；土地、耕牛一切由地主出，佃户在地主家吃饭者，可用一九比例分粮；关于回赎土地：凡被恶霸强占土地者，应无代价的收回，因出田赋负担把地押在伪村公所出卖者，要根据买主对象处理，若贫农出钱买地的，则按价回赎，如典地期未满，出典人无地可种者，应给予回赎。”[⑦]

由于新解放区运动的开展，一部分农民获得土地，房屋和粮食，生活初步得到了改善。经过几个月的减租清算，农民从大汉奸、豪绅、恶霸、大地主、高利贷者手中获得85 000亩土地，70 000多石粮食，以及大量的现款、牲畜和房屋。农村封建势力被削弱，广大农民获得了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亲身体会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大大提高了保卫和建设解放区的积极性。

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各解放区也开展了生产运动。1945年12月15日的指示中，要求“按照十一月七日指示，各地立即准备一切，务使一九四六年我全解放区的公私生产超过以前任何一年的规模和成绩。”同时也指出了生产的重要性，“人民中发生的疲劳情绪，只有在认真实现减租和生产两项任务，并有了显著成绩之后，才能克服。减租和生产两大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将最后地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负，各地切不可疏忽。”[⑧]

遵照中央的指示，各级政府积极引导农民发展农村变工队、互动组等组织，并及时地发放农业信用贷款和工业贷款。在为自卫反击作战动员民力时，尽力做到不违农时，减少误工，爱惜人力、物力；部队、机关、学校在

不妨碍作战、工作和学习的条件下，也适当参加农业生产，以减轻人民负担。还兴修水利，发动群众互助合作，以解决劳力、牲畜不足的困难。为了提高生产，各解放区普遍重视改进生产技术，改良农作法。生产运动的开展，使解放区的农业、工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下，各解放区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练兵、减租和生产运动，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得解放区的经济力量和解放军的战斗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③④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 76 页，第 55 页，第 76 页。

②⑤⑥⑧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7 年版，第 1119 页，第 1136～1137 页，第 1119 页，第 1119～1120 页。

⑦《解放日报》，1946 年 2 月 8 日、3 月 7 日、3 月 26 日。



蒋介石撕毁面具　部署内战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最主要是自己的准备不足，三次电邀毛泽东来渝共商国是。当他认为发动内战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便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悍然向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了全面内战。

蒋介石为确保发动内战可以消灭共产党，取得战争的胜利，军事、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做了相应的准备：

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国民党军在美国的大力支援下，已将大后方的大批军队调运到关内、关外各战区的前沿，基本控制了平汉、陇海、津浦、同蒲、平绥、北宁、沈吉铁路等交通干线和重要港口，完成了对各解放区的进攻部署。

于1946年3月开始进行军队整编，将大部分军的建制改为整编师。在内战爆发之前，于6月还改组了国防部，将军事委员会，陆军总部和军事参议院撤销。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正规军86个整编师（军）248个，旅（师）约200万人，非正规军74万人，特种兵、海空军及后方机关、军事学校等约165万人。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在全国设立的主要战区有：东北行辕（辖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北平行辕（辖第十一战区、第十四战区长官司令部）、西北行辕、武汉行辕（辖第六、第七绥区司令部）、徐州绥靖公署、郑州绥靖公署（辖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和第四、第五绥区司令部）、广州行辕、重庆行辕、衢州绥靖公署以及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直属统帅部指挥）。陆军的编制序列，按隶属关系大体分如下层次：行辕、绥靖公署——战区、绥区——集团军、整编军——整编师（军）——旅（师）。

上述各个战区中，实力最强的为徐州绥署，拥有23个整编师（军），其中嫡系精锐14个师；其次为郑州绥署，拥有17个整编师（军），其中嫡系精锐9个师；再次为北平行辕，拥有11个整编师（军）。东北保安司令

部的兵力虽不算多（7 个军），但大都为战斗力较强的精锐部队，全部为美械、半美械装备；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即有 2 个（新编第一、第六军）在东北战场。

除此之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还编组了 3 个快速纵队。每个快速纵队下辖个 1 个步兵旅、1 个战车营（装备有中、轻型坦克数十辆）、1 至 2 个炮兵营、1 个装甲搜索营、2 个工兵营和 2 个汽车营。战争初期，快速纵队主要配属主攻方向的野战兵团遂行重大战役。

国民党军的优势，还由于得到了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的大力援助而进一步加强。国民党军由于在抗日战争期间及抗战胜利之后，接受大量的美式装备；加以在抗战胜利时接受了 100 万侵华日军的全部装备，在全面内战爆发时，部队的现代化装备已有很大的增强。在 86 个整编师（军）中，有 22 个美械、半美械装备。其中新编第一、第六，整编第十一军、第七十四师以及第五军的装备尤为精良，编制兵员也较充实，战斗力较强，被称为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而且，国民党还在美国的帮助下，加强了海军和空军的力量，在重大战役中，直接支援陆军部队作战。

国民党统治区的面积为 730 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76%；人口为 3 亿 3 900 万，约占全国人口的 71%。人力物力资源比较雄厚。同时，控制着全国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拥有几乎全部近代工业。其军工生产也有一定基础，能制造步兵武器、重炮及各种炮弹。至全面内战爆发时，共建有兵工厂 15 个，拥有员工 4 万余人，能生产步枪、轻重机枪、冲锋枪、少量山炮、榴弹炮及其弹药。有飞机制造厂 3 家，年产教练机 3 架、运输机 1 架；有造船工厂 3 家，年产内河炮艇 20 余艘。这种规模的军工生产当然远不能满足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因此，在战争发起之后，国民党军的武器装备主要依赖美国的支援。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无论在兵力或装备上明显地占优势。国民党军总兵力是解放军的 3.4 倍，在武器装备上，解放军较之国民党军也有很大的差距，集中反映在：军种单一，没有海、空军支援；重武器少，弹药不足，火力弱；缺乏现代化的运载工具，加之大部铁路、公路交通干线控制在国民党军的手里，部队的机动力量远不如国民党军。

但是国民党也存在着许多致命的弱点，政治上孤立，作战指挥无能，军队内部派系复杂。在其 86 个整编师（军）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归顺蒋介石的原杂牌军的部队约占 1/2；杂牌军（即川军、晋军、西北军、东北



军、粤军、桂军、滇军，以及“青宁二马”等封建军阀控制的军队）约占1/2。各派系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这些都为国民党军日后的作战埋下了隐患。解放军多次利用国民党军内部的派系斗争，围攻打援，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蒋介石对于他一手策划的这场战争的性质和规模，早在战争之初就做了如下的明确表述：“剿匪之成败，关系我国家之兴亡。故应正视其严重事实，而确认剿匪乃堂堂正正之战争，非局部之戡乱与绥靖也。”[①]这就是说，蒋介石一开始就把这场内战看成是正规的、全面的战争，是关系到国共两党生死存亡的决战。通过这场“堂堂正正的战争”，按照蒋介石的构思，需要达到3个“战略目的”，即第一是要占领共产党的政治根据地，使他不能建立政治中心，在国内外丧失其号召力。第二是要摧毁其军事根据地，捣毁其军需工厂与仓库，使其兵力不能集中，补给发生困难。第三是封锁其国际交通线，使之不能获得国际的援助。

为了赢得这场战争，蒋介石决定采取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和先关内后关外的战略步骤，使用他的全部正规军的80%即193个旅（师）约180万人的兵力，同时向山东、苏皖边、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以及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企图在3～6个月内消灭关内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各解放区，然后再集中兵力解决东北问题。对于这种“速战速决”战略方针，蒋介石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曾在一次高级军官集训中作了如下解释：“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匪军则绝对没有”，“如果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②]这充分反映了他的“速决”战略，是完全建立在唯武器论基础上的。

蒋介石在确定战略方针的同时，提出了战争初期的3个“战略目的”：“第一步是要占领匪军的政治根据地，使他不能建立政治中心，在国内外丧失其号召力。第二步是要摧毁其军事根据地，捣毁其军需工厂与仓库，使其兵力不能集中，补给发生困难。第三步是封锁其国际交通路线，使之不能获得国际的援助。”[③]

为实现上述战略目的，蒋介石及国民党军统帅部的其他要员，多次在军事会议上强调在作战中要以占领城市及交通线为基点。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的一次讲话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城市”。“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它一定是水陆交通

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们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不能掌握交通要点和大城市，对于政治经济以及宣传号召，也有莫大的影响”。[④]

蒋介石确定国民党军的“作战纲要”是：“第一步，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匪军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第二步，要根据这些据点，纵横延展，进而控制全部的交通线”，使“我军运输方便，进退自如，一个兵即可当十个兵之用”；“匪军方面则因占领地区被我分割，兵力便无法集中”。因此，“我们作战的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⑤]国民党军实施全面进攻的战略部署和重大战役行动，都是依据这一指导思想作出的。

依据蒋介石制定的作战方针，国民党军统帅部确定的进攻各解放区的基本部署是：以郑州绥署主任刘峙指挥 8 个整编师又 2 个旅约 22 万人，在武汉行营一部兵力的配合下围攻中原解放区；以徐州绥署主任薛岳指挥 58 个旅约 46 万人进攻包括苏皖边和山东解放区在内的华东解放区；以郑州、徐州两绥署和第一、第二、第十一战区各一部兵力共 28 个旅（师）约 25 万人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以第十一、第十二战区和第二战区主力共 38 个旅（师）约 26 万人进攻晋察冀、晋绥解放区；以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和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指挥 7 个军（整编师）23 个师（旅）约 25 万人监视并在得到关内部队增援后进攻东北解放区；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所部主力 19 个旅约 15 万人在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及榆林左协中部的配合下待命进攻陕甘宁边解放区。此外，还用 9 个旅近 10 万人的兵力清剿长江以南中共领导的游击武装。

蒋介石及其统帅部为达到占领城市和消灭解放军主力的目的，把部队编组为“突击兵团”“、闪击兵团”“、扫荡兵团”、“地方部队”、“守备兵团”，规定了各种兵团运用及联系的要则：先以突击兵团搜索并确实捕捉敌之主力；尔后将集结后方待命之闪击兵团迅速机动至战场，协同突击兵团，以压倒优势与敌会战，歼灭敌军。战役结束后，突击兵团向下一作战目标攻击；闪击兵团位机动位置休整待命；扫荡兵团肃清残敌；地方部队接替野战军巩固后方治安。

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还修订、颁布了《作战教令》。同时，颁发了

《剿匪战术》，规定战役战斗的部署，应在企图决战方向适时集中可期必胜之兵力，且发挥诸兵种综合作战之能力。对其他方向仅使用必要之最小限度兵力；战斗时，不可逐次使用不充分之兵力，以免遗失战机；考虑到共军常行速决作战，故宜增大前卫之兵力。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对于解放军的夜战也耿耿于怀，这成为其国民党军军事行动的一大畏惧。为此，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就要求野战部队在前进时应做好正面之搜索，要求每日行程不得过五十华里，下午三时以前必须停止行动，并即行构筑工事，构成火网，以备夜战。

据此，蒋介石于1946年6月26日，毅然向我中原解放区发起攻势，标志着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为了发动内战后，可以在3～6个月内快速消灭共产党，做了充足的军事准备工作，但是其发动战争的非正义性已经决定了他的失败，就像毛泽东所说“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苦难。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⑥]

注释：

①蒋介石：关于《匪军战术之研究及对策》。

②④⑤台湾“国防研究院”编：《蒋总统集》第2册，第1558页，第1597页，第1597页。

③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92页。

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131页。

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决策和部署

蒋介石在完成全面内战的部署之后，于1946年6月中下旬先后向中共方面提出了中共军队退出察哈尔、热河、烟台、威海卫、苏北和东北大部，以及在关内分驻陕北、上党、大名、临沂等几个地区的武力要求，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共方面的拒绝。于是，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突然向我中原解放区发起攻击，拉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依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确定了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以期恢复国内和平的正确方针。中共中央于1947年7月20日做出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①周恩来10月19日，在上海发表演说时也宣布："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即使被迫得进行全面自卫抵抗，也仍是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②在全面内战爆发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一直坚持"武装自卫"这一口号。这个口号表明：这场战争是国民党反动派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完全是被迫应战；进行这场自卫战争的目的仍然是制止战争，恢复和平。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向全国人民、向各界民主人士、向国际舆论，反复阐明这一原则立场，赢得了广泛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全面内战爆发前夕，中共中央分析当时的形势及可能的发展趋向，为解放军制定了一个以主力向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外线出击、力争"以打促和"的战略计划。

对事物采取分析的态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判断形势、制定政策的一个基本方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清醒地估计和具体地分析了蒋介石在军事、经济力量方面所占有的优势，尤其是美国大力支持这个优势，同时也清晰地



看出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存在的种种弱点和自己的种种优势，尤其是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和革命力量在八年抗战中已获得巨大发展这个优势。正是根据这种科学的分析和估计，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不到一个月，即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党内文件中就对前面所说的这个重大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的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③

在指出"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为战胜蒋介石制定了几条基本的指导方针：

在军事方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突出强调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的地是运动战"。因此，他强调在这一时期"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④他希望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对此能明白，要有精神上的准备。二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具体的"在战役的部署方面，当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的。我军以少数兵力牵制敌军的其余各旅（或团），使其不能向被我军围击的旅（或团）迅速增援，以利我军首先歼灭这个旅（或团）。"⑤"在战术的部署方面，当着我军已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包围敌军诸路中的一路（一个旅或一个团）的时候，我军担任攻击的各兵团（或各部队），不应企图一下子同时全部地歼灭这个被我包围之敌，因而平分兵力，处处攻击，处处不得力，拖延时间，难于奏效。而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兵力，并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兵，从敌军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期必克。得手后，迅速扩张战果，各个歼灭该敌。"⑥

在确立了作战方法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依据国民党军的进攻部署，经过与各战略区领导人反复磋商后，拟定了南北两线作战的计划，具体

情况为：

在南线（中原、华东、晋冀鲁豫诸战场）：

处于国民党军重重包围之中的中原地区李先念、郑位三所部野战军、地方军各约30 000人，以“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为行动的基本目的，立即组织突围。由于中原军区东面的鄂东、皖西是国民党军预有准备的筑垒地带，而且东西向河流较多，在国民党军追堵下不易渡越；西面则虽然也有国民党军重兵堵截，但地域广阔，便于回旋机动，便于就粮，地形，而且鄂西北、豫陕边山高岭峻，地形复杂，便于分散坚持，如果情况十分紧张，还可分向陕南、湘鄂川边突围和向陕甘宁解放区、太岳解放区转移。

这样的分析，中央军委批准中原军区领导人的建议，决定全区部队除以一部就地坚持，一部以苏皖解放区为目的地向东突进，以钳制、迷惑国民党军外，主力30 000余人分两路突围西进，越过平汉路，直趋鄂西北及豫陕鄂边地区。在中央军委的南线作战方案计划中，最重要的是6月22日至24日拟定的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舒（同）、粟（裕）、谭（震林）、三军联合进击津浦路徐浦段的部分。

6月22日，中央军委致电晋冀豫军区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和山东野战军陈毅、舒同，全文大致为：

全局破裂后请你们考虑下列方案：太行区（按：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尽可能攻取长垣、考城、民权、兰封、封丘、宁陵、睢县、杞县、陈留、通许、太康、淮阳、商丘、鹿邑、西华等各点，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区（按：指山东野战军主力）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山东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取黄口、虞城、涡阳、夹沟、符离、宿县、任桥、固镇等各点，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太行区除山西对阎（锡山）部队外，其余一部监视豫北之敌，应以最大主力出动于豫东区域；山东以胶东对付青潍，以渤海对付济南，其余鲁中、鲁南、滨海三区主力及新四（军）主力全部南下；只要占领开封、徐州间及徐州、蚌埠间主要铁路线及上述各县城之半数左右，即为有利。有些县城可让地方部队逐次攻占之，我主力不必每个城均去打；在上述作战阶段中，充分注意争取杂牌及伪军投诚；在上述作战计划中，我五师（按：即中原军区）主力突围向河南出动，其任务为钳制河南之敌，配合我们作战；粟谭主力（按：指华中野战军粟裕、谭震林所部主力）对付江北之敌，配



合我们作战；上述作战胜利（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后，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7]

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发展，与蒋介石着重向北发展的精神正好相反，不但可将很大一部分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可保障五师不致被消灭或吃大亏，如果可以渡淮而南，就可以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

接着，中央军委与南线各军领导人就这个作战计划进行了紧张的磋商。24 日，根据磋商的结果，中央军委又发出了一份补充指示：

为使作战有重点起见，（一）开、徐间陇海线之占领及豫东、淮北各城之占领全归刘邓薄负担。（二）陈舒全力担负占领徐蚌间铁路线及调动徐敌出击而歼灭之。（三）以苏中地方兵团吸引并牵制通扬线上之敌，粟谭率主力占领蚌浦间铁路线，歼灭三、四分区之敌，策应北面作战。（四）动员民众，公私兼顾，彻底破坏陇海路、津浦路。（五）必须策动杂牌军及伪军举行起义。（六）以上为第一阶段，渡淮而南为第二阶段。（七）郑、李主力（即中原军区郑位三、李先念所率主力）在豫鄂西吸引敌人，一部在原地吸引敌人。（八）准备时间为半个月，必要时酌量延长。（九）不要阻止敌方向青、济等地增兵，彼方向北增兵愈多愈好。（十）望考虑利弊见告。[8]

至此，三军挺进津浦路徐浦段及其两侧地区实行协同作战的计划基本确定。

在拟定南线作战计划的同时，中央军委对北线（晋察冀、晋绥战区）也做出了相应的战略部署——夺取“三路四城”。“三路”是指平汉路北段、同蒲路北段和正太路；“四城”是指位于这三条铁路线上的四个城市，分别为石家庄、保定、太原和大同。

1946 年 6 月上、中旬，驻山西的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即违反停战协定向晋绥解放区发起进攻，侵占了忻县等 12 座县城；驻辽南的国民党军则积极策划进攻冀热辽解放区的中心城市承德，为了打击来犯的国民党军，保卫晋绥和冀热辽解放区，贺龙、李井泉指挥晋绥野战军及晋察冀军区一部分武装发起了晋北战役，逐步收复了朔县、宁武等城，逼近大同；而晋察冀野战军主力也准备在平汉线北段发起攻击，以声援冀热辽军区即将在热河地区进行的保卫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军委于 6 月 28 日致电晋察冀军区领导人，提出了以晋察冀、晋绥两区人民解放军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

“当敌进攻承德时，你们的主力不是保卫承德（因为这将劳而无功），而是乘敌北进，集中杨（得志）、杨（成武）、郭（天民）、赵（尔陆）四个纵队及冀中、冀晋全力举行平汉战役，占领从长辛店至石门整个平汉路，相机占领保定、石门两城。”电报列举了组织平汉战役的七点利益后指出：“希望你们用全力组织平汉战役，于半月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所有对平汉、正太、同蒲三路之进攻，均是攻城战”。夺取三路四城“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⑨]

除南北两线外，东北地区自6月7日开始，国共双方军队基本处于休战状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在这期间抓紧休战，并且在休战期间要注意军队、党内建设和做好群众工作。

从上述一系列指示中可以看出，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解放军制定了一个在关内的南、北两战场举行外线作战、全面出击的战略计划，当时被概括地称为“北线夺取三路四城”，“南线三军出击津浦线”。这个计划，以沉重打击国民党军为手段，以恢复和平局面为目的。

从1946年6月底、7月初开始，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投入了全面内战爆发后前四个月的作战。由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战争初期所制定的决策和作战部署使得解放军在战争初期顶住了国民党的疯狂进攻，粉碎了蒋介石要在三个月消灭共产党的美梦。

注释：

①③④⑤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130页，第1130～1131页，第1131页，第1141页，第1142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99页。

⑦⑧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284页，第292页。

⑨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中原突围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围攻中原解放军，成为全面内战的序幕。

中原解放区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新四军第五师在鄂豫皖部分地区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武汉三镇形成了威胁之势。在抗战期间，他们成为敌后打击日寇的有生力量。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原解放区成了蒋介石向华东、华北乃至东北发兵的重要障碍，也是全国解放区的前沿，因此它便成了国共双方都十分看重的战略枢纽。但是，在全国解放区中，这个地方又处于突出和孤立的位置，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中原解放区的孤立处境，使得蒋介石决心首先向这个地区开刀。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在对中原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政治破坏的同时，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对这个地区不断进行蚕食压缩，先后占领了鄂中、襄南、襄西、鄂南以及八路军河南军区的豫中、豫西广大地区，企图首先消灭中原解放军，打通进攻华东、华北和东北的交通。1946年5月10日，国共双方就中原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签订了《汉口协定》。但是国民党军的蚕食并未停止，到1946年6月，中原解放区被缩小到以宣化店为中心的60公里的狭长地带。面对蒋军的进逼，为了加强中原地区的武装力量，中共中央命令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自粤北返，命令王树声率领的嵩岳军区部队、王定烈率领的8团，从豫北南下，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三支部队会师后，中共中央决定由郑位三、李先念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及中原军区负责人。下辖江汉、鄂东、河南三个军区和第一、二两个野战纵队，共有6万余人。

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为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行营所属部队约30万人，统由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6月20日14时，刘峙向各部队下达了如下《作战要旨》："绥署为使尔后主力方面作战有利，以剿灭豫鄂边区共军之目的，决以第五、第六两绥区所辖部队，分由豫南、信阳、经扶（新集）、溢川间之共军，尤其对宣化店、泼陂河方面共军主力，集结优势兵力，一举分区包围而歼灭之。"[1]这就是国民党首先歼灭中原解放军，然后

进攻其他解放区的企图。

其具体部署是：将在许昌、确山、明港的第五绥靖区整编第四十一师调至信阳、罗山地区，占领岗山门、龙镇、陈兴店一线向宣化店及其以北进攻。将在罗山、光山地区的整编第七十四师调到光山东西地区，占领卧龙台、光山、付流店之线，向泼陂河及其以东以北进攻；将原在立煌（今金寨）的第四十八师一百七十四旅调至商城南北地区，占领付流店、大冲、双门拦一线，向泼陂河方向进攻；该旅归整编第四十七师指挥；将原在经扶、黄安（今红安）地区第六绥靖区整编第七十二师（欠新编第十五旅），调至双门拦、西河、经扶之线，向泼陂河方向进攻，以该师新编第十五旅主力向禹王城方向进攻，一部占领大小金山，协同整编第十一师第十八旅，由黄陂派出的部队向木兰山地区进攻；将原在信阳、花园地区的整编第六十六师主力，调至夏店、郭家店、大新店之线，重点向宣化店方向进攻，该师一部仍留在原地监视平汉路西解放军，并担任维护花园至信阳间交通；将原在方城、午阳地区的整编第十五师调至信阳、广水，占领大新店、三里店之线，重点向宣化店方向进攻；以原在安陵、应城、京山地区的整编第七十五师一部控制广水，并和驻浠水之第一百六十九旅推进至麻城以北，归第六绥靖区指挥，该师主力担负对平汉路西解放区监视之任务；整编第三师集结在信阳为预备队。并以驻西安之空军支援第五绥靖区部队作战，驻汉口之空军支援第六绥靖区作战。

针对国民党军的围歼计划，中原解放区积极应对，做了相应的突围准备工作：

在突围的准备中，首要的是选择突围方向问题。早在4月30日，中共中央在中原解放区形势紧张时，就曾致电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假如国民党军“向你们大举进攻而迫使你们非突围不可时，你们准备向何方向前进，向西还是向东，二者利害及前途如何，望预先秘密计划并电告。”[②]“未等中原局回电，5月1日，中共中央又致电指出，“主力突围方向应详细考虑。”，“主力向西当然有许多困难与危险，但比向东地区广大（豫西、鄂西、陕南、川东）便于机动，且早麦将熟。如和平破裂，即准备在这一地区作长期的游击战争，牵制敌人，配合华北、东北将起重大战略作用。”还指出，“目前国民党军主力布置在西面，然在津浦路上，二月以来即秘密加强碉堡与封锁沟。企图以强大兵力分路由西向东追击，压迫我军于津浦路以西附近狭小地区歼灭我军。如果我不能战胜黄河、淮河水网及津浦路上封



锁，其危险是很严重的。”[③]同一天，中共中央又致电郑位三、李先念：“国民党军有5日至9日围歼你们的计划，你们向东向北行动均很困难，国民党军已有周密准备，但应一部向东，一部留原地分散坚持游击，主力向西到鄂西、陕南、豫西地区为宜。”[④]

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就突围方向问题，先后提出了建议，并反映了研究中的不同意见。6月19日，依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致电郑位三、李先念、王震：“（一）宁周（周恩来）电称：蒋决定大打，你处须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二）突围后有两个可能前途：第一个能达向北目的；第二个被敌阻隔不能达向北目的。（三）因此你们须作两个准备：第一个争取一切可能向北；第二个在向北不可能时准备在国民党区域创造根据地，以待时局之变化。”[⑤]据此，中共中原局、中原军区曾研讨突围方案3个，一是东去苏皖解放区；二是北至冀鲁豫解放区；三是西向秦岭、武当山，而后转入太岳或陕甘宁边区。前两个方案均考虑有国民党重兵配置，不易出走。最终确定第三方案并经中共中央批准。

1946年6月，国民党任命刘峙为进攻中原解放军的总指挥，在河南驻马店设立指挥所，限所属部队“6月22日前完成秘密包围态势”，26日围攻开始，7月1日发起总攻击。其兵力部署为：3个半师由信阳、罗山、光山、商城、经扶、黄安地区，3个半师由黄陂、花园、应山、信阳、广水等地，分路向宣化店、泼陂河合击；并有一部兵力控制广水和麻城以北地区，还调集空军配合作战。6月26日晨，发动围攻之国民党军即已占取邓店、虎湾等地。

此前，6月20日，中共中原局向中央报告向西突围的计划获得批准，23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称：“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26日，中央又来电：“巧妙避开敌之打击，分途突出包围圈”。[⑥]据此，中原军区决定：由第一纵队第一旅皮定均部由白雀园地区向东行动，造成主力东移之假象，以迷惑敌人；鄂东军区部队就地坚持，以牵制敌人；中原解放军主力分左右两路于26日向西突围。具体突围情况为：

左路突围部队为第一纵队（欠第一旅）及第二纵队之第十五旅（欠1个团）共1万人，由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率领，于6月26日晚由光山县之泼陂河向西突围，7月1日越过平汉路，冲破敌人在宜城东南之流水沟等地的堵截，7月26日进入武当山区，在竹溪、竹山、房县、

保康、南漳等地分散活动。8月上旬，与由安陆向西突围，原拟入川，受阻后返回的江汉军区部队，在房县西南地区回合。27日，成立鄂西北军区。

担任右路突围的部队为第二纵队之第十三旅、第十五旅1个团、第三百五十九旅、干部旅及中原军区机关，共约19 000人，由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率领，于26日晚由宣化店向西北方向突围。29日晚，在信阳以南之李家寨及柳林车站间突破敌之封锁线，越过平汉路。郑州绥靖公署急调5个整编师的全部或大部进行追堵，先后在天河口、苍苔地区及南阳以西、丹江以东，荆紫关、白浪河以南的白桑关、南化塘地区，郧西西北的梁家坟、漫川关地区，组织多次大规模的包围合围。突围部队或昼夜兼程，以急行军先机冲出敌人的合围圈；或以小部队阻击追敌，掩护主力加速开进；或以殊死的反复冲击，突破敌人严密布防的阻击阵地。历经艰险，终于冲破敌人的重重追堵合围，胜利的进至陕南之商南县境，与在当地坚持斗争的陕南游击队会合。3日，成立了鄂豫陕军区，开展新的斗争。右路军的359旅，则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在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王震率领下和陕甘宁边区解放军的接应下，于8月底进到陕甘宁边区。河南军区2 000余人，在完成掩护任务后于8月初进入豫陕边的卢氏、灵宝等地开展游击斗争。

担任迷惑与牵制敌人任务之第一纵队第一旅，于6月26日开始行动，29日在麻城以北突破封锁线，越过鄂皖边境的松子关，穿过大别山，跋涉千余里，粉碎敌人的多次堵截，于7月20日进入苏皖解放区，改归华中解放军序列。鄂东军区部队掩护主力突围后，积极活动于麻城、太湖、霍山等地。

此外，当中原解放军到陕南时，由中共商洛工委、陕南游击队和党的秘密组织及人民群众当向导，作掩护，筹备供应，掩护伤员，转移保护领导干部。从龙头山到梅子沟岭，群众安置伤员近千人。当时，中共中原局、中原军区的干部极端疲惫，又多患病，如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百余人离开部队，化装赴延安，也通过国民党保安团中的秘密党员，以合法身份进行掩护，安全到达陕北。这些党的秘密组织和人民群众对于当时主力军的中原突围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两个月来，中原解放军以无比坚强的毅力，突破敌人重重包围和堵截，部队的总数损失了近2/5，但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保存了主力，部队约两万人创建了两块根据地，并留置小部队坚持了鄂东和鄂中地区的游击战争。中原解放军的胜利突围，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赞扬。1946年10月1



日，中共中央在《三个月总结》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分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作战起更大的作用。"⑦1946 年 12 月，刘少奇在提及中原部队的损失时指出："它完成了当时极重要的牵制敌人的任务，他们的损失是有代价的，正如胜利的战斗也有损失一样，是光荣的。"⑧1947 年 10 月，陈毅在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豫苏皖后，在河南淮阳汲冢地区会见原新四军第五师部分干部时说："没有你们在宣化店六个月的坚持，没有你们艰苦卓绝的中原突围，全国战场要取得今天这个好形势是不可能的"。⑨

中原军区部队，在突围中所以能取得胜利，一是由于正确地选定了突围方向，使突围部队突过平汉线即可进入广阔的地区，进行大的机动和开展游击战争。二是由于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充分的准备，有主有次，有突围有就地钳制，明确区分了各部队任务。三是由于保持了突围行动的突然性。四是由于广大指战员发扬了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战胜酷暑，忍饥挨饿，跋山涉水，兼程行军，奋勇作战。五是由于华中和晋冀鲁豫野战部队的积极作战，调动了围追中原部队的国民党军回援，起了一定的策应作用。

注释：

①黄友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档案出版社，1992 年版，第 97 页。

②⑤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选》第 3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89 页，第 274 页。

③中共中央致中央局电，1946 年 5 月 1 日。

④中共中央致郑位三、李先念电，1946 年 5 月 1 日。

⑥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281 页。

⑦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207 页。

⑧⑨《中原突围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254 页，第 247 页。

华东解放区的苏中、淮北战役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围攻中原解放区后，接着对各个解放区发起攻击，各解放区军民也起而应战，内战全面爆发，华东解放区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成为国民党重点围攻的对象之一。

华东解放区含苏皖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东濒黄海、渤海，南临长江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京、沪、杭地区隔江相望，西抵津浦铁路，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相邻，北与晋察冀解放区相接。境内有黄河、淮河、运河等河流。鲁西地区为平原，鲁中地区多为山区，淮北地区为平原，苏中地区河渠纵横。胶济铁路与陇海铁路横贯东西。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渤海湾南缘各港口是与东北解放区进行海上联系的重要渠道。华东地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经济比较发达，为重要的战略区之一。

国民党军在围攻中原解放区的同时，集中了58个旅对华东解放区进行围攻。其中以31个旅分别经苏中、淮南、淮北，进窥苏皖解放区的中心城市淮阴；27个旅进攻胶济路和鲁南台（儿庄）枣（庄）地区，牵制山东解放军，企图先占领苏皖解放区，消灭该区解放军或迫使其北撤，然后在山东地区与解放军作战，并占领整个山东。国民党军在长江西岸的南通、靖江、泰兴、泰川、扬州、江阴、扬中、镇江等地，集中了15个旅约12万人，由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指挥（7月上旬接替汤恩伯），首先进攻苏中解放区。

为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中共中央也做出了相应的部署，这时原定的“南线作战计划”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由于华中野战军、华中军区和山东野战军的几封建议电报，中共中央最终做出了“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决定。华中野战军和华中军区领导人的电报，陈述了苏中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且6月27日，粟裕致电山东野战军并中共中央军委，申述了华中主力仍留苏中作战的理由：“中央作战方针完全正确。唯在三分区集中大兵团作战，粮食及民夫和交通运输均极困难。如集中兵力过多，则



所需用粮、民夫必超过当地负担，不仅影响当地，且影响战斗更大。因此，特作如下建议：一、将五旅调往淮南，连同淮南独立旅及第18集团并路西部队共约8个团，如必要可从九纵抽三个团至淮南参战（共十一个团）。山东既有主力至七分区，则九纵愈可以南下，苏中主力可以扬、泰为进攻目标，以牵制敌军西移。二、如第一方案不成，则谢纵（十纵）必须留苏中，协同七纵，方能守住海安、东台、兴化，高邮之线，否则对华中影响甚大"。"目前，我们主力都集中于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已准备完毕，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因一、六师和七纵指战员大多是苏中人，有些家里已遭顽摧残，为此，我们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①]6月29日中分局、华中军区致电中共中央并新四军军部，提出了与粟裕相同的建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认真考虑了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和粟裕的建议，最终调整了作战计划。

7月4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和华中分局："据华中电，刘汝明、曹福林部队传出消息，该两军将由考城、东明开济宁；据剑英电，7月1日收到国方备忘录，限我军7月30日退出及至考城之走廊，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负责；据恩来7月2日电，现在形势边打边谈，打又为主；据刘邓电，顽方准备以三十一集团军进攻焦作，以四十四集团军进攻冀南；据陈电，济南、潍县两顽正攻胶济路，等语。似此，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果如此，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②]之后，中央军委在7月13日致电山东、晋冀鲁豫和华中领导人时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华东解放军在内线歼灭国民党军的决策，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在回忆录中写道："确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这是战争初期中央军委对原定战略计划的一次调整，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苏中战役，就是在中央调整战略计划指导下发起的。"[③]

这时中共华东解放区的野战部队，于7月初确定：以新四军军长、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指挥1个纵队和2个师共18个团，约4万人，追击淮北之敌；由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指挥3个师、1个纵队共19个团，约3万余人，首先在苏中地区迎击进犯之敌，然后经淮河紧急津浦路蚌浦段，配合山东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作战。

在苏中战场，国民党军原定7月15日发起进攻，华中野战军两个师、两个纵队共19个团3万余人，在粟裕的指挥下决定争取先机，于7月13

日，以五倍于敌的兵力，向宣家堡、泰兴守敌发起攻击，至15日拂晓，歼敌共3 000余人，取得了宣泰战斗的胜利。这时，国民党军一面派兵北援泰兴，一面向如皋进攻。15日，华中野战军以少数兵力续攻泰兴残敌，以迷惑敌军，以1个团及地方武装坚守如皋外，主力军于16日，以四倍于敌的兵力，奔至如皋以南之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驻地，于18日晚对该师进行包围，经过两日激战，将该师师部及第二十六旅全部、第七十九旅大部共万人歼灭。之后，以一部在如皋、海安之间进行运动防御，杀伤自如皋北攻海安的国民党军2 000余人，主力集结在海安东北地区进行短期休整。这时国民党判断失误，调整了作战部署，准备“巩固收复区”分兵“清剿”海安、泰州之线以南的占领区，然后北犯。经过整补后的华中野战军主力乘李堡、海安国民党军换防之机发起李堡战斗，分别在李堡和海安以东的丁家所地区以村落攻坚和伏击手段歼灭国民党军1个半旅约8 000余人。

在华中野战军四次战斗告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粟裕、谭震林，指出：“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如交警总队，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你们如能彻底粉碎苏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之影响。”④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李堡战斗后华中野战军主力自海安、如皋以东隐蔽南下，先后进入如皋、南通之间和如皋、黄桥之间国民党军侧后方，于8月21日至30日连续打了丁林战斗和如黄路战斗，前者歼灭交警总队5个大队共3 000余人，后者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的手段分别在如黄路上的分界、加力两地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半旅约1.7万人，并攻占黄桥。在进行如黄路战斗的同时，华中解放军一部在邵伯地区击退自扬州沿运河北攻的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守住了淮安南大门邵伯镇。

这就是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连续进行7次战斗，以伤亡1.2万余人为代价，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另5个交警大队共5万多人，占其进攻苏中解放区总兵力的2/5。苏中战役具有重大意义。延安总部发言人称：“汤恩伯部国民党军队对苏中的进攻，已经惨败。这一事件对于今后的战局的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华中野战军的胜利，使蒋介石狂妄宣称的“三个星期内消灭苏北共军”的企图化为泡影，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不得不承认自己伤亡过重。

苏中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面内战爆发后进行的第一个较大规模战役，起到了战略侦察作用，为解放军获得了内线歼敌的宝贵经验。在战役指挥上主要有：（1）紧紧掌握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的作战原则。



在战争初期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既不轻易放弃一个战略要点，但也不死守一地，而是给进犯的国民党军以重大杀伤后，有计划地逐步后撤集离。（2）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能平均使用兵力。（3）抓紧战斗空隙休整部队，整顿组织，保证部队有连续作战的能力。（4）充分利用解放区的有利条件，诱敌深入，追敌分散，捕捉战机，消灭敌人。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在向解放军全军通报苏中战役的经验时指出："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未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未敢集中十五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⑤]

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在检讨苏中战役的教训时，认为："一、进剿时使用兵力不充分，未能将匪主力击破，嗣后分散防守贻匪以各个击破，招致重大损失。二、苏北匪化甚深，故匪 之情报灵活，行动自如，我军则每日有盲目作战之感，常贻匪以集中兵力袭击我一点之机会。"[⑥]

淮北解放区是国民党军进攻华中的另一重要方向。1946 年 7 月 18 日，国民党军以 12 个旅的兵力，自徐州、夹沟、固镇地区分三路进攻淮北解放区。7 月 19 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徐敌东进，让其进至有利于我之地区，然后集中全力歼其一部，得手后再歼其第二部、第三部最为适宜。"中共山东野战军依据军委作战计划，决定：以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七师第二十旅及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共 13 个团的兵力，攻歼朝阳集、渔沟地区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二旅，并争取在运动中歼灭向南增援的第六十旅全部或一部，然后继续执行歼灭整编第二十八师的计划。按照事先的作战部署，山东野战军于 7 月 20 日前隐蔽进入淮北地区。27 日，以 13 个团的兵力发起朝阳集战役，激战至 29 日，歼灭国民党军 5 000 余人。朝阳集战役是山东野战军进至淮北首次取得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旅的胜利。朝阳集战役后，蒋介石以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长梁汉明指挥无方，坐视第九十二旅陷入苦战被歼的罪名，撤销了梁汉明的职务。当朝阳集战役进行之际，国民党军第七军乘虚东犯，先后侵占灵璧、泗县及五河。为了策应晋冀鲁豫野战军于 8 月 10 日向豫东出击，山东野战军首长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原定出击津浦路的计划，并针对第七军兵力分散的弱点，决心放弃原定攻歼陇海线整编第二十八师及预三旅之作战计划，改为进袭泗、灵地区之第七军主力第一百七十二师，然后乘胜进出津浦路。于是，山东野战军又于 8 月 7 日发起泗县战斗。由于是攻

城，守军是战斗力颇强的桂系军队，又适逢大雨，遍地雨水，攻城部队为大水阻隔，无法机动转用，因此虽一度突入城内，但在守军顽强抗击下又被迫撤出，山东野战军未能达成预期的歼敌目的，被迫转移到运河以东休整，淮北失陷。

国民党军在占领淮北解放区各城镇后，稍事整顿，又增调兵力，并以被称为“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为骨干，纠集3个整编师的兵力，于9月上旬自洋河地区夹运河向淮阴、淮安突进。山东解放军曾多次计划歼灭进攻之敌，但是均未成功。最终在华中野战军主力自苏中北上增援未及赶到的情况下，整编第七十四师乘隙占领淮阴，接着又抢占了淮安。

淮北、淮南、苏中解放区的丢失，主要是因为（1）守军战斗力强，遇到的是桂系部队和精锐整编师第七十四师；（2）天气恶劣的影响。在泗县战斗恰逢大雨，攻城部队受阻隔，无法机动转用，最终不得不在国民党军的顽强抗击下撤出；（3）增援部队未能及时到达，双方力量悬殊，解放军兵力不够集中，最终未能击破国民党军的进攻。

淮安、淮阴的失守，使苏皖边解放区的3/5，即淮北、淮南、苏中三个地区称为敌占区，主要战场推移到了盐阜、淮海两个地区，这样 ，解放军回旋机动地区大为缩小，军需物资供应的困难增大；但同时，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逐步靠拢，也出现了集两军于一个战场进行较大规模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注释：

① 粟裕致山东野战军并中共中央军委电，1946年6月27日。

②《苏中七战七捷》编写组编：《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③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60页。

④⑤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第438页。

⑥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如皋海安战斗》，《国民党军资料选编》第1册。



晋冀鲁豫野战军痛击国民党军

晋冀鲁豫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创造的根据地。抗战胜利后，解放区得以扩大，原来的4个抗日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晋冀鲁豫解放区包括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4个解放区，面积为16.5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735万，县城114座，解放区党政领导机关设在邯郸。东抵津浦路（德州至徐州段），西起同蒲路，北至正太路、德石路，南至黄河以南，分别与华东、晋绥、晋察冀及中原解放区相邻。境内西北山峦重叠，有太岳、太行山脉，东南平原辽阔，平汉铁路（石家庄至郑州段）横贯南北。它是国民党军进攻华北、东北的必经之路。晋冀鲁豫解放区也是蒋介石发动战略进攻的重要目标之一，国民党军在围攻中原解放区的同时，也向该地区发起了进攻。国民党军以豫北和晋南为进攻重点，在这一地区集中了正规军28个旅，连同地方团队共达30万人以上。

当时，国民党的作战意图为：国民党军在围攻中原解放区的同时，决定以郑州绥靖公署的6个师的兵力进于开封至商丘一线，阻止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支援中原军区部队；以第十一战区所属12个旅进于新乡、汤阴、安阳，待郑州绥靖公署主力歼灭中原解放军后，共同进攻冀鲁豫和豫北解放区，打通平汉路。以第一战区、第二战区所属10个旅（师）的兵力，进于运城、临汾、平遥，准备打通同蒲路南段，并进攻晋南的解放军。国民党军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兵力部署是：在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以第四绥区整编第六十八、第五十五师共6个旅的兵力担任守备；在豫北地区，集中整编第四十、第三十、第三十二、第三十八师和第八十五军共12个旅的兵力，在平汉路新乡及其以南的道口（今花仙）清化（今博爱）铁路线战区上待命；在晋南，集中第一战区6个旅、第二战区4个师（未整编），于7月初向晋南进攻，企图消灭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主力，进而会攻上党。

中共中央提出全局破裂后的战略计划，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和山东野战军主力分别向豫东和津浦路徐（州）蚌（埠）段进击，着重在野战中

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太岳军区部队会同晋绥军区一部，粉碎胡宗南部的进攻，歼灭同蒲路南段及晋西南之国民党军。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意图，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进行了如下战略部署，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率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共4万余人（随后又增加第二纵队1万余人），执行豫东方向的作战任务。由陈赓、谢富治率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一部共2万余人，同晋绥军区之吕梁军区部队，归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执行晋南方向的作战任务。由滕代远、王宏坤、薄一波负责晋冀鲁豫军区工作。

在中原军区部队突围以及长江北岸和津浦段徐浦段国民党军分别发起对苏中、淮南、淮北解放区的进攻期间，中共中央于7月21日指示刘邓：乘敌兵力薄弱之机日内即动手夺取汴徐线，而后依情况向南发展，夺取豫东、淮北诸县，以策应华东解放军的作战并声援中原军区的突围。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刘邓所部隐蔽集结在城武、定陶、菏泽、东明地区待机的3个纵队分两路向陇海路疾进，在广大地方武装和民兵协力下，于8月10日晚向开封至黄口段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至11日拂晓攻占兰封、砀山及其他车站，歼灭国民党军5 000余人，并毁了这一段铁路。接着按预定计划越路南下，在豫东地区展开攻势，连克通许、杞县、虞城等县城，再歼国民党军万余人，其中包括起义的“河南省鹿邑、永城、虞城联合总指挥”蒋嘉彬部5 000余人，对战略重镇郑州、开封、徐州构成严重威胁，迫使郑州绥靖公署和徐州绥靖公署分别从追堵中原解放军的部队中抽调3个整编师，从进攻华中解放区的部队中抽调3个整编师回援郑州和徐州。由于调动敌军的目的已达成，22日，刘伯承、邓小平决心结束作战行动，乘胜将部队撤回陇海路以北的鲁西南地区休整。

此役意义重大，它截断了国民党军东西交通干线，迫使国民党军不得不将其追堵中原军区部队3个整编师及准备投入华东战场的精锐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调到冀鲁豫战场，因而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南线作战计划，减轻了中原军区部队的负担，配合了华东地区解放军的作战。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这一战役中探明了陇海路一带及新黄河以北的地形、敌情、民情，为以后的战略进攻“探了路”。

这一战役，是在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情况下，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动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部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反击战。其主要经验是：



在出敌不意的条件下，晋冀鲁豫野战军采取“猛虎掏心战术”透入国民党军的纵深，进行宽正面而有重点的突然猛袭，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军，控制了国民党军的交通命脉，调动了国民党军。

在刘邓野战军出击陇海战役后，国民党徐州绥署和郑州绥署，循序集中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万人，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到开封进行部署，郑州绥署主任刘峙到民权、考城前线指挥督战，企图以优势兵力合击刘邓军于定陶、曹县一带，进而控制鲁西南地区，并于8月28日开始行动。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中共中央军委就定陶战役的作战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凡与顽正规军作战，每战必须以优势兵力加于敌人，其比例最好是四比一（四千人打一千人，四万人打一万人），至少是三比一，歼其一部，再打另一部，再打第三部，各个击破之。望以此教育干部，克服战役上及战斗上平均用力、普遍求胜之轻敌观念（此观念在许多干部中是存在的）。”[①]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上级指示，对当时敌情进行了周密分析，最终决定：集中其主力，首先歼灭第三师于定陶西南地区。尔后再视情况歼灭第四十七师。另以地方武装钳制其余各路国民党军。并决定从豫北急调第二纵队到东明东南地区集结待机。

9月2日，刘邓军两个团将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诱至秦砦、桃园，整编第四十七师进至黄水、吕砦。两师间隔20至25公里。刘邓决定待整编第三师进至定陶以西的太阳湖地区加以消灭。原定9月4日在定陶西二十里开始作战，首先消灭整编第三师之两个旅。后来获悉国民党军改变了战略部署，以整编第四十七师向定陶，整编第三师向菏泽，其间隔加大，而愈在西面间隔愈大，故决定提前1天于9月3日黄昏开始，改在韩集、安陵集以西作战。战斗发起后，因为有些部队攻击太晚，尤其未发挥突然由南北同时钳击之奇效，所以当晚的战果极微。9月4日，进行的夜战也仅消灭两个营。5日，第六纵队以最顽强的战斗，消灭了敌二十旅之五十九团，第三、第七纵队亦各消灭了一部，才打开了局面，此时，敌整编第三师主力之第二十旅已基本被消灭，第三旅也被重挫。6日，敌整编第三师向西南突围，企图靠拢整编第四十七师，但在途中被我军消灭。当整编第三师被围歼时，刘峙严令整编第四十七师向北增援，但四十七师行动消极缓慢，最终没有增援成功，两师相差不到十里，仍为我军钳制部队隔断。敌整编第三师被歼灭后，我军除一部肃清残敌外，主力转入西南，向整编第四十七师侧背卷击，该敌旋即

溃散，被歼大半。7 日，我军以第二、三纵队一部向考城迫近，又消灭由曹县向兰封撤退之七十四旅两个营，并给一百一十九旅以杀伤。我第二纵队又在考城以北消灭四十一师由东明向南撤退之一百二十五旅、一百零四旅各一部（约两个营）。到 9 月 8 日，整个战役结束。此役，刘邓军共歼敌 4 个旅约 17 000 人，俘敌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而刘邓伤亡 3 500 余人。《解放日报》1946 年 9 月 12 日发表社论称：这一胜利，连同中原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

定陶战役后，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总结了这次战役胜利的主要经验：（1）诱敌人解放区打为有利，但必须组织有力而适当的运动防御，消耗敌人弹药，损伤其人马，造成我主力决战的有利条件；（2）在战役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敌基干部队，打敌嫡系部队；（3）在战术上，以兵力重点打击敌人弱点而各个消灭之；（4）对战斗力不强，特别是两个系统的敌人，我们可以插入其中间钳击一部（对善于突击的而又积极是我敌人又当别论）。

定陶战役后，郑州绥署主任刘峙因“作战无力”被撤职，改由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兼任，并在郑州设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其任务是巩固陇海路，打通平汉路，企图“将陇海路以南之共军部队予以消灭，并拟将陇海路以北之共军更向北驱赶，而肃清共军对陇海线徐汴之威胁。”②

顾祝同接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后，为贯彻蒋介石意图，于 9 月下旬调整部署，并相继攻占了定陶、菏泽等地。晋冀鲁豫野战军于 10 月间先后举行了巨野战役和鄄城战役，歼灭整编第十一师一部和整编第六十八师一个半旅共 1.4 万余人。之后，全军即转移到鄄城以北、濮阳以西地区进行休整补充。

晋冀鲁豫战区的另一个作战方向，是晋南（太岳）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应敌的，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共 5 个旅约 30 000 人，统由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

1946 年 7 月上旬，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所部 3 个整编师及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部一个军，分别由运城、介休南北对进，企图打通同蒲路南段，求歼晋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而后打通正太路，经石家庄运兵北平。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在晋绥军区所属的吕梁军区部队配合下，决心乘胡（宗南）、阎（锡山）两部尚未靠拢时，利用胡部骄狂冒进和阎部力求保存实力的弱点，以一部兵力进至临汾以北钳



制阎部，集中主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北犯之胡军。

7月12日，胡宗南部整编第一、第二十七师分别进到水头、闻喜、夏县、堰常，第四纵队等部即乘机出击，发起闻夏战役，到22日，歼灭一个多旅共5 000余人。接着又转兵北上，乘阎军主力北调太原以北地区对付晋绥区人民解放军转赴的晋北攻势而太原以南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于8月14日发起同蒲战役，至9月1日，共歼灭守军万余人，控制铁路百余公里，切断了胡宗南、阎锡山两部联系，为继续歼灭北进之敌开辟了战场。9月下旬，在胡宗南军加强了运城兵力并再次沿同蒲路及其东侧北攻之时，第四纵队等部又于9月22日至24日举行了临浮战役，在临汾、浮山之间的官雀、陈堰村两地分别包围并歼灭了被称为“天下第一旅”的整编第一师第一旅共4 000余人，俘旅长黄正诚。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从7月开始的三个月中连打3仗，歼灭国民党军2.5万余人，重创了胡阎两部，稳定了晋南战局。9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通报全军表扬，通报称：晋南我军之三个独立旅及一个地方旅，敌军兵力四、五倍于我，我军仍然能够连续成旅的歼灭敌军。这一事实再次证明，只要集中优势兵力，坚决歼敌一路，并可取得胜利”[③]“只要在指挥上既灵活又勇敢，敌人的进攻是能够打破的”。[④]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四个月来，进行了陇海、定陶、鄄城、同蒲、闻夏、临浮等一系列战役，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12个旅共7.5万余人的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进攻的国民党军，有力地配合了华东和中原解放军的作战。在上述战役中，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贯彻了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实行大踏步地机动作战，积极捕捉战机，充分发挥战役指挥上的主动性、灵活性，各个击破敌人。经过四个月的作战，晋冀鲁豫军区武装力量不断壮大，部队由战争开始时的27万人增加到31万人，民兵由60万人发展74万人。部队的武器装备有了很大改善，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

注释：

①④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22页，第494页。

②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1946.7—1947.6），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

③ 中共中央军委致各战略区电，1946年9月25日。

晋绥、晋察冀解放区的失利

晋察冀解放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抗日敌后根据地，抗日战争结束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46 年 7 月，晋察冀解放区含冀中、冀晋、冀察、冀热辽解放区。南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相邻，北与东北解放区相接，东南与山东解放区相依，西与晋绥解放区相连，地跨晋、察、冀、热、辽五省。境内西倚五台山，东有冀中、冀东平原，物产丰富。晋察冀解放区包围着国民党军占领、控制的北平、天津、保定、太原、大同等大中城市和以平津地区为交通枢纽的北宁、平汉、津浦、平承、平绥、正太、同蒲等铁路交通干线。晋察冀解放区的面积为 54.95 万平方公里，人口为 2 655 万，拥有城市 96 座，首府设在张家口。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治委员刘澜涛、罗瑞卿，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兼），副参谋长耿飚、曾涌泉，政治部副主任潘自力、蔡树藩，下辖 4 个纵队、4 个二级军区，总兵力为 24 万人。

晋绥解放区含吕梁、雁门、绥蒙解放区。东抵同蒲路北段，与晋冀鲁豫、晋察冀解放区相接，西临黄河，与陕甘宁解放区隔河相望，南至汾河，与太岳解放区相接壤，北越平绥路，抵山西北部和绥远东南部。境内吕梁山脉横贯南北。晋西北地处黄河沿岸，土地贫瘠，粮食产量很低。

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李井泉，副司令员续范亭、周士第，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主任冼恒汉，后勤部长陈希云，下辖晋绥野战军、3 个二级军区总兵力为 5.5 万人。

由于晋察冀、晋绥重要的战略地位，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这里也成为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地区。在晋绥、晋察冀解放区周围的国民党军，计有第十一战区、第十二战区及第二战区，所属共 13 个军 38 个师约 33 万余人。其中第一战区孙连仲部 8 个军 21 个师，分布在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等大中城市；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 3 个军 10 个师，分布在包头、归绥、



旗下营地区；第二战区阎锡山部两个军7个师，分布于同蒲路北段太原、大同和正太路娘子关以西地区。国民党军的意图是：首先占领承德和冀东地区，然后夺取晋察冀解放区中心城市张家口，确实控制平绥路和同蒲、平汉路北段及北宁路、锦承路，分割晋绥、晋察冀和东北解放区，集中兵力分别消灭解放军。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依据中央军委半年内外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晋绥和晋察冀军区作出如下部署：第一步，以晋绥军区主力和晋察冀军区一部组织晋北战役，夺取同蒲路段诸城，割断太原、大同的联系；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留置冀东作战；第二步，以晋察冀、晋绥军区的主力部队会攻；同时阻击第十二战区之敌东进，并在平绥路东段阻止北平之敌西进；第三部，视情况发展进行平汉战役，夺取平汉路北段，并相机攻占石家庄、保定等城，然后夺取正太路和太原城。

依据此方案，中共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于1946年7月4日发起了晋北战役，解放军攻克和收复了五台、原平、定襄等十座城镇，并在忻县外围歼灭由太原北援之敌两个团，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8 000余人，控制了同蒲路忻县以北地段，使大同之敌陷于孤立。

晋北战役结束后，晋绥和晋察冀军区将主要作战方向至于大同地区。大同是平绥、同蒲两铁路的交会点，是山西省北部的战略要地。城东北及西北山岳环抱，城东面有御河障碍，城南面地势平坦。晋北战役后，大同是阎锡山在晋北的最后一个据点，是晋察冀与晋绥两解放区联系的唯一障碍。国民党守军计有第二战区阎锡山所属1个师（旅）、大同保安教导总队（内有收编的日军800余人）以及各种土杂武装共1.9万余人。

在大同已经被孤立的情况下，中央军委批准了聂荣臻提出的先以晋绥、晋察冀两军夺取的计划，并要求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领导人研究夺取大同的可能性和具体的作战计划。为研究和部署攻打大同的问题，聂荣臻于8月2日在阳高召开了干部会议。会议一致认为："攻占大同，对今后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各方执行任务均有利。大同国民党军总兵力不多，但工事坚固，故须在技术上进行充分准备方能奏效。尽力求得各个歼灭敌人，不使城外守军退集城内。在步骤上，首先歼灭应县及怀仁守军，争取在大同外围歼灭敌师主力，而后夺取城关，以坑道爆破攻城。预计半月至20天攻下大同。判断绥远傅作义有极大可能东出增援，其出动兵力最多为4个师。"①

为统一指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以晋绥野战

军副司令员张宗逊为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为副司令员。

7月31日，大同外围战打响，至8月8日，担任攻城的一个纵队另两个旅并附一部分分区武装攻占大同大部分外围据点，歼灭国民党军2 000余人，国民党军大部缩踞到城关及郊区各点。但由于未能将国民党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使国民党军得以收缩兵力退集大同城内。同时，解放军未能控制城东南机场，使国民党军得以从包头空运交通警察第16总队第三大队入大同，增强了防御力量。蒋介石为了诱使傅作义出兵增援大同，将原属第二战区的大同划归第十二战区管辖。8月下旬，傅作义一面假意与我军谈判，一面开始东进。9月3日，傅作义集中5个步兵师和4个骑兵纵队（师），共3万余人的兵力，分3路向集宁进犯，企图经集宁南援大同。9月4日，解放军大同前线指挥部，根据上述国民党军部署的变化，决心采取先打援，再攻城的作战方针。由张宗逊、罗瑞卿率第三百五十八旅北上打援，留第三纵队及第一、第五军分区的部队，在杨成武指挥下继续围困大同。9月5日，傅作义占领卓资山。解放军大同前线指挥部认为，敌人可能沿铁路进犯集宁，或沿公路向新堂、丰镇进犯，因此，又增调了3个旅。10日，打援部队与傅作义部交战于集宁城下，“当时我军迂回傅军背后，傅作义以三师兵力占卧虎山，攻集宁，当即与我军正面接触，发现我军主力时，已不能撤，去路已被切断。我军陆续歼灭了傅军的十一师主力和十七师的一个团；第三十一师作困兽之斗，向集宁成猛扑。此时，三十二师、一〇一师及三千骑兵又自绥远继续增援。由于我战场布置的不好，给养缺乏，担架、医药等准备较差，未能歼灭其一〇一师。因此，在和敌人三十一师猛烈巷战后，我乃主动放弃集宁。”[②]集宁丢失，大同势难再攻，为了寻求新的战机，攻城部队于9月16日撤围大同。大同、集宁之战宣告结束。

大同、集宁战役历时一个半月，解放军发扬了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援下，又取得了歼国民党军万人的胜利。但战役的基本任务未完成，大同久攻不下，未能歼灭傅作义部主力，使张家口处于国民党军东西夹击的不利形势下。

这次大同、集宁之战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军对于攻城战没有经验，指挥失误，临时改变作战计划，错过了最佳的歼敌时机，装备和补给也出了问题。傅作义在回忆这段时说：“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一百零



一师参加战斗之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12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三十一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他那天晚上去攻新编第三十一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③]

大同、集宁之战以后，国民党军又发动了冀东战役，占领了承德。集宁、承德的失陷，使得张家口处于东西夹击的状态。为了给10月即将召开的"国大"取得政治资本，蒋介石下令北平行辕发动对张家口的进攻。集中第十一、十二战区主力，对张家口实行东西夹击；以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两个军分别由南口和怀柔地区沿平绥路向怀柔进攻，以一个军为后续跟进；以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两个军另一个骑兵师等集结集宁，待机东进，协同第十一战区部队会攻张家口。

针对蒋介石的作战部署，9月17日，聂荣臻、萧克、刘澜涛和罗瑞卿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说："在敌东西夹击张家口情况下，我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9月18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集中主力于适当地区待敌分路前进，歼灭其一个师（两个团左右），得手后看情形如有可能，则再歼其一部，即可将敌第一次进攻打破。依南口至张家口之地形及群众条件，我事前进行充分准备，各个歼敌，打破此次进攻之可能性是存在的。""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如届时敌数路密集不利于我，可以临时决定不打。若预先即决定不打，则将丧失可打之机，对于军心士气亦很不利。""每次歼敌一个团二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十个至十五个团即有可能歼敌一个旅（两个团）。""同时张家口应秘密进行疏散，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之，这种准备和积极布置歼敌计划并不矛盾。"[④]这些指示，表明中央军委关于北线作战的战略决策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放弃了原定的夺取"三路四城"的外线出击计划，而改取依据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实行内线作战，力争在运动战中逐批歼敌的方针，即尽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晋察冀军区首长决心进行张家口保卫战。依据当前的敌情，他们判断国民党军的主攻方向将是东线平绥铁路东段之康庄、怀来地区，西线之国民党军可能经兴和或沿平绥路进攻，与东线之国民党军会师于柴沟堡地区，并估计在东线国民党军未攻下怀来之前，西线的国民党军不会轻易的东进。因此，决心在东线将主力配置在主要防御方向的怀来、延庆地区；在西线把部队置于张家口以西柴沟堡、阳高地区，准备迎击

国民党军的进攻，并组成野战军前线指挥部，以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为司令员、军区副政治委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

9月29日，国民党军在空军的掩护下，沿着平绥路向怀来西进，受到解放军的阻击，被歼灭一个团和一个营。国民党军从正面进攻怀来受阻，被迫转攻为守。这时，蒋介石派其参谋总长陈诚，亲自到南口，部署从侧面迂回怀来。4日，陈诚到达南口亲自布置新的进攻，将其主力一部由北平附近西调，企图经马刨泉、横岭迂回怀来，配合正面进攻。这时，解放军也迅速转移兵力，8日晚，在马刨泉设伏歼灭了国民党军第四十三师第一百二十七团，其主力窜回沙河。至此，解放军在10天的防御战中，歼灭了国民党军两个整团又一个营共1万余人，将国民党军阻止在怀来以东地区。

正当晋察冀军区集中主力在平绥东线与国民党军激战，张家口西北地区兵力空虚时，傅作义乘机以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二师伪装军主力，虚张声势向大同、阳高前进，并扬言向平绥路东南张家口进攻。实际上，傅作义以一部兵力向兴和佯攻，集中4个主力师及1个骑兵师、4个骑兵纵队共两万人，于10月7日，由集宁向张家口西北急进，先后占领张北和狼窝沟，由于解放军对傅作义部队的行动判断失误，寡不敌众，最终在11日，晋察冀边区和张家口市各机关相继撤出张家口，张家口失陷。

张家口保卫战，历时半个月，晋察冀军区部队在平绥东线和平汉路北段给了国民党军以有力打击，但是，由于没能在外围歼灭国民党军的主力，对傅作义部东进估计不足，特别是忽视了张北这个方向，使傅作义部乘虚而入，以致使张家口过早失守，给当时的形势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晋察冀、晋绥军区的解放军在4个多月的作战中，给了进攻的国民党军一定的杀伤，共歼灭其4.6万人。但是，未能达到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目的。晋察冀军区在以后的涞源会议上总结了胜利不足的经验教训。罗瑞卿指出："一个是远的，叫和平幻想，备战不足，和的工作做得太多了，备战工作太少了，复员过多直接影响到战争，练兵工作我们没有抓紧，军工建设也没有大力进行，当时张家口那样好的环境，我们连手榴弹迫击炮弹也没有多准备些，……""近的原因，主要是在军事指导上，初战没打好，因为当时有轻敌思想，对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思想，在战役指导上和战术指挥上均存在问题。"⑤

注释:

①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1946.7—1947.6),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②③聂荣臻:《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页,第630页。

④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7~488页。

⑤《罗瑞卿在涞源会议上的发言》,1947年版。

东北解放区的建设

抗日战争结束后，东北解放区一直处于“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状态，从1945年11月的山海关之战，一直到1946年的东北停战，国民党军占领了西起农安，东至吉林沿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后，战线拉长，兵力分散，暂时无力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而且“关内大打”已经开始，国民党军原拟赴东北的3个军不得不留置关内作战，同时，东北保安司令部又须抽兵进攻热河、冀东，因而已无力组织北进。国民党军决定先巩固其已占领的地区，整顿内部，等待援兵，以便继续发动新的进攻。东北民主联军经过连续作战也需要时间休整部队，加强根据地建设，以便尔后迎击国民党军新的进攻。经双方谈判商定，于6月7日分别发表了在东北停战15天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之后，东北的停战局面又继续维持了四个月，直至1946年10月底国民党军发动对南满解放区的大举进攻才告结束。

日本投降后，由八路军、新四军各一部及东北抗日义勇军组成的东北民主联军，在历时10个月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开创了东北解放区，但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东北联军从四平、长春这些大城市退出来以后，处境极为困难。除保持北满几个完整省份外，大部分地区为国民党军占领，而且南北满处于被分割的局面。解放区初创，土匪横行，群众尚未完全发动；来自关内各老解放区的部队经连续行军作战，伤亡消耗极大，亟需整顿补充；而且新扩充的军队人员，意志不坚定，急需要思想整顿。194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中，提出了“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斗争。但是在一九四六年一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①

1946年7月3日至11日，依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和中共中央对东北工作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了一年来创建根



据地和阻止国民党军进攻的经验，进一步明确了东北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并通过了《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即七七决议）。决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明确了当前的任务，确定以“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的斗争去取得和平”为总方针，抓紧暂时停战的有利时机动员东北全党全军大力建设根据地，整编整顿军队，加强“军事、剿匪、民运、土地、财经、后勤、兵工、交通、城市工作、文化和建党、建政等方面”的工作，号召和组织大批党员和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造成共产党员面向农村，深入农民的热潮”②。

根据“七七”决议的精神，东北全党全军全力展开了建设根据地和整编军队的新的斗争。

东北解放区为了贯彻中共中央东北局“七七”决议精神，发动群众，加强解放区建设，于1946年7月至9月，共抽调1.2万名干部组成下乡工作团。工作团下乡后，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斗争，并逐步转向减租、退租和平分土地工作。在斗争中，工作团采取的主要方针是，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适当地照顾富农，分化地主阶级，集中力量打击大汉奸、大地主、恶霸、匪首，摧毁农村中的封建堡垒和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没收其土地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使群众在政治上摆脱压迫，在经济上得到实际利益。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到1946年11月为止，已有2 600多万亩土地和大量牲畜、粮食、房屋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在解放自身的斗争中，广大翻身农民普遍地建立了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和12.3万余人的民兵、自卫队，改造和健全了村、屯政权组织，使农村政治面貌初步得到改观，封建势力受到了严重打击。

剿匪是这一时期东北的又一中心任务之一，也是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首要环节。国民党军占四平、长春，并向东、西、北三面扩展后，潜伏的土匪蜂起蠢动。在东北解放区内之土匪有3万多人。这些土匪虽然在人数上比1945年底已大大减少，但由于其与国民党军遥相呼应，密切配合，却是一股重要的反革命力量。这股土匪四处祸害人民，扰乱社会秩序，袭击东北民主联军地方部队，杀害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合江、牡丹江地区匪情更为严重，土匪疯狂破坏解放区建设，袭占解放区城市。据此，东北民主联军抽调大批主力部队协同地方武装大力开展剿匪斗争，并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肃清匪患，以便于迅速发动群众展开解放区的建设。各部遵照中共中央东北

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指示和部署，对土匪展开了大规模的进剿。4 月下旬至 8 月底，各剿匪部队重点展开了对大股土匪的清剿。至 8 月底，各地歼灭和击溃大股土匪近万人，残匪均化为小股或分散活动。在松花江地区，国民党军委派的新编第二十七七军军长姜鹏飞，秘密潜入北满解放区，活动于哈尔滨市、阿城、通河、延寿等地，组织日伪残余，勾结各地土匪，妄图于 8 月 28 日在哈尔滨市举行暴动。但被人民政府破获，粉碎了国民党军策动土匪从事破坏活动的阴谋，并使土匪失去了指挥中心。9 月至 12 月底，东北解放区各地残余土匪已不足 2 万人。但这些残匪的主要匪首接受了蒋介石的委任，并不断获得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的密令，仍在作垂死挣扎。8 月 29 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蒋军可能于十月向你地大举进攻，望利用九月加紧准备一切作战条件。"东北局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除在合江地区仍留第三百五十九旅负责肃清残匪外，剿匪任务交由地方武装担任，将主力集结，准备作战。为有利于作战，主力部队派往地方工作的，与作战关系密切的干部一律撤回。截至 1947 年 4 月上旬，共进行剿匪作战 1 300 余次，歼灭土匪 7.9 万余人，其中击毙土匪 3 000 余人，俘虏土匪 3.9 万余人，土匪投诚的有 1.1 万余人，匪患基本得到了肃清。

整编军队，建设新的兵种，也是这一时期东北全党全军的一项中心工作。为了加强对东北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于 1946 年 6 月 16 日决定：以林彪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陈云等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为了加强东北民主联军部队的建设，对军区机构进行了调整：撤销北满军区，其所辖之军区归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辖；成立西满军区，将嫩江、辽吉军区（1946 年 6 月由辽西军区改称）归西满军区领导，辽东（南满）军区辖第三、第四纵队及辽宁、辽南军区，另直属 3 个军分区；辽吉军区改为吉林军区。经过整编，东北民主联军组成野战军 5 个纵队另 3 个独立师、1 个旅共 12 万余人，地方军 3 个二级军区、10 个三级军区另一个内蒙古自卫军司令部约 20 余万人。全军经过整顿补充，总兵力达到了 36 万人。在整编部队的同时，还进一步加强了炮兵、工兵和骑兵等兵种建设，组建、扩建了铁道兵和各种学校，其中包括炮兵学校、航空学校、测绘学校等，以加强特种兵和技术干部的培养训练。此外，还从应付长期战争着眼，整顿和加强了军工生产建设。东北民主联军在整编中，重视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集中时间进行了土改政策的学



习，开展了诉苦坦白运动，清洗了坏分子，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进行了克服和平幻想、树立长期作战思想的教育。并且抓紧时间，进行了军事技术和战术训练。主力部队主要是加紧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四大技术和战术训练，尤其强调进行夜战、近战、白刃战的演练。地方兵团则以游击战术和爆破、射击等技术为重点进行训练。

国民党军占领了四平、长春后，为了争取时间巩固占领地区，等待增援，为下一步进攻创造条件，蒋介石不得不发布停战声明，中共也早已看穿蒋介石的“拖延”战术，在建设、巩固东北解放区的同时，对于蒋介石的进攻也做了相应的准备。8 月 29 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蒋军可能于 10 月向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望利用 9 月份加紧做好一切作战准备。

东北国民党军由于战线长，兵力不足，无力同时向南、北满发动进攻，因而采取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妄图首先控制南满，切断东北与华北的联系，然后全力进攻北满，以 8、9 月份侵占热河实现其占领整个 东北的目的。东北国民党军之后，即将进攻重点转向辽东、辽南地区。其作战方针是：在辽西方面，确实控制热河，截断华北解放军与东北解放军联系的辽西走廊，以保障其北宁路的安全。在辽南方面，准备将东北民主联军压迫在貔子窝、普兰店以南地区，然后用少数兵力在貔子窝、普兰店以南狭小地区构筑工事，封锁旅大与内陆之交通，以截断山东解放军与东北解放军的海上联系。在辽北、辽东方面，将东北民主联军压迫于长白山、松花江以北，然后沿长白山、松花江布防，妄图肃清南满东北民主联军后，再集中全力向北满进攻。

为实现上述方针，东北国民党军于 10 月 4 日开始，集中 8 个师的兵力对南满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在南满应敌的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辖有两个纵队、3 个独立师及地方武装共约 60 000 人。针对国民党军以较大兵力进攻安东的态势，南满军区决定，着重打击由兴京向通化等地前进之国民党军，并准备主动放弃安东。为此，以第三、第四纵队主力隐蔽集结于通化以西地区待机，并扬言转兵安东，诱使左路敌军进犯通化。

为了给国民党军以严重打击，延缓其行动，争取时间掩护后方机关转移与打开战局，南满军区首长决心集中纵队全部，在安（东）沈（阳）以东山势险要、群众条件好、有地方武装配合、便于隐蔽的新开岭地区，歼灭国民党军。10 月 30 日晚，国民党军进至新开岭至瑷阳边门的袋形谷地，民主联军于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集中两个纵队的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发

起了攻击，将敌压缩于河套内全部歼灭。此役，共歼敌8 000余人，开创了东北民主联军一次歼敌一个师的范例。延安《解放日报》日发表了《第二十五师的毁灭》的社论，指出：仅仅在10天以前，杜聿明侵占安东是如何得意忘形，他公开表示要在东北大打。然而曾几何时，这个号称蒋军嫡系精锐、全部美械装备的敌师却毁灭于人民军队之手，这对于好战分子，是何等痛心的损失啊！

战后，南满军区迅速上报了这次作战的主要经验。中共中央军委通报了新开岭战役的作战经验，指出："东北民主联军此次作战经验很好。(1) 以后作战凡打大一点的仗，总要集中10团成8团的兵力，最好能集中12个团以期必胜，战役上必须集中兵力；(2) 战术上亦须集中兵力，而后，作战每次均需采用此种方法"③。

东北民主联军自四平、长春撤退后的四个月内，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七七"决议精神，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了剿匪，参加了土地改革，创建了东北解放区，有了巩固的后方。同时，进行了军队的整编，加强了军队的全面建设，并进行了粉碎国民党军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10月，国民党军发动新的进攻，东北民主联军贯彻了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给了进犯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取得了新开岭战役的胜利，开创了在东北地区一次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个整师的先例，为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注释：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123页。

②陈云：《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第233页、第234页。

③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页。

全面进攻结束后的战争形势

1946 年 6 月 26 日，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发起了攻击，拉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随后，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向华东、晋冀鲁豫、晋绥、晋察冀等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这一时期，解放军主要处于战略防御阶段，但是也会在战斗战役中采取积极主动地进攻姿态，灵活运用战略战术。从 1946 年 6 月底到 10 月，这一时期被称为“全面进攻时期”。在这四个月中，双方共进行了大小战役、战斗 80 余次，国民党在这期间占领了解放区的城市 150 多座，包括承德、张家口、淮阴等这些大城市和战略要地。但是国民党被歼正规军折合 32 个旅，加上被歼的非正规军，共计损失 298 000 余人，打破了蒋介石要三个月消灭中共及其军队的野心。全面进攻结束后，国共双方的兵力也经历了强弱消长的变化，战争形势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

在头四个月作战中，国民党军的正规部队被歼约六分之一。为弥补其兵力的不足，并避免遭各个击破，国民党军主要采取了三种方法：一是采取更加谨慎的战法，经常集中几个旅在狭小正面齐头并进。这种战法虽有利于保存自己，但易造成其他地区空虚，给解放军更多的可乘之机。二是从大后方抽调守备部队，增强一线兵力。从内战全面爆发到全面进攻结束，国民党军统帅部先后从后方抽调了 5 个军（整编师）到前线。这就导致其后方空虚，更有利于民变运动及共产党领导下的国统区大后方游击战争的兴起和发展。三是扩大征兵，补充部队。这更加激起人民反对内战，逃役成风，其征兵计划也很难落实。据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报告，全面内战爆发后，原拟当年在全国征兵 70.2 万名，但至年底只征集到 40.8 万名。截止 1946 年 10 月，其陆军部队缺额达 58.3 万余人。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国民党军战略目标与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加深。正如毛泽东在《三个月总结》中所指出的：“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①

在四个月的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2个旅，其中包括一部分美械装备的旅，连同被歼灭的地方保安部队，总数达30万人。在被歼的这些部队中，起义、被俘的与毙伤的约各占一半。人民解放军共伤亡12万人，其中负伤的90 000多人。国民党军的损失是解放军的2.4倍。即使这样，国民党军总兵力仍然多于中共军队。但是，这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过去的四个月时间里，国民党军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的城市153座，守卫这些城市都需要大量的兵力。国民党军愈深入解放区腹地，战线就愈延长，守备任务也愈重，兵力就愈分散，攻击力量愈削减；同时，由于交通线的延长，补给也愈困难。到11月份，国民党军的战线已延长到约1万公里，用于守备的部队已接近其进攻总兵力的一半。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双方兵力对比在总体上，国民党军仍占较大优势；但在机动兵力上，它却正在逐渐丧失优势。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当时发表专论指出："无论哪一个军事学说，守备兵力必须大大地小于机动兵力，但蒋介石要卖国、独裁，就要压迫人民，就一定要加强守备兵力，其结果必然顾此失彼，这正是蒋介石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刘伯承还指出："固守一城一地无异自背包袱，……我们把这些包袱丢掉了，而蒋介石却拾起来背上了。他背得越多，他就越重，就越走不动。"[②]

与国民党机动部队减少的情况相反，解放军虽然在战争初期丢失了很多城市，但是这也使得解放军不用分散必要的兵力来守备这些地方，这就使得解放军相对的机动部队要多很多。而且在这期间，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军经过教育后，大部分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成为了人民解放军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人民解放军方面虽然也有被俘的，但为数很少，仅占总损失的3%左右，即约3 000人，最主要的是国民党根本就不敢将这些被俘的解放军放入自己的部队。除此之外，人民解放军损失的兵员中有80%属于负伤，其中80%经治愈后仍然回到了部队，而国民党方面则很少有伤愈归队的。这样，双方头四个月的损失就远远不是30万对20万。

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固然占有火力和机动力强的优势，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也不断暴露出种种新的矛盾：由于重武器和机械化装备对交通道路的依赖性大、要求高，当国民党军深入解放区腹地，在解放区军民的大规模破袭活动下，其行动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美械装备养成了国民党军对火力、工事和运输工具的严重依赖心理，以致不敢脱离工事进行野战、近战，不耐长途徒步行军；美械装备的熟练掌握，要求有较长时间的严格训练，在



老兵大量减员，新兵随补随打、无暇训练的情况下，作战的效能也就愈益下降；美械装备的零件损耗后，补给困难，报废严重；美械自动化武器的弹药消耗量大，国民党军在运输工具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增加士兵的负重量，每个士兵的负担达25公斤以上，影响了部队行军力和机动能力。战争的实践证明，装备的优劣对于作战的影响是相对的。

由于部队不断成建制地被歼，国民党军的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对于这场内战的前景开始悲观；甚至少数高级将领也开始动摇了对战争的信心。而且，在全面战争开始后，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对作战不力的军官的惩办直线上升。据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统计，1946年6月至12月，因作战不力等原因而受到免职、停职、记过以至撤职查办等各种处分的少将以上高级军官共达122人。国防部对1946年9月至12月全国军官惩罚情况的统计也表明，受处罚的人数是逐月上升的，12月份为9月份的11.5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民党部队的军心涣散和士气低落。

与国民党军相反，解放军在头四个月作战中不断壮大，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137万人。在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后，战线缩短，兵力逐步集中，机动作战的能力增强。在顿挫国民党军进攻锋芒、并成建制地歼灭其一些精锐部队之后，广大指战员对战胜美械装备国民党军的信心有了提高，并积累了大兵团打运动战、歼灭战的初步经验。不少部队以大批缴获补充自己，装备也有所改善。而且中共中央不断的对解放军进行思想教育，“不管中外反动派如何猖狂（这种猖獗是历史必然性，毫不足奇），我们是能够战胜他们的。各地领导同志，应当向党内一部分同志，即对于国内国际有利形势认识不足、因而对于斗争前途怀抱悲观情绪的人们，作充分的解释。必须明白，敌人还有力量，我们自己也还有弱点，斗争的性质依然是长期的，残酷的。但是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此项认识和信心，必须在全党巩固地建立起来。”③

这就是作战四个月后军事形势的基本状况，国共双方对于战争后变化的形势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蒋介石认为自己进行的是“现代战争”。只要控制了都市，控制了交通线，这场战争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所以要求他的部队“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在占领解放区105座城市并控制了解放区的绝大部分交通线后，蒋介石又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战略目的已接近实现。因此，他在10月10日便下达了恢复征兵制的命令。10月11

日，也就是占领张家口的当天，又宣布决心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出任"总统"。之后不久，又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下达了进攻延安的命令。

但是，一贯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因而特别重视打歼灭战的毛泽东却从上述基本形势中得出了与蒋介石完全相反的结论。

毛泽东在1946年10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三个月总结》中指出：三个月作战业已证明中央在全面内战爆发时作出的我们能够战胜蒋介石的论断是正确的，号召全党坚定必胜信念。同时指出："斗争的性质依然是长期的，残酷的。""今后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④]《解放日报》也发表社论对战局的变化作出如下分析："蒋军由战略攻势转为战略守势，解放区军民由战略守势转为战略反攻的重大转变时机，已经不远了。今后几个月，将是这个重大转变的关键"，"犹如爬山到了过山顶的时候，这是全程中最紧张的一段。"[⑤]"翻过山顶，夺取胜利"成为当时鼓舞全军的一个普遍的、深入人心的动员口号。

对于变化了的战争形势，国共双方也对作战计划做了重新部署：

国民党军统帅部认为，前期作战中，在华东、华中、华北、西北、东北诸战场都已取得重大进展，是其攻势卓有成效的阶段，但打通各交通干线的战略目标仍远未实现。因此，蒋介石于1946年12月30日向各战区发出《待天字第七十号密令》，提出："至明年（三十六年度）上半年各部队作战目标，应以打通陇海、津浦、同蒲、平汉与中东铁路诸线，肃清冀、鲁、晋、陕等地境内股匪，以恢复全国往来交通线"。这表明国民党军在战争初期迭遭沉重打击后，已经难以维持全面攻势，不得不对其战略计划作出局部的调整，准备有重点有步骤地各个击破各解放区。

国民党军在头四个月作战中消耗32个旅，经过整补、重建，加上从大后方抽调16个旅，到1946年11月，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计212个旅约174万人。部署于各主要战场的兵力为：用于进攻苏皖和山东解放区的66个旅；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37个旅；进攻晋察冀解放区的23个师（未整编）；进攻东北解放区20个师（未整编）。此外，以21个旅包围陕甘宁边区；21个旅包围和进攻晋绥解放区；另以部分兵力对付中原地区和海南岛的解放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的活动。置进攻重点于华东战场。

中共中央在总结战争初期的经验、并充分考虑各战略区指挥员的合理建



议的基础上，在战略指导上作出了重要的调整：1946 年 10 月 1 日作出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通过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适时实现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思想。这个指示中，他完全的肯定了四个月战争的成绩，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指明“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⑥

由上可见，中共中央分析战争初期形势变化而得出的结论是：“以打促和”的设想已不可能实现，仗必须打下去；通过大批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可以逐步实现国共双方的兵力平衡，甚至超过敌方以夺取最终的胜利；当兵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之后，解放军即可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对形势的这种正确分析，为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确立提供了依据。

国共双方依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分别调整了自己的作战方针和作战部署，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

注释：

①③④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67 年版，第 1149 页，第 1153 页，第 1153～1154 页，第 1150 页。

②刘伯承：《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版，第 359 页。

⑤《解放日报》社论，1946 年 11 月 4 日。

“打倒蒋介石”方针的确立

占领张家口后的一个月又4天，即11月15日，蒋介石置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于不顾，悍然召开了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准备通过这个大会制定一部集国家权力于“总统”一身的所谓“宪法”。同时，又秘密地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下达了偷袭延安的命令。

从蒋介石召开“国大”、偷袭延安这两件事情，充分表明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要把内战进行到底，不顾一切地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解放区，不顾一切地要在中国建立独裁统治的决心，通向国内和平的道路被完全堵塞。和谈的大门已被蒋介石彻底关闭，在中国人民面前，只剩下一条用战争的方法推翻蒋介石统治的道路可走了。同时，战争初期的实践也证明，人民解放军只要在长期战争中坚持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方法，不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就完全有把握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逐步做出以革命战争方式最后解决国内问题的抉择。11月15日，也就是“国民大会”召开的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在南京的周恩来：“除董（必武）及少数人留京外，周（恩来）及其余各人宜即回延。”接到这个指示之后，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并在答复记者提问时指出：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并表明：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国民党军队如果进攻延安，中共将被迫从边区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①]同时，周恩来又同马歇尔进行了会谈，说明由于“国大”的召开，国民党已经关上谈判的大门，中共代表团将不得不撤返延安，并表明：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一切，我们不会屈服。中国人民的人心向背是决定



一切的。11 月 17 日，周恩来又致函郭沫若、于立群："民主斗争艰难曲折……政协阵营已散，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办完这些事情后，11 月 19 日，周恩来、李维汉和邓颖超等飞返延安；3 月 5 日，留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维持联络的董必武及少数工作人员也被迫撤回延安。国共谈判渠道被完全堵塞。

11 月 18 日，"国民大会"召开后的第 3 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形势问题的指示，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群，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 35 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办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晓，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各地对于蒋介石开'国大'、打延安两点，应向党内外作充分说明，团结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为粉碎蒋介石进攻，建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②]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份指示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来代替前一时期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又第一次把"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同"建立民主的中国"连在一起，作为一个完整的目标提出，而没有提"恢复和平"。

11 月 21 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先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就新出现的形势和今后的方针问题交换了意见，接着又召开了有朱德、任弼时、彭德怀、陆定一、饶漱石等十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首先由周恩来报告了国共和谈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相关情况，他指出：谈判一年多，党的和平、民主、统一、独立的主张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蒋介石的独裁内战的野心在人民中暴露了，美国企图独霸中国的面貌也弄清了。一年来不仅证明我们能抵抗蒋介石的进攻，而且能胜利。现在，国民党召开了"国大"，势成骑虎，后方空虚。第三方面绝大多数不参加。我们的方针是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以武装斗争为根本。党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敌人是孤立的，共产党能够战胜蒋介石集团，用 3 年到 5 年，最长 15 年。接着，毛泽东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他是不允许共产党在保持一块地方的条件下签订城下之盟的。因此"我们的方针只能是打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毛泽东分析了战争形势，

指出：过去至今灭亡了国民党军的38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可能的，也是能够改变战局的。毛泽东为整个解放战争的大致进程勾画了一幅蓝图，他说："蒋介石的进攻是可以打破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我们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积蓄的力量在一年内打破，使国共两党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它。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发展。这大约需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当然我们也不能说那时就能消灭蒋介石，我们宁可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一些，最坏也无非是打十五年，打得我们连一个县城都没有了，这些我们也要有准备。"③毛泽东还就今后的方针问题说："现在是否可提出打倒蒋介石？我们做这个工作而不提这个口号，口号仍然是恢复一月十三日停战协定生效时的双方位置和实现政协决议。"最后，毛泽东说："我们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而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周密，不要疏忽。"④接着，刘少奇也指出：会开到这里，我们的方针是打。蒋要灭共，我必倒蒋。胜利是可能的，但有长期困难，要克服，不克服也没有其他办法。会议最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以"打倒蒋介石"来最终解决国内问题。从"自卫战争"到"解放战争"，由"制止内战，恢复国内和平"到"打倒蒋介石"，这是中共中央在战略决策上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为了推进革命形势，使之快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新的高潮，中共中央于1947年2月1日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认为解放区军事斗争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必将到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在近半个世纪中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这一次即将到来的是新的革命高潮，与前几次有所不同，是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同时，他还指出了这次革命高潮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⑤。为了可以快速的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开始更广泛的发动群众，不仅是解放区的，还要发动国统区的人民，使得蒋介石的后方也开始崩溃。要求全党同志必须重视这一点。指示明确提出，争取新的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的关键，是要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到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



以“打”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确定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人民解放区在过去几个月歼灭国民党军几十个旅的基础上，继续执行内线作战方针，歼灭更多的国民党军，以求改变战争形势，为而后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创造条件。因为前四个月的作战，证明了凡是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的，常能以较小的代价取得重大胜利；反之，脱离解放区深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特别是攻坚战），困难就大，代价就高，胜利的把握也小。前者如苏中战役、定陶战役；后者如大同战役。国民党军在几个主要战场均已将战线推进至解放区腹地。战局的演变，迫使解放军更加注重研究内线作战的战略战术。加上在战争初期，有些战略区首长也一再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歼敌的建议。如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在苏中战役发起前后，曾多次向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电陈充分利用苏中老解放区在人力、物力、地形上的优良条件，坚持内线歼敌之利，以及过早脱离解放区向敌占区进行远距离出击之弊。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在总结定陶战役经验时，也向中共中央建议以诱敌入解放区打为有利。这些情况和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视，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军委在战略指导上作出了重要的调整：1946 年 10 月 1 日作出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通过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适时实现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思想。这个指示指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并预见在歼灭敌军第三个 25 个旅后，“国共军力量对比，必起重大变化。”[⑥]特别强调今后不论在战役上还是战术上，都必须实行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指出只有彻底大胆地集中兵力，方能有效地和更多地达成歼敌目的。

由上可见，中共中央分析战争初期形势变化而得出的结论是：“以打促和”的设想已不可能实现，仗必须打下去；通过大批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可以逐步实现国共双方的兵力平衡，甚至超过敌方以夺取最终的胜利；当兵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之后，解放军即可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对形势的这种正确分析，为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确立提供了依据。

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从 1946 年 11 月份开始，在战线逐步向解放区的中心地区推移的情况下，以逐步扩大歼灭战的规模为指导思想，开始了全面内战爆发以后的第二个四个月的作战。在华东战场，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会合后，发动了宿北、鲁南战役和莱芜

战役；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发动了滑县战役、巨金鱼战役等；在晋察冀、晋绥解放区，在聂荣臻领导下的晋察冀军区部队发起了易满战役和保南战役；以及在东北战场发起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

最终在中共中央确定以“打倒蒋介石”为今后的指导方针后，以及在“逐步扩大歼灭战规模”战略思想的正确指挥下，使得人民解放军最终破除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粉碎了蒋介石快速灭亡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美梦。

注释：

①《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版，第 705 页。

②③④⑤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219 ~ 1220 页，第 198 页，第 199 页，第 220 页，第 1206 页。

1947 年的作战形势

经过 1946 年 6 月底至 1947 年 2 月初共八个月作战，战争形势起了重大变化，国共双方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毛泽东所说“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①

国民党军被解放军歼灭正规军 66 个旅（师）54 万余人，非正规军 17 万余人，共计 71 万余人，占领解放区城市 105 座。它每占 1 座城市，平均付出近 7 000 人的代价。1947 年春，国民党军经过补充，总兵力为 394 万人，比战争开始时的 430 万人下降了 9%。在现有的 200 多个旅中，被歼后重建的已超过 1/4。多数部队不满员，且新兵比重大。而且由于战线拉长，守备任务不断加重，能用于第一线的机动兵力也日益下降。在八个月的作战中，国民党军还损失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仅步枪就损失了约 25 万支。到 1947 年春，国民党军的武器装备补充已发生困难。除此之外，士兵在作战中也日益觉醒，不愿继续为国民党统治集团当炮灰，惧战、厌战情绪普遍发生，放下武器者日益增多；而且部分国民党高级将官腐化堕落，新的指挥官又没有指挥经验。这些都使得国民党军的战斗力明显的被削弱。蒋介石在 1947 年 5 月 15 日，对军官训练团所作的《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演讲中，对于这八个月来的作战也做了检讨：“我们在后方和交通要点上，不但要处处设防，而且每一处设防必须布置一团以上的兵力。我们的兵力就多被分散，我们的军队都成呆兵，而匪军却时时可以集中主力，采取主动，在我广阔正面积极活动，将我们各个击破。”结果是“（我们）占地愈多，则兵力愈分散，反而处处被匪军牵制，成为被动。”②

与国民党军的情况正好相反，解放军在过去八个月的作战中不断壮大，到 1947 年 3 月，全军总兵力已经发展到 168 万人，比 1946 年 7 月自卫战争爆发时的 127 万人增长了 32.2%。由于缴获了大量美式武器装备，因而部队的武器装备得到了较大的改善。炮兵建设初具规模。大军区和野战军均建

立了炮兵团或旅，华东野战军还组建了以炮兵为主的特种兵纵队。步兵纵队大多建立起炮兵营，有的纵队还建立了炮兵团。各战略区在野战军的旅以上部队中，先后组建了工兵连。这样，部队的火力和装备也得到了较大的加强。而且炮兵和工兵作为一个兵种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也逐步具备了打阵地战的实力。各部队进一步树立了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积累了打较大规模歼灭战的丰富经验，士气高涨。各野战军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并开展了以评指挥、评战术、评技术为基本内容的军事民主活动，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政治工作也有了新的发展，以诉苦为主要形式的阶级教育，以激发革命英雄主义为目的的杀敌立功运动，以加强各种战士之间的团结互助为目的的“王克勤运动”③，在各部队中广泛深入开展，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同时，解放区的战勤工作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建立和健全了各种战勤机构和制度，既能及时保障解放军作战，又能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利于长期支援战争。1947 年春天的军事形势，毛泽东在分析了国民党军和解放军的基本情况后指出：“目前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解放军如能于今后数月内，再歼灭国民党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连前共达一百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④

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施行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至 1947 年春，在卖国条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基础上，美国的帝国主义资本与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牢固地控制着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生活，民族工商业日趋破产。在美国的经济侵略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民族工商业受到了沉重打击，纷纷破产。全面内战爆发后，由于前线士兵数量减少严重，蒋介石政府无奈开始征兵。抓壮丁入伍，还时常征用大批农夫运送武器、弹药和粮食等弄得国统区的农民人心惶惶无心耕地，严重影响了农业的生产。而国民党政府繁重的苛捐杂税勒索，更加重了广大农民的经济负担，使他们降低了进行再生产的能力。这样，就使得国统区的农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除此之外，全面内战爆发后，军费开支庞大，财政赤字增加，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国民党治标不治本，主要是印发大量的钞票，一时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经济形势的恶化给国民党军武器装备及物资的供应增加了困难。

在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深入发展。由于各解放区坚决执行“五四指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有的地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至 1947 年 2



月春，有2/3的地方实行了耕者有其田。同时加强了军工生产，但是由于战争规模扩大，解放区的粮食供应也出现了困难，为了渡过难关，解放区实行了“精简节约”政策，使得情况稍有好转。

1947年春，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坚持卖国、内战和独裁的方针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以伟大的正义的爱国的学生运动为主的各阶层人民参加的群众运动迅速发展，人民群众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斗争，日益扩大和尖锐，发生了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和“五二〇运动”。第二条人民战线的形成，对国民党的统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国统区还发生了上海摊贩骚动和农民民变，国民党在进攻解放区兵力有限的同时，还要抽调一部分兵力来镇压国统区的人民运动，这就使得国民党的统治更加艰难。

经过土地改革、清匪反霸，解放区的政权得到巩固。“三三制”政策继续执行。在政权机关和社会事业中，除共产党人外，继续吸收广大党外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开明绅士等）参加工作。工、青、妇等群众组织进一步发展。在解放区内，除汉奸分子和反对人民利益而为人民所痛恨的反动分子外，一切公民不分阶级、男女、信仰，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在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后，人民私有财产权受到保护。因此解放区的后方很稳定，前线的战争也得到了后方的有力支持，尤其是在战争期间，解放区人民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支边运动，成为解放军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是八个月作战后国共双方的基本情况，这些军事、经济和政治三方面的比较，明显的表明国民党正在逐渐失去战略上的主动权，战争正在向着有利于解放军的方向发展。为了转变这种“被动”状况，自1947年3月起，蒋介石放弃了“全面进攻”的方针，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转取守势，抽调兵力加强到南线的山东战场，并立即开辟了新的陕北战场，以这两个战场为重点，继续加强其攻势，企图首先消灭这两个战场的解放军，或将他们驱赶到华北地区，然后再集中兵力最后解决华北、东北问题。同样是在对军官训练团所作的演讲中，蒋介石对于这一“重点进攻”的方针做了如下说明：“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地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对于为何选中山东和陕北解放区作为“重点进攻”的对象，蒋介石认为，“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处要冲，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军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军就容易肃清

了。”延安为中国共产党“发号施令的首脑部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占领”。至于“其他支战场，唯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⑤]

为了支持“重点进攻”，国民党在政治上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1947 年 1 月 30 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接着又限令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的人员于 3 月 5 日前全部撤退，并查封了重庆的《新华日报》，3 月 15 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在会上蒋介石宣布国共谈判正式破裂，决心作战到底，从而关闭了和谈的大门。与此同时，还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换取更多的美国援助，支持其庞大的军事开支。

依据上述方针，国民党统帅部决定集中 94 个旅的兵力用于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占其使用于对付解放区总兵力 219 个旅的 43%。同时又强使黄河在花园口合拢回归故道，并依托归故的黄河构成一道从风陵渡到济南的 1 000 公里“黄河防线”，以小部兵力驻守，企图以这条防线阻止晋冀鲁豫野战军向南出击支援山东、陕北地区解放军的作战。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国民党军所采取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战争形势，指出我党现在的任务是为了争取全国范围内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阶段的到来而斗争。指出“去年（指 1946 年）至今年（指 1947 年）1 月的七个月作战，以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五十六个旅。……蒋介石的攻势，在鲁南、鲁西、陕甘宁边区、平汉路北段和南满等地虽然还在进行，但是比较去年秋季已经衰弱得多了。”“蒋军兵力不敷分配，征兵不足规定数额，这同他的战线之广和兵员消耗之多，发生了严重的矛盾。蒋军士气日益下降。”“我军已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蒋军则开始失去了主动。预料今后数月内可能达到歼灭蒋军连同一百个旅的目的。”[⑥]

针对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为了促进革命高潮的早日到来，中共中央军委确定，全军继续在内线作战，执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同时，要求陕北、山东战场的解放军实行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抓住战机，逐批歼灭进犯之国民党军，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为而后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条件。要求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的解放军，依据各地的具体情况，举行战略性反攻，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逐步收复失地，以配合陕北、山东战场解放军的作战。1947 年 2 月 1 日，中共中央指出：“为了彻底粉碎蒋军的



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

这样，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区解放军开始了全面内战爆发以来的第3个四个月战争。

注释：

①④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155页，第1155页、第1156页，第1155页。

②⑤转引自《蒋总统集·演讲》，第1597页，第1598页、第1599页。

③王克勤，原系被抓丁入伍的国民党军士兵，1945年10月邯郸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补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当班长时，在全班率先开展“思想、技术、生活”三大互助活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陕甘宁边区的“三战三捷”

陕甘宁解放区，亦称陕北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老根据地。他东临黄河中流峡谷，西抵环江，南依渭北地区，北傍长城，包括陕西北部、甘肃和宁夏东部共20余县，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60万。首府延安，自抗日战争以来一直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也是全国解放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全面内战爆发一开始，这个地区就被国民党列为夺取的主要战略目标，只是碍于国内外的舆论，未敢贸然发起大规模进攻，只是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骚扰，先后占领了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地区和陇东地区，企图伺机对陕甘宁边区发起大规模进攻，占领延安。

从1946年7月到1947年2月，在这八个月的时间里，解放军以顽强的毅力抵制住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蒋介石的战略进攻开始逐渐走向“被动”，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蒋介石调整了作战方针，改变了“全面进攻”的方针，转为“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这时成为其重点进攻的目标之一。与此同时，在政治上，蒋介石开始驱赶中共和谈代表出国统区，在3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宣布，国共谈判完全破裂，正式关闭了和谈之门。开始公开的发起了对陕甘宁解放区的攻击。

陕甘宁边区，虽然人口稀少，土地贫瘠，物资匮乏，粮食供给尤其困难，但经过中国共产党十多年的经营，群众生活已有显著改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都很高。再加上这个地区属黄土高原，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回旋余地甚大，极有利于人民解放军轻装机动盘旋，打游击战和运动战，而不利于重装机械化的国民党军行动。

国民党军统帅部依据重点进攻的计划，于1947年2月底3月初先后调集了34个旅25万余人的兵力，准备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企图以其优势的兵力，一举消灭陕北解放军，夺取延安，以“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并准备在



占领陕甘宁解放区后，抽调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部加强其他战场的攻势。为达到这一为了迅速占领延安，捣毁“发号施令的首脑部”，1947 年 2 月 28 日，蒋介石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召到南京，具体研究了进攻延安的方案：集中 34 个旅约 25 万人的兵力，其中包括西安、潼关以北第一战区所属 20 个旅 17 万人，西北行营副主任马步芳、马鸿逵（通称“宁、青二马”）所属青海、宁夏军 12 个旅 6.9 万人，榆林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所部两个旅 1.2 万人。以第一战区部队为主，5 个旅担任守备任务，15 个旅 14 万人，由宜君、洛川、宜川之线向北担任主攻；以西北行辕副主任马鸿逵、马步芳部 10 个旅 5.4 万余人由宁夏、银川、甘肃之同心、镇原地区向东，晋陕绥边区总部主任邓宝珊所属之第二十二军 2 个旅共 1.2 万人由榆林向南助攻配合，夺取延安。为加强攻势，蒋介石还调集作战飞机 94 架，由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指挥，分别自郑州、太原、西安等地起飞，轰炸陕北，支援陆军作战。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进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边区军民早就认真地进行了战争准备。在军事上，积极动员边区人民参军参战，扩充主力兵团，加强民兵建设。至 1947 年 3 月，野战部队发展到 1.7 万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 1.6 万余人，另有 15 万普通自卫军和经过训练的 1.5 万名基干自卫军。部队还开展军事大练兵，在进行技术训练的基础上，着重进行了以战术为主的训练。除此之外，为了统一指挥，组成了陕甘宁集团军，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王世泰为副司令员，廖汉生为副政治委员，阎揆要为参谋长，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在物资上，征集细粮近百万石，在物资上对粮食、弹药等也做了必要的准备；在思想上对广大边区干部和解放军进行了“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这些准备工作为粉碎国民党的大规模进攻，保卫延安奠定了基础。

在陕北战场上应敌的西北人民解放军，有两个纵队共 6 个旅 2.6 万人，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这与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 25 万相差甚大，处于劣势。中央军委对此做了认真的分析，认为国民党军兵员充实、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并配有飞机、坦克，且经过长期反共教育与军事训练，有较强的战斗力，要战胜它将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这时的国民党军队士气已经日益沮丧；同时，西北地区国民党军派系复杂，矛盾重重，尤其是“青、宁二马”和邓宝珊部，为了保存实力，行动不甚积极。而陕甘宁边区经过中国共产党 10 余年的经营，广

大人民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支援战争的积极性很高。陕甘宁边区的解放军虽然数量不多，装备较差，弹药缺乏，但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良好的军事素质，在全国其他各战场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士气高涨。陕北高原的地形条件又有利于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因此，只要利用边区内各种有利条件，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必能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最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陕北人民解放军的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广大地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的困境，然后乘机集中优势兵力逐次歼灭深入高原地区之敌，以便钳制胡宗南军，从战略上配合其他战场人民解放军作战，并最终夺取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同时，还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等在陈赓的统一指挥下在晋西南发动攻势，在陕北的外线配合陕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

3 月 13 日，胡宗南部两个整编军开始北攻，扬言要在 3 天之内占领延安。为了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国民党军出动空军部队对延安及其以南解放区进行大肆轰炸扫射。16 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向西北人民解放军 发布了《保卫延安的命令》，规定了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延安以南的防御部署，要求担任防御的部队“利用地形组织短促火力，大量使用手榴弹、地雷杀伤敌人，掌握预备队，灵活反击夜袭歼灭敌小部”；“在防御战中疲劳与消耗敌人指挥，即可集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①]遵照毛泽东的命令，防御部队在彭德怀、习仲勋的指挥下，迅速调整部署，改进战术，白天以少量兵力固守要点，适时实施反冲击；发挥夜战特长，利用夜暗不断袭击国民党军，使其每日前进不及 5 公里。又经 3 日激战，给国民党军以重大杀伤，完成了掩护党政领导机关转移和群众疏散任务。由于国民党军的进攻猛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了主动撤离延安的决定。19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部机关和城区群众已基本撤离延安。3 月 21 日下午，在美军延安观察组撤离后 7 个小时，国民党军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延安保卫战，解放军以 500 余人的伤亡代价，歼国民党军 1 500 余人，沉重打击了胡宗南部的嚣张气焰，达成了预期的战役目的。

胡宗南于 3 月 19 日占领延安后，气焰十分嚣张。他认为人民解放军不堪一击，立即部署 5 个旅的兵力于 21 日向安塞方向追击，寻歼西北人民解放军，另以第三十一旅（前 91 团）由延安以东的拐峁向青化砭前进，担任侧掩护。彭德怀和习仲勋在得到这一情报后，迅速决定集中全部 6 个旅兵力



采取伏击手段歼灭敌31旅，并部署各纵队、旅于23日拂晓前进到青化砭两侧，利用山区地形隐蔽集结，做好准备，待命出击。25日10时许，第三十一旅进到青化砭、石绵羊沟，钻进了解放军所预设的口袋内，伏击部队立即拦头断尾、两侧出击，仅经过近两个小时，就全歼了第三十一旅旅部及1个团2 993人，俘其少将旅长、副旅长、参谋长，取得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个胜利，并创造了速决歼敌的典范。

与此同时，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到达了长县王家坪，与书记处其他书记会合，研究并最后决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留在陕北不走。29日，中共中央转移到清涧县枣林子沟，并在此召开了中央会议，正式决定中央分为两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并指挥各战略区部队的作战，另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工作。

青化砭一战，胡宗南得知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到延川、清涧一带，遂于3月25日令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主力共11个旅，分两路由延安、安塞经甘谷驿、青化砭迅速东进，企图集中强大兵力于延川、清涧地区与西北野战兵团决战，或将其赶过黄河以东。针对国民党的作战方法，彭德怀和习仲勋决心采取“耐心长期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寻找弱点”的方针，以主力隐蔽集结，休整待机，而“分散三、四个营兵力，以一连至两连为一股，派得力指挥员在敌前左右后四面袭扰，断敌交通，将敌疲困，使敌不能不分散部分守备交通”，[②]以利于而后歼击。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除了主力集结休整外，西北解放军组成了若干股小部队广泛袭扰国民党军。4月11日，获悉国民党军第一百三十五旅准备沿青化砭大道南下的情报后，彭、习迅速做出伏击国民党军于羊马河地区，14日，国民党军第一百三十五旅进入伏击圈，经过6个小时激战，大获全胜。在撤离延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以极小的代价先后取得了青化砭和羊马河两个伏击战的胜利，受到了中央军委的高度赞扬。同一天，毛泽东在致西北解放军的电报中，指出：“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方法，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③]

羊马河战斗后，4月26日，胡宗南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组织了9个半旅的兵力由蟠龙、永坪北上，企图将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压缩到佳县、吴堡狭窄地带加以围歼。彭德怀和习仲勋决定以一小部分兵力诱敌加速北上，然

后集中主力围歼胡宗南部补给基地蟠龙镇的守军。4 月 30 日，西北解放军完成了对蟠龙镇守军的军事包围。彭德怀亲自率领旅以上的干部进行地形勘测，制定作战计划。5 月 2 日，各攻击部队向蟠龙地区守军发起攻坚战，经过 3 天激战，至 4 日晚全歼守军 6 700 余人，并缴获了大批器材装备和粮食弹药，使得我军得到了补充。

西北野战兵团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的胜利，是与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在粮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边区的人民群众克服各种困难，保证部队的粮食供应，组织了 4601 副随军担架和大量民工抢救伤员及运送粮食等物资；为部队介绍地形情况，带路，侦察敌情，封锁消息，保守秘密；民兵配合地方部队积极袭扰迷惑国民党军。由于人民群众积极支援，使西北野战兵团有饭吃，行动隐蔽，地形熟悉，情报准确，完全处于主动地位；使胡宗南部常常饿饭，情报失灵，行动盲目，到处扑空，被动挨打。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 3 次作战均获胜利，被解放区军民称誉为陕北“三战三捷”，它共歼国民党军 1.4 万余人，给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粉碎了其企图消灭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首脑机关及西北野战兵团的狂妄计划，稳定了陕北战局，为彻底粉碎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进一步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志和胜利信心。

5 月 14 日，边区军民在安塞真武洞召开庆功祝捷大会，庆祝“三战三捷”的伟大胜利。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到会祝贺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代表中共中央祝贺你们，我代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蒋介石、胡宗南梦想赶走中共中央，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征服边区人民，但是一件也没能做到。他分析了全国各战场的大好形势后，进一步号召边区军民团结一致，下定决心，坚持斗争，彻底消灭胡宗南部，早日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这次大会，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必胜的信心。

注释：

①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4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0 页。

②彭德怀、习仲勋 1947 年 4 月 2 日致中央军委电。

③毛泽东：《毛泽东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7 年版，第 1166 ~1167 页。

孟良崮战役

经过八个月的作战，至1947年春，华东解放区的军民共歼灭国民党军25.4万人，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山东解放区除鲁南地区的临沂被国民党军占领外，渤海、鲁中、胶东、滨海地区已连成一片，土地面积约为12.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2 600万，基本上恢复到了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时的规模。

1947年春，华东地区解放军的实力得到增强。总兵力由1946年7月57万余人增至64万余人，增长了12%。其中，野战军由13万余人增至27万余人，增加了1倍。武器装备也得到了改善。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1946年底至1947年春，山东解放区的土改和农业、纺织手工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华东野战军实力的增强、山东解放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及支前工作的新发展，为华东野战军挫败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奠定了基础。

莱芜战役之后，国民党军积极准备对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国民党军于1947年3月初撤消了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进驻徐州，组织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统一指挥原郑州、徐州两绥署部队，同时又将原在晋冀鲁豫战场的王敬久兵团（整编第二十六军）东调山东战场，连同原来在山东战场的部队编组成第一、第二、第三共3个兵团另两个绥靖区，总兵力已达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占其进攻全国各解放区总兵力的27%，占其重点进攻兵力的64%。其中包括精锐主力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第七十四师以及桂系第七、第四十八军。

国民党军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战略步骤是：第一步，以一部兵力打通津浦路徐州至济南段和兖州至临沂公路，完全占领鲁南解放区。第二步，将主力推进到泰安、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之线，迫使华东野战军在鲁中山区与其决战，或压迫华东野战军北渡黄河，以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其具体部署：以第二兵团司令官王敬久指挥第五军及整编3个师集结在汶上、宁阳

地区，在第二绥区部队策应下，首先打通津浦路济南、兖州段，而后向莱芜、新泰方向进攻；以第三兵团司令官欧震指挥第七军及整编5个师集结在兖州、滕县地区，在第一兵团、第三绥靖区协同下，首先打通临沂至兖州公路，占领鲁南解放区，然后向新泰、蒙阴进攻；以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指挥整编6个师集结在东海、新安镇、郯城、李家庄、临沂、阿湖地区，先以一部配合第三兵团打通临沂至兖州公路，而后以主力向蒙阴进攻；以第二绥区司令长官王耀武指挥4个军及被歼后重建的第七十三军，除配合以上行动外，分别集中在徐州外围及青岛、潍县、济南各要点担任防御。

3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全国战局的发展和华东战场的情况，对华东野战军的作战方针作出了指示，指出："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由于中原军区部队已胜利转入外线，"中央原令你们提早转入外线援助五师之计划，现可改变，大约本年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我华东军在今后十个月内，以平均每月歼敌四个至五个旅，付出伤亡六千至七千人计算，共须歼敌四十至五十个旅，付出伤亡六万至七万人之多（明年的尚未计算在内）。你们须从长期作战的思想出发，并使广大干部建立此种思想，随时随地节省人力物力，方能战胜蒋介石，解决中国历史任务。""对敌津浦集团北进不要阻止，让其进至泰安一线，于我最为有利"。并强调：而后作战必须"经常集中六十个团行动。"[①]指示还要求华东野战军全军在3月份彻底休整，以利而后作战。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华东野战军作战方针的指示，华东野战军在陈毅领导下，研究确定了具体的作战方针，即"仍然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敌军重点进攻之始，采取持重待机的方针，即以积极主动的作战行动吸引、调动、疲惫、迷惑敌人，审慎地观察战场形势的细微变化，分析掌握敌人的行动规律，能动地创造和捕捉有利的战机，条件具备了就坚决歼灭之；条件不具备，就改变和放弃原定计划，绝不轻躁作战。"[②]

为做好迎击国民党军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华东野战军前委决定全军转入休整，并于3月中旬在淄川以东的大矿地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总结莱芜战役的经验，讨论怎样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歼灭国民党军的任务。经过大矿地会议和一个月整训，华东全军广大指战员的全局观念和必胜信心大为增强；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有了提高；在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要求；军政军民团结进一步增



强；部队战术、技术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从而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为迎击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做了较充分的准备。

3月下旬，国民党军发起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至4月上旬，打通了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占领了鲁南山区，打通了临沂至兖州公路，基本实现了其第一步战略目标。华东野战军在3月份休整后，4月初全军开始自胶济路南下，至5月上旬连续进行了泰安战役、临（沂）蒙（阴）路反击战等战役，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二师等部共2.8万余人，俘中将师长杨文泉。但由于国民党军不增援、不分兵，发现情况迅速收缩集结，因而几次战役决心均未能实现。

针对上述情况，中央军委多次指示陈、粟、谭等华东野战军领导人：对于密集进攻之敌，可实行诱敌深入，胶济路以南广大地区均可开辟为机动作战的战场；要有最大耐心，要掌握最大兵力在手。指出“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在局势未定之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③

依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野战军领导人总结了前段作战经验，决定将野战军主力后撤一步，集结在蒙阴东北机动位置隐蔽待机，并准备以攻取潍县为手段，诱使国民党军大胆北援，歼灭援军。

华东解放军在1个多月中的往来机动歼敌，接着又后撤待机的行动，使得蒋介石、顾祝同认为华东野战军已经疲惫，正向沂水、临朐、博山方向退却。顾祝同遂命令第一兵团主力兵进占坦埠、沂水之线；第二兵团集结在新泰、蒙阴地区，团主力向博山、张店方向进攻；第三兵团得手后，再向东进攻，以实现其在鲁中山区或在胶东地区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的企图。根据这个命令，国民党军3个兵团于11日开始行动，其中由汤恩伯指挥的第一兵团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左右邻的配合下行动尤为积极，于11日自青驼寺、垛庄北攻，准备通过蒙山抢占坦埠。

针对国民党军全线推进的情况，华东野战军决心转移兵力首先囚歼国民党军最右翼的第七、第四十八军于沂水以南地区。这时，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完全查明了国民党军第一兵团的行动计划，并获悉国民党军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等各以一部自莱芜、新泰东犯，判断国民党军已全线发起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华东野战军首长经全面考虑，认为求歼整编第七十四师更为有利，乃毅然改变决心，立即命令正在向东运动之各部重返原地集结，准备在蒙阴以东、坦埠以南地区歼灭整编第七十四师。并于5月12日发出了歼灭

第七十四师的作战命令，以 5 个纵队担任围攻任务，以 4 个纵队担任阻援任务。其具体部署：以第一、第八纵队分别自整编第七十四师与其左右友邻的接合部楔入，攻占黄斗顶山、天马山、界牌和依汶庄、磊石山、万泉山，割裂整编第七十四师与其左右邻的联系，并会同由鲁南兼程北上的第六纵队抢占垛庄、芦山，断整编第七十四师退路，合围整编第七十四师；以第四、第九纵队从正面出击，5 个纵队协同围歼整编第七十四师。

12 日，整编第七十四师通过孟良崮山区北上，13 日与正面抗击的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激战于坦埠以南一线山地。是日，黄昏至 14 日上午，担任楔入第七十四师两侧的两个纵队，完成了割裂第七十四师与其左右友邻的联系，这时，第七十四师才恍然大悟，迅速后缩，但为时已晚。14 日下午及晚上，各主攻纵队继续对第七十四师进行压缩攻击，至 15 日拂晓，将整编第七十四师紧紧包围于孟良崮及其以北山区。

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华东野战军合围后，蒋介石等认为该师战斗力强，又占据着易守难攻的有利制高点，附近还有强大的增援兵力，是同华东野战军决战的好机会，于是一面命令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坚决固守阵地，以吸住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面急令援军向第七十四师靠拢，企图以 11 个整编师（军）内外夹击，歼灭华东野战军主力，解整编第七十四师之围。华东野战军前委鉴于国民党军已调动了庞大兵力向孟良崮增援，近者不足 10 公里，远者亦仅 1、2 日行程，战场形势十分严峻。遂即令各阻援部队准备打击强大的国民党援军，同时令各主攻部队对被围之整编第七十四师加速猛攻，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在各路国民党援军赶到前，彻底歼灭整编第七十四师。于是一场孟良崮攻坚战开始了，经过激战至 16 日上午 5 时许，整编第七十四师及整编第八十三师 1 个团共 3.2 万余人全部被歼，中将师长张灵甫被击毙，副师长及几个旅长均被生俘，解放军伤亡亦达 1.2 万人，战况之激烈为解放战争开始以来所未见。

山东解放区的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华东野战军进行孟良崮战役。战役期间，从渤海地区向鲁中地区调运粮食 1 500 万公斤，鲁南各地向鲁中地区调运粮食 2 000 万公斤。战斗在兵工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和工人，加班加点，昼夜不停地生产武器、弹药。战区所在地的人民政府积极组织群众修路、架桥。沂南县组织临（沂）蒙（阴）公路两侧地区群众 3 天内抢修公路 100 公里、桥梁 40 多座。在孟良崮战役打响的第 2 天，一座通往战区的木桥被国民党军飞机炸毁。为保证军用物资的前送和伤员的后运，群众纷纷跳入水



中，肩扛桥板，架起了一座“人桥”。临时民工组成的庞大民工队伍，在国民党军飞机、炮火的威胁下，日夜不停地抢运伤员，源源不断地运送弹药、粮食，为战役的胜利提供了保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孟良崮战役，重挫了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极大地震惊了国民党军内部，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停止对鲁中地区的进攻，将前方一些主要将领召到庐山总结教训。蒋介石向受训的将领哀叹：“第七十四师被歼，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④当时，新华社在《祝蒙阴大捷》的评论中指出：它有力地策应了陕北和其他战场解放军的作战行动。它“在华东解放军的历史上更有特殊意义。因为：第一，这是打击了蒋介石今天最强大的和几乎唯一的进攻方向；第二，这是打击了蒋介石的最精锐部队（四、五个精锐师之一个）；第三，这个打击出现于全解放区全面反攻的前夜。和这个胜利的同时，东北、豫北、晋南、正太等地，强大的反攻正在展开。”⑤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华东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

在这段时间里，华东野战军首长根据敌情和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在作战指导上坚持的主要原则是：以极大的耐心持重待机，高度集中兵力和分批歼敌；经常控制自己的主力于机动位置上，以便在高度回旋机动中及时抓住战机立即投入战斗；翼侧之敌好打就打翼侧，战线中央的敌人突出，并有条件予以歼灭，亦可从敌中间挖出一部来加以歼灭。这些，对于夺取泰蒙战役、孟良崮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国民党军也总结了战役失败的主要教训。蒋介石认为，整编74师在孟良崮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术修养不高，选错了地形。

1947年3月至5月，华东野战军以1.5万人伤亡的代价，换来了歼灭国民党军5.4万人的胜利。双方伤亡比例为1：3.6。华东人民解放军以其顽强的毅力和正确的战略战术打破了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使得战争向着有利于解放军的方面更迈进一步。

注释：

①③毛泽东：《毛泽东军事选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第2页，第58页。

②《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84页、第485页。

④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军官训练团第2期全体学员的讲话，1947年5月19日。

⑤新华社：《祝蒙阴大捷》，1947年5月20日。

参考文献：

［1］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3］《解放日报》。

［4］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

［5］台湾"国防研究院"编，《蒋总统集》第2册。

［6］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8］黄友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

［9］《中原突围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10］《苏中七战七捷》编写组编，《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12］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如皋海安战斗》，《国民党军资料选编》第1册。

［13］《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14］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1946.7—1947.6），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5］《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16］《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1年版。

［17］《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0］秦基伟：《刘伯承指挥艺术》，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21］《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22］中共吉林省党委工作委员会编，《四保临江》，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出版，1987年版。

［23］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24］《莱芜战役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5］《孟良崮战役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6］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27］第二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28］童小鹏等编：《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

［29］《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30］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

［31］沙英：《中国四大家族的危机》，光华书店，1948年版。

《五四指示》的颁布与执行

随着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农民对于解放土地问题的要求日益迫切。1946 年春，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等各解放区，都有极广大的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了土地，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或正在解决土地问题。群众性的反封建斗争，已经发展到要求用革命手段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阶段了。

1946 年 3 月，中共中央听取了黎玉、邓子恢、薄一波等各地领导干部关于农民斗争情况和各阶层反映的报告。4 月，对解放区的农民土地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毛泽东回顾了历史的教训，他认为，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必须有坚定明确的态度。中共中央指出："由于广大群众的行动推平了土地（即平均分配）的地方，不要去批评农民的平均主义，相反农民这种彻底消灭了封建势力的行动应该批准；但无止境的推平，不照顾应当照顾的各色人等的推平，就要不得；群众未提出推平的地方照群众所提方法办理，也不要推平。"中共中央认为，当时内战尚未全面爆发，过早地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解放区以外的民主人士难以理解和同情。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是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基础，是符合全国人民（包括民主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但是在战争未全面爆发之前，一部分民主人士会忧虑猛烈的农民运动震撼眼前的安宁。如何才能既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又照顾到广大民主人士的情绪呢？中共中央认真地分析了民主资产阶级和民主人士的态度，权衡的结果是：不要怕自由资产阶级和中间分子的暂时动摇，只有我们坚决实行土地改革，使农民得到土地，我们的力量更加巩固强大时，才更可能争取团结他们；但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及中间派应作正确而有力的解释，即我们主张减租和实现耕者有其田，都是实行政协协议，其取得土地的方式是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不相同的。同时，中共中央在讨论中明确指出：工商业政策和工人运动必须与土地政策、农民运动有所区别，切忌把工人的工



资及其他劳动条件定得过高。现在应该是劳资合作，使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要做到劳资两利。经过反复研究后，由刘少奇综合大家的意见，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此后又根据各地领导农民运动的干部的意见，作了几次修改。1946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将它作为党内文件发至各解放区贯彻执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四指示》。

《五四指示》的基本内容，是要“有坚定的方针”，并据此“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使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依据群众运动发展的规模和程度，迅速求其实现”。“解决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和“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规定：对地主的土地，除了对大汉奸的无条件没收外，其他土地则沿用减租减息以来农民所创造的多种方式来解决。要“吸收中农参加（土地）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绝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中农土地被侵犯者应退还或赔偿。对于富农，则采取“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不能不有所侵犯的时候，亦不要打击的太重”；“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对富农应着重减租和保存其自耕部分”。而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予相当照顾，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和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但是对于抗日军人、干部家属“属于豪绅地主成分者”，对于与中共“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绅士及其他人等”，在土改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一般应采取调解和仲裁方式，使其交出土地，同时“应教育农民”给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对于顽固的汉奸、豪绅和恶霸作坚决斗争，“使他们完全孤立，并拿出土地来”，但应给他们留下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土地。

除此之外，还提到了对于工商业资产阶级“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的矿山、工厂、商店应当没收外，凡富农及地主所设的商店、作坊、工厂、矿山，不要侵犯，应予以保护，以免影响工商业的发展。不可用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阶级的办法”，“有些地方将农村中清算封建地主的办法，错误的运用到城市来”应立即停止。“除对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及人民公敌，为当地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处死，应当赞成群众”，一般的应当实行宽大政策，不要杀人或打死人，也不要多捉人，以减少反动方面的借口，不使群众陷于孤立。同时要求争取团结知识分子，“给以学习与工作机会”；对赞成民主纲领的开明绅士、城市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均应当继续和他们合作，一个也不要抛弃”；对逃亡地主“应让其回家并给以生活出路”。

该指示还提出要迅速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务必在 1946 年年底以前全部或大部获得解决，而且在执行“五四指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完全

执行群众路线，真正发动群众，绝对反对反群众的命令主义。对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以及在运动中所获得的果实的分配问题都做了相应的规定。要求各地要根据本指示防止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发生“左”的、“右”的偏向，对此要加以教育和纠正。

《五四指示》的颁布，标志着解放区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开始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削弱封建剥削向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的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的重要转变。

由于《五四指示》及时地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要求，尽管当时出于策略考虑，没有在报纸上公开宣传，消息仍然迅速传遍了各解放区。其后，各解放区迅速采取了多种形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大多采用清算（计算地主的剥削量）、地主献田（自动交出土地）和征购（公开征购地主土地）等办法。由于国民党军的进攻，有的地区“前方打仗，后方分田”，“白天打仗，夜晚分田”，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

在大部分解放区，对于汉奸和恶霸地主以外的一般地主的土地，主要是通过清算的方式，将土地收归农民所有的，即利用清算租息，清算额外剥削，清算无偿劳役，清算转嫁负担、霸占吞蚀和人权侮辱等种种方式，使地主的土地在偿还积债、交纳罚款、退还霸占、赔偿损失等名义下，转移、折算或出卖到农民的手里。具体的作法是发动农民同地主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一条一条地摆出地主剥削农民的事实，使地主自己低头认罪，不得不拿出土地，而使农民处于有理合法的位置上，理直气壮的收回土地。清算的一般过程为培训干部、发动群众、诉苦清算和分配果实。经过清算斗争，各解放区从地主手中获得了许多土地。据冀中地区 21 个县、市，2 889 个村庄的统计、经过清算斗争，农民获得土地 827 953 亩，山东解放区，将地主经济剥削和各种压迫奴役，折合成农民经济损失要求地主以土地财产偿还。晋冀鲁豫解放区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时，许多村庄已开始没收地主土地。“五四”指示下达后，这些地方在清算的名义下对地主土地普遍没收。据太行区十个县 1947 年 3 月统计，出租地主和经营地主的土地都减少了 38% 以人，富农土地减少了 50% 左右。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从没收分配日伪土地入手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种方式主要是运用在东北解放区。1946 年 7 月 7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了关于动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指示中，强调共产党员的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号召他们下到农村同农民一起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但



是这时东北城乡之间土匪猖獗，大部分土匪头子还都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状，成为“山大王”。他们与地主恶霸勾结，破坏人民的土改。为此各地工作组集中力量，组织农民翻身队、武装队开始了打击土匪的行动。接着，大张旗鼓地没收分配了日伪土地，从封建恶霸地主入手，分配恶霸地主的土地。1946 年 7、8 月间，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进入高潮，各地层层召开了由区到县的农民代表会，将运动进一步扩大，截至这一年的 10 月，东北 500 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已获得 2 600 万亩土地。

献田又是一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式，但是这是在解放区解决土地问题的一种辅助方式。采用这种方式的多是中共党员干部出身于地主家庭的人，劝说其家庭自动交出土地；也有一些开明绅士献出土地；此外，部分中小地主出于大势所趋也自动献出部分土地。到 1946 年 8 月，各解放区开明绅士等献地共 33 200 余亩。但是由于中共认为献田政策不能带动农民的积极性，最终 1946 年 10 月以后，各地土地改革基本上废除了献田方式。

经过“五四”指示的贯彻，从 1946 年 5 月至 1947 年 2 月；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都取得重要成绩，各区都有约三分之二的地方执行了中央的《五四指示》，不同程度地破坏或废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同时由于战争环境、时间紧等因素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地区没有进行土改。但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土改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晋冀鲁豫解放区，1946 年 10 月，即有 2 000 万农民获得土地。其中太行区的中心地区，地主的土地减少了 84%—91%，经营地主的土地减少了 67%—82%，整个地主阶级的土地平均减少了 80% 以上，富农土地减少了 40% 以上。

在晋察冀解放区的冀中地区，到 1946 年底全冀中除过去日伪直接统治的村庄外，能够实行土地改革的村庄有 8 567 个（约有人口 600 万至 650 万），完成土改的有 7 015 个占总数的 83%，其中彻底完成的有 4 664 个，占 49. 77%，不彻底的 2 838 个，占 33. 34%，尚未发动的有 1 465 个，占 17%。在华中（苏皖）解放区，至 1946 年 11 月，有 1 500 万农民获得土地。据其中一、六、九分区 1946 年 9 月统计，在解放区所辖的 2 263 个乡中，有 1735 个进行了土地改革，占 76. 7%。除此之外，东北解放区、陕甘宁、晋绥、山东解放区，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大部分农民都从中获得了土地。

上述情况．说明贯彻“五四指示”取得了巨大成绩。1946 年 10 月 1

日、中共中央的指示中说："三个月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或布置太晚，或机械地分为几个阶段，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①]1947 年 2 月 1 日指示中说；"各区都有约三分之二的地方执行了中央 1946 年 5 月 4 日的指示。解决了土地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②]各解放区的党领导对于《五四指示》的认真执行，使得解放区的大部分农民都获得了土地，这些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都踊跃参军增加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同时这一运动也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使自卫战争成为更具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战争，使战争的胜利获得更加可靠的保障。

注释：

①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7 年版，第 1152 页，第 1159 页。



战争初期解放区的各项情况和建设

在全面内战的第一年里，人民解放军所以能够以劣势装备战胜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除了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和广大指导员的浴血奋战外，还依赖于战争环境中各解放区的建设。各解放区有力地组织和依靠了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他们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对前线给以有力地支援。解放战争成为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人民战争。

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区还是面临着一些困难。前期根据中共中央《五四指示》进行的土地改革尚处于发动阶段，广大农村的封建势力仍然存在，解放区还不是很巩固，经济发展也有待进一步的提高，此时的解放区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还不是很充分。尤其是一些新解放区，人民政权刚刚建立，群众基础不好，尤其是在东北地区，土匪、豪绅恶霸到处横行，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严重的影响了东北解放区的建立和发展。如果不及时处理这些问题，解放区将难以长期坚持抵抗国民党的进攻。为此，1946 年 7 月 20 日，毛泽东在对党内的指示中，表明："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必须努力生产，使一切必需品，首先是粮食和布匹，完全自给。必须提倡普遍植棉，家家纺纱，村村织布。"他强调，"总之，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①最重要的是要求解放军在努力发展解放区经济的同时，不得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要军民兼顾。

根据中央的指示，各解放区在积极做好作战部署的同时，也大力加强了各解放区的建设。这时，解放区建设的内容主要有政权建设、生产工作和民兵建设。

所有新解放区，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都迅速建立了人民政权，并依靠在斗争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建立了工会、农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如 1945 年 12 月 28 日，中共中央在发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指示中，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

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在一九四六年一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②]中共中央东北局据此调整了东北解放区东北局的领导机构，而且通过了“七七决议”，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东北局号召领导干部要走出城市，下到农村与广大农民在一起，深入了解农民，加深与农民的关系。同时，从1946年底，东北全区开展了以“煮夹生饭”为中心的群众斗争，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复查工作的同时，也抽出地方武装进行了剿匪斗争，全力肃清农村的残余反动势力；培养、选拔积极分子，纯洁基层组织。一些老解放区，进一步加强了基层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的建设，调整干部配备，健全领导机构。陕甘宁解放区对边区、县、乡三级政权，在坚持“三三制”原则下，再次进行民主选举，根据广大群众的意愿，选出群众信赖的新领导干部。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使解放区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同时，由于战争消耗急剧增加，解放区军民面临着严重的物质困难。为了适应战争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再发出指示，要求解放区军民立足自力更生，努力发展生产。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三个月总结》中指出：“必须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和整理财政，遵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等项原则，坚决地实施之。”[③]1947年春，新华社发表评论，要求各解放区要高度重视春耕，领导需亲自指导，与农民一起抓紧时间抢耕；并且指示各解放区在短暂的休整时间内一定要抽出一部分兵力，轮流帮助农民生产和劳作。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各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部署了军民生产任务，规定了生产指标。各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各部队，积极帮助广大农民群众开展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据统计，1947年，在军民共同努力下，东北解放区不但耕种了全部农田，还恢复和扩大耕地80万垧，比原有耕地增加80%。除此之外，华东解放区、晋察冀解放区等都进行了生产运动，并努力发展农副业，使得解放区的经济在这一时期有很大的发展。

除了农业方面的建设，解放区的工业、交通等方面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区有些较大的工厂、矿山遭受战争破坏，难以大



规模发展。华东等地提出了着重保护机器，开展小规模生产的方针。凡能购得小型机器，如纺织、丝织、罐头、打油、毛织、水利、造纸、水产、淘金、冶金等机器的，均筹设小型工厂，或私营、或公营、或公私合营，利用解放区原料进行生产。1946 年 7—8 月间，东北战局较为稳定，各生产机关在佳木斯、鸡西、图们、牡丹江、哈尔滨、西满等地积极恢复和发展工矿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各战略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还组织解放区军民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以维护和发展解放区经济，支持解放军作战。各战略区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有计划地修复公路、铁路和桥梁，加紧生产大小车辆、船只等交通工具，以增强解放区的交通运输力量。东北铁路的修复，以及山东解放区海运业的大力发展，加强了关内与关外的联系，同时也可以保证战时物资的流动和及时供应，这对于我军的配合作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扩大商业贸易，是保证军需民用，促进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来源的又一重要途径。各战略区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1947 年初，晋冀鲁豫解放区投入资金 60 亿元发展贸易，税收总额达 2 亿元，按当时物价资金折成实物，可买麦子 3 350 万公斤，可买布 1 300 万米，能做军装 200 万套。华中解放区于 1946 年 7 月起，建立了“华中贸易公司”，统一经营公营商业。不仅如此，东北解放区还和苏联发展了对外贸易。这些对发展战时经济，支持长期战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解放区军民的生产和各项经济建设活动，奠定了支持长期战争的物质基础，是提高解放军生活保障能力的根本保证。同时，解放军在战争环境中，在不妨碍作战的前提下，坚持开展力所能及的生产活动，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密切了军地、军民关系，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

在增加生产的同时，解放区军民还采取各种措施，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集中一切力量，保障前线供给。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发出许多重要指示。中央军委 1946 年 12 月 27 日发出的指示中指出：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爱惜人力物力、防止浪费。要在全军进行教育，切实纠正浪费现象，加强管理。1947 年 1 月 1 日，朱德在元旦广播词中，指出：“为了解决自卫战争中的财政供应问题，必须一面发展生产，一面大力整理财政，缩减一切可缩减的人员，节省一切非切要的开支，由上级负责人以身作则，降低干部生活水平，表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严禁铺张浪费，”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根据地的长期坚持有所保障”。[④]

各解放区还把民兵工作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地方各级党委

均以一名委员兼任同级人民政府的武装部部长，并以县为单位编成民兵团，以区委单位编成民兵大队，以乡或自然村为单位编成民兵中队或分队，在不误农时的前提下，担负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并加强军政训练，随时准备参军参战和开展支前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各解放区开始了厉行节俭的反对浪费的运动。主要就是精简后方机构和过多的累赘人员，降低供给标准，减少解放区的压力，减少人民的负担。1946 年，晋冀鲁豫解放区发布了清理军队后方机关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各部队取消了团一级后方机关；紧缩了旅、纵队后方机关，对超编人员、马匹、武器均作了清点移交。晋绥军区召开建军会议，并由晋绥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发布整编命令，对全军部队进行了精简、整编。1947 年 6 月华北财经会议，对精兵简政作了进一步的规定：部队要精简后方机关人员，充实前方，保证野战部队占部队总人数的充实的 1/2 到 2/3。地方机关人员精简后，要充实部队。部队人数可占脱离生产总人数的 3/4，地方工作人员占 1/4，军费开支可占财政开支总数的 85%，地方经费占 15%。

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在本着遵循勤俭节约精神的基础之上，贯彻“部队高于地方，前方高于后方，野战军高于地方军”的原则，制定供给标准，减少经费开支，减轻人民负担，支持长期战争。各战区领导降低自己的津贴，与普通士兵同甘共苦。并且鼓励解放军自己动手自制凉鞋，以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尽力压缩财政开支。

解放区军民开展的生产节约运动，对于支持自卫战争虽然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由于国民党军的大举入侵，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资源受到极大的破坏和消耗，依靠解放区自身的物质力量坚持这场战争已日益困难。

解放区建设的加强，特别是土改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激发了他们发展生产和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晋冀鲁豫、东北等解放区出现了十多年未有的大丰收，连一些贫困的山区，农业生产也开始增长，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翻身农民说：“穷人挨饿受冻，就是因为没有土地；有地没人保，还是不牢靠。”因此，他们纷纷加入自己的军队。仅 1946 年 8 月至 10 月的三个月中，各解放区就有 30 万翻身农民，为保卫土改果实、保卫家乡而参军。许多地方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相争、村干部带头的踊跃参军参战的感人场面。同时，民兵也有很大的发展，各解放区有 300 至 400 万农民参加了民兵。在苏皖边解放区的宣（家堡）泰（兴）战役中，



仅参加担架运输的农民就有1.2万余人，当地几乎全部青壮年都参加了战场勤务。总之，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开展，使人民解放军有了巩固的后方，得到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援，从而获得了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基本保证。

注释：

①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132页，第1151～1152页。

②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④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册），第261～262页。

华东战场的反击战

华东战场的国民党军，在徐州绥署主任薛岳的指挥下，以80 000多人的损失为代价，于1946年7月到10月分别占领了苏中、淮南、淮北各解放区所有城镇及鲁南解放区的一部分地区，打通了胶济路，对苏北和鲁南解放区形成了从枣庄、峄县经睢宁到淮南、东台一线长达150公里的弧线半包围圈，并对山东解放区的首府临沂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为转换战局，中央军委于10月15日指示山东、华中野战军领导[①]，“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7至10个旅”，并指出：这样“就一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为执行此任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特别要求新四军军长兼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要注意：“不要分兵打击各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两军会师后的第一仗‘必须打胜’，”为了保证作战的协调一致，要求“两个野战指挥部合二为一，建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部队集结休整的地点要选在距敌较远的地区，以便诱敌深入，造成可乘之机，然后集中全力加以歼击”。另一方面也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配合华东解放区的作战，以缓解华东作战的困难。

这些意见，体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战争逐步向解放区中心推移时扩大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对华东人民解放军之后的作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在11月间，由于国民党军的行动谨慎，只对苏北、鲁南地区进行了若干次试探性进攻，因此山东、华中两野战军仍处于分别作战的状态，各自进行了若干次战役，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共歼灭国民党军约30 000人，掩护了华中后方向山东转移。

此时，蒋介石为了给即将在11月1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壮大声势，决定从郑州绥署的战斗序列中抽调主力整编第十一师到华东战场，改归薛岳指挥，并命令其尽快组织一次对苏北地区的大规模进攻，在半个月内结束苏



北战事。

1946年12月初，国民党徐州绥署拟定了关于结束苏北战役的作战计划：以5个旅由东台北进攻盐城、阜宁；以5个旅由淮阴北攻涟水；以6个半旅由宿迁分别向沭阳、新安镇进攻；以9个半旅，其中包括机械化装备的第一快速纵队，由枣庄、峄县、台儿庄之线进攻临沂。四路中，又以由宿迁和由淮阴北攻的两路为主，企图迫使华东人民解放军主力在苏北狭小地区内与之决战，或北移山东解放区。

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对敌情分析研究之后认为：四路敌军的间隙甚大，有利于各个击破；同时，来犯各军有的刚受到打击，已成“惊弓之鸟”，行动可能比较谨慎。而这时陈毅正好得到整编第十一师正向宿迁开进，准备同宿迁的整编第六十九师进攻沭阳、新安镇，其余各路国民党军将进行配合的情报，于是，决定先集中兵力首先歼灭由宿迁出犯之敌的作战构想，之后又召开了作战会议，与粟裕等共同确定了作战部署，并且获得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12月13日，国民党军两个师分两路向北、向东，以新安镇和沭阳为目标发起了进攻。据此，山东、华中野战军以第九纵队沿宿新、宿沭路进行运动防御，迟滞国民党军的行动；令第一纵队、第八师由新安附近，以急行军赶在15日拂晓前隐蔽开旅进至嶂山镇、晓店子西北地区；以第七师之第五旅由西鲍圩南渡沭河，配合第一纵队、第八师围歼宿新路上及其东侧各点之国民党军；以第二纵队及第一纵队一部东西对进，楔入整编第十一师与整编第六十九师的接合部，切断该两师的联系，而后会同各参战部队分割歼灭被围之整编第六十九师。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立即按照陈毅、粟裕的部署，在14日晚隐蔽地向战场开进。15日黄昏，解放军各参战部队按预定计划进至集结位置，并立即发起攻击。第八师首先集中兵力，夺取了位于嶂山镇与晓店子之间的重要制高点峰山。控制了这一战场制高点，不仅割裂了据守宿新公路上嶂山镇、晓店子各部国民党军的联系，而且直接威胁路东各点国民党军的侧翼，为战役的顺利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切断整编第十一师和整编第六十九师的联系，第一纵队于15日晚以第三旅主力自晓店子、井儿头之间楔入敌防御纵深，直逼整编第十一师师部驻地曹家集地区，歼灭了该师的直属工兵营、骑兵营。次日，各突击部队对第六十九师实行穿插分割，逐点攻击。由于没有得到第十一师的援助，六十九师陷于孤立，至19日，解放军歼灭整编第六十九师三个半旅共20 000余人，其师长戴之奇

自杀。

宿北战役这一仗，是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会师后进行的第一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他对以后这两支野战军汇合成一个强大有力的拳头以实现中央军委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意图有着重要意义。

宿北战役在战役指挥上的主要经验是：在国民党军多路进攻的情况下，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其一路；以远距离奔袭，保证了战役发起的突然性；在部队使用上，注意充分发挥各参战部队的特长，以擅长攻坚的第八师进攻战场制高点、坚固设防的峰山，以擅长野战的第一纵队担任穿插分割、迂回包围，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宿北战役的胜利，将华东国民党军四路进攻的半包围圈打开了一个缺口，顿挫了国民党军的攻势。但是，徐州绥署并未放弃其原定战略计划。还在宿北战役结束的前夕，中共中央军委就在 12 月 18 日指示陈毅、粟裕："第二步作战，似以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峄台，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逐步收复苏北、苏中一切失地。"[②]陈毅、粟裕根据中央指示也就下一步的作战方向进行反复磋商，曾考虑几个方案：一是集中兵力出击淮北，调动进攻苏北、鲁南之国民党军回援，歼其于运动中。但需充分估计在国民党军不被调动的情况下，将在淮北战场陷入被动。二是就近转用兵力，歼灭由涟水北犯沭阳之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三是回师歼击鲁南峄（县）、枣（庄）、台（儿庄）国民党军。就在这时，中央军委发来电报，电报指出："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主力似不宜分散，如放弃七十四师不打，似宜集中 25 个团左右兵力于鲁南地区歼灭二十六师，迫退冯治安部，然后相机出淮北较为有利"。[③]因此，陈毅等最后决定采取第三套方案。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决定以一部兵力在陇海路南以运动防御战节节抗击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而集中主力星夜隐蔽北上，会同原在鲁中、鲁南的第十师等部进行鲁南战役。

1947 年 1 月 2 日，解放军按原定部署向国民党整编第二十六师发起突然攻击，由于正值新年之际，国民党毫无防备，仓促应战。当晚，右纵队各部就分别攻占该师驻区北侧的平山、石城崮、青山、凤凰山、尚岩各警戒阵地，歼灭守军 4 个多营，直逼该师的主阵地及指挥中枢。同时，占领了峄（县）临（沂）公路上的傅山口、四马寨要点，切断了整编第二十六师西撤与峄、枣国民党军东援的道路。左纵队的第一纵队主力在 1 月 2 日晚包围了



卞庄；第一师由鲁坊向西穿插，至3日上午，占领洪山镇、横山、兰陵一线，构筑阻援阵地，切断了整编第二十六师与整编第三十三军的联系。至此，解放军已完成了对整编第二十六师的战役分割和部分战术包围。1月3日起，解放军全力压缩包围圈，逐点攻歼守军。至4日下午，将美械装备的整编第二十六师及所谓“国军精华”的第一快速纵队大部予以歼灭，只有少部分人逃走。

第二十六师被歼后，解放军乘胜追击峄县、枣庄的整编之第五十一师及第二十六师残部。9日晚向峄县发起攻击，11日晚晨攻克该城，全歼守敌第五十一师一个旅、第五十二师一个团及第二十六师、第一快速纵队残部，俘敌第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与此同时，解放军又围攻枣庄、齐村，于20日全歼守敌整编第五十一师师部及两个团，俘虏该师师长周毓英。

鲁南战役，共歼灭蒋军两个整编师、1个快速纵队计53 000余人，缴获坦克24辆，汽车470余辆，以及各种大炮200余门，为华东解放军组建特种兵部队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役，解放军伤亡8 000人。山东、华中野战军在认真总结鲁南战役与装甲部队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在野战部队中增设了反坦克的编制装备，加强了反坦克训练，这为以后的反坦克作战创造了良好条件。宿北、鲁南战役对扭转华东战局具有重要作用，使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走入困境。

鲁南战役后，中共为有利于华东解放区抗敌斗争和集中统一领导，特调整了党政领导机构及部队编制。华东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全军统一整编，撤销新四军及山东军区、华中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番号，统一组成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建立党的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陈毅为华东军区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任前委书记；饶漱石为军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军区副司令员；黎玉为军区副政治委员；粟裕为野战军副司令员，谭震林为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下辖六个三级军区，全部地方武装约30万人。除此之外，华东野战军召开“鲁南会议”，对整编后的军队进行了思想和组织建设：思想上，要求整个野战军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组织、统一制度，坚决克服历史遗留下来的山头主义、游击主义、本位主义；组织上，提倡着眼全局，照顾友邻，实行高度集中统一指挥；贯彻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确定团以上单位成立党委会；加强政治工作制度。鲁南会议对于统一华东野战军高级干部的作战、建军指导

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华东全军整编和鲁南会议，为华东野战军遂行更大规模的运动战、歼灭战，从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华东野战军整编之后，在国民党军进逼之下，很快进行了莱芜战役。蒋介石在鲁南战役之后，并不认为自己失败，而是认为解放军伤亡更为惨重，因此决定在鲁南地区与华东人民解放军进行“会战”。并且派出了总参谋长陈诚到徐州亲自督战，制定作战计划，企图以南北夹击的部署逼迫解放军于临沂决战，面对国民党的部署，华东解放军决定利用山区地形预伏在莱芜、吐丝口两侧歼灭敌人。这个战役，华东解放军以伤亡 8 800 人的代价，在 3 天之内歼灭敌人一个绥区前进指挥所、两个军部、7 个师 56 000 余人，连同南线及胶济路东段的作战，共歼敌 70 000 余人，严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气焰，扰乱了国民党军进攻山东解放区的部署，加深了其高级将领之间的矛盾和官兵的恐慌心理。

莱芜战役为解放军进行大规模运动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主要是：（1）把是否有利于歼灭敌人，作为制定作战计划、确定部队行动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华东野战军依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哪里能消灭敌人就到哪里去打的指示精神，“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毅然放弃山东解放区的首府临沂而挥兵北上，证明是取得战役胜利的关键一步。（2）力争主动，避免被动。善于根据敌情的变化，实施灵活机动的指挥。正如陈毅、粟裕谈到的，此次战役敌情变化之大、之快，是历来少有的。大的变化有四次，小的变化几乎天天都有。为此，华东野战军多次调整作战计划，始终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3）掌握最大而有活力的部队，持重待机。整个战役由南线到北线，野战军首长始终坚持把主力集结于便利机动的位置，当出现有利战机时，就能迅速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歼灭敌人。

从 1946 年 11 月到 1947 年 2 月，华东野战军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连打 3 仗，共歼灭国民党军 5 个整编师约 15 万人。这极大的震撼了国民党统帅部，使得蒋介石在莱芜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即亲自飞往济南，对第二战区领导人严加训斥，并且解除了薛岳徐州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华东野战军在这一时期，采用以空间换取敌人有生力量的战法，坚定不移地执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作战方针，从有利于歼灭国民党军着眼，有步骤、有计划地将战争重心由解放区的前沿引向纵深。打一仗，消

灭一部分敌人，后撤一步；再打一仗，再消灭一部分敌人，再后撤一步。四个月来，以暂时放弃苏北、鲁南解放区大部城镇为代价，换取了歼灭国民党军 15 个整旅的重大胜利。至此，国民党军进攻华东的总兵力已被歼 1/3 。而华东野战军在战争中兵力不断增强，装备逐步改善，这就为进一步扭转华东战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注释：

①淮阴之战后，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淮阴以北地区会师。

②③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581 页，第 587 页、第 589 页。

晋冀鲁豫战场破除国民党的全面进攻

前四个月的战争结束后，国共双方由于对战争的认识不一样，对于战后形势的判断也完全不一样。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在鄄城战役之后，也对战场形势作了如下分析："蒋军在冀鲁豫现仅残存的十五个旅中，有十个旅被迫看守着十七个空城，仅余五个旅可作机动部队。如果蒋军减少守备兵力，增强机动兵力，那么守备部队被我各个歼灭的危险便更大；如果减少机动兵力，增强守备兵力，那么就无法作战"，"这种形势，说明了蒋军的兵力已极度分散……其在战略上的主动已开始转入被动"。"如果蒋军采取'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战术，只有兵力十分充足才能收其效果。但今日蒋军兵力已极度不足。……既要进攻新地区，又要集中防守占领之城镇及保护漫长的补给线"，"其结果必然顾此失彼，这正是蒋介石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①]

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在前四个月作战中，虽然侵占了 25 座城市，但其正规军被歼 12 个旅，约占进攻该区总兵力的 1/4。但"蒋介石认为这是一桩好买卖"，在遭到沉重打击之后，仍继续保持全面进攻的态势。在冀鲁豫战场，郑州绥署主任顾祝同企图在第十一战区策应下，以主力继续打通平汉线，巩固地掌握鲁西南地区，寻歼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主力于黄河以北；在晋西南战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积极抽调兵力西渡黄河，企图举行对陕甘宁解放区的突然进攻。

为击破国民党军的这一计划，并策应华东人民解放军在苏北、鲁南地区的作战，中央军委于 1946 年 11 月 1 日和 3 日发出指示，据此，刘伯承、邓小平于 11 月 12 日，发出关于《晋冀鲁豫野战军滑县战役基本命令》，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在 11 月份用各个击破方法将孙震、刘汝明两集团大部歼灭，使邱清泉第五军、胡琏整编第十一师陷于孤立，然后解决邱、胡，转变战



局，并指出，晋冀鲁豫野战军当前的作战应“以拖住邱、胡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②]指出：这一战役的指导思想，是抑留与阻止王敬久与刘汝明集团，而集中力量进击孙震集团。先摧毁邵耳寨、上官村地域之旅部，吸引其旅来援，或压迫其旅逃走，以便于消灭其一部，然后相机向西或西南扩大战果。[③]11 月 15 日夜，晋冀鲁豫野战军用 11 个旅的兵力，远距离奔袭，由濮县、鄄城以北地区向滑县以北地区隐蔽急进。从敌人几个部队的结合部突然切入其纵深，将其割裂。从 19 日至 22 日，在上官村、邵耳寨和朱楼等地，共歼灭国民党军第五绥区孙震部 12 000 余人，吸引了王敬久、王仲廉集团的部队来援，这样，敌军西调也起到了策应华东解放军的作用。战役期间，冀鲁豫解放区党政机关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战勤服务工作，保障了大兵团远距离机动作战的各项供应。

通过滑县战役，解放军达成了抑留郑州绥署精锐主力整编第二十七军、粉碎国民党军打通平汉线计划之预定目的，并为向平原村落坚固筑城之敌进行强攻积累了经验。这一战役的主要特点和成功之处，在于采取了首先突击敌军指挥中枢以瓦解其整个防御体系的“掏心”战术。正如战役指挥员刘伯承在战后所评述的：不理会敌军众多的外围据点，“从他们手边擦过，穿过他们的小据点，一下子抱住他们的腰，猛虎掏心，打他的根根（按：指核心指挥部）朱楼、邵耳寨、上官村，一下子解决了他们的旅部、纵队部”。[④]

滑县战役后，国民党军郑州绥署仍然坚持其打通平汉线并寻找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决战的计划，调集整编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及第四、第五绥区各一部共 9 个旅，自 11 月 28 日开始，由滑县地区向北推进；另以整编第四十师 1 个旅及暂编第三纵队作为左翼，由安阳向临漳、大名配合进攻。战后，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望以一部监视敌人，主力集结休整，到有利时机、地点歼击其一部，最好先打较弱部分，准备在一两个月内先后打几仗，歼灭该军则全局好转。”[⑤]因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进行短暂的休整之余，也开始着手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有两个作战方向可供选择：一是打击当面进攻之敌主力第五军，歼其一部，以转变战局，并阻止该敌东调；二是乘敌后空虚，向徐州西北地区出击，直逼陇海线，威胁徐州，以调动进攻之敌回援，歼敌于运动中。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后，考虑到部队经休整补充，战斗情绪很高，决心予第五军以沉重打击。鉴于第五军系郑州绥署战斗力最强的一张

"王牌"，必须精心计划，选择有利的时机和地形，避免打无把握之仗。于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与第五军周旋20余天，先后在濮县、清丰、南乐等地设置战场，但由于该部过于集中，或地形不利，而未获战机。

而此时，中共中央军委又指示刘伯承、邓小平："我陈粟军主力在宿迁附近已获大胜，第二步准备渡运西进，迫近津浦、徐州，恢复淮北局面。在此情况下，如果你们西面之敌不好打，拟以南下寻歼八十八师，恢复嘉、巨、金、鱼、成、单各地，调动邱清泉东进而歼灭之较为有利。"⑥

而此时的国民党军由于集中主力北犯，东明、考城及以南地区的守备相对比较薄弱，而且这一地区原是老解放区，群众基础好。于是，晋冀鲁豫解放军置北犯之敌于不顾，以少量部队伪装主力，在清丰、南乐、大名、广平地区，牵制迷糊敌人，主力迅速转兵南下鲁西南地区，于1946年12月22日至1947年1月16日，举行了巨（野）、金（乡）、鱼（台）战役。

12月22日，晋冀鲁豫解放军以两个纵队另一个旅的兵力，自观城、朝城地区向东南挺进，于30日夜，向巨野、金乡、鱼台地区之敌发起突然进攻。1947年1月1日，攻克巨野、嘉祥县城，4日，再攻金乡，吸引了鱼台、定陶、菏泽之敌向金乡增援，于是，解放军当机立断，改变计划进行"围城打援"。于7日到9日，先歼灭由鱼台增援之敌，12日至13日又歼灭了由定陶增援之敌，菏泽的增援之敌见势不妙直接回头西窜，但仍被我军歼灭。此役，解放军歼敌正规军3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及地方团队，共16 000余人，收复县城9座，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的计划；同时有力的配合了华东战场的鲁南战役。

巨、金、鱼战役是晋冀鲁豫野战军采取敌进我进战术、调动与歼灭国民党军的一个典型战例。对于这种战术的作用，刘伯承曾用一个寓有深刻哲理的比喻来形容："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刘伯承、邓小平在总结这一战役的经验时指出："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乃能坚持主动权。"当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摆脱与王敬久集团在黄河北侧的僵持局面，大踏步向鲁西南挺进时，"不管敌人如何攻陷濮阳、范县、观城、大名、南乐，威胁我后方，佯渡黄河逼我回顾，终不能不转用其主力于陇海线，转成被动"；"各级首长在一个机动战役意图之下，必须预见情况的演变，因势利导，机断行事，努力达成歼敌任务"；"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是求得打运动战歼敌的好办法"。⑦此外，利用国民党军郑州绥署与徐州绥署之间的矛盾，也是取得战役胜利的一个因素。当晋冀鲁豫野战军围



歼驻金乡、鱼台的徐州绥署国民党嫡系部队整编第八十八师时，郑州绥署不愿派遣精锐主力相援，却拼凑了西北军刘汝明和伪军改编的张岚峰各一部去应付。由于两个绥署各图保存实力，使晋冀鲁豫野战军得以从容转用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巨、金、鱼战役和山东、华中野战军举行的鲁南战役，给予郑州、徐州两绥署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国民党军统帅部力图扭转战局，集中重兵部署“鲁南会战”。除集结徐州绥署的主力于陇海路东段外，拟抽调郑州绥署的精锐整编第二十七军东开徐州地区。当时，陇海路中段南北广大地区仅留置第四、第五绥区 2 个旅结合地方团队担任守备，兵力极为单薄。

这时，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望乘胜展开攻势，向你们附近广大地区敌占据点中一切较薄弱可攻取者广为攻取，不论敌正规军、伪军、民团广为歼灭，收复大批失地，并不被铁路所制。”据此，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发起豫皖边战役。决心乘胜发动攻势，以第一、第二、三纵队）作为路北作战集团；以第六、第七纵队作为路南作战集团，分别在陇海路南北展开夺取敌人守备薄弱之镇，求歼可能自徐州、郑州来援之敌。战役自 1947 年 1 月 24 日开始，至 2 月 4 日，北集团连续攻克定陶、单县、曹县，并控制民权、商丘间铁路约 70 华里；南集团连克太康、鹿邑、杞县、亳州，并歼灭由商丘救援亳州之敌整编第七十五师一部，全战役共歼敌 16 000 余人。国民党郑州绥署急调进占南乐、大名的第五军、整编第八十五师及驻武汉地区的整编第七十二师驰援，企图在击破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攻势后，东驰参加华东战场的“鲁南会战”（即莱芜战役）。但被晋冀鲁豫野战军牵制于民权、兰封和鲁西南地区，使其无暇东顾。解放军果敢的向敌后薄弱地区大踏步进击，捕歼分散、孤立之敌，袭扰敌之后方，以求调动敌人，有力地配合华东战场的作战，比前去援助有效的多。刘伯承将此比喻为“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实为援助友军之良策。

蒋介石为侵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于 1946 年 11 月上旬，命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抽调驻晋南的整编第一、第九十师共 4 个旅，由临汾经禹门西渡黄河入陕，准备会合原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干部，突袭延安。国民党在吕梁地区各县的正规军和地方保安团队共有 10 000 余人驻守。

为了保卫延安，中共军委令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驰援延安，命令称：到吕梁地区后，“如胡军向延安急进，则你们亦急进；如胡军缓进，则你们可攻占吕梁各县，待命开延”。依据中央指示，11 月 22 日，晋冀鲁豫

野战军第四纵队与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相配合，发起吕梁战役。至12月12日，攻取中阳、石楼、永和、大宁、蒲县等城。胡宗南因侧后受到严重威胁，于17日急令入陕的两个师东返，并令其驻守临汾、吉县的两个旅向蒲县、大宁反扑以图稳定晋西南的局面，然后再向延安进攻。这时，解放军实行运动防御，诱敌深入，断敌蒲（县）临（汾）公路，并令地方武装进行袭扰，使进犯大同之胡宗南军在蒲县以西地区连遭伏击，被迫于28日撤退，解放军乘机截击，歼灭其后卫1个旅，战役于1947年1月1日结束。此役，共歼灭敌人10 000余人，解放了晋西南广大地区，推迟了国民党军突袭延安的计划。

为扩大吕梁战役的战果，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晋绥军区司令员王震又指挥所部及太岳军区第二十四旅、晋绥军区独立第二旅，北上夺去了汾阳、孝义，寻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此役，国民党军被歼11 000余人。陈谢所部在这一战役指导上的特点是：先攻弱敌，开辟战场；而后依据各路国民党军增援的态势，灵活使用兵力，以小部牵制其大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援军，始终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

这一战役，也为解放军在晋中、晋南战场进行平原村落攻防战积累了经验。陈谢每每以少数兵力依托野战阵地进行防御，诱敌来攻；当敌迫近或进攻受挫后，集中主力发起突然的反击，以消灭敌人于野外。在追击时，以多路小部队渗透各部溃退之国民党军的间隙中，跟踪穷追猛打，以增大其混乱，不给敌以组织抵抗的时机。当退却之国民党军占领村落筑工顽抗时，力争以猛冲、猛打的手段歼敌于立足未稳。但当敌完成对村落的设防后，则适机集中兵力、火力，以攻坚手段逐点加以围歼。由于采取了这种战术，解放军得以避开国民党军火力强、善守备的长处，抓住其士气低、怕近战的弱点，从而扩大了战果。

这一时期，晋冀鲁豫军区与晋绥军区各一部密切配合，以7个旅的兵力，在晋西南及晋中战场辗转作战两个半月，歼灭国民党军2个多旅（师），连同地方武装共2万余人，解放了吕梁地区1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及数十万人口，将国民党军压缩到同蒲铁路沿线和晋中盆地，改善了解放军在这一地区的作战态势。从此以后，晋西南战场的解放军完全掌握了主动权，由战略守势转入了战略性反攻。

注释：

①⑦刘伯承：《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59页，第364～365页。

②⑤⑥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6页，第569页。

③秦基伟：《刘伯承指挥艺术》，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④《刘伯承谈蒋介石》，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6年11月30日。

北线晋察冀和东北解放区的作战

根据中央和中央军委“逐步扩大歼灭战的规模”的指示，南线各解放区于1946年11月开始了全面内战爆发后第二个四个月的作战。与此同时，北线也展开了对国民党军全面进攻的破除战。经过前四个月作战，冀、热、察三省已有40多个县市被国民党军占领，平汉、津浦、平绥、平承大部交通干线被国民党军控制，使晋察冀解放区的面积缩小，部分地区被分割，工农业生产和财政收入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全区的物资调剂也受到很大限制，这些都影响对战争的支援能力。

国民党军侵占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后，气焰十分嚣张。在打通平绥路全线以后，一方面，以部分兵力继续向察北、察南扩展占领区；另一方面，集中主要力量打通平汉铁路北段；同时，在冀东、冀西等地区继续压迫和蚕食解放区广大农村。国民党军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在占领张家口后，于10月13日，对第十一、第十二战区部队发出了“应立即追剿、捕捉匪军主力而歼灭之”的追剿令，并决定首先以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打通和控制平汉路保定、涿县段及其以西的涞水、易县、满城一线，将晋察冀解放军压缩到紫荆关、涞源山区，加以围歼。而后各个歼灭其主力。为此，制定了如下作战计划：“（甲）在年前（按：指1946年底前）打通平汉路，巩固平绥路。（乙）打通津浦路，将华北划成三个作战地区：平汉路西、太行山以东为一个；平汉路东、津浦路以西为一个；津浦路以东至渤海为一个。（丙）作战采取首先形成包围网，然后军政密切配合，稳扎稳打的扫荡清剿，实行过去江西剿共法。主力扫荡后，立刻完成地方武装。”[①]

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失陷后，在这一地区的党政军部分干部一度引起思想混乱。中共中央针对晋察冀地区国民党军猖狂进攻的形势，对中共中央晋察冀局、晋察冀军区作出重要指示：“目前你区敌人进攻，无论傅作义、李宗仁均已达到顶点，其后备已经用尽，我们方面一城一地之得失无关大局，主要任务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望本此方针鼓励士气，团结全党，完



成中央给你们的神圣任务。”②

为了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明确晋察冀军区在撤出张家口后的任务和作战方针，中共中央晋察冀局在书记聂荣臻主持下，于1946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在冀西的涞源县召开了中央局扩大会议。会议在学习中共中央《三个月总结》及有关指示精神的基础上，检查了前一时期失利不足的教训，涞源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晋察冀局、晋察冀军区为紧缩机构并提高作战指挥的效率，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于12月初撤消了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由军区直接指挥各野战纵队及地方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方针，争取多打中小规模之仗，实行内线作战，逐步歼灭国民党军。依据这个方针，从1946年11月2日开始，晋察冀军区部队首先在易县满城地区歼灭孙连仲所属1个团和两个地方保安团共7 900余人。稍事休整后，又于11月20日至28日在保定以南的定县地区歼灭国民党军5个保安团及其他土杂武装共8 000余人。

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晋察冀军区在四个月作战中，歼灭国民党军8个团，连同地方武装共约2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分割、占领晋察冀解放区腹地的企图，基本遏止了国民党军在这一战场的全面进攻，为扭转华北战局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晋察冀军区在作战中胜利不大的主要原因，在于运动战的指导思想不够明确。中共中央军委在肯定晋察冀军区作战成绩的前提下，也专门就作战方针问题致电晋察冀军区，着重指出：“你们最近时期在保易间的争夺战，是在被动情况下进行的，故打不出仗。今后应学习陈粟、刘邓、陈谢三区大踏步进退，完全主动作战方针”。“总之，大踏步进退，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完全主动作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③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在回顾这段经历时，也认为：“那时候，我们的一些作战行动，往往为敌人的行动所吸引，费力气不小，歼敌却不多。有些仗打得不痛快，根本问题就在于没有掌握主动权。”④为此，晋察冀军区认真研究中央军委的指示，总结这段时间作战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端正了作战指导思想，为而后打大规模歼灭战奠定了基础。

在东北战场上，新开岭战役挫伤了进攻南满国民党军的锐气，但并未改变其既定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战略计划。东北保安司令部重新调整部署，构点联线，企图以更加谨慎的战术，逐步向南满解放区的腹地压缩。于1946年11月初国民党军在结束新开岭战役后，稍经调整又继续向南满解

放区发动进攻，到12月中旬，南满解放区仅剩下临江、长白、抚顺、濛江（今靖宇）4个县（通称临江地区），地域狭小，解放军处境十分困难。在这紧要关头，中央军委连续向东北民主联军和辽东军区领导人发出指示，要求他们精心组织南、北满部队的配合作战，以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领导人林彪等研究了整个东北的斗争形势，认为南满、北满是一个整体，而要扭转东北战局、完成保卫东北解放区的任务，当前的关键在于坚持好南满的斗争。只有在南满坚持住了，才能陷东北国民党军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也才能为建立巩固的北满根据地赢得时间。坚持南满，主要依靠辽东军区所属的两个纵队及军区各级地方武装，但北满主力必须给予有力的配合，实行北打南拉，南打北拉交互运用的方针。基于这一分析，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决定派出联军副政治委员陈云、副总司令肖劲光到南满，以加强对南满斗争的领导。同时确定以南满野战部队主力在长白山区迎歼进犯之敌，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北满野战军主力在冰封季节视机南下，在长春、吉林以北地区寻歼分散之敌，策应南满部队作战，逐步削弱国民党军，以求改变东北战局。

陈云、肖劲光到达临江地区后，在肖劲光主持下，于12月11日召开了有师以上干部参加的七道江会议，着重讨论南满地区的斗争方针。会议上对于是否坚持南满斗争的问题出现了分歧。针对这一情况，陈云在听过各方建议之后，具体分析、对比了坚持或撤出南满根据地的利弊得失，指出坚持南满斗争的重要性。他形象的比喻："东北的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子是向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尾巴。如果我们松开这条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就危险了；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住牛尾巴是关键。"⑤经过陈云的工作，与会干部迅速统一了认识，最后会议通过了坚持南满，巩固长白山地区，坚持敌后三大块（即辽南一分区、辽宁二分区、安东三分区）的战略思想，以及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密切配合，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结合，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军事指导方针。最后，会议决定："首先第四纵队出敌不意地挺进敌后，牵制敌人，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及分散之敌，破坏交通线，打乱敌人的部署，第三纵队担任内线作战，集中优势兵力，顶住敌人，打掉敌人几张王牌，挫其锋芒，巩固现有根据地，为改变局面打下基础"。⑥

七道江会议后，中共中央南满分局将会议的决定报告中共中央东北局，



获得批准。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复示中指出：南满的斗争，要“巩固内部，结合群众，依托广大的山区，加强下层领导，采取大胆而精细的处置，各个歼灭分散的敌人。……在这种斗争中争取局部的坚持，以待东北与全国形势之逐步好转。”⑦

1946年12月17日，东北国民党军开始对南满仅存的一块完整的解放区——临江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至1947年4月初，国民党军的进攻被粉碎，先后历时三个半月。在三个半月中，南满人民解放军共进行了4次保卫临江的作战，北满人民解放军共3次渡过松花江向长春以北国民党军出击。解放军坚决执行“南打北拉”和“北打南拉”，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结合，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此役，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两个师另6个团以及大量地方军队共4万余人。当时，在东北民主联军的广大指战员中流行着一首叫《筛豆子》的快板诗，形象地刻画了南北满解放军的密切配合作战使得国民党军疲于奔命的窘态：“国民党，兵力少，南北满，来回跑，北满打了它的头，南满打了它的腰，让它来回跑几趟，一筐豆子筛完了”。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是东北战局发展过程一个战略性的转折点。它对改变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各个击破东北民主联军的战略计划。此后，东北国民党军由于机动兵力更加单薄，又得不到关内的增援，不得不放弃战略进攻，转入守势。这就为东北民主联军举行战略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一这阶段作战，南满解放区的基本区域得以保存，北满解放区获得巩固和发展，西满、东满也分别恢复和重建了一些小块解放区。在此期间，随着土改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和残余土匪被彻底肃清，东北解放区已日益成为巩固的战略根据地。

此役所提供的作战经验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一）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与南满部队在战略上的主动、密切配合，是夺取战役胜利的关键；（二）始终贯彻了积极主动、先机歼敌的战术思想；（三）发扬敢打硬仗和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不放过任何歼灭小部敌军的战机，集小胜为大胜。

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的这四个月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4个旅，连同非正规军共41万余人，自己损失兵员12万人；国民党军共占领解放区87座，解放军收复

和新解放的城市同样为87座。

这四个月的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歼灭战规模已越来越大，战斗力也越来越强大，切实执行了当初确定的“逐步扩大歼灭战规模”的方针；而与此相反，国民党军则士气日益低落，被俘、投诚、起义的越来越多，战斗力已明显下降。这个阶段使得国民党的战略主动权逐步消失，开始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转引自中共中央军委一局敌情科：《敌军进攻解放区部署汇集》(1946.10—1947.1)，第25页。

②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文献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0页。

③中共中央军委致聂荣臻、肖克、罗瑞卿电，1947年2月21日电。

④《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45页。

⑤⑥中共吉林省党委工作委员会编：《四保临江》，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出版，1987年版，第6页，第7~8页。

⑦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页、第351页。



豫北、晋南地区反攻战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经过八个月的英勇奋战，至1947年2月底共歼灭国民党军25个旅，连同地方团队共23万余人，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控制鲁西南和打通平汉路、同蒲路的计划，而且粉碎了国民党军对整个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进攻。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伤亡5.2万余人，放弃24座城市。

自1947年3月，蒋介石为了改变战场上的“被动”状况，放弃了“全面进攻”的方针，转而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这两个解放区，在豫北、晋南、晋察冀和东北等战场上“唯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①由进攻转为防御。于是，这些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为配合重点战场的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并为自己而后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条件，先后在这些地区发起攻势，举行了战略反攻。

3月，国民党军从晋冀鲁豫地区抽调17个旅去参加对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在该区仅剩下31旅，连同地方团队共有30余万人。在这些部队中，大部遭解放军歼灭过或遭解放军歼灭性打击，战斗力较弱，兵源补充、物资供应特别是粮食供应困难，官兵生活水平受通货膨胀影响而下降，士气低落。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国民党军由于兵力不足被迫转入守势，其作战的基本方针：依托所谓“黄河防线”、交通要道和城镇据点组织防御。其部署：以整编第二十六军军长王仲廉部的4个整编师和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孙震部的2个整编师，连同地方团队一部共约10万人，沿平汉、道清路②，守备豫北；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部的3个旅另4个团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部的地方团队共约3万余人，沿同蒲路南段守备晋南；以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部的两个整编师等部，连同地方团队，沿黄河南岸和陇海路守备鲁西南；以第五绥靖区等部在20个左右的地方团队的配合下，包围豫皖苏解放区；另以整编第二十七军军长王敬久部4个整编师8万余人，在东阿、平阴和滋阳地区，跨晋冀鲁豫和山东两解放区，伺机机动作战。

与国民党的情况相反，经过八个月的艰苦奋战，人民解放军不仅打破了

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与此同时，解放军的力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就晋冀鲁豫地区而言，1947 年 2 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的实力已由战争初期的 27 万发展到了 31 万人。其中野战军由 8 万人发展到 12 万人，由占全区部队的 30% 发展到占 40%。具体是：野战军共 6 个纵队，二级军区 5 个（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豫皖苏军区），另外，还有军政大学、民主建国军及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部队的装备，由于缴获了国民党军的大量武器、弹药和器材，亦得到了改善。这时，炮兵、工兵建设亦有了发展。晋冀鲁豫军区建立了榴弹炮团，第四纵队建立了炮兵团，其余各纵队都建立了较充实的山炮营，各旅都建立了炮兵连。大多数纵队建立了工兵营，第四纵队的各旅都建立了工兵连。

但是，由于连续作战，部队已相当疲劳，弹药供应困难，俘虏成分占连队人数的比重很大，多在 25% 至 60% 间，且有些没有经过很好的改造，需要休整和补充，以利再战。2 月 13 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向中央军委请示部队需要休整 15 天。中央军委批准了晋冀鲁豫的请示，并指出：必要时可以延长若干天，以补充齐全，恢复体力为原则。2、3 月间，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和地方部队一部，依据军区首长的指示，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了休整。在休整期间，各部队总结了作战经验，进行大练兵，对粮食、弹药进行补充，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解放军的领导，统一了指挥。经过整训后，部队兵员更加充实，各级组织更加健全，战术技术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体力得以恢复，士气高涨，为执行新的作战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根据全国其他战场的军事形势、晋冀鲁豫战场的具体情况以及中共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和晋冀鲁豫军区确定的作战方针：集中一切力量举行战略性反攻，大量地歼灭国民党军，收复一切可能收复的失地，扩大解放区，有力地配合山东、陕甘宁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并为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条件。其基本部署：以野战军主力和太行、冀南军区主力及冀鲁豫军区一纵队和太岳军区主力举行豫北攻势；以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主力举行晋南攻势；以太行、冀南军区各一部，在正太路沿线配合晋察冀军区部队作战；另组织地方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在同蒲路灵石、祁县段，豫北之汝阳、孟县地区和冀鲁豫军区之黄河以南地区及豫皖苏地区的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游击战争，大量牵制和消耗国民党军，配合主力进行的豫北、晋南攻势作战。



豫北原系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的前进基地，在国民党军发动重点进攻后，则成为其联系陕北、山东战场的枢纽地带，因而部署了较多的防御兵力，并修筑了大量的坚固工事。国民党军将防御重点放在平汉路和道清路交叉点的新乡及其以北地区。其具体部署：以王仲廉的4个整编师和暂编第三纵队孙殿英部等地方团队共7万余人，守备平汉路、道清路及沁阳、济源、孟县等地区；以孙震之两个整编师和王三祝部等地方团队约2.5万人，守备平汉路以东黄河以北之浚县、滑县、濮阳、长垣地区。

3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向平汉路实施进攻，专打王仲廉集团，进行连续作战，以便和晋南攻势一起，给陕北、山东解放军的作战以有力配合。并要求于3月下旬开始行动。根据中央的指示，3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签发了豫北作战基本命令，决心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和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主力共10万人，混编为4个集团，在豫北展开反攻作战，专打王仲廉集团，彻底摧毁平汉、道清铁路，肢解敌人防御体系。

豫北攻势，分为三个阶段：3月22日到4月3日为第一阶段，4月3日夜到18日为第二阶段，5月1日到25日为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各作战部队分别收复濮阳、原武、阳武、封邱、延津5城和牛市屯等国民党军据点多处，歼敌5 000余人，解放黄河以北、平汉路以东，东西长200余里、南北140余里的地区，摧毁与控制平汉路、道清路100余里，进至新乡附近，迫使蒋介石将原拟调往山东战场之整编第六十四和整编第九师改调豫北战场。

4月初，豫北（新乡除外）国民党军守备情况是：汲县为整编第三十二师2个旅及整编第四十一师1个旅。滑县为整编第四十一师2个旅及整编第四十七师1个旅。长垣为整编第四十七师1个旅。焦作为整编第三十八师1个旅。安阳为整编第四十师。其余城镇为地方团队驻守。

鉴于第一步作战任务已基本完成，刘、邓为了避开优势之敌，开辟战场，调动敌人，争取野战歼敌，决心挥师北上，进行第二步作战：首先扫清平汉路两侧据点，消灭分散之国民党军，彻底破坏平汉路安阳、汲县段，并相机夺取汤阴、淇县两城，控制卫河以北以西和平汉路以东广大地区，诱王仲廉部北进，寻机在运动中加以歼灭。

4月3日夜，晋冀鲁豫野战军避开新乡地区强敌，挥师北上。至10日，攻克淇县城及回隆、楚旺、宜沟、鹤壁等据点数十处，歼灭国民党河南省第

三专署人民自卫军第一、二、三总队共1万余人，彻底破坏安阳、汲县段铁路，解放卫河以北、以西平汉路两侧广大地区，逼近安阳、汤阴。4月14日，国民党军4个半旅由新乡北援，16日至18日，解放军伏击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快速纵队，俘获其纵队司令李守正，余敌南逃。解放军追击，共歼敌20 000余人，同时收复淇县、滑县、浚县三城。由于国民党军第二快速纵队被解放军歼灭，援敌全部退缩新乡，暂不敢北上增援。此时，汤阴守敌已陷于孤立无援境地。刘伯承、邓小平决心乘势夺取汤阴，孤立安阳。5月1日，鉴于攻城条件成熟，刘邓决定对汤阴发起总攻。黄昏总攻开始，第六纵队集中主要兵力和山炮，以全部火力从东北角实施主要突击打开进入汤阴的缺口，经过激战最终取得汤阴战斗的胜利，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暂编第三纵队，俘获纵队司令员孙殿英。接着，解放军移师北上，于9日至25日，在安阳外围歼敌6 000余人。解放军历时两个半月的豫北反攻战，共歼敌40 000余人，解放9座县城和广大地区，控制平汉铁路150公里，打乱了国民党统帅部在豫北的防御体系，有力地配合了陕北、山东两战场人民解放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并为自己下一步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

与豫北反攻的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在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下，于1947年4月至5月，在晋南地区进行反攻作战。

国民党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从晋南战场抽调7个旅，感到晋南守备兵力空虚，胡宗南遂将新兵旅、青年军第二百零六师1个团由陇海路调到晋南，担任守备任务。阎锡山部遭解放军不断打击后，将其主力回缩于晋中地区，以图自保，只以地方团队守备晋南地区。这样，在晋南地区，国民党正规军只有正规军3个旅另4个团，连同地方保安部队约30 000余人，并将其防御重点置于同蒲路临汾以南路段。

中共中央军委于1947年2月下旬和3月初，指示解放军驻晋南部队："须在3、4两个月消灭晋南胡（宗南）军几部，基本改变晋南局势"；并要求"配合边区作战，阻止胡部进攻延安"。并提出，全战役可分两步进行：首先，陈、谢主力4个旅"用突然动作袭占曲沃、新绛、河津、稷山四县"。同时，以王新亭1个旅及地方部队"攻占翼城、绛县，然后全军相机逐一攻占乡宁、吉县、蒲县、汾城、襄陵、万泉、荣河、猗氏、临晋、闻喜及三角地带一切可能攻取之地方。"还明确指出："攻占上述各地之主要目的不在占地，而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③]要求战役于4月份完成。并明确规



定，第四纵队及太岳军区部队直接归中共中央军委指挥，具体作战行动，则统由陈、谢指挥。

根据上述指示和敌军守备情况，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即陈赓部）和太岳军区部队50 000人，在130多个民兵连的支持下，举行了晋南反攻。

4月4日，解放军正式向晋南发起攻势，至25日，连克20余城，并控制了禹门口、风陵渡两个重要的黄河渡口，使晋南地区除运城、临汾两个孤立据点外，全获解放。28日，解放军太岳军区两个旅协同吕梁军区部队，攻占乡宁、襄陵等城，使太岳、吕梁两区连成一片。5月1日，陈赓部开始围攻晋南重镇运城，在外围歼敌两个团后，因敌凭坚固守，未能攻下，11日撤并转走，晋南战役结束。

为了配合野战军作战，太岳军区的地方武装、游击队和民兵积极开展游击战，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摧毁伪政权，建立人民政权，扩大解放区，牵制国民党军。在晋南反攻作战期间，太岳区的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战勤工作，支援第四纵队等部的作战行动。派出担架队、运输队5.2万余人，参加破城毁路的群众有4.9万余人。由于参战群众认识正确，组织周密，情绪高涨，干劲大，不避艰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有力地支持了前方解放军的进攻。

晋南攻势，自4月4日开始，至5月11日结束，历时36天，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共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3个团4个营 及1个新兵旅，非正规军3个保安团及18个县的地方团队，共1.4万余人，收复和解放县城20余座。晋南攻势，不仅彻底粉碎了胡、阎联防体系，使晋南局势起了根本变化，而且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直抵黄河东岸威逼关中，进窥潼、洛，造成胡宗南的后顾之忧，有力地配合了在陕北的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同时，也为第四纵队而后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四个月的作战，晋冀鲁豫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5.9万余人，收复和解放城市20余座，巩固、扩大了豫北和晋南解放区，基本切断了国民党军联系山东、陕北战场的纽带，并严重地威胁了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部的侧后安全，有力的配合了山东、陕北战场解放军的作战。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得到了发展。总兵力由31万余人增至42万余人，为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

注释：

①《蒋总统集·演讲》，第 1599 页。（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167 页。）

②道清路，是指河南省滑县道口镇至博爱县清化镇的铁路。

③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78 页。

晋察冀战场的反攻战

经过前八个月的作战，至1947年2月，国民党政府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部（保定绥署、张垣绥署）被晋察冀军区部队歼灭8万余人。1947年春，北平行辕在晋察冀战场的部队共有34.4万余人。其中正规军10个军（整编师）29个师（旅）84个团约31.5万人。由于北平行辕在前一阶段作战中，集中兵力大举进攻，占领了晋察冀解放区的一些城镇和铁路交通线，因此，它战线不断延长，守备的兵力增加，机动兵力减少。

在保南战役之后，国民党在这一战场的9个军、26个师分别据守在平汉路北平、石家庄段；平绥路北平、张家口段，及北宁路北平、山海关段，守备主要交通线，保持与东北的联系。守备的重点置于北平、保定、天津三角地区。在石家庄地区及正太路一线，仅有正规军第三军两个师、第四十三军1个师和地方团队担任守备。由于北平行辕部队占领的大、中城市和铁路交通线，均被晋察冀军区部队割裂，且平汉铁路保定至石家庄段已被晋察冀军区部队控制，保定至北平段也经常处于瘫痪状态；北宁、津浦、平绥等几条铁路线，则经常被晋察冀军区部队切断，所以，这些各个地区的守备部队是难以调动的，这样，在晋察冀解放区，国民党军其实已经开始处于守势。

经过八个月作战，晋察冀军区部队也得到了发展。随着晋察冀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深入，广大翻身农民为保田保家，踊跃参军；大量经过教育改造的俘虏兵补入部队，使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得到充实。晋察冀军区部队经过实战锻炼，总结作战经验，进行整训，战术技术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战斗士气高涨，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为下一步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晋察冀军区部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还没有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有些战役战斗是在被动情况下进行的，胜利也是不足的。因此，2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聂荣臻、萧克、罗瑞卿："今后行动应学习陈粟、刘邓、陈谢三区大踏步进退、完全主动作战的方针。你们部队休整若干天后，请考虑是否可以打第三军。其目的不在占地而在歼灭顽伪有生力量，并吸引保定以北之敌南

下，利于第二步歼灭之。”“总之大踏步进退，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完全主动作战，先打弱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①] 3 月 12 日和 16 日，中央军委还就作战地域的选择问题，给聂、萧发了指示电。指出“你们作战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歼灭敌人，就是对于他区的配合。”[②]这些指示，对于晋察冀军区明确作战指导思想，提高作战指挥能力，夺取作战的新胜利，争取晋察冀地区战局的根本好转，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据此，3 月底，中共中央晋察冀局召开了安国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作战如何争取主动，摆脱被动，从根本上扭转华北战局。会后即决定进行正太战役。

国民党此时在晋察冀地区守备的重点是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区，石家庄外围及正太铁路沿线，国民党正规军较少，并且正太铁路沿线分由北平行辕保定绥署和太原绥署不同建制单位守备，他们各图保存实力，互相支援的可能性不大。自平汉铁路被晋察冀军区部队切断后，第三军已处于孤立少援的境地。因此，石家庄外围和正太铁路沿线，是国民党军守备薄弱、孤立的地方，便于晋察冀军区部队实施各个击破。

另外，石家庄周围及正太铁路沿线过去是老解放区。对晋察冀军区部队来说，群众条件好，地形熟悉。这是取得作战胜利的有利条件。

鉴于上述情况，晋察冀领导人于 3 月 31 日决定发起正太战役，准备集中 3 个纵队和冀中、冀晋等军区部队相配合，先歼灭石家庄外围之敌，然后沿正太路西进，歼灭沿线之国民党军，彻底破击正太铁路。战役预定分两期进行：第一期，着重在正太铁路东段作战，集中野战军 3 个纵队的全部和冀中、冀晋军区的地方武装各一部，歼灭石家庄外围分散守备之国民党军，孤立石家庄。第二期，以主力向正太铁路西段进击，歼灭沿途之国民党军，并准备歼灭由太原方向东援之国民党军。在第一期作战任务完成后，若平汉北段之国民党军南援，好打时，则先歼灭援敌，而后再西进。预计战役于 4 月 8 日开始，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完成。在进行正太战役前，4 月 2 日，中央军委致电聂荣臻、萧克和罗瑞卿：“正太战役应尽可能提早举行及缩短作战时间，以便于本月底或下月初抽调一个纵队（杨得志）去晋西北打傅作义（晋西北有四个旅在陕北作战）。”[③]据此，晋察冀部队于 1947 年 4 月 9 日发起了正太战役。

4 月 9 日，晋察冀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向石家庄外围之国民党军进攻，至 12 日，攻克正定、栾城，并肃清了石家庄外围国民党军据点 90 余处，破袭



了正太铁路石家庄至获鹿段，歼敌第三军1个团和地方团队一部，共10 000余人。在此期间，北平、保定籍天津之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第十六军等部，分路“扫荡”冀中解放区大清河以北地区，占取胜芳镇。这时，解放军以地方武装与保定来援之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周旋。主力部队按原计划，于14日由正定地区向西进攻，连续攻克井陉、娘子关等地，逼近阳泉。这时，国民党军又调第九十四军等部南下，企图钳制解放军西进。解放军仍以地方武装与之周旋，主力坚持西进计划。并且上报中央军委表明“我主力仍按预计完成正太战役作战。”[④]正在此时，4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聂、萧、罗：“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正太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灭之，选击何部那时再定。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⑤]这样更坚定了晋察冀解放军西进的决心。

解放军沿正太路西进，阎锡山于4月24日，急派其第三十三军主力东援，25日，进抵阳泉。解放军以一部兵力包围阳泉、平定，一部兵力继续西行，先后攻占测石驿、芹泉、盂县等车站城镇。29日，第三十三军主力西撤，被阻于测石驿。5月1日，阳泉的国民党军突围西撤，当即被包围于赛鱼、测石驿两地，4日被歼灭，至此正太战役结束。此役，解放军共歼国民党军35 000余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井陉、阳泉和黄丹沟煤铁矿转入人民手中，不仅有利于解放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使阎锡山的军事工业因缺乏原料和燃料而陷入严重困境。极大地鼓舞了晋察冀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

正太战役的胜利，是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群众积极支援晋察冀军区部队作战分不开的。冀中、冀晋区动员了庞大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在正太战役第一期作战中，冀中军区第十一军分区在所辖的11个县中和第八军分区在所辖的3个县中共动员担架3 780副，出民兵2.6万余人。冀中地区的支前工作，得到了聂荣臻的好评。晋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所辖地区共派出3万民工支援正太战役，并在二三天内就把50万公斤粮食和柴草等运到前线。由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始终保障了正太战役的物资供应及伤病员的后送。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为正太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太战役在战役指挥上的主要经验是：首先，要把战役方向选择在国民党军守备薄弱的地方。在正太战役发起前，聂、萧、罗全面分析研究了晋察冀解放区周围的国民党军的情况，认为石家庄外围及正太铁路沿线国民党军数量少，所以对其发起攻击。其次，坚持主动作战的方针。解放军继续坚持西进计划就是很好的证明；除此之外，要组织地方部队积极配合野战军作战。正太战役之后，为了进一步适应战局的需要，晋察冀对解放军的作战指挥和后勤机构进行了调整，并且抓了武装力量建设问题。

1947 年 5 月，东北民主联军展开了强大的夏季攻势，捷报频传，开始打破国民党军分割东北各解放区的局面，并迫使其放弃了沈阳以北的大片地区。蒋介石为了确保东北这个战略要地，不惜挖肉补疮，命令北平行辕派兵增援东北。

面对上述情况，5 月 8 日，中共中央军委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并告朱德、刘少奇电："东北我军由北满出动主力八个师（每师约万人）入南满，向敌举行反攻，五、六、七月是重要关键，你们必须钳制关内敌军，不使东调，使东北取得胜利。你们下一步作战打何地、何部最能拖住敌人，配合东北作战，望拟具计划电告。"⑥根据中央指示，聂、萧、罗分析了具体情况之后，于 18 日提出打津沧线，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6 月 12 日，晋察冀部队在津浦铁路北段之陈官屯至沧县间发动攻势，动用了野战军 3 个纵队和察哈尔、冀中和渤海军区等地方武装，到 6 月 15 日，战争正式结束，解放了青县、沧县、永清 3 座县城，歼敌 13 000 余人，解放军还一度控制了津浦路 160 多公里。

青沧战役的胜利，使晋察冀解放区与华东解放区沟通了联系，造成了对天津的威胁，并震动了平、津，调动了保定绥署在平汉路两侧的部队东移。这样，分散了平汉路北段国民党军兵力，为而后在此地作战创造了条件。同时，使在冀东等地的国民党军开始向静海地区增援，而原定向东北增援的国民党军到达天津之后也被迫滞留于此。这样就达到了作战的目的，有力的配合了东北地区的作战。

青沧战役战役之后，6 月 19 日，中共中央致电表示嘉奖，同时，对下一步行动作出指示："似以全力（主力三个纵队不要分散，再加地方部队）向平津出击，截断杨村、黄村段，争取在大清河北歼灭援敌为有利；如援敌不好打时，则转向平保段出击。如此，可在平津、平保两线往来机动，寻歼敌之正规部队。"⑦晋察冀野战军鉴于平保线之敌较弱，遂于 25 日对保定北

 

部之国民党军发起攻击，保北战役开始，至28日战役结束，先后攻克徐水、固城等据点，歼灭国民党军7 000余人。青沧、保北战役，晋察冀军区部万队共歼灭保定绥署部队1.8余人，牵制了其拟增援东北的部队。

这两次战役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全胜主要原因是：从战役指挥上，集中兵力攻击国民党军薄弱部位，速战速决；灵活机动，有利则打，不利则另辟攻击目标，始终掌握作战的主动权；调动部队，夜行昼宿，严格保密，保持了战役的突然性；战役部署周密，每次攻击时均能分割包围，做到全部歼灭国民党军。在攻坚战术、技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6月29日，朱德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指出：在这两个战役中，“打堡垒及攻城的战术技术都有相当的提高。能步炮协同及善于使用炸药。”⑧

4月至6月，晋察冀军区部队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关于主动作战、集中兵力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地方进击等指示，英勇奋战，南下正太铁路沿线，东击青沧，再战保北，在华北大地上纵横驰骋，三战三捷，歼灭国民党军4.2万余人，以牢固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从根本上改变了军事形势，为转入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②③⑤⑦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第175页，第179页，第184页，第197页。

④聂荣臻、萧克：《关于按计划发动正太战役第二期作战向军委的报告》，1947年4月21日。

⑥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⑧《朱（德）对两战役的估计》，1947年6月29日。

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

经过1年多的作战，到1947年5月，东北地区的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这期间，东北国民党军被大量歼灭，兵力受到严重削弱。1947年春，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正规军有8个军23个师，连同非正规军在内，共约48万人。驻扎在中长路长春至沈阳、沈阳至大石桥段，沈吉路、沈安路、沈榆路沿线，以及赤峰、承德地区。企图巩固占领区和分割东北与冀东解放区的联系，但由于防区辽阔，兵力分散，而处于守势。当时，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已感到自己的机动兵力不足，并认为是东北国民党军的困难时期。机动兵力不足，必然导致军事形势出现被动局面。

而此时，东北保安司令部的绝大多数部队已遭受过严重的打击，新兵数量增多，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5月10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指出：东北保安司令部的"正规军，除13军之4师、新6军之22师比较完整外，其他在我不断打击下，均残破不堪；虽能有补充而质量、装备与士气已发生很大变化，战斗力严重下降。"①除此之外，东北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发展已开始停滞，人民群众生活十分贫困；加上东北国民党军胡作非为，征兵征粮，收编土匪和起用伪满警察，奸淫妇女，激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这些使东北国民党军的物资供应和兵员补充等都发生了严重困难。这对于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都有着严重的影响。

经过1年多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部队得到了很大发展。由于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大批经过改造的俘虏兵补入部队，加上1947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将冀察热辽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使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兵力迅速增加，到5月，已达46万余人。野战部队有5个纵队，15个主力师，9个独立师，4个旅，2个保安旅，共90个步兵主力团，9个骑兵团。各主力师员额充实，均在1万人左右。与此同时，东北民主联军也加强了野战军的炮兵建设，工兵亦开始建立。在这期间，部队也抓紧时间加强整训，在



东、西、南满已经站稳脚跟，在北满也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进一步加快土改，使得翻身农民踊跃参军，捍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巩固基层政权，这一切，都为解放军取得东北战场的胜利打下了牢固地基础。

总之，东北国民党军与东北民主联军双方的变化，尤其是军事力量的变化，已使东北军事形势发生了深刻改变。东北国民党军不得不放弃进攻转入防御，而东北民主联军由防御转为进攻的条件已日益成熟。

在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之后，东北国民党军被迫转入防御，企图控制战略要点，主要是吉林、长春、梅河口、清原、郑家屯等地，实施“机动防御”，确保尚存地区，继续分割东、西、南、北满和冀察热辽各解放区，待获得关内国民党军增援后，再相机发动局部进攻，继续实行其“先南后北”的计划。为实现这个企图，蒋介石曾亲飞沈阳，指导杜聿明布防。杜聿明重新调整了部署：新一军守备长春、吉林及德惠、怀德、农安、老爷岭等地，并凭借松花江，防阻北满东北民主联军部队南下；第七十一军及第十三军第五十四师一部，守备四平、公主岭、郑家屯、昌图、清原、辽源，控制中长铁路长沈段，并依托西辽河，保障中长铁路左翼安全；第六十军及第十三军第五十四师一部，守备烟筒山、梅河口、盘山、海城，控制沈吉铁路北段，保障中长铁路右翼安全；第五十二军守备安东、通化，控制安沈铁路及其两侧地区；新六军第二百零七师守备沈阳、抚顺，第二十二师和第十四师在新宾和凤城地区执行机动任务；第九十三军暂十八、暂二十二师守备阜新、赤峰、锦州，其暂二十师在沈吉铁路之清原；第十三军第四师守备承德、隆化，由于占领地区广大，兵力分散，机动兵力不足，中长铁路长沈段两侧守备兵力更为薄弱。

为彻底粉碎东北国民党军“先南后北”的企图，扭转东北战局，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后期，东北民主联军即初步确定了作战方针：待松花江解冻后，以北满主力南下，与南满主力会合，依托东、西、南满解放区作战，大量歼灭敌人，打通南、北满的联系。

4 月 8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拟定了夏季攻势作战计划：趁国民党军兵力分散，机动兵力不足，关内援军未到；东北江河溶冰、土地翻浆季节已过，便于东北民主联军行动之际，将南满作为战役主攻方向，把主要力量使用于南满，以北满主力 8 个师及 2 个炮兵团南下，在东、西、南满及冀察热辽部队协同下，从不同的方向，首先向东北国民党军防御比较薄弱的长沈路中段展开进攻，以打通南、北满的联系，并将南、北满主力两个拳头形成一个大

拳头，放手歼灭分散孤立之国民党军，收复小城市和广大乡村，结束东北解放区被分割的形势，而后再集中更大兵力，歼灭比较集中强大之国民党军，相机攻取中等以上城市，以彻底改变东北战局。4 月 14 日，中央军委批准了东北局的主力出击南满的作战计划，随后，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对发动夏季攻势进行了深入动员。阐述了战役目的、方针、任务、政治工作，以及发动此战的有利条件。并且在物资准备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为夏季攻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夏季攻势于 5 月份开始，分为两个阶段：从 1947 年 5 月中旬至 6 月 3 日为第一阶段，主要目标是对国民党军薄弱地区实行突击，歼灭分散孤立之敌，收复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在这一阶段，东北民主联军集中 28 个师和四个炮兵团，以北满和南满部队担任主要攻击任务。在西满、东满以及冀热辽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分别开展进攻。

民主联军北满两个纵队及两个独立师，南渡松花江，远距离奔袭中长路长春、四平段两侧地区。5 月 17 日攻克怀德城。18 日，在怀德城南歼灭四平街方向来援之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的第八十八师和第九十一师大部。然后，民主联军主力向辽河以南发展攻势，迅速控制了怀德至开原间的广大地区，孤立了四平街守敌。与此同时，在南满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南满第三纵队与第四纵队一部，先后向沈吉路中段、四（平）梅（河口）路东段攻击，攻占草市、山镇城、东丰、梅河口等镇，歼灭国民党军第六十军的第一百八十四师等部，与北满民主联军会师于四平街以南地区。在辽南、辽东地区活动的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主力和南满独立师，先后攻克通化、安东、庄河。西满辽吉军区部队向郑家屯地区进攻，至 5 月 17 日，攻克玻璃山、双山和康平，歼灭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的第八十七师一部。在东满，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和 3 个独立师，向拉（法）吉（林）路、沈吉路北段攻击，先后攻克天岗、江密峰、乌拉街、双阳、烟筒山、桦甸、海龙和磐石等城镇，歼敌第六十军的暂编第二十一师等部。

夏季攻势第一阶段经过 20 天左右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歼灭了大量分散守备小城市和重要村镇的国民党军，隔断了各大城市国民党军的联系，解放了广大地区。遭受重大打击的东北国民党军，纷纷自分散孤立的据点撤退，集中兵力进行重点守备，力求巩固中长铁路和北宁铁路沿线的较大战略要点，等待援兵，伺机反攻。东北民主联军抓紧战役间隙进行整训，总结第一阶段作战的经验，利用国民党军遗留下的工事进行了攻坚战术演练，提高



了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同时，开展了阶级教育和立功运动，提高了指战员的政治觉悟，为进行更大规模的攻坚战及运动战做了充分的准备。20 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高岗，祝贺他们歼灭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主力及其他各线的胜利。并且就东北民主联军夏秋季和冬春季的作战任务做了指示："目前你们以八个师南进，希望能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于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十三军、九十二军等部，发动群众，扩大军队。该两区共有人口一千五百万，为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沈平津四城必不可少之条件。"②

为继续扩大战果，"东总"于 6 月上旬决定，抓紧关内国民党援军尚未到达东北的有利时机，举行夏季攻势第二阶段作战，向孤立于中长铁路中段的四平城发起进攻。

四平位于长春、沈阳之间，在中长铁路与郑梅铁路之交会点上，是东北中部重要交通枢纽、战略要地。东北民主联军如能占领此地，将陷长春、吉林于更加孤立的境地。因此，它是东北保安司令部要确保之地。从 5 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军逐步增加防御工事，最终形成了半永久性筑城体系。

东北民主联军根据当时所获敌人情报，最终决定：首先歼灭铁路以西之国民党军，而后再歼灭路东之国民党军。6 月 11 日，东北民主联军各部开始扫清四平外围的作战。14 日，东北民主联军向四平城发起了总攻，集中 7 个师的兵力围攻国民党军战略要地四平街，以 17 个师位于四平街南北地区，担任阻援、打援。由于对四平街守敌估计不足，没有集中主要兵力攻城，至 6 月 20 日，仅占四平城的西半部。这时，沈阳、长春之国民党军 10 个师，采取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法，从南北两个方向向四平街进逼。对此，民主联军以一部分兵力继续佯攻四平城，集中 9 个师迎击沈阳北援之敌。因国民党军队形密集，无机可乘，歼灭其 1 个团之后，即停止战役，撤出战斗。四平街未能攻克，反攻第二阶段结束。

在四平攻坚战期间，其他地区的东北民主联军积极配合主力作战，取得了较大胜利。辽南地区的东北民主联军部队积极向国民党军进攻，收复了复县，再度攻克大石桥，并歼灭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师 2 200 余人。热河地区的东北民主联军部队，收复叶柏寿、朝阳城，再度攻克凌源，歼灭国民党军 4 000 余人，使热中、热南、热东解放区连成一片，并切断了锦承铁路。冀东地区的东北民主联军，收复了遵化、平谷、蓟县、三河。另外，晋察冀军区野战军于 6 月中、下旬，连续组织了青沧战役和保北战役，给了东北民主

联军的夏季攻势作战以有力配合。

在此期间，东北解放区的人民群众积极支援东北民主联军作战，为战争的进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战役期间，仅合江、嫩江和辽北3省就派出随军民工2.9万人、大车292辆、担架3 463副，担负起了武器、弹药、粮草和伤员的前送和后运任务。他们共运送粮食21.5万公斤，马草1.1万公斤。向前郭旗、开通地区后运伤员9 048人。战区附近地区的人民政府还派出临时民工，在康平、三江口、怀德地区修桥梁10座、道路202公里，保证了东北夏季攻势的胜利。

东北民主联军历时50天的夏季攻势，共歼敌正规军4个师及非正规部队，共约80 000余人，攻克城镇36座。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使东、西、南、北满和冀察热辽解放区连成一片，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继续分割东北解放区和各个击破东北民主联军的计划，并将东北国民党军压缩在中长铁路和北宁铁路两侧走廊地带，改变了东北的战局。同时，吸引了关内国民党第五十三军等部增援东北，配合了关内解放军的作战。

夏季攻势，在战役组织指挥上是有许多经验教训的。其中，四平攻坚战历时15天，东北民主联军以付出1.3万余人伤亡的沉重代价仅歼灭国民党军1.7万余人，并未能攻克四平城，主要教训是：对守城国民党军的实力侦察不够准确，使攻城兵力没有形成绝对优势；轻敌急躁，尚未肃清外围据点之敌，就仓促对四平城发起总攻；未能使国民党军腹背受敌，以及未能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对付国民党军航空兵和物资保障不充分等，这些都说明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攻城战的过程中并没有做好准备工作，没有清楚的了解国民党军的情况，导致最后出现许多问题，使得四平攻坚战最终失败。

注释：

①《东总关于对东北敌军情况的分析致各部电》，1947年5月10日。

②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3］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册）。

［4］《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5］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6］聂荣臻、萧克：《关于按计划发动正太战役第二期作战向军委的报告》1947年4月21日。

［7］《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8］《朱（德）对两战役的估计》，1947年6月29日。

［9］《解放战争战略防御》，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10］《新式整军运动》，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1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12］［美］K. W. 瑞阿、C. C布留尔合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的报告，1946—1949》，1981年版。

［13］《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译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14］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国共关系全面破裂

1946年底，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进行自卫战争，以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但是此时国共双方的谈判仍在继续。这个阶段谈判的特点，是以美国总统特使陆军上将马歇尔从中穿针引线，进行协调，实际上实行偏袒国民党一方的政策。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后，在美国的斡旋下，表面上仍在同中共进行谈判。国民党企图利用谈判掩盖其军事进攻，并在谈判中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迫使中共停止谈判，以便把分裂和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共方面；针对美国和蒋介石政府的态度，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以后局面是边打边谈，我们须准备应付此种局面。"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代表则继续留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继续进行维护政协协议的斗争，并用事实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使广大人民了解内战发生的真相。[①]中共中央还致信新华社代社长余光生："从现时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因蒋口头说停战，实际在作战，我应发表新闻予以揭穿。"[②]

全面内战爆发的第三天，即6月28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同马歇尔会谈时指出，6月26日国民党方面开始进攻，迫使我们起而自卫。如果蒋介石愿意和平处理，应立即电令停止进攻。并批评了国民党的进攻违反了政协协议。而且指出中共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7月2日，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谈时，蒋介石提出无理要求：要求中共让出安东、胶济线、苏北、承德、察哈尔省张家口以南地区，由国民党军进驻。周恩来予以拒绝，并提出：军事上由三人会议[③]迅速解决停战问题。行政问题，应召开政协会议，改组政府以后解决。这次会谈的唯一成果是蒋介石同意成立一个五人特别小组讨论地方政府问题。从7月3日到10日，五人会议召开，先后进行了五次会谈，内容以先停战还是先解决中共军队和交出地方政权为主，但最终由于国共双方



争执不下，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中央面对如此情况，7 月 9 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称，目前边打边谈，以打为主的局面还会继续一个时期，因此各地应充分注意粉碎蒋军的进攻。

军事方面的停战尚未解决，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的行径又接踵而至。按照政协协议，必须先改组政府，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然后由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主持召开国民大会。但是，在政府未改组的情况下，7 月 3 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第 197 次会议就单方面做出决定，宣布“于本年（指 1946 年）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这一决定遭到了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一致反对，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在同国民党代表会谈时，对于国民党这种破坏政协协议的做法提出抗议，要求召集政协综合小组商讨此事，但遭到了国民党方面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代表和民盟等声明拒绝参加国民党单独召开的“国民大会”，而且拒绝承认“国民大会”通过的一切决议。

在国共会谈停顿期间，由马歇尔从中沟通双方的情况和意见。马歇尔多次与周恩来和蒋介石会谈。但是由于蒋介石自恃武器精良，自信有能力消灭共产党，丝毫不接受中共的建议，最终谈判仍然无法进行下去。

进入 8 月份，中国内战的局势更加严峻。马歇尔和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决定将调处的重心从军事停战转向尽快组织国民政府委员会。当时国民党在军事上占据优势地位，讨论政府改组问题，只会给国民党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因此蒋介石同意建立一个 5 人小组，国共双方代表各两名，司徒雷登任小组主席。当时国共双方正在苏北和山东激战，蒋介石自恃军队力量强大，踌躇满志，认为可以就此机会压中共妥协，于是提出五项无理要求：“苏北共军应撤至陇海铁路以北；共军应自胶济铁路撤退；共军应自承德及热河省承德以南的地区内撤出；共军应退出东北的两个半省内（新黑龙江、嫩江和兴安省）；共军应撤离在山西和山东两省内于 6 月 7 日以后所占领的地区”。并称这 5 项条件要在一个月至六个星期内实行，否则停战和改组政府都无从谈起。最终遭到了中共代表的拒绝。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企图诱使中共代表接受蒋介石的这 5 个要求，然后再召开会议改组政府，对此，周恩来严词拒绝，并指出美国这样帮助蒋介石必然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在这种情况下，8 月 10 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承认“调处”失败，并以中间的调和口吻说，“国共双方领袖虽极愿制止冲突，但有若干问题需立即解决着，尚未成立协议。”在他们看来，“调处”失败后，国共双方只

能是在战场上决胜负了。13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声明，坚持国民党政府将“如期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当局敢于撕毁政协协议，不顾停战协定的约束，坚持内战方针，是同美国政府的纵容、支持分不开的。美国政府给予了蒋介石大量的财政、军火和物资援助，同时借用“调处”给以政治上的支持，压制中共。对此，中共方面多次提出抗议，指责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集团进行内战，同时，揭露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真相，以及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事实，使得广大人民能够清楚的看清形势。

就国共谈判的状况，中共代表团及时电告中共中央，称：“蒋为大打，必先多方要求，而美亦有可能放手让蒋大打一阵再谈。如此，我必须一面在准备全面大打的基础上，打两三个月再谈；也可能谈不成，而全面大打下去。”随后，周恩来和马歇尔再次接触，严重申明：蒋介石的五个条件是内战独裁路线，停战就现在停，否则必将大打。但是国民党不顾中国的抗日，于第二日（16 日）公布了《新兵役法草案》，决定实行在全国普遍征兵。而且蒋介石不接受中共的建议，认为没有必要发布停战令，现在所需要的是中共停战。会谈仍处于僵持状态，没有丝毫进展。这时，国民党为了吸收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中的人过来，假意实行改组政府。就改组政府的相关事宜，周恩来同司徒雷登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会晤，会谈的主要内容为停战和改组政府，但是经过中共的一再让步，国民政府仍然不能明确的答应改组国民政府后立即宣布停战，使得谈判无果而终。国民党既然已经下定决心扩大内战，8 月 31 日，国民党政府参谋总长陈诚下令，限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在本月底撤销。因此，朱德总司令电令该办事处所有人员撤返延安。

进入九月份，局势开始急剧恶化。9 月 10 日，蒋介石手令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和第十一和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署向中共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进攻。对此，中共代表团分别致函马歇尔和孙科，严正声明：“如果国民党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地放弃了政治解决方针；其因此所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④蒋介石对于中共的这些抗议都置若罔闻。提出了所谓的“最大限度的让步”两条，逼迫中共作出让步，为国民党集结进攻张家口的部队赢得时间，10 天之后蒋介石攻下了张家口。

攻下张家口之后，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蒋介石，不顾中共方面和各界人士的反对，于当天（1946 年 10 月 12 日）下午宣布于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1946 年 11 月 15 日～12 月 25 日在没有中共代表和民盟、民主



建设会等民主党派参加的情况下，召开了由其一手操办的“国民大会”，除了国民党外，参加的就只有依附于国民党的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和国民党。这次大会被称之为“伪国民大会”。会上主要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以国家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共代表和民盟、民主建设会等民主党派都发表声明，不承认这次“国民大会”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华民国宪法》。并对蒋介石的骗局进行了充分的揭露。

1947 年 1 月 29 日，美国驻华使馆发表声明，宣布美方退出军事三人小组及军事调处执行部。30 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2 月 3 日，美国驻延安联络团人员撤离延安。2 月 21 日，国民党政府逼迫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及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北平。随后，国民党当局限令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的工作人员于3 月 5 日前全部撤退。2 月 28 日，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查封了《新华日报》馆，并拘禁报馆人员。国民党以这种行动，表示他们关死了和谈的大门。

1947 年 3 月 3 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对国民党当局强迫驻南京、上海、重庆中共代表撤退发表声明，声明回顾了中共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平、民主，在历次谈判中仁至义尽的做法，揭露了国民党强迫中共在各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部代表与工作人员限期撤退，最后关死了一切和平谈判之门，是“妄图内战到底，实现其武力消灭中共及全国民主势力的阴谋”。声明最后严正指出：“蒋介石这一荒谬步骤，如不立即改变和放弃，那真是他自己走到了绝路，一切后果应由他负责。”⑤3 月 5 日左右，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机关全部工作人员撤回延安。董必武在南京上飞机前向送别的朋友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

3 月 15 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宣告同中国共产党关系彻底决裂，要同中国共产党决战到底。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对中共“政治解决的途径已经绝望”，政府“不能坐视变乱而不加制止”。⑥会议宣布声称：“国民政府对此武装暴力集团之军事叛乱自不能不采取坚决迅速之措施，而予以遏止。”⑦3 月 20 日，陈诚在记者招待会上扬言：“政府用兵之目的在于平定叛乱，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⑧6 月 25 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下令“通缉”毛泽东。7 月 18 日，中共参政员被除名，中共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也被取消。至此，国共关系终于完全破裂。

国民党当局彻底断绝国共谈判这一事实表明，它已经自绝于人民。全国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逐步看清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本

质。1947年4月18日，国民党宣布“改组国民政府”，广大人民立即识破了这个骗局。国民党的民主派、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拒绝参加“改组”的政府，拒绝同国民党反动派合作。国民党反动派已经众叛亲离，日益被孤立。中国人民把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希望，越来越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注释：

①②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③三人会议：是指1946年1月，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马歇尔参加组成的停战机构，马歇尔任主席。

④《周恩来1946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54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415页。

⑥⑧《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088页，第1093页。

⑦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册，第328页。



国统区的统治危机

全面内战爆发后的一年中，国民党政府军政费支出愈来愈大，虽横征暴敛，但仍入不敷出。1947 年，全年支出为法币 100 万亿元，但收入只有 13 万亿元．赤字竟高达支出总数的 90% 左右。这种巨额赤字主要靠印刷钞票来弥补。相继而来的是法币贬值和物价上涨。以抗日战争前的物价为标准，到 1947 年 7 月，上涨了 6 万倍，到同年底更涨到 145 000 倍。1947 年一年，物价普遍上涨 20 倍左右，有的更涨到 30 倍以上。1947 年一年内，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六次大涨风，使得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走投无路的人民群众只好铤而走险，反抗国民政府的统治。这使得国民党不仅面临着军事上的失败，同时在统治区内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官僚资本通过劫收敌伪全部的金融事业、商业、工业和农业，囊括了全国金融，独占了国内外的贸易，垄断了工业的一切部门以及大肆兼并了农民的土地，使得官僚资本发展到了顶峰，逐渐控制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命脉，使得民族工商业日益凋敝。

在金融方面，据中央银行统计，全国金融机构的 3/4 已被官僚资本控制，除官营银行外，所谓商营银行中，全由官僚资本所设立、或杂有官僚资本控制而被其控制者，又占多数，真正民营的银行，已寥寥无几。在商业方面，官僚资本所控制的“官”式商业机构及其直接经营的各种贸易公司，垄断了矿产资料、土特产品、手工艺品的对外输出和工业品、日用品等的对内输入，垄断了食盐、糖、棉纱、棉布等生活必需品的购销。这种“专卖”制度的实行，使得国统区内物价上涨，他们从中渔利。据说，单就布匹一项而论，只要有货就全部购入，用了区区十几万万的法币，完成了上海布匹价格抬高的工作。在工业方面，1947 年，官僚资本已占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 2/3，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 80%，操纵了国民经济命脉。在农业上面，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对人民土地实行大规模的军事性掠夺兼并。官僚资本对于各个方面的控制，使得民族工商业及金融业和农业都受到严重

摧残，整个国民经济处于严重萎缩状态。

中国经济走向崩溃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开始援助蒋介石打内战，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很快便“美国化”，美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更加速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破产。尤其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把美国取得的很多特权法律化。美国人在中国有经营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慈善事业和购置土地、房屋、产业等权利；美国商品输入中国和由中国运往美国的物品不受任何禁止和限制；美国船舶在中国开放的任何港口、地方都可自由航行。这其实就是“向美国全面开放”，这时的中国被美国独自霸占。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费开支猛增，造成整个财政入不敷出，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数额占到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而到 1947 年，国民党政府财政总收入约 14 万亿元（法币，下同），总支出为 43 万多亿元，财政赤字占总支出的近 70%。为了弥补这么大的财政赤字，蒋介石唯一采取的措施不是如何减少财政开支，却是大量发行纸币。当时，上海等地的印钞厂全力赶印仍不能满足供应，以至于要到美国、英国去印刷钞票。当时舆论嘲笑，在百业萧条中，中国唯一仍在全力开动的工业就是印刷钞票。法币的大量发行，使得纸币迅速贬值，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以抗战前夜为标准，日本投降前夜物价上涨 1 800 倍，而到 1947 年 7 月则上涨为 6 万倍。法币 100 元，在 1937 年能买两头牛，到 1947 年，却只能买 1/3 盒火柴。

经济危机的突出表现除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由于物价高涨和捐税繁重，民族工商业倒闭和工厂开工不足，时有所闻。据某些统计，1946 年下半年到 1947 年，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 20 多个城市，倒闭的工厂和商号达 27 000 多家。1947 年上海有的工厂的开工率仅为过去的 20%；华北经济中心天津市，1947 年有 95% 的工厂停工和半停工；1947，重庆参加全同工业协会重庆分会的 470 多家工厂停工达 66% 以上。这一年，国民党统治区原有的工业体系，80% 已告瓦解，生产大大下降，百业萧条。工商业的破产，城市经济的凋敝，直接加速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

经济危机还表现在农业方面。在农村，国民党统治区，农业生产力急剧下降，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全国内战爆发后，苛重的地租、田赋、捐税和各种摊派的剥削，使广大农民更加贫困化。一般自耕农，田赋、捐税的负担已



达其收获量的60%甚至90%。农民最低的生活难以维持，已无余力发展生产。此外，国民党征兵数目愈来愈大，强制抓丁，农村青壮年流失逃亡，劳动力严重不足，使得生产力受到了严重影响。1946年征兵50万人，1947年增至150万人，绥远省全省适龄壮丁20万人，1946年6月被征去35 000人，同年10月，又征11万人。农村劳动力减少，直接影响农业生产进行，许多耕地荒芜。1947年，江苏省的抛荒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3/5；安徽和湖南各占1/3；河南占1/4；广东高达3/4. 由于农作物产量减少，因此出现大量的粮荒，各地饥民达1亿人以上。国民党把人民推上饥饿和死亡的绝路，迫使人民起来为生存而斗争。

蒋介石自己也承认："现在我国经济状况，已届非常重要之时"，但他将经济危机的责任推给了中共，说："共党又乘复原时期，肆意骚扰，与日俱增""较之日寇侵占时期，更为彻底"。[①]中共对此给予了驳斥。1947年2月18日，《解放日报》社论指出："我们要问为什么在同一个中国，国民党区和解放区有如此天壤之别？答案很简单：只因为解放区比起国民党区来是没有了两样，和增多了一样。没有的是什么？一是美帝国主义，二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没有了这两样，却多了一个地方自治的民主联合政府，解放区各阶层的人民都参与这个联合政府，推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特别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这样，就什么财政危机、经济危机的之类的鬼怪，都摸不上解放区的门了。"[②]这段话指出了国民党统治危机的根源就是因为四大家族的垄断和美国的抢夺。

严重的经济危机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危机。国民党的总危机，最直接影响到的就是各阶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1946年下半年，仅北平、上海、南京三地，失业和无业的人数即达260万人。1946年，上海失业的产业工人共30万。公教人员也难以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广大农村更是饥民遍野。严重的经济危机，把各阶层人民逼到绝路上，这就迫使各阶层的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生存而战斗。

政治危机除了表现在各阶层人民生活困苦外，还表现在蒋介石镇压民主运动所制造的血案。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加进了对爱国民主力量的迫害和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先后在昆明暗杀了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8月18日，国民党特务捣毁

了成都各界人士举行的李公朴和闻一多追悼会会场，并在会后打伤民主同盟主席张澜。9 月 4 日，上海国民党军警非法搜查中共领导的《群众》周刊社，杂志被迫停刊。1946 年秋，国民党政府先后在西安、北平、天津、广州和昆明等地查封进步报刊 265 家。国民党特务还在许多城市随意搜查、逮捕所谓的“共党嫌疑分子”。国民党统治区成为特务横行的世界，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血的事实，揭穿了国民党的法西斯本质，也敲醒了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的人民。1946 年 7 月 22 日，宋庆龄对于国民党的暴政给予了严厉的谴责。并主张立即扑灭内战火焰，并断定国民党不能在内战中获胜。

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几个月内，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相勾结，为了消灭共产党，不惜牺牲中国的主权，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条约》，使得中国面向美国全部开放。广大民众越来越反感国民党政府的同时，也开始倾向于中共，希望中国共产党可以获得胜利，带领人民建立独立、民主的新中国。

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是蒋介石维持自己反动统治的两个主要工具，而前线军事上的失败和人民前仆后继的反抗已经表明国民党的军事镇压这一方式已经失败。1947 年 5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中说：“蒋介石军队在前线打败仗的消息传到后方的日益增多，被蒋介石反动政府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日益感觉自己的出头翻身有了希望。恰在这时，蒋介石的一切政治欺骗，由于蒋介石的迅速扮演而迅速破产。”③这里所提到的“迅速扮演”指的就是国民党一手操纵的“国民大会”的召开。1946 年底，国民党军占领了张家口之后，蒋介石不顾中共和各阶层人民的反对，依然召开了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伪国大闭幕后，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蒋记国民大会及其制定的宪法均属于非法，中共不予承认。接着，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先后声明不承认伪宪法。国民党原来是想通过这次会议的召开，使其独裁和卖国合法化，孤立共产党和打击民主力量，没想到蒋介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使得自己更加孤立，陷入到“人民的包围之中”。当他决定在 1947 年元旦公布“宪法”并命令一些地方举行“庆祝三十六年元旦暨制宪成功”的牌坊上写上了“宪法何用!”等字样。1947 年 4 月，国民党拉拢社会党、青年党“入阁”，“改组政府”，并宣称这个政府已经是“自由主义”和“多党”的了，



企图以此粉饰其独裁统治。5 月 20 日，蒋介石马上又召开了由其一手控制的“国民参政会”，就在会议召开的当天，京沪杭学生在南京举行了游行示威，并得到了各地学生、老师和广大市民的支持。对于学生的爱国运动，国民党当局给予了血腥的镇压，这样就使得其统治陷入到了空前孤立的状态。

蒋介石自恃自己军事力量强大，而对于中共和各民主力量的抗议不予理睬，尤其是对于共产党。他认为中共一定会输，最终强迫中国共产党驻在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的相关工作人员限期撤退，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关闭了和谈之门。蒋介石真内战的目的昭然若揭。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战卖国政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以及这个集团自身的贪污腐化和对人民的横征暴敛，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得自己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而危机的提议深化，又必然会引起各阶层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国民党统治区民怨沸腾，人民革命高潮正在兴起。最重要的是国统区人民的反抗加速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失败。

注释：

①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册），第 314 页，第 312 页。

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7 年版，第 1170 页。

蒋记“国民大会”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这使得蒋介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于当日下午便宣布要召开“国民大会”。早在1946年7月3日，国民党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97次会议上，置政协协议于不顾，擅自决定这年11月12日召开“国大”。占领张家口后，蒋介石正式决定“国大”如期举行。按照政协协议的规定：国民大会的召开，应该在政协各项决议付诸实施之后由改组后的政府负责召集，各党派共同参加，国大通过的宪法，应是协议审议后完成的草案，召开的日期亦由各方协商决定。国民党的这一决定显然是违反之前通过的政协协议的，一经公布，就遭到了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

中共为抵制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于10月18日，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声明中陈述了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为了争取和平、民主而做的八次让步，而事实证明了“蒋美两方所追求的，只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投降与消灭，只是蒋介石的卖国反动独裁”，他们所谓的“政治解决”只是在为了“军事行动”做掩护。鉴于此，中共中央表明：“今日一切会谈如欲有其真实结果，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协议的神圣效力，即承认恢复一月十三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的准则，承认实行政治一切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只要他们有这种最低限度的诚意，本党一定继续与他们通力合作”。①民盟主席张澜于10月14日发表讲话，指出：“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与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和利诱，绝不参加。”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和平奔走呼号，希望国共双方立即停火，改组政府，按照政协决议和已通过之程序，由改组后的国民政府讨论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希望蒋介石改弦易张。

蒋介石的一意孤行，使得第三方面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当局坚持独裁和内战的真面目。11月2日，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声明：



“现在国民党政府片面决定召开国大，不唯其代表系十年前国民党一党包办选出者，则其筹备事务亦属一党包办，完全违背政协关于国大问题决议之规定，应被认为非法（不合政协之法）集议，我们坚决反对。”11 月 4 日，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再次声明：召开“国大”是国民党政府违背政协协议及其程序的“一党行为”，是“毁法行为”，对此，“中共一概反对，一概拒绝参加”。11 月 10 日，重庆和平促进会、民主建国会重庆分会等 21 个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国民党包办的“国大”。11 月 12 日，周恩来会见第三方面人士、司徒雷登和马歇尔，再次向各方面表明了中共的严正立场。但是蒋介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议和第三方人士的建议置之不理，于 11 月 15 日在南京正式召开了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从 1946 年 11 月 15 日召开到 12 月 25 日结束。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中，国民党代表占 85%，剩下的就是依附于国民党的青年党、民社党和若干“社会贤达”。中共和民主同盟及许多正义人士均拒绝参加这次会议。11 月 15 日，于“国民大会”召开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南京中共代表团：“‘国大’已开会，除董（必武）及少数人留京外，周（恩来）及其余各人宜即回延。”[②]11 月 16 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招待记者，发表了书面声明。他声称：“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已于昨天开幕了，这一‘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③]并指出：“现在开幕的一党‘国大’，不但使中共及第三方面最近在商谈中的主张为不可能，而且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之路同时也很快彻底的揭穿了政府当局十一月八日‘停战令’的欺骗性。”和谈之门已经被蒋介石关闭，11 月 19 日，根据中央指示，周恩来便率领中共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 15 人离开南京返回延安，只留下董必武、吴玉章和部分机关工作人员继续在南京、上海和重庆坚持工作。民盟在 11 月 25 日的在京记者招待会上也声明：“民盟拒绝参加十一月十五日举行的国民大会，理由很简单：这次召集的国大违背了政协决议的整个精神，破坏了政协决议的程序，并且这次国大不是全国团结统一的制宪会议，这是举世共同承认的事实”[④]除此之外，许多海外华侨也坚决反对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和“宪法”。11 月 22 日，泰国华侨建国救乡联合会、职工总会、青年会、教育协会等 71 个华侨团体代表发表通电，坚决要求解散非法“国大”，表示决不承认一党“国大”的任何决议，誓与国内同胞团结一致，为真正的和平民主奋斗到底。

这次"国民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宪法，故又称"制宪国大"。经过41天的讨论，12月25日通过了一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随即会议结束。该宪法共14章175条，主要内容就是确定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使其合法化。宪法条文中虽然有关于保护人民自由、平等权利以及五院制等民主条款，总统为国家元首，统帅全国陆海空军，有发布紧急命令权等权力，蒋介石通过获得总统的职位，集军权、政权于一身，加强了其独裁统治。

《中华民国宪法》虽然在条文上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原则，但是它从根本上代表和维护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只能成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装饰品。并且，由于这部宪法是在"国大"召集者国民党撕毁政协协议并积极进行内战，而作为国内主要民主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又没有出席"国大"的情况下召开的，所以只能是有名无实。

《中华民国宪法》的通过，引起了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一致反对。1946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发言人评非法"国大"，声明中国人民决不承认蒋记伪宪。28日，《解放日报》社论指出"非由人民制定的宪法都得不到人民的承认；因而历次反动派的制宪，是成为他们恶贯满盈的信号，不但没有保障他们的统治；反而成为埋葬他们的棺材。因为他们的'制宪'，恰是他们在人民面前最后暴露了他们是窃国的大盗"[⑤]延安《解放日报》评论称："蒋记伪宪法的精髓和实质，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尽之：人民无权，独夫集权"。1947年1月1日，民盟对于伪宪发表声明，声明中指出："中国民主同盟站在维护政协的立场，拒绝参加此次国大，因此本同盟对今天公布的宪法愿留其接受的权利。"鉴于"宪法原则与内容"很多都违背了政协决议，已经失去了法律效力，与真正的民主也相距越来越远，"民盟站在争取中国真正民主的立场，愿保留接受此项宪法之权利。"呼吁全国人民共同坚决反对国民党一手炮制的"宪法"。1947年2月4日，民主建国会也指出"本会既拥护政协决议于前，自不能同意未依政协决议规定程序召开国大所通过之宪法于后"。[⑥]

对于"国民大会"的召开和《中华民国宪法》的通过国共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蒋介石认为这是一种胜利，通过此可使国民党政府取得民主的资格，以欺骗群众，巩固其独裁统治。他在日记中称，国民大会的召开，"实为革命史上最艰难之创举，与划时代之新页"；"共党一年来联合其他党派以孤立本党、围攻政府之阴谋，已被我完全击破"。[⑦]《解放日报》在评论蒋介石"国大"闭幕时，指出："蒋介石打出了最大的一张牌，但是他既不能



满足人民，又不能压倒对方，却只把弄假成真的国大再弄真成假。一切历史家都会看出，这乃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失败。”⑧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是对的。国民党召开的伪国大和通过的伪宪法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民盟，包括在上海的世界和平促进会上海分会、民主建国会、工商业协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九三学社、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等11个团体，一致决议坚决不承认“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强调：“什么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呀，什么改组一党政府为多党政府呀，其目的原是为着孤立中共和其他民主力量；结果却是相反，被孤立的不是中共，也不是任何民主力量，而是反动派自己。从此以后，中国人民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什么是蒋介石的国民大会，什么是蒋介石的宪法，什么是蒋介石的多党政府。在这以前，中国人民中的许多人，主要的是中间阶层的分子，对于蒋介石的这些手法是多少存了幻想的。对于蒋介石的所谓和谈也是这样。”⑨上述表明，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使自己处于更孤立的地位。

伪国大的召开和伪宪法的通过，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这一事件教育了广大的第三方面人士，蒋介石是要把独裁进行到底，和平、民主只是蒋介石的花言巧语。人民对于国民政府已不再信任，从此之后，蒋介石的统治威胁一落千丈，这进一步加深了国民政府的统治危机。

注释：

①②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143，149页。

③⑤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册），第230～234页），第237页。

④⑥⑧陈竹筠，陈起城选编：《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1页，第465页，第237页。

⑦转引自（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3070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170～1171页。

“一二·一”运动与第二条战线的酝酿

抗日战争胜利后，饱尝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渴望民主，切盼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国家。可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内战政策，极力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学生、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首先行动起来，掀起了一场反内战、争民主的群众运动。中共中央对于国统区内的学生运动以及整个人民运动非常重视，并且将国统区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称之为第二条战线。第二条战线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而“一二·一”运动为开辟这条战线吹响了第一声号角。

国共两党“双十协定”签订后，国民党背信弃义，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抗日时期就有“民主堡垒”之称的昆明，广大学生和爱国人士对时局极为关切。在中共向社会各界揭露了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事实之后，1945 年 11 月 19 日，重庆各界代表郭沫若等召开反内战大会，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以实际行动来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以及反对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为了响应反内战联合会所发起的运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云南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起，准备于 11 月 25 日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办时事晚会，讨论如何制止内战问题。当晚，云南省国民党党政军首长联席会议议决“一切集会或游行”非经核准“一律严于禁止”。[①]李宗黄还亲自前往云大命令校方不得出借校地供作会场。但即使这样，也不能阻止学生们的爱国行动。11 月 25 日，时事晚会在联大图书馆的草坪前如期举行，到会人数 6 000 余人，钱端升、费孝通、伍启元等教授在会上作了反内战讲演。晚会一开始，国民党军第五军邱清泉部和特务头子即对大会进行百般阻挠，在群众的坚持下，晚会最终坚持到底，并通过了反内战宣言和呼吁美国青年反对



美国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国民党企图禁阻到会群众返家失败，第二天则发布“昨夜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消息”，对师生竭尽诬蔑之事。

时事晚会事件暴露了国民党当局坚持内战政策的立场，这进一步激怒了广大人民群众。26 日，西南联大等 9 所大中学校的学生决定于 26 日罢课，要求国民党反动当局追究对晚会开枪的责任，公开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得再发生类似事件。接着 30 余所学校的 3 万学生响应罢课，并成立了昆明学生联合罢课委员会来领导罢课斗争。

为了压制学生的正义行动，国民党当局决定“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11 月 27 日，李宗黄召集各校负责人及警宪方面举行紧急会商，决定采取一系列迫害行动。29 日，关麟征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对学生进行恫吓，声称：“他们（学生）有开会的自由，我有放枪的自由”。[②]他们不仅直接命令各校克日交出所谓“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名单，还限定各校于 28 日复课。不仅如此，他们还指使或纵容武装暴徒到学校撕毁壁报，在街头行凶殴打学生。

面对反对派的恫吓和镇压措施，罢委会毫不畏惧，针锋相对的提出相应对策：“巩固阵营，团结同学，争取中间派，争取师生合作，扩大宣传，揭破阴谋，并准备在最低条件下复课”。随后，在29、30 日，学生组织了宣传队，走街窜巷，向市民宣传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及反内战、争民主的重要性。在遭到了暴徒的毒打之后，学生们不仅没有被吓到，反而更多的人参加了宣传队。这一短兵相接的战斗，使学生们受到了实际的锻炼和教育，为迎接下一阶段的斗争作了准备。

各种压迫措施的失败，使得国民党政府更加的疯狂，他们决定进一步采取暴力手段 ，把昆明的民主爱国力量镇压下去，因此 12 月 1 日怵目惊心的大惨剧就发生了。12 月 1 日，从上午 9 点到下午 4 点，大批的特务携带武器，向云大、中法、联大附中等 5 所大、中学校进发，捣毁校具，劫掠财物，殴打学生。进攻联大新校舍的暴徒还投掷了 1 枚手榴弹，导致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受重伤身亡；进攻联大师范学院的暴徒则投掷了 3 枚手榴弹，导致联大学生潘琰（女）、李鲁连和昆华工业学校学生张华昌身亡。总计当日死亡 4 人，受重伤者 11 人，轻伤者 14 人，教授马大猷、袁复礼等也被殴打。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广大学生群情激愤，社会各界也同情学生。据此，罢委会决定将反内战、争自由的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在斗争中，他

们注意将昆明惨案与揭露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联系到一起，提出了新的罢课宣言。宣言在要求条件方面增加了有关昆明惨案的部分。在罢委会的领导下，学生们深入工农市民中间，积极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宣传工作，并在联大设置灵堂，举行了4烈士的公祭。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纷纷去电声援昆明学生反内战的正义爱国行动，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坚持内战的政策和屠杀学生的暴行。

12月6日，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致电昆明学生誓作后盾。该联合会于当日上午举行第三次常务理事会，到会的常务理事有彭一湖、章乃器、曹孟君、罗隆基、郭沫若、沈钧儒、何公敢等10余人，由何公敢任主席，一致以该会名义致电慰问昆明各校为反对内战而遭枪击之学生，并汇去国币10万元以作死伤同学安埋及医药之费用。慰问电说：“乃我昆明各校师友竟以反内战而遭手榴弹与机关枪之突击，伤亡之众，牺牲之酷，视‘三・一八’惨案而过之。暴力专横，至于此极。国家前途，何堪设想！同人等休戚相关，誓作后盾，临电不胜悲愤之至。”③

成都学生团体及文化界集体声援昆明学生运动，呼吁全国同胞、同学，支援昆明学生运动，展开为人民、为国家的反内战斗争。他们指出：“目前在内战烟幕下，爱国运动受阻障不只是昆明，而且普遍全国。即使成都，便有人以种种的欺人惯伎和歪曲新闻报导，企图来迷住人民的眼睛……你们这次英勇而正确的行动，是揭破了烟幕的火把，是正在广泛展开中反内战的爱国运动第一声号令。”除此之外，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国立大学、遵义浙江大学都不同程度的支持和响应了昆明学生的爱国行动。

联大教授会议决定罢教一周以抗议反动当局的暴行，同时组织法律委员会，并与罢委会的控诉委员会合作，拟具了告状，向国民党的最高法院和军事委员会控告李宗黄、关麟征等人，并向报界声明了“一二・一”惨案的整个过程，揭露国民党的暴行。著名学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也致电昆明学生，表达了对于学生的同情之情。

《人民周报》、《大路周报》、《文化新报》、《民主周刊》、《昆明新报》、《时代评论》、《妇女旬刊》等进步报刊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一二・一”惨案的严重抗议》，指出：“昆明大中学生这一次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运动……我们完全赞同。”“我们特别对于西南联大在12月1日所发生的惨案，感到无限的悲愤和警惕。这一群纯洁爱国的青年，在争取祖国的和平民主的路程中，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而国家所给他们的答复不是奖励，



而是诬蔑，而是屠杀。军阀专制时代的残暴罪行，竟复见于今日，实属令人发指！”[④]

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也就昆明惨案发表谈话指出：“11 月 25 日，昆明各大中学校学生，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统一，在校内集会商讨。因受当地军警干涉，而引起罢课风潮，乃当局于事变发生以后，迄无妥善处置，演成 12 月 1 日之大流血案，死伤甚重。此在青年则遭受巨大之牺牲，在国家与政府则招致莫大之耻辱，吾人深引为痛惜。”发言人明确指出：“吾人为爱护国家与爱护青年起见，爰提出以下主张：一、请政府查明事实，追究责任，严惩肇事军政首长。二、请政府抚恤受害青年，赔偿损失。三、撤销特务，保障人民各项基本民主自由。四、对以后青年爱国运动毋再听任军警干涉，致生不幸事件。”[⑤]同一时期，三民主义通知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和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等人民团体以及各界知名人士都发表声明和函电，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

在学生的爱国斗争以及全国人民的声讨下，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陷于极端孤立的状态。为此，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把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停职”，“听候议处”，“其警备总司令职务，令派霍揆彰暂行代理”。而对云南省代主席李宗黄也只好去见云南省主席卢汉办理移交手续。学生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这时，由于解放区军民自卫还击战斗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蒋介石感到内战部署尚未就绪，于是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对学生运动，也由之前的高压政策改为公开让步、暗里分化的政策。一方面对关麟征、李宗黄作出处理，答应赔偿公私损失，抚恤死者等；另一方面又要求学生停止一切校外活动。面对这种情况，罢委会决定，为了粉碎反动派的阴谋，争取中间群众，以巩固胜利，扩大战果，准备在适当的条件下，组织群众有秩序的复课，以便转入长期斗争。但是，为了显示群众的力量，打击反动派的气焰，罢委会组织了 12 月 16 日的反内战座谈会，会上一致决定坚持罢课，会后还举行了校内游行。由于国民党当局无法实现其破坏学运的阴谋，遂于 12 月 24 日，全部接受了学生所提的复课条件。27 日，昆明 30 000 余名学生有秩序地正式宣告复课。复课之后，斗争并没有真正的结束。党组织和民青认真地总结了前一阶段的斗争经验，注意在反内战、争民主的目标下把广大青年进一步组织起来，同时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党和民青，充实学生的领导机构；注意引导学生认清目标，防止运动高潮过

后陷入低谷。在此期间，学生们举办了各种晚会及讲演会，积极做好“一二·一”运动的善后工作。3 月 17 日，昆明 30 000 余人，参加了“一二·一惨案”4 烈士的殡仪活动，至此，“一二·一”运动宣告胜利结束。

毛泽东对昆明“一二·一”民主运动给予很高的评价。毛泽东说：“目前我党一方面坚持解放区自治自卫立场，坚决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巩固解放区人民已得的果实；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⑥

这次学生运动之所以获得成功，除了学生坚韧的斗争精神和全国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外，中共的正确领导和斗争期间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的灵活有效的斗争方式也是取得斗争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当国民党被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对于学生采取公开让步、暗里分化的政策时，罢委会就改变了斗争的方式，转为在适当的时间有秩序的复课。这样不仅可以使自己的损失减到最小，同时也可以更有效的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更好的孤立国民党政府，以达到罢课的目的。

围绕着昆明“一二·一”惨案掀起的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的爱国运动，是中国青年继“五四”和“一二·九”运动后，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国家独立、自由、人民民主而进行的又一次英勇斗争。它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声号角，冲破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沉寂，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经过这次运动，人们更加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要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的一党独裁。

“一二·一”运动是在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广大人民要和平民主同国民党蒋介石坚持其内战独裁这样两种命运和两个前途之间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在这场斗争中，共产党员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们英勇顽强，毫不畏惧。烈士潘琰、于再就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和民青的组织有很大发展，培养了大批骨干。

这次反内战运动动员了群众，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一二·一”运动得到全国各地一致声援，延安、重庆、上海、桂林等城市举行群众大会，愤怒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爱国师生的法西斯罪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要战争不要和平，要独裁不要民主的丑恶嘴脸，为今后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的斗争，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铺设了道路。

注释：

①昆明：《中央日报》，1945 年 11 月 25 日。

②③《新华日报》，1945 年 12 月 7 日。

④胡庆云：《解放大学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37 页。

⑤《民主星期刊》第 11 期，1945 年 12 月 18 日。

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121 页。

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与第二条战线的初步形成

第二条战线的形成，是以1946年底、1947年初由北平学生首先发动，以席卷全国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运动为标志的。

蒋介石一直都把中国共产党看成是“眼中钉”，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就积极的开始准备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蒋介石为了筹措内战经费，除了榨取民脂民膏外，还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美国政府的援助。从日本投降到1946年10月，蒋介石为获取美国政府数十亿美元的物资和贷款“援助”，先后与美帝国主义签订了《在华空中摄影协议》、《美棉货款合同》、《铁道购料借款合约》、《关于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之协定》、《军警联合勤务议定书》等一系列协议、协定、合同、合约，使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了领空权、领海权、铁路投资权以及领事裁判权等。尤其是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条约》，几乎向美帝国主义出卖了中国所有的主权。

由于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使得美国商品大量侵入中国，驻华美军还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欺压中国人民，犯下累累罪行。美军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的极大反感。因此，广大人民纷纷起来，投入到反对美国援蒋，反对蒋介石卖国、独裁、发动全面内战的斗争中。一个以反对美蒋为中心的人民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迅速兴起。正在此时，发生了“沈崇事件”，立即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

1946年12月24日晚，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去看电影时，走到东单胡同口，被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皮尔逊等两人，架至东单操场强奸。此消息由上海《联合晚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刘时平首先披露。事件发生后，北京市警察局长急令北平报刊不得转发消息，以事封锁；威胁被害人“不准声张”，当晚却向美军赠送圣诞礼物。消息走漏之后，国民党报纸就极尽诬蔑、歪曲事实：“沈崇似非良家女子”。面对美军暴行和国民党的卑劣行



径，北平和各地学生义愤填膺。12 月 26 日，北京大学沙滩大操场墙壁上贴满抗议标语。当晚，北大成立了“北京大学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通过了《告全国同胞书》、《告全国同学书》和《告美国人民书》；并提出要求驻华美军当局道歉，保证不会再有非法事情发生，并且立即退出中国。随后由中共上海中央局钱瑛直接领导的北平学委（南系）与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刘仁等领导的北平学委（北系）紧密配合，并肩作战，发动和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12 月 30 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等校学生举行了抗议美军的万人游行。他们冲破了警卫的封锁，高喊着“抗议美军暴行！”“严惩肇事美军！”“美军退出中国！”“美国立即改变对华政策！”“维护主权独立！”等口号，由皇城根经东华门大街到王府井大街，到驻有美军的“军事调处执行部”门前示威，还到了肇事地点，在那里举行了群众大会，控诉了美军的罪行，揭露了那些卑躬屈膝的人，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由于学生们喊出了郁积在人民心中的悲愤，游行队伍经过时，“市民群众、商人、国军拥挤围观，途为之塞”。他们热情地向学生打招呼，许多年轻店员、公务员还亲自参加了示威游行，甚至一些国民党军人也跟着学生高呼口号。同日，北大沈从文、闻家驷、朱光潜等 48 名教授，联名致书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称：“吾等忝为某女士之教师，闻悉此暴行，尤深悲愤”。强烈要求美方“对于犯罪之士兵，迅绳以法”，并“保证此后绝不再有此类事情在中国任何地方发生。”[①]

这次游行使整个北平在沸腾，市民从家里走出来，向游行队伍招手，60 岁的老大爷跟着学生喊口号，小学生跑进游行队里跟着唱歌，许多店员、机关职员都偷偷跑出来，奔向游行队伍，和学生并肩前进。连反动政府的警察，也有的噙着眼泪反复地说：“好极了，好极了！”一个国民党士兵愤慨地说“：妈的，打了八年仗，打退了东洋鬼子，又换来了西洋鬼子。”[②]

这次声势浩大的游行，威慑了美蒋反动派，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尽量避免与群众发生正面冲突的对策，以致国民党励志社北平分社在学生游行的这天清晨，就把城内的美军用卡车运到颐和园，直到晚间游行结束后才返回。

北平学生运动发生后，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各大城市地下党组织积极动员群众，发动游行示威，以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彻底揭露国民党的卖国和内战面目，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响应和支援北平学生的斗争。中共中央提出明确的斗争政策和策略，要求把斗争提高到促进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助长内战，以及废除

《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的口号上去。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学生响应北平学生的反美爱国斗争，形成了一个席卷全国的反对驻华美军暴行和“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从 1947 年 1 月 1 开始，首先响应的是天津的学生，随后上海、南京、杭州、武汉、开封、青岛、广州、福州、桂林、重庆、昆明、台北等地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运动。他们通过请愿、示威的方式要求严惩肇事美军以及美军立即退出中国。从 12 月 30 日北平学生兴起抗议美军暴行开始，到 1947 年 1 月 10 日这 12 天时间内，抗暴斗争就普及到了 14 个省 26 个城市，其中 18 个城市发生了罢课、游行。全国学生参加这一斗争的总人数达 50 万人以上。工人市民参加的也很多，其规模超过了“一二·九”抗日民主运动。

对于这次抗暴运动，中共中央在 1947 年 1 月 6 日对地下党组织作出指示，指出：“此次平津京沪学生的反美示威，成绩甚好，影响甚大。”“我党在蒋管区的工作，应尽量利用这次运动的成果，扩大民族爱国主义的宣传与活动。”“经过学生活动和报章揭露，要将这些宣传深入到工人、店员、妇女、城市贫民、工商业家、自由职业者乃至华侨中去，引起他们的响应，以扩大这一运动。[③]

学生的抗暴运动，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开明绅士、工商业人士和海外华侨等都给以有力的声援。

各民主党派为了支持抗暴斗争，义正辞严地谴责美蒋反动派，指出：美军的暴行绝不是普通的强奸事件，也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帝国主义者蹂躏殖民地人民的行为，除非我们甘愿做亡国奴，决不能忍受此种侮辱国格之行动！这绝不是赔偿道歉所能卸责。倘美军一日不离开中国，则此种暴行就一日不能终止。民盟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发表《抗议美军暴行》的声明，民盟北平市支部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民盟重庆市支部与重庆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各个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强烈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并组织沈案后援会。民盟港九支部，发动港九学生，出版了《学生界》，抗议美军驻华。

上海各界的知名人士史良、沈钧儒、廖梦醒、许广平、田汉、吴祖光、胡风等，分别参加签名运动，向美蒋反动派提出抗议。郭沫若为了进行反美宣传，于 1 月 2 日，抱病参加上海生活教育社等团体组织的迎接民主年的盛会，他对“当前文运的路”，提出了“二反二迎三向三不”的主张，即“二



反——反帝反封建，二迎——迎民主迎科学，三向——向人民学习，向进步国际文化学习，向进步人士学习，三不——不读坏报，不受威胁利诱，不怕死"[④]，以勉励大家向陶行知、闻一多、李公朴学习，继续五四运动未走完的道路。

港九名流、学者、作家、工人领袖及各行各业人员彭泽民、何香凝、张文、李杜、方方、陈其瑗等百余人，通电全国各大中小学全体同学，声援抗暴义举，号召海外同胞一致行动，还致电美英民主人士与和平团体，吁请共同"反对最近美军强奸北大女生的暴行，要求撤退驻华美军"。

为了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重庆工商界倡导抵制美国货、用国货运动。上海民众自救会发起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运动。工人罢工，农民抗丁抗税，教员罢教，斗争如火如荼。

在解放区，延安市参议员、开明士绅、工商界代表等于1947年1月13日下午，举行座谈，声援国统区的学生爱国运动。中国劳动协会发表声明，指出："本会特向中国全体工人并代表中国工人向美国工人弟兄呼吁：以共同的力量要求修正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切实执行帮助中国停止内战，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不干涉中国内政。"[⑤]

海外华侨领袖陈嘉庚，也发动他所主持的新加坡华侨促进中国和平民主协会，举行美军退出中国的活动，并以10万人签名的函件致杜鲁门，要求撤退驻华美军。1月6日，陈嘉庚又致电香港、南京、重庆、北平、天津、延安各报，提出"凡属中国同胞，均应支持学生运动"。[⑥]

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不仅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支持和同情。美国《密勒氏评论报》记者 Charles J · Canning 亲身参加了这次抗暴游行示威，他对这次运动作了详细报道和分析。尽管他是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观察问题，但他承认了激起这次学生运动的根源是错误的美国对华政策所引起的。他认为，"所有这些都与美国对华政策和美军之继续驻华有密切关系，只有当我们思考到它的政治的社会的背景时，我们方可能对于这种反美游行在全国的突然起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把反美罢课和游行归罪于共党，简直是对共党的一个太大的恭维。"他最后认为："目前这种反美运动……有其深刻的政治的社会的背景。北平的强奸案只不过是落进火药库里去的一根燃着的火柴而已。"

在学生不屈不挠的斗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抗议下，罪犯皮尔逊被判15年的有期徒刑，美国政府被迫宣布陆续撤退其驻北平、天津、青岛等地的美军，减少甚至一度中断了对蒋介石政府的军事援助，抗暴运动取得了重

大的胜利。抗暴斗争后，北平地下党组织及时地总结经验，推动了各校学生运动的深入发展。不久，北京大学通过民主选举成立了文学院学生自治会；接着，又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北大院系联合会，成为我党领导学生运动的合法机构。各校的地下党组织和民青组织都有了发展。北系党组织仿照南系建立民青的办法，建立了党的外围青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各校进步社团犹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壮大，把更多的同学团结在党的周围。地下党抓住这有利形势，更深入、更细致、更艰苦地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依靠党员、盟员和进步同学，团结广大中间同学，教育后进同学，孤立反动分子。这些工作，就像涓涓细流汇成大海一样，汇入新的斗争高潮——五月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以抗议美军暴行为主的声势浩大的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兴起，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区战场的作战。与此同时，这次抗暴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团结抗暴的巨大力量，揭露了美国伪善的面孔，暴露了蒋介石集团的奴颜卑膝；教育了全国人民，鼓舞了斗志，培养了大批爱国积极分子；抗暴运动在国统区掀起了一次空前的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新高潮。以此为标志，以学生群众为先锋的爱国民主力量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这条战线的发展将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深深地陷于革命力量两面夹击的不利境地而无法自拔。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会议上，也指出："去年（指 1946 年）十二月三十日因美军强奸中国学生而引起的北平学生运动，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涨。""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⑦

注释：

①西北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民主党派史资料选辑》，第 502～503 页。

②《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1919—1949），北京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01 页。

③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59 页。

④⑥《时代日报》1947 年 1 月 3 日。

⑤《解放日报》1947 年 1 月 6 日。

⑦《毛泽东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7 年版，第 1156 页。



蒋管区人民反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的方针，搜刮民脂民膏，致使经济发生严重危机，造成老百姓日益贫困化，从而引发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加深了国统区的政治危机。国统区的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有铤而走险，以抗争来寻求出路。相继出现了上海摊贩斗争和各地的抢米风潮，以及农村的民变运动。

由于国民党对经济的垄断政策，使得许多中小商人破产。那些破产、半破产的中小商人、城市贫民、失业与半失业的工人、小职员和店员等，为生活所迫，只好靠在街头摆摊谋生。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摊贩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到 1946 年底，仅上海的摊贩就达到 10 万余人。

他们贩卖的东西主要是走私美货、粮食、贪官污吏盗卖的“接收物资”、破产商店的存货和贫困家庭出售的旧货等。由于人民的贫困化，许多人无力到大公司、大商店去买昂贵的东西，转而向摊贩购买便宜货，这就造成了上海摊贩业的空前“繁荣”。这种虚假的繁荣其实是社会经济危机、物价飞涨和美货倾销走私的反映。

摊贩业的迅速发展，冲击了国民党官僚资本集团的经济垄断，为国民党所不容。从 1946 年 7 月开始，国民党上海当局不顾人民的生计，以所谓“妨碍市容”为借口，三令五申要取缔上海摊贩。广大摊主为保住自己的饭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 8 月 28 日，上海摊贩整队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收回成命，给他们一点生计，但毫无结果。10 月中旬，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强行驱散摊贩市场。摊贩们要求划几个固定地段给他们谋生，也被断然拒绝。为了生存，摊贩们只得采取流动摊点。警察来了，他们就赶快跑；警察走了，他们再回来。11 月中旬，国民党政府进而采取凡属摊贩一律取缔的严厉手段。并告知警察如“取缔不力，以渎职论罪”。这样警察便穿梭于大街小巷，捉拿摊贩。特别是对摊贩集中的黄浦、老闸区搜查更紧，先后被逮捕的小贩多达六七百人。

国民党当局的行为将上海的摊贩逼得走投无路，他们被迫起而反抗。11月30日，3 000名摊贩赶往国民党上海市参议会请愿，并包围了黄浦警察分局，要求他们给予摊贩谋生的出路。但上海警察总局当即派出大批警察前往镇压。他们用水龙喷射，开枪射击，7名小贩中弹身亡，多人受伤。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激起了摊贩更广泛、更强烈的反抗，他们从游行、请愿、呼吁迅速发展为大规模的激烈斗争。

12月1日，上海市长吴国桢为了镇压全市摊贩的反抗，下令全市戒严，并说，对群众的反抗，可以"格杀勿论"。但是，高压政策并未吓倒愤怒的群众，就在戒严令发布的当天，上海全市摊贩5 000余人走上街头抗议国民党的屠杀暴行。于是，黄浦警察分局、国民党军、宪兵、警察纷纷出动，以水龙、警棍、刺刀、步枪以至催泪瓦斯来对付反抗的群众。摊贩们则以石头、竹杠、木棒为自卫武器，与全副武装的军警相对抗，并继续包围黄浦警察分局。结果，在国民党军队、警察的镇压下，又有摊贩10人死亡，100余人受伤，221人被捕。这一天，公共汽车、电车停驶，全市商业大多停业，形成了全市性的反蒋斗争。上海摊贩的斗争和人民群众的同情与支持形成了全市性的反蒋群众运动。12月2日，天津摊贩得到上海同行被镇压的消息后，全体罢市，抗议国民党当局驱逐摊贩的命令。

在上海的摊贩斗争之后，全国各地的许多城镇，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抢米风潮。1946年6、7月间，国民党统治地区由于粮价暴涨，许多地方有价无市或有市无货，造成了严重的粮荒，各地饥饿和饿死的人数与日俱增，于是便出现了抢米风潮。

从1947年4月开始，抢米风潮迅速席卷了江苏、浙江、安徽、四川、湖北等12省的大小城镇，其中包括了首都南京。5月上旬，杭州的抢米群众，捣毁了米店和警察派出所；南京的铁路码头职工也捣毁了浦口镇所有的米店，无锡全市的米店被抢，而成都的米店被抢的也有30多家。据不完全统计，1947年5、6月份，各地的抢米风潮有12个省40多个城镇，参加者有17万人。

抢米的群众直接同反动的国民政府展开斗争，愤怒的人们对着逮捕的政府官员说："我们肚里没有一粒米，请你们剖开肚皮看看吧"。由此可以看出国统区的人民已经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

除了摊贩之外，农村也因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而民变运动蜂起。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满足内战的需要，变本加厉地向人民要钱、要粮、要丁，给广大人



民群众，特别是给农村带来了饥饿和死亡，激起了农民的无比仇恨。在征兵方面，1946 年，国民政府除了征收当年的巨大兵额外，还要追缴抗日战争时期的“壮丁陈欠”。征兵人员下乡强拉硬抓，因征兵弄得家破人亡的事件时有发生，同时劳动力的大量减少也大大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征粮方面，历年积欠未交，新征又来。1946 年各地普遍歉收，粮荒严重，而当年的粮赋征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比 1945 年增加一倍以上。国民政府的过度征粮，迫使广大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难以为生，只有奋起反抗，以求生存自救。与此同时，由于蒋介石不断扩大内战，将其正规军 248 个旅中陆续用于进攻解放区达 227 个，仅剩下 21 个旅守备国民党统治区，兵力日渐空虚，统治力量逐渐薄弱。这就为民变运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 1946 年下半年开始，农村人民揭竿而起，反抗抓丁、征粮事件，屡有发生。

从 1946 年下半年起，广大农民为了反抗抓丁、征粮，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已很普遍。在遭受暴政戕害特别深重的地方，农民们更是自动拿起武器进行反抗，掀起大规模的民变运动。1946 年 9 月，民变运动首先在四川、湖南、江苏、浙江和安徽等省发生，起义群众多达 20 多万人。到 1947 年 1 月，便扩展到西康、山西、云南、广东、湖北、福建、江西、绥远等省，300 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参加群众 80 余万人。各地的民变运动以四川、西康两省的规模为最大。四川在 1946 年 9 月初，民变地区 30 县，参加群众 10 多万人，到 1947 年 1 月扩展到 20 万人，遍布全省 130 多个县，他们甚至可以与国民党的正规军和地方部队相抗衡。在川北，1946 年 8 月，民变武装曾击溃蒋军 2 个旅及陕鄂地方团队之四路进攻，全歼川省第 15 行政区“通缉大队”；在川西，峨眉山脉邛崃山区，邛崃、名山、洪雅、蒲江、峨嵋、大邑等县，1947 年彝汉民变武装发展至万人，曾击败蒋军 1 个正规旅、2 个保安团的进攻；岷江上游松潘、理县及川东岳池、武胜、合川、江北、长寿等县境内有两三千人的民变武装，他们以山地为根据地，1946 年秋曾战胜 2 个师的进剿。其后继续发展，迫使蒋军在重庆设立“华蓥山进剿指挥所”。西康省在 1946 年下半年，起义群众已有 10 多万人，到 1947 年 1 月更激增至 50 万人。这支彝、汉两族大军，组织 7 路，活动于西康的 9 个县市，尤其天全、雅安、芦山、宝兴的人民自卫军，有枪 6 000 余，反抗蒋政权勒令种鸦片、强征烟税而起义，歼灭蒋政权 6 个保安大队。1947 年春，攻占荥、芦、天县城，生俘团长刘元河。

参加民变武装的不仅有农民，还有工人、手工业者，甚至有国民党政府

的公务员和中小地主以及国民党的一些部队加入民变武装。起义的群众除了汉族外，少数民族，如西康的彝族、湘西的苗族，均有参加，形成了农村各阶层、各族人民反蒋政权的统一战线。据《文汇报》、《华西晚报》、《晋绥日报》和《经甘日报》报道：1946 年，四川大邑国民党军的一个特务连，由连长率领加入雅安民变部队。8 月，浙江仙居县派自卫队向变民进“剿”，中途 1 个分队哗变，参加民变武装。苏浙皖边各县的地方团队，1946 年也纷纷哗变，如平湖自卫大队两批，松江、宜兴县属保安队各一批，吴兴、长兴水警各一队共千余人，先后带轻重武器，参加民变武装。宜兴县属湖汉镇自卫队，张诸区署联防队，广德县属自卫队共数百人，先后起义参加游击队。“围剿”宜兴等地之蒋军，亦有部分士兵携带全部枪械投入起义部队。部分国民党正规、地方军也有哗变投入民变部队的。这增强了民变武装的战斗力，使之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心腹之患。

民变部队积极开展对群众的宣传。广西的南宁、武鸣、宾阳、永淳的民变武装，所经乡村，遍贴“反对征兵征粮”的标语；云南等地，民变武装所到之处都流传着“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如要不反，一不征兵，二不派款”等口号；浙江台州洋面的民变武装 5 000 余人，拥有海船 100 余艘，打出的旗号是“铲除贪官污吏”；湘南的“贫民团”发表宣言，揭露贪官污吏、地主恶霸的罪行，号召没有饭吃的人参加他们的队伍；太湖的“民主联军”向长兴县民众展开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宣传。随着民变武装的壮大，斗争目标逐渐由反抗征粮抓丁转向反对国民党政权。他们经常组织围困和袭击国民党的各级政府和地方团队，如四川的第 15 专署曾被民变武装长期围困，西康的雅安专署曾被民变武装占领，江、浙、皖等省各地的乡镇公所和地方“自卫队”常被包围缴械。有些地区的民变武装还建立了根据地和自己的政权，如陕西商县成立了民选的政府，西康起义军也提出成立“人民政府”的斗争方向。

据北大院系联合会发表的一篇文章称：“由于内战的缘故，在中国西南和东南，民变蓬起，四川、西康、广东、浙江等省加入民变的饥民约四五十万人。”①

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民变运动，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政策。有的地区，由于民变蜂起，国民党地方保安团队无力镇压，而不得不依靠正规军对起义民众进行“围剿”。除抽调正规军进行“围剿”外，对民变家属子女也进行疯狂的屠杀，如川、滇、黔边规定，凡变民逃逸则株连其父母妻子儿女，境内有

变民不交出则枪毙保甲长 。到 1947 年 5 月，已有数百家属经保甲长的捕送致被惨杀，其中包括七八十岁老翁及幼子。但是，起义军却愈“剿”愈多。有些地方的保甲长竟与民变武装建立联系，互相联络，暗通声息。广东、江西的民变武装与保甲长打成一片，由他们掩护活动。甚至国民党军官也有哗变的，致使国民党的镇压政策收效甚微，民变队伍不断扩大。

民变运动的蓬勃发展，暴露了蒋管区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它扰乱了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冲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牵制和削弱了国民党前线的兵力，从而间接地配合了解放区的第一线作战。

注释：

①天津：《大公报》，1947 年 5 月 19 日。

台湾民众举行“二二八”武装起义

1945年10月17日，国民党军在美军支援下收复了被日本侵占50年之久的中国台湾，台湾同胞回到祖国的怀抱欢天喜地。却不料国民党从一开始就对台湾同胞实行专制统治，同时还对台湾人民进行大肆的经济掠夺，使得台湾人民对国民党的统治完全失望。最终“官逼民反”，爆发了“二二八”人民起义。

台湾收复后，国民党即设立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由陈仪任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当时在国际上和蒋介石政府的心目中，“台湾和其他远东地方不同，实是最好的政治实验区”，“台湾没有共产党，没有内战，是三民主义的苗圃”。[①]所以蒋介石委任陈仪治台，并给予很大的权力。同时规定治台的基本政策为：“实行政治建制的特殊化和政治、军事的绝对独裁政治”；“实行台湾经济建制的特殊化，实行统治经济和内地隔离的政策”。在此政策的指导下，陈仪开始了他对台湾的统治。

陈仪留用日本俘虏治台。陈仪到打台湾后，立刻扩充警察数万，并秘密留用日本战俘万余人，冒充台籍，安置在警务、工矿企业和地方行政部门，使他们以“副统治者”地位，继续作威作福。台北第一监狱，仍被日本殖民者所控制，学校的教科书仍旧沿用日本统治时代的版本。陈仪还从由海南岛和南洋各地遣返回台的20万台籍日俘中，挑选出4万余人，分配到各县市担任基层工作。那些日本统治时期的“达官贵人”，更是受到重用。而真正爱国的台湾人民，则遭到百般的歧视。陈仪说：“台湾人没有政治人才”，“台湾人受日本五十年的奴化教育，要收到重新教育的效果，至少得二十年的‘训政’才行”。[②]所以台籍人员即使从政，绝大多数也只是些委任及雇员级的下等职员，而简任和荐任的高中级职务，则几为内地派出之官员所垄断。即使都是公职人员，在薪俸待遇上，同工不同酬。由内地赴台的官员，除享有安家费和各种照顾外，还给予实物和法币的工资补贴，而台民公职人员却什么都没有，这就势必引起台湾民众的极度不满。



国民党在台实行特务统治。密布全省的特务、警察，常把稍表不满的台湾人投入监狱。1946 年 4 月 19 日，陈仪特设台湾劳动训导营，任务名为训导流氓分子，其实四五百被训人员，都是批评过政府的教师、学生、参议员、公务员、医师等，无业者仅 3 人。而所谓的训导，则是“感以恐怖，教以愚蒙，扑灭进步，使他们戕害自己，憎恶人生。”不仅如此，在经济上，国民党官员在台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初到台湾，国民党即以“接收”为名，恣意搜刮台湾的财富。他们不仅以资源委员会和长官公署的名义，垄断了原日本在台公营和私营的工矿、农业、商业等企业，甚至连台湾人民的私产也被他们没收。对于这些财产的处理，名义上是公开标卖，实际上是私下吞并。许多党政头目，去台时赤手空拳，顷刻间家藏万贯。例如，长官公署财务处长兼日产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严家淦，借“劫收”之机，几乎操纵了全台的金融。在台湾土地银行、工商银行、华商银行及上海几家私办银行，都有他化名投资的股金。

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垄断，台湾的经济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日益凋零。物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困苦。国民党集团“接收”了台湾全省 90% 的企业和 70% 的土地，建立了独占的经济体系。而国民政府在“接收”之后，并不是将这些财富用于恢复生产，而是偷卖原料和机器，以至于大批的工厂倒闭停工。即使开工的工厂，用人也不及以前的 1/5，而且 80% 的技术工人都是从内地来的。据台湾长官公署民政处 1946 年 11 月统计，台失业人口高达 80 万，占总人口的 10% 以上。在农业生产方面，因大批农民不堪苛捐杂税的重压，被迫弃家逃生，田园大部荒芜，一向富庶的嘉南平原的部分土地竟颗粒无收。1946 年全省粮食减产 130 万担，加上官僚、奸商大量地走私和囤积居奇，造成严重的米荒，每斤米价由 1 角 6 分扶摇直上至 40 元。不仅贫苦百姓难以生存，就连台北市福建警察派出所也呈文向上司要饭吃。在米价上涨的同时，整个物价乘势而起。此外，国民党政府还继承了日本在台的专卖制度，独揽了台湾省内外贸易和烟酒的专卖权。当局利用这种垄断，压价收买，高价出售，并滥发台币，对人民进行强制性剥削。当时全国内地的物价以上海居首，而台湾又远在上海之上。台湾人民的生活，在暴涨的物价中已陷入绝境。

而此时的美国也在趁火打劫。日本投降后，美国以“协助”国民政府接收为借口，对台湾进行了大肆掠夺。美国不断增强侵台势力，在台设立领事馆、新闻处，网罗社会渣滓，发行《台湾杂志》，进行亲美以及台湾独立

等反动宣传；还通过《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签订，在台投资设厂、经营各种企业，在基隆、高雄等海港建立军事基地，妄图取代日本的地位霸占台湾。尤其是在“二二八”起义期间，美国间谍大造舆论，宣扬所谓的“台湾要独立”的言论。当台湾人民向蒋介石建议“注意美国的企图”时，蒋介石却说：“在这次事变中，美国朋友还帮了我们很多忙，这样不相信他们，恐怕会影响中美亲善。”[③]

蒋介石政权的这些倒行逆施的行为，最终使得台湾人民不得不铤而走险，走上了反抗之路。1947 年 1 月，台北 5 万学生、工人和市民，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声援大陆的抗暴斗争。台湾人民的愤怒，终于通过林江迈事件爆发了“二二八”起义。

1947 年 2 月 27 日晚，台湾专卖局专员叶德根带领 9 名武装缉私人员，根据密报前往淡水港查缉香烟货船，不料去时货船已走。叶德根等人心有不甘，为了借机获财，他们便在台北各商业街进行巡查。在台北市延平北路，以“逃税”为名，将体力不支而奔跑不及的寡妇林江迈捉住，并抢走了林江迈的 6 000 元现款和几十条香烟。当林江迈为了家人的生计向查缉员求情时，这些人不仅未归还物品，还以枪柄砸伤其头部。周围群众基于义愤，殴打了查缉员和警察各一名。这些查缉员看到寡不敌众，于是边逃边向民众开枪，打死了市民陈文溪。气愤的群众将查缉员乘的大卡车烧毁，这就是所谓的“林江迈事件”。

事件发生后，民众强烈呼吁将查缉员傅学通逮捕并于 28 号处于死刑，与此同时，还派人沿街走巷，向广大市民宣布事实的真相。2 月 28 日上午，台北市民因提出的要求未被政府采纳，又分头沿街击锣，通告全城商店罢市并游行。太平町一町目警察派出所警员出面阻挠，民众乃收缴其枪械，痛殴其所长，砸毁其房屋以扫除障碍。接着，民众将陈文溪、林江迈二人的尸体分置于脚踏三轮车上，敲锣击鼓，浩浩荡荡地由太平町一町目冲进本町台北市专卖局局长欧阳正宅，打死、打伤查缉员 6 人，烧毁该局所存之烟、火柴及 10 余辆脚踏车和 1 部汽车。中午，市民数千人高呼：“打倒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府”、“建立台湾民主自治的政府”和“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口号，到长官公署门口请愿，要求惩办凶手和撤销专卖局。这时，早有准备的守卫军警向请愿市民开枪，打死 30 多人。被激怒了的台北市民，分别把守各交通要道、公共场所和旅馆商店，捣毁官僚机构，痛殴贪官污吏，乃至外省籍公务人员。14 日，台北参议会议长黄朝琴向陈仪提出：为免事态扩



大，请陈仪下令军警勿再开枪并解散警察大队。陈仪对禁止开枪一事表示应允，但借口无权过问法院的裁判而对惩凶事进行推诿，更拒绝取消警察大队。随后，全台北市学生宣布罢课，教师、工人、商人、各机关台籍员工纷起响应，陆续投入抗议行列。警察总司令部亦发布公告："自2月28日起，于台北市区宣布临时戒严，禁止聚众集会，如有不法之徒，企图暴动捣乱治安者，定予严惩。"接着，台北1 000多名军、警、宪人员全副武装蜂拥出动，疯狂地对民众施暴，双方各死伤千余人。愤怒的民众占领了省广播电台和邮电局，通过电台，向全省人民宣布台北市起义，呼吁各地援助和起义，这样就使得群众请愿活动发展到武装斗争。

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终于爆发了。民众纷纷奋起，要求改革台湾政治，把斗争矛头直指长官公署、警察局、专卖局、市县政府、驻军等机构和主管官员。台东、花莲、屏东、台中、嘉义等地的三四万高山族人，亦纷纷下山参加起义。至3月4日，武装起义的烈火已燃遍台湾全省。④

台北是起义的中心。3月2日，5 000余名大中学校学生集会并组织了学生军；5日，成立了台湾自治青年同盟。9日，起义者经过数日战斗，便将长官公署和警察总司令部以外的一些机关占领；并致电蒋介石，提出"重用台省人才"、"县市长民选"等九项要求。

此间，起义的烈火，迅速燃遍台湾各地，并纷纷建立了民众武装。台中是起义的中坚力量，3月1日下午，台中及彰化各界领袖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联名行动响应台北起义。随之，彰化民众集合于火车站宣布起义，接着袭击市政府，包围警察局，遭到军警顽抗。双方相持到3日上午，台中市起义的武装部队赶来援助，将警察之枪械缴获，并控制全市。2日，台中时局处理委员会、台湾自治军台中指挥部及市人民政府相继成立。人民政府颁布安民布告，提出保障人民言论、集会自由等口号，呼吁"共同努力，建设台湾"，要求市民"不带枪的不要打，不抵抗的不要打"。并且建立了以谢雪红为总指挥的3 000人的武装部队。对于台北和台中的起义，台湾各地区的人民都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基隆、新竹、彰化、嘉义、高雄、台南、台东、花莲等地纷纷建立武装，发动起义，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台北、台中市民的正义斗争。

此时，陈仪深感问题严重，只得急电向蒋介石求救："祈即派大军，以平匪气。"蒋介石为保住台湾这块基地，尽管内战失利，兵力紧张，仍于是晚电令驻京沪线之第二十一军："（一）台湾乱民暴动；（二）该军全部开台

平乱；（三）军部及直属营连和一四六师即日在吴淞上船直开基隆，一四五师在连云港集结候轮开高雄，并限三月八日以前到达；（四）该军到台后归陈长官（仪）指挥。”[5]随后，蒋介石又派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到台湾处理相关事宜。

3月8日，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一军[6]，陆续到达台湾，从9日开始，对台湾民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上午，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闽北监察使杨亮功率福建宪兵第四团的两个营到达基隆港，未上岸即架起机枪，在基隆要塞部队的配合下，对民众实行疯狂的扫射。顿时，码头附近一带陈尸累累，血迹斑斑，拉开了全面镇压的序幕。国民党军对台湾民众进行了大肆的报复，有的用机枪扫射；有的三人一捆，将其投入海中；有的被割掉耳鼻，无所不用其极。在应援部队到来之后，陈仪也一改之前与台湾民众谈判的面孔，洗劫新闻界，压制舆论。至3月13日，起义完全失败。据不完全统计，台湾各地被杀群众有3万多人。

国民党在台湾大屠杀，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强烈的反响。首先是教育界和文化界的进步人士起而声援，他们称赞：“台湾同胞真勇敢。台湾的民主自治必须联合国内人民共策共励打倒贪官污吏。”3月6日，以北京大学、华北学院为中心，将惨案真相用壁报公诸于众，明确表示对台湾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台湾旅平同乡会和同学会会长梁永禄并会同鄭石城、王康绪召开联席会议，通过《告全国同胞书》，并《致蒋主席电》，强烈要求撤办陈仪和释放被捕台胞。与此同时，天津和东北的台湾同乡会也表达了对于这次起义民众的支持。

“二二八”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次起义具有重要意义。它正逢蒋介石大打内战，我军寻机歼灭蒋军有生力量之时，这就使台湾民众反蒋的义举汇入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潮流中来了。台湾民众的起义，虽然被蒋介石残酷地镇压下去，但它却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牵制了它进行反革命内战的兵力。这不仅是台湾人民革命斗争史上极其光辉的篇章，同时也有力地配合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是置蒋介石政府于全民包围中之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二八”起义不仅在当时有着重要的意义，即使到现在他依然影响着台湾的国民党。国民党对这次起义的镇压，成为后来成立的民进党攻击的靶子，每次“大选”时，都会因为民进党大肆宣传国民党镇压“二二八”起义而大受影响。

注释：

①《世界日报》：1947 年 4 月 1 日。

⑤胡庆云：《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67 页。

②③何汉文：《台湾二二八见闻纪略》，《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订本，1981 年版。

⑤何聘儒：《蒋军镇压台湾人民起义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 18 辑，第 76 页。

⑥1946 年，蒋曾将二十一军暂改编为二十一师，但为了虚张声势，去台湾之前，又将其改为二十一军。

“五二〇”运动

在抗暴运动之后不久，1947 年春夏，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学生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更浩大、范围更广泛、内容更深刻的斗争，这就是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即五·二〇运动。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统治区的整个经济命脉逐渐被美国垄断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所控制。战后，美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美国对华投资急剧增加。美国在华投资占各国在华投资的比重，从 1936 年的 8%，猛增到 1947 年的 80%，形成了独占的地位。美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是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进行的，它使处于危殆境地的中国民主工商业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与此同时，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以政府的名义接收了大量的日伪产业，并且采取各种超经济手段，集中了巨额财富。由于官僚资本是在掠夺广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时兼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所以，官僚资本财富的增长使得国统区经济严重萎缩，中国的民族资本企业纷纷倒闭。他们把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引向了绝境。国统区的人民无法生存下去，群众性的斗争此起彼伏。

1947 年 3 月，蒋介石在进攻了延安之后，内战进一步扩大，军费开支剧增。为了应对巨额的财政赤字，蒋介石一边继续大量发行纸币，另一方面对于统治区内的人民运动也加强了镇压。随着国民党的军事失败和二月经济紧急措施的破产，国统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危机更加严重。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国统区的党组织“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指示还指出：“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①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刘晓为书记的中共上海中央局，根据中央的指



示，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形势做了具体分析后，对于如何在南方开展斗争，进行了详细的部署。以刘仁为部长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对北方群众运动的发展形势也作了分析，提出领导者应注意群众情绪，注意客观条件和斗争策略，使运动深入下去，坚持下去。上海局领导下的北平学委同晋察冀城工部领导的北平学委一起，对北平、天津的学生运动作了具体部署。

这时由于国民党政府为了弥补严重的财政赤字，支持前线打仗，挪用了大量的教育经费，使得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危机日益严重。由于教育经费奇缺，靠工资收入的教师朝不保夕，靠助学金和贷款维持生活的学生受到失学、失业的严重威胁，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并且教育制度腐败，国民党党棍治校，特务横行，思想言论无自由。这些都使得广大师生愤懑怨怒，不可终日。1947 年四五月间，上海、南京等许多城市的学生发出“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5 月 4 日，上海各校学生举行了游行示威，反对内战，喊出了全国人民的要求：“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5 月 15 日，南京各校学生 3 000 人，为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未能得到满意答复，于是决定 5 月 20 日举行大规模游行。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也纷纷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当北大的一个宣传队来到西单商场对面的街上准备进行宣传时，大批青年军跑过来，动用皮带、铁棍，将 30 余名手无寸铁的学生围在街心毒打，制造了“西单血案”。这一事件震动了华北各院校。当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 11 校的代表在北大开会，成立华北区“五一八血案”后援会，19 日，华北学生还成立了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并且决定在 5 月 20 日举行请愿游行。斗争声势日渐扩大。

国民党政府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于 1947 年 5 月 18 日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规定凡人民团体或学校学生“不得越级请愿”；请愿时，禁止 10 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蒋介石发表讲话，诬蔑爱国学生“形同暴徒”，声称“国家何贵于如此学校？亦何惜于如此恣肆暴戾之青年？”并声称将对这些学生要“采取断然之处置”。[②]但是，爱国学生没有屈服，学生运动逐步由各地、各校分散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斗争。中共地下组织也认为，敌人的高压政策，并不表示它的强大，而是暴露了它的软弱。只要我们在斗争中讲究策略，勇于斗争，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据此，决定按原计划进行。

5 月 20 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 16 个专科以上学校的 5 000 余名学生在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后，冲破宪警的阻碍，举行了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在珠江路口，游行队伍遭到了宪警的水龙喷射和棍棒、皮鞭的殴打，重伤 19 人，轻伤 90 余人，被捕 28 人，这就是"五二〇血案"。当天，国民党操纵的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开幕，蒋介石到会讲话，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掩盖他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事实。学生游行队伍向国民参政会请愿，在国府路（今长江路）口遇到国民党政府设置的 5 道防线阻拦；面对这种情况，游行队伍与国民党政府军队相对峙，并高呼"反饥饿、反内战"、"反对政府屠杀学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并且对围观的群众和附近居民解释游行的目的，以此获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主席团也一面开记者会阐明游行的目的，一面派代表与卫戍司令部参谋卫持平进行谈判，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撤防，让学生队伍通过。学生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南京市民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当学生与军警在国府路口对峙时，"老工人提来了茶水，店员们拿来了雨伞，居民们送来了毛巾"，表达了他们对学生的声援。

同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 7 000 余名学生从北京大学出发，北大的许多助教也参加了游行的队列。由北大宣传卡车开道，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巨幅横标，进行持续五个多小时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不断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恢复政协路线"、"提高教育经费"、"反对征兵、征实、征购"、"减轻农民负担"、"清算官僚资本"等口号。到黄昏时分，大队在北大留校人员的欢呼声中返抵红楼广场。随后，"反饥联"常务委员会向围坐在广场上的学生，报告了当天游行的情况，并对下一步行动作出了部署。与此同时，天津的大、中学生也进行了反饥饿、反内战游行。

五二〇血案后，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上海局的《关于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的指示》。《指示》首先肯定了这次学生运动的发展"完全循着我党的指导方针前进。望即坚持此项方针，并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③]同一天，在另一份指示中指出："为避免与青年军学生及宪警士兵造成对立，并争取他们同情学运，以瓦解蒋介石镇压后方的力量起见，你们应该通过各种组织、各方积极分子赶紧进行青年军及宪警中的士兵工作，提出适当口号，使之同情学生要饭吃、要和平的斗争，进到其本身要求加饷退伍的斗争"。[④]



5 月 27 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指示，“此次学潮，一般的是从学生本身要求发动起来的，但一经发动，便马上联系到政治口号。于是，要饭吃、要和平、反饥饿、反内战均成为不可分离的斗争口号。”“要使此次学运的政治经济斗争口号成为有机的联系，不要生硬加上，不要脱离中间分子，要依其觉悟程度，提出各种部分的辅助口号，以推动其向总的斗争口号前进。”⑤

在中共的引导和推动下，学生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这一运动席卷武汉、重庆、广州、杭州、长沙、昆明、福州、南昌、桂州、济南、开封、沈阳等 60 多个大中城市。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以各种形式支持和援助学生运动。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燕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等校的教授，纷纷罢教或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谴责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冯玉祥等社会知名人士，分别发表慰问信、题词、演说和告全国同胞书，声讨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赞扬学生的爱国民主精神。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南京分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分别以致函、捐款等方式，慰问学生。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

六月初，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分析形势，认为这次斗争已取得重大胜利，大大教育了群众，发展了进步力量，争取了群众，暴露并孤立了反动势力，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同时，经过长时间的斗争，学生群众已感疲劳，需要休整。中间学生、教师和社会上层分子对一部分学生提出的无限期罢课的主张不十分赞成。如果坚持长期罢课，或者提出其他过高的要求，将会脱离群众。为了巩固已有的胜利，决定改变斗争方式，一面复课，一面休整，开展一些分散的活动，以教育积极分子和学生群众，待机而动。

与此同时，6 月 3 日，中共中央向上海局发出的《关于学运方针给上海局的指示》，肯定上海局“领导斗争向前发展的方针是对的。今天京沪平津学生停止街上游行改在校内开会的办法也是对的。这样可以巩固校内（包括教职员）的统一战线，便于集中要求可能实现的条件（如释放所有被捕学生教员、医治受伤学生、惩办暴行人员、取消紧急措施及军事戒严等），然后在改变斗争形式，继续进行要和平要自由的运动。”⑥由此，学生运动开始主要着眼于积蓄力量，而不是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学生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1947 年，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主要工业城市，有 120 万工人参加

反对内战、反对美帝国主义暴行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其中罢工高达 3 000 次。国民党政府对广大农民横征暴敛，抓丁征粮，在许多地区引发农民抗粮、抗租、抗抓壮丁的反抗运动和农民起义，其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政府的基层政权。到 1947 年 1 月，反对国民党政府暴政的农民武装遍及川、陕、滇、黔、粤、桂、闽、湘、鄂、苏、浙、皖等省区，参加群众达数十万人。城市贫民也掀起大规模的抢米风潮。据不完全统计，从 1947 年 3 月到 7 月，上海、南京和江苏、安徽、四川等九省的 38 个城市发生抢米风潮，参加的城市贫民达 17 万人。

五二〇运动是一场全国范围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在这场斗争中，“反饥饿与反内战有力地相结合，以广泛的经济斗争进一步提高到政治斗争，使运动表现的无比的广泛、深刻与猛烈，比抗暴更凶猛地震撼了全中国”。在这场斗争中，学生运动的反内战阶段发展到了最高峰，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孤立了；教授们“不仅站在做师长的立场上同情学生，更站在一个人民的立场上直接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声”；青年学生里的政治人士在这次运动中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六二华北学联宣言总结群众在斗争中认识提高的情况，说：“我们深感向顽固执迷者要求和平，是一种不智之举，制止内战，端赖全国人民的努力。”在此次斗争中，“反动派已撕去一切伪装的面目”，而学生们则是更加英勇的给以反击。“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展开了，全国同学表现了坚贞的气节，也准备了下一阶段——‘反迫害’斗争的到来”。[⑦]

对于这次规模宏大的学生运动，毛泽东作了很高的评价：“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逃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⑧]

注释：

①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69 页。



②南京《中央日报》，1947 年 5 月 19 日。

③④⑤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版，第 673 页，第 673～674 页，第 674 页，第 674～675 页。

⑦《华北学生运动小史》，1948 年。载《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480～481 页。

⑧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224～1225 页。

第二条战线的历史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定胜负的斗争，是在两条战线上展开的：一条是由解放区军民进行的革命战争，被称之为第一条战线，也是主要的战线；另外一条就是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这是第二条战线，他虽然是辅助性的，但是却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的前线作战，加速了蒋家王朝的灭亡，进一步保障了人民取得第三次国内战争的胜利。

1948 年 10 月 14 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负责人罗迈（李维汉）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两年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首先是大学生，在保卫祖国和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中进行了英勇忘我的斗争，政治上严重地打击了美蒋统治，配合了解放战争，对敌区革命群众运动起了带头作用。""运动的坚持性，群众的联系，策略的灵活性，都超过了学运历史上的任何时期"。[①]

学生运动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的发展，主要是"新的历史环境和党的正确路线相结合的结果"。[②]

首先，由于战后的美国采取了扶蒋反共、助蒋内战的政策，而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了依靠美国发动内战和加强独裁统治的政策，这样，"他们就将全国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做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发展下去。全国人民除此以外，再无出路"。[③]学生斗争，正是人民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革命要求，经过长期的煎熬和锻炼，已经随着中国人民的革命命运的成熟而日益成熟。"

其次，人民革命的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在全国内战爆发之后，人民军队又在解放战争中不断地取得胜利。这种情况，极大地鼓励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首先是广大学生群众的斗争勇气，增强了他们的胜利信心。如果说，"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黑暗时期，那时，不但中层人



民，而且下层人民也暂时屈服于某些暴君的淫威之下，”那么，这时的中国，则“不但下层人民因为胜利在望而表现了无比的勇敢和自我牺牲，而且颇为广大的中间阶层，也表现了类似的信心和勇气”。④因此，尽管学生运动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残暴镇压，广大学生还是顽强地把斗争坚持了下来，而且把它从一个高潮推向了另一个高潮。

从学生运动爆发伊始，毛泽东就敏锐地注意到，学生运动以及国统区人民的反抗对于打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配合解放区的前线斗争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政治上揭露和孤立了美蒋反动派，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取得国内外舆论的支持，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参加谈判。但在谈判的同时，他却又下达密令要求其部队进攻解放区，并且为发动内战积极地做准备。“一二·一”运动的基本口号就是“反对内战，争取自由”，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坚持内战政策和独裁统治的本相，并且使中共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进一步深入人心。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在集中力量进行内战的同时，也多次玩弄“还政于民”的政治骗局。1946 年 11 月，它亲自撕毁了政协协议，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制定伪“宪法”。在伪国大召开前后，重庆、昆明、上海、香港等地，民主党派的几十个地方组织、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声明、谈话和抗议书，指斥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召开一党“国大”，妄图用假民主来掩盖其法西斯独裁，推行内战政策的罪行。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也不得不承认：“在国大中蒋（介石）称国家还政于民，但听众都是反动分子控制国民党统治机构之极端保守派，不但中共而且大多数党派已拒绝参加‘国大’，蒋介石持一党专政，不予中国人民以民主，而使国家陷入内战的混乱之中。”为了抗议伪“宪法”，广大学生举行了抗暴示威游行，并高喊“反对钦定宪法”、“要求和平民主”等口号。南京学生还在三青团中央团部门口的“庆祝三十六年元旦暨制宪成功”的牌坊上写上了“宪法何用!”“内战不止，普天同悲”等字样。1947 年 5 月 20 日，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参政会”开幕，蒋介石出席并讲话。就在这一天，京沪杭的学生前往国民参政会会址举行了示威游行，并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而国民党当局竟然用水龙头和木棍将学生打伤，还逮捕了一部分学生。国民党当局的这些行为充分地暴露了其专制独裁的本性。学生的爱国行为获得了南京广大市民的同情和支持，在爱国学生与国民党当局对峙

期间，他们给学生提水送毛巾，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这次学潮使得国民党的政治统治更加孤立，政治危机更加严重。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此次学潮之影响，有关国乎？元气之损失，异数不可数计。”[5]不仅如此，学生还发动了抗暴运动，给予了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以沉重的打击，使美国认识到了中国国民的力量，同时也教育了广大亲美的知识分子和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

其次，国统区人民的斗争牵制了国民党的力量，削弱了它的前线兵力。国民党虽然拥有庞大的军队，但由于它的后方不稳，学生运动不断、民变蜂起以及上海摊贩的斗争和各地抢米风潮的出现，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抽调前线兵力来镇压运动和加强后方的防备。比如，“五二〇”运动期间，国民党当局为了防范学生在6月2日发动的全国性行动，就出动了大批军队、警察。这一天，“北平城门紧闭，西直门外戒备森严，，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一个个士兵荷枪实弹，上起刺刀，来回巡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四周也被上千的警察、特务所包围。北平如此，其他地方也一样。每次学生的爱国运动都会迅速传遍全国，这使得蒋介石疲于奔命。除了学生运动，由于国统区官僚资本的垄断，使得广大的摊贩、农民无法继续生存下去，这些人民被迫铤而走险，起来反抗。从1946年9月起，民变运动在四川、安徽、江苏、浙江、湖南等省发生，起义群众达20多万人。到1947年已经波及到全国14个省30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参加人数也扩展到80万人。各地的民变运动都需要国民党军队的镇压，这就有力地配合了第一战线的作战。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才有可能毅然做出决定，当人民军队在数量上还没有占很大的优势时，就开始发动战略反攻。

除此之外，学生运动的另一个成就就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许多知识青年学生，通过斗争的锻炼，政治上日益成熟。他们不仅有比较高的知识水平，而且还觉悟高，富于正义感，再加上有了一定的斗争经验，使得他们成为革命的一笔宝贵财富。而且学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部分积极分子还被中共地下党组织输送到解放区，去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与此同时，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学生，则在后来积极参加了迎接解放、接管城市的紧张斗争。比如，秘密印刷并宣传党的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广泛宣传党的城市政策，特别是保护工商业等项政策；教授宣传当前的全国形势，粉碎了国民党想要迁走校具和裹挟教师南逃的图谋；调查社会各方面的情况，绘制城市内部的详细地图，为解放军入城做指南等等。



以上这些情况清楚地表明，学生的斗争以及国统区人民的斗争确实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这一点连国民党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所以它才叫嚣要“消灭第二战场”。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前线的战略反攻的展开，第二条战线的人民运动也广泛的开展开来，迎来了人民运动的高潮。两条战线的有力配合，使得蒋介石政权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就覆灭了。

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也让我们认识到，只有在它反映历史前进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在它与整个革命斗争相配合并担负起时代的使命时，才能具有深刻的内容、坚强的生命力和历史意义。例如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人民的愿望就是争取和平民主。学生在1946年发动的一二·一运动的基本口号就是“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自由”，正因为如此，这个运动发起后，迅速扩大，并且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吹响了号角。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借用国民党与其签订的一系列卖国条约所给予的特权而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并且在中国胡作非为，残害中国人民，中国人对美军恨之入骨。学生们在抗暴运动中就提出了“美军退出中国”的口号，反对美国政府的侵华政策，同时还把反对美国同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统治联系在一起。由于内战所造成的军费激增和兵员短缺，国民党加紧了对人民的剥削，国统区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反饥饿、反内战，已经成为国统区人民的心声。随后五二〇学生运动就喊出了这一口号。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国统区人民的斗争能够取得胜利，有效的牵制国民党的军队力量，没有正确的领导是不可能的。从学生运动爆发开始，中共中央就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抗暴运动爆发后，1947年1月6日，中共中央致董必武并转上海工委、叶剑英、吴玉章、张曙时、方方、林平点：“此次平、津、京、沪学生的反美示威，成绩甚好，影响甚大。”“我党在蒋管区的工作，要尽量利用这次学运的成果，扩大民族爱国主义的宣传和活动。”“经过学生活动与报章揭露，要将这些宣传深入到工人、店员、妇女、城市贫民、工商业家、自由职业者乃至华侨中去，引起他们的响应，以扩大这一运动。”[⑥]正因为如此，每次学生运动在中共的领导下才能做好宣传，斗争时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斗争策略，灵活运用斗争方法，使得以最小的损失获得最有效的结果，最大限度的团结各阶层人士，获得最广大人民的同情，最大可能的孤立蒋介石集团。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国统区人民同国民政府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第一战场解放军的作战。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加速了以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的灭亡。

注释：

①②罗迈：《国民党区的学生运动——给毛主席的一封信》，1948 年 10 月 14 日。

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225 页。

④新华社社论：《爱国运动的新高潮》，1948 年 6 月 18 日。

⑤蒋介石谈处理学潮之方针，天津《益世报》1946 年 6 月 10 日。转移自《青运史研究资料》，1983 年第 3 期。

⑥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59 页。

参考文献：

[1]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

[2]《周恩来 1946 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

[3]《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 1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

[4]《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

[5]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册。

[6]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册）。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7 年版。

[8] 陈竹筠、陈起城选编，《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

[9]《中央日报》。

[10]《新华日报》。

[11] 胡庆云，《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12]《民主星期刊》。

 

［1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14］西北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民主党派史资料选辑》。

［15］《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1919—1949），北京出版社，1987 年版。

［16］《解放日报》。

［17］《时代日报》。

［18］天津，《大公报》。

［19］《世界日报》。

［20］何汉文，《台湾二二八见闻纪略》，《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订本，1981 年版。

［21］何聘儒，《蒋军镇压台湾人民起义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 18 辑。

［22］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23］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版。

［24］《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2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26］《五二〇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5、1987 年版。

［27］《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年版。

［28］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学生运动卷》上、中、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年版。

［2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工人和市场斗争卷》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年版。

［30］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卷》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 年版。

［31］中共中央统战部编，《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卷》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年版。

［32］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 年版。

［33］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运动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34] 杨克煌，《回忆二二八起义》，北京出版社，1953 年版。

[35]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36] 中共上海市委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出版社，1991 年版。

[37] 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编辑委员会编，《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第 1 分册，1948 年版。

[38] 张大中等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北京出版社，1995 年版。

[39] 萧超然，沙健孙等编，《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

[40] 北平燕京大学反饥饿反迫害行动委员会编，《生与死的搏斗》，1948 年版。

战略反攻前夕

从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到1947年6月，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的精心策划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解放区军民经过一年的英勇抗击，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基本挫败其重点进攻，开创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新局面。经过一年的战争，国内整体态势有了很大变化，一个属于解放军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

首先，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蒋介石集团面临严重的军事危机。从1946年10月13日蒋介石下了著名的“剿匪”密令，调动一百多个旅（当时叫师），大举进攻解放区起，国民党军队就不断失败。起初，蒋介石曾经妄图利用1946年6月底7月初的总动员，在四个月内消灭解放军，但是在8月占承德，9月占淮阴、菏泽，10月占领张家口、安东以后，其兵力大损。从1946年7月中旬的泰兴战役到1947年初旬的费县、郓城、定陶战役，一年之内，解放军已经歼灭蒋介石正规军整营以上的兵力一百多个旅，其中包括50个整旅[①]。经过这一年的战争，国民党军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降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则由200万减少到15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其中正规军亦由61万人发展到100万人以上。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兵力对比，总兵力从1：3.4上升为1：1.9；正规军则由1：3.3上升为1：1.5。由于解放军后方日益巩固，不须分兵守备后方供应线和保卫城市，后方所需兵力不多，因此在整个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已优于国民党军。这时国民党军旅的番号虽仍保持248个，但在整个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则由117个旅的最高峰下降到40个旅。[②]

蒋介石兵力不断损失，造成了蒋介石反动集团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危机。蒋介石在第一线集中了220多个旅，后方兵力十分空虚。在山东、陕北两个主要战场上，逐渐被我军歼灭了。在其他几个战场上，已经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蒋介石原在山东集中了60个旅，40多万人。5个主力师（原军），摆在山东的有五军、十一师、七十四师3个师，摆在东北的有新一

军、新六军。结果在山东被我军歼灭六个半师（原军）。在鲁南战役被歼6个旅，莱芜战役被歼7个旅，泰安战役被歼3个旅，孟良崮战役也同样是被歼3个旅。这使蒋介石开始在山东处于被动，主动权已经开始转到我军手中。陕北战场上，蒋介石集中了34个旅，共20多万人。我军不但歼灭了他三个半旅，同时解放区还扩大了十多万人口。随后，我军还收复了环县等四个县城，并且打进关中，逼近三原。此外，蒋介石至少有三个战场的战线已经支离破碎而采取了重点防御。豫北战场，安阳、新乡、黄河铁桥已表现出支离破碎、重点防御的窘态。东北战场包括热河，我军已经歼灭了蒋介石军队11个师，蒋介石只能在四平、长春、沈阳进行重点防御。我军歼灭90多个旅，战局发生变化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危机[③]。

其次，战争态势开始向着有利于解放区的方向发展。1947年，毛泽东在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副政委罗荣桓、高岗的电报中，分析了过去一年作战的主要成果，指出，第一年作战，除山东外，一切区域均已将敌战略进攻停止，并已转入我军之进攻。敌在陕北虽尚有进攻能力，但由于地形等条件，已变为游击性的，我军已能主动作战；东北及太行早已采取攻势；五台自改善领导后亦能主动作战；山东敌集中攻我鲁中，估计亦难持久，我军将逐步转入攻势。此外，报告还分析了我军当前的兵力分布，指出我军山东有27个头等旅；太行（不包括陈赓）有13个头等旅，14个二等旅；西北有边区6个旅（其中4个是晋绥来的），陈赓4个旅，晋绥3个旅；五台有9个头等旅，四个二等旅；东北（包括察北、冀东）有头等二等32个旅。我全军共计112个旅（东北山东两炮纵，东北、晋绥四个骑旅不在内），90万人。此外，地方部队60万人，军事机关40万人[④]。

战争进入第二年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虽然仍在继续，但已成强弩之末。国民党军由于战线广和兵力不足的矛盾，从1947年3月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把重点进攻至于山东和陕北后，敌军主力仍在南线，连被歼者（其中大半已补充，惟人数不足，战力弱，一部在准备补充中）计算在内，共有154个旅。其中，山东（包括苏北）88个旅，太行26个旅，西北（包括晋南、榆林、宁夏，不包括兰州以西）40个旅。北线敌力较弱，共有64个旅（被歼者在内），其中，东北（不包括冀东、察北）24个旅，五台及晋绥40个旅（孙连仲15个旅，傅作义10个旅，阎锡山15个旅）。敌后方守备兵力30个旅，其中，新疆及甘西8个旅，湘鄂川滇黔五省16个旅，东南



各省及台湾6个旅。全国敌正规军248个旅，去年七月共有兵员180余万人，一年作战被我歼灭78万人，补充60万，逃亡20万，现有兵员150万人，今后一年准备补充100万人。此外尚有特种部队（炮、工、辎、海、空）、伪军、交警及保安部队等100万人（被歼者除外），后方军事机关180万人。一年作战，敌军士气已衰，厌战情绪高涨，民心尤为厌战，蒋政权在人民中已陷孤立。[5]此时，由于重兵深陷山东、陕北两个战场，国民党在这两个战场之间的鲁西南、豫皖苏直至大别山区的兵力十分空虚，形成两头强、中间弱的哑铃型的布局，十分有利于解放军实施中间突破。而这时解放军除山东战场外，“一切区域均已将敌战略进攻停止，并已转入我军之进攻。敌在陕北虽尚有进攻能力，由于地形等条件，已变为游击性的，我军已能主动作战；东北及太行早已采取攻势；五台自改善领导后亦能主动作战；山东敌集中攻我鲁中，估计亦难持久，我军将逐步转入攻势”。[6]由此可见，解放军已掌握了战争的局部主动权，战争转入进攻阶段指日可待。

第三，国民党统治不得人心，人民民主运动不断发展。在过去的一年中，蒋介石的统治倒行逆施，残暴专制，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反对，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人民的力量较之以前，也更为强大，这使得蒋介石所遭到的危机也更为深刻严重。这一年里，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四项诺言、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以发动全国大内战，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签订卖国的中美商约，勾结外国军队驻在中国领土，大借美债，大用美国送来的军火，驱逐中共代表，占领延安，对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学生严厉镇压，封闭自由主义的报纸，以逮捕和暗杀对付广大民主人士，起用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参加指挥内战。蒋介石的这种卖国政策、内战政策和独裁统治，造成了自身统治的政治危机、军事危机和经济危机。蒋介石对蒋管区学生和人民大众的进攻，不但不能消灭或削弱蒋管区的民主运动，反而使它更加发展、更加有力。[7]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和全国人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8]由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加强法西斯统治，与人民为敌，把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限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斗争，形成配合人民解放军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虽然形势朝着有利于我方的趋势发展，但是战争进入第二年，解放军面临的局势还是相当严峻的，敌我双方强弱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由于这一年的战争深入解放区的腹地，许多地方的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困苦，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补充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国民党方面，它的军队虽然被削弱了，但在数量上和装备上仍占着很大优势。自从人民解放军1947年春夏间在晋冀鲁豫、晋察冀和东北战场相继展开战略性反攻后，使得国民党上层人士忧心忡忡。1947年4月起，蒋介石连续举办军官训练班、研究班，集训团以上军官，并亲自任训练团团长，检讨内战以来“剿共”失利的原因，研究对策。蒋介石不无焦虑地说：“如果再不大彻大悟，急起直追”，“恐将陷于最后的失败，整个为共产党所消灭”。他决心重新部署力量，加强对解放区的进攻。蒋介石规定国民党军的作战纲领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共军“没有立足的余地”。并据此提出要捣毁共军“发号施令的首脑部的所在地”。为了挽救正在走向崩溃的国民党政权，美国政府派出魏德迈为首的代表团来华“考察”，以便继续援助蒋介石打内战。

尽管解放军面临的形势还相当严重，但是我们这个已经在过去三次革命运动中表现出它自身的优越性的党，用这一年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的事实证明了它对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以及它完全有能力、而且肯定能带领全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悬殊状况已有所改变，国民党军虽然在总兵力上仍占有优势，但在战略上的薄弱环节已经暴露；人民解放军不仅在机动兵力上已超过国民党军，而且在政治上占有巨大优势，这一切都说明人民解放军争取军事形势根本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这个事实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属于解放军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正如党中央2月1日指示中写到：“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9]中国共产党经过了二十余年的锻炼，经过全党的整风运动，已经是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坚强团结起来的、政治上成熟了党。有了这样的党，我们的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就有了确切的指望，这种指望使我国人民更加增强了信心和勇气。在这个黎明前的黑夜，祖国人民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自己胜利的前景。这个胜利，将不是别的，而是百余年来我国志士仁人抛头流血、牺牲奋斗目标的实现，也就是祖国的独立于民主的实现，就是孙中山志



愿的实现。胜利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但我们一定能克服困难，迎接胜利。⑩

注释：

①《总动员与总崩溃》，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5页。

②《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6页。

③ 邓小平：《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1页。

④⑤⑥ 毛泽东：《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⑦⑩《努力奋斗迎接胜利》，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页。

⑧⑨ 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4、第1211页。

毛泽东对外线出击的战略思考与调整

全面内战爆发后，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在指挥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防御的同时，对于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和形式，也进行了长期的思考。1946 年 11 月到 1947 年 9 月，他曾 3 次比较全面地表述了关于人民解放军何时以及如何转入战略进攻的基本构想。

第一次：在 1946 年 11 月 21 日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歼灭战已经经历了事实的证明，过去几个月已歼灭国民党军 38 个旅。蒋介石是可以战胜的。再用半年到一年时间，消灭七八十个旅，就可以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一定平衡。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再向长江以南。这次讲话，不仅提出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应该在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之后，而且还提出了进攻的主要方向，即鄂、豫、皖、陇诸省。

第二次：1947 年 7 月 10 日，毛泽东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副政委罗荣桓、高岗的电报中，对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蓝图作了全面细致的描绘。电报在分析过去一年作战结果、指出我军兵力分布的基础上，提出全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基本方向和基本部署，要求我军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 100 个正规旅及大量杂部，使敌人由数量上的优势转为劣势，我则由劣势变为优势。报告同时指出我军第二年的任务："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甘宁大部，北线我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其中极重要的是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联系，使华北、西北我军获得军火接济"。电报还大体规划了在顺利实现上述任务条件下对第三年发展战略进攻的设想，即在"第三年，山东太行两主力即可向长江以南发展；东北、五台我军，除留必要兵力攻击平、津、沈及



其他第二年尚未占领之城市，并守备本地外，即可以相当数量之兵力加入西北及长江以南作战，而主要是加入西北，以期夺取西北各省及四川全省，巩固后方”。此外，毛泽东还对我军作战方针提出指示，指明要“仍如过去所确立者，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先取中等城市及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及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夺取地方是歼敌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须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夺取地方；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与大部兵员（十分之九的士兵及少数下级官佐）补充自己，配合土地改革与发展生产，支持长期战争；今后作战，运动战的可能已减少，主要是攻击敌军阵地，必须用大力加强炮兵与工兵。”①

第三次：1947 年 9 月 1 日，在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两路大军分别进入大别山区和豫西地区，陈毅粟裕军也已在鲁西南地区展开，准备向豫皖苏边区挺进，进攻山东、陕北两区的国民党军已开始回援的基础上，毛泽东又向各战略区领导人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电报，全面地阐述了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进攻的构想，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为了实现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统区的方针，毛泽东还提出到国统区作战取得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②

毛泽东在构思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基本框架的同时，还依据形势变化，精心策划了南北两线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具体布局。在南线，1947 年 1 月 18 日，在华东人民解放军举行的鲁南战役即将胜利结束，而由中原突围进到陕南、豫西和鄂西北的李先念部处境十分困难，毛泽东告诉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要他们在三四个月内，在陇海路南北广大地区灵活作战，将这个地区“创造为机动战场，以便吸引邱军及其他薛、顾主力来此而歼灭之，大约在 5 月间主力即可向中原出动”，以支援李先念部。他还告诉华东的陈毅、陈士榘、粟裕、谭震林，要他们在鲁南战役结束后准备在陇海、台枣两线“打几个大歼灭战，开辟向

南进攻的道路”。1 月 24 日，他又致电华东领导人并告刘邓：“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五月开始（包括休息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弹药、新兵、干部、经费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具体规定南线的两大主力——华东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外线出击的时间和方向。[3]

电报之后，由于南线战场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对这个计划作了 3 次调整。

第一次是在 1947 年 3 月 6 日和 5 月 4 日。1947 年 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华东野战军举行的莱芜战役已胜利结束，一举歼灭国民党军 7 个旅，主力正集结在胶济铁路一带进行休整，同时，李先念部大部分已脱离险境，安全渡过黄河，进入太岳解放区，另一部正在渡河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军委、毛泽东于 3 月 6 日致电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因五师（指李先念部）主力一部已渡河到达太岳，一部正待机北渡，鄂西王树声部一部已渡江去湘西，一部留原地。因此中央原定你们提早转入外线援助五师之计划，现可改变，大体本年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4]但规定晋冀鲁豫野战军五月挺进中原的任务仍没变化。

第二次，1947 年 3、4 月间，南线战场形势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国民党军把进攻重点置于南线两翼的陕北和山东，其中，进攻陕北的胡宗南军又很快陷入了困境；二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及第四纵队分别在南线战场的中部，即豫北和晋南地区组织了两次强大的攻势作战，收复了大片失地，使即将执行南进任务的这支野战军获得了一个较为巩固的后方。此外，由于黄河旧故道横穿并分割了晋冀鲁豫战场的豫北和鲁西南两区，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事实南北机动增加了很大困难。根据这一事实，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 1947 年 5 月 4 日和 5 月 22 日先后两次致电陈毅、粟裕、谭震林和刘伯承、邓小平，对南线战略进攻的部署作了调整：“现在可以确定下列诸点：（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二）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三）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巳东（六月一日）以前完毕，巳东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军受刘邓指挥。（四）陈谢主力（四个旅）在现地工作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



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顽，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⑤]华东方面，应"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⑥]这样，就形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先出中原，华东野战军以较长时间继续坚持内线作战，主次歼敌，而后再越陇海路进入苏皖边区，两军夹津浦路密切配合作战，以及陈、谢一个纵队西进陕北，直接加入西北人民解放军序列协同作战的部署。

第三次调整是在 1947 年 7、8 月间。这时南线战场有三个变化：一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 4 个纵队 12 万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后，已于 6 月底自豫北南渡黄河，在鲁西南转战一个月，歼灭国民党军 9 个半旅，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国民党军统帅部正在山东、西北、豫北等战场抽调重兵准备在鲁西南狭窄地区内寻求晋冀鲁豫野战军"决战"。二是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上集结重兵、集团滚进的部署，同时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地区的作战。华东野战军按照毛泽东的决定，以 5 个纵队兵力分两路出鲁西、鲁南，以 4 个纵队留置鲁中正面。但 7 月份攻滕县、邹县、济宁、汶上、南麻、临朐，都打成消耗战，没有达成预期目的，战场形势十分严峻。三是陕北地区的军需尤其是粮食供应十分困难。

针对上述形势变化，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组织南线主力以开辟新的中原解放区为重点转入战略进攻的基本决心没有变，但在具体部署上又一次作了大的调整：

第一，将陈赓、谢富治所部的进攻方向由西进改为渡黄河南下挺进豫西，"为了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陇海路津洛郑段，而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豫陕鄂边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⑦]

第二，刘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 4 个纵队于鲁西南战役结束后略微休整，立即千里跃进大别山区，"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⑧]

第三，华东野战军出鲁西、鲁南的 5 个纵队，在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指挥下，就势进入鲁西南。另由陈毅、粟裕率鲁中正面的一个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主力经路北、豫北南渡黄河，会同陈士榘唐亮所率

5个纵队及新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外线（西线）兵团，首先活动于鲁西南地区，“目前主要任务是从侧面，将来则从反面（将来邱欧可能南进）钳制邱欧”，如邱清泉（第五军）欧震（整编第十九军）由陇海路南追刘邓军，“陈粟则尾随之。总之，陈粟从反面钳制敌人最为有利。”在完成钳制邱欧、掩护刘邓军进入大别山区任务后，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即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往来击敌，开创新局面，逐步将冀鲁豫与豫皖苏两区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之后方。

第四，华东野战军留置鲁中的3个纵队及刚由胶东军区武装组成的第十三纵队组成内线（东线）兵团，以许世友为司令、谭震林兼政委，担任保卫胶东解放区，钳制鲁中之敌的任务。

第五，西北野战军仍然独立在陕北战场坚持内线作战，钳制并逐步削弱胡宗南集团，并为自己而后转入外线作战制造条件。

这样，在南线最终形成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实行中央突破，挺进中原，开创广大的中原解放区，彭德怀、习仲勋，许世友、谭震林两军分别在陕北、山东两翼钳制胡宗南集团和范汉杰集团这样一个“三军挺进、两翼钳制”的战略布局。

在北线的东北战场和晋察冀战场，毛泽东也作了规划。毛泽东认为华北、东北是个整体，两区军队的基本任务是夺取长春、北宁两铁路线和长春、沈阳、北平、天津四城。1947年5月20日，东北民主联军正在发动夏季攻势之际，毛泽东指出：“夺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9]依据这一设想，中央军委要求晋冀鲁豫军区在为配合东北民主联军作战而发起的青（县）沧（县）战役之后，以主力出击平津间和平保（定）间，“往来机动，寻歼敌之正规部队”。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在夏季攻势结束后准备“于八九月间发动新攻势，以四个月至六个月时间占领中长北宁两路之大部，相机夺取长春、四平、辽阳、锦州等城。如能顺利达成上述任务，约在明春即须以东北有力兵团，配合五台、晋绥进攻平绥路。待战争发展平绥附近时，五台、晋绥我军统一归林罗指挥作战。”[10]中央军委还强调，解决北线国民党军的任务，应以东北我军为主力，五台、晋绥



为辅助去完成。

至此，毛泽东关于外线进攻的战略布局也大体完成。毛泽东以及中央军委对外线进攻战略方案的不断调整，充分说明我党的领导人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的改变而改变方案，随时调整部署，以保证战争的胜利进行，同时也反映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人较高的战略眼光与军事远见，这些都为我军挺进中原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毛泽东：《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135页。

②毛泽东：《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0-1231页。

③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805页。

④毛泽东：《考虑作战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⑤毛泽东：《刘邓陈谢晋南陕北各部队的作战任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⑥毛泽东：《在山东战场打破敌人进攻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⑦毛泽东：《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⑧毛泽东：《对确保与扩大战略主动权的军事部署》，《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⑨毛泽东：《东北作战方针及关内战局》，《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⑩毛泽东：《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中原地区南临长江，北濒黄河，东依运河，西迄伏牛山和汉水，地跨苏、皖、豫、鄂、陕5省，人口约4 500万，与南京、武汉等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和江南基本统治区隔江相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国民党集中重兵对山东、陕北实施重点进攻后，中原地区守备兵力大量减少，因此，这个地区又成为国民党军整个南部战线的一个“软腹部”。中央军委判断：只要人民解放军挺进中原，在中原地区立足生根，就可以东慑南京，西扼武汉，南控长江，直接威胁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及江南广大基本统治区，迫使国民党主力自山东、陕北回援，从而实现把战争的主要战场引向国民党区域、从根本上改变战局的战略目的。同时，中原地区也是蒋介石从大后方经陆路运兵华东、华北的必经之路。在全国各解放区中，这个地区又处于突出和孤立的位置。地位重要和中原解放军处境孤立，这是蒋介石首先向这个地区开刀的重要原因。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就在对这个地区不断进行蚕食压缩，先后占领了鄂中、襄南、襄西、鄂南以及八路军河南军区的豫中、豫西地区。1946年6月，中原解放区被缩小的只包括罗山、商城、经扶（今新县）、礼山之间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纵横50余公里的狭小地区。

刘邓军（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纵队12万人）依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豫北攻势结束后于5月中旬转入休整，抓紧时间完成了挺进中原的各项准备工作，主要是补充新兵、训练部队、准备渡河器材、抽调培训建设新区的地方干部以及建立黄河南北的运输供应线等。同时，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了由邓小平任书记，刘伯承 、李先念等委员的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6月22日，刘伯承、邓小平依据中央军委5月4日指示正式发布了强渡黄河实施鲁西南战役的基本命令，决心率4个纵队从张秋镇至林濮集150余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首先争取各个歼灭防守鲁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而后依托鲁西南逐步向豫皖苏、大别山地区挺进。

6月30日，刘邓全军分两个梯队在炮火掩护下和南岸冀鲁豫军区两个



独立旅的接应下，从孙口、林楼、于庄等8个渡口渡河，迅速突破国民党军河防，进入南岸，并包围了驻郓城的敌整编第五十五师主力。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为堵住这一缺口，拱卫徐、汴（开封），立即从豫北等地抽调3个整编师组成一个兵团，由整编第二十七军军长王敬久指挥，进到陇海路商丘、徐州见，并自黄口至砀山断稳步北上增援。据此，刘邓采取“攻敌一点，吸敌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乘国民党援军尚未赶到之机，首先集中4个旅的兵力于8日拂晓前攻克郓城，歼国民党守军一个师部及两个旅，俘中将副师长理明亚。10日，又攻歼定陶守军一个旅。在定陶战役中，著名战斗英雄、“王克勤运动”的始创人王克勤排长英勇牺牲。郓城、定陶战役之后，野战军主力东移击敌，抓住王敬久兵团在嘉祥、巨野至金乡之线形成一字长蛇阵的态势，将这个兵团割裂成3段，并于14日拂晓，首先在嘉祥以西地区歼其一个旅，接着又以“围三阙一”的部署迫使六营集守军2个整编师师部率两个半旅向东突围，并于14日晚全歼突围之敌，俘整编师第七十师中将师长陈颐鼎。这样，王敬久兵团在万福河以北部队已大部被歼灭，仅有的整编第六十六师一个半旅也被包围在羊山集，处境孤危，王敬久本人则率一个整编师另一个旅困守金乡。7月19日，蒋介石飞抵开封，亲自部署，决定从西安、洛阳和山东战场抽调7个整编师分路回援鲁西南战场，并命令王敬久立即率金乡守军一个整编师另一个旅北上解羊山集之围。25日，他又致电守羊山集的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说：“羊山集苦战，中正闻之，忧心如焚，望吾弟转告部下官兵及诸同僚，目前虽处于危急之际，亦应固守到底，希吾弟赖上帝庇护，争取最后五分钟之胜利。”但可惜“上帝”也没有“庇护”宋瑞珂，在蒋介石致电宋瑞珂之前，即22日，刘邓一部就在羊山集以南以诱敌深入手段歼灭了王敬久北上援军的一个旅，其余缩逃金乡。蒋介石的电报发出之后两天，即27日，刘邓又集中了3倍于敌守军的兵力，在强大的炮火的支援下总攻羊山集，激战至28日，全歼守军第六十六师部以及一个半旅，活捉宋瑞珂。至此，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刘邓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九个半旅约60 000人。这次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战役，不仅迫使国民党军从陕北、山东及豫北方向抽调了大量兵力回援，有效地配合了山东、陕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而且也为自身下一步向鄂豫皖边千里进军打开了通道。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驻地陕西靖边县的小河村主持召开了小河村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任弼时和西

北、晋绥军区的负责人彭德怀、贺龙、陈赓等十几人。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要刘邓、陈谢两大主力进军中原，挺进大别山地区。大别山地区，位于国民党首都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又曾经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广大群众，多年来一直有我军游击队坚持斗争，容易立足生根。我军占据大别山，蒋介石必然会调动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军预期的战略目标。

刘邓表示，完全赞同中央的决定。但是目前有困难需要解决，一是过黄河后连续作战，消耗甚大，炮弹无法补充，新兵没有，俘虏多，争取补充需要时间。二是所带军费已经不足半月开资，冬衣问题无法解决。但是毛泽东等不及了。7 月 29 日他给刘邓发出一封绝密电报："（一）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的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按照刘邓原来的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渐向南发展，或支直出大别山。（二）陈谢集团按照原计划于 8 月出潼关，切断陇海线，调动胡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之作战。该部亦与太行太岳保持后方接济。该部是否远出伏牛、桐柏，依情况而定，有利则远出，不利则缩回河北。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①]

羊山集之战后，刘邓野战军转入休整，准备于 8 月 15 日南进。此时，华东野战军出击鲁南、鲁西的 5 个纵队也已在兖州、济宁之间会师，并在陈士榘、唐亮指挥下进到郓城以东与刘邓军靠拢。8 月 6 日，中央军委就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后国民党军方面可能采取的对策作了分析，并电告刘邓：敌人可能采取两种或三种办法对付我进入大别山的部队：第一，"迅速组织进攻，使你们不能立足"；第二，"宁可给我以立足机会，不急于尾我进攻"，在一至两个月的时间内抽调三十几个旅，先从长江、平汉两线完成部署，然后向西、向北进攻；第三，"同时采用上述两种办法，既以 12 个旅左右分数路迅速进攻，又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用于长江方面"。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必须同时准备对付这几种办法，而主要是对付第一种办法，即用全副精神注意于运动中大批歼灭敌人，一切依靠打胜仗"来实现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②]



这时，蒋介石对刘邓野战军准备挺进大别山的意图还毫无察觉。他错误地判断刘邓军作战近月，已疲惫不堪，短期内难以再战，因此决定以调集到鲁西南和陇海路沿线的8个整编师18个旅约14万人的兵力分进合击，欺辱逼迫刘邓大军于郓城、鄄城之间的狭窄地区决战；同时又准备利用连日以来的大雨造成的黄河涨水的机会，决堤放水，淹没刘邓军。有鉴于此，刘伯承、邓小平深感已不宜在鲁西南完成休整，即当机立断，于8月6日下达预备命令，决心乘国民党合围部署尚未完成和黄河尚未决堤之际，立即隐蔽突然南进，执行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并于7日一面将决心报告于中央军委，一面指挥部队迅速行动。

7日黄昏，刘邓全军在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兵团（包括刚由冀鲁豫军区武装组成的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掩护下开始向南急进。8月9日、10日，中央军委连续致电刘邓："决心完全正确。""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8月11日，刘邓野战军越过陇海路分3路向大别山疾进、连续越过宽达20公里、遍地淤泥、积水及膝、渺无人烟的黄泛区，抢渡沙河，强渡汝河，突破国民党军20多个旅的围追堵截，于8月25日到达淮河北岸。此时河水陡涨，部队云集岸边，无法过河，而国民党军的追兵正向淮河一线压来，先头部队已到达离渡口不足20公里的彭店，开始与刘邓军的后卫接火。在危急万分的情况下，刘伯承赶到渡口，亲自涉水测量水深，调查水情，发现上游有人、马徒涉，且已通过淮河，立即下令部队乘水势尚未大涨的时机，以徒涉方式从上游抢渡。27日，主力在后卫掩护下全部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在刘邓野战军最后一批部队渡过淮河后，尾追的国民党军也赶到了淮河北岸，但因河水陡涨，已经无法徒涉，只好望河兴叹。8月30日，刘邓高兴地向中央军委作报告："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跃进任务，敌人追击计划完全失败。"

从8月7日郓城地区南下起，到8月27日安全渡过淮河，先敌进入大别山区，刘邓野战军在20天连续急行军中，战胜了国民党军的追堵，克服了重重障碍，胜利地完成了千里跃进的任务。刘伯承在1963年4月10日撰写的回忆文章《千里跃进大别山》中，对20天跃进的整个过程，作了如下概括叙述："就这样，我军以锐不可挡之势，粉碎了敌人数十万大军的前堵后退，先后跨越了陇海路、涡河、黄泛区、沙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碍，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终于在8月末先后进人大别山。"③

大别山区，位于鄂豫皖3省交界处，共28县，人口1 200余万。大别

山山脉呈西北、东南走向，山南、山北均为丘陵、平原。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就曾在这里建立过革命根据地。1946年6月中原军区部队突围时，在这里留下了一部分游击武装坚持斗争，刘邓野战军进入大别山区后，决心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乘追堵的国民党军尚未到达的有利时机，将全区划分为豫东南、鄂皖、皖西、鄂东等4个地区，以4个纵队分别在这4个地区内展开，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

8月27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了《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指出："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为此，全军要充分树立胜利信心，并下决心用十年以上时间去"大量歼灭敌人和充分发动群众"，以求站稳脚跟；要向群众说明"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在军事上，我们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胜仗……为大歼灭战准备条件"。"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而我军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指示"强调："必须了解，如果我们不在半年内歼灭10个旅以上的敌人，就无法使群众相信我们不会再走而敢于起来斗争；我们也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任何时候，全军都必须有高度的战斗意志和战斗的准备。"④8月底、9月初，各纵队按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的布置，迅速在预定地区展开，一面大力剿灭国民党土杂武装，一面分散一部分部队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党建政，创建根据地。

9月上旬，国民党军围追刘邓军的23个旅陆续进入大别山区，并开始"围剿"刘邓军。根据这一情况，刘伯承、邓小平立即决定以一部分主力集中对付"围剿"军，大部分部队仍分散从事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反国民党军"围剿"的一部分主力，在9、10两月进行了若干次中小规模的战役、战斗，其中10月9日至11日和10月26日至27日进行的张家店战役和高山铺战役，前者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旅5 000余人，后者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的大部和一个旅共1．2万人，给了"围剿"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这对刘邓野战军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

刘邓野战军进入大别山区后的最初两个月中，共歼灭国民党军包括土杂武装在内约30 000人，解放县城17座，建立了33个县级政权，完成了战略展开。大别山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注释：

①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4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58 页。

②同上，第 170–171 页。

③刘伯承：《刘伯承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版，第 588 页。

④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94–95 页。

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

1947年8月初，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前委，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确定由陈毅、陈粟率一、三、四、六、八、十纵队及特种兵纵队，并指挥晋冀鲁豫第十纵队组成外线兵团进入路西南作战。1947年9月初，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1/2主力、8个纵队在鲁西南地区会战，9月9日在菏泽取得了沙土集大捷，9月下旬，陈粟大军除留两个纵队在鲁西南牵制国民党军外主力分5路越过陇海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实行分散作战，并迫击陇海路和津浦路，徐州至固镇段威慑国民党徐州部队，到10月下旬，完成豫皖苏地区的战略展开。

当时蒋介石在鲁西南集结大量兵力，防止我军南下，用5个整编师据守菏泽、金乡、开封、商丘等要点，用8个整编旅作为机动与我军纠缠，我军为了钳制住鲁西南敌人，有力的掩护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和展开，同时，迫使山东敌军西调，彻底粉碎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千方百计袭扰敌人，寻机歼灭敌人，华野8个纵队在鲁西南会和后，8月4日中央电示“刘邓大军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于陈唐、叶陶五个纵队能否起作用”，“请考虑要粟裕同志带炮兵主力速去鲁西南统一指挥五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

豫皖苏地区，东起津浦路，西至平汉路，北起陇海路，南至淮河，人口约两千万，面积约六万平方公里，抗日战争时期，睢县、杞县、太康一带和萧县、夏邑一代就是我军的根据地，现在豫东为老游击区，淮北为沦陷区，豫东南及皖西为新区，由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和陈粟大军转战鲁西南，南线的国民党军机动兵力大部分被吸引到这两个地区去，豫皖苏地区只有一些保安团队和土杂武装，几乎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这就为陈粟大军南下在这里创建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里使鄂豫皖、豫皖陕、山东和苏北、苏中的大块根据地连成一片，结束过去独立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局面，变为全国大反攻的主战场之一。中央军委指示陈粟在一两个月内，只打小仗，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肃清敌方地方武装，摧毁反动政权，大力发动群



众，发展人民武装。

陈毅、粟裕在接到中央命令之后，在考虑要打一个好仗来扭转局面。8月30日，毛泽东又电示，国民党对刘邓大军"压迫甚急"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足之势，勿忘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河，并全力配合刘邓大军。由于刘邓大军在这时已经进入大别山区，国民党军队正在重兵堵截，陈粟迅速率领部队在9月3日渡过黄河南下，同原在黄河以南的四个纵队会合。

6日晚上，粟裕在各纵队领导干部会议上，针对部队中一些人感到疲劳、战机难寻、又值雨季、要求休整的思想，反复说明了早打的好处和取胜的条件，指出首先要承认困难，正确对待困难，而克服目前的困难，变被动为主动的关键是要打一个好仗来扭转局面，他坚定地说："只有打，才能有力地配合刘邓；只有打，才能扭转现在被动的局面；只有打，才能得到补充；只有打，部队才能得到休整；打好了，鲁西南根据地就能重建起来。"[①]要看到前面有国民党部队的堵截，后面有国民党部队的追击，国民党的军队动作不一定那样整齐，距离也不可能一致，我们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先打掉他们一路，那样国民党的军队的缝隙就大了，我们的自由活动空间就多了，我们也就有了主动权。

经过讨论，部队的思想认识得到了统一，并且一致同意要争取早打，接下来就是怎么样研究战略部署了，经过讨论，作了如下战略部署：以第八、三、六纵队担任攻歼整编五十七师的任务，其他部队打援，并伺机歼敌整五师一部。怎样打好陈粟兵团的第一仗呢？解放军面对的新问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作战，敌我军力对比悬殊，想要创造好的战机，比在根据地内要困难和复杂很多。而国民党军队在这个时候也开始骄躁起来，认为解放军不堪一击。

9月初，在第一、三纵队的引诱下，国民党军分三路北进，精锐主力整编第五师在中央，整编第五十七师在左翼，整编第八十四师为右翼。国民党军五十七师积极北进，与整编第五师之间出现了一个20公里的大空隙，这时，陈粟感觉这是一个歼敌的好机会，决定先歼整编第五十七师。原因之一是这个师的战斗力比整编第五师弱，二是所处的位置便于分割。具体的作战部署是：集中三个纵队八个师的兵力，形成四倍于敌的优势；而用于阻击、打援、钳制的兵力超过用于主攻的兵力，挡住整编第五师的来援，以确保战役的胜利。

9 月 7 日，整编第五十七师继续北进，华东野战军第一、三、六纵队和第四、八纵队抓住时机突然对它实行南北夹击，由于出其不意，国民党军迅速向南撤退，收缩在郓城、巨野西南的沙土集地区，当晚被解放军合围。"沙士集是鲁西南菏泽、巨野公路上的一个村庄，三面靠水，北面是一片沙地。村庄椭圆形状，东西二里半，南北一里，周围有一土墙，南墙之外有一外壕，五六里内无村庄，地势较高，墙上有独立地堡及单人掩体，庄内要道巷口有地堡，以房舍土墙开辟枪眼为巷战工事，但尚未完成，正在赶修中。"[②]北面的这块平平的沙碱地上除几丛沙柳外，毫无遮拦，解放军战士就是在这样一个开阔无隐蔽的地上冒着枪林弹雨发起了英勇的进攻，战士们勇往直前，面对敌人的炮火毫无畏惧，士气特别旺盛。8 日晚 6 时，解放军对沙士集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发起了总攻，由于战士们的英勇奋战，战争进展顺利，国民党中将师长段霖茂率 100 多人化妆逃跑，就在他们刚出所在的山寨不远处，就被解放军俘虏，其余士兵见主帅被俘，纷纷放下武器投诚。至 9 日凌晨 3 时许，战斗胜利结束。

同时，郓城的狙击战打的也十分的激烈，在我军的奋力抵抗下，国民党的军队未能穿过解放军的阵地。五十七师被歼后，援军后撤，当时又正值雨季，解放军官兵的体质普遍下降，不宜再战，就未再歼整五师，这就是著名的沙士集大捷，此战打得干净利索，共击毙、击伤国民党军 2 000 余人，俘虏 7 500 余人，以及缴获大量军用物资，解放军得到补充，而伤亡仅 2 300 余人。至此，国民党军对山东战场的重点进攻彻底被粉碎，解放军也从此顺利地进入战略反攻。

沙士集战役是陈粟大军在外线的国民党统治区内集中兵力所打的一个歼灭战。粟裕总结到："沙士集战役的胜利，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解放军在鲁西南的被动局面，为向豫皖苏的挺进打开了道路，而且迫使国民党军队从大别山区和山东战场抽调出四个师支援鲁南，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和山东内线解放军的行动。"[③]

9 月 11 日，中共中央来电奖励全体将士，并要求两兵团努力完成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巩固的根据地，协同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饶黎谭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这一伟大的任务，并指出：你们处在四大根据地之间地带，你们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在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全军深受鼓舞，但是同时也感到自身的责任



重大，全体官兵抓紧时间休整，就在休息的时候，领导干部组织学习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同时为南下豫皖苏做了准备工作。9月24日，陈毅、粟裕发布全军主力越过陇海铁路、向豫皖苏地区进军的命令。除十纵、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继续留在鲁西南牵制国民党军之外，主力越过陇海路南下，进入了豫皖苏地区。陈毅、粟裕率领第三、四、六纵队作为东路越过陇海铁路南下，陈士榘率第一、八纵队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作为西路越过陇海铁路南下。在平汉路以东、运河以西、淮河以北地区，一面剿灭各类土杂武装，一面派出大量干部、战士展开群众工作，建党建政，同时还从各纵队中抽调部分师、团指挥机构，加强原有的豫皖苏军区各分区、县的力量，或组建新的分区、县级武装。陈粟大军的进展十分顺利，到10月底为止，在一个多月中，陈粟大军在豫皖苏军区武装的直接配合下，一共攻占或一度攻占杞县、睢县、亳县等县城24座，解放了广大乡村，歼灭了土匪、保安武装万余人，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在这个地区的政权。陈毅在这年年底曾说："在黄河以南更好打仗。在山东时敌人重点进攻，有二十四个军，现在我军只负担四个军，敌人是一军一旅在一起，顶多是两个军在一起，三个军是没有的。我们走到那里，他们就跟到那里。我军以旅为单位分散活动，扫荡土顽团，消灭敌人保安队，摧毁蒋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给养又便利，到处可以取得。吃得又好，吃鸡鸭，吃竹笋，吃鱼，不比以前那样吃不上菜。我军真是如入无人之地，国民党到处恐慌得很。"④

11月初，晋冀鲁豫第十二纵队进入大别山地区归刘邓野战军建制。11月底，陈粟兵团完成在豫皖苏的战略展开。这样，刘邓大军、陈谢兵团和陈粟兵团外线主力部队，在中原形成了"品"字形的有利态势。10月8日，毛泽东指出："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共48个旅，约40万人，业已在长江、黄河间立住脚跟。"

这是一个胜利的转折点，向豫皖苏进军的华野外线兵团从1947年9月26日开始越过陇海路，纵横扫荡国民党地方保安团队，国民党军被迫以6个整编师的兵力分别组成机动兵团，依托平汉、陇海、津浦三条铁路，机动转用兵力尾随作战。为消灭国民党军的机动力量，创造大量歼敌的条件，陈粟决定：

第一，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继续分兵清剿国民党军杂牌军，开展地方工作，同时集中主力打中等规模的运动战。

第二，辗转追击平汉、陇海、津浦三条铁路，剥夺国民党军依托铁路机

动作战的条件，将国民党军注意力吸引到铁路沿线，削减其黄河段的防御，以利于解放军前方和后方的联系。

在此方针下，华野7个纵队于1947年11月8日，首先组织了对陇海路的大迫击。至18日，彻底破坏了陇海路商丘至郝砦段300多华里，歼灭国民党军1.1万余人，迫使国民党军匆忙调回十五个旅回援，从而再一次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

12月下旬，为了扩大战果和减轻刘邓大军的压力，华野外线部队又在平汉路郑州至许昌段和陇海路郑州至开封段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战，把蒋介石赖以运输军用物资和调遣部队的两条交通线拦腰截断，并趁机攻占平汉路上的重镇许昌，在12月一个月中，共歼敌4.5万余人，吸引了白崇禧部分兵力北援，并与刘邓大军的陈谢兵团在平汉线遂平、西平会师。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部队、民兵和当地群众都参加进来了。国民党军据点却被解放军包围起来了，不许国民党军出来一步，更多的人则肩扛铁锹木棒，涌向铁路沿线，成百上千，人山人海，一堆堆的枕木和钢轨在燃烧着，一个个国民党军的碉堡也在燃烧着，一座座铁路桥梁也在大火中毁灭。上百人用无数根杠子和绳子，竟把几百米长的钢轨连同枕木，一起抬起来掀到路基后面。

国民党军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军会发动这么大规模的破击战。他们束手无策，只能看着他们的运输路线被我军破坏殆尽，许昌是平汉路中段的一个重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屯兵站和补给站，铁路被解放军破坏后，它成了一个孤立的据点。在许昌附近的华野三纵决心伺机拿下它。许昌战役是进行平汉路战役的一个重要战斗。13日晚，破袭平汉路，许昌战役开始了。守城的敌军是骑一旅残部，40师115团和该师特务营，26师特务营以及地方保安团，共约7 000余人。13日晚，我军乘机攻占了许昌南、北、西城关，14日上午又攻占了火车站，形成了对许昌的包围。接着发起了对许昌城的总攻，战斗进行得很顺利，15日12时，许昌宣告解放。

这次许昌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8 0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70余门，近百辆汽车和一列装满炸药的火车，以及几个军用库。粟裕来电表示慰问，并指示几个纵队都到许昌进行补充，部队的装备一下子好了很多。

当华野陈粟大军插到平汉路上的时候，陈谢兵团也插到平汉路上的西平、遂平一线。12月23日，国民党军一部由北山而上解郾城之围，陈赓部



队把国民党军引到安排好的地方——西站25里的金刚寺、祝王砦一线。于是陈粟、陈谢两路大军，一个由南向北，一个由北向南，像一把铁钳，把蒋军第五兵团正三师夹在中间。

金刚寺战役是我军平汉战役中的一个重要的战役。金刚寺的守敌是蒋介石整三师之二十旅，整三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946年秋曾在鲁西南被我刘邓大军歼灭后重建，大部分是新兵，战斗力不强。金刚寺（今金刚镇），当时的工事还较坚固。金刚寺的战斗由于配合陈赓部队作战，我军士气高昂，华野西线兵团命令三纵配合陈赓部队，乘敌整三师孤立突击之际，歼敌于金刚寺地区。

25日夜，最后的总攻开始后。国民党军溃不成军，解放军也在金刚寺的雪地上会师了。整个中原战场上，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初步站稳了脚；陈谢兵团在豫西和豫陕边界辗转破出，开辟了豫陕鄂边区；华野陈粟大军外线作战，挺进豫皖苏地区。三路大军犹如三把钢刀直插国民党军的心脏，乘胜完成战略展开，相互策应，纵横驰骋在江淮河汉之间，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打败了国民党军的33个旅对大别山的全面围攻，击破了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上的全面防御体系，调动和吸引了国民党军南线兵力160个旅中的90个旅在自己的周围。这些行动，对于迫使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陷入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作用。中原地区的战略格局已经形成，中原地区已经从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为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进攻的前线。

注释：

①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24页。

②王云：《我所经历的沙士集战斗》，《陈粟大军战中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

③同①，第531页。

④陈毅：《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页。

陈谢大军挺进豫西

1947 年 4、5 月间，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的部队，横扫晋南的敌军，收复和解放了 25 座城池，歼敌 20 000 多人。晋南敌人除了运城、安邑、临汾等几个孤立据点外，已经全部肃清。6 月党中央叫陈赓到陕北去部署四纵下一步行动。7 月 19 日，陈赓到了中央的驻地——靖边县小河村，晋见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同时接受了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新任务，改变了要四纵增加到陕北战场的原意，决定以四纵、九纵三十八军组成一个兵团，就是后来的陈谢兵团，以陈赓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委，挺进豫西配合主力作战。当时党中央的战略意图是："首先攻占潼（关）洛（阳）郑（州）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①]使它成为夺取大西北的一部，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部，同时协助刘邓进入中原。

这个集团中，四纵是主力，原有的第十、十一、十三旅都是陈赓指挥多年的老部队，晋南战役中又补充了许多武器，兵源充足，战斗力强。新补充的第十二旅原来是太岳军区的二十四旅，旅长刘金轩，政委李耀。这支由民兵组成的部队在汾孝、晋南战役中随四纵作战，得到了锻炼和补充，归入四纵建制。还有八纵的二十二旅，原来是太岳军区二十二旅，属王新亭指挥。旅长查玉升，政委朱佩宣。此时也归入四纵直接指挥。

九纵是进攻豫西新组建的部队，由太行军区独立第一、二旅和第一、四、五军分区基干团组成，司令员秦基伟、政委黄镇。这些部队在豫北攻势中由秦基伟统一指挥，担负着西面的作战和牵制任务，当时叫秦纵。现在正式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下辖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个旅，一个炮兵营，共 20 000 余人，8 月 15 日在河南博爱县举行纵队成立大会，也是出征的誓师大会。8 月 21 日，九纵带着 7 000 民工沿着信阳、济源、王屋、邵原一线向黄河北岸口前进。

38 军原是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的旧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改编。



抗日战争期间被编入国民党军第三集团军，饱受国民党嫡系的排挤，官兵们不甘忍受压迫，于1947年7月17日，第十七师在河南洛宁率先起义，将部队带到晋冀鲁豫解放区，1946年5月15日，第五十五师师长孔从周率领手下于巩县起义，虽然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围攻，但部分队伍仍然胜利到达了晋冀鲁豫解放区。1946年9月24日在太行区组建西北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孔从周，政委汪峰。

毛泽东曾指示陈赓："出师后是有战略意义的，进以后应该放手发动群众，向东配合刘邓、陈粟，向西配合陕北，东西机动作战，大量歼灭敌人，开辟鄂豫陕根据地，要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和决心打出去。"规定陈谢集团的作战原则："对敌守备薄弱之据点及城市则坚决攻取之，对敌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许可之据点及城市则相机攻取之，对敌守备之强固之据点及城市则避开之，着重点放在调动敌人打运动战及占领广大的乡村，消灭反动武装，发动群众。"②

8月12日，四纵和38军从冀城、浮山出发南下，但是天公不作美，大降暴雨，交通线全部中断。陈谢督促部队冒雨行军，20日，陈谢率四纵主力到达河南济源县黄河北岸官阳渡口，九纵也同时赶到。38军和22旅到达山西平陆的茅津渡口，准备渡河。渡河是分左、右两个集团进行的，8月22日夜和23日拂晓，右集团军在茅津渡以东，左集团在济源，先后发起了渡河战役。左集团的指战员，机智地利用了黑夜和连天大雨，河水猛涨，浪大声喧，对岸看不见也听不清的机会，乘舟渡河。在渡船靠近对岸的时候才发起了火炮攻击，这样巧妙地把偷渡和强渡结合起来，成功地登岸。右集团军在渡船很少的情况下，战士们制造了十几个大油布包，当做渡船，一面作战，一面划船，冲过敌人的火力封锁，把敌人的守军打败。在他们渡河过程中，有些精通水性的民兵，还组织了葫芦队，肩下系着葫芦，葫芦浮在水面上，手中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掩护渡船前进。由于动员深入，士气高昂，这次渡河战斗，两个集团军都只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就突破了天险黄河。

陈谢集团挺进豫西，打乱了国民党军队原有的作战计划。他们匆忙地从尾随刘邓大军的部队中抽调出四个旅回援，连同原驻洛阳地区的四个旅组成第五兵团，由胡宗南系统的河西警备司令李铁军改任第五兵团司令官。又急令胡宗南部主力从陕北战线南撤，先抽出四个半旅组成陕东兵团，由西安绥靖公署陕东指挥官谢甫三指挥，企图从东西两面夹攻陈谢集团。

四纵过河后，十三旅向西南24日攻克新安县城，30日攻克宜阳。又以

一个团30日占领渑池。十二旅31日占领洛宁。这些县城都是国民党保安队和地方土匪，听说八路军过河了，大多望风而逃，少数略有抵抗便被我军歼灭，所以我军进展很顺利。陈谢指挥十旅于23日攻击洛阳西北的衡水镇，原以为守军是地方保安队，一冲便能成功，没想到守军是敌人的整十五师的一个团和两个保安团，依托工事进行顽强抵抗。我军炮火未跟上，火力组织不好，两次进攻都失利了。陈谢的意图是攻下衡水，袭扰洛阳，命令以一个部包围衡水，以两个旅在洛阳西北准备打援。僵持了两天，接到毛泽东的电报，指示："陈谢渡河后，主力攻占心安、渑池，陕县、灵宝，相机夺取潼关；以一部攻占宜阳、洛宁、卢氏、嵩县，以另一部攻占洛南、商县、商南，切断西荆公路迫使胡宗南一部向陕南部防"。这是中央要陈谢大力向豫西发展。

陈赓明白了中央的意图，他回忆："当时我们的主力在洛阳附近，如果攻洛阳，虽然敌军的第三师等都还未赶到，但亦无必克的把握。即使攻克，也不能巩固，东西两面的敌人一旦靠拢，我们就难于展开，难以大量歼灭敌人。主力向西，乘虚歼灭陕县以西的敌人，斩断敌人的东西联系，既能有力地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又便于多路地向陕南、豫西进军，开辟广大的新区，更好地配合挺进中原的主力作战。"[③]毛主席的指示使我们认清了这种局势，这对于挺进豫西的胜利是有决定意义的。

当时敌人在陕东兵团，除集结了一万多人来据守陕县阻止我西进外，陕县以西的敌人还在部署，这里一个营，那里一个团的摆着长蛇阵。9月2日，部队开始行动了，首先以一部监视陕县的敌人，主力绕过陕县，直扑灵宝、阌乡。夺取灵宝，首先要攻占著名的函谷关。函谷关位于黄河南岸的豫陕交通要道上（今已被三门峡水库淹没），是历史上的军事要地。唐朝地理书《元和郡县志》记载："函谷关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其中略通，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岸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日。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陇海铁路开通后，地形有所变化，但是崤函古道依然狭窄险峻。四纵十一、十三旅奉命夺取函谷关，战士们看到高高的山峰矗立在灵宝的西南方，离灵宝仅几百公尺，占领了函谷关，灵宝唾手可得。蒋介石为据守灵宝，便把一个营的兵力放在了这个山上，夺取函谷关是这个战役的关键。

11日21时，执行攻击任务的十一旅七团一连利用黑夜悄悄前进，绕过孟村，接近函谷关山下。一直摸到离敌军很近的地方，敌方哨兵才发现我们



惊慌地喊起来，我军一排将手榴弹扔出去，勇猛地冲向山头，与敌军开了殊死搏斗。附近敌军慌忙开火，夜间不辨目标，二连、三连接着冲上去，经过几次争夺，我军最终占领了山头阵地。这时，灵宝城内新一旅的敌军出城反击，企图夺回制高点，我十一、十三旅乘机反击，敌军混乱，四散突围，至24时被我军全歼。进攻灵宝的同时，迂回前进的十旅和三十八军的十七师也抢占了阌乡，歼敌一个保安团。十二旅则攻克了卢氏。就这样这里吃掉一个营，那里吃掉一个团、一个旅，把敌人全部消灭。12日，我军解放了灵宝、阌乡、卢氏等地。然后，以一部西叩潼关，另一部回打陕县。这时陕县之敌已经孤立，我们即以瓮中捉鳖的形式，攻克了这座相对较大城市。

陈谢集团主力在陇海西线攻城略地的时候，东线作战的九纵进展不顺利。9月3日陈谢主力由衡水西进的时候，交给九纵的任务是以二十六旅监视洛阳和衡水之敌，秦基伟率二十五、二十七旅在洛阳以南活动，攻占城镇，牵制李铁军兵团，配合主力行动。但是这一带完全是新区，没有群众帮助，没有后方支援，连情报资源也没有，部队带着700民工，行动不方便。几天后主力南渡洛河，攻克宜阳，秦基伟率纵机关和民工在洛河北岸柳泉镇准备渡河。没想到第二天早上突然与洛阳出来的整三师一部相遇，九纵警卫营与敌军交火，秦基伟和黄镇政委带着机关和民工向西转移，到韩城镇发现可以徒涉，过了洛河才脱离危险。警卫营狙击一天遭受很大损失。

9月中旬，九纵二十五、二十七旅先后攻占嵩县和伊阳（今河南汝阳）。17日，李铁军整三师二十旅由临汝（今汝州）向我军进攻。双方在田湖一带激战五小时，九纵是新建的部队，不擅长阵地战，未能结束战斗。于是我军主动后撤，放弃嵩县，撤退到宜阳境内的东西赵堡一带。由于连续作战和雨季行军，九纵非常疲劳，部队思想波动，出现逃亡现象。秦基伟后来总结道："当时由于缺乏新区作战经验，加上几个战斗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及雨天往返行军，我纵部队的年轻幼稚，缺乏在复杂艰苦斗争中的考验，因此许多人对建立豫西解放区产生了怀疑情绪，以致相互埋怨，造成严重的减员现象。"

9月18日，毛泽东命令九纵由伊阳向东进攻临汝，吸引整三师在伏牛山地区建立根据地。陈赓考虑九纵的情况不宜马上行动。19日如实报告军委："现在秦纵除一个团活动于新安附近外，主力军集结于东西赵堡一带。因伤病千余人转运困难，病员增多，粮食有时缺少的关系，部队情绪稍有波动。需要调整与动员十天左右，才能按军委指示出动"。

陈谢集团主力进攻潼关，并控制了由新安到灵宝一带陇海路，半个多月连克数县，歼灭敌军2万余人。蒋介石大为震惊。9月20日蒋介石亲临西安部署防御，胡宗南也从陕北回到了西安。为了守卫关中，国民党统帅部从大别山空运整65师到西安，并从陕北、晋南调回了一部兵力，由裴昌会担任陕东方向总指挥。国民党军方面增强了潼关方向的守备，陈谢要向西进肯定会遭遇恶战。

毛泽东审时度势，看到潼关一带集结敌军十个旅，我军难于得手；东面李铁军兵团只有六个旅，较为分散，23日致电陈谢，要他们调转方向，回头东打新安，消灭整十五师。命令四纵十二旅和三十八军十七师进军陕南，收复根据地。三十八军主力在陕县、灵宝地区剿匪，巩固新区。陈赓执行毛泽东的指示，9月26日率四纵主力从陕县隐蔽东进悄悄到达渑池以东的铁门镇附近。

李铁军对陈谢的行动一无所知，命令武庭麟整十五师占领新安、铁门；他自己率整三师向宜阳进攻，企图配合胡宗南东西夹击我军。30日夜里，四纵十一、十三旅从两面接近铁门随即发起攻击。驻守铁门的是整十五师的六十四旅，师长武庭麟随其行动。我军没摸清情况，地形不熟，攻击没有成功。于是我军将铁门包围，构筑工事，准备10月2日再攻，敌军发现陷入重围，1日企图通过南面突围。由于我军占据制高点，他们突围没有成功。2日晚发起总攻，敌军坚持不住，我军大获全胜，将六十四旅大部歼灭。除武庭麟等少数脱身外，我军共俘虏敌人2 100余人。

李铁军得知六十四旅被歼灭，立即指挥整三师放弃洛宁，向洛阳市收缩，陈赓决定将整三师截在韩城镇予以歼灭。10月3日，四纵主力已逼近韩城，因天降暴雨，九纵未能及时渡河。整三师三个旅在韩城靠拢，修筑工事；并与河南岸宜阳的两个旅互成犄角之势。

由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此时洛阳的守卫相对较为薄弱，陈赓指示十、十一旅攻击洛阳西关，如果不好打就佯攻，吸引韩城之敌回援，如果顺利索性就把洛阳打下来。8日开始进攻，经过两天战斗打到了洛阳西关城门下，洛阳城内守军不断告急，韩城的整三师匆忙回撤，陈赓决定停止进攻洛阳，部队转移到新安、铁门、韩城一带休整。

从8月24日渡过黄河时到10月初，陈谢兵团挺进豫西，转战于陇海路潼洛段和豫西、陕南地区，连克12县，歼敌3万余人，预留等陈粟大军形成一个“品”字形插入国统区。我军的战略进攻打乱了国民党军对山东、

陕北的重点进攻。陈谢军团出兵豫西，有力地策应了我军陕北的行动。

10月下旬陈赓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率领部队开始行动，东线部队主力，在伏牛山东麓南北300里战线上，即在平汉路西侧，北起登封，南到南召间的广大地区发动新的进攻，相继解放临汝的10座城市，这就是著名的伏牛山战役。到11月26日胜利结束，歼敌12 000余人，豫陕鄂解放区已扩展到南邻汉水，北至陇海，西抵丹江东至平汉的广大地区。

作为挺进中原一路，陈谢兵团自1947年8月渡过黄河到12月底平汉战役结束，挺进豫西，南进千里，在陇海西线、伏牛山东麓、平汉路南段，连战连胜。五个月间，总计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及地方土顽5.6万余人，解放县城36座，解放人口900余万，解放区的广大地区连成一片，互为犄角，互为补充，胜利的完成了当初的战略使命。

注释：

①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②同上，第232页。

③陈赓：《挺进豫西》，人民日报1961年1月1日。

刘邓 陈粟 陈谢三军站稳中原

刘邓大军经历了千辛万险，终于在 1947 年 8 月份进入大别山地区，8 月 27 日，邓小平政委以中原局的名义起草了《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30 日以刘邓名义上报中央军委。邓小平预料："要在大别山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要经历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发展半年以上的时间，如果不大量地歼灭敌人，充分地发动群众，要想站稳脚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该戒骄戒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

但是邓小平对前途的估计是乐观的，他指出："大别山区有长期的革命传统，并且保存着游击战争的基础，我们有许多本地干部。特别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军上下一致的决心和信心，胜利是有把握的。"对于如何完成任务，邓小平指出了三点：一要发动群众，向他们说明我们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特别要强调我们再也不走了。二是要在最初的一个月中我们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城镇，肃清土顽，为大歼灭战准备条件。三是严格遵守党和军队的各项规章制度，尤其是要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群众中间树立好的形象，使群众敢于接近我们，敢跟我们说实话，乐于跟我们接触。

蒋介石得知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的消息之后感觉十分不安，他坚持认为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不是毛主席的战略举措，而是被迫临时决定的，他在南京国防作战会上指出：如果刘邓真能占据大别山，东可威胁京都，西可威胁武汉，南可阻碍长江运输，在战略上对于政府是一个很大的顾虑。但是他感觉可以对付刘邓大军，大别山区地理位置特殊，东面有津浦路，西面有平汉路，北面有淮河，南面有长江，这些交通线都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中，国民党可以自由运动，共产党却不容易逾越。

大别山地区原来是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1932 年张国焘带领红军主力去开辟川陕根据地，国民党军占领了大别山区，对当地居民进行了疯狂的清剿。因此，当地居民对共产党这次的到来能否站住脚跟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我军进入大别山以后，很少有群众出来帮助我们，向导找不到，吃住也成了问题。据陈再道回忆说："我们部队刚到大别山区，不熟悉山地、稻田地区作战；衣食住行也不习惯。时值九月，夜晚天气冷，指战员们还是穿着一身单军衣，夜里睡觉只好盖上稻草御寒。北方人初到南方，大米吃不惯，有些同志吃了就拉肚子。平地走惯了，爬山、走稻田小路就很困难，从军用地图上看，到某个村庄是十多公里，结果翻山越岭走了半天才到达目的地。到了一个村庄，只是几户人家的什么弯子，一个营住不下，住一个连也够挤的，只好露宿。加上蚊子咬，不少同志身上长了疮，发疟疾的也很多。特别在战斗中，受伤的同志要部队自己抬下来，转到指定地点，然后由各旅教导队和我们纵队教导员以及机关的同志，抬着自己的伤员翻越七百多米的飞旗山，转送到金寨后方的医院。过去内线作战中没有遇到的困难，现在都出现了。"①

经过刘邓深入的思考，要取得群众的支持和改善部队的情况，急需打几个胜仗，不过在刘邓刚进入大别山区的开始的几个战役都没有打好，使部队陷入了困境，这令刘邓十分气愤，就在这个时候，陈粟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于9月27日越过陇海路，向豫皖苏进军。这对中原国民党军又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它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刘邓大军，分散了对刘邓大军的围堵的兵力。毛泽东十分关注刘邓大军的处境，10月4日致电刘邓，指示要他们分散大敌，歼灭小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在中央的指导下打了几个胜仗之后，果然国民党军开始感觉到共产党的威胁，国民党军停留在大别山以北地区，因大别山地区山高路窄，国民党军的机动部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国民党无计可施，只能等待白崇禧前来指挥。这样我军就在黄安、麻城一带得到了休整，开辟了根据地。1947年11月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鄂豫皖、豫皖苏和豫陕鄂地区，以"品"字形式在中原战场展开，把战线从黄河南北推移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后方基地转变为人民解放军威胁南京、武汉及国民党江南基本统治区的前进基地。这是一个对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的胜利，对于这一点，国民党军在后来做的检讨中这样写道："大部华中地区全为匪军糜烂，我全盘战略形势，乃从此陷入被动。"惊慌失措的蒋介石，既怕解放军在中原地区站稳脚跟，又怕解放军乘势南渡长江或西经大巴山入川，因此几经筹划，于11月7日，下达了"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的指令，决定由其国防部长白崇禧坐镇九江，担任总指挥，统一指挥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区"围剿"的部队，并指导豫、皖、

赣、湘、鄂等五省政府，目标是彻底铲除平津浦路以西，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淮河以南大别山区匪患。

11月27日，白崇禧刚组织的九江指挥人员到达九江，12月4日，又从九江转移到汉口，决定组织一场会战。为了保证会战的胜利，白崇禧调集了原来追堵刘邓大军的部队在内的共15个整编师33个旅的兵力，其中包括精锐部队和他的嫡系部队，军队进驻汉口。企图摧毁新建立的大别山革命政权，使刘邓大军失去活动空间，从而歼灭刘邓大军或迫使它向北撤退。为了配合白崇禧这次会战，国民党军统帅部还调动陆军徐州司令部和西北晋绥公署来分别牵制陈粟、陈谢大军。

大别山根据地能否巩固，是中原解放区能否最终建立和巩固的关键，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因此，中央军委除敦促晋冀鲁豫军区尽可能动员一批新兵和治愈的伤病员及调集一部分军需物资由晋冀鲁豫军区第十纵队护送，快速地向大别山区前进，力争快速供给部队外，又做了如下重要决策：刘邓大军尽一切可能坚持大别山斗争；陈粟及陈谢两部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至粉碎敌人对大别山区的进攻为止；陈谢集团开创的豫陕鄂解放区改归中原局领导，陈谢集团归还刘邓野战军建制。

围攻大别山的国民党军采取了分进合击的部署，以5个整编师自黄陂、广济、浠水、太湖、潜山之线呈半月形态势分路由南向北稳步推进；以3个整编师另4个旅位于商城、光山、罗山、信阳之线由北向南担任堵截任务，其余部队控制要点，随时准备做短距离出击配合主力并防堵解放军突围。刘伯承、邓小平分析了大别山区的斗争形势，认为国民党军在兵力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且密集靠拢，难以捕捉战机，而且根据地处在创立的初期，群众尚未充分发动，粮食等军用物资难以补给充足，中心地区山高路少，不利于较大兵团回旋作战，因此决定以邓小平、李先念和李达率领野战军前部指挥部和第二、三、六纵队，坚持大别山内线；以刚进入大别山区的第十、第十二纵队分别向国民党“围剿”军的外翼、平汉路以西的桐柏、江汉地区挺进，创建新的解放区。第一纵队在刘伯承直接指挥下跳转淮河以北，在沙河、淮河之间积极活动，外线配合坚持大别山内线的3个纵队，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将敌牵制在外线，以小部牵制大部的国民党军，以大部消灭国民党的小部的方针，除以小部队结合游击队、民兵武装等坚持地区斗争外，大部分的主力迂回到敌后，与敌人盘旋打转，伺机以歼灭国民党小部兵力。为了取得大别山战斗的胜利，中原局号召大别山军民立足于大局



坚定地克服一个时期的困难，拖住围剿军主力在大别山区几个月，以利于陈谢、陈粟军团大量歼灭敌人，并掩护第十、第十二纵队和第一纵队在桐柏、江汉和淮西地区的发展。

11 月 27 日，国民党军队大别山区的围剿的行动开始了。12 月上旬，刘伯承率第一纵队向淮西地区挺进，第十纵队向桐柏前进。中旬，第十二纵队向江汉地区挺进。邓小平指挥的 3 个纵队，除一小部分在内线活动外，主力适时跳出合击圈，转到围剿军的后方，以旅、团为单位，在当地武装的配合下，积极歼灭小股的国民党军，迫击其交通运输线，并在有机可乘的情况下，又适时集中一部分主力进行歼敌一个营、一个团为目标的歼灭战。刘邓野战军的这种分散与集中相结合、内线与外线相结合、坚持原解放区和创建新解放区相结合的机动的灵活的作战方法，使围剿的国民党军迅速陷入疲于奔命、又处处扑空、处处挨打的困局，在一个多月的反围剿作战中，3 个纵队及广大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共歼灭敌人 1.1 万余人，收复县城 10 多座。同一期间，跳出外线再展开的 3 个纵队，分别进入桐柏、江汉和淮西地区，第十、第十二纵队改建为桐柏军区和江汉军区，初步打开了局面，第一纵队进入淮西后会同豫皖苏三个军分区进一步加强了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剿灭国民党军一些土杂武装。

在刘邓野战军坚持大别山斗争和一部分主力实行再展开创建新解放区的同时，担任配合反围剿任务的陈粟野战军和陈谢集团也于 12 月 13 日开始对平汉路郑州、漯河段和陇海路郑州、兰州段实行大破击战，连克许昌、漯河等重镇和沿线大部分车站。接着两军合力平汉路向南扩展攻势于 12 月下旬在西平、遂平之间的金刚寺、祝王砦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兵团兵团部和整三师共约万人，并围攻确山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师，威逼豫南重镇信阳，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从围剿大别山的兵力中抽调 3 个整编师 13 个旅回援平汉路，鉴于调动国民党军的战略目标已经达成，陈粟、陈谢即撤确山之围，转入休整。两军在平汉、陇海路的 20 余天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 4.5 万余人，解放县城 50 余座，破坏陇海路 420 余公里，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刘邓野战军在大别山区的反围剿作战，而且使中原地区国民党赖以调动兵力的交通线陷入瘫痪状态，沟通了鄂豫皖、豫皖苏与大别山区的联系，从而为下一步集中大兵力作战创造了条件。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从 12 月初开始，以击破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地区的围攻为目的，密切配合，由战略上的协同逐步发展到战略上的直接配合协

同，共歼灭国民党军6.9万余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1948年1月15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报告说："现在看来，我们业已站稳脚跟，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美国合众国际社也在1947年12月29日发出的一篇报道中说："白崇禧华中指挥部对大别山为时达几个月的围攻，所得的结果不过是：一，刘伯承部分成若干小股，互相呼应；二，刘邓回到大别山基地；三，共军在鄂北大洪山建立了新的基地；四，另一路共军包括一部分刘军，在汉口、宜昌公路沿县建立了基地"。围剿总指挥白崇禧则不得不承认"他们虽占领了大别山各县城和重要据点，不过匪的全部主力尚未击破，按过去鄂豫皖三省剿匪，当时我们六七十个师的兵力，尚费时三四年，今天要清剿大别山区匪患，必须假以时日，才能完成清剿的全功。"②

这样，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战略格局形成了。中原地区已经从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为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进攻的前线。国民党统帅部调整部署，集中以整编第五师和第十一师为骨干的六个整编师，组成机动兵团，依托平汉、陇海、津浦三条铁路机动使用兵力，同人民解放军周旋。陈粟根据这一新的动向，报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决定以一部分兵力继续执行开辟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而集中六个纵队的主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开展声势浩大的铁路破击战，以便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机动能力，威胁他的战略重地徐州，并为中原三路大军的密切配合创造条件。

破击战自11月8日开始，首先指向开封至徐州之间的陇海铁路。战士们说："过去咱们跑路，你们坐火车，嗨，现在一起用两条腿比赛比赛，看谁能吧！"③他们掀翻铁路，挖断路基，炸毁桥梁，历时十天，完全破坏了陇海线铁路二百多公里，还攻克了民权、虞城等九座县城，歼灭国民党军队11 000余人，接着他们对津浦铁路的徐州蚌埠段进行了破击作战。12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在致电刘邓的信中指出准备"与陈谢、陈粟两区连成一片"的任务。9日，在致粟裕并报告刘邓、陈谢电中又明确要求："如无重大不便，粟部以攻击平汉郑许段以配合陈谢攻击许信段为宜。""如粟定于13日攻郑许段，则陈谢攻许信段时间，可与粟同时举行，亦可提早几天举行。"④粟裕随即率主力沿平汉铁路南下，平汉路破击战从2月13日发起，到24日，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个师和陈谢集团的第四纵队一起将从豫西赶来增援的国民党军第五兵团部和整编第三师合围于西平以南的祝王砦、金刚寺地区。经过两天的激战，全歼第五兵团部和整编第三师9 600人，陈粟大军和陈谢集团实现了会师。



平汉路破击战的胜利有着重大的战役："平汉路战役，是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进入中原战场后的首次协同作战，斩断了国民党军事运输大动脉平汉路南段，夺取了国民党的屯兵基地许昌、漯河、驻马店等重要城镇，并再次破击了陇海路，孤立了国民党河南省府开封，严重威胁国民党战略中心指挥中心郑州，打乱了国民党在中原的军事部署，使国民党军围攻大别山的计划未能实现。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陈谢集团和刘邓野战军各一部于12月底在确山地区会合。至此，以大别山为中心的刘邓野战军鄂豫皖根据地，同西线兵团豫皖苏根据地、陈谢集团、豫陕鄂根据地已连成一片，胜利完成挺进中原的战略任务。"⑤

注释：

①陈再道：《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163页。

②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史稿 第五卷 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页。

③季音：《陇海路破击战》，《陈粟大军征战记》，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页。

④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8、341页。

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页。

陕甘宁边区保卫战

随着刘邓大军、陈粟大军、陈谢集团在南战场上大举进行战略进攻，战争形势已发生了改观。国民党军队在黄河以北全面转入战略防御，国民党方面的战史写道："斯时，国军为击灭刘伯承匪部，对原定攻势构想加以修正。"就在此时，东北、华北，西北战场均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都占有优势。

早在 1934 年 11 月，刘志丹、吴岱峰、习仲勋等领导的西北红军成立了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1937 年 1 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1935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这里就成为共产党的根据地中心，中共中央所在地。1937 年 9 月，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中共中央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建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它是一个边区的自治性地方政府，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之后蒋介石命令胡宗南调集 39 个旅、23 万多人的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1947 年 3 月 19 日，毛泽东等率领共产党中央机关和部队，撤离延安。从 3 月到 8 月，共产党军队对国民党军发动多次突袭性战役，其后国民党军退出陕甘宁地区。1948 年 3 月 28 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东渡黄河，迁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陕甘宁边区建制依旧存在，但已被蒋介石政府认定为非法。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甘宁边区的建制撤销，政府解散。

陕甘宁解放区，亦称陕北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立的老根据地。它东临黄河中流峡谷，西到环江，南依渭北山区，北靠长城，包括陕西北部和甘肃、宁夏东部共 20 多个县面积约 10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160 万。首府延安，自抗日战争以来一直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也是全国各解放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全面内战一开始，这个地区就被列为国民党夺取的主要战略目标。这个地区虽然人口稀少，土地贫瘠，物资匮乏，粮食供给尤为困难，但经过中国共产党十多年的经营，群众的生活已经有很大的改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都很高。再加上这个地区



属于黄土高原，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回旋余地甚大，非常有利于人民解放军轻装机动作战，打游击战和运动战，而不利于国民党重机械化军队行动。

1947 年 7 月 30 日，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番号定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兼前线委员会书记，下辖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纵队，另两个野战旅，共约五万人。同月，中央军委为加强西北地方武装的建设和后方工作的领导，决定将晋绥军区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下辖晋绥军区和陕甘宁五个军分区。

西北野战军为了创造战机歼灭敌人，配合太岳兵团出击豫西，于 8 月 6 日，围攻长城要塞榆林，调动胡宗南部队北援。榆林为晋陕绥边境的反革命重要据点，是陕北、晋西逃亡地主的集中地，西与宁夏马鸿逵集团，南与延安胡宗南集团构成犄角之势，北与傅作义集团相依，为陕绥之重要门户，塞外沙漠与西北高原之连接点，守敌为邓宝珊部四万余人。开始守军只是稍许抵抗，随后便拖枪逃跑，被新四旅截歼一个连。新四旅主力、三五九旅协同一纵夹击三岔湾守军，守军新十一旅二团和二十八旅二营扼守碉堡顽抗，终被解放军全歼。随后，三五九旅独五旅乘胜追击攻占城东无量殿，野战军主力同时攻占机场外围据点。蒋介石深恐榆林丢失，宁夏孤立，影响西北整个战区，命令胡宗南抽调出十个半旅，共六万三千多人，迅速分路北上，解榆林之围。并企图趁我主力攻榆林之际，寻找我党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歼灭我军于榆林、葭县、米脂三角地带，或逼我军过黄河。胡宗南并以整编三十六师组成援榆“快速兵团”，部队轻装前进，由飞机空运补给，取捷径星夜兼程北进。钟松是胡宗南手下的一员大将，他下辖三个整编旅，即二十八旅、一二三旅、一六五旅，共有 3 万多人，为半美械装备。

8 月 14 日，毛泽东、周恩来还在行军途中，就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彭德怀：“集中 8 个旅打钟松于绥德、镇川以东以北山地是好机会，不知部署来得及否?”西北野战军随即以一部兵力阻击刘戡等部，集中 6 个旅兵力于沙家店地区，准备围歼整编第三十六师。17 日，钟松终于进入解放区的设伏区。

彭德怀司令请示军委，果断地撤出榆林之围，集中兵力首先打援，将我军主力隐蔽于米脂县沙家店地区，以小部队佯做东渡黄河。胡宗南根据电台测向和空军侦察报告，误以为我军要东渡黄河，下定“迅速追击，勿失此

千载良机”的决心，急令各路敌军迅速追击。并以整编第二十九军等五个旅由绥德北进，整编第三十六师主力两个旅由榆林南下镇川堡再折向东，企图夹击我军于葭县地区。我军以一部分军力阻击整编第二十九军等部，集中六个旅兵力于沙家店地区，8 月 28 日，将孤军冒进的敌整编三十六师部及其所属一六五旅，一二三旅，共六千多人包围全歼。这是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的第一个胜仗。胡宗南主力北上，沿途为我地方兵团、游击队不断袭扰，群众藏粮、断水，补给困难，部队减员很大，尤以三十六师最为严重。该师每旅原有万余人，最后只剩三千余人。

沙家店战役后，胡宗南在陕北的全部兵力只剩下 14 个旅，其中机动旅不超过 7 个旅，标志着敌人对我陕北的重点进攻彻底破产，我军从此转入反攻。沙家店战役后，我太岳兵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威逼陕南，震动西安。胡宗南异常恐慌，急令深陷绥德以北的八个旅，撤回延安以南。8 月 27 日敌军开始沿咸榆公路南撤。我军沿公路追击、侧击、截击。9 月 1 日，二纵在国民党军侧翼抄小路展开平行追击，9 月 2 日赶到清涧的石嘴驿、九里山一带拦截整编第一军，在俘获国民党军 140 余人、毙伤数十人后，又奉命到永坪地区展开活动。9 月 9 日，二纵在曲思教、聂家坪一带，伏击了国民党军前往清涧送粮后回归延安的一个辎重运输队。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歼其一个营和坦克连。9 月 12 日，国民党军第十七师十二旅到达清涧南三十里铺并露营于清涧河两岸。三天之中，西北野战军击毙击伤俘敌 4 000 余人。14 日于岔口、关庄击溃其两个旅，16 日又击溃其两个旅，共击毙击伤敌军四千余人。胡宗南历时一个月，才将他被打的七零八落、残缺不全的部队收拢起来，撤回延安地区。岔口追击战虽是击溃战，但从此造成了西北战场大举反攻的新局面。

9 月到 10 月，我军乘敌后方空虚，发动了延清战役，占领延川、延长，攻占清涧，歼敌整编七十六师部、二十四旅旅部和六个营共八千多人，迫使胡宗南放弃延安以北的据点。接着乘胜扩大战果，又进行了黄龙战役，占领白水、黄龙、韩城，扫清黄龙山区据点，歼敌七千多人，使关中、华北连成一片。

西北野战军经过九个月来的艰苦作战，已经由原来的六个旅，两万五千多人，增加到五个纵队十六个旅七万五千多人，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并与晋西南解放区连成一片，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西北敌军虽还有三十九个旅，二十三万多人，但战斗力已大大削弱，并先后调出三个整编师救援豫西，整个



陕北敌军被迫采取守势，主力部署于延安以南，洛川、黄陵、宜君、宜川地区，企图确保延安，阻止我军南进。1948 年 2 月，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以后，主力转入外线作战。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亲自到宜川一带侦察地形，审时度势，运筹帷幄，胸中已有妙计。他使用“围点打援”战术，选定以突出我陕北解放区边缘的敌人供应站宜川为突破口。宜川地处黄龙山脉之中，道路崎岖，峰峦起伏，如敌增援便于我军歼敌。我率先攻宜川，调出敌人，创造战机。第三纵队于 2 月 24 日迅速包围宜川，以主力隐蔽集结在宜川通向洛川公路的两侧瓦子街周围地区。宜川守敌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面临被歼危险，向胡宗南告急，胡宗南急令他的主力整编二十七军军长刘戡，率两个整编师四个旅共两万四千多人，由黄陵、洛川东援。一年来刘戡与我军交战，吃尽了苦头，使这个狂妄自大的“名将”变得小心翼翼，忧郁多疑，只顾保存实力，避免与我军接触，行动迟缓。可是，我军猛攻宜川，拿下了外围屏障太子山、外七郎山，逼得张汉初在报话机里哭哭啼啼向刘戡呼救。胡宗南电令刘戡：“立即前进，不准停留！”刘戡只得率部前进。27 日，到了瓦子街任家湾地区，被我设伏的九个旅团团围住。锁住敌人退路的是三五八旅的山头阵地。敌人见势不妙，拼死命夺取山头，企图突围，我军继续打退了敌人三十多次的轮番冲锋，敌人尸体堆满了山坡。我各部队继续攻击，包围圈越来越小。经过两个昼夜激战，敌人全部被歼，生俘敌军一万八千多人，击毙击伤敌军五千多人，军长刘戡和九十师师长严明被我军击毙。3 月 3 日，又攻克宜川，全歼守敌二十四旅五千多人。四天共歼敌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部，五个旅，共约三万人，在西北战场上获得空前的大胜利。特别是胡宗南主力刘戡部队的全军覆灭，使西北和中原战场的敌军官兵胆战心惊。

宜川战役，使胡宗南的机动兵力大部被歼，敌人在西北的防御体系趋于瓦解。3 月 5 日，我军主力继续南进，乘胜向西向南进攻，连攻石堡（黄龙）、白水，宜君等城，扫清渭河以北分散守备之敌，除洛川被包围外，其余守敌或望风而逃或投降，我军解放了洛川以南广大地区。延安守敌整十七师面临被歼危险，惶惶不可终日，于 4 月 21 日放弃延安，25 日又放弃洛川。逃敌被我追击，重武器全部丢弃，歼三千余人，我黄龙山区遂即解放。革命圣地延安，于 4 月 22 日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收复延安的喜讯迅速传遍全国，解放区军民奔走相告，欢欣若狂。

4 月 24 日，中共中央给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及西北人民解

放军的贺电说："庆祝你们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去年3月17日国民党匪军占领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断言这种占领将标志着国民党匪军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一年多来一切事变，充分地证明了这一断言"。

我西北野战军继续主动地向敌进攻，大踏步向敌人后方西府（指西安以西宝鸡地区一带）、陇东进军。彭德怀在进军动员会上说："蒋介石、胡宗南占领我们延安，我们这次要捣毁他的后方宝鸡，不久还要占领他的西安、南京！"4月17日，全军向西府开进，18日强渡泾河，占领永寿，斩断西（安）兰（州）公路，21日继克武功、麟游，切断西安宝鸡铁路。4月26日，我一、二纵队直取宝鸡，一举破城，歼敌整编七十六师，敌中将师长徐保重伤被俘后，次日毙命。宝鸡是胡宗南后方供应基地，又是通向四川、汉中的咽喉，军用物资屯积极多，均为我缴获。3月，敌为确保西安，急忙由豫西调五个整编师回援。4月下旬，敌裴昌会集团有十一个半旅逼近宝鸡，宁夏马步芳的整八十二师，也向长武、亭口前进，又占领我永寿、栒邑，切断了我军东退归路，并向麟游急进，使我军陷入背水侧敌的被动地位。我军遂主动撤出宝鸡，北上至肖金镇、荔镇，突出重围。5月中旬回至马栏、高王镇地区。西府、陇东战役历时一月，转战一千五百余里，歼敌七十六师、九十师、三十八师等部二万一千九百多人，一度解放邠、凤翔、扶风等十四座县城，摧毁了敌人西北后方基地，陕甘宁边区也化险为夷。

“九月攻势”的失败

1947年8月间，蒋介石不顾在山东战场遭到的空前惨败，又制定了进攻胶东的“九月攻势”计划，企图在短时间内占领胶东，切断华东野战军与东北、华北的联系，断绝华东野战军后方接济，将华东野战军胶东部队消灭于胶东半岛，以抽调兵力回援中原。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九月攻势”，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胶东军区前线指挥部将和华东局协同指挥作战。随后，根据华东野战军总部和华东局的建议批准成立了东线兵团。谭震林率领的第二、七纵队北上胶东，同许世友指挥的九纵、十三纵会合，组成华野东线兵团（即山东兵团），由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兼任政委。配合外线作战，把国民党军引向渤海之滨，牵制和消灭山东境内的国民党军，保卫胶东，收复失地，粉碎敌人的进攻。

此时，蒋介石还没发现刘邓大军的作战意图，自恃在山东战场上保持着局部攻势，还在做着“九月攻势”的美梦。他还拼凑了6个整编师、20个旅的兵力，组成胶东兵团，由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在海军和空军的配合下，大举进犯胶东，企图占领胶东半岛，切断山东解放区与东北、华北的海上联系，从而摧毁中共的战略后方，支援中原战场。胶东是中共华东总后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里人口稠密，经济富饶，是当时华东局机关所在地，也是华东野战军军事供应主要基地之一。境内有医院、军工生产单位和大量的军需物资。这里是老根据地，群众条件较好，又同辽东半岛隔海相望，交通便捷，可以同东北解放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蒋介石看来，这是华东野战军必将全力守御的地区。这里又是地处黄海和渤海之滨的牛角形半岛，北、东、南三面环海，如果西面的退路被国民党军重兵堵塞，解放军便难有机动回旋的余地，因此，是同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的理想场所。

当时的山东兵团，士兵有很多是胶东人，对如何应对国民党军对胶东解放区的进攻，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集中主力于胶东内线歼敌，以保卫胶东

解放区这个华东全军供应的主要基地；另一种主张以部分兵力在内线阻击作战，而把主力置于外线来，调动进攻胶东的敌军。中共中央华东军倾向于第二种主张，并向毛泽东报告说："最大的顾虑是如敌采取齐头并进，如果万一打的不好，三面背水，机动困难，有被迫决战和最后拼命的危险"[①]。8月25日，毛泽东复电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和副政委黎玉，同意这个意见。电文说："蒋介石似乎判断我主力必守胶东，企图以四五个师向胶东进攻，吸引我主力进入内线后，即在青岛、平度、掖县建坚固工事加以封锁，以二师左右守备该线，然后以三四个师向东攻击。""蒋介石必在胶东方面全力速决，以便抽兵。因此我们完全同意你们一部位于内线，以主力（二、七、九纵队）位于外线，以利持久之方针。只有谭率领的三个纵队在外线（诸城一带），寻机打一二个小胜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敌即不敢向胶东深入，胶东大部至少一部即可保全。"[②]

根据这个指示，华东局立刻作出部署，但第九纵因正值雨天无法迅速开到胶济铁路以南，经请示中央军委并得到同意后，由许世友率领第九、十三纵队（第十三纵队是刚由胶东地方武装升级组成的）等留在胶东内线坚持斗争，由谭震林率领第二、七纵队等处在胶东以南的诸城地区，威胁进攻胶东的国民党军队的背侧，配合胶东内线作战。

国民党军胶东兵团在完成作战准备后，9月1日起，从胶济铁路东段的潍县至胶县地区出发，当时国民党军的行进很是壮观：天上有飞机，地上坦克、大炮和步兵，后边还紧跟着恶霸还乡团，所到之处一片血海，一片废墟，一片荒芜。进犯胶东的国民党军总指挥范汉杰，接受以往将军被歼的教训，无论其兵力如何优势，都不敢贸然突进，而是以4个整编师并列为前梯队，2个师紧紧尾随，采取了齐头并进、密集平推的战术，分四路向胶东腹地挺进。这里是老解放区，当地民众和地方武装为了保卫家乡，在许多地区设立了地雷网，给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带来了很大的杀伤。同时，华野九纵、十三纵和地方武装节节阻击国民党军，经过平度以西之潍河、招远西南之道头、莱阳西南之水沟头等战斗给国民党以重大的打击。但在胶东战场上，解放军在军事上仍然处于劣势。在"九月攻势"中，国民党军在付出1.4万余人的重大代价后，相继占领了胶县、高密、平度、昌邑、掖县、荣成、栖霞、招远、龙口、黄县、蓬莱、福山、诸城、莱阳等15座县城，30日占领烟台。这些都是胶东的重要城市，是比较富庶的地区。它们的相继失陷，给山东解放区带来了不少的损失和困难。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新闻局长邓文仪在



攻占烟台后，向新闻界招待会兴高采烈地声称："烟台当胶东北部沿海之要冲，自共军开始叛乱以来，实为其东北与胶东唯一之交通捷径不啻为共军之命脉所在，其以关外共军兵员粮食及关内共军武器弹药来源之起卸点，全在于此，对共军叛乱之成败兴，实较延安更有过之"。"烟台收复以后，山东作战之国军只需分其实力之一半，即足以攻取河北共军根据地，更可以调动部队增援关外，以收复东北领土主权，由此可知烟台之收复为共军全盘战略之失败，亦即为抗战结束以来国家统一建国致命危机之消除。"③范汉杰大肆鼓吹"胶东胜利"，得意忘形 。在现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仍留在胶东内线作战的部队的处境已经日益艰难，必须采取新的对策。

胶东三面环海，形同牛角尖，越往东地域越狭窄。由于国民党军步步推进，胶东根据地越来越小，聚集了机关、部队、医院、群众及军用物资，越来越拥挤，给我方造成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夺取战争的主动权，就成了扭转胶东局势的关键。中共中央致电谭震林、许世友道："你们一部应为于胶东内线阻击，主力位于外线，待机歼敌，只要你们打一、两个胜仗，敌人就不敢深入胶东，胶东大部至少一部可以保存。"根据这一指示，山东兵团决定，由各分区独立团等地方武装在胶东内地继续坚持内线作战，九纵、十三纵掩护着华东局机关向外插。

9 月 22 日夜，中共胶东主力部队从国民党军第八、九师结合部突围而去。在漆黑的夜里，几万人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听不到一句说话声，看不到一点火光，一夜急行军走上百里路，从国民党军队的夹缝里穿越而过。天快亮的时候，先头部队在大泽山东北方向与国民党军第九师侧翼部队相遇，解放军坚决出击，将国民党军击溃。部队转到了国民党的后方大泽山区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和牵制国民党军。兵团决定：十三纵留在大泽山坚持斗争，九纵继续向西南跃进。此时，谭震林同志亦率领第二、七纵由诸城北上，9 月 29 日夜，二纵横扫胶济路潍县、高密段，歼敌 1 500 余人。10 月 1 日，二、七纵胜利会师于高密以西朱阳地区，粉碎了国民党军企图聚歼解放军胶东主力部队的狂妄计划。

10 月 2 日，第二、九纵队将国民党军第六十四师主力包围在胶河东岸的范家集。这一计划杀得国民党军防不胜防，只能拼命固守等待援兵，范汉杰不得不调兵分三路回师救援。更大的战斗开始了，二纵全歼西路援军二一一旅，活捉师长以下 8 000 余人，七纵歼敌一五六旅和二一二旅一个团。增援的整九师一开始就被华野七纵、九纵 2 个师阻击于红石山一带。解放军死

死坚持了四昼夜，使援军与六十四师隔山相望，前进不得。范汉杰急不可耐，又抽调了进攻胶东内地的八师、五十四师等部火速增援。至此，解放军调敌回援的目的已经达到。十三纵在配合作战中，攻克掖城，全歼守军2 700余人，四纵及滨海地方武装乘机南攻诸城，歼国民党军300余人。10月10日，胶河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收兵南下在景芝地区休整。

从11月上旬起，国民党开始在胶东战场上采取了守势，分散守备几个战略要点，整编第八、四十五、五十四、六十四师等部，分散地守备蓬莱、龙口、烟台、威海、莱阳等要点。而将二十五师、九师集结，准备转运大别山区和徐州战场。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兵团要尽力延阻九师他调，以配合中原战场。11月6日，第九师开始从高密西进，因为解放军发动突然袭击而被歼灭1 000多人。范汉杰急于调九师南运，命令六十四师及一九八旅沿高密铁路增援。第九师在蒋介石所谓“不吃亏就是胜利”的思想指导下，西援惧歼，便掉头迎着援兵向东回窜，华野二、七、九纵紧追不放，并用了七个小时攻克了高密，歼灭国民党军2 300多人。国民党军空运计划失败，又准备改海运南下。

此时，在胶东内地的十三纵将国民党军五十八师围困在海阳，范汉杰又令一九八旅东援。当一九八旅进入上下仙游一带时，被我纵赶上包围。范汉杰只得再调九师得七十六旅复返增援，并令七十四师的五十七旅由灵山北上，又被解放军包围和阻击。这回范汉杰慌了手脚，令在城阳掩护九师海运的六十四师北进，并将八师的3个团由烟台海运来援。国民党军以三个团被歼的代价，方才突出重围，一个月的胶州、高密破击战结束了，解放军共歼敌一万余人，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西援计划，收复了胶县、高密等线并控制了胶济线东段二百余公里，使胶东和滨海、鲁中等解放区连成一片。12月初，解放军又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了莱阳的守军。

莱阳，位于胶东半岛的中心地区，东临五龙河，南邻烟青公路，是连接四面八方的交通枢纽。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莱阳获得解放，曾为中共胶东军区和政府机关所在地。1947年9月，国民党军向胶东大举进攻，解放军退出莱阳，敌人则把这个胶东内地最大的县城作为插入胶东腹地的主要堡垒，大肆修筑工事，加强火力配置，城内驻有五十四师一个加强团和其他力量共1万余人。

在攻莱阳前，解放军利用地方武装民兵和游击队，化装成主力部队，在莱阳城周边大张旗鼓地展开活动，在门板上写明九纵的番号，以大部队的名

义筹备粮款，打击小股敌军，扬言要攻莱阳城，弄得莱阳守备军整天提心吊胆。经过一段时间的袭扰，守军逐渐麻痹，以为解放军不过虚张声势罢了。12 月 4 日，战斗打响，黄昏时分，在怒号的大风中，七纵直扑城关，展开了激烈的城关争夺战，很快夺取城关，扫清了外围据点。国民党军只得收缩在城隍庙核心阵地负隅顽抗。此时援兵第五十四师、六十四师、八师等共8 个旅，由青岛经灵山分批北援，密集靠拢，步炮、坦克协同进攻，步步进逼。

情况紧急，攻城不可拖延，山东兵团调来了熟悉城内地形、担任过莱阳守备任务的十三纵三十七师，13 日，开始了最后攻击。炮击过后，枪林弹雨中，突击队员冲锋在前，见到敌军战壕就扔炸药包，壕沟被炸塌，暗堡里的守军被活埋，为后续部队铺平了道路。在朝阳升起之时，被国民党军侵占两个多月的莱阳城，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当莱阳城激战正酣之时，青岛到莱阳的必经之地水沟头一带，二纵阻击国民党军增援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着，国民党军六十四师师长黄国梁曾狂妄地说："攻不下水龙头，愿将头颅送青岛"。解放军的工事被摧毁了，战壕也被填平了，但国民党军在丢下 3 000 具尸体后，仍未前进一步，直到莱阳城被攻克那一刻，范汉杰还不死心，还想驱使部队重占莱阳城。解放军攻城和打援部队迅速调整了部署，从正面、背后狠狠地打击国民党军，敌被迫撤走。此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 1.7 万人。至此，国民党军只能龟缩在青岛、烟台、蓬莱几个孤立的据点内。那个吹牛皮的黄国梁，被打得伤透了心，吓破了胆。

群众的伟力在这场战斗中得到了凸显，在胶东战役过程中，胶东、渤海、鲁中解放区的广大党政军民，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援。特别是胶东解放区的军民，全力以赴支援作战前线，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是发动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保证野战军和地方武装有充足的兵源；二是组成运输队、担架队和拥军队，保证部队的战地抢运和抢救；三是组织敌后武工队，给敌主力军和"还乡团"以沉重打击；四是组织民兵、子弟兵团、远征爆炸队等地方武装，配合我主力部队作战。在各级党组织的广泛发动下，人民群众团结一心，同仇敌忾，成为胶东保卫战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解放军历时五个月的胶东保卫战，取得了歼敌国民党军队 6.3 万人的战果，完全改变了胶东的局势，整个山东站场的形势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有力地配合了外线兵团的战略进攻，同时对配合刘邓、陈粟、陈谢等外线部队作战，支援中原、华北战场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国民党军所谓的"九月攻势"，彻底被粉碎。

注释：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③《大公报》1947年10月2日。

内外线配合完成经略中原的战略任务

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胜利展开，内外线各战场的形势都发生了一些新的、重要的变化。在内线，由于国民党军主力的回援中原，留置在山东、陕北乃至华北、东北各战场的部队不得不放弃大批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将兵力收缩到大、中城市及一些主要交通线上，凭借坚固工事转入重点守备。在外线即中原战场，国民党军一面退守若干要点，企图“建立封锁，阻止共军继续扩大窜扰”，一面“编制有利而机动的兵团，遇机穷追猛打，以求歼灭共军主力”。由于国民党军在兵力上尚占有一定优势，因此这个战场双方暂时处于胶着状态。

1947 年 8 月 5 日彭德怀命西北野战军进攻榆林，牵制胡宗南部，使他无力东调。8 月 22 日晚，陈赓、谢富治率领的太岳军团共 8 万人，在晋南、豫北交界处强渡黄河，挺进豫西。9 月 26 日，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进入豫皖苏平原。谭震林、许世友在胶东也向敌人发起了进攻，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在中原地区展开，形成了人民解放军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格局。中原地区的战略展开，为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8 年 5、6 月份，中野主力先后发动了宛西、宛东和襄樊战役，并配合华野的豫东战役。中原打起来了，吸引了国民党军的主力。大别山、江汉、豫西、陕南等军区的压力明显减轻，各地陆续开始出击扩大和巩固解放区，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土匪势力，中原形势有了明显的改观。

豫西和陕南师土匪活动猖獗的地方。1948 年 6 月间，豫西国民党结合地方武装，乘陈赓主力到中原作战，掀起一次全国范围的反革命暴动。他们袭击我军后方机关、瓦解区县武装、暗杀我干部，给我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鉴于这一情况，我军要在这一地区站稳脚跟，就必须大力联系群众，做

好群众工作。同时要大力铲除匪患，让当地人民安居乐业，这样我们才会有群众基础，我们才会站稳脚跟。7 月，豫西军区召开鲁山会议，确定 8 月到 10 月开展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强大攻势，坚决打退反动派的进攻，宣传政策，依靠群众，瓦解敌人。军区报告剿匪经过说："首先是军事与政治交互运用，互为因果，直至彻底消灭土匪。剿匪为政治攻势开辟道路，而政治攻势又巩固剿匪成果，并为新的军事胜利做准备。其次是坚定的宽大政策与坚定地镇压首恶相结合。在军事进攻的强大压力下，给胁从分子以出路，解除其各方顾虑，争取瓦解。大量释俘。"豫西军区将剿匪与减租减息、工商业政策、调整农民负担等工作结合起来，大力开展宣传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向政策靠拢。同时统一领导坚决贯彻，统一军政力量，统一剿匪地区，消灭结合部。由军事进攻打开局面，继续政权建设与解决群众具体问题，不能半途而废。在这些政策的指引下，经过两个多月的清剿，豫西共歼土匪 3 199 人，瓦解土匪 1 430 人，基本上解决了为害多年的土匪问题，稳定了豫西的局面。

陕南的斗争更为艰苦。因陕南主力 12 旅回归主力作战，军区只剩下原三十八军部队和陕南地方武装。陕南的土匪相当难对付，军区同志形容他们为"地头蛇，地形熟，会爬山，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用高压来控制群众，强令他们，八路军来了要跑，不给他们带路、通信、交公粮，违者杀之。因而造成了我军不能掌握匪情，军事合击往往扑空。陕南土顽经内战时期同我军斗争直至现在，我们打游击的一套，土顽全学会了。并且土顽内部有不少我军叛变分子，我大军合击，土顽即分散隐蔽；我若不搜山驻剿，走后土顽又集合起来。"而陕南军区部队分散在各县建立政权和地方武装，显得部队新，力量弱，对斗争没经验。

总结经验教训，陕南军区采取"以敌制敌，以毒攻毒"的办法，"集中兵力有目标地、分地区、分股围歼之。以分进合击、快扑对敌之集中，以分散驻剿对敌之分散以搜山对敌之隐蔽，以穷追之对敌之逃跑。战斗动作要灵活巧妙，运用游击战术，放下正规作战办法，突然猛冲猛打，以及相等兵力轻装。"陕南主力 17 师运用这些战术，结合政治宣传，先后消灭和瓦解了均县、上关和南化塘地区的土顽，遏制了土匪和地主武装的活动。

在剿匪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当地游击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年与巩德方一起坚持斗争的留仙坪蔡兴运游击队，他们是本地人，地形熟，在敌后经过长期的锻炼，有斗争经验，与群众联系密切。因为蔡兴运保护群众利



益，所以每次大的战斗都有老百姓组织担架，转运伤员。同时他们善打游击战，遇敌扫荡则分散隐蔽，组织短小精悍武装与敌周旋，情况有利时就集中力量主动作战。经过两个月的剿匪斗争，陕南的局势大为改观。

1947年10月至1948年2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在大别山根据地艰苦转战，牵制国民党军白崇禧部33个旅的兵力，造成了国民党在中原、江汉平原的兵力空虚。刘邓抓住时机，确定“以小部消耗大敌，以大部歼灭弱敌，发展外线，开辟新区”的政策。分出一部分兵力，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积极开辟根据地。以大别山地区为中心，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的罗山、光山、经扶，黄陂、麻城、立煌、商城、潢川、广济等20个县全部和部分地区，建立了鄂豫军区。以王树声为司令员、段君毅为政委。在安徽淮西的宿松、太湖、潜山、望江县和桐城、巢县、六安等县部分地区建立皖西军区，以曾绍山为司令员，彭涛为政委。

晋冀鲁豫十纵、十二纵南下至大别山后，遵照刘邓的命令越过平汉路向桐柏、江汉地区展开。12月15日占领桐柏县城，又相继解放邓县、枣阳、新野等6个县，建立桐柏军区，以王宏坤为司令员，刘志坚为政委。十二纵在通过平汉路时建立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江汉军区，以张才千为司令员，刘建勋为政委。陈赓、谢富治集团在挺进豫西开展后已在伏牛山东麓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时，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进军豫皖苏，开辟了大片根据地。华野三、四、六纵由粟裕指挥，在灵璧、夏邑、永成、蒙城等地展开。陈士榘指挥华野一纵、八纵沿内黄、通许、尉氏、太康、淮阳等地展开。在陇海线以南，平汉、津浦路之间纵横驰骋。陈粟、陈谢与刘邓在大别山根据地在中原地区形成一个“品”字形态，可以互相呼应和配合作战。

1947年底，当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对大别山地区发起清剿后，刘邓局面越来越困难。毛泽东十分关注大别山的局势。粟裕和陈谢也表示要全力配合刘邓大军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用什么行动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支援刘邓呢？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军能够迅速调动几十个旅的兵力围剿大别山，最重要的是他们控制了铁路和公路交通运输线。如果切断国民党的交通线，特别是平汉路，必将大乱国民党军的部署，减轻大别山的压力。12月8日，粟裕和陈赓同时提出破击平汉路的方案。毛泽东当日致电陈谢：“因为敌人向大别山地区进攻，刘邓已停止破平汉路的计划，这是对的。请陈谢考虑是否仍有单独破击许信段铁路的必要。若陈谢以五个旅破该段，第一可以使该段

暂行切断，第二可将李铁军部调到东边，以利下一步向西行动。但是否可行望按实情定。”9日毛泽东看到粟裕和陈赓8日电报，定下破击平汉路的决心。指示粟裕、陈谢：“（一）如无重大不便，粟部以攻击平汉郑许段以配合陈谢攻击许信段为宜。郑许战役结束后，再打开封，并彻底平毁陇海郑州、兰封段似亦方便。（二）如粟定于13日攻郑许段，则陈谢攻许信段时间，可与粟同时举行，亦可提早几天举行。”[①]

粟裕作出决定，以陈士榘参谋长指挥华野一、三、四纵对许昌地区发起进攻。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四纵由方城、宝丰出动奔袭漯河、确山一段平汉路，九纵26、27旅配合主力行动。我军迅速破击平汉路，给国民党军统帅部很大的震撼。但白崇禧坚持清剿大别山不肯放手，附近能调动的部队只有李铁军部队。于是他命令第五兵团司令长官李铁军率领整编第三师由南阳、唐河东进，整编第二十师由信阳北上，第四十七军从郑州南下，企图打通平汉路。12月24日，李铁军率领整三师到达遂平以北的金刚寺、祝王砦，二十旅驻金刚寺，他们长途行军也是疲惫不堪，做了简单的工事就宿营了。鉴于李铁军部孤立突出，陈赓与陈士榘商议，由陈谢兵团和华野共同歼灭整编第三师，由陈士榘统一指挥。在这一仗中，我军全歼国民党军第五兵团兵团部及整编第三师共九千多人。

华野和陈谢兵团进行平汉路破击战，有力地支援了大别山刘邓大军。这时华野、陈谢兵团在中原的第一次协同作战，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平汉路战后，陈谢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在确山会合，转至舞阳地区休整。陈士榘率领华野三、八纵留在郾城，配合陈谢兵团在中原歼敌。粟裕接到中央军委指示，要他带领华野一、四、六纵撤到黄河以北休整一段时间后向江南进军。1948年2月，粟裕率部北渡黄河到达濮阳。这时，刘邓主力也摆脱了白崇禧集团的围追堵截胜利转至淮河以北。奉中央军委命令，华野十纵、十一纵护送两万多晋冀鲁豫新兵和大批物资南下，与刘邓大军会师。严重减员的刘邓二、三、六纵得到兵员和物资补充，振奋了精神，同时使士气得到鼓舞。战争重点由坚持大别山转入逐鹿中原。

1948年1、2月间，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没有大的行动。蒋介石已经预感到我军对中原的进军，使国民党军渐渐处于被动状态，丧失了主动权。他需要对中原的兵力部署和建制做大的调整以适应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帅部作出决定：将中原战区分为八个绥靖区，开封的第四绥靖区、商丘的第六绥靖区、阜阳的第十四绥靖区属于陆军总司令部徐州指挥部管辖。信阳的第五



绥靖区、合肥的第八绥靖区属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管辖。这些绥靖区配属一定数量的正规军和地方保安部队担负着区域内的防御。

中原国民党军主力编为六个机动兵团，担负机动作战任务。邱清泉兵团（整编五军）驻商丘，孙元良兵团（整编47军）驻郑州，张淦兵团驻九江，胡琏兵团（整编18军）驻驻马店，裴会昌兵团驻洛阳。这六个兵团各辖二到三个整编师，分布在平汉和陇海铁路上，一旦有事可以快速调动，相互支援。绥靖区和兵团的总兵力为37个整编师，连同非正规军共86个旅，66万余人，蒋介石凭借这些兵力，来与我中原大军抗衡。1948年3月，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2月27日至3月2日，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在陕西宜川全歼国民党军整29军，军长刘戡被击毙。胡宗南大为震惊，仓促调裴会昌兵团星夜撤回关中，加强西安至潼关的守备。陇海线潼关以东到洛阳段已无国民党正规军防守，新安、渑池只剩下一些保安队。郑州方面，孙元良兵团的整编三十八军准备空运关中。这样，洛阳变成了一座孤城，为我中原部队提供了战机。此时洛阳的守备军是国民党青年军第二百零六师，青年军是抗战期间“太子”蒋经国发动青年知识分子参军组成的几个师。206师是解放战争时期从中原各大城市招收的学生组成的，基本上没有战斗经验。

洛阳是九朝古都，中原的战略要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打洛阳这样的大城市，是场硬战，有没有把握打下来，多长时间能打下来？都是我军要反复考虑的。因为无论是陈谢还是陈唐，都没有打大城市的经验，战前的决心是很难下的。陈唐、陈谢认真的分析了形势，我军投入的兵力有四个纵队二十八团，占明显的优势。我军在攻克许昌和歼灭整编三师过程中缴获了大量的战略物资。我军首长认为：“由于裴昌会兵团已西调，无力东顾，胡琏兵团正在北开许昌途中，回援需七天的行程，孙元良兵团两个旅已抵黑石关，但势孤力单，估计不敢单独增援，如等胡、孙兵团靠拢后再打，不仅援敌难打，又误了攻城的时机。因而决心以速决战法，在国民党军来援前先攻取洛阳，而后伺机转用兵力寻歼援敌。为了避免出现确山战斗中双方相互谦让贻误战机的现象，中央军委命令陈士榘、唐亮统一指挥华野和陈谢的部队，以陈士榘为战役指挥员。

3月7日，陈唐下达洛阳城的战役命令：华野三纵和晋冀鲁豫四纵主攻洛阳，以三纵攻击东北、北关，四纵攻击西关、南关。华野八纵和晋冀鲁豫九纵负责狙击援敌，八纵夺取黑石关，阻止孙元良和胡琏兵团来援；九纵夺取新安、渑池，阻止裴昌会兵团来援。命令一下，各部即开始行动。洛阳战

役非常激烈，战役历时七昼夜，我军全歼国民党军青年军第二百零六师及保安部队约2万人。其中击毙3 000余人，俘虏师长邱行湘、洛阳专员刘焕东以下15 000余人。缴获美式105毫米榴弹炮3门、野炮6门，其他小口径炮180门。轻重机枪440挺等大量军用物资。

洛阳战役是一次典型的大城市攻坚战役，也是华野和陈谢集团联合作战的成功战例。华野的总结说："这种工事复杂坚固、守备顽强、连续五昼夜的攻城战斗情况，是我们在自卫战争以来攻城战斗第一次所遇见，亦是对我们野战军战斗力的一个新的考验与极大的锻炼。"我军解放洛阳，切断了陇海线西安与郑州间国民党军的联系，将晋冀鲁豫解放区和豫陕鄂解放区连成一片，有力地配合了刘邓主力在淮河、沙河间的行动，也配合了西北野战军的作战。洛阳的解放，使我党我军干部取得了管理大城市的宝贵经验，为新解放区的开辟和新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典范。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在中原战场上协同作战，在战略上互相支持，给国民党以很大的震惊，同时，也使他们的军队受到很大的打击，使我军在中原战场上逐渐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为我军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民党方面越来越感到军力不支，这为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最后战略决战做好准备。

注释：

①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1页。



东北完胜为大决战做准备

东北地区的战略位置突出，它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解放东北、控制东北的战斗对于整个中国民主革命，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首先，东北地区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是当时中国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东北在全国经济方面处于极为优越的地位，谁控制了东北，谁就会利用东北的丰富的物力、财力，极大地加强他的经济实力，从而处于主动地位。国民党反动派也深知到这一点，蒋介石曾经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强调说："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

其次，东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它是改变中国革命根据地长期被敌人包围局面的战略支撑点。中国革命根据地从建立的那天起，就处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经常遭到敌人的围攻，在战略上处于防御的地位。东北地区背靠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西与蒙古接壤，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邻，南与冀热辽解放区和整个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如果我军控制了东北，就可以变东北为我们的战略后方，从而改变中国革命根据地长期被敌人包围的状态。这不仅有利于全国解放战争，而且会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反之，如果东北为国民党占领，我解放区仍处于敌人的四周包围之中，势必将进行革命和反革命的大决战，使我们处于南北夹击的被动局面。

再次，东北地区是抗战胜利后最有利于发展人民革命力量的地区，是当时我军战略的突出方向。

鉴于东北地区的重要战略位置，中共中央在 1945 年 4 月—6 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该加紧在那里的地下工作。对处于流浪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

就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际，解放军在东北地区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在中国共产党的关于打败国民党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军事方针的指引下，人民解放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歼灭了敌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打败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使全国战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1947年7月，敌人总兵力已由430万人减少到370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减少到150万人，主力部队深陷在山东和陕北两个相隔很远的战场上拔不出来，在晋冀鲁豫战场上，经我军豫北、晋西南攻势后，损失的兵力很大，战略协同更加困难。而解放区不断巩固，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发展壮大，战士们的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并且士气高涨，军心振奋，充满胜利的信心。解放区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提高了政治觉悟，广大青年热烈参军。

中共中央、毛主席紧紧地抓住战局的有利形势，及时地决定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实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1947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全面地阐述了我军的作战方针。指出："我军第二年的作战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引向解放区，进一步消耗和破坏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军不能持久地反革命的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武装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并强调指出："到国统区作战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

在东北敌我力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根据地已经基本建成，在我军取得重大胜利的有利形势下，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47年5月5日做出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并经中央正式批准正式下达。决议分析了全国的战争形势，指出：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在许多地方已获得主动，开始反攻，使蒋介石危机更为严重，蒋军更陷入被动。决议还分析了东北的形势，指出：东北战争局势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目前东北军队正处在一个新的形势下面，即是在军事上敌人不得不从进攻转入防御，而我军从防御逐渐转为进攻。这个决议指出了我军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战斗的斗争方向，明确了今后的战斗任务，极大地增强了东北解放区党政军民夺取胜利的决心。



东北国民党军队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的打击后，被迫停止了向南满地区的攻击，全线转入防御。妄图加强自己，补充部队，调整部署，相机发动局部进攻，并积极整补军队。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的布防有：以新一军守备吉林、长春及其外围之德惠、农安、怀德地区；以七十一军及其十三军五十四师守备四平、公主岭、郑家屯，控制中长路长沈段；以十三军、九十三军控制热河与北宁路关内外通道；以新六军、五十二军、六十军、二零七师、青年军第二军、二十师及东北军集团军大部的直属特种部队，占东北半数以上的兵力，控制着沈阳及南满地区。为了从根本上扭转东北的战争形势，结束东北解放区被包围的局面，配合全国即将到来的大反攻，我军进行着夏季攻势的准备工作。这次攻势分为两个阶段。我军的战略部署是：首先以我北满主力第一、二纵队、独立第一、二两师共八个师南下，协同南满和东满军作战，以打通南北满两个战略区的联系。然后，再集中更大的兵力，歼灭较集中的敌人，乘机取得中等以上城市，彻底改变东北战局。

东北野战军从1947年5月13日前后，同时从几个方向发起对敌人的进攻。夏季攻势的第一阶段自5月13日至6月3日的20天作战，消灭了大量的分散守备之敌，解放了广大地区，使东、西、南、北满连成了一片，迫使敌军收缩在少数的大城市之中，完全改变了东北我军的战略地位，使东北我军主力处于更加集中、更加机动的作战地位。

在上述形势下，我军决定将夏季攻势发展到第二阶段。历时50天的夏季攻势作战，我军共歼灭敌人8.3万余人，收复城镇42座，解放了占国统区45%以上的土地，彻底改变了东北解放区被分割的局面，解放军南、北满主力终于在这一攻势中胜利会师。东、西、南、北满根据地连成一片，东北我军处于更加集中、更加主动的地位。我军发动了强大的夏季攻势，迫使敌人不得不从关内抽调五十三军支援东北，减轻了关内解放军的压力，有力度地配合了关内解放区的作战。

夏季攻势后，蒋介石将其在东北战场上的惨败，完全归咎于其高级将领的无能。为了挽救败局便派其参谋总长陈诚接替熊式辉、杜聿明出任东北最高指挥官，并调整编四十九师增援东北。陈诚初到东北，一时比较猖獗，叫嚣“要消灭共匪，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这时，在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正规军有14个，还增加了炮兵、战车、汽车等部队，总兵力在50万以上。陈诚为了挽回东北败局，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提出在六个月内恢复东北优势、恢复满洲一切失地，实施所谓确保北宁，打通锦承，维护中长，保护海

口的战略计划。采取所谓“依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机动防御方针。妄图在东北战场上争取局部的主动权，以待关内的更多的援军的到达，相机发动攻势。为此，国民党将其军队部署主要以长春、四平、沈阳、锦州为重点的中长路和北宁线。以六十军两个师守备吉林，一八四师于沟帮子、大虎山地区；新一军守备长春、德惠、农安、公主岭地区；七十一军守备四平、梨树地区；五十三军守备昌图、开原、西丰地区；新六军守备铁岭地区；五十二军两个师守备鞍山、海城、本溪地区；九十三军守备阜新、义县、彰武、新民地区；四十九军守备锦州、锦西地区；十三军守备承德地区。敌人的第一部作战计划是打通锦承路，恢复辽西与热河的联系，保证海口与铁路交通，并伺机发动攻势。

我军在夏季攻势结束后，抓紧了秋季攻势的准备工作。夏季攻势之后，东北战局发生了新的变化，连接沈阳、四平、长春的交通现已被切断，国民党作战的机动性完全消失。为了配合全国解放军战略进攻，继续扩大夏季攻势的胜利成果，东北解放军于1947年9月14日至11月5日，在中长、北宁沿线发动了秋季攻势。根据敌军的战略部署，我军的作战方针是：首先向南线北宁路锦榆段及新民、阜新、义县、鞍山等地发起进攻，歼灭薄弱地区之敌，调动中长路北段之敌南下，以造成北线我军主力进攻和歼灭敌人的有利机会。

陈诚为了实现打通锦承路的计划，9月6日以九十三军、四十九军等部由绥中、锦西和锦州一线分三路进犯我热东解放区。与我军在梨树沟门和杨家杖子打了两仗，但损失都很大，解开了我军秋季攻势的序幕。进犯热东受挫后陈诚又以四十九军七十九师一零五师由锦州西进，再次进攻杨家杖子。我军决心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聚歼该敌，八纵撤至杨家杖子以西新台边门西北地区集结隐蔽，九纵主力兼程赶至杨家杖子以东截敌退路，并担负打援任务。9月19日当敌四十九军到达杨家杖子的时候，八纵主力和冀热辽第一师迅速将敌包围，立即发起攻击。敌军在我军的攻击下，溃不成军。第二场杨家杖子战斗结束后，解放军第八、九纵两队稍事休息整顿，即南下北宁线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战。将锦榆段铁路线彻底破坏，从而使北宁线陷入瘫痪状态。解放军辽西三战的胜利和规模巨大的破袭北宁沿线的空前紧张形势，迫使敌人慌忙将其机动部队新六军主力由铁岭西调锦州增援，从而造成了沈阳、四平间兵力不足，守备薄弱的局面。我军遂乘机在北宁线上发动进攻，把秋季攻势推向第二阶段。在整个秋季攻势过程中，国民党军损失



惨重。

从1947年9月14日到11月5日，历时50天的攻势，我军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共消灭敌军6.98万余人，攻克城市17座，解放了3.8万余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和260余万人，控制了东北大部分铁路；粉碎了敌人之依托重点，向外扩张，确保北宁，打通承锦、维护中长，保护海口的战略计划，将敌军紧紧地压缩在大小24座孤立的城市中，仅占东北全面积的14%的狭小地区，造成了东北敌军空前严重的困难和更加被动的局面。使我军牢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这次攻势，又调动了一批关内的敌军增援东北，减轻了华北解放区的压力，给我军关内的战略反攻以有利的条件。

东北我军秋季攻势的胜利，使敌丧失了大量的有生力量，广大的地区被解放，大部分交通线为我所控制，敌军虽然还占领着大小24座城市，但都处于我军的包围之中。在关内战场上，我军的战略反攻正在积极地进行着。11月12日，晋察冀野战军一举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平汉路北端的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国民党又急忙将增援东北的部分军队调回华北。东北敌军鉴于在我军的连续攻击中遭到了各个击破，大量的有生力量被歼的情况，采取了更加集中兵力的部署，实行了固点、联线、扩面的战略防御方针。

秋季攻势过后，为了延续胜利，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于1947年11月9日及16日发出了冬季攻势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指示，发动全军积极做好准备工作。1947年12月14日，冒着严寒，我军发起了对敌的冬季攻势。八纵首先从朝阳出发向沈锦路两侧攻击。12月14日进占北镇之后，16日完成了对新立屯的包围；二纵、十纵包围了法库；一、三、六纵分别由驻地出发进至新民、法库、铁岭、沈阳之间，准备阻击西援之敌；十纵主力进抵昌图、开原地区；七纵进抵法库以南，协同二纵夺取法库。我军的这一突然行动，危及了沈阳的安全，使敌人异常焦急，急令铁岭之新六军、新二十二师西援，解法库之围。

我军的这一行动，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铁岭、法库、沈阳、新民地区。为了加强沈阳方面的军力，陈诚又急将长春的新一军五十师、暂五十三师、四平七十一军之八十七师、九十一师、开原五十三军的一三零师等调至沈阳、铁岭、新民地区。企图解除我军对沈阳地区的威胁。当敌人将注意力集中于沈阳以北地区的时候，我军以一纵三师佯攻法库，以二、七纵及一部分炮兵西进，直取彰武；以一、三、六、八纵共八个师的兵力，进抵沈阳西北地区，阻击沈阳出援之敌；十纵二十八师破坏沈阳至铁岭段的铁路。我军

12 月 22 日包围了彰武城，28 日清晨，发起了总攻。战斗仅用了 5 小时，全歼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共九千多人。

彰武战役结束后，我军继续扩大战果，补歼分散孤立之敌。一、八、九纵主力南下，12 月 30 日八纵二十二师、二十四师占领了黑山县；九纵于 31 日进占大虎山地区，并收复了台安。1948 年 1 月 1 日，敌以新三军、新六军为右路，由沈阳、铁岭一线向西推进；以新五军的一九五师、四十三师为左路，由新民向北推进；以七十一军、新一军的主力为中路，自石佛寺地区西进。敌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出击，给我军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军当即决定，首先歼灭比较薄弱的左路之敌，新五军军部及其两个师。至 7 日，将敌新五军军部、一九五师和四十三师 2 万多人全部歼灭，并活捉了新五军军长林达。敌人的新五军被歼灭后，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的形势紧张起来。为此，蒋介石于 1948 年 1 月 10 日亲到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将陈诚撤职，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

1948 年 1 月 1 日，东北民主联军奉命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原民主联军总部，改称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为了将东北国民党军队压缩在最小地区，给最后全歼国民党军队创造条件，1 月末，我军又按计划进行冬季攻势的第二阶段作战计划，向敌防守薄弱的突出部辽南出击。东北解放军在 20 日胜利收复了鞍山市。鞍山市解放之后，我军以三、十纵队攻取开原；一、二、六、七、八纵队右沈阳以南地区向西转移，配合我军攻占开原。2 月 15 日，我军对营口发起了总攻，解放了营口，在我军冬季攻势的一连串打击之下，东北之敌惶惶不安，呈现出部署混乱，进退失措，顾此失彼的状态。我军完全控制了沈阳以南的中长铁路和营口支线，切断了敌人的海上运输；沈阳西北的广大地区也在我军的控制之下；锦州、沈阳之间的交通线完全被切断；四平、吉林、长春三个据点之敌更加孤立，并处于我军的包围之中。我军为了更大地扩大冬季攻势的战果，切断沈阳和长春之间的联系，以进一步孤立长春、吉林，为全部解放东北打下基础决定攻取四平。3 月 2 日，我军完成了对四平的包围，并立即进行工程准备和扫清外围据点的战斗。13 日早晨，我军在炮兵的配合下，进行最后的总攻，将敌全部歼灭。这次战斗前后共用 23 个小时，全歼守军共 1.9 万余人，在四平战役期间，我军同时收复了吉林。



冬季攻势，从1947年12月14日至1948年3月15日，历时三个月，共歼敌15.6万余人，收复城市21座，解放人口618万，将敌人完全压缩在长春、锦州、沈阳、抚顺、本溪、新民等12座城市里，敌人的唯一交通命脉——北宁路已被完全切断；使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最后覆灭已成定局。与此相反，我军则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为我军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和解放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土改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问题的出现

“五四指示”下达后，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极大地激发了千百万农民革命的积极性，促进了解放区生产的发展，为我军进入战略反攻、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虽然“五四指示”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这个文件还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比如，承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中小地主、富农的土地一般不动等，这使得土地改革的普遍性和彻底性受到一定的影响。到了 1947 年初，大约还有 1/3 的解放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在已经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地方，也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不彻底性。此外，在土地改革中还存在一些错误的倾向，主要有在党的土地政策从减租减息向没收地主土地转变时，有些人的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来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给地主以过多的照顾，或者是干部和积极分子利用职权多占胜利果实，致使不少地方的土地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

1947 年 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重要会议，分析了全国的形势，决定彻底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从这个方针出发，中共中央指示各解放区，“必须认真检查，实行填平补齐，务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能获得土地，而豪绅恶霸分子则必须受到惩罚”[①]，并正式开始了土改复查工作。刘少奇在 1947 年 4 月 22 日给贺龙、李井泉、张稼夫等的信中指出：“地方农民已分得若干土地，有些地主被斗争，有些地方也正在进行工作，但群众运动是非常零碎的，没有系统的，因此也是不能彻底的。”“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如果群众没有这种最低限度的勇气，群众就不能压服地主阶级。群众如果害怕我们的干部，害怕我们的干部不正义的报复行为，那群众将更怕地主和恶霸。也只有充分发扬群众的民主，才能清除我们党内及政府内一切贪污腐化及官僚主义的现象，才能肃清社会上数千年来的封建残余。”刘少奇的这封信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同年 7 月 25 日，他对这封信写了如下的



批语："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好，很必要。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在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是在一切解放区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他所指出的原则，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的。"②刘少奇的信经毛泽东批示后发往各个解放区，作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指导性文件。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的指示，各解放区在一九四七年春夏进行了土改复查，着重纠正右的错误。

1946 年秋冬，各解放区深入开展检查工作，从土改中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开始对土改进行复查。

中共中央东北局于 1946 年 10 月对松江省的阿城县做了典型调查，发现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后即要求各地普遍检查土改工作。合江省军区政委张闻天于 1946 年 12 月和 1947 年 1 月两次深入到桦川县农村，发现了地主假分地、瞒地、转移财产，利用变质干部收回被分的青苗，以及对地主斗远不斗近，土地分在口头、纸面上，没有落到群众手里等问题，并亲自动手创造解决典型的问题。此外，东北解放区还发觉干部、积极分子中流氓、半游民分子比例较大的问题。这些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法西斯政策造成的游民阶层，善于应付逢迎，在土改初期骗取党员干部的信任，充当了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在掌权以后，他们的恶习逐渐显露，明目张胆地脱离群众做坏事，甚至成为地主阶级在农会的代理人。在他们掌握农会领导权的村庄里，经常出现假分地、明分暗不分等现象。根据这些调查，东北局把这些地区的特点总结如下：基本群众在斗争后的态度是懒洋洋的，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对农会的工作漠不关心，甚至互相埋怨；整体土改，从形式上看样样都有，地也分了，斗争也斗过，武装也有，农会也有，积极分子也有，但切实检查起来，则毛病很多。

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于 1946 年秋后根据太行区武安县，冀南区队城县检查工作的情况，向全区提出开展"翻身大检查"的要求，大力深入查田、查阶级，从割封建主义尾巴、清查遗漏隐患、干部包庇和假卖假分入手，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晋绥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也分别于 1946 年 10 月和 1947 年 2 月检查了土地改革工作。在检查中发现，晋绥老区有 20% 左右的贫雇农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土地，而地主还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华中、山东、陕甘宁解放区也在自卫战争中，检查了土改工作，发现对中农利益的侵犯，果实的挤压与分配的不恰当，村干部多得地、得好地等现象。

各地对土改工作的检查，充分让干部们认识土改工作中群众发动得不充

分，封建制度消灭得不彻底，贫雇农还没有足够的生产条件，干部多分多占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同时也说明了初期土改工作基础不同而造成了复查工作的复杂性，也反映出复查是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

1947 年 2 月，国内军事形势已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我军已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取得了主动。这同《五四指示》制定时的形势相比，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随着土改运动的深入，农民在实际运动中已越来越普遍地超越了《五四指示》规定的政策范围，和以往规定的一部分具体政策，如对地主照顾较多，使部分地主留地较多等。因此，各解放区根据贫苦农民的要求，对土改政策进行了一些改动。

对于地主的政策，有三方面变动：首先，改变了对中小地主和抗属、干属、烈属必须照顾的政策，规定对于个别地主是否照顾，要出于群众的自愿。其次，不仅将地主的土地房屋等公开财产没收分配，并且对其埋藏起来的现金、财物也要追查出来，分配给贫苦农民。第三、分配给地主的土地，一般相当于平均数，也有的地方先“扫地出门”，然后由群众民主评议，分给一些坏地坏房。

对富农的政策，改变了“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的规定。提出：“可以而且应该从富农手中取得一部分土地、牲畜、工具去满足农民要求，但应避免发动专门反对富农的运动，除对汉奸、恶霸富农等为群众所痛恨者应该清算斗争外，对一般富农可用协商调解征购等办法使其拿出一部分土地、牲畜。对于依靠自身勤俭起家的富农及新富农的土地财产以不动为原则。不完全消灭富农经济，在每一乡、每一区保存几家富农不动”。

农民获得土地的方法，改变了以清算为主的办法，普通采纳了“中间不动两头平”或“打乱平分”的办法。并且批评干部、民兵、积极分子等多占多分土改果实是受富农路线的影响，令他们拿出多占部分参加平分。分配时以贫苦程度为标准，“填平补齐”、“铲墩填塘”，普遍拉平。

对待地主所经营的工商业，许多地方改变了“凡富农及地主开设的商店、作坊、工厂、矿山，不要侵犯，应予以保全”的政策规定，而是主张对地主的工商业和一般的工商业要区别对待。对于地主剥削农民在城市兼营的工商业财产，以及他的土地财产等要没收分配。

经过复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进一步深入，然而受战争的影响，这次复查未能对各解放区作全面的调查和准确的估计。在纠正《五四指示》不彻底的同时，随着政策的改变，1947 年春季和夏季的复查工作中产生了一些



新问题。

问题最早突出表现在晋西的土改中。晋西的临西、兴县、静乐等县属于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晋绥根据地。经过减租减息、初步土改以及税收、负担等政策的实施，那里相当部分地主占有的土地和资财已经不多了。但是，1942 年初在那里考察的康生、陈伯达不经调查研究，不听当地干部和考察团其他同志的意见，否定以往工作。将开明士绅作为主要斗争的对象，将破了产的地主和工商业者，说成是“化形地主”，公开侵犯他们的利益；对待地方干部以感想代替政策，说了解下情的干部“右倾”，并将他们当作土改的障碍“超过”，叫做“搬石头”，一直发展到把支部也一脚踢开。这种作法使许多干部消极、不满甚至无所适从。陈伯达在兴县木栏杆村提出划成分要“查三代”，“看铺摊摊”，“看政治态度”，甚至跑到野外墓地查看墓碑，以此为依据来划分成分。此外，康生还将晋绥分局制定的正确的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小册子收回烧掉。1947 年初夏以后，这一套错误的作法进一步通过《晋绥日报》传播开来，报纸上公开宣传“贫雇农坐天下，说啥是啥”，“过河必须拆桥”等口号，并解散县委、县政府、批斗开明士绅、民主人士等。这一错误的行为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于晋绥及其他各解放区的土改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给刚刚露出苗头的“左”倾错误火上加油，促其蔓延。

同时，其他各解放区在复查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一些“左”倾的问题：首先，对于群众路线的错误认识。这主要表现在用部分农民群众的认识代替党的无产阶级政策。在土地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即发动群众自己动手消灭封建势力。但是在复查中，在纠正工作中的强迫命令和更改不适宜的政策时，部分领导同志错误地认为群众路线即政策法令，一切以群众为依据，用部分农民的意见代替了党的无产阶级政策，放弃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责任。

其次，执行过“左”的土改政策。在修正对部分地主照顾过多的政策时，部分地方不仅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而且将地主彻底“扫地出门”，让地主给贫雇农当长工。为了追地主的底财，出现了严刑拷打地主的现象。对大中小地主不加区别，普遍平分富农土地，侵犯地主所经营的工商业，侵犯中农，认为杀人不必拘泥于法律手续等。在这种形势下，5 月份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的土地会议上对工商业政策也发生动摇，规定在土改中，对于农民要求清算地主在乡村与封建相联系的工商业，应予以批准。这种规定在一定

程度上纵容了“左”倾冒险主义。

最后，土改运动的盲目扩大化。主要表现为在土改已经彻底的地区未能及时结束土改，转向生产。解放区各地自反奸清算以来，在土地斗争的深度和广度上差距很大，但是在复查时很少能够区别对待。如晋冀鲁豫解放区到1947年春，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同时于1947年3月决定开展生产运动，正确地指出：“现在农民的普遍要求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兴家立业，发财致富，以改善其当前不能满意的生活状况”。但是5月以后，在各地复查逐渐掀起高潮的情况下，这里对转入生产的方针也动摇了，以至出现侵犯中农，斗争工商业，乱打乱杀等“左’倾错误。

综上所述，全面复查工作是对土改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查出了初期土改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对于进一步深入消灭封建土地制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经验的缺乏，各地在土改的具体执行中出现了错误倾向，此时仍然承认一般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改革的普遍性和彻底性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复查中出现的问题，统一修正《五四指示》中不适宜的部分，制定并颁布新的土改政策，成为中共中央工作的当务之急。

注释：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6页

② 刘崇文、陈绍畴：《刘少奇年谱 一八九八---一九六九 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4-75页。



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

1947 年 6 月，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8 月份，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区，开辟大别山根据地；陈毅、粟裕大军挺进豫皖苏区，发展豫皖苏解放区；陈赓、谢富治大军强渡黄河，创建豫陕鄂、陕南根据地；东北、晋察冀、华东、苏北的部队也在内线转入反攻。在全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要尽快获得自卫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各地解放区经过半年多的复查运动，对于初步土改中的部分问题已经解决，然而有些土改还不彻底，各解放区土改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为了总结长期以来土地改革的经验，解决初期土地改革的问题，推动土改运动的深入，使土地改革工作和人民战争相辅相成，实现解放全中国的伟大目标，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土地会议迫在眉睫。

1947 年 7 月 17 日至 9 月 13 日，在晋察冀解放区所属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工委负责人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等，还有晋察冀、晋冀鲁豫、东北、华东、晋绥、陕甘宁等解放区的主要领导人聂荣臻、刘秀峰、彭真、李雪峰、薄一波、王从吾、胡锡奎、张稼夫、李林、张晔、赵德尊、李卓然、赵守政等；华北地区大多数地委，晋察冀野战军每个旅也都有代表参加，总计 107 人。

在 7 月 17 日的开幕式上，朱德致了开幕词，他回顾了一百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从陈独秀、王明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错误，说明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意义以及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必要。他指出，“红军从产生到现在，经常同几倍以至几十倍于自己的敌人作战，中间也打了很多败仗，但是没有垮，为什么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坚持土地革命，我们帮助农民得到土地，或者实行减租减息。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斗争果实，支持和拥护我们”，“我们党领导和实行土地革命以来

有十几年了，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再加上一年多以来的土地改革，经验就更丰富了。我们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把各地的经验总结和交流一下，制定出更完善的政策，然后把它贯彻下去，使土地改革彻底完成”。他还指出，“现在土改中的‘左’的和‘右’的偏向，许多地方都有，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十几年来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用以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朱德根据他当时的调查，正确地指出不能盲目地套用外地经验。他说：“土地改革要从各地的情况出发。这个村和那个村的情况不同，比如附近的西柏村、东柏村和陈家峪三个村，人口多少不同，地主多少不同，斗争对象不同，所以作法也就不完全相同，不能一切照搬”。他客观地分析了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形势，指出：“有的地方土改搞得比较彻底，有的地方搞得不彻底，但是不论怎样，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党虽然不够纯洁，但还有很多坚定的干部和党员；困难是有的，但是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土地改革政策”。[①]他还希望各位与会代表对新解放区如何进行土改要多出主意，并强调军队要学会土地改革的相关政策，帮助农民分得土地。刘少奇、叶剑英、董必武等同志也先后在开幕式上讲了话。这次会议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主持，并作了报告和总结，朱德、董必武等在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和讲话。

根据会前调查和各解放区代表的汇报，土地会议围绕着解放区农民关于土地、生产成本、民主权利和平分负担的要求，主要讨论了3个问题：民主整党、平分土地、农业生产与负担。这次将近两个月的土地会议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7月17日到8月底为会议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中央工委听取各地关于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研究讨论各地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在此期间，代表们学习了马恩列斯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论述和党中央在各个时期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文件。各地代表汇报了抗战胜利以后各阶段土地改革的基本情况，并且就土改的政策和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希望在会议上得以讨论和解决。如晋察冀和晋绥代表团提出划分阶级的依据标准问题；东北、陕甘宁等代表团提出了对富农和工商业的政策问题，对不同地主如何区别对待等；晋冀鲁豫代表团提出，反对干部的官僚主义的做法中，通过内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比发动群众批判斗争更好等。然而对于这些来自斗争实践的重要问题，会议没有专题讨论研究，得出一致的意见。

在各地汇报情况即将结束时，刘少奇于8月4日就各地汇报的情况及今后意见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说：“全国土地改革只有晋冀鲁豫及苏北



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均不彻底，尚须进行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东北、热河新区情况尚好。综合各地农民要求有四大项：即土地、生产资本、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及负担公平，其中土地与民主又是基本要求，而民主是保障与巩固土地改革彻底胜利的基本条件，是全体农民向我政府和干部提出的迫切要求，原因是我们干部强迫压制群众的作风，脱离群众，已达惊人程度，其中贪污自私及为非作恶者亦不很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这种作风并撤换与处分那些坏干部。”[②]报告还提出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改造党、政、民组织与干部，并创造树立民主作风的条件。但这个方法，又是如此激烈的一个斗争过程，若在全国实行，必致有数十万党员及大批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评斗争与审判，若干事变，亦将不可避免要发生。因此这是一个需要十分负责的重大原则问题。”[③]为了使土地改革彻底完成，农民民主有所保障，干部作风有所改变，刘少奇提出了10项建议：

（1）“全党确定经过贫农组及农会发扬民主，以完成土改并改造党政民各组织及干部的方针，一切党的组织和干部，必须完全忠实和正确实行此方针，并很好完成任务，如有党的组织和干部不能有效执行此方针者，即由上级组织派遣工作团直接执行此方针，如有抵抗和破坏此方针之执行者，即根据情况给予处分，直至解散其组织或开除党籍。在土改业已彻底地区，即进行改造组织及干部工作。”

（2）“建立各级农民代表会（城市建立市民代表会）并在适当时机建立全国农民总会，暂时代替各级业已死亡的参议会，作为各级最高权力机关，对各级政府实行无明文规定的罢免权与选举权，政府公粮、预算、征兵、征夫计划等，经农民代表会通过后实行，农会决议，亦得交政府执行，经农民代表会直接联系群众，打破官僚主义，树立贫雇农在各级领导机关的地位，青年妇女团体亦加入农会，待适当时机再建立三三制的各级议会。”

（3）“规定每年旧历正月初一（或其他日期）一切村干部解除职务，由农民大会或代表会检讨其工作，并进行改选，十天改选村干部完毕，并召回区代表会，改选区干部，再十天改选县干部，省及分区改选另定。”

（4）“由中央和地方党委发表告解放区人民书，号召人民把命运操在自己手中。实行言论、集会自由等权利，监督、鉴定、选举与罢免自己的勤务员——各级干部，反对干部非法侵犯人民权利及压迫人民，并对过去干部脱离群众的错误，适当自我批评。”

(5)“由中央或地方党委发表告解放区党员书，号召党员接受检讨、批评、鉴定，尊重人民权利，服从群众的决定，为人民做长工，有错者认错，地主、富农出身党员，必须劝告家属接受农民要求，不得反抗群众，以免被斗，然后由群众决定给予若干照顾，并号召党员严格遵守纪律。”

(6)“根据地党员是秘密的，有些地方群众要求党员公开，并要求由农会或贫农组介绍党员，我看此要求可接受，无害处，巩固区的党可以公开，群众反对并提议某人不应作党员者，经党审查后，如理由正当，应拒绝入党或退为候补党员。”

(7)“地主、富农出身党员，除特许者外，在土改期间回避在本县、本区工作，以免亲朋包围麻烦，严肃党的纪律，宣告：凡包庇地主，破坏土改，侵犯人民权利，作假报告欺骗上级，封锁上级人员了解情况，威胁报复群众，故意毁损隔断党与群众联系，隐瞒自己成分与历史，不退出侵吞果实，向党进行两面派斗争，进行小组织活动，隐瞒包庇其他党员非法行为等，须受到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8)“上述各项如中央批准，即提交土地会议讨论，再将文件报中央批准，然后在各地领导机关取得一致，再以区党委为单位召集县以上干部会，并召集地主、富农出身党员干部讲话，告诉他们在土改中如何自处，再召开区、乡干部会，并集中贫农进行训练，如此将上述计划贯彻实行。在这些会议中即号召各级干部，特别高级干部退果实，坦白错误，有罪者自首。”

(9)“为避免在运动中群众随便打人、杀人，派可靠干部在各地普遍建立人民法庭，接受群众控诉，并加调查审讯，有罪者适当分别处刑，群众向干部斗争时，则严格保障少数人应有基本权利，干部有否认、辩护、发表不同意见，出席、退席大会等自由权，并禁止打人及一切肉刑、在大会逼供等行为，群众在大会上对干部只有批评、罢免、选举及控诉之权，干部如有犯罪部分，必须交法庭调查审讯后，由法庭处理，只有法庭才有权逮捕监禁。如此保障干部及少数人不受群众中某些过分行为的侵犯，并对其犯罪行为得以揭露、证明和处分。”

(10)“对被群众撤换的干部及犯罪干部、地主富农出身干部，只要他们服从群众、服从党，一律采取治病救人争取教育改造方针，而不是毁消他们，分别令其受训及派工作。但有些坏分子必须洗刷，有过者必须适当处分，否则即无原则的严肃性。对于干部的功劳与过错及与过错铸成的原因及责任，均须在群众中有适当评判，避免偏在一边。在运动中提拔的新干部与



老干部，实行团结的方针。”[④]

8月9日，刘少奇在土地会议上作第一次总结报告，肯定了“五四指示”发出后一年多来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大部分地区土地改革不彻底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说，一年来所有各解放区农民都进行了土改运动，胜利是空前的，规模也是空前的。有些地方比较彻底但也仅是部分比较彻底，又仅在斗地主方面，分配还不合理。其他大部地区则很不彻底。在此基础上，提出今后的任务是要对比较彻底的地区，再彻底一些，对于不彻底的，要彻底。土地改革的路线是，依靠贫农及乡村工人，联合全体中农及一切反封建分子，中立一部分富农，向地主阶级及一部分带封建性的富农斗争。在向地主和带封建性富农斗争时，要区别地主与富农，大地主与中小地主，政治上进步的与反动的，以便集中力量，打垮恶霸大地主，只有如此，才能最坚强地依靠贫雇农，最广大地联合中农，组织农民战斗部队，打垮地主阶级并取得胜利。

8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刘少奇8月4日报告并要求将报告所述方针提到土地会议上去讨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会议着重讨论了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如何整顿党、政、群众组织及改造其工作等问题，会议认为，党内及干部中存在的严重不彻底是基本原因。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有效办法，是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整顿党、政、民的组织与干部作风，并创造树立民主作风的条件。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整顿党的队伍，并规定了适当的步骤和方法，其中首要的是在党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揭发各地组织内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

在第一阶段中，会议集中讨论了党的组织、农民组织和民主问题，重点研究了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民主，改造党、政、民（兵）组织和干部。此外，董必武、邓颖超、冯文彬分别就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土地改革中的妇女工作和青年工作等作了报告。

会议的第二阶段自8月底至9月13日闭幕，中心议题转向讨论土地改革政策，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

8月27日，董必武向大会做了《土地改革后的农业生产和负担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土改后发展农业生产的13项政策、措施，并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农业生产发展的方向。他指出，现在我们进行的土地改革，只是把地主的私有制土地变为农民的私有土地。因此，怕共产和希望共产都是错误的，要鼓励农民生产发家，走向丰衣足食。报告还分析了农民负担的状

况，指出村财政和战勤、支查中的浪费现象以及负担不公平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会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947年11月14日即要求董必武组织农业委员会研究提高农业生产的办法以指导各地。

9月5日，中共中央工委将《关于彻底平分土地问题》报告给中共中央。报告中说："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认为办法简单，进行迅速，地主从党内、党外进行抵抗可能减少，坏干部钻空子、怠工，多占果实的可能亦减少。而缺点就是除一般要削弱富农外，还可能从约占人口5%的上中农那里抽出或换平一部分土地。得利者在老区亦仍占50—60%，不动者占20—30%。仍可团结80%以上的农民，因系彻底平分，中农的不安与动摇反而减少。故大家认为利多害少。因此，决定普遍实行彻底平分，由土地会议通过一个公开的土地法大纲，而各解放区政府提议，同时通过一个党内决议，以总结一年来土改经验，并提出执行政策的方法等。土地法大纲及决议草案，待通过整理后，即电中央批准并发出。"⑤

中共中央于9月6日对中央工委关于彻底平分土地问题的报告作了批示："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亦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中农大多数获得利益，少数分出部分土地，但同时得了其他利益（政治及一般经济利益）可以补偿，因此土地会议应该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将农村中全部土地、山林、水利，平地以乡为单位，山地以村为单位，除少数重要反对分子本身外，不分男女老少，在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平均分配。不但土地、山林、水利平均分配，而且要将地主、富农两阶级多余的粮食、耕牛、农具、房屋及其他财富拿出来适当地分配给农民中缺乏这些东西的人们，地主、富农所得的土地财产不超过也不低于农民所得。大规模的森林及水利工程不能分配者由政府管理。"⑥

在会议的闭幕式上，刘少奇作了结论报告，着重分析了以往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他提出："大部分地区土地改革不彻底，即使比较彻底的地方还有若干毛病"，并指出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有三个：指导土地改革的政策不彻底，党内不纯，官僚主义的领导。针对这三个问题，他分析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所规定的平分土地政策，提出了整顿党和群众组织的任务，并分析了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问题。这个报告对以后各解放区平分土地的运动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注释：

① 朱德：《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203-205 页。

② 刘少奇：《刘少奇关于土地会议各地汇报情形及今后意见的报告》，《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年版，第 71-72 页。

③《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年版，第 76 页。

④ 同上，第 76-78 页。

⑤《中央工委关于彻底平分土地的原则向中央的请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 529-530 页。

⑥《中央关于彻底平分土地问题给中央工委的复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 528 页。

《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及其意义

在全国土地会议召开的同时，中共中央于1947年7月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由于战争的迅速发展，农民群众对土地有进一步的要求，土地政策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平分是原则，但按情况可以伸缩。针对陕甘宁和晋绥建设战略后方和后勤基地的问题，毛泽东还指出，地方工作就是要联系群众，其中心关键就是土地问题。1947年8月29日，在讨论土地改革政策问题时，新华社自陕北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反映了中共中央在战争的新形势下对土地改革的要求。社论指出："我们是处在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内战之中，人民的敌人是蒋介石反动集团，这个反动集团有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中国人民要以自己的力量战胜这个敌人，最重要的保证之一就是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首先是解放区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为此，"我党的土地政策改变到彻底平分田地，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农具、牲畜、种子、粮食、衣服和住所，同时又照顾地主的生活，让地主和农民同样分得一部土地乃是绝对必要的"。这个社论将战争形势和土地斗争的关系阐述得如此明确，并且第一次公开宣布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转变为平分土地、消灭封建，以至社论发表后的第三天，刘少奇即要求会议代表郑重对待这个社论，认真考虑平分土地的问题。从此土地会议集中讨论土地改革的政策问题。决定"普遍实行彻底平分"，并于会议结束时一致通过了《全国土地法大纲》，决定公开宣布平分土地的政策。

社论传到西柏坡后，对土地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会议对平分原则进行了讨论，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认为这种办法简单，进行迅速，缺点为除一般要削弱富农外，还可能从仅占人口5%的上中农那里抽出或换平一部分土地。考虑到如此做后得利者在老区亦仍占50%～60%，不动者占20%～30%，仍可团结80%以上的农民。因为是彻底均分，中农的不安反而减少，故大家认为利多害少。因此，会议决定对土地普遍实行彻底均分。9月6



日，中共中央来电同意会议关于平分土地的意见，并就中农问题进一步指出，平分过程中，中农大多数获得利益，少数分出部分土地，但同时得到了其他利益（政治权利及一般的经济利益），可以补偿土地减少的损失。此外，中央还同意即由土地会议通过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解放区政府的建议，同时，起草一个党内决议，由中央宣布。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土地会议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9月13日土地会议通过。

《中国土地法大纲》共16条，其内容如下：

（1）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2）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3）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

（4）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

（5）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6）除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矿山、大牧场、大荒地及湖沼等归政府管理外，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会接受，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评价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

（7）土地分配，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但区或县农会得在各乡或等于乡的各行政村之间，作某些必要的调剂。在地广人稀地区，为便于耕种起见，得以乡以下的较小单位分配土地。

（8）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分给个人的财产归本人所有，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

（9）若干特殊的土地及财产之处理办法，规定如下：（甲）山林、水利、芦苇地、果园、池塘、荒地及其他可分土地，按普通山地的标准分配之。（乙）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矿山、大牧场、大荒地及湖沼等，归政府管理。（丙）各名胜古迹，应妥为保护。被接收的有历史价值或学术价值

的特殊的图书、古物、美术品等，应开具清单，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丁）军火武器及满足农民需要后余下的大宗货币、资财、粮食等物，应开具清单，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

（10）土地分配中的若干特殊问题的处理办法：（甲）只有一口或两口人的贫困农民，得由乡村农民大会酌量分给等于两口或三口人的土地。（乙）一般的乡村工人、自由职业者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但其职业足以经常维持生活费用之全部或大部者，不分土地，或分给部分土地，由乡村农民大会及其委员会酌量处理。（丙）家居乡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及人民团体人员，其本人及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丁）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戊）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地方其他人员，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己）汉奸、卖国贼及内战罪犯，其本人不得分给土地及财产。其家庭在乡村，未参与犯罪行为，并愿自己耕种者，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11）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及债约，一律撤销。

（12）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

（13）为贯彻土地改革的实施，对于一切违抗或破坏本法的罪犯，应组织人民法庭予以审判及处分。人民法庭由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会所选举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员组成之。

（14）在土地制度改革期间，为保持土地改革的秩序及保护人民的财富，应由乡村农民大会及其委员会制定人员，经过一定手续，采取必要措施，负责接收、登记、清理及保管一切转移的土地及财产，防止破坏、损失、浪费及舞弊。农会应禁止任何人为着妨碍公平分配之目的而任意宰杀牲畜，砍伐树木，破坏农具、水利、建设物、农作物或其他物品，及进行偷盗、强占、私下赠送、隐瞒、埋藏、分散、贩卖这些物品的行为。违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15）为保证土地改革中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政府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证农民及其代表有权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干部，有权在各种相当会议上自由撤换及选举政府及农民团体中的一切干部。侵犯上述人民民主权利者，应受人民法庭的



审批及处分。

（16）在本法公布以前土地业已平均分配的地区，如农民不要求重分时，可不重分。[①]

土地会议的召开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制定，对各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深入开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其成绩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有：大纲规定的将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办法，导致侵犯中农利益，极大地损伤了中农参与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土地会议虽然确定要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但是在怎样划分地主、富农，又怎样区分富农和中农，而不至于侵犯中农的利益，会议没有制定统一的标准；对错误倾向的批判不够全面，虽然对前一阶段在部分干部中存在的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倾向有所批评，但对有些地区出现的“左”倾错误没有足够重视，没有及时遏止“左”倾错误的发生；对各解放区的情况没有做出具体分析，没有按照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政策。

总体看来，《中国土地法大纲》虽然还存在一定缺点和不足，但它较“五四指示”来看，还是前进了一大步，它对“五四指示”中一些不彻底的方面进行了明确的改变，用没收地主的土地代替了“五四指示”中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的规定；用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和财产代替了“五四指示”中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财产的规定；用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代替了“五四指示”中给几种人以照顾的政策。

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具有重大的反封建的革命意义，是一个彻底的比较完善的解决土地问题的革命纲领，对土改运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保证民主革命的胜利起到了历史作用。《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公开举起的一面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战斗旗帜，它极大地推进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广泛的政治影响。正如一位美国人评论的那样：“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 1946 年至 1950 年中国内政期间，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 1861 年至 1865 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②]

9 月 13 日，刘少奇在土地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他首先检讨了过去的工作，对“五四指示”以后，解放区土地改革不彻底的三个原因：指导土地改革的政策不彻底、党内不纯、官僚主义的领导，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接着提出了今后的政策，指出土地法大纲是我们政策的主要部分，这个政策是彻底的；最后，对于如何贯彻这一政策，也提出见解，他指出：以前土地改

革不彻底有3个原因，今天，政策不彻底这一条解决了，今后只有两个问题，即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有了彻底的政策，有了贯彻政策的纯洁的党组织，又有了好办法，不是官僚主义的而是群众路线的，土地改革就一定能进行到底。所以，整编队伍就成了首要任务。队伍有两个，一个是党的队伍，一个是群众队伍，而决定的一环首先是党的队伍，即群众的参谋部。党搞好了，其次是群众队伍，群众队伍的整编决定于发动群众。整编队伍的方法，还是“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制裁”。对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分子要清洗；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主义要进行思想斗争。他还指出：“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路线，在实行彻底平分的方针下也不变，还是这个路线。彻底平分土地一定要团结中农，不仅不可以少注意，而且更要注意。”“工商业肯定要保护。有的工商业者有土地可以分，其他不动；有些地主有工商业，工商业部分不动；有的地主把东西转移到铺子里，可以命令退出。特别是城市里，一切工厂商店，一律不动，让它去经营。”③

10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公布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同时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决议指出：“今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召集了全国土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详细地研究了中国土地制度的情况，土地改革的经验，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地民主政府、各地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个土地法大纲，并予以公布。希望各地民主政府、各地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对于这个建议，加以讨论及采纳，并定订出适合于当地情况的具体办法，展开及贯彻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④

注释：

①《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一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65-67页。

②［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③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8-390页。

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一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64页。



各解放区土地会议的召开

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初，随着《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各解放区党的组织和民主政府先后召开干部会议，总结一年以来的土地改革工作，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各解放区会议普遍具有参与人数多、历时长的特点，参与人数多表现在参会人数普遍超过千人，历时长主要表现在会议行程基本都在一个月以上。主要地区会议有晋察冀土地会议、晋冀鲁豫区会议、陕甘宁区的义合会议、东北区省委书记联席会议、华中（苏皖）区土地会议以及山东区大鲁南会议等。各土地会议除了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外，还汇报了土改情况，讨论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实施土地法大纲的具体步骤。

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于10月2日至12月26日召开了地区土地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县级、团级以上的干部1 700余人。晋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薄一波传达了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提出首先检查本区过去一年多来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并要求与会代表自觉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纪律上整顿队伍，以新的观点、新的精神详细讨论如何在本区施行《中国土地法大纲》，以便达到彻底平分土地，消灭封建性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从而满足农民要求。会议着重分析了一年多来土地改革的情况，认为全区土地改革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得多。全区3 000万人口，有1 000万人口区域中的农民已经彻底翻了身，但是仍有毛病；有1 000万人口区域中的农民翻身不彻底，需要继续翻身；还有1 000多万人口区域中的农民翻身很不彻底，需要大力进行土地改革。会议经过热烈而又紧张的讨论，认真揭发了土地改革中各种错误思想，找出了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会议开展了查阶级、查思想运动，开展了思想斗争。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讨论研究制定了《施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草案），并建议边区政府采纳定为法令。

12月28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公布全部接受《中国土地法大纲》

（草案）作为边区土地法的同时，还颁发了《施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草案）。办法具体细致，对《中国土地法大纲》中的第三、四、六条进行了修正，对第六、八、九、十、十一、十三、十六条进行了补充说明。并颁发布告，规定："本府所属各级政府，以前发布的一切法令规章，凡与《中国土地法大纲》和本府补充办法抵触者，一律废止。""不论任何个人，团体或机关，凡违反、破坏《中国土地法大纲》和本府补充条例，而作阻挠农民运动、破坏土地改革、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活动，或在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利用职权营私舞弊、阳奉阴违、包庇地主、富农，反对雇农、贫农、乡村工人，以及贱买、侵占、窃取斗争果实者，一律交人民法庭依法严惩；用暴力实行反抗及破坏者，决严予镇压消灭之。""各级政府机关（包括公营事业）首长对各该机关工作人员和所属下级机关的上述犯罪行为故意纵容包庇者，也应受法律制裁。"[①]1948 年 1 月 10 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发表了《告全体党员书》，号召全区党员坚决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遇事与农民商量，好好地与农民研究彻底平分土地的办法，领导全体农民起来实现《中国土地法大纲》，达到农民彻底翻身。[②]

在晋察冀解放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于 10 月 3 日至 11 月 9 日召开扩大会议和边区土地会议扩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县以上干部 1 100 余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在会上讲话指出："全国土地会议规定了土地改革的总方针，这就是要彻底平分土地。要贯彻这个方针，必须整理我们的队伍。在晋察冀边区党内还有许多倾向，存在着严重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的倾向，必须加以克服。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克服存在的各种倾向，调查研究，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我们一定能够完成土地改革。中央工委成员彭真在会上作报告，对《土地法大纲》作了说明，强调要实行土地法大纲，要整顿党的队伍，要整顿群众队伍，要改造边区贯彻土地法大纲的计划和具体政策。11 月 10 日，边区农会召开临时代表会议，发表了《告农民书》，号召边区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地主阶级，彻底平分土地，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做主人。"[③]26 日，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布告，接受《中国土地法大纲》为边区土地法，并立即执行。27 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和晋察冀军区联合发布布告，规定对违反土地法者给予严厉制裁，保障边区农民彻底翻身。

在西北解放区，中共西北局于 11 月在陕北召开全区高级干部会议，传达和讨论土地会议精神，研究如何完成土地改革问题。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



勋在会上总结了西北局在过去解放土地问题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充分发扬民主，对过去的工作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达到搞通思想和整顿组织的目的。会议结束后，陕甘宁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联合发出布告，坚决施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布告指出：（1）“要依土地法大纲的方针，不论老区新区，一齐动手，彻底平分一切土地，坚决干净消灭地主阶级和一切封建势力。如有敢于进行任何公开的隐蔽的反抗、破坏、以至反革命活动，即应受到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2）“村乡贫农团、村乡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各县农会临时委员会或农民代表大会，为组织领导进行土地改革的合法执行机关，不受现时县区乡村政府的任何限制。各乡政府和全体干部都要接受全体农民的审查、批评、鉴定，以至罢免改选。”（3）“过去土改中的斗争果实，在很多地方都轮不到贫雇农手里，而干部和自私自利分子占了便宜。这些贪污与窃取的斗争果实，要一律退出来交给贫农团或农会。”④与此同时，晋绥解放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发出《告农民书》，号召全区农民以空前的规模行动起来，打倒封建势力。

在东北解放区，中共东北局于1947年11月3日至21日在哈尔滨召开北满省委书记联席会议，研究如何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问题。会议提出要彻底消灭封建，彻底平分土地，充分发动贫雇农，满足贫雇农的要求，紧密团结中农，建立以贫雇农为领导的优势。会议提出在工作方法上，要由点到面，依托重点，全面发动，迅速掀起群众分地斗争的高潮。会后，东北局于12月1日发出《告农民书》，提出农村一切财富是农民创造的，一切土地是农民开垦的，农民分得土地及果实是理所应当的，是土地还家。号召农民一齐动手，来一个彻底消灭封建，彻底平分土地。

东北行政委员会于11月25日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土地法大纲在东北解放区实行的问题。会议认为，一年以来，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卓有成绩，基本上摧毁了封建统治，改变了农村面貌。但由于去年颁布的施政纲领中关于土地政策尚不彻底，致使封建、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尚未能彻底摧毁。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会议决定接受土地法大纲作为解决土地改革的法令。12月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制定颁发了《东北解放区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补充办法》，与《中国土地法大纲》一并实行。办法结合东北地区的实际，对《中国土地法大纲》中的第三、四、六、八、九、十、十一、十三条进行了补充完善。

在华中地区，华中工委于1947年11月10日发出《关于执行彻底平分

土地的指示》，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并强调要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把握以下几个问题：（1）切实满足贫雇农要求，团结中农中的大多数，但必须以满足贫雇农、依靠贫雇农为主要着眼点。（2）以乡或者村为单位，不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采取在数量上抽多补少，在质量上抽肥补瘦。（3）在土改比较彻底的地区，如贫雇农不要求重分，应以不变动为原则，个别的可作适当调整；在小农经济发达，中农多的地区，可在照顾贫雇农实际需要和团结中农两大原则下，按照中间不动两头平或彻底平分的方针灵活进行。

各区的土地会议以后，各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都联合发布命令，公开宣布接受《大纲》为本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法，要求一切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有任何违犯土地法，抵抗农民运动，侵犯农民民主权利的行为，违者予以法律制裁；并要求一切共产党员与干部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在土改运功中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不得包庇地主富农，不得有贪污自肥、徇私舞弊、阳奉阴违、阻挠破坏等行为，违者受党纪处分与法律制裁；一切武装部队应负责保卫土地改革，不得包庇地主、富农，阻挠破坏农民土地斗争，违者受军纪制裁及法律制裁。

在各地召开土地会议的过程中，有一种错误倾向逐渐滋生和发展起来，即用片面的贫雇农路线来代替党的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主张“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这种倾向最早突出反映在晋绥边区，那里的文献和报纸于1947年9月到12月期间反复强调，对于“反动地主”、“恶霸富农”，“大家要怎样惩办就怎样惩办”；对于“农民当中少数的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怎样惩办”；对于党政军民和其他一切机关中混进去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新恶霸、敌伪人员等”，“大家要怎样惩办就怎样惩办。”[⑤]至于混入各级组织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只要当地群众要求拿去清算惩办，就可以拿去清算惩办”。[⑥]由于对上述惩办对象的含义并没有作严格的规定，所以在具体执行起来就难免出一些偏差。同时，把中农同运动对立起来，提出中农的多余土地“应当抽出来分”，“任何借口‘不得侵犯中农利益’而压制群众运动，抗拒彻底平分土地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是一定要受到群众制裁的。”[⑦]这种宣传很有鼓动性，在群众运动中传播很快，能够广泛迎合部分农民的口味，却背离了党的政策。这种观点引起了农民间的自发斗争，扩大了贫雇农和中农的矛盾，纵容了严重扩大打击面的错误行为的滋长



蔓延，但是，这种倾向当时并没有引起各解放区土地会议参加者的普遍注意，从而为后来土地改革工作出现错误埋下了隐患。

虽然在地区土地会议的召开中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但是各地土地会议的召开，对于宣传土地会议精神、贯彻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各解放区土地会议的召开，各地土地法大纲的施行办法以及《告农民书》等文件的制定，对于各解放区平分土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各解放区在召开会议、发布指示和制定法令条例的同时，还抽调和培训了大批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下乡，广泛发动群众，掀起了一个平分土地的热潮，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①《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141 页，转引《东北日报》，1948 年 1 月 8 日。

②《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141 页，转引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8 年 1 月 14 日。

③《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142 页，转引《晋察冀日报》，1947 年 11 月 30 日。

④《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143 页，转引《东北日报》，1947 年 12 月 17 日。

⑤ 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见新华社 1947 年 9 月 16 日电。

⑥《晋绥日报》社论：《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见新华社 1947 年 12 月 6 日电。

⑦《晋绥日报》社论：《拥护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号召，坚决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1947 年 9 月 29 日。

平分土地运动的热潮

各地土地会议以后，深刻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的群众运动，很快在陕甘宁、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华中等老解放区，东北等半老解放区以及豫皖苏、豫陕鄂等新解放区广泛兴起。这次平分土地运动一般是在 1947 年 11 月至 1948 年 3 月期间进行的。其主要特点是全党动手、行动快、声势大。

各解放区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一般都先进行了斗地主、挖浮财的斗争。这一斗争虽然使农民得到不少胜利果实，但由于农民热衷于追挖浮财，各地都不同程度地扩大了打击面，产生了过火斗争，忽略了及时向分配土地的转移。中共中央发现这一情况后，及时制止了这种做法，而对于某些农民眼前生产上的困难，则改以发放贷款的方法来解决。

《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各地农村进行广泛宣讲以后，农民们很快就理解和掌握了平分土地的思想，在半老区和新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地主阶级，在老区和土改运动比较彻底的半老区，则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平分高潮到了以后，相当部分地区采取了联村斗争的方式，联合几个村庄的群众召开斗争大会，以求得浩大的声势。至于各地平分土地，一般都是以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但在具体做法上，是打乱平分还是在原耕的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要不要动中农，以及对各种特殊问题的处理办法等，各地有所不同。

首先，在晋察冀解放区，开始时曾经机械地执行以人口除土地的彻底平分方针，因而忽略了区分巩固区乡村具体的类型。通过 1948 年 1 月一个简短的实践，发现某些地区或村庄已经消灭或大体消灭了封建，如果再绝对平分土地，则拿出土地的农民反会比得到土地的农民数量多。因此，除个别贫农主张打乱平分外，绝大多数贫农都主张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抽近补远的办法。绝大多数农民认为，打乱平分土地需要重新丈地评级，费事费时，秋后也完不成，反而会影响生产；同时，当年的庄稼好坏不齐，如果打乱收割，会产生一些矛盾，引起部分农民不满；此外，“地种三年亲如母”，农



民对于自己亲自刨种出来的土地，往往会有深厚的感情，除了太差的以外，一般都不愿与别人交换。于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局改变了原来的提法，要求各地实事求是地分情况办事，在老区只通过抽补的方式调剂土地，土地不超过平均数1/10以上的，不动其土地。通过这种方式，各阶层土地大体拉平，特别是贫农的土地大大增加，接近了平均数。到1948年春天，在晋察冀解放区的北岳、冀中两区除边沿区以外，在有条件进行土地改革的15 066个行政村，1 068万人口的区域中，已有90%以上的地区达到了大体平分。贫雇农都获得了大体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和财产，地主也分得了一份，一般维持在平均数的70%以上，在巩固区只有占全部8%的地区（约100万人口）还还须要继续调剂。[①]

在陕甘宁解放区，从1947年冬起贯彻平分方针，具体做法是由工作团"打破旧圈子"即甩开原来的村干部，直接到乡村中"访穷"，用"穷连穷的办法建立贫农团或贫农小组，再成立农会斗地主富农，搞浮财，然后按平分的方针进行土地、窑房的分配。但是由于这里基本是老的解放区，经过多年土地斗争，农村中的土地占有关系已发生很大变化，因此在平分的原则下触动的不仅是地主的土地。在一些老解放区，平分后各阶层占有土地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了，地主、富农被进一步削弱了，贫农、雇农的土地大大增加了，普遍接近或达到平均水平。但是，新富农和富裕中农普遍遭到侵犯，中农也部分受到侵犯。因此在平分土地后期，这里又回过头来做补偿中农、落实政策的工作。

晋绥解放区的情况与陕甘宁解放区大体相同，只是中农受侵犯的程度更为严重。据全区的统计，在平分土地当中，老区转移所有权的土地占总耕地面积9.5%，半老区转移所有权的土地占15%左右。据岢岚、伯关、临县3个县的统计，共抽出土地359 478亩，其中49%是从地主富农手中接收的，16.6%是各种公地，4.2%是以前未分配的土地，29.6%是从中农手中抽出的，其中临县独动中农土地占总抽出地的37.5%，偏关为40%。在机械平分偏向较大的河曲、保德、兴县3个县所抽动的土地来源中，中农的土地比例一般占土地来源的45%以上，河曲、保德县的有些村子抽动中农的土地甚至达总来源的80%以上。经过抽补调剂，晋绥老区半老区共约70到105万人，即占总人口的33.4%到50%的人口获得了土地。同时，接收和征收了一批封建地财和浮财，据4个分区的统计，有白洋220余万元，粮食10万余石，牲口1.8万头，银子12.7万余两，金子608两等。从而使有46.7

万人口的灾区战胜了数十年未有的灾荒。平分以后，群众们支持前线的积极性明显提高，据两个分区统计，在 1948 年夏季的一个月中，即有 6 011 人参军。[②]

东北解放区的大部分是抗战胜利后立即解放的半老区，还有一小部分为 1947 年解放的新区。1947 年冬季普遍进行了平分土地运动。半老区在平分前大部分经过初步土改和复查，群众基本已发动起来，但由于封建土地制度消灭得不够彻底，土地在劳动人民之间分配得不够公平等原因，在不同程度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地主仍然留地过多、基本群众土地不足、分地不公、佃富农土地多、存在大量未分的公地和黑地、土地分得过于零碎还有移民户土地问题等。从 1947 年 12 月到 1948 年 2 月，东北解放区开展了平分土地运动。一般的做法为“多少拉平，好坏填齐、照顾（土地）远近，打烂重分”，即重新丈地、评级、按人口分配。这种办法虽然说起来简单，而且容易理解，但是在具体行动中要完全公平合理很不容易。

此外，在东北解放区的大部分地区，地主、富农的黑地很多，如松江省 1947 年底估计，地主、富农黑地占耕地面积的 1/6 至 1/5，分配查出的黑地即可以解决雇贫农土地的不足，这样就使得平分工作就简便多了。到 1943 年 2 月中旬，东北解放区巩固区的封建土地制度已经彻底废除。据松江、龙江、合江、嫩江 4 省的不完全统计，平分土地 5 000 余万亩（其中包括前几次运动没收分配的土地数），没收征收牛马 40. 8 万匹，金子 19 500 两，银子 47 300 余斤，衣服 520 余万件；各省已基本没有黑地，地主、富农的统治地位随着他们的封建剥削的废除，一去不复返了。大多数地区以贫雇农为骨干的农民群众，真正掌了权。农民们分到了田地，有了生活的保障，纷纷起来参军参战，支持前线战争，并积极主动地要求加入共产党。

华中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因早先贯彻“五四指示”和复查期间对封建土地制度斗争较彻底，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受到了好评。在平分土地时期，这些地区较早地纠正了部分“左”的倾向。如早在全国土地会议召开之前，华中土改的领导人邓子恢即强调：“雇贫农要土地，只能引导他向地主富农要，决不能引导他向中农及新富农要，这是土地改革中与满足雇贫农要求同样重要的基本政策”，“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方针，是此次土改的最好办法。这个方针既公平合理又简单明确具体，农民易懂易行（农民的口号越简单越好），既可防止被右倾分子富农路线所假借，又可防止幼稚者在分阶级不明确时吃了亏”。[③]这些意见虽未引起全国土地会议的重视，但是中共中央华



中分局在1947年11月10日发出的《关于执行彻底平分土地的指示》中却采纳了，规定在不同情况下土改的不同方针："在土改时及复查后较彻底的个别地区（如涟水、兴化、两台及五分区的个别区乡），如雇贫农不要求重分，应以不变动为原则，个别的可做适当调整。至于小农经济发达中农特别多的个别地区，在照顾雇贫农的需要和团结中农的两大原则下，按照中间不动两头平或彻底平分方针灵活进行"。这些规定对于保护中农利益起了一定作用。晋冀鲁豫区在1947年夏秋季复查时，曾在"反特"的口号下，一度乱打乱杀现象比较严重。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土地会议之后，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对此加以制止。直至1948年2月区党委直属机关整党工作基本结束之后，才组织工作团下乡宣传《土地法大纲》，同时贯彻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以后制定的各项具体政策，农村工作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干部问题和补偿错斗的中农和工商业。

综上所述，全国土地会议以后在整个解放区开展的平分土地运动，使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达到高潮。与以往的土地斗争比较，这次运动发动快、声势大、范围广，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更加普遍、彻底。在那些过去土改不彻底的地区，经过运动之后，农民占有的土地趋向合理，运动以后，农村各阶级所占有的土地大体平均，贫雇农基本上得到了相当于平均数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其要求得到较好的满足并且在斗争中迅速成长为农村各级政权的骨干；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壮大了主力部队。同时，在平分土地过程中，特别是在老区半老区的斗争当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左的错误，亟待纠正。

注释：

①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转引《聂荣臻在华北局扩大会上的发言》，1948年7月。

②晋绥区党代会通过：《关于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基本总结纲要》，1949年1月30日。

③赵效民：《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页，转引《邓子恢给刘少奇的信》，1947年7月3日

扩大打击面的“左”倾错误的出现

在党的领导下，解放区广大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对地主阶级展开了猛烈的斗争，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高潮。在平均分配土地的热潮中，原来已经存在的“左”的倾向，在一片反右的气氛下，伴随着土地法大纲的贯彻执行和群众运动的高潮而进一步得到发展，在一些地区成为一种主要的危险倾向。这种“左”的错误倾向主要表现在：

第一，错划阶级成分。

正确划分阶级成分，分析农村中客观存在的阶级矛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毛主席告诉我们，一定要划清界限，分清敌我，孤立敌人，分化敌人，而不能孤立自己。1933 年 10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作出《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批准将毛泽东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依据，文件中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都有明确的规定，标志着正确的农村阶级划分政策已基本确立。但是在平分土地的热潮中，党对于划分阶级的标准没有给予充分的说明和具体的政策指导，多数干部在强调贯彻阶级路线的同时，一度盲目提倡“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使阶级划分标准受到绝对平均主义和狭隘关门主义的影响，造成了严重的偏差。

在划分阶级成分的过程中，一些干部把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识作为划分的标准。对于过去曾是国民党员的，或对新政权态度不好的，干部中贪污腐化、欺压群众的，就提升其成分，定为地主富农。其次，他们还查三代的历史，在贫农队伍内部“强调三辈穷，把三辈穷的定为一等，两辈穷的定为二等，一辈穷的定为三等，还有划分七等的”，从而增加群众内部的矛盾。再次，缺乏正确的数量界限，对剥削和劳动不作数量上的分析。在许多地方，把靠自己劳动为生，只雇个把放牛娃或放羊娃的中农或富裕中农定成富农；将有劳动之家作为无劳动，或把主要劳动作为附带劳动，把富农定成地主。此外，他们还单纯以田地和财富的多少，生活水平高低作为确定阶级成



分的标准。在确定成分时，往往只由贫农团通过，或少数人确定，不经全体农民讨论，也不允许本人申辩。

任弼时在分析兴县蔡家崖行政村定成分的错误时，将本村 31 户错划成分的原因总结为六种：一是错划其祖辈或是父辈剥削过人，本人在 1936 年以前，即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前一年，剥削已很少，或已不再剥削者，一共 15 户；二是错划本人早年享受过地主富农生活，抗战以前（后半辈）自己劳动即未剥削人，或剥削很轻微者，一共 5 户；三是错划本人勤苦劳动，只有轻微剥削，而“铺摊”大（财产多）者，一共 7 户；四是错划本人早年很穷，过继或被卖给地主富农为儿子，自己劳动为主，剥削很少或不剥削人者，共 3 户；五是错划因孤儿寡妇无劳动力，中间一段雇过人，父亲是农民，本人长大也是农民，因偶然丧失劳动力而雇佣长工的，有 1 户；六是此外过去定成分中，对经济状况剥削关系很难确定者，往往以其政治态度决定其成分的升降。任弼时总结到，在蔡家崖和晋绥的其他许多地方，是以剥削、历史、生活及政治态度等许多项目来作为定成分的标准的。除剥削一项以外，拿其他几项作为定阶级的标准都是错误的。这种做法是把自己人算到敌人阵营中去了，不是孤立了敌人而孤立了自己，把自己队伍里的人，送到敌人方面去，是严重的错误。①

第二，侵犯中农利益。

中农是我们永久的同盟者。一般来说，中农占有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并且自己劳动，但是他们不剥削其他农民，或者只有轻微的剥削。在过去，中农也受封建政权的剥削压迫，是民主革命的重要动力。因此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经过土地斗争，中农成了农民中的大多数时尤其如此。不侵犯中农利益是土地改革的一条基本原则。但是在“平分”热潮中，被侵犯的中农一般占中农阶层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在解放区，排斥中农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种是定错了中农的阶级成分。将一些中农错划成所谓“生产富农”或“破产地主”，加以侵犯。许多地方被错划了成分的，其财产也被没收了，有些连人也被打过。如东北有些地方将全部富裕中农都划为富农，以至有的县，如龙东县无一户富裕中农，据冀中区党委统计，这种情况占被侵犯户的 70%。

第二种是在“平分”的口号下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将高于平均水准的中农土地抽出来。尤其在老区，将部分老中农和由贫农上升的新中农也列为平分对象。晋绥区某些地方提出平分要做到“粮不过一升，地不过一分”

的门号，以至保德县平分中由中农那里抽出的土地占抽地总数的70%以上。

第三种为办事不要中农参加。在一些地区贫农团代替了农会，不尊重中农的民主权利。不让中农讨论划阶级、评议负担等重要问题。有的地方规定中农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中农不能当干部，中农参加农会必须经贫农团推荐与审查等等。

第四种为加重中农负担。在负担上不照顾中农，特别加重中农负担，不给中农困难户贷款、在合作社互助组内与贫雇农同工不同酬，有的地方甚至命令中农无偿为贫农秋收、支差等。有些地方发现了分派公粮时只由贫雇农小组商量决定，因为土改后地主富农无力负担，就把应分派给地主富农的公粮负担都派在中农的头上，甚至送公粮也多派在中农头上。如在1947年冬季生产中，太行区银行规定不向中农贷款，并用转贷的方式将过去中农的贷款交给贫农；榆次县互助合作组织冬季生产中赚的钱按贫（农）六、中（农）四的比例分配；长治县五区西掌村互助组内工资分三等：地主一个工半升米，中农一升半，贫农二升；武安县有些村减免贫农差役，由中农多出或全出。

此外，在分配果实时，有完全不分给中农的。这些作法严重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挫伤了中农斗争和生产的积极性，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

第三，侵犯部分工商业。

中国土地法大纲上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一般工商业是应当受到保护的，就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也不应当没收，同样是应当受到民主政府的保护。毛主席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及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容许他们存在，并且按着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他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他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在平分的热潮中，各地已发生破坏工商业的现象。不少农村集镇与一些县城的工商业者被斗，财产被没收分配。出现反对农村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触及到城镇工商业者的现象，主要出于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用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看待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并把农村的做法照搬到城市中。如太行区一些人的逻辑是：地主是财主，工商业主也是财主，地主该斗，工商业者也该斗；贫苦农民是“穷人”，城市贫民、店员、工人



也是“穷人”，农民该翻身，贫民、店员、工人也该翻身，所以得出结论是工商业者非斗不可。结果邢台等地斗争了工商业者，群众虽分到一些果实，但是引起资金外流，有的外流资金达全部资金的75%，造成工商业萧条，贫苦市民收入减少，坐吃山空，果实吃光了仍无法度日。

二是否认和反对地主、富农向工商业转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前期，党的政策曾明确鼓励地主、富农投资工商业，转化为工商业者。这既有利于农民获得土地，又能繁荣经济。但是在平分热潮中，一部分地区否认这种转化是正当的，认为兼营或完全转化为工商业者的是“化形地主”，“若不加以清算，则难以消灭地主在农村之封建剥削经济基础”，结果引起连锁反应。华中一分区的大中集和新丰镇，群众在清算地主工商业时，市镇贫民恐怕镇上的商店会被农民算光，于是也起来清算，甚至把铁匠店、豆腐店、茶水炉子、烧饼店也都以“进行商业剥削”（铁匠店刀打得不快，豆腐店的豆腐太小等）的名义加以清算、罚款。事后，据新丰镇民主街的调查，50户商店被侵犯的即有38家。

三是片面强调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对党的保护工商业政策发生动摇。出现了三个不加区别：不区别城市和农村的不同，不区别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不同，不区别农民与贫民的不同。所以发动农民平分土地翻身斗争，也发动城市贫民平分工商业以求翻身。

由于以上各种情况，各地被侵犯的工商业户占总数的5%左右，多数是地主富农兼营的，也有如上述华中等地的情况波及面更加广泛的。据冀中八、九、十三个分区的调查，在全部8万余户工商业中，被侵犯的有4 000户。侵犯工商业较严重的地区被侵犯户达32%以上。如晋绥10个城镇中被侵犯的工商业占工商业总户数的29%，东北解放区的灾县全城432户工商业者，被斗争的有210户，占48.8%。这种现象，严重地妨碍了解放区经济的发展。

第四，对地主、富农不加区别，排斥知识分子。

消灭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制度，主要是要没收地主阶级的粮食、土地、耕畜、农具等财产，及征收富农多余部分的财产分给农民。关键是分配土地。而在许多地方，斗争地主富农的方法是不恰当的。土地在平分的高潮中，一度对大中小地主及开明士绅，地主与富农，旧富农与在民主政权下劳动致富的新富农不加区别。对于富农和地主一样的方法去斗，甚至要打死一些人，有的地方对其一律“扫地出门”，少分田，分坏田，平分其牲畜、大

农具，清算其油坊、粉坊。还有的地方仅在处罚的方式上有所区别，而在生产资料的处理上不加区别。如吉林省一度对地主富农的区别仅在于“凡征收一般富农多余财产时，可不逮捕，只加监视”。华中也仅反映在对富农不采取“扫地出门”的方式，其保留的土地财物也不能多于一般农民。此外，对于党外人士、三三制政权中的开明绅士一度也不加区别地斗争。晋绥区于1947年8、9月份由兴县的工作团汇集群众将著名的开明士绅刘少白押回其老家斗争当场撤职，并抄家、没收公章文件，将家属扫地出门。这种过火打击富农的做法，引起了中农的惧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负面影响；而对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的过分打击，极其不利于团结这一群体，壮大我们的队伍，从而共同抗击国民政府。

第五，乱打乱杀。

共产党一向是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但是在土改运动中，由于党内不纯，地主富农投机分子和流氓分子利用机会捣乱，发生了不少打人和逼死人的事实。如习仲勋在给毛主席的报告中提到的葭县的例子，几个村庄连贫中农的东西一起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家中被斗，弟弟被吊打索银洋，有的烈士家属被扫地出门，甚至还有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的，用滚油从头上烧死人的现象。[②]这些随便加人罪名处人死刑和任意打人的行为，是极端错误和缺乏民主的，极大地损害了我党的形象，破坏了社会的稳定。

土改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生，有众多方面的原因，有党的政策不完善的原因，也有更加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滋生起来的平均主义思想在我国农民中间的长期存在及其发展蔓延，成了这种“左”倾错误产生的社会思想基础。此外，在异常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对解放区具体情况缺乏全面的调查和正确的估计也是错误发生的重要原因。这些“左”倾错误在广泛的土改运动中虽然不是主要的，但是也给解放区带来了很大损失，妨碍了土改运动的健康发展，使得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秩序的不安定。

注释：

① 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一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101页。

② 习仲勋：《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给毛主席的报告》，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一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113页。



土地政策的补充修正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不久，中共中央即派人到各地了解土改运动的情况，任弼时到米脂县杨家沟周围的村子里广泛调查，发现了土改中存在的“左”倾错误。中共中央及时察觉这些问题，并采取措施迅速加以制止。1948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十二月会议，研究新的形势和党的工作。会议研究了解放区土改中的错误偏向，制定了纠正偏向的方针政策。

会议在对土地改革的路线、政策、方法进行讨论后，作出以下几点决定：指明当时土地改革中的主要倾向已经偏“左”，我们应该及时纠正；重申土地改革“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的正确路线，必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同时必须坚决团结中农，不能损害中农利益；研究并制定了土地改革的大量具体政策，正确划分农村阶级成分，正确对待中农、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正确对待地主富农。

会后，毛泽东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问题》，任弼时于 1948 年 1 月 12 日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这些文件都成为 1948 年以后指导土地改革的重要文献。1948 年，中共中央重新印发了 1933 年关于划分阶级的两个文件，删掉了其中“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错误规定，并且对这两个文件陆续做了一系列补充和更正。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明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任弼时在报告中指出：“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根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①]其次是进一步明确了划分阶级的时间界限。1948 年进一步规定了改变成分的时间：“凡地主自己从事农业劳动，不再剥削别

人，连续有五年者，应改变其成分，评定为农民（按实际情况定为中农、贫农或是雇农）。富农已连续三年取消其剥削者，亦应改为农民成分。”[2]第三是将区别富农和中农的剥削量由1933年的15%改为25%。自1948年至全国土改结束，划分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界限都以剥削收入是否超过总收入的25%为准。此外，还强调了应民主评定阶级，有错必纠，“自报公议，三榜定案”，进一步明确划分阶级必须采取正确的方式。在此基础上，规定了正确对待农村各阶级的政策。

正确划分阶级的目的在于正确对待各阶级。为了消灭封建势力，掌握政策的基本方针是要争取多数，反对少数，集中力量打击消灭主要敌人，而不应多树立敌人。这是中共中央一贯的策略思想。针对平分热潮中出现的盲目扩大打击面的错误，十二月会议以后，中共中央重申和具体规定了一系列政策，主要有：

第一，在满足贫雇农的同时，不侵犯中农的利益。

在封建社会中，贫农是生活最苦，革命性最强的阶级，是土地改革的骨干。毛泽东在1927年说过“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但是只有贫农还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农民革命队伍。封建时代“每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农民革命总是在封建统治者不断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使得中农群众，尤其是比较贫苦的中农也感到无法照旧活下去的时候才爆发起来的”。又由于“文化为地主阶级垄断。过着最贫苦生活的贫农几乎完全没有机会接受最起码的文化。中农比起贫农来有可能稍微多一点文化，也较有可能对本村、本地区以外的世界多一些见闻。因此，贫农往往和贫苦中农联在一起领导和进行农民革命”。[3]

任弼时在他的报告中对中农评价到：“中农在旧政权下，约占人口的20%。在老解放区，一般占了50%上下。在彻底平分土地以后，则农村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了中农，只有少数人不是中农了。在过去打日本时，中农出力出钱不少。他们打日本是有功劳的。在现在打蒋介石时，也靠他们出很大部分人力和粮食。现在我们的解放军中有30%～40%是中农。如果我们破坏了中农的利益，甚至和他们对立起来，那就要使我们在战争中失败。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由个体经济到集体合作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依靠新老中农。他们有丰富的生产经营，是值得贫雇农学习的。他们的生产工具也比较完备，可以给贫雇农以帮助。在将来，中农还可以同我们一道走进社会主义。因此，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4]



1948 年以来，中共中央关于保护中农的具体政策越来越明确了，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在平分的口号下曾认为“中农不可能不动’。但是，很快便给以纠正。十二月会议批评了侵犯中农利益的倾向，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两个方向是统一的。即贫雇农对土地财产的要求只能通过没收或征收封建的、半封建的土地财产来满足；要求得进一步富裕，就只得通过逐步发展生产，劳动致富。而不能去平分中农的土地财产。十二月会议还提出了不得损害中农利益的原则。1948 年 4 月召开的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必须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5]1949 年进一步明确指出，在城区土改中，对一切中农的土地不得抽动。从政策上彻底制止了侵犯中农利益的行为。

为了保障中农的经济利益，还规定保障中农的政治权利，指出“办事一定要吸收中农参加”，“在农民代表会的代表中，农会委员中，要有中农参加”“在贫雇农占多数的地方，在农会代表及农会委员中，中农可占大约三分之一的比例，贫雇农占三分之二；在中农占大多数的老解放区（其中许多是贫雇农上升的新中农），中农所占的比例就应该增高，大约贫雇农占三分之一，中农占三分之二”。[6]此外，中农的负担要公平合理，绝对不能因为地主富农不能负担，而把其负担加到中农身上去，对于已侵犯了中农利益的要退还其财物或补偿其损失。

第二，进一步明确保护工商业。

对于工商业，是应该受到保护的。破坏工商业“是一种自杀政策”。《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要“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规定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也不应当没收，同样也应受到保护。“过去鼓励地主富农经营工商业的办法是正确的，今后仍应鼓励”，即使是官僚资本，战犯及罪大恶极的恶霸的工商业财产，经县以上法庭判决应该没收的，也要将“这种财产由政府处理，不由农会处理”。为了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解放战争后期还制定了有关的城市政策，“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对于土地在乡村家在城里的地主，由民主政府依法处理。其罪大恶极者，可根据乡村农民团体的请求送到乡村处理”，“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7]对已被侵犯的工商业要进行补偿，制定和实行合理的工商业税，使解放区的工商业得

到恢复和发展。

第三，区别对待地主富农。

要正确地对待地主富农，禁止乱打乱杀，从而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阶级，主要是没收其土地、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其中最基本的是分配土地，不要在搞地财（埋藏起来的金银等浮财）上耽误很多时间。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批评斗地主的地财，是“斗到牛角尖里去了”。农民在搞地财上耽误了很多时间，以致妨碍分配土地。在战争环境下，解放区的财力有限，用适当的办法搞出地财能够帮助农民解决资金困难，但搞地财要慢慢去搞，同时也不能单靠搞地财去解决农民的困难。为了引导农民不搞地财，中央要求各解放区政府发放农贷，帮助农民克服困难。

对大中小地主，恶霸、非恶霸地主在斗争方式上要有所区别。对大地主及恶霸采用严厉的斗争方式，以打掉其威风，使他们懂得土改是大势所趋，不得抗拒的。然而对于非恶霸的中小地主可用谈判的方式使他们交出土地财产，已拿出土地财产、低头屈服者就不一定到大会上斗。

消灭地主阶级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个人。除少数汉奸，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等经法庭定罪者外，对一般地主都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使其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要把一切不是坚决破坏战争，坚决破坏土地改革，而在全国约三亿六千万乡村人口中占有约三千六百万之多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因此，要“坚持少杀，严禁乱杀”，给地主以生活出路，鼓励他们转向工商业，允许其经过劳动改变成分。

对富农与地主要有所区别。因为“富农自己是劳动的，他的积蓄的一部分是自己劳动的果实”，‘如果过火地打击了富农，是可以引起中农惧怕的”。所以规定对富农除平分其土地外，对他的其他财产只征收多余部分不能全部没收，也不能像对地主那样去搞富农的地财。

此外，对于新式富农和旧式富农也应有所区别。1948 年以来，针对老解放区土地斗争多年后经济发展的情况和平原、沿海、大城市郊区等经济较发达的新解放区的情况，逐步补充规定了对新富农的政策。新富农的生产是在民主政府帮助下发展起来的，过分打击新富农，会引起中农的动摇，因



此，要鼓励新式富农，发展其生产，从而刺激中农的生产热情。

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以后，土改政策更加完善、具体，斗争的打击面逐步缩小，土地改革的成效也愈来愈明显了。

由于小农所固有的平均主义倾向是产生“左”倾错误的重要思想根源，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对平均主义作了分析：“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平均主义。……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5月1日，中共中央在其发布的《一九四八年“五一”劳动节口号》一文中，没有关于平分土地的内容，在这以后的中央文件中也就不再出现“平分土地”的提法。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其中说到：“凡属封建制度已经根本消灭，贫雇农已经得到大体上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他们同中农所有的土地具有差别（这种差别是许可的），但是相差不多者，即应认为土地问题已经解决，不要再提土地改革问题。”这段文字，充分说明党中央已把是否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作为土地改革完成的标准，而不把是否平分土地作为标准。到了1949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就华中局《关于土改中如何对待中农问题的报告》复电指示：“我们同意以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作为解决河南土地问题的基点，对中农土地完全不动，而不要照土地法大纲上关于中农土地的规定。”根据中央的指示，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对一切中农的土地都不再抽动。至此，就不但完全放弃了“平分土地”的口号，而且规定了防止在分配土地中搞绝对平均主义的具体措施。实践证明：只有实行“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才能切实保障中农的利益不受侵犯，做到巩固地团结中农，顺利地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

注释：

①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一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第102页。

②同上，第103页。

③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92 页。

④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一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第 104 页。

⑤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314 页。

⑥同①，第 105 页。

⑦同⑤，第 1324 页。



落实政策 确定地权

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以后，“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全党树立起来，各解放区的党政机关都加强了调查研究工作。1948 年一二月期间，参加了十二月会议的陕甘宁、晋绥两区的代表首先就近深入各县检查土改工作，并将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向中央汇报。接着，其他各解放区也深入基层进行调查。

陕甘宁和晋绥两区都有占人口半数或半数以上的地区为抗日战争时的根据地，既不同于对日反攻后解放的半老区，也不同于解放战争转入反攻后开辟的新解放区。经过调查，中共中央西北局负责人习仲勋于 1948 年 1 月 4 日、1 月 19 日、2 月 6 日 3 次向中央报告了陕甘宁老解放区土改的实际情况，如实地反映了土改斗争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左”倾错误及其造成的种种危害，明确地指出：“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负责人李井泉也于 1948 年 2 月 10 日向中央报告“关于老区贫农与中农领导地位问题”。中共中央对这些报告极为重视，毛泽东及时将西部土地改革的调查批转各地，要求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1948 年 2 月，他建议分三类地区采取不同策略实施土地改革。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于 1948 年 2 月起草了《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经过毛泽东修改后作为党内正式文件下达，提出了老区半老区的土改方针。

首先，要区别老区、半老区三类情况，采取不同的工作方针。在土地改革较为彻底的地区，“决无再行平分的必要”，只需在较小范围内用抽补方法调剂土地及一部分生产资料；在土地改革尚不彻底的地区，“一般的也不是再来一次全面的平分，而是实行在较大范围内的调剂，只是在某些特殊地方，在多数农民要求并取得中农同意的条件下，应当重新平分”；在土地改革很不彻底的地区，封建制度仍然存在，地主、旧富农仍占有大量土地财产，贫、雇农仍人多地少，在这类地区中除尚带游击性质的边缘区外，完全

适用平分土地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方针。但文件对“平分”作了具体说明和限制：平分的“办法仍应是抽补，而不是完全打烂”，平分的重点，应放在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及征收旧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上面。对于一部分中农的多余土地，必须在取得其同意以后，方能抽出平分。如果某些中农所有土地较一般农民所有土地的平均数只超出10%以下，应不变动。对三类不同地区的农民组织也要有所区别。

第二，在第一、二两类地区，要合理调剂土地，适时确定地权。调剂土地要从党的阶级路线出发，从发展农业生产出发，“而不应附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地权确定后即不再变动，以利发展生产。调剂土地必须与整党相结合。

第三，在土改和整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各地党的领导必须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领导干部的多少强弱，决定工作的速度；对于群众中的不正确意见，必须耐心说服；对于一切领导土改和整党工作的干部，必须加强训练，讲明政策，并适时检查他们的工作。凡无得力的领导者或健全的工作团的地方，宁可暂缓发动，不要急于求成，致走弯路。

为了迅速落实老区、半老区的土改方针，1948 年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还亲自调查，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毛泽东向全体土改工作的同志推荐了刘少奇总结的《平山老解放区土改经验》、谭政文的《关于山西崞县召开土地改革代表会议情况的报告》以及《陕甘宁绥德县老区黄家川抽补典型经验》。这 3 个典型分别反映了如何在农村整党，如何在老区调剂土地而不是平分土地，以及如何在半老区做平分土地的准备工作。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些典型经验。他认为，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当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仅要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这些具体的生动的典型经验进一步补充了老区、半老区的土改方针，并使之得到初步验证，对于上面的推广贯彻起了引路作用。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各地纠正“左”的偏向一般从改正错划的阶级成分入手。经过 1948 年上半年的重新审定阶级，各地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基本



上都遵循了党的阶级划分政策，与1947年底“平分”时比较，扩大了农民群众的队伍，缩小了打击面。据几个解放区的统计，打击面都基本上占农村户口的80%，人口的10%左右。

在改正错划成分的基础上，各地于1948年进行了补偿被侵犯的中农和工商业者，安置难以维持生活的地主、富农的工作。各地对补偿中农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有步骤、有分别地进行，并把思想教育工作放在了首位。在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础上，以村为单位统一筹划补偿的土地财物，而不是由被斗争者与应退者个别解决，不要简单采取物归原主的方法。1948年初到年底，各地纠正错定成分、补偿中农的工作普遍开展，纠偏和补偿工作做得好的农村，群众生产情绪迅速恢复和提高。解放区还掀起了生产救灾的热潮，这对于渡过灾荒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绛县乔野村的一位秀才说：“你们这一下能顶200万军队，再不纠正，大家就都睡觉了。”在补偿中农的同时，各地还按中央指示补偿被侵犯的工商业。补偿和安置的财务来自未分配的土改成果和政府库存。各地还安置了被“扫地出门”的地主、富农；落实了对“三三制”政府中的民主人士及开明绅士的政策。如晋绥边区给一度受到错误批判斗争的参议长刘少白等开明绅士恢复了职务。

通过落实政策，各解放区的工商业迅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如晋冀鲁豫区，到1948年8月，濮阳县工商业比3月时恢复和增加工商业40余家。聊城工商业由解放时的1 068家增加到1 249家。天津、济南、青岛、开封、西安等国民党统治区的工商业者来解放区贸易和办厂的也日益增多。据聊城统计，各地来往商人2月份为1.06万人，3月份为2.4万人，4月份为4.53万人，5月份为4.6万人，逐月在增加。在晋察冀区冀中的3个分区，原有工商业8万余户，一度被侵犯的有4 074户，到1948年4月已补偿者3 726户，占被侵犯户的91.5%。

在纠正了“左”倾偏向、社会秩序安定的情况下，不少逃亡户也被争取回来。国民党军队，政府中不断有人回归解放区或向解放军投诚。在纠“左”的同时，土改中出现了一些右的倾向，虽然偏差不大，但是影响很坏。中共中央于1943年11月提出纠“左”防右的任务：“必须在巩固过去土地改革伟大成就的基础上来纠正偏向，结束土改；而在解决土改所遗留的问题和纠正‘左’的偏向时，我们必须要照顾土地改革中满足贫雇农要求的历史任务，仍然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来组织强大的群众队伍。对于发生了右的偏向的地方，应该予以及时的克服，并且按照错误的性质，分别对

于犯错误者进行思想上的教育和组织上的处置，以达贯彻关于土改和整党的正确政策之目的”。此后，各地在结束土改中，按照实际情况，从两个方面纠正偏向，按照党的政策和具体条件，有领导、有步骤地，恰当地补偿中农、安置地主富农及进行各项结束土改的工作。

在纠正各种错误偏向的同时，各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对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的指示，将纠偏与调剂土地、春耕生产结合起来，进一步解决以往土地分配不够合理的问题，为确定土地权、结束土改打好基础。

经过初期土改、复查、平分等多次反复的土地斗争，农民盼望用法律形式确定土地所有权。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明，对于农民安心投资于土地，发展农业生产，有重要作用。这项工作自 1948 年下半年陆续展开，至 1949 年春耕之前基本完成。

1948 年 6 月到 8 月，东北、华北（1948 年 5 月由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而成）、华东、西北各解放区的行政委员会分别发出关于颁发土地所有证的指示。土地证颁发的一般原则为：（一）凡经土地改革后，分个人所有的土地均发给土地证，以户为单位确定各阶层一切男女老少人口的地权（包括宅基地和地上的树木等），保障其不受侵犯。由各解放区最高行政机关统一印发，依级转由各县、市政府填发，交各户主收执。以后遇有土地转移、买卖、分家、嫁娶等情形，准予分领或换取土地证。（二）如数户共用分得的土地，土地证上须注明其为共有土地，各户各执一张。（三）凡归村所有之土地，如学田等，经县政府批准后，土地证发给村政府收执。（四）凡属公有土地，如公营农场或苗圃，以研究或改进农业为目的保留的试验田以及义地、荒地、草滩等，均不发土地证，由县、市政府登记。（五）二流子一时难以改正者，经群众公议后，其土地证由村政府暂予保存，待其改变后再予发给。

发证工作于 1948 年秋后普遍展开。大部分地区发证工作都先经过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于 1948 年秋后普遍展开。先广泛地进行发证意义的宣传教育，接着集中力量加强组织领导和督察工作，由农会、贫农团共同组织发土地证委员会，负责审查、丈量、登记土地与解决房地纠纷。

在结束土改、颁发土地证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落实妇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这样做不仅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而且有效地提高了妇女参加生产和各种政治活动的热情，改善了她们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



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发展农业生产，也只有生产发展起来，才能巩固土改的胜利果实。因此，地权一旦确定，中共中央即大力号召：把解放区的农业生产提高一步。毛泽东指出，由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农村经济，在一个颇长的时间内，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但是，在将来可以逐步地引向合作社方面发展。在基本上是手工劳动、缺乏社会分工、商品率极低的条件下，为着发展生产，就必须使广大群众树立和巩固生产发家、勤劳致富的思想，这样才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由这个基本点出发，中共中央制定了土地改革后的农业生产政策，并在各个解放区认真贯彻执行。其主要内容包括：保障土地改革后农村各阶层的土地财产私有权；确定公平合理、公私兼顾的负担政策；实行奖励生产的政策；组织农民互助合作，等等。不到半年时间，消灭荒地一半以上，体现出在正确政策指导下，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在老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的同时，1947 年解放区转入战略进攻以后收复的新解放区，也吸取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相继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工作。

停止新解放区的急性土改

在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占统治地位的同样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其土地占有的情况尽管各地不完全相同，山地和平原、内地和沿海等有所区别，但是除大城市郊区的少量土地外，绝大部分都是封建占有关系。广大新区农民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土地问题，封建土地占有关系严重地阻碍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是新区农村同老区土改前农村情况的共同之处。

由于新区是在战争迅速进展的新形势下开辟的，尤其是外线新区，具有与老解放区不同的一些特点。第一，环境不安定。敌人的残余武装力量、特务匪徒和各种反革命组织还未肃清，革命秩序还未完全建立。如中原解放区的豫西、桐柏、豫皖苏，陕南等地，敌人正规军被消灭、撵走，敌县区政府、保安团被摧毁以后，土匪恶霸仍在猖獗，暗杀事件频频发生。这些事件多是由恶霸地主作后台，策动流氓退伍兵作凶手，有组织地作案。这些人诡计多端，善于把公开合法斗争与秘密暗杀结合起来，企图“改朝不换代”：表面上拥护人民政权，但胁迫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承认他们在基层的统治地位。实践证明，不推翻这个基层恶霸势力，基本群众根本不敢动，“一切由上而下的发动群众的办法，均可能变成他们镇压群众的手段”。

第二，群众觉悟程度一般比较低，没有广泛地组织起来。广大群众虽然长期遭受封建势力的剥削压迫，但是在上述不安定的环境之下，特别是多年来受封建思想的奴役和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群众中长期存在着“贫穷是由于命运”，“分土地是不道德行为”等错误思想，对于土地斗争缺乏精神准备。因此，多数群众，特别是广大贫苦的群众，需要经过深入细致的艰苦的教育工作，才能发动得起来。

第三，由于新区开辟、发展得十分迅速，干部力量和武装力量不足以在各个农村同时展开深入的工作。

第四，尽管存在上述种种困难，但是为了动员新区的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巩固的后方，为了探索广大新区的土地斗争经验，



为全国解放后的土地改革铺平道路，新区的农村工作急需开展，并必须做好。

因此，能否从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正确的策略步骤，解决新区农民的土地问题，成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又一重要课题。

1947 年冬季，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很快，后续工作一时跟不上，新开辟的中原解放区斗争十分激烈，环境极端艰苦，只有尽快发动和依靠当地群众，才能站稳脚跟。于是，一度急于搬用老解放区平分土地的做法，普遍开仓济贫，分浮财、分土地。但是，当时广大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是剿匪、合理负担与清算恶霸，对土地改革缺乏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大别山群众反映：你们只要把反动派消灭了，分田我们会搞。豫皖苏群众则说，我分他的地，他要我的头，你想地要紧还是头要紧。对于广大群众的这些要求和反映，我们的干部没有细心地体会，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打算半年完成土改；特别是在批评了部分干部对群众工作不够重视的倾向之后，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苦性，把少数勇敢分子的行动误认为是大多数群众的行动，把群众刚解放时的热情误认为大多数农民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觉悟和要求，提出了一些过“左”的口号，强调反右，反尾巴主义，轻率地决定实行土地改革。在控制区和游击区的 300 万人口中，大部分地区分了浮财，在约 400 万人口左右的地区实行了分田。

结果很多是形式主义的假斗争。有的是地主富农领导的假分地；有的群众虽一度得到土地，但很快又在敌情严重和地富威胁下秘密重新改为租佃关系；有的是少数勇敢分子霸占果实，其中不少是流氓分子或者与地主有联系的分子，而大多数贫雇农没有分到或分得很少很坏的土地，有的是农民只敢要弱小地富和中农的土地，而不敢要有势力的地主富农的土地。

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的贫农团严重不纯，真正老实的贫雇农或者动不起来，或者受到孤立，乱打乱搞中打头阵的大部分是流氓、勇敢分子。有些人察言观色迎合干部心理，他们总结出：“变化愈大的事干部愈高兴，”主张“打乱平分”；进一步搅乱了阶级阵线，甚至在分浮财中造成村与村的对立。

在这种情况下，所分的浮财大部分被少数勇敢分子拿去，多数基本群众并未得到或很少得到利益，因此解决不了贫雇农多大问题。但是，这种作法却造成了社会财富的过早分散和大量浪费，使军队的供给，首先是粮食供给发生了困难。军队只得把负担加到农民身上，引起了农民的不满。

同时，由于对新区的复杂情况调查研究不足，对老区平分中经验教训分

析地不够，盲目照搬老区的做法，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在政策和策略上普遍犯了“左”的错误。如对地主富农不加区别，对地主中的开明士绅和左翼分子、知识分子不加区别；违背党的工商业政策，没收地主富农的工商业部分；在打人捉人杀人上不分首恶胁从、罪大罪小，乱打乱杀等。结果是把一批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迅速地赶到国民党方面去，并且拿起武器来同人民对立；打击面过大，树敌过多，不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干部力量不足本来已使分配了土地的区域不能连成一片；工作中过“左”的政策又脱离了群众。分配土地以后，国民党军队勾结当地的封建势力很快组织反扑，集中力量首先打击这些区域，使其受到严重的摧残。

由于没有安定的后方和在“左”的错误下自己所造成的困难，一部分干部的右倾情绪也有所滋长。有的人对胜利缺乏信心，缺乏坚定的战斗意志，对政策对工作采取漠不关心的消极应付态度，不关心群众利益，对种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等。

所有这些，都与新区土改当初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给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实践又一次证明，实行土地改革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在军事上还没有取得面的控制，国民党和地主富农武装力量还没有在当地被肃清，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分配土地的要求而组织起来，本地的正派的区、村干部还没有大批涌现出来，而外来干部又尚未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的时候，就马上实行土地改革，不仅是主观主义的，而且是冒险主义的。

1948 年 1 月，中共中央根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改变了 1947 年曾要求新区一年内彻底平分土地的部署。毛泽东指出，“应当按照消灭敌人武装力量的情况，领导土改干部的多少强弱，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决定土改工作的速度，大体上长江以北各区 3 年内积极努力，工作得法，不犯错误，能够全部按土地法分配土地，就是极伟大的成绩”。为了从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他特别强调要提高干部的认识：共产党虽领导着缺乏精神准备，缺乏团体生活，缺乏斗争艺术的农民群众，向着诡计多端，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占优势的地主、富农作斗争，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只有共产党员与农民群众一道，逐步完成精神准备，逐步把自己组织起来，逐步学会斗争艺术，才能最后斗倒地主阶级，实现真正的平分土地。否则即使平分也是假的，还必然闹出许多危害群众的大乱子。他提出了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要有步骤地进行：要有步骤地启发群众觉悟，在宣传和组织群众，建立了党、民兵、区乡政府的组织以后，才能没收分配地主土地。没收分配也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中立富农，富农的土地原则上不动，组织以贫民为主体的农民协会；第二阶段，平分一切封建阶级的土地，动一部分富农的土地。

1948 年2、3 月份，中共中央中原局就新解放区土改中的教训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并要求每个干部、每个党员要加强对党的政策、策略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有了这样的自我检讨，就有使广大干部逐步学会党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的可能；而没有全盘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①]

为了在广大干部中统一认识，各地具体检查了新区土改工作情况，进一步发现了新区实行“一次平分”所产生的问题。如河南省沈丘县常里营乡原认为土改搞得较好，土地已经平分了。但是经过检查发现，“阶级未划开，分配极草率，田地无登记册，只知 1 人分到 2 亩 4 分，但不知地在哪里”，“贫雇农不在分到的地里上粪，许多村地主把土地分给近宗近门人”，“有些村则完全是假分，哄我们，因此得到地的群众还抱怀疑消极态度”。相反，地主无屈服表现，自行分散土地，利用宗族村本位观念分裂农民斗争，对干部先威胁后利诱，订立‘中央军来我保你，八路军在你保我”协定的很流行。在检查中了解到的情况，进一步使干部们认识到急性土改“欲速则不达”。

基于上述认识，1948 年春，新区决定按照中央指示分步骤分地区实行土改，第一阶段专门打击地主，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大约用 2 年左右时间；第二阶段巩固第一阶段的胜利，将富农出租的和多余的土地同一部分财产拿来分配，计划用 1 年左右。但是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不久，即到了麦收季节。敌我斗争愈益紧张与复杂。敌人勾结反动地主，收买流氓地痞，企图以抢麦为中心在解放区制造骚乱，加之前段“一次平分”中部分流氓和勇敢分子曾经乱哄乱抢，这些都使广大群众恐慌和不安。麦收斗争成为敌我双方斗争的焦点。中原局决定暂时停止分地，号召与发动群众保卫和组织麦收，肃清土匪，建立村政权。

1948 年6 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原解放区全区“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财，停止乱没收，禁止一切破坏，禁止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等现象”。[②]这时，中原全区 4 500 万人口中，在控制区和游击区实行了分田的不超过 400 万人口，其余地方大多数只分了浮财。在停止土改过程中，各地注意了区别不同情况，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已控制区，凡是没有

分地的地方，停止分配土地的宣传，并着手调查研究，创造典型，积累经验，准备秋后形成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在已分了土地的地区，凡真分的，确定地权财权不再变动；假分的，说服群众自愿收成租佃关系，实行减租减息，在环境许可、群众要求分地的较大片地区，则领导群众继续完成分地工作，同时要正确地划分阶级，补救缺点；只在孤立据点分了的则按情况根据大多数农民意见，不再变动或说服群众改为减租减息。

在中原新区停止土改的同时，西北、华南等地的新解放区和游击区也分别停止了急性土改。如陕西黄龙地区的韩城解放后，既提出“快斗快分”的口号，结果是贫雇农并不能分得多少果实，而“扫地出门”，乱打乱斗的做法弄得不少人恐慌逃走，造成了极坏的影响。1948 年 7 月，西北局按照中央指示，决定黄龙地区在一二年内仍实行减租减息，即使是靠近老解放区的地方，也要看群众觉悟如何而决定是否土改，同时鼓励群众开荒，结果社会人心大为安定。又如位于广东、广西部分地区的华南解放区于 1947 年冬和 1948 年初在庾岭、翁江、江北、九连、桂西及粤桂边等地区实行了分田废债，其他地区实行了分耕、分粮、分浮财。结果农会、民兵虽一时有些发展，但由于不具备土改条件，并在斗争中扩大打击面，造成“人心惶惑，而减产停耕，贫农借贷无门现象，为数亦不少”。国民党进攻时，地主或勾结或配合或在其支持下组织武装对抗，而部分中农工商业业者却对解放区政府采取疑惧态度，此时全区干部减员 4/10，地区缩小 3/10，人口由 24 万减至 14 万。直至 1948 件 8 月改变政策以后，全盘局势才逐步由稳定、好转至向前发展。

经过半年多的摸索，到 1948 年下半年，各解放区都停止了急性土改，有步骤、有分别地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注释：

①毛泽东：《对新区工作问题报告的批示》，西北局《党内通讯》合订本第 1 期。

②王礼琦：《中原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91 页。



新解放区的减租减息

1948年3月，中共中央研究了新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由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起草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指示的草案。1948年5月，陈毅、粟裕、李雪峰、薄一波等到河北同毛泽东全盘研究了中原地区的工作。为了准备解放军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重新考虑了新区工作策略，决定“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①]5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正式下达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对1948年秋冬两季的土改和整党工作做出具体部署。与此同时，5月24日毛泽东向邓小平发电对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提出具体要求。

中共中央于1948年5月25日指示，只有具备以下3项条件的地区，才能划入土地改革工作的范围：第一，当地一切敌人武装人员已经全部消灭，环境已经安定，而非动荡不定的游击区域。第二，当地基本群众（雇农、贫农、中农）的绝对大多数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不只是少数人有此要求。第三，党的工作干部在数量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如果某一地区，在上述3个条件中，有任何一个条件不具备，即不应被列入当年土地改革的范围。根据这个指示，各解放区的接敌区域和大部分外线新开辟的解放区，都未于1948年进行土改。

中共中央在制定新区土改工作策略时，强调了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的状态，反对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而要加强党的领导，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利，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为此，进行土改必须要有足够的干部力量，而且在土改之前，干部必须充分了解土改的全部政策，“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分清界限”，并“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在土改中要随时互通情报，交流经验，以便领导掌握运动的状态，及

时纠正错误，发扬成绩。[2]

在总结长期土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中央为在新解放区有条不紊地完成土改做出了详细部署。

（一）在基本控制区实行减租减息。基本控制区为环境已初步安定下来的新区。当时主要指中原解放区的大部地区，华北、东北、西北各大解放区的部分接敌地区。这些地区的工作方针为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实行减租减息以及酌量调剂口粮、种子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如同抗日时期只逮捕汉奸分子和没收他们的财产一样，主要打击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一方面通过减租减息使农民得到利益，为土改做好准备；一方面通过合理负担使地主富农多出钱。“这样，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二）游击区和刚刚解放的崭新区有准备以后适当减租。当时，环境内不安定的游击区和崭新区主要为两广等南方各游击区和各大解放区的边缘区，这些地方控制不久，在减租减息之前拿出二三个月的时间，通过剿匪、合理负担和反霸，联合与稳定中小地主，组成农村统一战线，有步骤地发动群众斗争，给土匪及地主当权派以打击，开辟进行减租减息的道路。

（三）具备了条件的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当时，这部分地区主要指东北、华北解放区中的新解放区，如华北的石家庄周围、东北的锦州以北，沈阳、长春周围等地。由于这些地区长期位于老解放区包围之中，群众受老解放区影响较深，特别是受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影响，基本群众顾虑较少，已要求分配土地，地主富农因大势所趋，抵抗亦有所减少，其中一部分人甚至表示迟分不如早分。这些地区客观上已具备了土改的条件。在这种地区，如不进行土改，倒可能使农民同地主均抱消极观望态度，对生产更加不利。因此，中共中央和各中央局指示这些地区在肃清土顽散匪，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上，抽调培训大批新老干部，进行了土地改革。

还有一部分新解放区为收复区。如察哈尔南部等地曾经实行过“五四指示”，后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这次收复后不宜退回到减租减息。故这类地区的方针为核复初期土改后农民的既得利益，在此基础上稍加调剂，完成土地改革。

为了切实贯彻保护中农、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政策，1949 年 8 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要修改《中国土地法大纲》，改正老解放区土改中的缺点。



如1949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河南土地问题给华中局的复示》中指出："我们同意以"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作为解决河南土地问题的基点，对中农土地问题完全不动而不要照'土地法大纲'上关于中农土地的规定。在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土地法大纲'须要有所修改。除上述一点外，在南方及其他新区实行改革土地制度时，必须在某些政策上（例如不要使地主富农扫地出门等）及工作方法上（例如要开区乡农民代表会议等），改正过去在北方土地改革中做得不好的地方。而且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完全掌握全部农村运动的领导权，绝不许再有过去那样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出现"。这些规定比1948年上半年对《大纲》所加的注明彻底好多了。它清除了土改政策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残余。从此，"平分"仅仅指公平合理地分配没收的封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及征收旧式富农的出租土地与多余财产，而绝不是平均农村中的一切土地财产。为了避免混淆，全国解放以后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不再用"平分"的提法，而提为将"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亦分给同样的一份"，使土改政策更加明确，避免了由于误解"平分"而扩大打击面。

1948年秋冬季节，在中原、西北、华东等地的新解放区及华南游击区等我方基本控制的地区，农村工作的重点转向反匪、反霸、合理负担，在此基础上，1949年初进行了减租减息。基本控制区的大部都是1947年7月以后解放的，人民政权尚不巩固，社会秩序还不安定，部分地区进行过短时间的土改。在控制区，凡是没有分土地的地区，即进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宣传，着手调查研究，创造典型，积累经验，在此基础上制定统一简明的法令和进行步骤，准备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凡是分过土地的地方，则区别具体情况，解决问题。在游击区，实行团结一切社会力量，以对敌斗争为主的方针，坚决进行反抓丁、反掠夺、反保甲特务统治的斗争，保护基本群众及各阶层的利益，并按照环境和群众要求，适当地实行减租减息，在负担政策上，确实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不可比控制区还重。在刚刚解放的崭新地区，则采取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根据这种地区的巩固程度，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状况，逐步地实行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在执行减租减息政策时，事先经过宣传组织，政府颁布正式法令等步骤，而不毫无准备地贸然进行。对于已经分配过土地的新解放区，在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后首先进行分析，区别是真分还是假分，然后按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至于错误没收

的中农财产、地主和富农的工商业，则退还原主，或另行设法给以补偿。

由于解放战争迅速向南发展，新解放区急剧扩大，需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扩军任务也很紧急，形势要求新解放区减租减息运动提前完成，因此，这个时期的工作比较粗糙。尽管如此，在不到 1 年的时间里，新区双减工作仍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到 1949 年 6 月，中原 8 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减租减息。其他地区，如西北、华南也有一部分地区完成了此项工作。据河南省委对许昌地委重点县的调查，在发动群众较充分的地区，地主、富农的土地削减将近 50%（其中包括部分地主假送、贱卖的），有组织群众已达 40% 左右，恶霸基本被打倒，地富开始低下头，他们由控制群众变为被群众所控制，由公开的反抗变为采用合法形式进行隐蔽的斗争，农民已在政治上取得优势，敢于斗争、敢讲理、敢于打击地主的阴谋活动，为以后进行土改创造了条件。农民提高阶级觉悟以后，踊跃参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仅河南柳县，即有 3 200 名青年农民参军。农民得到了比反匪反霸斗争丰富得多的胜利果实。至 1949 年 4 月，河南临汝县农民得到了地主的 8 万余亩土地和 280 万斤粮食。据郏县三区 39 个行政村、133 个自然村的统计，在 4. 3 万人口、8. 2 万亩耕地的地区，农民得到粮食 1 343 石，土地 19 580 亩；全县农会会员增加了 1 倍以上。③

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大部分开始于全国解放以后，只有东北、华北地区的新解放区和新收复区于 1948 年秋便开始土改了。这些地区除北平、天津郊区外，均于 1949 年春耕之前完成。河南省的新解放区完成了减租减息以后，在一部分乡进行了土改实验。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吸取了老区的经验教训，并针对新区的特点制定和实施了一些新的具体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新区土改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时间短促，发动群众不够充分，有些参加过老区土改的干部怕重犯左倾错误，过于宽大，甚至“首恶不办”，而有些村庄仍扩大了打击面，这些问题一般于当年秋后通过复查得到了解决。

在东北，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后，一批大中城市获得解放，这些城市郊区的农村具有新的特点，土地问题比较复杂，改革封建土地制度更加迫切。根据以上情况，中共中央东北局制定具体办法，解决城市郊区土地改革问题。此外，1948 年秋，随着解放区的迅速增加，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问题进一步突出了。中共中央东北局通过对内蒙的具体环境、阶级结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进一步调查和分析后指出，内蒙古地区不能机械地搬用汉族



地区的办法，而要依靠内蒙的工人、贫雇农、中农、牧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及其他一切劳动人民，集中力量打击少数的大蒙奸、恶霸分子。对于农业区、半农半牧区、牧业区采取不同的政策。

农业区地主的土地、耕畜等没收平分，并留给本人同等的一份。出租户口地（指蒙古王公赏赐下属当差者的少量土地）的小地主，其财产不分，土地一般不动，已分者维持现状。中农只分进，不分出。

半农半牧区中农业占优势的地区，大地主的大垅地（经过人工整理线段、比较肥沃、常年耕种的土地）与耕备没收后分配，其牧群不分。小地主与富农不动。漫撒地（不固定的耕地）一律不分。半农半牧区中牧业占优势的地区，须严格区分耕亩和牧亩，特大牧主的耕畜分组农民，严禁分散畜群。个别大蒙奸、恶霸的土地、牲畜、财产经盟以上政府批准没收后。土地可分给农民及愿种地之牧民，牧群不予拆散，由政府组织牧民放牧，适当改善农牧民生活。

游牧区废除王公贵族上层的一切特权，如不出负担，强迫征募牧民、强迫牧民为其无偿劳动、私买公地等，在牧民、牧主两利的前提下，有步骤地适当提高牧工工资，改善牧放制度。除大蒙奸、恶霸经盟以上政府批准，可以没收其牲畜财产由政府处理外，一般大牧主一律不斗不分。并有步骤地实行民主改革、建立民主政府，发展畜牧经济，保护牧场。

此外，对于同少数民族有联系的寺庙，如清真寺等的土地，一般数量不大，不按照老区处理教堂土地的办法，不没收分配，实行减租减息。如当地回民大多数要求分配时，可征得他们同意，没收后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回民。

这些作法改变了平分土地时对少数民族地区不加区别、扩大打击面、拆庙、焚经、打喇嘛等错误作法。为全国解放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提供了经验。

综上所述，新解放区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在解放战争时期只进行了1年多，仅仅是一个起步。但是由于各地贯彻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针对各种不同地区的特点细致规定了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不仅迅速纠正了以往的“左”倾偏向，使土地斗争初见成效，而且为全国解放后的大规模土地改革提供了经验。

注释：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326 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330 ~1331 页。

③《大众日报》，1949 年 4 月 19 日。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加强解放区政权建设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斗争，已经持续了二十八年，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是在继承土地革命时经验的条件下，进一步明确土地改革的阶级路线、斗争策略和斗争目的的基础上，提出了成熟的土地改革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并在这一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展开实践斗争，继承和发展了以往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的成果，经历了艰苦、曲折的斗争，在占全国农业人口1/3的土地上，实现了大规模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消灭地主阶级，从根本上动摇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经过长期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到1949年上半年，东北，华北、西北及华东的山东、苏北等老解放区及其包围的小块新区，土地已基本平均分配，封建土地占有制度已经随着封建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而被废除；在中原等新解放区已通过减租减息削弱了封建土地制度。获得土地的农民当中，90%左右是贫农和雇农。据冀中饶阳、河间、深县的764个村的统计，土改中共抽出土地162 882.32亩，到1948年7月已分配了153 073.46亩，分配给贫雇农的土地占总数的86.31%，全冀中贫雇农约得土地80至100万亩。[①]同时中农也普遍获得利益。一部分少地的中农分到了土地，其户数约占得地户的10%，占中农户数的30%，如太行地区中农所得土地占全部分配土地的20%左右。[②]在土地较集中、佃农较多的地区，还超过这一比例。分配土地以外的其他财产，得利的中农一般占得利总户数的15%，占中农户数的50%以上；所有农民都通过土地改革免除了地主富农所转嫁的负担和压迫，获得民主权利。

土地大体平均分配以后，农村人均占有了3~8亩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同一地区各阶层之间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大体平均。据冀中饶阳、深县、河间

764 村统计，这个地区共有 152 321 户，2 110 237.4 亩土地，每人平均 3.84 亩，土改后各阶层人均土地占有数为：中农，3.48 亩；新富农，3.29 亩；贫农，3.10 亩；旧富农，2.96 亩；地主，2.54 亩。在土地质量上，据河间县 151 个村的统计，每人平均标准亩 3.1 亩，各阶层的情况为：富裕中农，3.4 亩；中农，3.2 亩，贫农，3 亩；旧富农，2.6 亩；地主，2.1 亩。上述统计基本可以反映老区、半老区的一般状况。[③]这些数字充分表明了统治农村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已经被彻底废除，农业劳动者和土地直接结合，农民开始成为自己的主人。

土地改革之后，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就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农村中贫农的经济地位普遍上升了，地主、旧式富农的经济地位则下降了，中农成为农村人口的大多数，一般由过去占人口的 20% ~30% 上升为 70% ~80%。农民经济地位的变化趋势由旧中国的“两极分化”变为“两头向中间走”。大体平均。

除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农之外，各地尚存 10% ~30% 的贫农。这些贫农在土地改革中也都分到了土地和其他财物，经济状况有很大改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尚未上升为中农，如在人多地少的村庄，土地平分后仍不够耕种，并未开展多种经营者；遇到天灾人祸、生老病死或缺乏劳力者；个别外来户、移民户及本人历史上有污点在土改中分配过少者；不劳动、爱嫖赌的二流子等。此外，贫困者中还有个别未及时安置的地主、旧富农。同时，上述各类农民的贫困已不是由封建剥削所致，要消除这种贫穷，只有通过多种经营、发展生产或个别调剂土地等措施来解决。总之，在实行了土地改革的解放区，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已被消灭，封建的阶级关系也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大体平均的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农民之间的平等关系。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总是依靠掌握封建政权，推行各种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以维护封建土地制度和各种封建特权，使农民依附于土地，承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没有丝毫的民主权利。因此，改革封建土地制度必须首先推翻封建政权。在我国，农民为了获得土地而进行的斗争是从夺取农村基层政权开始的。

要推翻地主政权，首先要建立基层人民政权。在广大农村，除一部分原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三三制政权之外，大部分解放区的农民是在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中夺取基层政权的。在没收分配地主土地之前，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了贫农团、农会，领导农村的各项工作，将政权从地主



手中转到了农民手中。土地改革之后，广大农民在共产党的教育下，逐步树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观念。

在土地改革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体，建立起了人民代表会议制的政权。1947 年的土地改革中，起初是以贫农团和农会为基础，召开区、村农民代表会。村农民代表会是由贫农团和农会所选派的代表组成的。区农民代表会由各村的农民群众大会或农会直接选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组成。这些代表每次开完代表会，就向选派自己的农民做报告；农民如不满意，下次开代表会就另派他人。因此，这种代表会与群众联系很密切。在土地改革中，区、村代表会经常召开。凡运动中比较重要的、普遍性的问题，如划分阶级成分、制定分地原则与调剂土地等，都要经农民小组与代表会反复讨论，最后由代表会作出决定，提交农民大会通过后实行。经过代表会，民主生活开始被带到文化落后、民主生活极其缺乏的农村中来了。

中共中央及时将代表会议的经验从局部地区推广到各个解放区，并将农民代表会充实、发展为人民代表会；还指出人民代表会议制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最好形式。部分解放区在贯彻人民代表会议制时进一步提出，人民不但有选出其代表的权利，而且必须有随时收回其代表权的充分的权利；在政权中还应建立检查机构，以防止政权中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这些规定对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有进一步的补充、发展。

根据中央的指示，华北、晋绥两个解放区的多数村庄，在土地改革中均已建立了代表会，其中晋绥区的崞县、代县、临县，华北区的平山、曲阳、阜平等县，还建立了县、区、村三级代表会议制的政权系统。东北解放区于 1949 年 3 月以前在吉林、松江、合江、嫩江、黑龙江 5 省实行了村级政权的普选。东北、华北、山东、中原几个大解放区也分别于 1948 年和 1949 年召开了临时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区或省人民政府。

夺取农村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要在农村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在土地改革中，各地农村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贫雇农积极分子，他们经过反封建的斗争提高了阶级觉悟，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在 1947 年的土改中，中共的党组织已由 1937 年的几万党员发展为 270 万党员，到 1949 年全国解放时，党员总数达到了 450 万，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土地斗争中加入党的。随着革命的胜利发展和解放区的巩固，在 1947 年下半年至 1948 年结合土改进行的整党时，解放区的党组织由秘密转向了公开，

从而使党的组织和党员直接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监督。各级党组织都开展了极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广大党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建立农村基层民主政权，还要依靠文化科学知识在农村的普及。土地改革激发了农民学文化、学科学的热情。土地改革以后，农民成了经济生活的主人，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使农民迫切要求学习文化、掌握科学。为了适应农民的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在区、乡、村普遍设立文化站，开办冬学、民校，组织农民识字班等，以及开展文娱活动等。仅据河北、山西、察哈尔及北平市郊农村统计，1949 年冬参加冬学的农民即达 360 余万人。山西一省即建立冬学 2 万余所，每个行政村平均有 2 所。据山西黎城、平顺等县 218 个村的统计，14 到 25 岁的青年入冬学者占 90% 以上。经过冬学学习，一般农民都能识 200 个字，成绩好的能识 600 个字，并学会了写生活便条和简单的信件。

经过土地改革，中国的封建意识形态受到了猛烈地冲击。曾经“有效地渗透到它的臣民的血液之中，可以做到‘礼教吃人’”的中国的封建意识形态，受到猛烈的冲击和破除。广大农民在土改胜利的事实教育下，挣脱了束缚他们的“三纲五常”、“天命观”等封建道德、迷信观念，烧掉了财神爷、灶王爷的像，“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在一部分农村也成为很响亮的口号了。

农民群众的文艺活动也普遍开展起来。农村中建立起了秧歌队、剧团等各种农民业余文娱组织。农民自编、自演、自唱，以他们熟悉的人物与思想，表现他们自己的生活与要求，有些用生动的形象正确地解释人民政府的政策，对大生产运动和各种建设工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仅河北省保定等 6 个专区 42 个县，就有业余剧团 1 800 多个，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组织的。这些新型的文娱活动夺取了封建迷信的文化阵地，使社会风气有了显著的改变。

土地改革中，大批专业文艺工作者投身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通过参加实际斗争，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描绘了群众性反封建斗争的历史画卷，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文艺方针，对于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的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民主政权的建立使农民获得土地，翻身农民的支持又巩固和加强了解放区的民主政权。土地改革的胜利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经济基础，提供了干部队伍，在土地改革中所诞生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又使新民



主主义政权有了最好的组织形式。农民掌握了乡村政权并派代表到县以上的政权机关中去，既巩固了土地改革的成果，又促进了工农联盟，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但是，由于人民政权中大批干部是从战争和土改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于完成战勤、公粮、扩兵等动员任务比较熟悉，对于组织群众反奸反霸反封建的斗争也较有经验，但是还不善于管理经济，组织生产，这是土改完成以后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如此，解放后3年多的土地改革运动培养了大批土改干部，积累了丰富的土改经验，特别是形成了一整套日渐完善的土改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全国解放后的土地改革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注释：

① 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转引《冀中区党委土改与整党初步总结纲要》，1948年7月。

② 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转引《太行区土改运动各阶级的动态与我们政策的检查》，1947年3月。

③ 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

解放区经济恢复发展，广大人民支持解放战争

经过长期的土地改革，在解放区，三分之一的中国农民摆脱了封建剥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解放区的经济得以迅速的发展，这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在国民党时代，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只有在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了起来，伟大的生产胜利才能得到。”[①]翻身得解放的农民都起来，踊跃参军，拥军优属，支持解放前线。

解放区经济恢复发展，农村的面貌迅速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扩大了耕地面积，改进了耕作技术。

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政府贷款等各种支持，使得广大农民有了发展生产的保证，在废除了地租和减轻了负担的条件下，农民都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尽力恢复战争的创伤。首先，他们恢复了战争中荒弃了的土地，扩大耕地面积。如东北解放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开拓团的撤走和多年战争的影响，增加了大量的荒地，农民于土改后大量开荒。1948 年共耕种 1 341 万公顷土地，其中新开荒 77.9 万余公顷，占全部耕种面积的 5.8%；共种水田 21 万余顷，其中新增加 9 万顷，占全部水田的 42%。[②]仅吉林省蛟河县保安村 1947 年至 1949 年即扩大耕地面积 334 亩 8 分。陕北老区 1949 年耕地面积为 1 651 万亩，不仅达到了 1947 年 3 月蒋介石、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前边区耕地面积的总和，而且超过 1946 年边区和平建设时期的耕地面积 10%。晋察冀区冀中 32 县 1948 年 8 月以前共消灭荒地近 15 万亩占全部荒地的 51.5%。华东解放区 1948 年不到半年时间，消灭荒地一半以上。

土地属于农民自己所有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起早贪黑、深耕细作，精心侍弄自己的土地，改进耕作技术，与给地主干活的情景大不相同了。为了克服战争中牲畜减少带来的困难，农民普遍增加锄地次



数，抗战前谷子和高粱一般锄2遍到3遍，1948年普遍锄3遍到5遍；地瓜和豆子则从战前锄一二遍增加为二三遍。此外，农民们还开始注意改良品种、防治虫害、修整土地等。据太行区和顺、平定、昔阳等6县统计，土改后的二三年中，因修渠修滩增加土地50万亩，增加水浇地7 800顷，增产粮食19万石。1947年，东北解放区平均每垧地产量1 500斤，到1948年增加到1 920斤，增加将近三分之一。

其次，齐心协力，战胜灾荒。

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自然灾害，给解放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破坏。如1948年上半年在黄河南岸陇海路北的狭长地区，国民党军队集中了20个旅反复“清剿’，仅据不完全统计，抓壮丁38 000余人，抢牲口16 000余头，抢走大车1 700余辆，粮食1.7亿余斤，烧毁民房8.2万众间，许多村庄被烧光。到了麦收时节，国民党军队挖开卫河四道门口，制造了濬滑水灾区，仅高村抢险，就动用民工30余万、牲口21万余头，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其他如陕北、山东等解放区在遭到国民党军队重重进攻的情况下，1947年粮食都严重减产，1948年春荒严重。面对严酷的灾难，翻身农民在解放区政府领导下毫不气馁，互济互助，并将土改中得到的粮食、财物用于救灾。如陕甘宁边区群众互济粮食达5万石，土改果实用于救灾达25 000余石；晋绥土改中获得粮食20万石、银洋220万元、银子12.7万余两、金子500余两，亦大部分用于救灾。华北的农民组成民兵，带枪下地，抢种抢收，挖河疏水，使上千顷地免受水灾。土改使广大农村妇女争得了民主权利，她们积极参加生产，弥补了战争带来的劳力不足，对战胜灾荒起了重要作用。

再次，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农民收入普遍增加。

虽然深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的严重破坏，但是由于土地改革的作用，使得解放区的农业生产仍在迅速恢复，大部分地区于土地改革完成后的1948年均获丰收，达到抗战以前收成的十分之七八，有的地区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东北解放区1948年春基本上完成土地改革，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 187万余吨，比1947年增长12%，1949年则达到1 320万吨，1950年约1 800万吨。其中产粮最高的榆树县（占全东北粮食产量的3%）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克山县也已接近历史最好水平。晋绥解放区1948年获得了10年未有的好收成，平均八成年景，少数地区达到十成。晋西北1948年增加水浇地24万亩，增产粮食4万石。部分村庄超过了抗战前的生产水平。华北解

放区 1948 年获得了七成年景，平均亩产（折成小米）120 斤，共收粮 227.7 亿斤，达到抗日战争以前平均水平的 80%。因遭胡宗南军队的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农业 1947 年严重减产，1948 年得到迅速恢复。

尽管各解放区农业生产尚未恢复到抗战前的最好水平，但是由于封建地租的废除和负担的减轻，农民的收入普遍增加，大多数农民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生活水平上升。据东北地区 1949 年底的调整，除了新解放区的一部分及少数灾情严重的地区外，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已超过土改刚结束时的水平。松江省上升户占 60～70%，吉林占 2/3，龙江上升比较显著的户占 54%。上升户普遍粮食产量增加，牲畜、大车、衣物、房子也有所增加。

在农村种植、养殖业发展的同时，农村手工业与家庭副业迅速发展起来。据华北解放区统计，农民的副业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 1/5 至 1/3。晋西北农村在抗战前没有纺织业，至全国解放前，临县、保德一带已是村村织布、户户纺纱。太行全区有 52 万妇女纺织，有纺车 43 万辆、织布机 10 万架。农民以剩余劳力组织运输合作，获得了大量利润，据平顺县统计，全县 1946 年供销合作社赚洋 1 200 万元，运输合作社赚洋元 3 千万元，至 1947 年全区合作社总资金即达 9 亿元。由此可见，土地改革使得农民的收入得到了普遍的提升。

最后，工商业得到了发展。

农副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购买力的提高，极大地推动了农村工商业的发展。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民有了余钱剩米，如吉林省农民 1949 年每人平均有余粮 250 斤。同时，国营专业公司与工商联机构大力收购粮食与工业原料，私商不能压低收购价格，人民政府对工农业产品比价作了适当的调整。这些都使农民的购买力提高了，工业市场扩大了。各解放区凡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工业品，如犁、铧、水车、轧花机、弹花机、锅等，都特别畅销，尤其是水车，时常要预定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在农民解放后广阔的市场面前，怕的是货出不来，不怕货卖不出去，因而对于工业经营激起了极大的兴趣和热忱。大多数资本家具备扩大投资的实力。如哈尔滨 1948 年 2 月举行了一次私营工商业登记中，在 12 092 家工业企业中，一年来盈利的占 62%；在 9 276 家商店中，盈利的 70%，其中经营铁工、皮革、印刷、纺织、制粉、制酱等行业的获利最大。因此，在国营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下，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也发展了。1949 年全东北私人工商业增加了 3.1 万余家。太行区长治市 1945 年 10 月解放时，仅有坐商



340户，土改后，增至1 300多户；河南郏县土改后，全县增加工厂16家、商业128户、行店27户、合作社4处、摊贩716户。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土地改革以后，解放区的工业市场逐渐扩大，商业经济日趋繁荣。

土地改革极大地激发了中国最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巩固的后方和力量源泉，就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说的，“有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生活有了保障，纷纷起来支持前线，农民对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作出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大方面：

首先，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参战，支持前线。

在土地改革中，亿万农民获得了土地、粮食、房屋。为了保卫翻身果实，他们以“保田参军”为口号，到处掀起参军热潮，风起云涌般加入解放军。华北区自日本投降至全境解放，有近百万农民参军，其中太行区全区平均参军者已达全人口的4%，少数高的地方达8%。1949年初，太行区在10天内即有24 501人参军，鲁中南在一个月中即有38 000人参军。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3年以来（1947～1949年），共有160万人参军。

翻身农民所组成的人民军队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特别是1948、1949两年各个业已完成土改的地区参军的新兵质量最好。山东渤海区新兵中，党员干部占14%，华东区新兵中，贫农和中农占90%，太行区新兵中，18至25岁的青年占75%以上。这些新战士关心政治和部队建设，他们对于新解放区未翻身的农民有高度的同情心，决心帮助被压迫者获得彻底解放；他们不满部队中的军阀作风残余等坏现象，要求军队的一切都要符合人民军队的标准；他们打起仗来以一当十，奋不顾身；他们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主人翁的责任感。

解放区的农民还就地组织民兵，协助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牵制、围困与歼灭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期间，民兵2 284 800人次参加大小战斗114 700次，歼敌204 700人。妇女、儿童都积极参加战斗。苏皖地区即有2 000余女民兵。晋西解放崞县的战役中，8个残敌拖着1挺机枪3只步枪踉跄逃奔，被3名放哨的儿童团员活捉。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民兵积小胜为大胜，有效地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为了保家保田，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解放区农民在物资、人力等各方面保障解放军的前方供应。在物资上，翻身农民积极交纳公粮。东北解放区3年来共交纳450万吨公粮，质量之好、速度之快是空前的；1948

年底起征的公粮到旧历年时，前后不过 1 个多月即已完成 95% 以上。解放区的妇女还承担了制作军鞋、被服的任务。由于群众发自内心的支持，粮食、棉布、军鞋等各种物资源源输入军队，为人民解放战争提供了经济基础。在解放战争期间，除东北解放区外，各地没有或几乎没有机械化运输工具，各种物资和伤病员的运输全靠民工以体力或手工工具完成。从下表解放战争后期的辽沈、平律、淮海三大战役中人民支持前线的人力、物资，便充分说明人民对解放战争的支持。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人们支援前线统计表[③]

	民工（万人）	挑子（副）	小车（辆）	担架（副）	大车（辆）	牲畜（头）	船只（条）	粮食（万斤）
辽沈战役	162		6 750	13 800	6 750	30 000		7 000
淮海战役	225	42 400	410 900	73 900	3 070	6 300	13 630	57 000
平津战役	154		20 000	20 000	3 800 000	1 000 000		31 000

其次，大力拥军优属，开展瓦解敌军工作。

翻身农民不仅把亲人和物资送上前线，并且对留在村中的军属，干、烈属和民工家属，从生产到生活处处予以关心和照顾。许多村庄做出“一切先尽军烈属和参战家属”的规定，首先帮助军、烈属和参战家属完成各项农活。在春种秋收大忙时，各地采取大变工的方式，及时解决军、烈属的困难。农民们说：“误了自己的也不能误了他们的，他们的亲人在前方流血流汗是为了咱们，咱们也不能忘了他们”。每值分配果实或逢年过节，总要特别照顾军属利益。家庭之安定解除了前方战士的后顾之忧，亲人的鼓励使他们忘我地去争取胜利。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对国民党军队中的下级士兵也起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因为大部分士兵原是贫苦的农民，他们一旦了解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政策，即军心动摇。如冀南解放区安阳地方的党政部门发动群众，对国民党军队及其家属深入宣传《土地法大纲》和分给国民党军队士兵土地的政策，12 天内就有 52 名国民党队伍的军人跑到解放区来，没有回来的也不肯卖命与人民为敌。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士兵，与解放军接谈后，经过简单的诉苦教育，懂得了地主剥削穷人的道理，很快就觉悟过来，调转枪口向国民党

反动派进攻。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的一亿多农民经过二十多年的土地斗争，解决了解放区农民的土地问题，赢得了农民的心，调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积极性，从而为人民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必要准备。

注释：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②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1页，转引中共中央政研室：《土地改革后解放区的农业生产》，1949年。

③《中国土地改革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5页。

解放区整党的必要性

为了顺利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势力，发动农民打倒蒋介石政权，各解放区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和各地党组织的实际情况，在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进行了整党运动。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从1945年到1947年，全国共产党员由120万人发展到了27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二十五万个新党员。党员人数的剧增，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壮大了党的力量，使我们的党迅速成为空前强大的党，但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当时吸收党员，比较注重抗日的积极性，忽视阶级成分的考察，有些地富分子混进党内，使得党内作风不纯。

这时，党员的成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抗战初期，党员的主要成分是贫雇农，而现在有的地区主要成分是中农了。在晋绥老根据地里老中农成分的党员，竟占农村党员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有的地区，中农出身的党员虽不占多数，但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中共西北局统计了分属于六个县的八个党支部，有共产党员一百二十六人，其中贫雇农成分的党员有六十七人，占党员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三，中农成分的党员五十四人，占百分之四十三；富农成分出身的党员五人，占百分之四。有的地区地富家庭出身的党员占有更大的比重。据太岳区统计，有的县的党员中地富家庭出身的占百分之六。问题更严重的是党员干部的出身成分，有的机关的党员干部属于地富出身的达到百分之六十，个别机关高达百分之百。有的单位地富出身的党员干部虽然数量上不占多数，但掌握基层党组织的实权。在这些干部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必然影响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侵蚀党的肌体。正如刘少奇同志给晋察冀中央局的信中说到的，仅仅是社会成分，并不能决定一切，目前我们所以强调社会阶级成分，是因为现在党员的社会出身正影响着我们政策的执行及党的进步。这主要是有一部分党员干部，由于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同地主富农有着某些联系，在土地改革中丧失立场，有的同情甚至



包庇地主富农，利用职权帮助他们转移土地财产，降低地富成分，打入机关团体企业内部，阻挠和破坏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斗争。

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和党的领导同志，曾多次提到整党的必要性，强调要着重解决党内不纯的问题。早在1947年7月27日，中央在刘少奇关于土地会议的准备情况报告的批示中就指出了在实行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改造党政及群众组织工作的重要性。

9月13日，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指出，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基本原因，就是党内不纯的问题，“这是土地改革不彻底带基本性质的原因。党内不纯在一年土地改革中更加证明、更加暴露了。可以这样说，党内不纯的情况不改变，即便政策彻底也不行，不只是不能完成土地改革任务，也不能进行战争，还会使党走向灭亡。”“党内小资产阶级自发性的弥漫，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组织上混乱等，都是党内不纯。地主富农混进来，党内阶级路线、阶级观点模糊，就使得土地改革不能彻底。”①因此，“在时局的转变中，在执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党内有很大的动摇和混乱。现在应该终结了，应该迅速完成转变，以执行新任务。即要改造党。我们党内的地主富农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弥漫、很猖狂，而且很普遍。阶级观点模糊。这就是党内的不纯。因此，需要改造。因此，改造党，是从两方面来看的：第一是形势转变了需要改造；第二是党内不纯需要改造。”②

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进一步指出，“为了坚决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必须整编党的队伍。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内部的整风运动，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的。这种成效，主要是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在这点上我们党是比抗日以前的几个历史时期，大进一步了。但是，在党的地方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所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则没有获得解决。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十一年时间内，我们党的组织，由几万党员，发展到了二百七十万党员，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这使我们的党成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党。这使我们有可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并打退蒋介石的进攻，领导一万万以上人口的解放区和二百万人民解放军。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这即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

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种严重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这个任务如果不解决，我们在农村中就不能前进。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彻底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规定了适当的步骤和方法。这些步骤和方法，现在正和平分土地的决定一道在各地坚决地实施。其中首先重要的，是在党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地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③

1948 年 3 月，刘邓大军过黄河以后，刘伯承在二纵队干部会上也强调了整党的必要性。他说：中国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刘伯承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他指出，我们党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统计，"大革命时代的党员还有 2 000 人，土地革命时代的党员 5 万人，抗战时代的党员 120 多万人，现在党员则达到 270 万人，正因为党在斗争中发展了，我们就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战胜利，这是一方面。但是也正因为我们党大大发展了，所以就有不少的异己分子乘机混进我们党里来，即使是成分出身于工农而又是老党员的同志，也有蜕化了的，所以就在党内产生了成分不纯，作风不纯。特别是在抗日反攻时期，平汉战役以后，至今年一月邯郸会议为止，表现得非常显著，当时我曾指出：'兵骄将横，纲纪荡然'。现在在土地改革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刘伯承还说，在作战上，也表现阶级不纯，"如我们在大别山的情形来说，稍微苦了一些就发生思想行动糊涂的事，因此，刘少奇同志说：'党内不纯，如果不整，就有亡党亡国之痛'，尤其在此争取胜利关头，整党就更必要。"④

1948 年 3 月 6 日，邓小平在二野直属机关干部会上指出："毛主席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我们必须坚决贯彻这一方针，党内存在着成分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如果不加整顿，就要使党丧失战斗力，至少也要削弱战斗力，不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他强调作风好坏关系重大。"坏的作风，在许多环节使革命受到损失，如在土地改革中贪污群众斗争果实，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坏作风，结果群众就必然发动不起来。""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影响到革命的成效，尤其是在这中国革命接近胜利的关头，每一个关节都不能松懈，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明确地认识自己的政治责任。认识每一个环节都有严重的政治任务。有的干部把自己的任务看做单纯的技术工作，这是错误的。"他说："'我'字必须清算，把'我'放到天上，把革命工作看作第



二，到了‘我’和革命，和党，和工作发生矛盾的时候，就暴露了原形。我们天天看到不仅在思想上，甚至在行动上损害党的利益，损害党的声誉的事，如打仗怕死，生活腐化，纪律不好，官僚主义，只发号施令，不自己动手等等。”他说：“这些党内存在着的邪气，使毛主席的方针不易贯彻。我们整党的目的，就是在于扫除这股邪气，把正气发扬起来。”“同时必须认识战士是好的，就是干部问题，干部越大越需要整。党整好了，队伍强大了，和群众联系好了，党的领导力量强大了，革命就可以少受挫折。有的人一听到整党就心跳，那一定是自己毛病很多。”⑤

陈毅说：“今年春天我到中央去。毛主席亲口对我说：共产党不整党就不能胜利。三百万党员中整去三四十万是必要的，否则就要失败。蒋党一不查成分，二不查思想，因此蒋党就在实际上走向灭亡了。共产党就是不断整党的，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不但开除了一个陈独秀，也清除了一批地富分子，因此坚持了土地革命，这是第一次整党。抗战期间整风运动是第二次整党，也开除了一大批人出去，保证了抗战的胜利，保证了一面和日本打一面和国民党斗，终于能够胜利。……这次是第三次整党，保证我党不会被腐化堕落，一大批党员要受批评被开除。毛泽东有那么大的决心：开除三四十万党员也不可惜。共产党是做好事的，做坏事的人要给他打击。如果一个人经常不注意自己健康，精神颓废，就不能继续发扬政治生命，健康的人应先洗脸洗澡。大家必须坚决拥护整党。”⑥

党内不纯的问题影响了土地改革的彻底性，由于党内存在成分不纯、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使大量土地保留在地主富农手中。有的地区有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家庭的土地甚至于原封不动，这些都给土改工作的进行造成极大地阻碍。此外，党内不纯还严重地影响了党群关系。自从延安整风运动以后，由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由于重视从群众利益出发，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做法，因而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使得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有了很快发展。但是，由于党内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等现象，使党群关系出现了矛盾。有的干部不相信群众，不听群众的呼声，严重违反群众路线，习惯于在工作中发号施令，包办代替。甚至还有个别干部打骂群众，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使党的事业受到损失。因此可见，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站在一起，共同抗击蒋介石的武装，已经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问题了。1947 年 7 月 17 日至 9 月 13 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上决定了在土地改革中

要开展一个整党运动。会议还提出了关于整党的方法和步骤，刘少奇同志在所做结论中指出，整党的方法是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制裁。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分子要清除出党；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主义作风，要进行斗争。整党的步骤，首先是由上而下的整顿，目的是去掉障碍，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然后再由下而上地整顿，这是巩固党的组织，扩大战果，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把党的各项制度和正确的作风建立起来，使党的面貌焕然一新。在整党中，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刘少奇在大会的结论中指出，必须把严格和热情结合起来，坚持教育，也要执行纪律，必要时还要给予适当处分。于是，会议之后，整党运动很快在各解放区开展起来。

注释：

①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7页。

② 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的结论》，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一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第85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2～1253页。

④ 刘伯承：《整党与整军作战相结合》，《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十一册），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工教研室，第378页。

⑤ 邓小平：《在野直干部会上关于反攻形势与整党问题的报告》，《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十一册），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工教研室，第384～385页。

⑥ 陈毅：《在中原局欢迎外来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2册，第60～61页。



解放区整党运动的展开

全国土地会议之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都纷纷召开了土地会议。在这些会议上，经过讨论，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右倾思想，揭露了各种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尤其是暴露了党内严重存在的成分不纯、作风不纯、丧失立场、敌我不分、地富思想和官僚主义等问题。对这些问题展开了严肃的批评，端正了对整党认识不足的错误态度，从而使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普遍认识到整党的必要性，确定了在土地改革中开展整党的方针、计划，明确了整党的重点、方法和步骤。

各解放区整党的基本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说服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党的基本内容是，通过开展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那些错误严重、屡教不改的党员辅之以组织纪律处分；对极少数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整党的基本方法是，公开党的支部，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党的支部大会，使三查三整工作接受群众的监督；对少数被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操控的党支部，则由上级组织派出工作组重新建党支部，并协助支部开展整党工作。

晋察冀中央局于 1947 年 10 月 3 日至 11 月 7 日，召开中央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揭发批判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流氓思想及堕落腐化倾向，严重打击地富思想，对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进行了调整，在高级和中级领导干部中组成了坚持土地改革的领导班子，会议还具体制定了在土地改革中的整党计划。11 月间，中共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在边区贯彻土地法大纲和整顿问题。会议上，反对了党内存在的右的倾向；批判了阶级观点模糊，敌我不分，不相信革命力量，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倾向；也批判了对党的政策，对党的统一领导不严肃的态度；反对了干部中工作失职，贪污腐化的倾向。同时，其他各地的中央局也都召开了扩

大会议，在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同时，开展整党工作。

在十一月中下旬，各地委相继召开有区、县两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土地会议精神。在掌握了精神实质的基础上，针对本地区的情况，提出本地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的具体措施，然后开始查阶级定成分。在查阶级定成分中，有的地区采取自报公议，有的地区是填表查阶级，也有的地区邀请当地贫雇农参加会议，帮助查阶级。在查阶级的基础上又深入到查思想，查作风，着重查有无地主富农思想，有无敌我不分和思想麻痹以及阶级观点模糊等问题，也查有无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和贪污自肥等作风。最后，将查出来的一些混进党内的坏分子，凡是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一律清除出党，有罪行者依法逮捕。还有的地区由群众民主鉴定，看哪些干部能参加土地改革，哪些干部不能参加土地改革。也有些地区将“三查”同时进行，也有的是一开始就查思想，然后再查阶级。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重点在于查地主富农出身的领导干部和主要负责干部。在“三查”中，也贯穿学习文件和讨论问题。并采取了大会、小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进行。经过三查整党，基本上摸清了农村区县两级干部队伍的状况，提高了干部的思想水平，有助于改进工作作风。

整党工作开始以后，在最初的一个短时间内，和土改工作一样出现了“左”的偏向。有些上级党组织派出的工作组，对当地原来的党组织和党员一律不予相信，把他们当做绊脚石一样踢开，单纯强调依靠贫农团去进行土改。有的地方听任农民群众的自发倾向，发生群众起来胡乱斗争党员、干部的现象。有的地方轻率地停止了许多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或被错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党员的党籍。这些做法，伤害了当地党员、干部的感情，造成了党员同工作组、贫农团的对立，使土改工作受到很大影响。整党工作的这种“左”的偏向，同全国土地会议上对党内不纯问题的估计过于严重有关，也同缺乏农村基层整党的经验有关。

对于上述“左”的偏向，中共中央很快发现并给予及时纠正。1947 年 12 月 25 日至 28 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详细地讨论了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并强调绝对不许重复历史上所犯过的“左”的错误。1948 年初，毛泽东又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指示中，提出要“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者未能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

 

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错误”。[①] 1948 年春，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委也先后召开会议，总结检查土改和整党工作，使得到 1948 年五六月间，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的“左”的偏向已基本得到纠正。

各地整党工作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采取有重点的、波浪式的、逐步推广的方式进行。先整老区，后整半老区；先整具备整党条件的基层组织，条件不足的基层组织待条件成熟后再整；分期分批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凡是开展整党的地区和组织，都采取了集中力量，按期完成整党任务的做法。平山整党经验得到了推广，比较普遍地采取了邀集党外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整党会议，听取了他们的批评意见。经过初步整党，改变了党的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现象，使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密切起来。

1948 年 2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提出对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的方针。指示推荐了平山县的整党经验，即“经过党的支部，邀集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干部”。指示决定公开党的支部会议，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在内，均有党外群众参加。为了指导整党，同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在《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一文中，指出要把晋察冀平山县的整党经验（由刘少奇总结）推广到全党，并要求公开党的支部，把关门整党变为开门整党。开门整党，表明了党与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和党把自己置于广大群众监督之下的决心和态度，实际上是在向群众宣传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群众利益的党。

1948 年 5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规定了整党的方针和政策，并提出自 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3 月，在各中央局和分局所划定的地区内“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初步整党”，“完成党的支部组织的整理工作”。这是当时开展整党工作的又一个重要的指示。在指示中，对下一步整党工作，作了全面妥善的安排，明确了进行整党的程序、步骤和方法，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在所辖区域内，从 1948 年 9 月到 1949 年 3 月，按照正确的政策实行初步整党，完成党支部组织的整理工作。1948 年 9 月，大批从事土改工作的干部深入乡村，继续领导土改和整党，并把土地改革、整党建政和准备春耕结合起来。

1948 年 9 月到 1949 年 3 月，各解放区的整党总结了前一阶段的经验教

训，加强了党的领导，纠正了“左”的错误，执行了依靠基层党支部和党员积极分子，团结广大党员和党外群众的正确方针，抓紧了秋冬两季的有利时机，使整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48 年 9 月 8 日到 13 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对整党工作做了估计，指出党在最近一年来，基本克服了并正在继续克服着党内存在的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党员人数有了很大发展。会议作出了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规定各级党委要按照党章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从而扩大党内民主，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9 月 20 日，毛泽东同志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完成整党任务。

在整党后期，强调了整党与发展党员相结合进行。到 1948 年下半年，有些老区土地改革任务已经胜利完成，整党也已在一部分地区接近尾声。于是建党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此时建党条件也已具备，尤其是在一些半老区和新区，党的组织发展不平衡，也很不充分，因此必须强调在整党的同时要完成发展党员的任务。党中央也指示各地，在已经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区，应大批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入党。于是各地都重视起了建党的工作。在发展党员过程中还强调了注意成分问题。一方面要在工人、贫雇农和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发展党员，另一方面要严防投机分子、地主富农分子以及流氓分子混入党内。同时在入党之前要加强教育，严格入党手续，举行入党仪式。

1949 年 4 月以后，各地的整党工作进入结束阶段。在此期间，各级党委认真地处理了整党中的遗留问题，并开始总结整党工作。各地在处理遗留问题时，主要是把整党中对有些党员处理不当的，予以改正。有些地区对已开除党籍遣散回乡的党员干部经过了解，确实无严重问题的予以恢复党籍，回来继续工作。在原地工作不适合者，可调往别处工作，或送干部学校学习等。但有些党支部尚未完成整党任务，则继续整顿。在整党的基础上，选举新的支部委员会，健全必要的制度，形成基层的领导核心。

到 1948 年底和 1949 年初，大部分老区、半老区的整党工作基本结束。“晋西北共有二十三个县，一千一百九十四个党支部，在一九四八年一年内共整顿了一千零七十九个党支部，就是说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党支部得到整



顿。陕甘宁边区所属的老区，共有一千一百八十四个党支部，三万七千零十七名党员，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已有百分之七十八的党支部，百分之六十七的党员经过了整党。西北局向党中央的报告中有这样一个估计，在西北地区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党支部，经过整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揭发了党内的矛盾，解决了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水平，加强了党内团结，密切了党群关系，建立了必要的制度，党支部真正成为领导核心。还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党支部，在整党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处分了一批犯有错误的党员，清洗了一批坏分子，发展了新党员，使党的基层组织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还有一部分党组织只限于组织上的整顿，未重视思想教育，或由于其他原因，有些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党员的精神面貌也未能全部改观。还有百分之十的党支部整党走过场，流于形式。”②

通过整党，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很大进步，清除了一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蜕化分子，加强了党同群众的联系，纯洁了党的基层组织，建立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阶级觉悟，划清了阶级界限，这就为争取土改和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同时，由于缺乏普遍整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经验，所以在整党中也出现过一些曲折，给我们以后进行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注释：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268 页。

② 王一帆、陈明显：《中国共产党历次整党整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01～102 页。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提出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就必须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早在 1946 年 7 月，全国内战爆发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基本口号是：“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即是武装自卫，而不是打倒蒋介石。因为在此时，公然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在“当时主客观条件还不具备”。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的那样，一方面，蒋介石当时还有力量，“一下子还不容易被打倒”，如果我们那样提，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部分中间分子“会不相信，不接受”。另一方面，我们强调武装自卫，这就表明这个战争是蒋介石强迫我们打的，他要承担挑起战争的责任。“如果我们把自卫口号变成进攻口号，那么就成为国共两方面都要进攻，就抵消了”。这在政治上对自己也是不利的。但是，在一年以后，情况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了，因为“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①

1947 年 7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为纪念“七七”十周年而发布了对时局的 16 条口号，主要内容如下：“（一）全解放区人民团结起来，发展正义的爱国自卫战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蒋介石进犯军！（三）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向蒋介石要和平！惩办一切破坏停战协定、反动反革命内战及在战争中屠杀人民的战争罪犯，缉拿这些罪犯交人民法庭审判，没收他们的财产赔偿被蹂躏的人民！（四）反对蒋介石的饥饿政策，向蒋介石要饭吃！（五）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向蒋介石要自由！（六）反对蒋介石的



卖国政策，反对蒋介石借外债打内战，反对蒋介石用美国军火杀害同胞，取消卖国的中美商约及一切卖国条约”，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背叛政协决议执行内战独裁卖国政策的蒋介石政府，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只有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消灭内战，实现和平；取消独裁，实现民主；制止卖国，实现中国民族的独立！”[②]

同年7月21日，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尽管这一点现在也还不公开讲出来，我们还是要准备进行长期斗争。他说，“在日本投降以后，国共和谈是必要的。虽然我们希望全部问题真正解决的目的没有达到，但蒋介石的确是更加孤立了。只有经过长期地教育群众，我们党才能在今年‘七七’提出十六条口号。”[③]

9月21日，新华社发表“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的社论，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指出“人民解放军的大举反攻，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蒋介石的全面攻势已被打得粉碎，以及一去不复返了。他所吹嘘的‘九月攻势’换了个方向，变为人民解放军的全面的战略攻势了。蒋介石转到被动地位，并且因为人民反对、兵力削弱与后方空虚，而处在及其危殆的地位”，因此号召全国人民打倒蒋介石，并指出“打倒蒋介石才有和平！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打倒蒋介石才有民主！打倒蒋介石才有独立！”，“人民解放军伟大的反攻已经开始，长江以北各省伟大的解放战争已经开始”，要“争取这个大反攻的胜利和解放的旗帜插到全中国，把民主的联合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④]

9月2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到陕北佳县神泉堡。在这里，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0月10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发表。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言首先指出了当前的战争局势，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现已大举反攻。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北线我军已向中长、北宁两路进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其次，宣言说明了本军作战的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则是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

此外，宣言郑重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即中国共产党的8项基本政

策，主要的有如下各项："一、联合工农学兵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二、逮捕、审判和惩办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三、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四、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五、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六、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八、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⑤

由于这个宣言是在10月10日公布的，所以被称为《双十宣言》。宣言所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反映了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为解放区军民、为国民党统治区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指明了奋斗的目标，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胜利信心和斗争勇气。

同一天，新华社又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一是颁布解放军口号，共67条。二是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的主要内容有"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打倒背叛政协决议的蒋介石！打倒破坏停战协定的蒋介石！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打倒独裁者蒋介石！打倒反革命的蒋介石！打倒屠杀人民的蒋介石！打倒欺骗人民的蒋介石！打倒摧残人权的蒋介石！打倒横征暴敛的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打倒蒋介石才有和平！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打倒蒋介石才有民主！打倒蒋介石才有独立！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蒋介石进犯军！审判战争罪犯，赔偿人民损失！解散特务机关，拿办杀人凶手！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组织反蒋统一战线！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⑥三大纪律有："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⑦

在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之后，我党又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



的口号，以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缓兵之计的阴谋，保证“解放全中国”目标的顺利实现。1947 年 10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和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刘航琛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他提出了一个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的方案。为了揭露这一方案是美蒋缓兵之计的阴谋，同时纠正党内部分同志认为可以利用它促使蒋介石下台的错误认识，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这个指示。

中共中央指出，“一年多内战经验，证明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败局已定。不管美帝援助多少，甚至直接出兵，也不能挽救其覆灭命运”，并且提出这个反动统治的覆灭过程可能有 3 种形式：“一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全国人民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不经曲折地一直打垮，反动武装完全消灭；另一种是反动统治内部中途举行政变，并在美帝赞助下，送蒋出国，找出孙科、冯玉祥、何应钦、陈济棠、龙云、宋子文、邵力子、张治中这类人主持停战议和，想以缓兵之计维持已濒崩溃的统治局面，伺机再起；再一种是在蒋介石反动统治大崩溃的时候，凡我解放军所未及到达的地方及各大城市中，将有各种形式的反蒋运动发生，其中包括很多伪装分子，乘机窃权，并和我们争夺领导权。”在这三种形式面前，“我们必须坚持第一种形式，把中国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警戒和揭穿第二种形式的阴谋，预防第三种形式会在时机成熟时突然出现，并要预见到二、三两种形式会在某种时机交错地出现”。

中共中央提出：“反蒋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反帝反封建，就是要彻底摧毁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卖国统治。具体纲领，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双十宣言，而中心问题是平分土地与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这一宣言，必然取得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真诚拥护，他们不但赞成，而且会愿意为它奋斗。”

鉴于自由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妥协倾向，其右翼“经常在群众中散布对美对蒋的幻想，以便时机一至，好与美蒋（或蒋倒后的其他代理人）妥协，消灭新民主革命”，中共中央强调，“在宣传斗争上，我们必须彻底宣传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和政纲，反对一切不彻底的资产阶级妥协思想和改良主义政纲。”因为“在中国现状下，要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半封建

半殖民地的独裁政权，要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政权，不可能有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的旧民主政权。自由资产阶级所希望的欧美式的旧民主，在今日世界上已经一去不返。凡是不愿与共产党合作并受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必然是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而“只有动员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站在我解放军双十宣言的主张上，并彻底实行之，才能专政摧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和消除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共中央认为，当前党内外的主要危险，“还是对敌人力量特别是美帝力量的高估与对人民力量的低估。反蒋统一战线中的右倾危险，是对美军存在着幻想或畏惧，特别是认为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可以改变，可以影响蒋介石政府变好，因而和平可以期待，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投降主义的思想。在党内的右倾危险，是对人民的反蒋力量估计不足，而对美帝援蒋内战存有恐惧，因而缺乏充分信心去动员群众，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反对美帝侵略，将反蒋战争进行到底，反而迁就开明士绅及自由资产阶级的和平妥协思想，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党内的投降主义”。因此，“为使反蒋主张反美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彻底胜利，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党内的投降主义，然后才能有力地反对民主阵营中的投降主义”。⑧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中国共产党由于紧紧抓住了坚持土地改革和坚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这两个中心问题，这就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进一步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条件。

注释：

①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3–274页、第276页。

②《中共中央颁布“七七”十周年几年口号》，《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一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第1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267页。

④《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一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3–5页。

⑤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7–

1238 页。

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发解放军口号》，《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一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 15–16 页。

⑦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241 页。

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 572–578 页。

十二月会议及毛泽东的报告

在中国人民革命已经进入新时期，夺取全国胜利的条件业已成熟的基础上，为了迎接更大的胜利，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进一步解决怎样打败蒋介石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毛泽东于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由于会议在12月召开，所以史称“十二月会议”。到会的有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的干部。他们中除留在陕北的中央书记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李井泉等。

这次会议的召开，经过了认真充分的准备，周恩来、任弼时分别就军事形势和土地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集中精力起草会议的主题报告即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12月7日至24日，举行了18天的预备会议，与会者分成政治、军事、土改3个小组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会议正式开始前，毛泽东即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分发给与会者进行讨论。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正式举行。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讲了话，在会议闭幕时作了结论。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以及他在1946年所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会议的决定指出，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会议要求全党全军将这个文件联系1947年10月10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进行教育，并在实践中严格地遵照实施”。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讨论的结果后来由毛泽东写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

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分析了人民解放战争转入进攻以后的国内形势及其伟大意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打退了美帝



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进攻，这标志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①]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这种形势下，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为此，他在报告中着重阐明了党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纲领、政策和策略。

在政治方面：毛泽东指出，蒋介石统治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因而要将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身上，“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同时，他还重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所阐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即：“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②]

从表面上看，由于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成为革命的主要打击对象，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比之抗日时期，似乎是缩小了。但是，由于美蒋反动派的罪恶已经暴露无遗，他们在人民中陷入了完全的孤立；由于党采取了彻底的土地政策和恰当的城市政策，它获得了广大农民和城市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的拥护和同情；由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高潮时期，人民很自然地将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面；因此，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必须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强调，没有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③]他在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本来是不孤立的，后来因陈独秀右倾，脱离了群众，孤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左”的政策的结果，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所以，我们要总结历史的教训。“我们既要反右，又要反‘左’，以便划清界限，避免造成自己的孤立和失败”。[④]他认为，“关于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共产党要实现领导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率领被领导者坚决同敌人作斗争，第二要给被领导者以物质利益和政治教育”。他说，“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现在要公开讲，不公开讲容易模糊党员

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坏处多于好处”。[5]

在军事方面：毛泽东总结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长期的作战经验，特别是全国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经验，对这些经验作了新的概括，在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并指出，这些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人们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并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的。”同时，毛泽东还强调，“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6]

在经济方面：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和保护民族工商业。

毛泽东强调，“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蒋介石之失人心和我们之得人心，“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搞了土地改革，而蒋介石没有搞”。在土地改革中，我们坚持“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使得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一战略任务真正得到落实。

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而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因此，党必须实行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

正式宣布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这是毛泽东这个报告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新内容。毛泽东后来说过，党的六大决议案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大纲领，“但这十条里没有没收官僚资本，没有联合中小资产阶级。

 

那时这个纲领对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权上根本不要它，在经济上根本不动它”。“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当时提出，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但没有讲没收官僚资本。[7]而到“十二月会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是明晰了。还应当考虑到，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是合作的，就是到解放战争初期，尽管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但在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前，也不宜把没收官僚资本列入革命纲领。而到“十二月会议”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成熟了。[8]

毛泽东深刻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地位和它们在性质上的区别，指出，中国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但他们受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的压迫和损害，与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联系较少. 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守中立：在经济上，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使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因此，党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工商业必须坚决地保护。“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对于他们中的右翼分子的反动政治倾向是必须进行揭露和打击的，这样才能使群众从他们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政治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如果混淆这两件事，我们就要犯错误”。[9]

毛泽东还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和党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指出：“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10]

最后，毛泽东在他的报告中还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形势，指出帝国主义集团各国的反动势力，组成了帝国主义和反民主阵营，反对世界民主势力，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全世界人民对此要有充分的警惕。但

是美帝国主义的基础是虚弱的，它的内部分崩离析，它脱离人民，又无法摆脱的经济危机，因此，它是能被战胜的。毛泽东说："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会议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表现了高度的信心，同时对斗争的艰巨性仍然作了充分的估计。毛泽东认为，"战争的时间还要准备四五年．可能还要长一些"。

中国共产党的十二月会议以及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所坐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革命形势下为了领导人民争取全国革命胜利而作的重要准备。毛泽东在会议闭幕时说，这是一次很令人高兴的会议，是在时局展开中召开的。"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篇文章（按：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在今后打倒蒋介石时期是起纲领作用的"。报告阐明了党在战争转入进攻以后关于军事、土地改革、整党、经济以及统一战线各项工作方面的基本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全国胜利的一个行动纲领，为引导广大人民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在政治上、思想上、政策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注释：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244 页。

②同上，第 1 256–1 257 页。

③同上，第 1 257 页。

④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 329 页。

⑤同上，第 332–333 页。

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248 页。

⑦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37–138 页。

⑧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 821 页。

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254 页。

⑩同上，第 1254–1256 页。



十大军事原则与解放军总部移师西柏坡

十大军事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作战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打倒蒋介石的军事纲领，是解放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1958 年 6 月 23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讲话时说过："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①

1927 年至 1937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同以帝国主义为靠山、以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艰苦战争，即土地革命战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党第一代领导人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制定了红军的战略战术。1936 年 12 月，毛泽东为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阐述了红军作战原则的产生和形成。

1937 年 7 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指挥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在全国人民支援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浴血奋战，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毛泽东依据抗日战争的特点与规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作战原则，并且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军事著作，系统地论述了这些作战原则，并提出要注意研究军事问题，"研究军事的力量，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战术的研究虽然不足，但十年来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们已有很多的成绩，已有很多根据中国条件而提出的新东西，缺点在于没有总结起来"，"为了全党和全国的需要，军事知识的通俗化，成为迫切的任务。所有这些，今后都应该注意，而战争和战略的理论则是一切的骨干。从军事理论的研究"，要"唤起全党注

意于军事问题的研究”。[②]

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虽然是不同性质的两次战争，但就其作战的基本原则来说是相同的。毛泽东在 1937 年 10 月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这和我们过去在国内战争时采用的战法，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但亦有某些区别。”[③]

1946 年 7 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军委指挥下，在解放区人民全力支援下，奋起自卫。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和他的战友运用以往的作战原则，并结合实际，不断发展完善，在以前战略战术经验的基础上，于 1947 年 12 月总结出了解放军正确的战略方针，即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具体内容如下：“（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上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不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连接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④]

十大军事原则高度概括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内容丰富。每一条都



有它的独立意义，但各条之间又密切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核心实质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其中每一条原则都贯彻了歼灭战的思想。如第1条，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第3条，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第4条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第5条，打力求有准备和力求有把握之仗；第6条，发扬优良的战斗作风；第7条，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这些，都是人民军队在以往作战中一贯遵循的原则，也是今后必须继续采取的主要作战方法。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毛泽东一贯的作战指导思想，是人民解放军队伍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重要因素之一。毛泽东指出：“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⑤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时，毛泽东要求人民解放军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干部，都必须学会、掌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当战争进行三个月，歼灭国民党军25个整编旅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三个月总结》对党内的指示，指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25个整编旅，“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毛泽东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⑥此后，毛泽东指出，为了实现在5年左右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全军“必须每年歼敌正规军一百个旅（师）左右，五年共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⑦人民解放军只有全部歼灭了国民党的军队，才能完成“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争使命。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阅读了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后报告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说：“就大使馆所能断定的情况，毛氏的详尽分析共产党战术与战略是对共产党军队确定如何作战的一个非常率直的解释。共产党毫不迟疑地说明他们的战略，也许是表示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思想与情报之鄙视，应该承认这种战略到现在为止并不是没有成功的。”⑧为了寻找对付人民解放军的战法的方法，蒋介石多次集训他的将校，研究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蒋介石的美国军事顾问也向蒋介石建议各种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国民党军的失败。毛泽东指出，“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部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十大军事原则既是人民解放军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继续打败国民

党军的主要方法。1948 年 3 月 7 日，毛泽东总结战场胜利情况后说，“纵观全局，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只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惧怕敌人，反对惧怕困难，依照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指示，我们就能展开进攻，大量歼灭敌人；打得蒋介石匪帮，或者只有暂时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或者连招架都没有，只有被我一个一个地歼灭干净。”邓小平在 1948 年 3 月的一次讲话里也指出，要打仗，军事方针是什么？就是毛主席的十条军事原则。那是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和一年半爱国自卫战争经验的基本总结，也是今后革命战争的指导方向。凡是打得好的，都是依靠了这十条，不依靠这十条，仗就一定不会打好。[9]

十大军事原则的提出，武装了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战略战术思想水平和作战能力。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挥下，运用十大军事原则，不断地歼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取得了战略进攻的伟大胜利，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在全国和西北战场的战局已经大大改善之后，为适应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需要，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决定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陕北转移到华北。

1948 年 3 月 21 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杨家沟出发，到绥德县吉镇，22 日到刘家坪。23 日，从吴堡县川口村以南的园则塔渡口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

3 月 26 日，毛泽东等到达中共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山西兴县城西 7.5 公里的蔡家崖村。4 月 13 日，毛泽东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4 月 23 日，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到达西柏坡，同原在这里的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5 月 27 日，毛泽东到达西柏坡。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前。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西柏坡后，5 月 9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中央已与中央工委会合，中央工委即行撤销。”随即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也撤销。

从此，西柏坡便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周恩来在 1973 年 2 月的一个批示中曾写道：“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指挥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夺取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注释：

①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

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4页。

③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7-1248页。

⑤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⑥同上，第1206页。

⑦同上，第1345-1346页。

⑧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850页。

⑨邓小平：《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9-80页

新式整军的缘起

在轰轰烈烈的整党运动和土改运动的过程中，中央军委发现部队中存在着如下问题：

首先，人民解放军内部组织不纯。在解放军的长期发展中，不可避免地混进了一些不良分子，如地主富农出身的子弟、国民党的下级军官、流氓分子和大批被俘军队士兵等。出身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在参加人民解放军后，经过党的教育，他们中的一些人思想和作风已经符合人民军队的要求了，但是还有少数人进步较慢，个别人还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投降过来的士兵身上不同程度的染上了反动军队的恶习，在被编入解放军后，有些获得了新生，有了很快的转变和进步，还有一些人仍然存在旧社会的坏思想、坏习惯。此外，还有一些雇农、贫农或工人家庭出身的指战员，因受剥削思想作风的影响较深，又不注意改造，在思想政治上有的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个别的忘了本，反对农民、工人阶级的利益，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上述这些人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军队组织的纯洁。

其次，人民解放军内部思想不纯。在战争问题上，有些人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看不到敌我力量的消长，认识不到胜利即将到来，右倾情绪比较严重。有的人对美帝国主义缺乏本质的认识，惧怕美帝国主义直接出兵帮助蒋介石，惧怕长期战争。在对待土地问题上，不少人对于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不了解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中国革命的关系，对土改运动还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言论和行动。

再次，违反政策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执行命令不坚决，不彻底，阳奉阴违。缴获不完全归公，私打埋伏，虚报冒领。执行规章制度不坚决，强调自己的特殊。搜俘虏腰包，个别人员还杀害俘虏，违背工商业政策、城市政策，假借没收官僚资本反动分子的旗号，去没收那些本来不应当没收的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厂和商店；个别侵犯中农利益。在解放城市之后，争抓物资，甚至破坏工厂及市政设备。



再次，人民解放军内部存在着官僚主义现象。在人民解放军的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以及军队与人民之间，在政治上是完全平等一致的。但是有的部队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没有搞好。有些干部存在着官僚主义的倾向，对待下级干部及士兵缺乏深厚的阶级情感和平等思想，生活上不关心，领导方式简单粗暴，开口处分，闭口杀头，打骂士兵现象比较普遍。在同级关系上表现为本位主义，在物资和缴获处理方面，没有整体观念，全局观念，各自为政。有的干部斤斤计较个人利益，有的投机倒把、贪污腐化，有的争功诿过。在士兵中间存在着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不尊重干部，不服从指挥。在军民关系上，不尊重地方政府，不爱护人民群众的人力物力，随便浪费，甚至有的打骂老百姓，打骂政府干部，搞所谓的枪杆子主义。

由于以上问题的存在，整军问题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当务之急。邓小平在后来谈到为什么整军时说到："这次整风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战争非常艰苦，又处在接近胜利的关头，正需要我们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以争取胜利，而党内存在着成分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一部分同志有消极失望的情绪和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些现象必须加以克服，才能前进。"①

1947 年 9 月，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专门谈了整军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军队需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以整顿，需要一个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的运动，使军队在思想上达到一致拥护土改，组织上纯洁严密。因为在土改中暴露了军队的许多毛病，地主富农钻到我们的军队里来，在土改中利用我军躲风躲雨，穿起军衣反对群众土地改革；不管在野战军中或军队的后方机关，都要审查清洗。

朱德指出：在政策上，"地主参加了我们的军队，而且参加的很久。他现在表示不反对土改，愿意学习，愿意工作的，一律给予在继续工作中进步的机会。坚决反对土改，或过去有过重大的镇压群众包庇地主行为的，一律开除军籍，交人民法办。"他说："在抗战中参加军队的知识分子，有的地主富农子弟，也有的不是这地方人，他们的立场也要审查一下，究竟站在哪一个立场，是不是站在工人农民这边赞成搞土改。只有诚心诚意，不要半条心，而要一条心——为人民服务，要放弃他们原来的立场（这里边包括地主富农的子弟之内）。只有这样，才有出路。"

朱德对当时部队的状况作了分析。他说："现在战士中又发明了三合一班：有三种战士，（1）国民党主力的俘虏兵。（2）老八路。（3）彻底土改后参军的新战士。三种战士各有不同，各有优点，也有缺点。白区的战士，

他们的阶级路线是模糊的，老战士有八路军的传统作风。但是他对土改没有完全受到新的实际利益以前，他对解放区的感想不是那样十分好的。他出来是被迫的，而不是土改后自动地出来保护土地这样去的。所以把这三种人组织起来，开一个诉苦会，你是怎样苦，他是怎样苦，他又是怎样苦。经过开会后，三方面的东西就会都合拢起来了。解放区土改也知道了，白区农民的苦处怎么样也知道了，八路军的各种作风也知道了。这个会开他一天两天，一班人的阶级觉悟就会大大得提高。”朱德强调指出：土改翻身后参军的新战士就是“班里的政治战士，部队的巩固就是靠他。这也叫政治教育中的群众路线。”[②]朱德的这个报告，对全军的新式整军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人民解放军的整军运动，因为各战略区情况不同，全军没有一个统一开始时间，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束时间。大体都是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后展开的。运动开展早的为华东军区驻渤海地区的机关、部队，1947 年底就开展了整军运动。华东野战军的整军从 1948 年 1 月开始至 5 月中旬结束，西北人民解放军于 1947 年 12 月开始到第二年 2 月中旬结束，因为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进行的，其经验迅速向全军推广。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西北人民解放军是整军运动经验的首创者。晋察冀人民解放军是从 1947 年 11 月开始至第二年 3 月结束整军运动的。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大规模整军是在 1947 年冬季攻势结束之后展开的，于 1948 年 4 月下旬结束。中原人民解放军因为中原战场敌情严重，作战频繁，整军运动持续时间较长，大体上从 1948 年 1 月开始至 9 月结束。华南各地的游击部队的整军运动，大体在 1947 年年底至 1949 年秋。之所以称为新式整军运动，是因为在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上，这是第一次。“这种整训，是完全有领导地和有秩序地采用民主方法进行的”，整军方法新颖。其次，结合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展开诉苦运动和针对部队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进行全面整顿，整军的内容新颖。第三，整军的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正如陈毅在 1948 年 4 月 5 日的一次讲话里所说，称之为新式整军，因为旧式整军只整下面不整上面，领导者认为自己是没有毛病的，新式整军主要是整顿领导，整顿各级干部。

新式整军运动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一是诉苦，即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二是“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也有的说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1948 年 1 月，周恩来对诉苦与三查运动作过



高度的评价。他说："放手发动群众，高度发扬民主的诉苦三查运动是有成绩的，是整军与土改结合起来的一种群众性的政治工作，应该受到称赞。"他对西北野战军作了如下具体指示：

"（1）革命军队制度一般的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但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可以使民主的比重增加，范围扩大，可是不能脱离集中的领导，亦不能像群众团体那样范围的民主，因此由连以上的干部去领导连队中的三查运动是好的，也是打破军队中官僚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办法。

（2）以诉苦运动启发阶级觉悟是很好的教育方式，不但反对封建可如此，反帝反蒋正确亦可如此，但土改、三查是应以反封建为主的，而且这种诉苦主要依靠于贫雇农出身的战士和干部。

（3）三查的结果：审查出许多特务、伪、异己分子及坏人，这是群众运动的活力，较之高高在上的领导机关更能有成果的地方，自然这样就更能巩固部队，团结自己，加强对敌的战斗意志。

（4）在这个运动中经过支部改选就扩大了党，出现了积极分子、新的干部，也教育了许多原来的干部。"③

新式整军运动，从东北军区辽东三纵队开始，即1947年9月从辽东三纵队学习土地政策，进行诉苦开始的。过去部队也曾进行诉苦运动，收到不少成绩。但在内容上过去是多方面的，范围很广。而新式整军运动，则是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目的在于拥护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势力，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并进而提高干部、士兵的阶级觉悟，为推翻蒋介石政权而奋斗。因此，辽东三纵队在学习土地政策时进行诉苦的经验，毛泽东非常重视，亲自修改发给全军。这些经验如下：

"（1）以解放封建压迫为主。如若是由于被民族压迫及其他压迫者，应联系到封建压迫上去，进一步引导到土改政策的学习。

（2）发动干部诉苦。经验证明，这是可能的。因为全军干部，大多数皆工农成分。而且已证明干部诉苦，可以提高阶级觉悟。有时比战士诉苦作用大，更能影响群众。

（3）部队诉苦与地方诉苦相结合。应派人参加地方诉苦大会或要求群众典型到部队诉苦。部队同志，亦可到地方上诉苦，以发动群众，使工农兵血肉相连，体验到天下穷人是一家。

（4）发动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揭发反动社会制度的没落与黑暗，从反面来教育群众，使群众知道封建阶级的本质及没落的前途。现已有个别进行

控诉自己家庭的黑暗，压迫贫苦人民的罪恶者。这是进步表现，应受表扬，不应歧视。

（5）诉苦后，号召团结部队。阶级教育的目的，是使工农分子阶级觉悟提得更高，非工农分子应彻底抛弃自己出身的阶级立场站到劳动大众一边，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4]这些基本经验，对部队的诉苦运动起到了引路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新式整军运动的全面展开。

在上述经验的基础上，9月28日，东北军区政治部对辽东三纵队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作了进一步的总结，并向军委总政治部作了报告。其基本经验有4条：

1. 打通模糊思想，认清土地政策，铲除地主富农的丑恶思想，树立坚定明确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思想，增强保卫土地，保卫人民利益而战的决心。目前在普遍开展阶级教育、土改学习的思想斗争，是异常激烈的。部队中的地主、富农成分士兵的思想，极度波动，表现恐慌不安。地主成分的，则感到无前途，悲观、恐慌、落后甚至走向逃走。富农成分的则异常关心何时是否分到自己的家属。所以在这个学习中，领导上须慎重地掌握与稳定地主富农成分士兵的思想情绪，使其坏思想彻底消除。

2. 检查糊涂观念，进行坦白，追查阶级、查思想（忘本思想、地主富农思想、狗腿子思想、奴隶思想），查立场、审查与研究成分。部队来东北后，成分相当复杂，工人、农民、学生、地主都有，甚至特务分子，也混入部队中来。因此，查思想、查成分是及其重要的。

3. 普遍地开展诉苦运动，增加阶级仇恨心。其方法是：干部带头诉苦，起模范、做典型，启发别人及战士诉苦，作用甚大。如八师的各级干部参加听炮兵营长诉苦时，给下面影响很大；开展一条心运动，进行挖苦根，吐苦水。未诉苦的连队，要求掀起诉苦；发挥报纸作用，推动诉苦，启发诉苦，交流经验。目前从诉苦转到练兵，进行磨刀杀敌，部队情绪高涨；部队诉苦与地方农民诉苦结合起来，通过参加农民诉苦翻身，启发部队诉苦报仇、立功。

4. 组织工作队，实际参加推动改革运动，搜集经验再教育部队。如七师二十团的模范党员任继珍在土地改革学习中，亲带工作班参加土地改革，经过半个月的时间，将西丰县万和村、中原村农民完全发动起来，并彻底帮助农民分地和生产，取得很好效果。[5]这些经验对部队诉苦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152页。

② 朱德：《整军问题》，《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89-91页。

③ 周恩来：《诉苦和三查运动》，《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227页。

④ 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修改，批转的辽东三纵队诉苦教育经验报告》，《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86页。

⑤《东总政治部关于辽东三纵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向军委总政的报告》，《军队政治工作历时资料》第11册，第87-88页。

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

1947年冬，为适应战争形势和解放区土改、整党运动的展开，人民解放军各部普遍利用战争间隙，在部队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先后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

这次整军运动，一般分为3个步骤：第一步，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教育，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主要是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共中央《关于公布土地法大纲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修订和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的有关讲话和中共中央发出的一系列有关指示、“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等文件。通过学习，让全军广大指战员进一步理解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与中国革命战争的相互关系，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总政策，土地制度改革的总路线、总政策，从而提高全军的思想认识和阶级觉悟。

第二步是开展诉苦运动。整个诉苦运动，一般分为4个阶段展开：一是动员酝酿，着重解除各种思想顾虑、提高诉苦的自觉性；二是通过领导访贫问苦，发现和培养诉苦典型；三是通过典型，推动一般，在典型的启发带动之下，指战员们纷纷上台控诉；四是通过群众性的分析讨论，算账对比，进行挖苦根、找苦源，激发起对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提高阶级觉悟。

第三步是联系本人、本系统的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三查三整”，三整主要是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由于各地区、各部队、各单位具体情况不同，查整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查整，一般以干部为重点，其方法主要有：发动群众找问题，清理问题；以自我加压为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析问题，找出根源，作出鉴定，一边互相督促，互相帮助；动员大家提出整改措施，使各种意见落实到对组织上、思想上、工作上、制度上的改进、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健全规章制度，订立公约，开展官



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运动，达到大步提高军政素质、提高战斗力的目的。

人民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首先是从土地改革教育和诉苦运动开始的。有的部队先集中一段时间学习土改政策，进行土改教育，然后转入诉苦；有的部队土改教育与诉苦运动同时进行。土改教育，一般是首先学习文件，由部队首长作报告，讲解土地法；请地方政府干部介绍土改运动的情况；让土改后参军的战士介绍农村土改情况，以及分配土地后的家庭经济情况；发动全体人员开会，宣誓拥护土改运动等。此外，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引导指战员初步检查有无损害贫雇农利益、包庇地主富农，干涉土地改革的言行，为以后的整顿思想做准备。

诉苦运动是土地改革教育的深入发展，是三查运动前的思想准备。早在抗日战争时，八路军、新四军的一些部队就多次进行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以此提高广大官兵打败侵略者的决心。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针对新形势、新任务以及部队产生的新问题，人民解放军的一些单位继续采取诉苦的方式对部队进行教育。1947 年秋，人民解放军许多部队在普遍进行土改教育的同时或者在土改教育之后，又开展了诉苦教育。彭德怀同志讲到，诉苦运动，就是“普遍发动挖穷根与彻底挖蒋根。挖穷根的目的，就是在思想上解决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学，打倒地主富农思想与立场，建立明确的为土地而战的意志。挖蒋根的目的，就是要清洗对蒋介石的一切幻想，建立彻底打倒蒋贼的思想。在上述思想准备的基础上，再进行转入三查运动，以达到纯洁思想，纯洁组织的目的。”[①]1947 年 9 月 7 日，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强调指出：我们的军队一定要进行诉苦教育，“时间紧张也要想法抽出一点来搞。这也是政治教育中的群众路线。”

诉苦运动的要求有四点：一是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来提高阶级仇恨心与战斗勇气。深入土改教育，彻底弄清为谁打仗，同时，尖锐展开肃清地主富农思想，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思想斗争。二是培养建军骨干。在这个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单是进行思想教育，要发现与提高积极分子，评定成分，改造支部。三是放手大胆地发扬民主。通过这个运动，让群众从严格的阶级观点上，来对我们部队各级干部，提出意见，以便认真改善官兵关系，找出部队在工作作风上的主要毛病，切实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四是坚决清洗异己分子，杜绝来源，并适当调整组织，把我们的连队，真正掌握在工人、雇贫农的骨干手里。[②]

三查运动是在诉苦运动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是诉苦运动的深入和发展。在经过土改教育和普遍开展诉苦之后，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阶级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新式整军进入三查三整阶段。

彭德怀说："三查运动的目的，是要继续纯洁思想，纯洁组织，加强工作效率，提高战斗力，在深入的诉苦运动中，大体的划清阶级与敌我界限，帮助了三查运动，打下了思想上的基础，这是三查运动前的重要步骤。但诉苦运动尚未涉及各方面的具体事物与具体的人。去冬（指 1947 年）的经验证明：三查运动一经发动起来，必然广泛而复杂地接触与联系许多问题。领导机关提出三查是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而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后，自动地查工作、查经济、查纪律、查领导，以及查支部与党员的作用，形成了党内和党外，从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经过这个斗争，解决一连串的问题，检举出暗藏的奸细分子，不可改造的兵痞流氓分子，历来斗志不强，地主富农出身，而未放弃其地主立场的干部，被撤换的一批干部，其中有团、营长各一，连级较多，无统计，检举了前方及后方留守处不少贪污事件。许多干部过去爱打人、骂人，以至违犯群众纪律，工作不积极，被群众审查尖锐批评后，改变了态度，一般的工作更加积极，作战更加坚决勇敢，特别能接受群众批评，态度诚恳的干部更加取得战士爱护"。[③]

三查运动的基本方针，是"治病救人，发扬民主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为了报复、打击或造成分裂，而是为纠正错误思想。"批评揭露虽须彻底坚决，但绝不能乱加帽子，不能说一切不好都是地富思想，更不能搬用农村农民斗争地主的方法，一切处罚，未经上级批准，不应随便进行。三查以后，必须到达完全政治上的高度团结。在三查中，"纠正错误思想，使思想无产阶级化是主要的，基本的，只对于真正的阶级异己分子，才加以清晰些，但为了有效地进行，除首要的依靠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外，对犯有严重错误或屡教不改的同志，必须给以适当的处分，调整，同时实行改选支部，选举真正优秀的党员到支部来，并大量吸收优秀分子入党（必须注意成分，着重吸收优秀的工人、贫雇农入党，但不是唯成分论，其他成分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优秀分子，亦应吸收），加强党的经常的组织生活，才能完满地达到三查的目的。"[④]

为了达到三查的目的，各部队在三查的基础上必须进行三整。华东军区政治部指出："查整范围各部队大不相同，有的是三查，有的是四查、五查、六查。但总的应该是三查：查思想（立场）、查阶级（成分与本人出



身）、查工作（纪律、作风等）。三整是整思想、整组织，整工作作风。至于在这个范围下，从何开始，着重查几项，可根据情况而定。”他们指出：“为了达到三查三整的目的，基本办法是改造思想、调整组织、执行纪律。三者中改造思想是主要的，是贯穿在整个三查三整过程中的；调整组织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和群众路线的作风；执行纪律是保证我党我军中无产阶级思想纯洁，不被投机分子、地主富农立场分子所破坏。”⑤

三查运动就是军队中的民主运动，因此，还必须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指出：“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战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目前在我军部队中热烈进行的三查、三整，就是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方法，达到前两项的目的。”接着，毛泽东对三大民主做了阐述，指出：“关于经济民主，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关于军事民主，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此种会应开几次，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证明只有好处，毫无害处。”毛泽东说：“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应当相信，士兵对于一切好的和较好的干部是不会不加爱护的。同时，应当使士兵在必要时，有从士兵群众中推选他们相信的下级干部候选人员以待上级委任的权利。在下级干部极端缺乏的时候，这种推选很有用处。但是这种推选不是普遍的推选，而是某些必要时的推选。”⑥

新式整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群众性整军运动。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说到西北大捷“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前线领导同志们的坚决的、灵活的指挥，后方领导同志们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协助，以及敌军比较孤立，地形有利于我等项，都是应当指出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

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他说：“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理论，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毛泽东强调指出：“这种新式的整军运动，不但在西北方面实行了，在全国人民解放军中都已实行，或者正在实行着。这种整军运动，是在作战的间隙中进行的，并不妨碍作战。这种整军运动，同我党正确地进行着的整党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同我党缩小打击面，只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严禁乱打乱杀（杀人愈少愈好），坚决团结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大众的正确方针相结合，同我党实行正确的城市政策，坚决地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方针相结合，这样就必然会使人民解放军的威力无敌于天下。”他满怀信心地说：“任凭蒋介石匪帮及其主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面前如何拼命挣扎，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⑦

新式整军运动使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经过诉苦和三查，我党在部队中的威信大大提高，广大战士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要求入党人数大大增加。这一运动，从整体上提高了解放区军民的阶级觉悟，增强了部队的团结，密切了军民之间的关系，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注释：

① 彭德怀：《关于一九四七年冬季整军运动报告》，《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 12 册，第 46 页。

② 华东野战军政治部：《连队诉苦运动实施方案》，《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 11 册，第 186 页。

③ 同①，第 48 页。

④《二野前委关于三查工作指示》，《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 11 册，第 365 页。

⑤ 华东政治部：《关于三查三整工作的几个原则问题的通报》，《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 11 册，第 401–403 页。

⑥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 275–1 276 页。

⑦ 同上，第 1 291–1 295 页。



中国共产党的新区政策

从1948年1月起的几个月时间内，中共中央集中全力解决新形势下关于土改、整党、工商业、统一战线、新区工作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和政策问题，注意纠正党内的错误偏向，主要是“左”的偏向。

中共中央十分关注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更加完整地概括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在这条路线提出前后，中共中央指示，要在不同的地区制定实施土地法的不同政策。这时的解放区基本上可以分为3种：日本投降以前建立的根据地，即老解放区（老区）；日本投降以后至进攻战略开始以前两年内占领的地方，即半老解放区（半老区）；战略进攻开始以后所占领的地方，即新解放区（新区）。这种解放区还在进一步扩大。这3种地区情况不同，党制定的政策也不同。而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党在新区应实行的政策。党在新区的政策，主要分为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在农村，主要涉及如何实行土地改革的问题；在城市，主要涉及如何接管城市的问题。

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征询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48年2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规定了党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要点。指示说：“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的速度。”“应准备在两三年内完成全区的土地改革”。同时，指示还强调：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又要分为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与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要有所区别。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但在待遇上，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①

中共中央关于新区土改工作要点的指示于2月15日发出之后，各中央局、分局及前委及作出了相应的部署。各地在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过程中，结合当地的实际，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意见和建议，积累了一些新的经验。毛泽东十分重视了解各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指示的情况，总结、推广有关的新鲜经验。5月24日，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电报中明确提出，“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的必要。”他指出：“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如同抗日时期只逮捕汉奸分子和没收他们的财产一样，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因为过早地分浮财，只是少数勇敢分子欢迎，基本群众并未分得，因而会表示不满。而且，社会财富迅速分散，于军队不利。过早地分土地，使军需负担过早地全部落在农民身上，不是落在地主富农身上。”不如不分浮财，不分土地，在社会改革上普遍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得到实益；在财政政策上实行合理负担，使地主富农多出钱。这样，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在一两年甚至3年以后，在大块根据地上，国民党反动派已被消灭，环境已经安定，群众已经觉悟和组织起来，战争已经向遥远地方推进，那是就可以进入像华北那样的分浮财、分土地的土地改革阶段。“这一个减租减息阶段是任何新解放地区所不能缺少的，缺少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要犯错误。”在华北、东北、西北各大解放区的接敌地区，亦须实行上述同一的策略。[②]

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1948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由毛泽东起草的这个中央指示明确划定了土地改革工作的范围。具体来说，“这种范围必须是在下列三项条件下划定之：第一，当地一切敌人的武装力量已经全部消灭，环境已经安定，而非动荡不定的游击区域。第二，当地基本群众（雇农、贫农、中农）的绝大多数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不只是少数人有此要求。第三，党的工作干部在数量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当地的土改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凡不具备其中任何一项条件的地区，即不能列入1948年土改的范围。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解放区的接敌区域和中央局所属江淮河汉区域的绝大部分地区，“应当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余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以便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



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一切国民党武装力量和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在这类地区，既不要分土地，也不要分浮财，因为这些都是在新区和接敌区的条件之下，不利于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完成消灭国民党反动力量这一基本任务的"。[③]至此，党的新区农村政策就最后完整地形成并被正式地确立起来了。

在中共中央有关土地政策的各项指示的同时，中共中央还对《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某些条文作了订正。在"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一条上，加注了"本条所称应予废除之债务，系指土地改革前所欠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的高利贷债务"，以避免与农民中正常借贷和商业债务混淆。在平分土地一条上加注了"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并允许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半数水平为高的土地量"。

中共中央的这些政策规定和措施，对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的"左"的偏向，保证土地改革的正确实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到 1948 年秋，在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已在大约 1 亿人口的区域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在新解放区，社会秩序渐趋稳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

在关注农村土改政策的同时，中共中央对城市政策也给予充分关注。抗战胜利以后的两年间，曾经占领和管理过张家口、淮阴、临沂、长治、烟台、威海卫、德州、承德、邯郸、赤峰、安东、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那时党的注意力集中于战争和农村工作，对于城市工作的经验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及时的推广。转入战略进攻后，人民解放军屡克名城，其中有一些已能够巩固地占领。但是，主要来自农民的人民军队和地方干部中的一些人，往往还是以游击战争的观点和小生产者的眼光来看待城市问题，把农村工作的一套办法照搬到城市，以至发生一些违反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的现象。这些问题在东北的台安、盘山，中原的许昌、漯河，西北的高家堡，华北的井陉、阳泉，山东的羊角沟等地都程度不同地有所表现。

城市是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城市工作十分重要。毛泽东说过："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如果"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到此目的"。[④]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许多城市相继解放，制定正确城市政策，已经成为我党的当务之急。

中共中央对城市工作极为重视。1948 年初，中共中央即连续就城市工

作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向各地方、各部队发出指示。1月9日，针对解放军1947年秋攻克陕西省榆林高家堡时发生过违反政策、破坏纪律的行为这一现象，毛泽东在西北地区给中央的报告上批示，“我军到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等。[⑤]1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就地主经营工商业的政策作出具体的指示。1月31日，毛泽东转发朱德关于职工待遇等问题给中央的信，并写了按语，强调“我党工商业政策的任务，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指出“工厂中商店中工人店员职员的生活条件，不可过高”。[⑥]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指示。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明确指出：党在这个问题的指导方针上，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对于城市中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应当保护。应当坚决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工作方针，并将这个正确方针同那种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

晋察冀军区部队攻占华北重镇石家庄后，中共中央工委及时总结接管石家庄工作的经验，于1948年2月19日发出《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要求全党切实注意做好城市工作，规定各地、各部队攻占城市后的接管工作都应学习石家庄的经验。中共中央并责成各中央局、分局、野战军前委，对于已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5万以上者），应及时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使好的经验得以推广，避免重犯各种错误。

4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就城市政策应注意的各点作出指示。其中包括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没收官僚资本、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工人的工资待遇、城市的粮食与燃料、清理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禁止大吃大喝、委派懂政策的干部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等9大方面问题。由于这个电报涉及更多内容，政策具体完善，所以中央将这个电报同时发给了其他部队和其他地区的领导人。6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将东北野战军入城纪律守则8条转批给各军区各野战军首长，要求各地“参考采用”。

在城市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又建立了军事管理制度。6月10日，中共东北中央局发出《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就新收复城市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具体而又深入的分析，并就保护新收复城市和



做好城市工作作出了重要的决定，其中包括“在新占领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即在新解放的城市中，由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首长，并吸收地方党、政负责人参加，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保护解放城市的全部责任。军事管制必须在城市秩序安定后，才能废除。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发出指示，指出东北局的上述文件已“经中央审阅批准”，“应即照此颁发同样的文件，并切实遵行”。[⑦]11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就新收复城市实行军事管制的时间、应达到的目的和实施管制的方法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11月28日，东北局领导成员、沈阳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云总结接收沈阳的经验，在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转发这一经验。此后，新解放的城市，基本上都是按照沈阳的接收方法进行接收的。

除了就接管城市的全局性工作作出指示外，进入1948年来，中共中央还就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遇到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如如何对待国民党的政权机构和国民党各类人员，如何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和保护民族工商业，如何处理劳资关系，如何保护学校和发展教育事业，如何对待国民党的和私人的新闻机构，如何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和依靠工人阶级及团结各方面人士，如何教育干部和战士遵守党的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等问题，及时地分别作出指示。

党中央制定的这些政策指示，有利于团结城乡最大多数人民，孤立敌人，巩固人民政权。同时促进了城乡经济的恢复发展，为以后全国范围内完成土改和在城市中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正如1948年7月30日新华社社论所说的那样，“解放军进入新区作战，并解放许多城市的结果，使中国共产党在新区工作和城市工作方面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训练了大批的干部，因而使得共产党不独是对于农村，而且对于城市，对于工商业，也完全规定了正确的政策。而这些，乃是实现全国胜利所必不可少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⑧]

注释：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3页。

② 同上，第1 326-1 327页。

③ 同上，第1 329-1 330页。

④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页。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⑥ 同上，第22页。

⑦ 同上，第209页。

⑧ 同上，第669页。

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

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保持已经取得的胜利和夺取全国的胜利，中共中央强调，必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坚决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分散主义和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由于长期战争的原因，中共中央曾经允许各地方党和军事的领导机关有很大程度上的自治权。这种状况使得党内存在无政府、无纪律的现象。有的地方甚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①]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胜利发展，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党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到1948年，党已拥有300万党员。此时，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者即将解放，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正规性程度大为提高，全国胜利已经在望。到1948年“九月会议”前夕，解放区面积为25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24.5%；人口1.68亿，占全国人口的35.5%；县城以上的大中城市586座，占全国城市的29%。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统一筹划和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夺取全国胜利，要求党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内的任何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毛泽东指出：“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胜利解决。”[②]

1948年1月，中共中央就已经提出了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问题。5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的第六节中，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是把解决这个问题同实现党的战略任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他说：“我们的战略方针

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军队向前进，就要生产长一寸，不这样就没有饭吃。又必须加强纪律性，作战方式要逐渐正规化。这是方针。”③

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是中共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中央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军事、政治、土改、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中央要求，“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因为“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加强此种联系，极为必要”。④3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同时发给中央一份”；“下级向你们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应同时告知中央；“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⑤6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就“关于各项工作中何者决定权属于中央，何者必须事前请示中央，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付诸实施，何者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作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决定》指出：“凡属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的事项，中央已有决定指示者，各地必须严格遵守，正确执行。在执行中遇有困难及特殊情形，或有不同意见时，均可向中央说明理由，提出意见，等候中央批示，但不允许擅自修改。中央尚未作出决定指示者，各地有权向中央建议，并得根据本地区情况和经验，向中央提出处理的方案，拟出决议或条例的草案，请求中央决定公布，或由中央批准，用地方名义发表。”除此以外的“其他各事项，各中央局、分局及军委分会、前委会有自己决定实行之权”。⑥

为了提高维护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自觉性，中共中央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前委就此问题进行检讨，开展自我批评。为了提高维护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中共中央还要求全党同志尤其是党的干部认真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1948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在列宁的这本书的封面上写下以下评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我们现在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⑦]为此，中共中央重印此书的第二章。6 月 1 日，中宣部在关于重印《"左派" 幼稚病》第二章的前言中指出："现在重印列宁这一著作，同志们——特别是一切负责的同志们，必须认真阅读"，并参看毛泽东的有关著作和党中央的有关文件，"为消灭现在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而进行必要的与适当的斗争。"[⑧]

在彻底摧毁旧政权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着手建立全国性政权和统一财经工作。早在 1946 年，党就在东北根据地建立各省联合办事处行政委员会，加强了对东北解放区的统一领导。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西北、东北、华东解放区迅速扩大。在华北，除少数城市之外，国民党军队的据点已经基本肃清，使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为了使华北解放区的工作由分散迅速向集中转变，实行党、政、军、财统一领导，1948 年 5 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由刘少奇兼任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聂荣臻任第三书记；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董必武任主席。按照中央的部署，华北解放区大力加强各级政权的建设，组织全区的人力、物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同时摸索、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建立新中国的中央政权做准备。

中共中央认为，在中国，新生的政权组织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形式，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形式，而是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并通过代表大会选出政府领导人，制定各项施政条例。但在刚刚接管的新解放城市，因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工作尚无基础，不能召开名副其实的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只能召开协商性质的、主要对群众起联系作用的各界代表会议，然后待时机成熟再实行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华北解放区首先按照这个设想，进行了政权建设。

1948 年 8 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大会通过了《华北解放区施政方针》、《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村县（市）人民政府组织条例》，并民主选举董必武等 27 人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在此前后，华北各地 3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先后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9 月，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董必武任政府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为副主席。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开展大量的工作，进行积极的探索，积累了丰

富的政权建设经验，并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在组织上作了准备。后来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各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各界代表会议是城市解放后军事管制时期建立的一种临时的协议机关。中共中央明确规定：在城市解放后实行军事管制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议为党和政权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党所领导的人民代表会议是我们的组织武器，而各界代表会议则可看作是人民代表会议的雏形。“我党的一切决议和主张，均可经过他们的协助，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根据中央的部署，其他各解放区以及后来新解放的北平、上海、南京、太原等地相继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为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新中国政体的确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东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逐步扩大，中国中央还抓紧开展统一财政经济的工作。1947 年春夏之交，华北解放区召开财经工作会议，提出今后要逐步达到各个解放区财经工作的进一步统一，并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华北财经办事处按照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有步骤地统一各解放区的财政，并广泛开展调查研究，积极筹备统一货币的工作。同时，逐步建立财政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为统一财政奠定基础。1948 年 7 月初，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董必武任部长，加强了对财经工作的领导。9 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随即成立华北财经委员会，相继召开华北工商会议、金融贸易会议，研究解决统一华北各区的货币、物资交流等问题，制定金融、贸易、商业税收等政策，并发出《关于统一华北财政工作的决定》，颁布施行新农业税则。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华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逐步走向统一，以华北为主逐步统一其他各解放区财政经济的工作也开始筹划。

早在 1947 年 10 月 8 日，中共中央即指示华北财经委员会，准备建立统一的中国人民银行。经过筹备，1948 年 12 月 1 日，由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而成的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宣告成立，并从即日起发行人民币，以此统一各解放区组织和动员群众，迅速收兑和肃清国民党政权发行的货币，使人民币逐渐占领了货币市场。

1949 年 1 月，毛泽东在回顾 1947 年十二月会议以来，中共中央为增强全党的政策观念、制定并完善各项政策所进行的工作时，高兴地指出：“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有系统地学会了在农村



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许多同志在过去长时期内没有学会的东西，一个年头内都学会了。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在全党内能够贯彻执行。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是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这样一件事就指明：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⑨

注释：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332 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25 页。

③ 同上，第 133 页。

④ 同①，第 1 264–1 265 页。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32 页。

⑥ 同上，第 356–363 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8–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03 页。

⑧ 同⑤，第 193 页。

⑨ 同②第 231–232 页。

1948 年的夏季作战

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全国各战场的情况而利于指挥整个解放战争，也为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能及时地共同研究和决定革命新高潮形势下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于 1948 年 3 月 23 日离开战斗 13 年的陕北，东渡黄河，于 4 月 13 日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与刘少奇、朱德会合，并于 4 月 30 日至 5 月 7 日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怎样促使中国革命斗争走向全面胜利和怎样迎接这一胜利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 3 条战略性意见，即：第一，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区域。这样做无疑会有很多困难，打出去的主力会削弱，打不了很多胜仗，但无此一条不能战胜国民党。第二，要使后方农业、工业生产长一寸。土地改革、整党、开人民代表会议，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第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缩小地方权力。这 3 条以后被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 20 字方针。会议正式决定将晋察冀、晋冀鲁豫 2 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刘少奇兼任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徐向前、滕代远、萧克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员。晋冀鲁豫（刘邓）野战军改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军区和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李先念分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扩大中原局领导成员，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分任中原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中共中央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中央工委即撤销。5 月 9 日，中央军委根据会议的决定向全党全军发出了上述军事机构及人事调整的通知。[①]此外，会议还讨论了粟裕兵团（华东野战军第一、四、六纵队）暂不过江，留置中原地区作战的问题。会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返回平山西柏坡，毛泽东单独留在城南庄作去苏联访问的准备。这个访问，以后又因需要处理许多军国大事而被推迟。5 月 18 日，毛泽东移住离城南庄 10 多公里的华山村，29 日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

柏坡村。

1948 年春，毛泽东的工作重心放在对党的重要政策的研究上，经与书记处的其他同志研究后发出了一系列有关指示。1948 年夏，作战问题再度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毛泽东的工作中心。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精心策划下，除东北野战军正在进行大休整外，其他各野战军、各兵团先后展开攻势，进行了豫东战役、襄樊战役、津浦路中段战役、晋中战役和冀热边作战等一些重要战役，取得了被新华社社论称之为“五路大捷”的重大胜利。

刘邓、陈粟、陈谢 3 支大军挺进中原，虽然开创了中原新解放军，从根本上改变了全国战局；但由于国民党军集中了 90 个旅上兵力对付中原各路人民解放军，因此到 1947 年年底和 1948 年初，中原战局仍呈胶着状态，“使那里的我军暂时处于困难地位”。[②]

如何解决这种局面，成了整个战争棋盘中的一枚关键性的棋子。1948 年 1 月 19 日，奉命自中原前线赶赴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陈毅开始向中共中央汇报华东、中原各方面的情况。在汇报会上，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商定了中原地区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以刘邓军主力位于大别山内线，“分遣坚持，多休息，多打小仗”，待正由晋冀鲁豫解放区南下的 30 000 新兵及一部分物资到达并补充部队后再谋求打中等规模之仗；以粟裕所部并指挥陈谢军在二、三、四三个月内，在中原地区打几个中等规模的歼灭战，以配合刘邓军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这个计划还设想，以山东兵团许世友司令、谭震林兼政委率两个纵队南下苏北、苏中，会同原在这两个地区活动的华东野战军第十一、十二纵队“形成一个重要战场，威胁京沪”，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区抽调一部分兵力向东。他们估计，经过三个月作战后，中原三军“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1 月 26 日，中央军委把这个计划用电报下达给了刘伯承、邓小平及粟裕、陈赓、谢富治等。1 月 27 日，毛泽东又以他和陈毅两人的名义就山东兵团的使用意见致电华东局，要求华东局提出意见。[③]

1 月 27 日，毛泽东和周恩来、陈毅就改变中原战局问题磋商之后，作出一个大胆的新构想，并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粟裕征求意见。电报指出：“关于由你统率叶、王、陶（即华东野战一、四、六纵）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同志研究有三个方案”：一、休整半月后立即渡江；二、按原计划二、三、四三个月仍参加中原作战，力争歼敌一部，然后休整一个月再行渡江；三、按以前的设想先参加中原作战，于 1948 年秋季再行渡江。军委在电报中分析了这 3 个方案利弊后指出：“你率

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20到30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④

1月31日，粟裕与陈士榘、唐亮商量之后发给军委赞成的回电，并提出渡江的2个方案，即：一、3个纵队先北开陇海路附近休整一个半月，争取补充，做好动员，然后于3月下旬出动渡江；二、3个纵队仍先参加中原作战，3月开始休整补充，5月中旬出动南下。粟裕等在电报中认为"以上两案以第一案为最好"。此外，回电还对渡江路线、渡江后留在中原地区各兵团的作战方针等问题提出了意见。2月1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裕，批准粟裕提出的第一个方案，于3月下旬出动渡江，并指出："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

1948年中原战局出现变化之后，粟裕重新考虑作战方案。4月18日，粟裕在电报中首先充分肯定了1947年7、8月份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这一方针所取得的极大胜利，接着，就详细分析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执行渡江南进方案后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和当前中原战局已经发生的有利变化，建议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不南下，以刘邓、陈谢、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依托后方（陇海路以北）作战，求得在最近期间有效地打几个大歼灭战。除了野战军主力暂留中原作战，而后再相机向南推进外，粟裕还建议组成"每路多则一个旅，少则一个团"的多路游击兵团和远征游击队，依次向国民党近后方及远后方挺进，会同当地人民游击武装"辗转广泛游击，配合正面主力作战"。粟裕认为，"以上三线武装部队（野战军、游击兵团及远征游击队）依战局之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粟裕在电报的最后还表示："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的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⑤

毛泽东在看完电报后，要求陈粟尽快来中央汇报，以便做出最后决定。4月30日，毛泽东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粟裕的汇报。与会同志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根据城南庄决策，陈毅赴中原局工作，由粟裕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代政委。5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电报，通知刘邓和华东局："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



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开封）徐（州）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在此期内，由该兵团派出十个营，附以地方干部，陆续先遣渡江，分布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⑥

新政策制定之后，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与陈毅、粟裕及各纵队负责人研究确定了南下中原的作战方案：首先以陈士榘、唐亮指挥第三、第八纵队出许昌地区向淮阳方向挺进，吸引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军（辖出原第五军扩编的整编第五师及第七十师并附一个快速纵队）由鲁西南地区南下，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及刚由渤海地区西调的两广纵队（3 个团）等立即乘机南渡黄河，会同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鲁西南地区展开，吸引第五军等部回头北上，然后以陈唐所部尾敌北进，协向南渡各纵夹击歼灭第五军等部于运动中。

6 月 3 日，中原野战军皖东战役结束，歼张轸集团及其他部队约 12 000 人。陈唐完成任务后率第三、第八纵队稍事整顿，立即自许昌以南地区向鲁西南急进。6 月 16 日到达通许、睢县、杞县等地区，距开封一日的路程。开封是河南的省会，中原战略的要点。城周 20 余公里，共六门四关。国民党守军为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部率一个旅及河南省 2 个保安旅、周围各县保安团共 30 000 余人。6 月 17 日晚，解放军第三、第八纵队隐蔽地向开封急进，18 日黄昏袭占四关，接着组织攻城，至 20 日占领城区大部，国民党守军残部退守古龙亭、华北运动场核心阵地。21 日晚，解放军队核心阵地发起最后攻击，至 22 日全歼国民党守军，开封之战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约 40 000 人，击落飞机 2 架。

开封被占后，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恐慌。蒋介石为稳定人心，决定以整编第五军及整编第八十三师组成一个兵团，由整编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指挥，以整编第七十五师、第七十二师及整编第二十一旅组成一个兵团，由第六绥靖区副司令区寿年指挥，分左右两路向开封攻击前进，企图“收复开封”。

因此，粟裕立即按原定计划于 26 日放弃开封，诱国民党军右路邱清泉兵团进入该城，使邱、区两兵团之间出现 20 余公里之间隔。27 日至 29 日，粟裕部署所属各纵队行进到睢县、杞县地区的，对区寿年兵团实施并完成了

合围和分割。接着，以一部坚决阻击邱兵团的东援，集中主力围歼区兵团。7月2日，歼灭了这个兵团的兵团部、新编第二十一旅及整编第七十五师大部，俘中将兵团司令区寿年及中将师长沈澄年。7月3日至6日，又歼灭第七十五师残部及由徐州方向经商丘来援的黄百蹈兵团（由整编第二十五师及伞兵纵队、交警第二总队组成）3个团。因鉴于国民党的多路援军已渐次逼近，自己部队又连续行军作战一月有余，炎夏季节，部队饥渴疲惫，再战有陷入被动地位的危险，于是决心立即撤出战斗，各部队分向陇海路南北转移休整，睢杞之战遂告结束。

开封之战和睢杞之战合称豫东战役。战役历时20天，歼灭国民党军1个兵团部、2个整编师师部、4个正规旅、2个保安旅以及其他部队共90 000余人，歼灭了国民党军的大量有生力量，打破了中原战场的僵持局面，巩固了中原解放区。豫东战役期间及其胜利结束之后，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和中原野战军主力一部分别发动了津浦路中段战役和襄樊战役。

依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解放军山东兵团在谭震林兼政委和许世友司令员的指挥下于5月29日发起津浦路中段战役，先后占领泰安、大汉口、曲阜、邹县等城镇，并于6月20日包围兖州，准备打可能自徐州北援之敌。为解兖州之围，刚接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的刘峙迅速将其整编第二十五师自苏北战场北调经徐州北援。但该师于6月28日进至滕县后又因豫东战场告急而转援豫东。解放军山东兵团乃于7月1日再度包围兖州，并经充分准备后于12日黄昏开始强攻该城。经一昼夜激战，至13日下午，全歼国民党守军第十绥靖区司令部及整编第十二师共2.7万余人，俘整编第十二军兼第十二师中将师长霍守义。接着，又于同日晚在泰安以南的太平镇地区歼灭自济南南援的国民党军一部万余人。全战役共歼国民党军6.3万余人，收复县城12座，使济南完全陷于孤立。

同时，华东野战军的苏北兵团也在陇海路徐州、连云港段发动攻势，接着又攻克涟水，共歼灭国民党守军万余人。

1948年6月下旬至7月初，中原野战军为保障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的豫东作战，在平汉路西平、漯河段及其东侧进行了阻击作战。豫东战役结束后，主力进至平汉路西进行休整，所属第六纵队附桐柏、陕南两军区一部分部队，在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下于7月2日发起襄樊战役，首先歼灭了老河口、谷城的国民党守军，接着于7月3日包围襄阳、樊城，激战至16日全歼守军20 000余人，俘第十五绥靖区司令、特务头子康泽，控制

了汉水中段。

为保卫晋中麦收，进一步削弱阎军兵力，为夺取太原创造条件，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徐向前统一指挥第一兵团的第八、第十三纵队及太岳军区部队（8 月 15 日改编为第十五纵队），吕梁和太行军区一部分部队共计 60 000 余人发起晋中战役。战役自 6 月 11 日开始，到 7 月 21 日包围太原城，历时 40 天，胜利结束，兵团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野战军（兵团）总部、4 个军部另 8 个师、2 个总队等正规军 7.4 万余人，民卫军 2.6 万余人，解放了灵石、介休、汾阳、孝义、文水、太谷、榆次、忻县等 10 余座县城，使国民党在山西的统治区只剩下太原、大同两座孤城。

在华北第一兵团于山西地区进行晋中战役前后，华北第二兵团也在兵团司令杨得志，政委罗瑞卿、杨成武指挥下于热河、冀东、察哈尔地区及平汉路保定以北地段进行了冀热察战役和保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所属的暂编第三十一师及交警总队、地方保安团队共 30 000 余人。自此，人民解放军 1948 年的夏季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51-153 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303 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4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75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8-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71 页。

⑤ 粟裕：《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版，第 353-355 页。

⑥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4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 459 页。

国共双方力量对比逆转

1948年6月底，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移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的运动战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并继续在内线作战，收复失地。经过洛阳、襄樊、晋中、豫东等一系列战役，国民党有战争初期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其中用于一线作战的正规军只有174万人，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个战场上，在战略上已经处于被动地位。与此相反，解放军则从战争初期的120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在正规化方面和技术装备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具备了进行大规模运动战、阵地战和城市攻坚的能力。同时，收复与解放土地面积15万平方公里，使解放区面积达到235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 700余万，解放和收复县级以上城市182座。

从当时的版图上看，华北、华东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东北除少数大城市外，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获得解放。东北解放区的巩固和扩大，不仅摆脱了国民党军南北夹击的不利的战略态势，并使东北解放军获得了巩固的后方。中原解放区在大别山、皖西、豫西、陕南、桐柏、江汉、江淮，创立了七个军区，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使中原地区由原来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基地，西北解放区也在巩固逐渐扩大。这些变化，为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创造着必要的条件。[①]

1948年夏季作战取得胜利之后，7月16日，新华社以《祝五路大捷》为标题，发表社论，指出："这一连串的大胜利，无疑的，又给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极为严重的打击，使它的全盘战略更加陷于被动，并为人民解放军今后在一切战场上的胜利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这一连串的大胜利，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指导，是完全正确的，是唯一的胜利的战略方针。一切反动派，不论是蒋介石的'全面进攻'或是'重点进攻'，也不论是他的'全面防御'或'重点防御'，不论是傅作义的'主力对主力'，'穿心战术'，不论是白崇禧的'攻势防御'，都是不可



避免地要失败的。”同时，分析了这次胜利的重大意义，“我军不仅在军事上打了打胜仗，并且在政治上也继续地打了打胜仗，这就是，中共中央的正确政策，真正在人民解放军中上下一致地贯彻执行了。”②

1948 年 8 月 1 日的新华社社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一文，总结了解放战争两年来尤其是第二年的情况，指出了战争在第二年发生的新情况新变化，并指出了在新变化下，中国人民应该做的工作。文章总结到：“过去一年，即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军事情况的基本特点，就是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的反动军队则由进攻转入了防御。过去一年中，在南线，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在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内先后渡过黄河、越过陇海线、进入中原以后，建立了北起陇海路、南抵长江、东抵大别山以东巢湖至徐州之线、西抵汉水以西沙市至安康之线、拥有人口三千万的中原解放区。在西线，西北解放军去年八月转入反攻，此后不但收复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绝大部分，而且解放了黄龙山区，与黄河东岸的解放区完全衔接，并一度解放了麟游山区。在东线，华东解放军去年十月转入反攻，接着收复了山东解放区的绝大部分，肃清了济南青岛之间的胶济线和济南徐州间的津浦线，与运河以西的冀鲁豫解放区衔接；陇海路南，也收复了苏北的六座县城，并重新建立了安徽东部的解放区（江淮解放区），而与中原解放区打通。在东北，经过过去一年的秋季攻势，冬季攻势和热河方面的作战，东北和热河的百分之九十七的土地都已获解放。在华北，除太原孤城正在围攻以外，敌人留在华北解放区中心的据点已经全部肃清，从而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这两大解放区获得了合并的条件，并与山东和晋绥解放区完全衔接。”党中央不断加强对日益扩大的解放区的集中统一领导。1948 年 8 月，经过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决定，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改为华北人民政府，在华北 4 400 万人口的区域建立起共产党和党外民主人士生死合作的统一的人民政府，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作了准备。

“解放军在第二年作战中消灭敌人兵力共达一百五十二万余人，其中俘虏九十五万三千人，毙伤五十四万人，争取起义二万八千人；解放土地十五万五千平方公里，人口三千七百万。截至今年六月底，解放区的总面积二百三十五万五千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百分之二十四点五，人口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三十七。”③

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两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

日）的综合战绩为：“歼敌营以上正规军三个军部、二十九个师部、九十五个整旅、十三个旅部、一百八十八个整团、三百三十六个整营，除军部、师部外，共折合一百九十个旅。连消灭营以下兵力算计在内，共俘敌正规军一百零二万二千八百五十人，毙伤其六十七万六千二百七十人，另争取其起义一个整旅又两个整团一个整营及营以下部队一万六千九百三十人，合计一百七十一万六千零五十人。”

“歼敌营以上非正规军十七个整旅、一个旅部、二百四十二个整团、二百二十四个整营，共折合三百五十个团。连消灭营以下兵力算计在内，共俘敌非正规军六十万零七千一百五十人，毙伤其二十八万九千九百三十人，另争取其起义六个整团两个整营及营以下部队共二万八千二百七十人，合计九十二万五千三百五十人。”

“以上两项合计，共歼敌三个军部、二十九个师部、一百一十二个整旅、十四个旅部、四百三十个整团、五百六十个整营，除军部、师部外，共折合九百二十个团。连消灭营以下兵力算计在内，共俘敌一百六十三万人，毙伤其九十六万六千二百人，另争取其起义一个整旅又八个整团三个整营及营以下部队四万五千二百人，总计二百六十四万一千四百人。”

“俘敌将级军官三百二十六名。内正规军二百一十名，计上将一名、中将二十三名、少将一百八十六名；非正规军一百一十六名，计上将二名，中将十九名、少将九十五名。毙伤将级军官五十名。内正规军三十一名，计中将六名、少将二十五名；非正规军十九名，计中将三名、少将十六名。合计俘虏毙敌将级军官三百七十六名。此外俘毙敌旅级上校军官四十二名。”④

战争经过两年以后，截至1948年6月，敌我双方力量发生了很大变化，敌我兵力损失比较如下：“（一）我军全年负伤三十二万五千三百人，阵亡八万二千三百人，伤亡共计四十万零七千六百人；被俘五千三百人，失踪四万人。总计我军损失兵力四十五万二千九百人。但负伤数中约四分之三伤愈归队，故损失数应减去约二十四万人，实际损失只约二十一万二千九百人。”

“（二）我军全年毙伤敌军五十四万零二百人，敌我伤亡相较为一点三二比一；全年俘虏敌军九十五万三千人，敌我被俘相较为一七九点八比一；全年共消灭敌军一百五十二万一千四百人，敌我兵力损失相较为三点三五比一。但实际比率当超过次数，因敌军受伤后治疗既差，逃亡又重，伤愈归队者占极少数，而我军伤愈归队者可达伤员四分之三，两相比较，比率当大过



三点三五比一。"

"（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一年我军伤亡共三十三万六千人，被俘二千五百人，失踪一万九千五百人，合计三十五万八千人，内伤愈归队者约二十万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两年中，我军伤亡共七十四万三千六百人，被俘共七千八百人，失踪共五万九千五百人，合计八十一万零九百人，内伤愈归队者约四十四万人。"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两年中，我共毙伤敌军九十六万六千二百人，敌我伤亡相较为一点二九比一；两年我共俘敌军一百六十三万人，敌我被俘相较为二零八比一；两年我共消灭敌军兵力二百六十四万一千四百人，敌我兵力损失相较为三点二五比一。若除去双方伤愈归队人数，则敌我损失比率，当大过此数。"

"（五）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两年中，我军伤亡为我军兵力总损失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七，被俘为总损失的百分之零九六，失踪为总损失的百分之七点三四。两年敌军伤亡为其被消灭兵力全部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五，被俘为其被消灭兵力全部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七，起义者为其被消灭兵力全部的百分之一点七。敌军损失中的大部分为被俘，而被俘敌军的大部分（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又已加入我军，此外并有起义加入我军的部分，我军得此补充，即足以抵消全部损失而有余。"⑤

国民党军在战争第二年中，损失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共计152万。经过大量的补充，其总兵力保持在365万人左右，其中正规军285个旅（师）198万人，但大多数是被歼灭后重建的或受过严重打击的，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分布在第一线的正规军共249个旅（师）170万人，被人民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等5个战场上，大部分只能担任战略要点和交通线的守备，或在其附近地区作战役性机动，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兵力已经不多。留置在长江中下游和巴山山脉一线以南、兰州和贺兰山脉一线以西的后方广大地区，只有正规军36个旅23万人，大部分是新建的，战斗力很弱，而且被日益活跃的人民游击队所钳制，也难于机动。

"同国民党军力逐步削弱的情况相反，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作战，总兵力由原来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正规军149万人），同国民党军总兵力的比数，已由战争初期的1：3.4上升为1：1.3。由于后方稳定，兵力可以集中用于前线，在第一线的机动兵力已优于国民党军。全军的武器装备也大为改善。经过两年战争的锻炼，不但积累了丰富的打大规模运动战的

经验，而且在攻克石家庄、四平街、洛阳、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取得了城市攻坚战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各游击队也迅速壮大，到 1948 年秋已达到 4 万多人；并在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海南岛、粤桂边区等地区，建立和发展了游击根据地，威胁着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⑥

解放战争两年来的胜利，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术，特别是攻坚战术，有了很大的进步。国共两党力量的变化，说明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已经到了最后崩溃的边缘，人民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

注释：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 3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601 页。

②《祝五路大捷》，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一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1979 年版，第 48-49 页。

③《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一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1979 年版，第 51 页。

④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一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 440-441 页。

⑤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一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 444 页。

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786-787 页。

“戡乱总动员令”与“党团合并”

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引起了反革命阵营的极度惊慌。美蒋反动派为了挽救他们在中国灭亡的命运，进行垂死挣扎。早在1947年5月20日，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之前，国民党反动政府召开的伪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参政员纷纷反对和谈，要求对共产党下讨伐令，孔庚说：“主和者为现代秦桧”，燕树棠说：“不愿和谈，更讨厌和谈”，这类言论受到会场大多数人的鼓掌欢迎。该会决议“请政府速派大军清剿各地共匪”。

1947年6月30日，在刘邓大军南渡黄河的前一天，国民党召开中常会中政会联席会议，与会者有孙科、张群、陈诚、陈立夫等五十余人，会议由孙科主持。此次会议通过“加强剿匪军事”，多数主张颁发“讨伐令”。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四次政治委员会第六次联席会议之决议——国民政府关于中国共产党叛乱问题案。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武装叛乱，割据地方，破坏统一和平，危害国家民族，政府以政治方式解决之途径，已因共产党之迭次峻拒而告绝望，以保卫国家基础，扫除建国障碍，拯救匪区同胞，亟应命令剿办，戡平内乱。至如何动员一切力量，为迅速有效之实施，一并由主管各同志秉承总裁指示，详拟办法，提侯决定。”①

7月4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出席会议的“国府委员”有国民党的蒋介石、孙科、张群、居正、戴传贤、于右任、张继、邹鲁、宋子文、翁文灏、王宠惠、王世杰、蒋梦麟、钮永建、吴忠信、陈布雷，青年党的余家菊，民社党的胡海门、戢翼翘，“社会贤达”王云五等人。会上通过了蒋介石所提出的“理性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即全国总动员方案，并随后下达了戡乱动员令。方案指出：“共党自去年十月以来，始则拒绝政府颁布之停战令，继则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又复拒绝政府派员赴延安洽谈和平之建议，最近复由其宣传机关，对国民参政会之和平建议，断然予以拒

绝。政府方力谋整军，而共党则胁迫民众，大量扩充其叛国之武力。政府方力谋复员建设，而共匪则到处阻碍复员之进行，到处破坏我交通工矿之建设。政府方力图实现民建政治，准备行宪工作，而共匪则一面宣传民主，一面残虐人民，无所不用其极。”因此，为救匪区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且捍卫国家基础，安定社会秩序，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以“号召全民一致奋起，淬厉进行经济建设，刷新地方政治，发动人力物力，改善粮政役政，保持社会安全，救恤人民疾苦，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厉行消费节约，增进农工生产，提高官兵待遇等项，均交给各主管机关妥拟方案，制颁法令，一体依法进行。至实施时，应如何防止法外之滋扰，并饬主管机关严切注意。”[②]这时，所谓“少数党中自由人士”，进一步暴露其反共反人民的面目。青年党的余家菊说：“自应加强剿匪军事”。陈启天说：“余等对政府此一重大措施，完全表示赞同。”民社党的蒋匀田说：“对剿共戡乱一事，余等极表拥护。”张君劢说：希望“总动员案能获得所希望的效果。”各省市的伪参议会，国民党总办的所谓人民团体亦纷纷通电拥护“戡乱令”，并在各地召开所谓“戡乱建国动员大会”。

7月6日，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说，污蔑中国共产党“公开叛变”，要求“全国人民举国一致，戡平叛乱”。7月18日，国民党反动政府通令取消共产党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保留名额，并开除共产党参政员。19日，国民党政府又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十八条，其主要内容为尽力征发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为其血腥内战服务；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矿、金融和商业贸易，尽行加以垄断和管制：对人民的一切基本权利，如罢工、停业、请愿、游行，均严加管制，使一切逮捕、监禁和屠杀的暴行，得以借“戡乱”之名合法。如“第三条，戡乱所需之兵役工役及其他有关人力，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雇及妨碍征雇等行为，均应依法惩处；第四条，戡乱所需之军粮、被服、药品、油、煤、钢铁、运输、通信器材及其他军用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购征用妨碍征购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依法惩处；第六条，为安定民生，政府对于日用品之交易价格、各业薪俸工资及物资流通、资金运用，金融业务，均得加以限制或管理；第七条，为维持安宁秩序，政府对于煽动叛乱之集合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第十二条，增加合理的税收，控制非必要之支出以适应戡乱之迫切需要；第十四条，人民基本权利，均应切实尊重，妥为保障，除因动员戡乱所必需之各种法令，必须切实施行者外，任何法外侵扰行为，均应严行防



制；第十六条，违反本纲要第三条至第七条，或依据各该条所定办法，应行制裁或限制之行为者，依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惩罚之。"[③]很显然，这种"戡乱动员令"下的法西斯暴政，无疑是国民党反动派垂死前的疯狂挣扎。

国民党在发布"戡乱动员令"后，进而完全扫除旧政协时代的遗迹。1947 年 7 月 7 日，国民党政府下令撤销政治协商会议的名义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秘书处，同时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学生和民主人士，展开了血腥的迫害和镇压。8 月 2 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布了《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接着，在北平、上海、杭州、广州、西安以及东北各地，便有大批爱国民主人士，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而被捕。8 月 30 日，国民党六届中央常委会第 81 次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戡乱建国总动员方案》，规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全力协助征兵、征粮及保安工作，破坏"匪党"潜伏；在收复区全面严密搜查，根绝"潜匪"；在中共占领区设立行动小组进行破坏。以后，国民政府还颁布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国防军事实施办法》、《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粮食流通管理办法》、《动乱戡乱期间劳资纠纷处理办法》等法令，在戡乱的名义下，加强统治。

军事上，国民党公开放弃"整军复员"，而转而提出"剿匪第一"，开始征补兵员缺额充实第一线兵团以维持战斗力，建立第二线兵团作为国民党军队的总预备队，普遍加强民众组训以健全地方自卫组织、发挥全面战术等。自 1945 年 8 月到 1947 年 6 月，国民党政府拨发全国各省地方团队及警察武器，计步枪 423 422 支，轻重机枪 17 252 挺，还有手枪、掷弹筒、迫击炮等。法律成为统治者的护身符，"动员令"使反动派成了刽子手。9 月 27 日，蒋介石更亲自在南京召集各地特务头子举行秘密会议，布置对全国民主人士更大的迫害。据传初步列入黑名单拟于逮捕者，约有 6 万之多。仅上海一地预定逮捕三千人。十月的一个月中，上海、杭州、北平、保定、唐山、长春、西安、广州等八个城市惨遭屠杀者，有 2 100 余人。到 1948 年 3 月间，国民党反动政府更制定《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组织"特种刑事法庭"，在全国大中小城市实行恐怖的大逮捕和大屠杀。7 月 7 日，孙科在上海对记者谈动员令下达后，国民党政府对反对党派的态度时，杀气腾腾地说："总动员令下，绝对不容有反战情事存在"。"反对战争，即属反对政府，反对政府则必予取缔，严惩不贷"。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说："我个人蒙受如此的奇耻大辱，我仍然要百折不回继续奋斗，毫不灰心，毫不气馁，

我不忍放弃这剿匪责任，所以我能领导一般同志，艰苦奋斗，来完成戡乱建国的使命。”

国民党还试图与三青团合并，加强自身的力量。自三民主义青年团建立，发展很快。1939 年仅 7 万多人，到 1945 年超过百万人，1946 年达到 130 余万人，1947 年解散时约 140 万人。党团之间矛盾一直不断。部分三青团骨干一直认为国民党为腐败官僚所盘踞，希望三青团能取代国民党。1946 年 9 月，三青团召开二全大会，进行组织甄别审查，蒋经国跃升为中央常务干事。会上，一些激进分子提出另组新党，与国民党两党轮流执政。稍后的大选期间，一些党、团分子为争夺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名额甚至达到动武的地步。1947 年 3 月的六届三中全会即通过《党团关系案》，提出“党团关系亦应谋根本解决之道”。

为了避免党、团同归于尽，蒋介石作出了党团合并的决定。1947 年 9 月 9 日至 13 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联席会议。会议通过的党团统一组织颁发规定，“为集中革命力量，统一革命领导，以适应当前环境之需要，经由中央党部、中央团部决定，统一其组织。除省、市、县各级统一组织原则及其实施办法业经中央常会通过颁行外，关于中央党部团部组织之统一与机构之充实，订立办法如下：一、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一律为本党本届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干事一律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一律为本届中央监察委员，候补监察一律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全会通过后，提请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二、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额扩增为四十五人至五十五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名额扩增为十五人至十九人。其人选由总裁提请全会决定之。三、中央执行委员会除原有各部会外，增设青年部，为本党领导及组训青年之机构。其组织另定之。四、中央执行委员会各部，各设委员会，为决策及检讨机构。各部部长为当然委员，并为委员会开会时之主席。其办法另定之。五、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理论研究委员会，负对主义及政纲、政策之理论研究责任。其组织另定之。六、党团统一组织以后，为适应宪政时期之需要，本党组织之改进，由常会制定若干人成立研究委员会，负责研究具体方案，提出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④

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当前组织纲领》也提到：“吸收党员团员，应特别注意优秀农民、工人及青年知识分子，以为革命之主力”，“依据本党民主集权制之原则，各级领导干部应由民主之方式选举，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总裁领导全党，下级服从上级”，“党员团员应一律重新登记



为党员”，“登记合格之党员，应重新宣誓”，“党员重新登记宣誓后，应即编组，并依据民主原则，限期重新完成各级组织”。[5]1947 年 10 月 1 日，国民党与三青团正式合并，陈雪屏为首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 1947 年下半年采取所谓“联省剿匪”的反革命军事措施。在华中，蒋介石于 11 月电召国民党鄂豫湘赣皖苏六省主席到南京举行联席会议，筹建十五个绥靖区，并提高绥靖区司令官职权，使之掌握辖区内党政军大权。会后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由白崇禧坐镇九江统一指挥华中军事，并指导国民党鄂豫湘皖赣五省政务。在华北，蒋介石于十二月调整国民党在华北的指挥机构，设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傅作义为总司令，统一指挥国民党晋冀热察绥五省军事。在东北，撤销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由“东北行辕”负政治和军事全责，为了加强国民党东北军政的指挥，蒋介石于 1947 年 8 月派他的参谋总长陈诚兼任东北行辕主任。

然而，蒋介石的这一切倒行逆施的行为，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反抗和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走向破产。

注释：

①彭明：《国民政府关于中国共产党叛乱问题案》，《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六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 3 月版，第 254 页。

②同上，第 255-256 页。

③同上，第 256-257 页。

④同上，第 258-259 页。

⑤同上，第 259-260 页。

魏德迈来华和《援华法案》

对于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美帝国主义较之国民党反动政府更为惊慌。美国政府认为："虽然形式继续恶化，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和批评增加，但中国政府似无能或不愿采取有效步骤，解决摆在它前面的严重问题，看来倒反有一种消沉、失败主义和精神破产的感觉，这种感觉不可避免地造成心理上完全依赖外援来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办法，而不顾及情况的现实性，即中国自助自救的努力和办法，乃是唯一和基本的要求"，"鉴于这种情况，总统于1947年7月9日，照国务卿的建议，令魏德迈中将立即赴中国与朝鲜作一事实调查。"①7月11日魏德迈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率领使者团来到中国调查。

魏德迈的使华是由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议，为调查"由于急迫灾难的迹象"而来的。魏德迈在临行前，杜鲁门总统给他的训令说："即刻前赴中国，就中国现状及未来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情况，作一个估量。……在与中国居负责地位的官员和领袖们讨论时，你要表明你所负的是调查情况的使命，并表明只有中国政府能够提出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其能采取有效办法以趋向中国元气的恢复，美国政府才能考虑援助复兴的计划。再则任何可能提供的援助，必须由美国政府的代表监督的情形下，予以利用。"②由此可知，魏德迈来华的动机和目的，是积极设法加紧美援，及发挥美援在中国内战中的作用，以挽救蒋介石的败亡，进一步控制国民党反动政府。

国民政府方面对魏德迈来华访问诚惶诚恐，积极欢迎。"外交部长王世杰博士表示他的政府看法如下：中国政府与蒋主席欢迎魏德迈将军之奉派为美国总统代表，前来中国及韩国从事事实调查。魏德迈将军为中国一忠诚老友。当其在上次大战末期，在中国战区服务之时，其对中美合作所为之贡献，以及其在加强中国战区之成就，早为众所佩誉。余深信魏德迈将军之来访，必将使美国友人对中国局势获一完全了解，增进中美友谊与合作，并于远东局势之广泛稳定有所裨益。中国政府相信魏德迈中将的使命，将立即促

成大量的经济和军事的援助。由于同一原因，自由主义集团和反对派集团对这个使命感到怀疑，恐怕援助会延长内战，中国共产党的反应是极端仇恨的。”③

1947年7月22日，魏德迈以大使衔及总统代表身份来到南京，随行者有政治、经济、军事、新闻顾问等若干人。国民党政府向考察团提供了有关军事、经济、财政等多方面的报告材料，美国驻华外交官也为考察团准备了详尽的资料。此后，陈诚陪同魏德迈由南京飞往上海、北平、天津、汉口、青岛、济南、沈阳、广州、台湾等地考察，会见了中国方面的各派人士。他也多次与国民党要人会谈，与蒋介石进行商谈。此外，他也约见了民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李璜等人。代表团还收到信件2 000多份，其中有一小部分为匿名信件。8月22日，魏德迈出席国民党政府伪国务会议和部长联席会议，即席发表演讲，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组织、军事、经济各方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不能被武力击败，国民党政府在共产党猛攻之下屹立或倒台，决定于政治经济状况改进的效率与时机。他批评国民党政府组织机构的叠床架屋，呼吁彻底调整提高效率。他谴责已成巨富的人仍利用中国当前的不幸局面增加自己的财富，以及对政治犯和其他犯人错加或滥施刑罚。他建议，国有制度应予以停止发展，应鼓励自由企业，政府应鼓励建设性的批评，向公众公开政府的工作与活动。他十分严峻地指出，从财政的意义或从原料资源方面来看，中国离破产阶段甚远，中国实际上是精神破了产。他还表示形势比他预计的还要坏，对国民党政府各级官吏的腐败无能，大发雷霆，以致出席会议的国民党官员，也“普遍地认为他的讲话是一种侮慢”。但是，蒋介石却当场表示“乐于接受”。8月24日，魏德迈在离开中国，又发表了一个声明，重申了他的观点：“在今天的中国，我发现许多方面消沉而麻木。他们不寻求解决当前问题的办法，却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于责备外界的影响和寻求外界的援助。看到许多中国人的卑怯的失败主义，令人丧气”，要求国民党政府“必须立即实行激烈的、远大的政治经济的改革”，说“光靠军事力量是消灭不了共产主义的”。在这个声明中，他表示，代表团是在绝无约束与成见的情况下进行的考察，在动乱的中国，民众是人同此心地渴望和平。他一方面要求中共自动放弃以武力达到其思想之努力，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应立即重施严厉及远大之政治与经济改革，去除身居要职的无能腐败官员。

魏德迈回到华盛顿之后，于9月19日向杜鲁门提出了一个长达十万余

言的报告书，即著名的魏德迈亡华计划。他在报告中指出：“一个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共，对美国利益是有害的。”“一个援助计划，如果有效地执行起来，可以支持对共产主义的扩张的抵抗。且可有助于中国逐渐趋向于安定的发展。”④他认定，援蒋侵华是美国政府的世界扩张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对美国的反苏和向世界扩张，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报告提出了一个广泛的援蒋计划，计划在军事方面给蒋以海陆空各方面的援助，甚至提出“由美国人员积极参加作战”。在经济上，计划自 1948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一个五年为期的援助计划，而且只要该项美援能够有效的使用，则援助的数量可以无限制的。在政治方面，计划扩大美国顾问拟定政策和执行监督的各项权力。

他在报告书还特别强调，美援的运用必须放在美国顾问团的直接监督之下。鉴于东北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魏德迈在报告书中拟定了一项由联合国托管的阴谋计划。提出国民党政府“请求联合国立即设法促成满洲战争的停止，并请求将满洲置于五强监护制度之下，如不成，则按照联合国宪章置于托管制度之下”⑤，企图假借联合国之名，变相吞并东北。综上所述，他提出了援蒋的条件：中国将其要求援助的请求，告知联合国；中国要求联合国促成满洲的停战，并请求将满洲置于五强的监护或托管之下；中国应利用其本国的资源，改革其财政，改革其行政与军队，并于经济及军事方面，延用美国顾问人员。

自魏德迈来华调查之后，美帝国主义日益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和监督，1947 年 10 月 27 日，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侵害中国生产、贸易及财产主权的《中美救济协定》，美国以 2 700 万美元物资援助国民党政府打内战，但美援的运用计划、分配方法、分配机关、分配物资的作价和售价的动用，均须由美帝国主义派遣的代表团自行决定。同年 12 月 8 日，又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侵害中国国防、领土及领海主权的《海军协定》，规定美国享有对中国海军的监督权及获得中国海军基地的特权。19 日，美国国会通过给国民党政府“临时援助”1 800 万美元。到 1948 年 2 月 18 日，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交了 5.7 亿美元的咨文。美国参众两院争论的结果，达成给予国民党政府经济援助 3.38 亿元，特别赠款 1.25 亿元。1948 年 4 月 3 日，美国国会又通过 4.63 亿美元的《援华法案》。其中，特别赠款可供国民政府任意使用，国民党立即将这笔钱全部用于购买陆海空军用物资。至此，美帝国主义在日本投降后援助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内战的贷款、物资、



服务的总值共达到43.4亿美元，加上对日作战时期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共达59亿余万美元。

美国经济总署负责实施援华法。1948年6月6日，美援驻华代表来普汉来华。他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先后会见了贝祖贻、翁文灏、王世杰、蒋介石、司徒雷登等人，协商援华物资处理计划。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美援运用委员会。美援由美国经济合作署中国分署与中方的美援运用委员会合作讨论决定美援的运用问题。美援技术调查团（团长史蒂尔曼）也同时来华。美国援华技术代表团考察了中国湖北大冶钢铁、粤汉铁路、湘黔路沿线矿产、广州黄埔港、台湾高雄港等，强调中国如欲获得更多美援，当自助。

随后，1948年7月3日，由司徒雷登与王世杰代表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美蒋双边协定中，美帝国主义的监督权就更为广泛和严格。其中规定，美帝国主义对美援有最高的决策权，美援物资和款项须在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开设特别账户，美方有权决定该项存款对美元的折合率，并且得和国民党政府共同协商外汇政策，其中还规定，美方得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拟定各项财政方案。8月5日签订的《中美农业协定》中，规定美方代表两人和蒋介石代表一人成立所谓的"农业复兴委员会"，反农业的生产、农业品的销售、土地的灌溉和牧畜手工业等各项计划，均由该委员会拟定和监督实行。

10月，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援华计划处处长克里夫兰赴华，宣布援华共有计划中增拨3 775万美元购买美国面粉。自1948年4月至10月，美国12 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汇中的88 275 170美元已移交国民党政府，占援华军事基金的75%。12月，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来华活动，翁文灏希望在美国国会通过新援华法案前及时另拨暂时性援助，但霍夫曼最后宣布暂时停止价值7 000万美元的长期中国建设复兴计划贷款。顾维钧在美国作呼吁、宋美龄到美国游说乞求美援，都没有得到成效。

此外，在金融方面，1947年9月6日，美国人杨格掌握国民党政府的金融监督权。在文化教育方面，1949年11月10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帝国主义签订所谓的《美国对华教育基金协定》，蒋介石正式承认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的监督权。

美帝国主义对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加紧，不仅表现在经济物资、财政金融和文化教育方面，特别表现在军事方面。魏德迈来华之后，美国顾问的人数扩大了。据12月美联社讯："陆海空顾问人员总数将增至五千六百人。其中陆军三千六百人（目前为三百人），空军一千六百（目前为三百人），海

军四百人（目前为一百十六人）”，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从部到各厅、处、局，都有美国顾问广泛地参加工作。美国顾问团的职权，就从训练国民党军事人员扩大到参加蒋介石的“国防”工作和作战计划。这样，美帝国主义就直接与全面控制了蒋介石的军队，并控制了中国许多的军事基地。

美帝国主义通过一系列的协定和援助，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军事、政治、财政、贸易和文化等主权，而蒋介石反动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也更加疯狂和残暴。

注释：

①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着重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九年时期（上卷）》，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出版，1957 年版，第 207–208 页。

② 同上，第 208 页。

③ 同上，第 209 页。

④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着重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九年时期（下卷）》，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出版，1957 年版，同上，第 734 页。

⑤ 同上，第 736 页。

国民党“行宪国大”的召开

1946年底，蒋介石反动集团为了欺骗人民和镇压革命，曾召开伪“国大”和制定了一部伪“宪法”。按照蒋介石及其党徒的原定计划，是打算在“制宪国大”之后，接着搞一个“行宪国大”。所谓“行宪”，就是让蒋介石登上总统宝座，把主席名义的法西斯独裁改变为“总统”名义的法西斯独裁。在军事形势继续恶化的情况下，蒋介石不顾党内的反对，抓紧行宪国大的筹备工作，以期通过法定形式，巩固和加强自己的集权统治。

是否在1947年进行国大代表选举，在党内有着不同的意见，但是蒋介石依然坚持己见，召开国大。1947年7月，国民党中枢确定了“戡乱”和“行宪”同时并举的方针，但在实际贯彻中，国民党的许多组织和党政官员则更热衷于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的选举和竞选，其“戡乱”工作难免受到干扰，党内外关系也日趋紧张。这些情况引起了一些国民党人的忧虑和不安，于是，在是否应该如期召开国大的问题上，党内产生严重分歧。部分党员认为在此内乱外患之时，应延期选举。然而自从魏德迈访华指责国民党“许多占据负责地位的人”，“消沉”、“麻木”、“贪污”、“渎职”和充满“卑怯的失败主义”，敦促国民党立即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并称中国的恢复“有待于令人振奋的领导和道德及精神上的新生”之后，蒋介石怀疑美国是否有意“逼他退休或改职”。为此，他一意孤行，尽快召开行宪国大，以显示自己的能力和威望，并造成当上法定总统的既成事实。11月初，孙科、居正、于右任、戴传贤、张群等10名中执委常委就国大应否缓开的问题再“详加研究”，多数人认为此时举办选举确实不合时宜，不仅会“使各地党政工作同志置戡乱工作于脑后，用全力于办选举或竞选”，且“按现在各地竞选情形，选举完毕后，本党内部一定分崩离析、同志变成仇人，民青两党必因不满选举结果，横生枝节，甚至要退出政府”。那时，“国事不堪再问矣”。但蒋介石依然顾我，无动于衷，批示：“选举不能停办，应如期举行为宜。”①

1947年11月21日至23日，按照南京国民政府的规定，国统区进行普选国大代表。根据选举法规定，每县市各选国大代表1名，人口超过50万者，可增选1名。另蒙古代表57名、西藏代表40名，各民族在边疆地区选出者34名，华侨65名，职业团体487名，妇女团体168名，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选出者17名 。选举法还规定现任官员不得当选为所在地区的国大代表。[②]

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民众对于这次选举"委实不感兴趣"，纷纷避选或弃权。"广州应有选民65万人，实际投票的不及5万人，北平选民们的选票上有的写'不知道'，有一张写的是白面、小米面、玉米面的价格。首都南京的场面也颇寥落，各投票所人数多者不足选民的1/3，少者不足1/10，选民弃权者半数以上，玄武门投票所选民总数为7 200人，仅投票者522人"。[③]有的选举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干脆越俎代庖，冒充选民投票。面对选举中的种种不法行为和舞弊现象，国民党当局一筹莫展，虽曾发出"训令"，要求"严切禁止"，"设法纠正"，但也无济于事。

最终，"全国选举结果，应选3 045人，实际选出2 961人。为拉拢青年党、民社党，国民党拟定的国大代表数字为国民党2 000，青年党400，民社党300，而实际当选结果，青年党仅76名，民社党68名"。[④]这一结果又让国民党中央当局的计划完全落空。民社党、青年党代表被挤掉大半，国民党中央提名代表亦有256名落选。为此，南京政府第16次国务会议又作出《政党提名补充条例》，规定国、民、青三党党员参加竞选"须由各所属政党提名"，这一决定实际上就取消了原《国民大会选举罢免法》中经五百名以上选举人签署提名，可"得登记为候选人"的规定，致使众多的经选举人连署提名当选的国民党代表归于无效，因而招致大多数国民党员的抵制。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公布《关于国大代表本党党员与友党党员退让实施办法》，要求数百名经连署提名当选的国民党党员退出国大代表资格，此举又激起党内的强烈不满。国大代表签署候选人成立"联谊会"，发起"护宪运动"，要求政府切实执行《国大代表选举罢免法》。经中央提名而在地方选举中落选者，亦成立"联谊会"，发起"护党护法"运动，要求政府执行《党员竞选办法》和《政党提名补充条例》。双方各持理据互相公开指责，闹得不可开交。国民党中央当局几次派要员说服劝阻，都无济于事。在这种纷乱不止的情况下，1948年3月27日，蒋介石发表《为解决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纠纷的声明》，以国民党总裁和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宣布他要依据

"党的协议"、"党的决定"、"党的纪律"，"对本党同志应否当选代表，能否出席大会之问题，行使党章所赋予之最后决定权，予以决定"。他要求党员要"体念党的决策"，"遵守党的纪律"，协助他"解决此迁延不决之问题"。该声明发表后，一些党员因惧怕"执行纪律"而有所收敛，但思想上并未解决问题。

1948 年 3 月 29 日，行宪国大在南京开幕，仅有 1 679 名代表出席开幕式，略超过代表总额的半数。蒋介石致开幕词。他标榜这次大会是"中华民国实行民主宪政的开始"；强调"戡乱与行宪应该同等重视"；说明"大会的使命，只是行使选举权，以完成中华民国政府的组织"。会议上冲突不断。首先，国大代表们嫌主席团原定人数太少，无法满足需要，从而迫使蒋介石令立法院召开临时会议，将人数由 25 改为 85。其次，多数代表对蒋的开幕词和《国民大会议事规则》不满意，认为"大会职权太嫌空洞"，要求扩大国大职权，起码也应使国大有"顾问国是"之责。会议经过争吵，于 4 月 8 日通过扩大国大职权的条文如下："国民大会开会时，得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检讨国是，并得提出质询建议"。于是，会议从 9 日起，即安排政府各部门的施政报告和代表发言。会上，蒋介石作了经济军事报告，白崇禧、俞鸿钧、王世杰等分别就军事、经济、内政、外交等问题作了报告。许多代表们纷纷表示出了对时局的不满。

此外，在总统选举尤其是在副总统选举中，突出地表现出国民党中央内部各派系之间更加尖锐的对立。为了讨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问题，国民党于 4 月 4 日到 6 日召开临时中央全会。蒋介石在讲话中提出了总统候选人的五个条件："（1）了解宪法，认识宪政，确保宪政制度；（2）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3）忠于戡乱建国之基本政策；（4）深熟我国历史、文化及民族传统；（5）对当前之国际情势与当代文化有深切认识。"并提出"吾人可提一具有此种条件之党外人士出任总统候选人"。并称他在"国家未能统一"之前，"决不竞选总统"，而"愿担任政府中除正副总统外之任何职责"。[5]蒋介石假意不愿出任总统，实际上是嫌制宪国大通过的《宪法》对于总统权力有一定的限制，同时是为了刺激党内代表们对他领导能力日益不满的心理，从而能够获得他们的同情，加强自己的地位。司徒雷登称蒋介石的这一行动，"是一个巧妙的政治手段"。结果，正如司氏所说："这一手段大大加强了蒋委员长的地位"。大多数党内干部和国大代表深恐此举会削弱"国民党对政府的控制"，CC 派和黄埔系甚至声称，"拒绝与任何非由委

员长担任总统来领导的政府合作”。

为了让蒋介石再度出马，国民党当局提出“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战乱时期得为紧急处分。4月15日，莫德惠、胡适、谷正纲等提出《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主张：“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和人民遭受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三十九条或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18日，该案在大会上通过。宪法第39条规定，总统依法宣布戒严，但须经立法院之通过或追认。立法院认为必要时，得决议移请总统解严。第43条规定，国家遇有天然灾害、疠疫，或国家财政经济又重大变故，须为急速处理时，总统于立法院休会期间，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依紧急命令法，发布紧急命令，为必要之处置，但须于发布命令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立法院不同意时，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取消了宪法中对总统权限的最重要的制约权，这样，总统的权力便不受《宪法》限制。4月19日，国民大会进行总统选举，蒋介石以2 430票当选为行宪后的第一届政府总统。

副总统的选举更是矛盾重重，集中反映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明争暗斗。之前，蒋介石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并内定孙科为副总统，压迫李宗仁退出竞选，但由于李宗仁的极力反对，被迫取消。4月23日，伪国大开始选举副总统。参加副总统竞选的候选人有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溥霖六人，其中最有竞争力的是李宗仁和孙科。李宗仁不仅有桂系实力派作后盾，而且因其平时作风比较开明，在党内颇得一些人的好感。美国人亦认为李是“建设性改革的象征”，从而暗中给予支持。孙科原本无意参加副总统竞选，只想稳坐立法院长的交椅。但蒋介石深知程潜、莫德惠等人均非李宗仁的对手，为阻止李上台，遂反复鼓动孙科竞选，孙科于3月16日声明参加副总统竞选，被时人称为候选人中的一匹“黑马”。孙科由于占着是孙中山后嗣的特殊地位，又有广东实力派和CC派的支持以及蒋介石的暗中撑腰，实力与李不相上下。副总统的选举，因依据选举法规定，无人得到超过代表总额一半的票数，所以连续举行了四次，由于中途所有候选人放弃参选，以致“国大”被迫停止。直至蒋介石多方疏通，劝请各候选人取消放弃竞选，才于4月28日重新召开。

经过多次斗争，4月29日，李宗仁以1 438票，战胜1 295票的孙科，当选为副总统。选举产生的五院院长分别为：立法院院长孙科、行政院院长



翁文灏、监察员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院长张伯苓、司法院院长王宠惠。其中，立法院长、监察院长分别由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互选产生；行政院长由蒋介石提名，立法院会议通过；考试院长、司法院长由蒋介石提名，监察院全体会议通过。总统府设资政、参议若干，秘书长、参军长各一。

行宪后的政府在组织体制上与训政时期有所不同。国民大会具有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权力，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监察院职能为同意、弹劾、纠举、审计，并得提出修正案，三个机构共同具有西方国家国会的职能。总统职权方面，在行宪前国民政府主席依法定程序任免五院院长，行宪后总统只能依法任免行政、司法院长，立法、监察成为民意机关，不再是国家元首脑的下属机关。监察院委员由训政时期院长提名改为各地方议会选举产生，"不得兼任其他公职或执行业务"。考试委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1947 年宪法司法院职权为司法审判、行政审判、公务员惩戒、对宪法与法律进行统一解释。机构设置上由大法官会议行使解释法律的权力。在司法问题上规定法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总之，迫于内外压力，国民党在实施宪政后政府的组织形式、职能均与训政时期有所不同。

国民党从 3 月 29 日到 5 月 1 日的"行宪国大"以及其伪总统的选举，为历史上演了一场闹剧。正如新华社在《旧中国在灭亡，新中国在前进》的社论中指出的一样："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一年所追逐的最后一出戏，已经演过了"，"这出戏演得这样难堪，以致人们不知他们是在作喜事，还是在出丧。所有蒋管区一切中外报纸刊物和通讯社，包括国民党各派的报纸刊物通讯社在内，毫无例外地每日不停地宣扬和嘲笑着'国大'的各种丑闻"。[⑥]正是这场闹剧，宣布了蒋介石统治即将走向灭亡，在一片嘲笑声中，蒋介石将下坡路走到了尽头。

注释：

①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2)，中央委员会，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 年 9 月版，第 813－814 页。

②魏宏运：《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 517 页。

③同上，第 517 页。

④同上，第 517 页。

⑤《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7 年 12 月版，第 857-858 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 1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 639 页。

国统区经济进一步崩溃

国民党统治区在出现深刻政治危机的同时，其经济也进一步走向全面崩溃的境地，整个国统统区内负债累累，金融破产，通货膨胀恶性发展，从而导致物价暴涨，形势急剧恶化。

国统区经济危机全面加深，工厂的经营状况十分差。1948 年上海 3 000 多家大工厂开工率只有 20%。上海申新一、三、四、六、九 6 个厂家，1947 年的棉布生产量仅及 1936 年的 49.2%。天津市的 8 867 台织布机，只有 4 867 台在开工。有名的江南丝织业濒于破产，无锡的 2 000 多架丝车，1948 年年终时已停了 80%。[①]

由于国统区物价飞涨、工厂经营状况差，国统区工人斗争不断。9 月 22 日到 9 月 29 日，上海电力工人举行大罢工，使上海半数以上电、汽车停驶，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12 月 30 日这一天，上海英美烟草公司颐中烟厂 12 000 名工人为改善待遇开始举行“年关”大罢工，上海海关职员也举行罢工并开展绝食斗争。据朱学范 1948 年 8 月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的报告统计，1947 年这一年里，全国参加罢工的工人达 320 万以上，罢工斗争波及上海、天津、北平、武汉、杭州、宁波、青岛、济南、唐山、广州、汕头等 20 多个大中城市，和水电、邮政、海关、铁路、交通、机器、纺织、丝织、卷烟、化工等 50 余个行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罢工浪潮。

1948 年 1 月 30 日，上海申新九厂工人举行“申九”大罢工，遭到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三人牺牲，重伤数十人，被捕二百多人，造成“二二申九”惨案。1948 年 3 月，北平市 20 家报业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全体举行罢工。上海申新纺织第二厂 2 000 余人为要求职业保证，抗议解雇工人举行罢工。上海秦利铁厂工人 800 余人，抗议厂方无理解雇工人。4 月，京沪铁路工人 3 000 余人进行“哑口”斗争，工人齐至铁轨上一言不发，进行“卧轨罢工”，使南京到上海的主要交通动脉顿时陷于停顿。5 月，南京 4 000 余名三轮车工人举行总罢工，反对资方将租金从每日 15 万抬到 25 万元及将押

金增加到400万元的无理措施。7月，沈阳市全体铁路工人1.4万名为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举行罢工。国民党铁路当局慑于工人的声威被迫“允予较好的生活条件”。1949年2月16日，上海公共汽车公司、法商电车公司等6大公用事业公司工人为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增加配给食米举行全体大罢工，遭镇压，七八十名工人被捕。17日，国民党京沪杭区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下令枪杀上海交通汽车公司工人运动领袖钟泉周（职工福利会理事长）、顾伯康、王元三人。18日，浙赣铁路工人不顾反动派镇压，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善生活待遇，奋起举行全体罢工。国统区工人不断举行大罢工，给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使得蒋介石反动统治摇摇欲坠。

除此之外，经济风潮和抢米风潮也是蒋政权经济崩溃的表现。1947年春，国统区金融市场普遍上涨，有时一天内涨价5次，法币价值暴跌，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6月21日，皖南绩溪、旌德、宁国、泾县、芜湖、宣城、广德等8县近万名饥民抢米，公粮万余担被饥民抢光。26日，四川省隆昌千余饥民围攻县政府。与此同时，灌县、内江、大足等数十县均先后发生饥民抢米事件。

1947年12月10日，国民党政府发行2万元、4万元及10万元大钞，及所谓1 000元、2 000元、5 000元三种票面的大额新关金券。13日，大米每担达法币350万元，面粉每袋140万元。23日，沈阳饥民将两家米店抢光。

1948年1月1日，沈阳物价又大涨，至2日，大米每斤由法币6万元涨至9万元；高粱米每斤由3.8万元涨至4.5万元。2日，天津粮价猛涨，大米由每斤8 100元涨至1.85万元；小米由每斤5 600元涨到1.2万元。5日，上海米价猛涨，米每担涨至150万元，为抗战前的15万倍。

2月16日，上海物价出现了第一次暴涨，大米每担210万元，一日内涨幅达15%。其他物品如肥皂、火柴、香烟、毛织品、玻璃品等均上涨15%到40%。17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平、津、穗、沪、京五市市长粮食配售会议。通过五市配售粮计划纲要，拟具五市粮食配售通则。纲要和通则规定市民凭证每月配售粮额（米面等量，一斗即15斤），每月配售一次，暂定四个月，自3月或4月开始实行。

2月25日，上海物价第二次暴涨，大米每担法币300万元，较1月2日每担150万元上涨一倍，较去年2月之最高价每担12.8万元，上涨23倍以上。3月9日，上海米价每担420万元，较1月份涨1倍半以上，较去年底



则涨了3倍，较抗战前涨了42万倍。10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发表声明，称“估计约价格5亿美元现在太平洋诸岛上的剩余物资，已根据‘就地运取’的原则，售与中国政府，由中国政府接受”。19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议案，其中以5.7亿美元为对华的经济与军事援助，为蒋介石输血打气。

5月4日，国统区开始爆发第三次涨风。上海大米每担达470万元，冲破第二次中的每担450万元之最高纪录。6日，上海大米每担突破500万元大关。8日更达580万元。11日，上海大米每担达到600万元，为年初6倍。面纱及其他物品亦在飞涨之中。

6月5日，上海物价开始本年度第四次暴涨。8日，大米每担价已涨至800万元，为年初之8倍。9日，黑市美钞美元涨至160万元，为年初10倍；黄金每两涨至8 000万元，1日内即上涨700万元。14日，上海黑市美钞比价190万元；15日午即210万元。半个月内法币贬值百分之百。黄金同时每两涨至1亿1百万。大米批发价每担1 100万元，较1936年每担10元，上涨110万倍。

蒋介石为了解救经济危机，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唤取美元。1948年7月3日，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与美国代表司徒雷登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规定：美国供给国民党政府27 5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中国政府对美利坚合众国因其本国资源中缺乏或可能缺乏而需要之中国所产物资移转于美利坚合众国，无论系为储备或其他目的，将予以便利。”[②]国民党政府利用这批美援，于7月18日对行将崩溃的经济采取了重大措施，宣布发行美金券1万、2.5万、5万及25万四种新大钞。7月24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发表广播讲话，其中宣称：“政府决定实施粮食征实征借的办法。”27日，国民党中央银行在东北发行流通券200万、500万元两种大钞。7月26日，上海《大公报》报道：沈阳民营工业各厂相继倒闭。计机械铁工厂光复后开工者460家，本月中旬倒闭540家。

为了挽救经济危机，国民党政府于8月19日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这些办法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法币及东北流通券停止发行，所有以前发行之法币以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东北流通券以3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金圆券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

限。”还规定限制各地物价，冻结在1948年8月19日的水准上等。此即为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所谓“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之举措。随之，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通令各地物价改算金圆券以19日当地物价为准，财政部通令全国银行、钱庄实行金融冻结停业2天。23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发行金圆券。

为了执行紧急处分令，行政院设置了经济管制委员会，翁文灏兼任主任委员，在上海、天津、广州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21日，蒋介石任命俞鸿钧、张厉生、宋子文分任三地督导员。26日，经济管制委员会通过了限制利息，“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违法限价处置办法”、禁止石油出口等。

最初，金圆券的发行依靠行政手段，物价被控制。一个多月内，全国兑出金圆券6亿多元，收兑金银外币折合美金超过1.5亿美元。仅上海一地一个月内即兑换金圆券2亿元以上。但是，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物价被强行限定后，许多商品有价无市。一些奸商藏匿货物，囤积居奇，并在市面上制造哄抢。而且在限价之后，一些工厂买不到原材料，无法开工，又加剧了物资短缺。

10月初，上海出现抢购风。先是呢绒、纱布，接着是大米，抢购风越演越烈，黑市买卖猖獗。政府又增加了各种税额，更加刺激物价上涨。物资抢购与物资逃匿使市场有价无市。11月1日，行政院公布《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不得不宣布取消限价。这样，与发行金圆配套的限价政策首先失败了，此后，物价不断飞涨。

11月2日，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出席立法院为经济改革失败召开的质询会。翁在会上承认关于收支平衡、抑制高利贷、增加银行存款、吸收外币外汇存款、制止资金逃避、稳定市场价格、增加生产、提高输出贸易、吸收侨汇等之目的及调整重要物品价格和国营事业价格、调整工资、调整公教人员待遇之目的已完全失败，并造成了“新通货的膨胀”。

由于国民党经济改革政策失败，全国物价狂涨。在上海，从11月4日到10日连续发生近百起抢米事件，抢米人数在两万人以上。8日，上海出动7万多名军警宪特在市内“大清查”，对人民群众进行镇压。同日，南京饥民也发生抢米事件，并持续两天。

11月13日，由翁文灏主持，在南京召开粮食会议，没有提出可行办



法。21 日，宋美龄在南京对美国发表广播讲话，乞求美国政府从速援助国民党政府。24 日，驻美大使顾维钧谒杜鲁门，呼吁美国政府给予“更多更快”的军事与经济援助。

11 月 13 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取消金圆券发行的最高限额，发行额突破了 20 亿大关，形成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到 1949 年 6 月，发行量达到了 1 303 046 亿元，为原定发行额的 65 152 倍。到 1949 年 5 月，需要 500 万金圆券才能买到 1948 年 9 月 1 元金圆券能够买到的东西。一些地方，国民党机关、部队也拒绝金圆券。13 日同日公布的《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规定黄金 1 两兑换金圆券 1 000 元，美金 1 元兑换金圆券 20 元，允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这又引发了人们以金银兑换金银外币的热潮。后因拥挤过剩，以致发生挤死人的惨剧，到 1949 年 1 月全部停兑。

金圆券发行的失败，使财政部长王云五、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先后辞职。1948 年 11 月 26 日，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孙科上台后，曾颁布《金圆券存款兑现办法》，也无法改良状况。

12 月 24 日，上海主要物品普遍上涨。大米零售每担 500 元，面粉每袋达 205 元，其余杂粮一致上涨三四成左右。纱布价亦涨，42 支兰风高至 2.9 元，其他丝绸涨三成。卷烟涨一二成，肥皂火柴等日用品亦涨三成余，呢绒、绒线、橡胶、棉纺品涨二三成。

1949 年 1 月 8 日，上海公用事业：水、电、煤气实行加价，平均上涨一倍半。美汇、煤、油料较上月上涨 3 倍多。10 日，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将中央银行现金转移到台湾。16 日，国民党行政院政务会议决定废止存兑金银办法，发行黄金短期公债（定额 200 万两，发行日期为 2 月 1 日、6 月 1 日两期各发半数）。

1949 年 7 月 2 日，国民党政府公布《银元及银元券发行办法》，规定以银币为中华民国国币，银元以元重 26.6971 公分，辅币为 1 分，5 分，2 角，5 角，但实际未及发行。中央银行发行银圆兑换券及辅币券。兑换券面额为 1 元、5 元，10 元，50 元，100 元。辅币券面额为 5 分，1 角，2 角，5 角。公私收付以银元计，各级政府税收及公营事业收费，应一律收受银元兑换券。7 月 4 日开始发行银元券。发行银元券只不过是金圆券命运的重演。在

次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财政部部长徐堪信誓旦旦地表示决不以印刷机办财政祸国殃民，但银元券只发行了2 500万元，便随着大陆的解放而失去了价值。

面对物价飞涨、工厂危机、工人罢工，甚至出现抢粮风潮，不管是发行金圆券还是银元券，都已经无法挽回国统区的经济危机了，国民党的统治已经穷途末路了，国统区经济进一步崩溃。

注释：

①魏宏运：《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页。

②《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7年12月版，第1021页。

“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的深入发展

随着内战不断扩大，国统区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人民生活极端困难，不但工农群众深受其害，就是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教师生活也挣扎在饥饿线上。他们为求生存，继续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其中重要的事件有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全国学生反内战日活动、于子三惨案、同济流血事件、反对查禁华北学联斗争、“七五”流血惨案、国民党公布抓人名单等。

武汉大学是当时华中民主运动的中心。1947 年，反饥饿、反内战的爱国学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高涨时，1 月 5 日，武汉大学联合华中大学、武昌艺专、省立医学院、农学院以及博文、安徽中学等，为沈崇事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美抗暴游行。5 月 22 日，又联合上述院校，为反内战反饥饿，举行了声援南京“五二〇”血案大游行。他们喊出“我们要饭吃，我们要活命”等口号，并到湖北省政府请愿，但无结果。恰在这时，华北学联号召全国学生举行“六二”反内战总罢课大游行，武大学生立即响应这一号召，并着手进行准备工作。

5 月 31 日晚，武大学生举行盛大的文娱晚会。就在这时，武汉警备司令部彭善召开军警特宪秘密会议，武大有 7 名反对学生参加了这次会议，审定了捕人名单，布置了两股军警分别到武大和华中大学。1947 年 6 月 1 日，国民党政府同时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开封、杭州、贵阳、昆明、重庆等大中城市，开始全国规模的疯狂大逮捕，妄图扑灭学生运动的烈火。凌晨 3 时左右，全副武装的军警宪特冲进了珞珈山，包围和封锁了整个学生宿舍。戴着面罩和黑眼镜的特务拿着黑名单，逐舍逐室搜捕。他们捕捉和绑走了几十名无辜的学生。学生们向他们质问：“为什么把我们同学抓走?”“我们同学有什么罪?”“反内战、反饥饿，难道不应该吗?”学生们与

敌人英勇搏斗，军警竟用美制汤姆式冲锋枪朝学生扫射，投掷手榴弹，当场3名同学牺牲，17人受伤，还抓走教师5人，学生14人，工友3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武汉大学“六一”惨案。惨案发生后，学生自治会、教授会和讲师助教会都发表了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并组织了武汉大学赴京控诉代表团，向全国人民揭露控诉反动派的残暴罪行。6月16日，北平学生为抗议武大“六一”惨案总罢课一天。清华大学在追悼死难烈士时写道：“你们的死告诉了我们：今后的道路不是消极的呼吁和要求，而是应更坚决地行动……从现在起，我们决不对反动派存在任何幻想，我们已经明白，要和平、要温饱，只有一条路——倾倒法西斯的巢穴。”[①]

6月2日，是全国学生反内战日。国统区所有大中城市戒严。在这种极度的白色恐怖中，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中共各级城市工作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精神，以及中央最新的指示，中共地下组织决定改变学生爱国斗争的方式，由示威游行化为分散运动。这一天，上海、杭州、北平、天津等地学生召开了“内战牺牲军民追悼会”。各地学校文艺团体，分别演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文艺节目。昆明36所大中学校举行了示威游行。

北大在这天举行了“内战牺牲军民追悼会”。师生们在6月1日就在红楼操场上举行了“民主广场”命名典礼，并召开了“受伤同学返校大会”。会后，华北学联公布了几项决议：（一）6月2日总罢课一天；（二）为死难于饥饿及内战的军民与内战牺牲的烈士，举行追悼会；（三）该日暂不举行游行。6月2日，国民党北平当局如临大敌，城门紧闭，戒备森严。清华、北大等高校分别在校内举行了“内战牺牲军民追悼会”。6月15日，全国学联成立。华北学联、武汉学联及京、沪、苏、浙、豫五区学联等在上海召开秘密学联会议，确定全国学联在国统区斗争的方针，继续进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与此同时，平津学生在运动中，又建立起了进步青年姐妹组织“民主青年联盟”。

10月29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惨杀在狱中。这一惨案引起了国统区学生反迫害、争自由运动的新高潮，卷入这场斗争的青年学生达10万人以上。当于子三被惨杀的消息传到幽燕时，北平学生立即掀起了一场抗议国民党特务惨杀于子三的运动。华北学联发表了《反迫害、反屠杀、反污蔑罢课宣言》。11月6日，在北大民主广场上召开了追悼于子三大会。北平各大中学举行全市总罢课，抗议国民党政府杀害于



子三和在全国各地逮捕屠杀学生的暴行。4日到8日，北平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昆明36所大中学校等均先后举行罢课，抗议国民党杀害于子三。7日，北平学生举行了于子三烈士追悼会，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镇压，当场捕去6名学生。为此，8日，华北学联号召华北国统区所有大中学校总罢课两天，为声讨蒋介石反动派在学生罢课期间的新暴行。

1948年1月29日，上海同济大学校方根据国民党制定的《修订学生自治会规则》，下令禁止经学生选举产生的学生自治会活动，并先后开除学生自治会理事长等22名学生干部。为此，同济大学学生为反对国民党训导处开除学生，争取学生会的民主权利，从18日起，实行罢课。29日，学生自治会决定派代表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交大、复旦、暨大及圣约翰等27所学校5 000余学生，前来欢送和支援同济学生代表。国民党当局出动装甲车数十辆，阻拦同济学生代表赴京请愿。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亲自指挥3 000余名军警，用马队冲，马刀砍，学生受伤者69人，其中重伤3人，33人失踪。晚上又有200余人被捕，造成"一·二九"同济流血事件。蒋介石还嫌镇压不力，指责吴国桢"姑息养奸，以贻后患"。3月15日，国民党法院对在"一·二九"同济流血事件中被捕学生进行审判。同济大学及各校学生1 000余人举行游行，并到法院"听审"。他们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100多名学生涌进法庭，亮出两面红旗："英勇斗争，意志坚强"，"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并向"被告"献花，迫使法院全部释放了被捕学生。

国民党当局于3月29日在所谓行宪国大开幕之际，发布查禁学联的命令，华北学联被查禁。为了保卫华北学联，北大、清华、师大、燕大、中法、朝阳、铁院、南开、北洋、唐山工学院等十大院校，自4月3日起开始总罢课。接着，4月6日，各大学的讲师、助教、职员和工友为"争取合理待遇"，宣布罢教、罢职、罢工，北平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宣布罢研，北大医院的医师、护士宣布罢诊。形成了华北人民运动历史上空前的"六罢合一"的"四月风暴"。各校师生员工，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反饥饿、反迫害的风暴，冲击着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特别是对刚刚开始的"行宪国大"给了一个迎头痛击。

1948年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东北90%以上的土地以后，国民党政府在4月份下令将沈阳的几所大专院校南迁北平，宣称教育部在北平已经成立

临大、临中收容东北的学生，然而学生们到北平以后就发现是场骗局。7 月 4 日，北平报纸登出北平市参议会《救济东北来平学生决议案》，要对东北学生“予以严格军事训练”，考察其背景身份，对于“思想纯正之学生，暂时按其程度分发东北临大或各大学中学借读”，对于“其身份不明，思想背谬者，予以管训，不合格者，即拔入军队入伍服兵役”。《决议案》还指出“停发东北各国立学校之经费及学生公费”。其实，国民党当局把东北学生骗进关内，只是为他们打内战当炮灰。明白过来的东北学生终于爆发了。当天，15 所东北院校的学生会代表，齐集长白师范学院住地开会，决定在 7 月 5 日联合到市参议会抗议，要求市参议会取消该决议。7 月 5 日，东北学生 5 000 人游行到市参议会要求面见许惠东失败。之后前往北长街李宗仁副总统住所请愿，在遭到推托之后又返回“找许惠东算账”。下午 5 点，在谈判之中，学生代表打算撤离之时，国民党青年军二〇八师的刽子手对着手无寸铁的同学两次射击，接着开来两辆卡车，国民党士兵把受伤和牺牲同学横拖上汽车拉走，紧接着工兵们用水龙头冲洗街上的血迹，造成 9 人死亡、38 人重伤、100 余人轻伤的“七五”流血惨案。

“七五”惨案之后，形势更加险恶。国民党在报纸上发出“清除职业学生”的叫嚣，进步学生一出校门，就受到特务和由地痞、流氓组成的“人民服务队”的盯梢跟踪。8 月中旬，几十个进步同学同时接到“铁血铲共会”的恐吓信。19 日，北平各家报纸齐登国民党当局要逮捕审讯的 250 名大学生名单。同日，北平特刑庭向各大专院校发出传票，限令这 250 人在 20 日投案。接着又公布了第二批和第三批名单，共 463 人，其中北大学生 247 人，占第一位。

中共北大地下党组织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决定发动群众展开斗争，击退敌人迫害。首先，将名单上的人，不论是地下党员、民青、民联盟员和进步群众，都一律安全转移，撤退到解放区安全地带。其次，组织暑假在校同学，成立临时领导机构，开展反迫害斗争。当天下午，在沙滩召开文、理、法三学院和留校学生大会，到会者 600 多人。大会作出三项决定：（一）要求北大校方退还北平特刑庭发出的传票，拒绝出庭受审；（二）坚决声援被迫害同学，一人被捕，全体坐牢；（三）成立北大安全保障委员会成员。其中骨干分子，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和民青、民联盟员。新的领导机



构成立后，首先组织了护校队，其次向教职员工进行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援。

8 月 20 日晚，国民党当局派大批武装军警闯入清华、北大、铁道学院、朝阳学院、华北学院等院校，非法搜查宿舍，逮捕了一批学生。21 日清晨，武装军警把北大包围得水泄不通，但没有冲进校园抓人。中国地下党总支决定：组织留校学生立即向胡适请愿，要求胡适保证北大最高学府的尊严，保证大学生的安全。21 日到 23 日，反动军警一直没有进校。24 日，少数军警在学校转了一圈以后，包围北大的军警也撤走了。至此，斗争取得胜利。

8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对目前蒋管区斗争策略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已决心撕破伪装民主的假面具，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政策。“因此，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错误。”“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此外，还特别嘱咐：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地说：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将城市中多年积蓄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这是最失策的事。”最后还指出：“无论反动派如何疯狂镇压，只要我党能有清醒的头脑，灵活的策略，并坚决依靠广大群众，而不犯冒险主义错误，我们是一定能够对付反动派的进攻，保持并发展自己的阵地的。”[②]

同日，中共中央城工部给上海、香港局发出《应付蒋匪大举逮捕各地学生的指示》，要求学生、工人和其他进步分子开始有秩序地疏散、撤退。1948 年 8 月起，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经张承宗和工委、学委、职委等负责同志讨论，决定撤退已暴露的干部，输送解放区城市工作所需的科技、工程、医务等干部 2 000 余人。9 月，中共上海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发出了上海、南京当前基本方针的指示，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在党内作《集中力量争取第三年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发挥第二条战线的作用》的报告。明确了当前上海地区工作的中心是：积极发展革命力量，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为彻底解放京沪，准备接管而斗争。围绕这一中心，开展反对国民党屠杀，反出卖，反搬迁，以及开展保厂、保校、保业、保命的斗争，以配合解放上海与接管上海。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组织

了人们保安队约6万人，其中以职员、工人、教师、学生约2万人为骨干力量，保护工厂、机关、学校，进行反屠杀反破坏反搬迁的斗争，迎接解放军，配合上海解放和接管工作。

注释：

①《在第二条战线上》，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央党史参考资料》第18册，第457–458页。

反美扶日运动

1947年7月，九三学社社员孟宪章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急管哀弦愈逼愈紧的日本问题》一文，揭露美国扶植日本活动。九三学社常务理事褚辅成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大为赞赏，认识到美国扶日的危害。于是召集孙荪荃、笪移今、王造时、吴藻溪、孟宪章等九三学社成员，在上海北京东路第二区缫丝同业公会，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邀请进步友人，研究日本问题，并将座谈结果，随时公布于社会，同时，欢迎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共同努力奋斗。他们的这一举措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下组织的支持和参与。在“民盟”被反动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以后，褚辅成等认定反扶日足以从侧面打击蒋政权，而且是当时唯一可能公开的活动。

二战后，美国破坏《波茨坦宣言》和由中、美、苏、英等11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关于彻底解除日本武装的决定，积极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有计划地扶助日本复兴经济，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的侵略基地。1948年5月19日，美国政府公布了所谓的“德莱勃计划”，旨在重建日本军事工业，使其成为独立的作战体系。美国将军麦克阿瑟不顾亚洲其他各国的利益，竟违反国际惯例，在对日和约尚未签订，日本在事实上还是盟国公敌的时候，专断地宣布日本对外私人贸易于8月15日开放。9月19日，魏德迈向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院提出的访华秘密报告第7条中指出：“取消对日占领的计划”，即解除对日本的管制，扶植日本侵略势力，作为美国侵略中国的帮凶。同时美国勾结蒋介石扶植日本反动派、释放日本战争罪犯，想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发动侵略战争的军事跳板，威胁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为此，“对日问题座谈会”同仁曾多次发表联合宣言，给美国的对日政策以严厉的抨击，随着美国扶日政策的变本加厉，这一运动也迅速的展开。

1947年8月起，九三学社社员通过《观察》杂志，先后多次发起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专论和报道，从而逐渐引起国内各界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关注。1948年春，褚辅成去世以后，由日本问题专家孟宪章为“对日问

题座谈会”召集人。“从1948年春起，对日座谈会乃进一步扩大范围，并一变开始时的温和态度，改为积极的、尖锐的斗争姿态，自后所发宣言在上海通过大教联（特别热心的是李正文、张志让、曹未风诸先生）、各民主党派（如施复亮、杨卫玉、宦乡、陈仁炳、李世璋先生），在平、京则通过九三学社总社及南京分社（由笪移今兄与许德珩、袁翰青、潘菽及厦门大学罗志甫教授联系），在穗、渝、汉等地则通过私人关系，妇女界由曹孟君、孙荪荃先生负责，广泛征求签名。于是反扶日运动范围日益展开。当时《大公报》及上海一般进步杂志亦均积极支持这一运动。”①

1948年，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美国政府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事实。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18条就明确提出：“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8年5、6五六月间，国统区人民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运动，简称“反美扶日运动”。运动中，上海、北平、昆明、广州等地的学生不顾反动军警特务以及职业学生的告密、追踪、逮捕、屠杀，积极从事街头宣传、座谈、讲演、游行示威。

5月4日，上海150余所大中学校万余名学生聚集在交通大学举行纪念“五四”营火晚会，学联代表号召全市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而斗争。会上成立了“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助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简称“”反美扶日联合会）”，并当即通电全国，发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呼吁。5月20日，上海全市2万多学生举行大检阅，纪念“五二〇”一周年。“反美扶日联合会”在上海发起10万人大签名活动，接着各民主党派成员孟宪章、陈仁炳、张絅伯、周谷城、张志让、卢于道、漆琪生、潘震亚、史良、许广平、马寅初、施复亮、包达三、盛丕华等知名人士，先后应邀到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观察家》杂志等单位作反美扶日演讲，或参加座谈会。在上海法学院举办的“时事漫画展览会”中，一幅漫画描绘了蒋介石身穿龙袍，跪在美帝国主义面前接受“新二十一条”的丑态。

23日，上海学联又在交通大学举行纪念“五二〇”一周年大会，再次召集有1.5万大中学生参加的大会，继续推动全市10万人签名运动，并检阅了102所学校15 000人的反美扶日学生队伍，进一步推动了反美扶日运



动的发展。5月30日，北平各大学学生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举行“华北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示威大会”，天津、唐山等地大学也派代表参加。会上成立了平津唐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发出了致全国同胞、美国国务院、美国人民、世界学联和麦克阿瑟等5则通电。

6月，农工民主党发表《时局宣言》，谴责美帝在全世界范围内，以支援军火扶植反动势力，建立军事基地，干涉各国内政。《宣言》强调指出：美国“最近且更积极扶植日本复兴，师承日本故伎，企图造成听命于美国独占资本的‘工业日本，农业中国’，再度武装日本，并极力培植实有侵略性及战争潜能的生产。”此种事实，显然是美国破坏波茨坦宣言及危害世界和平的具体行为。《宣言》说：“南京反动政府竟追随美帝此种扶日政策，对于爱国反美运动，尽力加以压迫，这是中国人民所痛心疾首而不能忍的。”

6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中午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书面声明，竭力为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辩护，对中国学生反美扶日爱国运动进行干涉和威胁。他诬陷反美扶日运动是“阴谋”、“错误”和“企图”，是“无理及不负责任地攻击美国对华政策”。声称：“此举对中美间的传统睦谊有严重的损害。倘仍继续进行，可能致不幸之结果。”“参加反美对日政策，……必须准备承受行动之结果”等等。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卡宝德也连续发表讲话，污蔑中国人民的反美扶日是受“奸人迷惑”，还说中国学生是受美国“恩惠”得到教育的，中国学生不应“忘恩负义”。

针对司徒雷登的恐吓与威胁，6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发表声明的第二天，上海市120余所大中学校学生5 000余人，再次走上街头，举行全市学生反美扶日游行大示威游行。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卫戍司令宣铁吾指挥军警封锁了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和市区主要街道口。为避免硬碰，上述学校灵活地将行动改为校内游行。震旦大学、光华大学和部分中学5 000余人，克服重重阻拦，到外滩美国驻华海军总部和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前示威。1 500多名军警和马队冲进游行队伍殴打学生，当场逮去50人，示威学生坚持斗争，游行至南京路、西藏路大上海电影院门口，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反美扶日。

6月6日，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章伯钧与李济深，何香凝（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国民党民主

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郭沫若（无党无派）诸氏顷为抗议司徒雷登之侮蔑声明，联合发表反对美帝扶日宣言："美帝国主义欲奴役我中国，全力支持反动势力以华制华。顾因诡计未易实现，乃复扶植日本复兴，竟公然承袭日寇'工业日本，农业中国'之亡华故智，而益以'资本美国'，认敌作友，借刀杀人，暴戾如狂，举世共见。今我全国爱国青年及文化界工商界人士，已一致奋起，极力反对。乃美帝不自反省，竟由其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荒谬绝顶之声明，强为扶日措施作辩护，并以狂妄言辞恫胁我爱国学生。昔时暴日之所不敢为者，今美帝竟悍然为之而毫无顾忌。此实我中华民族之奇耻大辱。除出卖国家，甘为傀儡之败类外，凡有血气，断难忍受。同人等素以国家独立，民族平等，世界和平为职志，美帝政策，向所反对。今更受此污蔑，誓愿与全国同胞再接再励，以自卫答复侵略。"②

反美扶日运动，在上海开展后，迅速得到了南京、青岛、成都、昆明、武汉、长沙等地各界人民和民主党派的积极而热情地响应。各地教育、文化、工商界以及民主党派成员纷纷发表声明，谴责司徒雷登。在国统区，有数十万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卷入斗争。除学生之外，其他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发表宣言，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这个运动甚至获得了国民党营垒中下级人员的广泛同情。但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动大批军警代表殴打爱国学生，镇压学生运动。国民党《中央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叫嚣要对爱国学生"与其养痈为患，不如操刀一割"、"当机立断，斩草除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公开号召一切国民党反动分子向爱国学生"作生死之斗争"。

上海反美扶日消息传到北平后，北平各校学生立即投入战斗。6月9日，全市5 000多学生高举反美扶日抗日大旗，进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清华、北大等教师437人发表对司徒雷登的抗议书。北平许德珩、袁翰青、黄国璋、费孝通、潘光旦、吴晗等联合各校教授437人，发表《为反对美国扶日致司徒雷登大使书》，从陆军、海军、空军、政治、经济五方面摆出了美国扶日的事实，指出反美扶日运动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全中国人民一致呼声，绝不容许任何人污蔑和攻击。清华110名教职工，包括张奚若、吴晗、朱自清等教授也签名发表拒领美国"救济"面粉的声明。华北学生反美扶日联合会在驳斥司徒雷登的声明中，义正言辞地宣布："我们愿意正告司徒先生，中国学生是不怕的……中国人民反美爱国运动，已有一百年光荣历史。中国学生自'五四运动'起，即是在美国主义和军阀的刺刀枪杆



下成长，在高压迫害下壮大起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学生不是任何恐吓和暴力所能吓倒的……承受行动之结果者，不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学生，而是美帝国主义！"③

上海各大学教授33人发表致司徒雷登公开信，南京一些大学教授在金陵大学举行座谈会，驳斥司徒雷登声明；工商界人士包达三等联名发表抗议书。甚至在长期受司徒雷登直接控制的北平燕京大学，学生们也召开代表大会，抗议司徒雷登的声明，并联合北平11所学校向司徒雷登递交抗议书。9日，平津12所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北平4 000多么学生冲破军警包围举行示威游行；12日，北平各大学教授437人发表致司徒雷登书，指出美国政府倘若不立即改变扶日政策，美国政府"必须准备承受行的之结果"。

为了抗议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6月19日，清华大学80余名教授支援发表声明拒绝接受由国民党政府配给的美援平价面粉，并退还了配购证。著名学者朱自清教授坚守誓言，"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8月2日，朱自清在饥病交加中去世。在去世前，他还嘱咐家人不要买国民党政府配售的面粉，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骨气和对美蒋反动派的仇恨。对此，毛泽东同志评价到："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铭刻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④在朱自清教授的带领之下，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的学生也纷纷拒绝美援食品，学生们在校园张贴"不食嗟来之食"，"中国人的良心不能收买"的大标语，表示中国学生的斗志和尊严。

反美扶日运动，沉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提高了民族自尊心。美国大使对中国人民的污蔑激起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感，激发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美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的热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反美扶日运动，在国际上也产生很好的影响。当时所发生的事件，所发表的宣言，不仅苏联报纸予以登载，电台予以广播，而且欧美报纸也经常摘要报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在东方的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第因受这一运动的影响，也曾卷起反美扶日的浪潮。

注释：

①孟宪章：《中美反美扶日运动斗争史》，《九三学社》，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年版，第 35 页。

②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19—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年版，第 427 页。

③《在第二条战线上》，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年版，第 193 页。

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495-1496 页。

中共中央对国统区人民运动的领导方略

1946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举行的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了蒋管区的工作，改组了中央城市工作部，决定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城工部部长，李维汉为副部长，还决定城工部对国民党统治区（国统区）最近的工作作以指示。①

1947年1月16日，为了更有力、更有计划地领导蒋管区群众爱国民主的斗争，以配合解放军作战，准备迎接全国革命新高潮，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刘晓、钱瑛、张明、方方、林平、潘汉年电，指出：中央认为蒋管区党组织系统有调整的必要：（1）南京局由董必武主持，直接管理上海工委、重庆分局、香港分局及一部分统战关系中的党员。（2）另设上海分局，将刘晓、钱瑛两处领导的秘密组织统一管理，惟下层仍不打通，分局下另设上海市委。刘光原管之青年组织及其外围亦由钱瑛领导与朱语今发生关系，其散步在平、津、京、沪、汉、各地关系均应设法联系起来。（3）上海分局由刘晓、钱瑛、张明等组织之，负责领导与发展蒋管区秘密工作。下级组织仍采取平行的组织，单线联系，转地不转关系等办法，以保持核心作用。（4）重庆分局领导《新华日报》及川、康、滇、黔党的工作。（5）香港分局由刘长胜（因上海分局要求，刘长胜后来未去香港）、方方、林平、潘汉年、刘宁一、梁广、章汉夫、夏衍、连贯组成，管理南方工作，下设香港工委、南方区党委、琼崖区党委、城市工委4个平行组织。（6）重庆分局、香港分局均直属南京局，但有关全局工作，中央得给予直接指示。②

4月29日，周恩来就城工部的工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指示："中央城工部自去年年底改组后，其职务已定为：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管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训练

这一工作的干部。”现在除各解放区中央局下设城工部外，各解放区党委，如周围有蒋管区可进行工作的也得设城工部。在蒋管区，“上海局管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与平、津、青岛、台湾，香港分局管华南及南洋各地。”“各解放区于蒋区地方党将，有互相重复及交叉之处，仍照旧进行，平行发展，不必打通。”③

5月6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致刘晓等，告以决定将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通知指出：为加强与调整蒋管区党的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将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并于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上海局仍以刘晓、刘长胜、钱瑛、张明（刘少文）4同志组成，刘晓为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在上海局领导下由张承宗分管上海市委，张执一分管外县委员会和策反工作，张登分管文化统战工作，加强了国统区党的领导。

1947年“五二〇”惨案后，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他说：“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蒋介石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蒋介石的军警宪特与同学和群众之间，到处发生冲突。蒋介石用逮捕、监禁、殴打、屠杀等项暴力行为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学生运动因而日益扩大。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蒋介石的狰狞面貌暴露无遗。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④

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运动的健康发展，中共中央于5月5日发出《关于蒋管区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就是要保护我党及民众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为此目的，既要坚定勇敢，又要机警谨慎。要时时注视情势的发展，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灵活地既结合又分别合法与非法的斗争。”⑤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中共中央于5月23日发出的《关于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的指示》中又提出了党在蒋管区的斗争策略是：“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向前推进。”并指出：“现在全国人民的斗争，不仅人民解放军的自卫战争是在搞垮蒋介石统治，就是蒋管



区要饭吃，要和平，反对借外债打内战的任何一种斗争，不管其主观想法如何，其客观意义都在搞垮蒋介石统治，甚至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乃至相互埋怨，美帝国主义对蒋借债的犹疑，都可看做是搞垮蒋介石统治的间接帮助。所以我们尽管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在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斗争发展中国，适当地提出实施民主自由，肃清贪官污吏，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驱逐反动好战分子与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援蒋内战等口号是很对的。”[⑥]这样，中共中央就为国统区今后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5月31日，中共上海局刘晓就给叶剑英、罗迈（李维汉）电文《蒋管区群众斗争近况及今后策略问题》，提出在此运动中应当注意的几点：

（甲）目前运动已从个别要求发展到共同要求，从局部发展到全国性，从经济性发展到带政治性，群众情绪高涨，社会同情，CC系与政学系矛盾，经济危机，继续发展对我们有利，但敌人预布之紧急措施，企图以威胁、镇压，首先压下群众气焰和进行若干妥协，以达到分化，打击积极分子。平津京沪均已发生惨案。我若在目前推却，敌人则得寸进尺，且群众情绪降低，敌会趁机击溃我们。因此，我抓紧各地惨案（这是敌人弱点），发扬上述我之有利条件，利用我一部分预备力量（只是扩大声势不行动），集中在三个可能实现的条件上，压迫敌人作若干让步，取得局部胜利，趁胜利转变斗争方式，既一面上课，一面交涉，来巩固这次斗争中的成果，准备第二次斗争。在我们进行这一策略时，同时推动一部分教授或参政会出面调解，这可以转圈，又可以在第三者保证下转变，使我们更有利。

（乙）目前斗争是将连续不断，一直发展到高潮。只有斗争形式改变，而无斗争的停顿。为着既能发展又能滋集力量，我们使斗争预定是：此起彼伏，不同形态，车轮战式（即学生运动暂时休息，职工斗争又起；职工休息，学生又起），并充分利用矛盾来发展，使在每个斗争中，有主流，有细流，既分开，又配合，以经济为主，但又联系政治，使之不断提高。

（丙）由于斗争今天已带全国性，又由于今后斗争的新形势与我们力量弱，决定利用这次斗争，在真正群众基础上，成立各地学联与全国总学联，使之成为公开群众性领导机关。[⑦]

6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学运方针给上海局的指示》，指出：“你们领导斗争向前发展的方针是对的。今天京沪平津学生停止上街游行改在校内开会的办法也是对的。这样，可以巩固校内（包括教职员）的统一

战线，便于集中要求于可能实现的条件（如释放所有被捕学生教员，医治受伤学生，惩办暴行人员，取消紧急措施及军事戒严等），然后再改变斗争形式，继续进行要和平要饭吃要自由的运动。目前蒋政府捕杀学生兼及教员、记者的暴行是普遍的，应抓紧社会上对此暴行的共同愤慨及统治阶级中某些矛盾（如立法院设调查委员会），坚持放人反暴行的要求，以团结内部，扩大同情。学生的组织形式也应与此形势相适应，例如现有华北区学联，京沪苏浙豫五区学联以及各地学生反暴行委员会，均可不拘名称形式，设法联合，以达到成立全国学联的目的，但形式上却不要马上号召成立全国学联，致引起敌人过早注意分化与压迫。究如何为好，由你们依实际指导之。暑期工作，亦应及早计划。”⑧

6月17日，中共上海局向中共中央、城工部并华东局呈送《关于整顿、布置学运斗争的请示报告》，报告认为：为了表示全上海学生团结，与表示政府不能以武力压服学生，正式宣布上海学联成立，包括大中学102个单位，“六二”宣布全市总罢课，坚持反内战为民主斗争。现在正深入推进发动大规模抗议暴行，要求释放学生的签名运动，各校已与教授组织保证安全或抗议暴行释放同学的签名活动，各校已与教授组织保障安全或抗议暴行释放同学的共同委员会。另一方面，进行社会人士的同情运动。现除交大、复旦教授外，其他各校教授，均大部分起来呼吁，并派代表向当局请愿。外国自由主义分子，男女青年会上层干部，学生家长，甚至连上海一部分耆老如张菊生、陈叔通、胡藻清等，也推动他们起来表示同情，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准备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各阶层联合组织与斗争。19日，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复示，表示同意上海局学运方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管区学生暑期下乡中心任务的指示》，指出：暑期学生下乡，其中心任务应是宣传群众，锻炼自己，当其与群众取得密切联系并取得群众信任后，则可组织群众，发动斗争。

为使学生运动减少阻力，向青年军与宪警做工作，中共中央曾发出两个指示。第一个指示是，5月23日，中央给叶剑英、罗迈急转上海局、香港分局、五台局转平津两市委电，指出：“目前学潮日趋高涨、广泛，蒋政府所持以镇压与殴杀学生者在其后方兵力空虚条件下，仅有青年军与宪警。”“为避免与青年军及宪警士兵造成对立，并争取他们同情学运，以瓦解蒋介石镇压后方的力量起见，你们应通过各种组织，各方积极分子赶紧进行青年军及宪警中的士兵工作，尤其要利用学校退伍学生及同校学生向青年军中进



行同军同学的联络、解释，提出适当口号，使之由同情要饭吃、要和平的斗争，进到其本身要求加饷退伍的斗争。特别当青年军宪兵殴打、逮捕学生时，更要进行学生群众有利的劝阻呼号，以感动他们停止动手，即使是消极的袖手旁观，对学潮的发展，也是极有利的。[⑨]第二个指示是，6 月 6 日，中共中央又指示上海局的刘晓与香港分局的方方、林平，告诉他们：5 月下旬，燕京、清华两校学生已与青年军二〇八师交谈。青年军办有剧团、球队，将分别举行友谊比赛，及提出两校学生留此，分别招待青年军到校参观。清华亦应该军之请，由教授数人分期到该师讲演，实行联络。北平罢课游行时，各校参加过青年军之退伍返校军人数百人列队参加，并穿戴作战之全副军装，佩战功勋章，作大队前导之前导等。“据此，证明青年军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但应注意国特分子故意利用青年军与学校来往，以暴露学生中进步分子，同时，各地所采方法应因地因时因人制宜，不要刻板照抄。”[⑩]

10 月 13 日，周恩来同江震、杨超谈蒋管区目前形势和任务时，指出：“在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形势下，蒋区工作的总方针是：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发动第二战场。”同时指出：“蒋管区群众斗争的策略要有充分的灵活性，需掌握一切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组织形式是分散的、平行的、各线纵深配备的形式，已暴露的干部应撤退，另提拔新的干部。蒋管区当前工作的最终目的是里应外合，迎接胜利。”[⑪]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和策略，更好地开展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华北局于 1948 年初，举办了国统区城市学运骨干轮训班。轮训班学习的主要内容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后来则以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为中心文件，系统地学习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在理论武装的同时，训练班着重研究城市工作的方针任务，地下党员的工作准则等。这种学习训练，对于提升爱国青年的政治觉悟、建立一支政治上坚强、组织上严密、作风上过硬的学运骨干队伍，起到了重大作用。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 1989-1949 年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第 708 页。

②同上，第 716–717 页。

③同上，第 731–732 页。

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224–1225 页。

⑤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18 册，第 296 页。

⑥同上，第 297–298 页。

⑦同上，第 300–301 页。

⑧同上，第 303 页。

⑨同上，第 306 页。

⑩同上，第 304 页。

⑪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 1989–1949 年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第 752–753 页。



各民主党派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一支重要的同盟军，对创建新中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对于无党派人士，周恩来曾经评价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他们在形式上没有结成党派，但实质上是有党派性的"，"正确地写出来应该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①

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反革命内战等斗争中，不断加强合作。在国共和谈、声援国统区的爱国斗争，抨击美国的对华政策，反对援华法案，共同抵制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内战加剧以及国民党统治的更加腐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加积极地投入争取民主和平的斗争，表现在反对美国大使魏德迈使华、反对"行宪国大"、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改革、反对美国白皮书等方面。

1947 年 7 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魏德迈为特使访华，在视察华北、东北、台湾、华南等蒋管区主要城市的基础上，召开了一连串的军事座谈会，发表了一系列声明。为此，中共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共致公党等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抨击美国的对华政策。7 月 29 日，致公党发表声明：就魏德迈此次所率的许多专门人员（军事的经济的顾问人才）本身的性质来说，不难看出，美国反动的基本政策并未有任何的改变，不是要不要援助南京独裁政府的问题，而是如何援助更有效的问题。一切表现的姿态，不外是美妙的烟雾，借此欺骗中国人民，并缓和美国人民，避免强大力量的反对。我们中国人民，对这一阴谋，是必须加以警惕的。

8 月 26 日，民主同盟就魏德迈离华声明发表言论，指出，此一声明，在外交史上尚属空前，"魏氏认为国府如铲除腐败官员，施以政治经济之改革，即可取得人民之热情拥护，按此项建议早于马歇尔离华文告中提出，国府并已遵照办理矣，然政府改组后之成绩如何？人心如何？撇开中国与真民

主党派之‘扩大政府’于和平统一与政治效率何补?”“魏氏不求建立和平基础之巩固，空言和平之可贵与举国人民对于和平之要求，劝中共自动片面放下武器，实非公允。”深盼美国政府即以中国之实际为根据，而决定其对华政策。[②]

1948年2月3日，民革、民盟、农工、救国会、民促、民联、致公党等民主党派，对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马歇尔向美国国会提出援华法案一事，在香港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目前南京独裁政府违法摧残民主政党逮捕学生执行内战政策，早已不能代表民意，已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之政府，美国政府如再继续积极援助南京政府，实具有助长中国内战，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味。我们坚决反对此种加深中国人民痛苦之对华借款，同时绝不承认南京独裁政府所签订之任何损害中国主权之卖国条约。”[③]

1948年10月22日，民主同盟、民革、民主促进会、农工党、救国会、民联、民促、致公党、中国民主社会党（革新派）联合发表《为美帝侵华向联合国大会控诉书》，系统地揭露了美国在抗战胜利之后为了反苏反共，先后援蒋43亿美元巨款，帮助国民党发动内战；撕毁政协决议，排斥民主党派；与国民党独裁政府签订《中美商约》、《中美海军协定》以及若干秘密协定等不平等条约；派遣美军顾问，建立海空军基地；不撤退驻华美军，干涉中国内政；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等种种罪行。指出美国政府的目的在于“侵略中国，使中国殖民地化”。《控诉书》还进一步指出：美国政府的对华侵略政策，是在防苏反共的口号之下进行的。“但是在我们中国人民看来，中国共产党给农民的土地，实行保护工商业，执行劳资两利的政策，这是适合于人民的要求的，它没有超过民主革命的范围”。“今天中国所进行的内战，乃是中国人民反对独裁的革命战争。”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独裁政权，“实属于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已威胁到远东的和平。为此，我们“向你们提出诉讼”。控诉书要求联合国根据其宪章，责成美国政府：（A）立即撤退在华驻军和放弃一切在华的海陆空军基地；（B）立即停止援蒋；（C）废除一切美政府与蒋介石政权所订立的中美不平等条约，俟中国新的民主政府成立以后，而代之以新的、真正平等的互惠条约。[④]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的斗争，还反映在同中国共产党一起，共同抵制和反对国民党一手包办的“行宪国大”上。蒋介石集团召开了行宪国大之后，内地和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发表声明，强烈否认“行宪国大”和伪“总统”的合法性，



号召人民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民革、民联和民促及其领导人李济深、蔡廷锴等分别发表声明：南京召开的伪国民大会，“是由破坏政协决议之执政的发动集团一手包办下制造出来的”，“其通过的所谓‘宪法’，今年南京主要代表根据伪宪法选举的大总统，于法自属无效”，并指出“今天南京政权已临最后崩溃的阶段，其所以在军事、政治、经济严重违纪中急召开伪国大，主要目的，不外通过伪国民大会满足独裁者‘帝制自为’的大欲，并授予‘总统’以‘戡乱特权’，使反动政权及内战合法化，以掩护其卖国殃民的罪行”。民革郑重宣布：“凡伪国民大会所作的决议及由其产生之政府所签订的对外条约，对内一切立法及行动措施，一概不予承认，并号召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再接再励为铲除人民公敌、结束卖国独裁政权而奋斗到底。”

为了挽救经济危机，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和实行限价政策，实则是借以掠夺工商业者和人民的财富，为打内战积累资金。对此，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抨击国民党反动派掠夺人民财富的行径。1948 年 8 月 29 日，民主同盟发言人指出：“蒋介石政府此次突然宣布‘改革币值’，发行金圆券，这完全是由于它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已陷于穷途末路之际，为了挽救其整个崩溃而采取的一种救死挣扎。蒋介石军事上之节节溃败，引起其财政经济之急趋崩溃。今年 1 月至 8 月，物价由抗战前 13 万倍徒涨至 800 万倍，……此次之所谓‘改革币值’，实际就等于发行三亿元单位的大钞，比原来的大钞增加了六十倍。”发言人说：“我们敢断言，在不久之将来，今日之‘金圆券’势必成为昨日之法币。”[5]9 月 23 日，民盟又为南京政府掠夺及迫害工商界人士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政府“强迫人民拿出金银外汇和货物来向它交换不兑现不值钱的一叠叠的纸币，”实际上是“假币制改革之名，行集体掠夺之实。”“这样公然无耻的大规模掠夺人民，实是中外古今任何国家所未曾见过的。”民盟号召工商业者“为了自救和救国”，应和反政府的民主力量团结在一起，用关厂、罢业、罢市等方式，与以人民为敌的反动政府进行坚决的斗争。[6]

9 月 21 日，农工民主党揭露国民党的所谓“经济紧急法令”及币值改革，事实上是用更恶性的通货膨胀，并且强迫人民交出外汇、金钞、黄金、白银，实行公开无耻的大欺骗、大掠夺，一面造成市场极度混乱，物价飞涨，一面却以恐怖手段限制物价，冻结薪资，这样就扼杀工商业的最后升级，摧毁人民生存温饱的仅有条件。

民主建国会成员对国民党这种掠夺行为极为愤慨，利用各种办法，以关厂、关店、转移等方式进行对抗。与此同时，他们更加拥护和向往解放区"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黄炎培为了使广大工商业者了解解放区的政策，在1948年9月，主动要求中共地下党组织，派人参加民主建国会等创办的《展望》周刊的编辑工作。

10月10日，民革、民盟、农工党、救国会、民进、致公党、民联、民促、民主社会党（革新派）联合发表《告同胞书》，其中揭露国民党以"打老虎"为美名，作为迫害千千万万中小商人的幌子，指出："全体工商业者都在人人自危。财物的横被收兑、充公、掠夺，那更是极端平常的事。真正能够囤积居奇，操纵黑市，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豪门，不但毫毛未损，而且把全国工商界及小市民的残余的财产完全掠夺，作为最后挣扎和将来逃亡的资本。"民革提出："反对一切助长内战，窒息民生之财政经济政策，号召人民站出来，一致反对征兵、征役、征实、征购、滥发纸币；取消苛捐杂税及一切经济统制办法。"

中国人民革命的不断胜利，加剧了美国内部对华的矛盾。美国国务院为了替自己政策失败辩护，于1949年8月5日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和艾奇逊国务卿为发表白皮书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对中国发生的巨大变革，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它一方面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极端仇视，另一方面企图逃脱助蒋内战，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责，并阴谋继续利用所谓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来破坏中国革命，同时，白皮书也公开透露了美国政府的若干反革命真相。这样，白皮书就成了一份美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自供状。毛泽东及时抓住这个反面教材，为新华社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5篇重要评论，揭露美国政府对话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并对中国革命之所以发生和取得胜利的原因，在理论上作了系统的阐述。这就大大地教育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并武装了他们的头脑。

8月16日，民盟中央在北平举行批判白皮书座谈会。23日，民盟发表了《对美帝白皮书的斥责》一文，文章说：他们读了白皮书的结论是："美国过去一百年来继续不断地侵略中国；最近五年来更变本加厉地侵略中国；今天又正在处心积虑地计划着进一步侵略中国。"文章指出："白皮书把侵略政策的失败，干干净净推卸在蒋匪身上。说这是奴才不听主子命令的结果，说这是，'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他不肯承认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反



动政府的错误，是由于中国人民力量的不可抵抗。可见美帝国主义是至死不悟的。它今后将用什么方法来加紧侵略呢？我们看来不外三策：（1）以华乱华；（2）结伙抢劫；（3）直接蛮干。"⑦

艾奇逊在信中鼓励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来推翻"外来制度"，这就是另找奴才。美帝即令仍有利用这些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可能，他们早已为中国人民所不齿，不能发生丝毫效用。我们相信，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绝不至出卖祖国，甘为美帝做奴才，必能站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来为彻底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斗争。

民盟明确表示：在世界上民主与反民主，进步与发动的斗争中，是没有中立的余地的。立国之道，友敌必分清楚。孙中山先生曾经用"联俄联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号召国人。"我们只能与平等待我的一切国家做朋友，绝不能向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者投降。"民盟呼吁美国人民的进步力量与中国人民联合起来，打击并粉碎杜鲁门、艾奇逊之流的侵略阴谋。⑧

8月23日，民主建国会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了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以反对美国务院白皮书对中国革命的污蔑和对知识分子的挑拨伎俩。声明揭露美帝除了欺骗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来一次威胁，给奄奄一息的中国反动派打一针强心针外，值得注意的是扶植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的阴谋诡计。声明严正指出："白皮书上所提的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好梦是做不成的。就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吧，抱歉得很，如果把他们当做好对象，那美帝又将多犯一次错误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工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在内）的态度。"

各民主党派纷纷批判美国白皮书，他们深刻地揭露美蒋充当了反面教员的角色，有人撰文说："实际我们亦不能不感谢美帝奴才蒋介石，他那位美帝导演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旧的民主的把戏，他那套残酷压迫的手段，把中国中间阶层许多知识分子都逼上了革命的梁山泊。我们亦不能不感谢美帝这本白皮书，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把马歇尔、赫尔利、魏德迈、司徒雷登们在中国唱卖的西洋镜完全看穿。即令还有对美帝尚存些微幻想的自由主义分子，亦必为这本白皮书所唤醒。"⑨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战后不断活跃在反蒋第二条战线上，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内战独裁政策，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有利参加者、推动者和支持者，有效地支持了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发展。

注释:

①周恩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

②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19—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39页。

③同上,第405页。

④同上,第465、474页。

⑤同上,第448、458页。

⑥同上,第448、458页。

⑦同上,第578页。

⑧同上,第578-579页。

⑨同上,第579页。

国民党对民主党派的迫害

民主党派积极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遭到蒋介石政府的打压迫害。国民党反动派诬陷各民主党派，解散民盟，将各民主党派打入地下，迫使各民主党派转战香港，重新组合。

1946 年 6 月，民进、民建、民盟等民主党派积极参与组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赴南京和平请愿代表团。代表团乘坐的列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代表们即遭到早有准备的国民党特务、歹徒的围攻和殴打，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等代表和民盟总部派赴下关车站欢迎代表的专使以及一些民盟盟员，还有《新民报》记者浦熙修等身受重伤，即震惊中外的六二三下关惨案。接着，国民党当局在向解放区发动全面军事进攻的同时，进一步加紧了对其统治区人民的法西斯统治，在各地逮捕了 13 000 多名反内战的学生、工人、市民。7 月，又在 5 天之内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大血案。李公朴是 1936 年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时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委员；闻一多时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主周刊社社长。1947 年 3 月，民盟中央常务委员、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捕。

随着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的失利，以及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不断深入，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加紧打击爱国民主力量。1947 年 4 月 22 日，国民党官方报纸《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公开污蔑中国民主同盟，否认民盟的“合法平等地位”。5 月 3 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布一个捏造的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和某政治观察家的谈话，公开诬称民主同盟与民建、民促等团体是中共控制下的暴乱工具，从而制造舆论，以打击压迫民主党派。5 月 4 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向全国各地国民党报纸发出训令，要各报揭露民盟、民建、民进等民主党派的“共产奸谋”，并开始有计划地迫害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5 月 14 日，国民党政府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攻击民盟与“与反叛政府之中共既有密切联系，虽仍称系一和

平政党，然政府对该盟之态度，将视其政策及行动如何而定”。这一声明，表示国民党当局公开发出有计划打击民主党派、迫害民主人士的信号。

5 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当局查封了上海《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报》等几家进步报纸。6 月 1 日，国民党军警宪特在上海、北平、南京、天津、武汉、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桂林、广州、杭州、福州、西安、太原等全国各大城市进行大逮捕，包括民盟等民主党派成员在内的民主人士和进步师生 2 000 多人被捕，仅民盟盟员被捕的即超过百人。民盟中央委员杨伯恺、于邦齐等十余人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在成都，1949 年 12 月成都解放前夕惨遭毒手。

7 月 4 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案，制定了一系列镇压共产党党人和民主势力的反动法令。6 日，蒋介石发表讲话，污蔑中国共产党“公开叛变”，叫嚣“举国一致”“戡平叛乱”。同时，对于手无寸铁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加以迫害，逮捕了大批民主党派成员和民主人士。接着，国民党训令各级组织，对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这三个党派实行对上层分子“暂时容忍敷衍”，其余则“不必客气”，只要发现，不问其理由如何，“一律格杀勿论”。国民党随即将北平、上海、广州、杭州、西安以及东北各地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以“共产党嫌疑”而逮捕和屠杀。9 月 27 日，蒋介石又亲自召集各地特务头子举行秘密会议，布置对中共和民主运动的疯狂镇压和迫害。仅 10 月份一个月，上海、杭州等 8 个城市就有 2 100 余人惨遭杀害。对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民盟等民主党派采取了新的斗争策略。民盟总部决定“为求得盟本身的存在与发展，须先后争取和平合法公开之地位做起，虽明知无效”，“也不能放松”；同时，要求基层盟员做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斗争的准备，并在海外筹建言论机构，以备内地形势恶化时及时转移。民建总会也决定一方面健全组织，继续坚持公开合法斗争，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工商界座谈会，以广为宣传，扩大政治影响；一方面由章乃器、孙起孟等赴香港负责筹备海外分会，以备时局逆转时继续坚持斗争。中国民主促进会采取化整为零、分组活动的范式，以缩小目标，隐蔽力量。

10 月 7 日，国民党政府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民盟是“中共之附庸”，诬陷“民盟分子破坏总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同日，国民党西安警备司令部以“勾结匪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兼共匪关

中地委会负责人”等罪名，枪杀民盟中央重要成员杜斌丞等12人。民盟主席张澜即于当日就杜斌丞枪杀案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根本破坏国家之司法独立”，“对如此和平的在野政团果欲凭借其权势及武力加以摧毁，以达根绝在野党派之目的”，“惟绝对不容许在野党派存在的国家，尚何民主之可言?”①

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指出：西北著名教育家杜斌丞先生的被害，表示蒋介石政府欲以扩大对民主人士屠杀的方法，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发言人指出，蒋介石于7日在西安枪毙杜斌丞先生时，宣布其是中共关中地委负责人。实则杜先生是民主同盟西北负责人，一生为民主事业奋斗，为西北人民所敬仰，并非中共党员。发言人强调：蒋介石现在对国统区民主运动实行大规模的残酷镇压，说明了蒋介石对自己的统治能力业已丧失信心。

10月中旬，国民党御用团体“中国文化界戡乱救国总动员会”污蔑民盟参与叛乱，主张政府将其明令解散。随后，国民党派出大量特务，包围、监视南京民盟总部。27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说：民主同盟勾结共党，“参与叛乱”，“煽动五月学潮及上海工潮”，“作叛乱宣传”掩护共党之“间谍活动”，“企图颠覆政府”，着令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暂行惩罚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以遏乱萌。”②自此，国民党反动政府彻底宣布，解散民盟。

对于国民党的迫害，民盟领导人发表声明、对国民党当局表示严重的抗议。10月29日，民盟南方总支部发表《为总部横遭南京摧毁郑重声明》，“认定南京政府的解散命令，本身即为非法”，“倘当局更进一步剥夺其（民盟）个人自由，或予以肉体上之危害，或予以精神上至胁迫，所有后果，南京政府应付全责”。同时，民盟总部领导人在上海举行紧急会议，多方交涉，最终无效。11月5日，民盟在沪中央常委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宣布自动解散。第二日，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发表《中国民主同盟被迫解散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③7日，张澜以个人名义在《时代日报》发表声明，表示“余迫不得已，忍痛于十一月六日通告全体民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

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

国民党解散民盟，引起了民盟许多地方组织和广大盟员的极大不满。他们纷纷表示不同意民盟的解散声明，并对国民党政府压迫民盟的法西斯暴行，提出严重抗议。11 月 9 日，民盟南方总支部发表声明：自从 10 月 27 日政府宣布本盟为非法团体后，独裁政府直接又对本盟总部负责同志加以监视，继则封闭本盟总部，威胁本盟领袖，现在总部工作同人已被暴力劫持，行动、言论全无自由。“本盟南方总支部今后仍一本为民主和平而奋斗之素志，继续努力，绝不因独裁政府之非法压迫而停止其活动。同时号召海外全体盟员，对独裁制度之敌视人民，蹂躏民权，共同奋起，一致反对。”④

民主同盟被迫解散，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当局解散民盟，迫害民主人士的法西斯暴行。新华社于 1947 年 11 月 6 日在《蒋介石解散民盟》的时评中指出：“病入膏肓的蒋介石，今天害怕这样一个组织，他宁可向这个组织露出法西斯野兽的牙齿，宁可使在蒋介石统治下进行任何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归于破灭。”美国也“害怕民盟照往常一样的活动，因此就决定批准南京的这个显然愚蠢的步骤。过去的无数经验表明，像解散民盟这样的大事，没有美帝国主义的批准和参与，蒋介石是从来不敢擅自决定的。”时评指出：“民主同盟在若干历史关节中实行了与中共在部分民主纲领上的政治合作，从而推进中国民主事业，乃是民主同盟的光荣。”毛泽东在新华社发表时评时，还加了一段话：“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⑤

民主促进会领导人马叙伦于 11 月 1 日致函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张群，斥责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并郑重宣布：“至伦立身，本末不移，贫富威武，无动于衷。达观早成，生死一致。自今以拥疾之躬，待命陋巷之内。捕杀不辞，驱胁无畏；穷以私剑，投诸浊流，皆系于政府，于伦无与焉。”⑥九三学社、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许德珩、雷洁琼等联合北平各大学教授 47 人，在北平《新民报》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的看法》，指出，“政府此举，旨在消灭民盟”，如此行径，“人民的权利何在？人民的自由何在？”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领导人李济深、民主建国会领导人孙起孟等在香港发表

文章，谴责国民党政府强迫民盟解散是“违法悖理”。

国民党当局在打击民主同盟时就点了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的名，因此，各民主党派必须改变斗争的策略，由公开、合法的活动转入到隐蔽的地下斗争。从1947年冬天开始，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实行了这种斗争方式的转变，它们的一些领导人秘密由上海到达香港，继续进行反蒋斗争；有些领导人则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积极参加民主运动。

注释：

①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352页。

②同上，第360页。

③同上，第356页。

④同上，第362页。

⑤晋察冀《人民日报》，1947年11月7日。

⑥民进中央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国民主促进会简史》，开明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中间路线的幻灭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海外侨商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爱国分子。民主党派作为上述阶级、阶层和人们的政党，主要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但又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而带有阶级联盟的性质。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这些党派虽带有中间性，但其组织成分又常从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①]就当时在各民主党派中影响最大的中国民主同盟而言，在它1941年成立时，就是三党三派的联盟，组织成分相当复杂。其中，以曾琦、李璜、左舜生为首的中国青年党（又称国家主义派、醒狮派）和以张君劢、张东荪为首的中国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就其政治主张与历史实践来看，同属资产阶级的右翼。三党三派的政治立场有很大的差异，并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民盟的决议和行动，并不能约束各党派的独立自主的行动。大多数盟员具有双重党籍，及时民盟盟员，又是原党派的成员。这样的一个政治集团，是相当松散的，基础是极不稳定的，这就隐藏着后来民盟内部意见分歧乃至分化斗争的尖锐矛盾。

在一个时期里，民主党派中的不少人，包括某些领导人，既不满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统治，又不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和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即中间路线，从而在中国建立他们所向往的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在政治上，他们主张民主，不赞成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中间路线主张现代化和工业化；在思想文化方面，中间路线奉行自由主义的态度，但反对任何思想上的统治和清一色，反对教条主义的信仰；在外交政策上，中间路线主张对美苏二国采取同合作的桥梁，不做美苏冲突的牺牲品；行动上，中间路线主张和平、改良，不赞成暴力革命。



内战爆发之前，人民多认为政协决议的精神就是中间路线，坚持政协路线就是坚持中间路线，而大量的民主党派也被人民认为是中间路线的主张者。但是，由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很不充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天生的软弱性，这种寻求第三条道路的“中间路线”虽然长期存在，其政治影响却十分有限。毛泽东同志对此论述到：“蒋介石统治区域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这些阶级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他们替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散布幻想，他们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当着他们的反动倾向尚能影响群众时，我们应当向着接受他们影响的群众进行揭露的工作，打击他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使群众从他们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他明确指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 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够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②]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政治斗争的不断加剧，使得中间路线在中国走不下去，最终宣告失败。

抗日战争中后期，国共两大对立政党既合作抗日又对立摩擦斗争的政治舞台上，促进了这些党派的联合，他们以第三种独立力量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就是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民盟已发展成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大党。战后，全国范围争取和平民主的政治氛围，为民盟这样的民主党派提供了一个发展自己力量、施展政治影响的时机。

当时，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不少人认为：目前的局势是，国民党既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而国际形势也不许可有一个完全右倾的国民党政权或完全左倾的共产党政权；这样，唯一可能的正确道路，就是实行中间路线，以便把右的拉向偏左一点，把左的拉向偏右一点，从而取得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中间问题的办法。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宣言和政治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上述这种政治见解。此次大会的政治报告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在我们所需要

为中国树立的民主制度上，我们没有所谓偏左偏右的成见，我们亦没有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这些成见”。实际上，整篇报告赞扬了英国的议会政治和美国的所谓人权保障，接着又主张“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报告最后强调：“改组后的中国民主同盟仍不失为一个具有独立性和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所谓独立性是说它有它独立的政纲，有它独立的政策，更有它独立自主的行动。所谓中立性是说它介在中国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中，是两大对峙力量组织中间的一种。要求它保持不偏不倚的严谨态度，不苟同亦不立异。”报告申明，“所谓独立与中立，并不是不辨是非曲直的乡愿，它是一个民主的大集团，因而它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亦就是民主与反民主”。[③]但是，这种民主还不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而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总之，当时民盟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美国和蒋介石存有幻想，主张不右倾不左袒，对内调和国共两党，对外兼亲美苏两国，保持超然独立的第三者立场；他们反对一切兵争，反对国共两党拥有自己的军队，把内战的责任同时归之于国共两党；主张采取和平、合法、改良的方式和途径，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就坚定地认为，民主党派中一些领导人和若干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这种政治主张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是，考虑到这些主张当时在相当一部分民主人士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国民党蒋介石还没有挑起大规模内战，正在玩弄和平阴谋；这些主张在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内战独裁方针、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官僚资本操纵国计民生、保护民族工商业等基本方面，同中国共产党在战后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有着共同点，在当时仍能团聚很大一部分人，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在1946年初召开的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和民盟实现了有效的合作，中共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民盟代表的主张，在政治上作了很大的让步。会议通过的5项协议，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还有很大距离，基本上体现了民盟及其代表的主张和要求。此后，周恩来还指出：“民盟由于抗战特别是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④]共产党的让步，让民盟以及当时的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对时局发展表现出乐观态度。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之后，中间路线的言论开始频频出现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主办的刊物上。当时以民盟代表身份参加政协会议的国社党



领导人张东荪发表了《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文，提出“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以这样一个“折衷方案”作为“立国之基础”；认为这样一个中间性的政治制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民建会的领导人施复亮也发表题为《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的文章，认为“中间的政治路线，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决不能为少数特权阶级（在今日中国是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所操纵，在经济上必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奖励民生必需品的扩大再生产，但不容许官僚买办资本的横行和发展，且须保护农工大众以及一切被雇佣者的利益，提高其购买力和生活水准”；中间路线要建设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资本主义的经济”；而他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在形式上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新资本主义经济则是要“尽量革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弊端”。他认为，“在今天中国的客观条件之下，只有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在客观上才是足以代表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整个国家的真正利益，所以中间路线的政治路线，是今天中国最可能为多数人民所拥护的政治路线。”中间路线的宣传者们只是单纯寄希望于统治当局的改革，从而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没有看到国民党当局一党独裁的法西斯本质，所以终究要失败。

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局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前后，对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无党人士的政策主要是拉拢和分化，因此，一方面同意民盟以第三方面的身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让民盟在国共两党之间调节争端；另一方面又利用民盟中的青年党、国社党等右翼力量，拆散民盟，以瓦解这个力量。在国民党的拉拢之下，政协会议前，青年党就从民盟中分裂出去了；全面内战爆发之后，国民党一首包办的“国民大会”召开时，国社党又从民盟分了出去。

国共和谈破裂以后，民盟发表了题为《中国民主同盟为和谈正式破裂发表宣言》，指出：“我同盟同人民更愿坦白以告天下者，吾人站在和平民主统一之立场，固与共产党为友，然亦同为国民党之友也”，希望双方“会有一日诉之理智，恍然于败固不了，胜亦不了，结果且归于失败，乃各动念放下屠刀”。

然而，国民党却对民盟举行了屠刀。在一系列打击诬陷之后，国民党当局宣布解散民盟。之后，民盟逐渐转入地下，它的一些组织和许多成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更积极地开展工作。民盟中央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周新

民等秘密到达香港。1948 年 1 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重新建立的民盟总部，由沈钧儒、章伯钧领导工作。沈、章在全会闭幕后向记者发表谈话时称：民盟必须与目前政见相同的政党及一切民主人士真诚的携手合作，必须在真民主真和平之中认清敌友，在是非之间，民主与反民主之间是没有“超然的”或者“中间路线”的存在可能。这就说明，民盟已经放弃了中间路线。

民社党、青年党则因为党见、参加国大、政府而产生分裂。1947 年 5 月下旬，不愿意参加国大的孙宝刚等人另行组织了民社党革新委员会，选举伍宪子为主席。该派于 8 月 15 日在上海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宣言，称张君劢利用民社党的党名是名不正、言不顺，名不副实。1947 年 7 月，民社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君劢当选为主席。《中国民主社会党总章》规定：“本党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为宗旨”，在上海设中央党部，在各地设省、市、县党部。其政治上主张反对政党武装、反对一党专政、采用合法手段渐进方式实现该党主义，以社会主义为改造国家的基本信仰。

青年党内部也因参加选举而产生纠纷。1947 年 9 月 1 日，青年党在上海召开十一大，到会者有百余人。会议要求国民党开放地方政权。曾琦继任中央主席。1948 年 4 月 17 日到 20 日，青年党召开十一届二中全会，因青年党提名的 80 多名立法委员，仅有 10 名当选，所以多对国民党愤愤然。1948 年 7 月 7 日，青年党革新派发表宣言，称赞中共召开新政协会议的五一宣言不无理由，表示寄以深切希望。

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3 月，民主党派领导纷纷秘密进入解放区。1949 年 1 月 22 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并坚决表示，“人民民主专政应容纳最广泛阶层之代表，而不能容纳反革命细菌；使最大多数人民有充分之自由，而不能使少数反动分子有反人民之自由。因此，我们确信，全国真正为民众革命而努力的人士，必能一致努力，务使人民民主阵线之内，绝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绝对不允许有所谓的中间路线之存在。”这一宣言，标志着中间路线的破产。

注释：

①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84 –

285 页。

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254 页。

③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年版，第 71、76、77、87 页。

④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83－284 页。

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的联合

中国共产党以极大地努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党的组织同各民主党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鼓励和支持他们坚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有效地帮助各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加强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各民主党派依据自身的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实现历史性的转变，这是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许多民主党派的组织和成员，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做了大量的工作。如积极进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这种宣传；利用同国民党的历史关系，配合中共敌军工作部门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同中共地下组织配合开展群众斗争；从事反蒋的军事活动；在华侨中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参加护厂护校斗争，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等等。中间路线失败后，各民主党派出现了历史转折，主要表现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和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上。

1947 年 11 月 12 日到 1948 年 1 月 1 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参加大会的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革命同盟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大会认真讨论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国民党民主派的任务，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成立宣言》、《行动纲领》、《组织总章》和《告本党同志书》。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言》重申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谴责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原则，明确指出，“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政治上之罪恶，均为蒋介石一手造成，蒋氏及其领导下的反革命集团，实为国内一切反动力量——大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土劣、流氓——之集合体”，内战以来



的种种灾难，“其责应由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反动集团负之”，“蒋介石真是全国人民之公敌，中华民族历史上之最大罪人！”郑重宣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宣言》追述了国民党民主派的斗争历程，宣告了民革的正式成立，表示将“集中党内忠于（孙）总理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前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推翻反对民主、破坏和平、媚外卖国的蒋介石之反动独裁统治”，“建立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指出：“只倒蒋而不反对美国反动派的破坏中国民主与和平的帝国主义政策，则蒋氏之反动独裁政权纵被推翻，卖国反动派支持下的第二个反民主政权，仍有可能成立”，因此，“倒蒋”与“反帝”实有“不可分性”。《行动纲领》本着“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的“最高理想”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之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完成“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革命任务的具体纲领，主要有：“联合各民主党派及其各界民主人士之代表组织联合政府”，“由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国内各民族之自治权”，“扶助农工组织，保障农工生活，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本独立自主之原则，与世界各国敦睦邦交，平等和平相处”等等。《告本党同志书》号召国民党内“忠贞之士”“团结一致，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奋斗”，“组成强大之革命洪流，冲除一切封建反动之遗毒”；敦促尚在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党人士“早日脱离蒋氏，参加本会工作”。[①]

1948 年 1 月 5 日，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紧急声明》、《宣言》、《政治报告》和《今后组织工作计划》等文件。《紧急声明》宣布：“代表本盟全体盟员”一致否认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无理而又狂妄的举动”；表示民盟 10 多万盟员“今后将更坚强地站起来，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②]

《政治报告》和《宣言》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民盟对时局的态度和政治主张，其内容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提出欲建立和平民主新政权，就必须消灭、打碎国民党反动独裁政权。指出，“南京国民党反动集团既已关闭和平之门，且不复容许任何不同意一党专政的反对党存在，则欲实现中古够的和平民主，已不可能由谈判妥协中求之。我们必须打碎一个独裁

反动贪污腐化的政权，才能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廉洁有效能的新政权”。（二）反对美国政府的援蒋侵华政策。声明“坚决地反对美国目前的对话政策，反对美国把中国当成远东反苏反共的基地，反对美国返工品一切直接间接危害中国主权的行动”；“决不承认美国政府与南京政府所签订的一切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条约，并认为美国政府给予南京政府的所有援助，都是与中国人民为敌”。（三）批评“中间路线”，反对“中立态度”；郑重声明，今后民盟的立场就是“人民的民主立场，对于人民与反人民之争，对于民主与反民主之争，我们就决不能有所谓中立的态度”；指出“民盟对国事，自然应该明是非辩曲直；是非曲直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民主同盟的真目的是中国的真民主，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在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重力的余地”；“至于独立的中间路线，从目前中国的现实环境看，更难行通。自从本盟被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勒令解散以来，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说法和幻想，实早已被彻底粉碎了”。（四）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指出“为了反对独裁卖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本盟愿伸出手来欢迎一起民主党派的合作，而且要与一切民主党派结成坚强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历史，日寇投降以来，为实现国内和平的努力，是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为了彻底肃清封建残余，和驱逐帝国主义，我们要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民主和平自由独立新中国的实现，是有赖于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其他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亲密合作，才能达到的”。表示“今后自应积极地支持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动的武装”；“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关系，实行耕者有其田，彻底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经济统制”，“没收豪门资本的财产”。[③]

民盟一届三中全会还相应地制定了新的“群众的革命性的”组织路线，强调民盟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全体服从组织”；“不容有个人自由主义之言行”，“严密各级地方组织，建立高度的组织纪律”，“严格吸收盟员，每一盟员必须具有坚定性与战斗性”；决定在解放区设民盟特派员，与中共密切配合，开展解放区民盟组织的活动。[④]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实现了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大联合，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了公开的彻底的决裂。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民革的成立，表现出民主党



派已经同意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基本原则，开始和中共紧密配合，一致抵抗国民党反动派。此外，其他民主党派，如中国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也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各民主党派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积极配合解放军作战，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 年民革在香港成立之后，积极建立反蒋武装，配合解放军作战。民革、民联、民促曾派人在广东东江和东韩江地区、云南地区、湘桂边区、闽浙沿海地区，组织了一些大小不等的反蒋武装。为加强对这些反蒋武装的指挥，民革在中国南方局的帮助下，曾在香港开办游击训练班，每期训练数十人，先后办了三期。学员受训后，就派回各地游击队成为骨干。各地反蒋武装活动，曾经给国民党地方反对统治者以一定的打击，牵制了国民党军队。

1949 年 4 月 25 日的《民革会、民促会南方发言人联合声明》指出："民国三十五年七月蒋介石发动集团全面内战后，本党部分同志激于爱国义愤，曾先后在华南各地自动进行军事活动工作，并在若干地区组织了各种不同名称的地方不对，他们曾将活动情形，分别向本会作过详细的报告。本会认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在人民解放军力量所一时未及的地区，利用一切关系与可能，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展开军事行动，是有必要的，所以当时本会曾同意他们的做法，并派出了一些干部去协助他们工作。"

1948 年 9 月，农工民主党在香港举行的中央扩大会议所通过的《政治决议》强调要加强军事工作。根据决议精神，农工民主党为配合解放军作战，在香港与中共有关负责人建立联系，开始了在中共领导下的新军事运动，他们在广东省的北江、兴梅、惠东、宝安和广州地区建立了 4 支武装共约 2 600 人枪，民兵 500 余人枪，为迎接当地解放而斗争。在浙江的杭州、诸暨、金华等地方分别组织了游击武装约 300 余人，与当地中共游击队密切合作，共同战斗。在江西的九江等 18 个县、区组织民主自卫军 4 500 余人，枪 3 000 余支，其中有些纵队、支队在配合当地解放中作出了较好的成绩。在湖南的湘西成立了"溆沅辰人民解放军总队"，人枪 3 000 余，同国民党军残部血战 10 余次，为迎接解放及协助人民政府剿匪、征粮作出了贡献。在广西组织了数百人的"富川游击队"，在当地开展自卫斗争。在四川的川北以中江县为中心，成立"农民自卫军"近百人，在当地策应解放，维持治安，以及配合解放军瓦解国民党军残部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以上武装均在

当地解放后按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接受了改编。[5]

民主同盟也积极支援解放军。民盟西北总支部、江西省支部、云南省支部动员盟员和部分青年学生参加解放军，与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民盟北平支部1948年组织近200盟员知识分子，去冀中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

此外，各民主党派还广泛搜集军事情报、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农工民主党从1948年到1949年，为了方便解放军进军南方作战，搜集了不少军政情报。民主同盟派忠实可靠的盟员打入敌人内部，搜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序列、部队番号、驻地人枪机密命令等重要情报，以支援解放军战斗。

1948年11月6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告蒋管区本党同志书》，号召国民党“忠贞之士，坚持团结，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奋斗；尤其在蒋氏控制之下本党进步同志，尤宜率先起义，早得挣脱魔掌，参加本党革命工作，以铲除独裁，光复本党，共同完成民主革命之伟业”。号召党内进步同志，把握自己的岗位，随时随地，做好彻底的反蒋工作。

1949年6月4日，民革又发表《告前南京国民党系统党员书》，指出：“人民解放军或游击队，很快就会临近你们。你们如果是在军队服务，就必须与解放军或游击队联络或就地起义，或率队投奔解放区和游击队。你们如果是在地方政府服务，就必须把解放军或游击队欢迎进来，共同维持地方秩序，保护人民的种种利益。你们如果是在经济的或文化的机关服务，就必须团结职工，联合民众，保全所有的物资文献，等待接管。这样，你们就算为人民立了功！将来人民政府，必然依据你们的功绩和能力，为你们安排工作”。

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不仅是工农基本群众，而且包括上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都已经团结到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已经无法逃脱彻底失败的命运。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从5月5日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等相继发表声明、宣言和通电，热列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此后，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在香港的等地就召开新政协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热列的讨论，提出许多积极的意见。自 1948 年 8 月起，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注释：

①陈竹筠，陈起城：《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08-121 页。

②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年版，第 363-364 页。

③同上，第 375、376、377、394、395 页。

④同上，第 370-373 页。

⑤于刚：《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07-309 页。

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蒋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从1947年至1948年1月，国统区人民武装日益发展壮大。据川、康、滇、黔、桂、闽、赣、湘、鄂、苏、浙、皖及新疆等14个省份的不完全统计，人民武装的总数以达到50万以上（最低的估计），遍布于400多个县份（台湾尚未包括在内），给予蒋介石政权以严重的打击与威胁。[①]

随着内战的爆发，国民党大量增兵新疆，引起了新疆人民的强烈不满。1947年5月，又以大土耳其主义者麦斯武德为新疆省主席，遭到了三区代表的反对。在民族军的改编和国民党军开入三区等问题上，双方也僵持不下。此外，民族败类乌斯满在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宋希濂的指使之下进攻三区，被打败后转移到北塔山地区，在苏、蒙边界挑起武装冲突，渲染“苏蒙侵略中国疆土”。至此，新疆的和平局面就被破坏了。1947年8月间，三区代表纷纷离开迪化（乌鲁木齐），新疆联合政府结束。

新疆联合政府破裂后，国民党反动派把大批军队开进新疆，并于1947年9月指使乌斯满、贾尼木汉等少数民族中的败类，向三区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进攻。1948年春，三区各族人民在阿哈买提江为首的革命派领导下，从承化赶走了乌斯满叛军，并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从而初步稳定了三区革命根据地。此后，在三区革命根据地内，开始纠正了革命初期的某些错误，如无区别地对待一切汉人的错误政策，提出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劳动人民团结一致，争取民主的口号。与此同时，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也采取了许多进步的措施，因而，三区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一些发展。在此基础上，1948年8月1日，在伊宁成立了新疆各族人民统一战线的组织“保卫新疆和平民主同盟”（简称新盟），推选阿哈买提江为主席。到1949年8月，盟员发展到八万人。

1948年12月，新疆省政府改组，撤换麦斯武德，包尔汉被委任为新疆



省主席。此后，在全国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于1949年9月25日宣布起义。从此，新疆人民获得了解放。

在广西，人民武装活动地区扩展到了39个县，其中最著名的在东南部容江流域有“民主联盟军”，在陆川、博白一带有邹正领导的人民武装，成立了“化北军区司令部”，在兴安、富川一带的人民武装成立了“桂东解放区”，该省之容、贵、横、万岗、武宣等县城，均曾经一度为民军攻占。广西的僮族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右江、左江一带以及桂中南、桂北、桂东等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蒋斗争。右江地区反蒋斗争，以万岗、东兰、凤山和天峨等县为中心，1947年2月，成立了中共东万凤委员会。8月22日，党领导了万岗武装起义，连续解放了万岗和凤山。从此，游击队组织壮、瑶各族人民展开了反对“三征”的斗争，使敌军“兵征不来，粮征不来，税收不了”，严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地方政权。游击队经过多次战斗更加壮大起来，在1949年5月扩编为桂西人民解放军四个大队，并向凤山、天峨、百色、田东等县活动，使游击区连成一片，在游击区内建立了政权。在左江地区，1947年4月，在中共左江工委的领导下，发动了龙州、靖西、明江起义，缴获国民党军许多轻重武器，大大鼓舞了左江一带的壮族人民反蒋斗争。1949年4月，游击队经过反复斗争，把游击区连成一片，在龙津、靖西、上金等县建立了革命政权，拥有人口65万，并建立了专员公署。

分布在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等省的瑶族人民，也先后掀起了反蒋斗争。1947年12月，在鄂北地区的英德、仁化、翁源等县，建立了游击根据地。瑶族人民积极支援了各根据地的反蒋战争，参加游击队。在广西，瑶族人民和壮族、汉族人民一起，坚持了西山游击区等地的斗争。粤桂边区纵队的第三至队伍由汉、瑶、苗、壮族人民组成，其中有的连队全是瑶族人民。

1946年初，国民党军队在四川、西康、云南边区屠杀彝族、汉族人民达20万，并大量得搜索白银和鸦片，侵夺土地。12月，蒋介石动员了川康云贵四省兵力，成立了“剿夷总部”，在乾河湾修筑飞机场，向彝族人民进攻和轰炸。蒋军的粮食和柴草，强迫附近各县的汉族人民供给。汉族人民群起反抗，并发动了武装斗争。于是，彝族、汉族人民武装联合在一起，组成了“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共同反抗蒋家王朝。川、康、滇、黔诸省的人民武装，据1947年国统区的报纸估计，拥有32万左右，活动地区至少160多

个县份。

四川全省民变武装大约有 12 万人之众，新旧部队总共百余单位，遍及全省百余县份。其中川滇黔三省边境的人民武装约 8 万人，大小 10 余部，合组为“川滇黔总司令部”。川北嘉陵江沿岸的人民武装，拥有人枪数万，武器有机步枪、山炮与迫击炮，活动于嘉陵江两岸的旺苍、广元、通江等 11 个县份，广泛发动当地农民抗粮、抗丁、抗税以及反对土豪劣绅，因此，农民纷纷起义，使部队日益扩大。川黔湘鄂边境之瞿伯级部，下辖 4 个支队，大约 5 000 人，活动于秀山等地。川西峨眉山脉邛崃山区之民变武装达万人，自称“民主人民军”，活动于洪雅等县。成都西北岷江流域有数部民变武装，活动于崇庆、汶川、灌县等地。在岷江上游之松藩、茂县等地尚有季星武率领的汉夷民变武装数万人。

西康民变武装分为两部分，一部为活动在雅安、天全等地的“人民自卫军”，总司令为程志成、拥有人枪五六万；另一部为大凌山区普雄一带之少数民族武装 10 万余人，总司令为乌鲁合木支。此外，在德昌、会理等县尚有汉族与少数民族农民武装，他们都在坚持反蒋斗争。

云南民变烽火燃遍了 35 个县，人数达到了 4.4 万人。民变武装分布于：滇南箇碧石铁路一带之蒙自、石屏、健水等县，其中有许世好领导的“民主联军滇南第一纵队”约 5 400 人，石屏龙永和部六七千人。滇西南盘江流域之邱北、广南一带有“民主联军”近万人。滇西北之巧家、鲁甸、镇雄、威信等县有民变武装千余人。滇东的曲靖、霑益、罗平、师宗、宣威及黔境的兴义、盘县、威宁等县有陶永忠、李德兴、魏光兴等部以及少数民族安都帮等四五千人。此外，滇南蒙乐山脉南麓思茅、宁洱有高彩然、高汝云等领导的武装数百人。滇北普渡河流域武定、罗次、安宁与滇西北毗连康境的德钦县等均在民变武装的控制之中。

贵州的民变武装共有 9 部，大约 2 000 人左右，散布于毗连滇境之兴义、永城、威宁、织金；川滇边境之大定、黔西、金沙、仁怀及灵界湘境之铜仁等 13 县。

海南岛的黎族人民，战后就开始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1947 年 1 月，琼崖纵队司令部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派出了大批工作人员，深入琼中各地，发动黎、苗各族人民，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并进行了清匪肃特的斗争。5 月，中共琼崖特委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在解放区内展开土地改革和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1948 年 6 月，琼崖纵队在黎族人民的积极支



援下，解放了白沙、保亭、乐东，初步地巩固了五指山根据地。9月，琼崖纵队集中优势兵力，对国民党军队连续发动了三次攻势，解放了儋县、昌江、陵水、万宁、乐会、定安以及石碌矿区、广坝水电站等地区，消灭了国民党军四千九百多人，更加巩固和扩大了五指山根据地。1949年5月，在白沙（后迁至乐东）成立了琼崖少数民族行政委员会，黎、苗各族人民所理想的民主权利实现了。

“二二八”起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之后，台湾人民再接再厉，继续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以谋求台湾人民的解放。1947年8月，台湾革命者谢雪红、苏新等转战香港，酝酿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9月，他们首先成立了新台湾出版社。在征得台湾岛内革命团体、大陆的台籍革命人士、上海台湾同乡会、《大公报》李纯青、李伟光的支持后，11月12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正式成立，简称台盟，并制定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纲领草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规程草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会时局口号》以及《成立文告》等文件。这些文件于12月1日在香港《华商报》正式公布。台盟的成立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热情帮助和支持指导。台湾的领导机构，在成立时没有对外公布，到1948年7月12日方在香港正式公告台盟总部成立和总部负责人名单，分别为谢雪红、杨克煌、苏新。

台盟赞成和接受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的政治主张。《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纲领草案》提出18条政治主张，主要是：“设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独立、和平、民主、富强与康乐的新中国”。《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规程草案》第三条规定，本同盟以实现台湾省之民主政治，及地方自治为宗旨。同时，针对当时国民党统治的情况，在政治上强调：打倒独裁专权，实行人民民主制度；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保障人民身体、行动、居住、迁徙、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之基本自由；实行台湾省彻底的地方自治等。在经济上，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取消苛捐杂税，实行耕者有其田，恢复生产，救济失业者及贫民。在外交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确立独立自主之外交，提出“中国之领土及领海不许任何外国军队驻扎”，“反对美军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不许日本侵略势力复活，反对非法的对日合约”等原则问题。

此外，在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居住的苗、彝、布依等少数民族人民，也进行了英勇的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边疆以及少数民族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游击队和人民政权，共同打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支援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沙英：《空前壮大的蒋管区人民武装》，《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0册，第352页。



决战前的形势

从 1947 年 7 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后，中国革命战争进入了转折时期，经过一年的作战到 1948 年秋，进入了国共双方主力决战的战略阶段。

经过两年多的较量，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形势都在向着更加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方向发展着。

自 1946 年 7 月全面战争爆发到 1948 年 6 月，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从局部被削弱到整体被削弱，战略上已经处于被动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不断增强，逐渐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两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从 127 万人增加到 280 万人，其中野战军由 61 万人增加到 149 万人；而国民党军两年的时间中被歼灭 264 万人，其中被俘虏 163 万人，军队总人数由 430 万人减少为 365 万人，其中正规军 198 万人。兵力对比，已经由战争初期的 3.5∶1 缩小为 1.3∶1，其中正规军对比为 1.32∶1。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是能够在第一线机动作战的兵力则已居劣势。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上要少于国民党军队，在装备上也还远低于国民党军队，但是经过两年多的内线和外线作战，已经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人民解放军在消灭大量敌人的同时，缴获了大量的美式现代化武器，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建立了强大的炮兵队伍，除纵队以下各级都建立了队属炮兵团、营、连外，全军还组成了 35 个预备炮兵团，装备留重炮 1 100 多门。部队普遍学会了使用炸药作为夺取城市和据点的主要手段，并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工兵部队。提高了攻坚能力，在临汾、石家庄、四平、开封等战役中，取得了攻坚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同时人民解放军利用战斗间隙，用“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式，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政治素质、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解放区的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参战，坚决保家卫田；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经过政治教育以后，也纷纷自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而使解放军源源不断地得到兵员补充。毛泽东指

出："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①]

此时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还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也比人民解放军更占有优势，并且仍然统治着全国3/4的领土和2/3的人口，但是由于国民党所进行的是反革命的非正义内战，国民党的统治集团极端腐朽没落，其统治已经陷入了绝境。国民党军队在此阶段因为成建制的被歼灭，高级将领大批被俘虏，士气不振，军心涣散，战斗力严重下降。随着军事形势的每况愈下，蒋介石统治集团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危机也在迅速加深。蒋介石在《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的讲话中指出："过去两年来的剿匪军事，我们全体官兵牺牲奋斗，固然有若干成就，但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这几个月以来，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形的表现，的确是严重而危险"。"现在我们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有许多受我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被俘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我心中更觉得沉痛万分无地自容"！[②]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8年8月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一份报告中也说："局势的恶化已经进展到接近崩溃的地步"。

蒋介石也于此时被迫放弃"全面防御"的计划，转而进行所谓的"重点防御"，企图以其现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战略的重要点和线。国民党为了避免遭受歼灭，便以精锐部队为核心，实行兵力靠拢猬集一团，以此达到使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的目的。同时，裁并绥靖区、扩大兵团，吞并整合杂牌军，裁减机关，以求最大限度增大机动兵力。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大量征集壮丁，扩充二线部队，以便整顿和补充兵力，进行着最后的垂死挣扎。

但是在人民解放军大规模进攻面前，国民党再也无法摆脱战略上的全面被动地位。国民党军队正规军中，分布在第一线的249个旅174万人，分属于5个战略集团，即胡宗南集团、白崇禧集团、刘峙集团、傅作义集团和卫立煌集团。而此时这5个战略集团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牵制在西北、华中、中原、华北和东北5个战场上。只能担任战略据点的守备和附近地区的战役性机动。东北战区为卫立煌集团，总兵力64万人，分布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的地区，依靠北宁线上的锦州榆关段作为他们和关内的路上通道。华北战场为傅作义集团，总兵力60万人，分布在平绥线上的归绥、张



家口和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各要点，依靠塘沽港作为他们海上补给的通道。华东战场的刘峙集团，总兵力60余万人，且在战役阶段有一个增援兵团和其他部队，以徐州为中心地，在西起商丘东至连云港的陇海线上及南至蚌埠线的津浦线上，阻止华东野战军南下。中原战场为白崇禧、李宗仁集团，约75万人，分布于平汉线南段以及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西北站场的胡宗南集团，兵力约35万人，被牵制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除了上述5个战场以外，在长江中下游和巴山山脉之线以南、兰州和贺兰山以西的后方广大地区，还分布着国民党正规军36个师旅，总计约23万8千人，但绝大部分是新建部队，战斗力尚弱，或被共产党游击队所牵制，很难机动。这样国民党军队就没有完整的战线了，除某些地区还有一部分兵力可作机动以外，大多数部队出于被动挨打的状态。这种国共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战时机已经到来。

随着军事形势的巨大变化，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也日益加深，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则不断扩大和巩固。

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腐败政治，国统区广大中间阶层迅速觉醒，拒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国民党内一些地方实力派开始与中共联系，准备弃暗投明。国民党内部斗争更加突出，反蒋倒蒋日益激烈。副总统李宗仁竭力争取美国政府的支持，企图逼蒋下野。一直支持蒋介石内战的美国政府也开始怀疑蒋介石的能力，开始转变政策，甚至策动“一种所谓去掉蒋介石的和平运动”。[③]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写到：“过去的一个月里，中央政府的威信和权力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蒋委员长不能以其权力改变时局，地方军政长官被迫考虑区域谅解或组织区域整治结合以应付南京政府失败或权力崩溃的局面”。“现在尚不能预计什么事件会使总统与任何可能的区域领袖发生分裂”。[④]“目前街谈巷议的是人们普遍怀疑政府的继续存在”，“正如我们所观察的那样，蒋委员长作为一个政治因素，其重要性正日益缩小，这已经是确凿不移的估计了。人们普遍地谴责他无能，诅咒、责备他顽固地拖延内战直至自取灭亡”。[⑤]司徒雷登还向美国国务卿提出：是否“我们可以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其他的较有政治前途的政治领袖。”[⑥]

随着内战的进程和国民党统治区殖民地化日益加深以及官僚资本疯狂掠夺的加剧，国统区经济危机日趋严重。由于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军费开支庞大，财政赤字连年增长，内外债沉重。1946年国民党政府军费支出为6

万亿元，占该年实际支出总额的86%，财政赤字约6至8万亿元；1947年为29万余亿元，占全年支出的67.6%；1948年为900万亿元；1948年6月，赤字达到财政支出的95%。1947年，国民党内债即达18 580多万美元，外债达85 750多万美元。为了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除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搜刮之外，印刷钞票成为国民党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办法。抗战结束时，法币的发行额为1.656万亿元；1946年底增加到8.2万亿元；1947年底剧增到40万亿元，比较抗战前增加23 500多倍；1948年6月猛增到400万亿元。法币发行额剧增，带来货币贬值，购买力急剧下降，物价急速上升。以抗战爆发前的物价为标准，到1947年底上涨了14.5万倍，高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何一国。法币的价值已下降到不抵自身的纸张和印刷费用了，法币失去了货币的基本功能。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导致产品滞销，工商业资金无法周转，再加上美国垄断资本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联合排挤与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大量倒闭。据不完全统计：自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20多个城市，工商业倒闭达2.7万多家。1947年国统区工业生产比1936年降低10%。工商业的倒闭和工业生产的下降，直接加速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在农业上，国民党政府大肆搜刮与掠夺，农民不仅繁重的地租、田赋、捐税等急剧增多，各种摊派也多如牛毛，“一般自耕农负担通常达到其收获量的60%至80%”⑦。再者，随着内战的进行，国民党的征兵数量日益增多，使农村劳动力大量减少，造成土地荒芜，产量下降。1946年河南、湖南、广东三省就有荒地5 800万亩之多。农业生产急剧衰退，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的危机加速了工农业生产的危机，而工农业生产的危机，又反过来加剧了财政金融的崩溃。随着工商业的倒闭和生产的下降，国统区失业人数剧增。在业人员的实际收入也大幅度下降。1946年全国有1 000万人死于饥饿，1947年各地饥民达1亿以上，形成了饥民遍野、饿殍载道的人间地狱。宋子文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只好承认：1946年“遭逢数十年未有之饥馑，灾民达数千万”⑧

为扭转经济崩溃的局面，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作为本位币，发行总额20亿元，限期以300万：1和30万：1的比价收兑法币和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金、银、外币，逾期不兑一律没收；各地各种物品和劳务价格，均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准上，依照兑换率折合金圆



券出售。国民党的币制改革，是对各阶层人民的又一次大洗劫，大量的黄金、白银、美钞，被政府强制收兑回去。在生产下降、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依靠暴力劫持工商业者所造成的“平价”局面，是维持不住的。在抢购风潮之下，限价政策很快破产和被废除，跟着就是金圆券的大幅度的贬值、发行限额的废除和物价的更加狂涨。金圆券发行额，1948 年 8 月为 5 亿多元，1949 年 4 月增至 51 612 亿元，8 个月增发 1 万多倍，超出原限额 2 580 倍，金圆券几近废纸。物价指数，至 1949 年 4 月比 1948 年 8 月，上涨 83 800 多倍。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彻底崩溃，国民党政权的反动统治即将走向灭亡。

与此相反，随着人民解放军军事上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主要战场推向了国统区，各个主要解放区已经相继连成一片，可以在战略上直接相互支援。解放区的面积已经扩大到 235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1/4；解放区人口 168 000 000，占全国总人口的 1/3 以上。解放区内已经完成或者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和生产的积极性，经过一年的休养生息，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从而使人民解放军后方更加巩固。中国共产党地下战线在国统区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也争取了各大城市各阶层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站在自己方面，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

面对日益恶劣的国内形势，为了扭转军事败局，挽救政治危机，国民党政府改组了战区指挥机构和统帅部。为检讨两年以来的作战经验教训，制定出新的战略，蒋介石于 1948 年 8 月 3 日，在南京国防部召开“军事检讨会”，各战区高级将领和政府高级官员参与，会议进行了 5 天，到 8 月 7 日结束。

早在 1948 年 6 月 16 日，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就通知各“剿匪”总部，各绥靖公署，各兵团，各绥靖区以及各整编师，为加强戡乱，决定召开军事检讨会。其内容是：剿匪军事之总检讨、对匪军战法之研究和我军战法之检讨、华中作战之检讨、总体战之检讨、提高士气之方法等。要求各单位充分研究并准备提案。7 月 16 日和 7 月 29 日，国民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召开了两次预备会议，综合各方提案，确定将政略、战略、战法、指挥、情报、征兵、恢复斗志等 22 项提案，提交军事检讨会审议。

3 日军事检讨会在南京国防部秘密举行。蒋介石亲自到会并做了多次训话和讲评。蒋介石在开幕时讲话：“过去两年来，尤其是这几个月来，无论

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情形表现，的确是严重而危险”，[9]已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要求与会将领会议期间要“必须彻底反省，彻底检讨，在会议以后，能真正有一番起死回生的改革”[10]

军事检讨会在预备会议的基础上，通过了许多决议案。

在军事方略上，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 今后要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即所谓“军事应作久远方针”，而否定了两年来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对匪应并用歼灭战与消耗战”，要改变过去单纯以攻占城市，攻占交通线为主的作战指导。

2. 将作战重点放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在这一地带“各绥（靖）区国军配合地方武力堵剿兼施，国军主力则编组强大之剿兵团，捣毁匪军根据地。猛烈进击，使成流寇，然后依据各兵团之增强，迫匪于绝地而歼灭之”。

3. 东北地区，“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

4. 确保华北，以利黄河以南之作战。

5. 西北须计划建立以兰州为中心之独立作战地带，陕西须建立一骨干部队，支配战场，确保汉中，并于四川及汉中及时建立一个坚强兵团，以应陕甘之急需。

6. 长江以南成立绥靖公署绥靖区，培养地方武力，争取人力、物力，廓清散匪，俾总动员实施有利。

在政治方略上，会议决定要“动员全民积极实施总体战，发挥政治、经济、军事及一切力量之总和，全力进剿并使党政军民一元化，以期步调一致”；“试试全面动员，确定戡乱第一”，“使政治区分与军事区分密切配合灵活运用”；要“加强金融监管，实施银行国营，黄金白银国有，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币制。”[11]

在战略方针上，会议确定了“东北求稳定，在华北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12] 1948年8月8日：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各绥靖区国军配合地方武力堵剿兼施，国军主力则编组强大之进剿兵团，捣毁匪军根据地，猛烈追缴，使成流寇，然后依后备兵团之增强，破匪于绝地而歼灭之。”在华北地区，“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河，热河，以巩固华北；确保华北以利黄河以南之作战。”“西北需按计划建立以兰州为中心之独立作战地带，陕西须建立一骨干部队，支配战场，确保汉中，并于四川及汉中及时



建立一个坚强兵团以应陕甘之急需。”

为了实现这个新的战略方针，南京国防部采取了多种措施：

1. 充实战斗部队，将整编军及整编师、整编旅改成兵团、军、师，每师 3 个团，一个军以 3.5 万人定编。

2. 加强战略城市的守备。会议决定立即筹措资金，并责成各剿匪总部，各绥靖区绥靖公署选定主要城市构筑强固工事，配备重兵，以便长期固守，作为坚固的战场支撑点，同时以精锐兵力为骨干，组成若干个 10 万人以上的机动兵团，加强战场应援力量，使解放军既“啃不动”这些强固据点，又“吃不掉”这些机动兵团，在坚城之下被动应战。

3. 迅速编练战略预备队。会议决定，为应戡乱之需要，全军兵力总额应保持在 500 万人。因此要在长江以南及西南、西北广大地区设置若干个“编练司令部”，组训新兵 150 万人，并首先编组成 50 个步兵师，10 个骑兵师，使正规陆军规模达到 370 万人，海、空军各达到 20 万人。

4. 加强作战意识。会议决定，要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以便促使士兵尤其是高级将领确立必胜的信念，坚定对元首的信仰和发扬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

5. 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合并成一个战区；东北、华北合并为一个战区，“各置统帅一人节制之”；在西北“应迅速建立西北剿匪总部，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剿匪军事”。此外还要求各级将领加强对解放军战法的研究。

蒋介石强调南京军事检讨会“意义十分重大，是今后剿匪成功之关键”，务必要把这次会议的决议案于两星期之内积极执行。只要能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实施，即可使剿匪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373 页。

②《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编，第 1632 页。

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 3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32 页。

④⑤（美）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32～233 页，第 234 页。

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版，第 786 页。

⑦《东北日报》1948 年 4 月 2 日。

⑧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⑨《郭汝槐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91 页。

⑩蒋介石：《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器》，台湾《蒋总统选集》第 2 册，第 1632 页。

⑪《震撼世界的大决战》，王道平等著，解放军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1 页。

⑫天津《大公报》。



中共召开九月政治局会议

国内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发展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政治上、军事上夺取全国胜利的条件已经具备。为了尽快的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实现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南京国民党军事检讨会议召开后不久，1948 年 9 月 8 日至 13 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这是中共中央离开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抗战结束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聂荣臻、陈毅、徐向前、饶漱石、曾山、邓小平、薄一波、邓颖超、廖承志、滕代远、叶剑英、张鼎丞、贺龙、刘澜涛。列席会议的重要工作人员有杨尚昆、李维汉、胡耀邦、傅钟、胡乔木、安子文、李涛、冯文彬、黄敬、李克农。即政治局委员 7 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14 人，重要工作人员 10 人。其中有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主要听取和讨论了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会议的任务是总结检查过去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今后时期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中心议题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

在九月会议召开前的 8 月 28 日到 9 月 7 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有关事项，草拟文件，为会议的顺利召开作出充分的准备。8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召开，刘少奇主持，听取毛泽东的报告。9 日至 13 日，与会人员参与讨论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会议文件。会议最后一天，刘少奇做出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的重要发言，毛泽东做会议的结论。大会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会议检查了过去时期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内的思想、意志和纪律已经达到高度的统一。

毛泽东在9月8日首先做出会议报告，报告分为8个部分：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我们的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发扬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准备占领全国后各方面工作的干部；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等。整个报告贯穿一个主题思想，这就是如何实现战胜国民党蒋介石和胜利后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与会同志围绕这个主题进行了认真、深入地讨论。

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重申了1946年提出的对国际形势的三点估计：世界大战的危险“必须而且能够克服”，美苏之间在若干国际问题上将或迟或早达成妥协，美苏之间的妥协是苏联及一切民主力量向反动派力量做斗争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各国人民都必须向发动派妥协。毛泽东指出：“从古以来，反动派对民主势力就两条原则，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留待将来消灭之。……我们对反动派也应采取同样的两条原则，我们今天实行的是第一条。”[①]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提到不能排除美国在局部地区实行直接干涉的可能性。

毛泽东在报告中的第二个问题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方针，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问题。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会议指出，战争进入第三年，这是争取五年胜利中的关键一年。今后局势的发展有两种可能：如果战争第三、第四年给敌人的打击很严重，加上敌人政治经济危机的发展，则蒋介石的统治可能垮的更早些，胜利会来的更快些；另一可能即美国出兵，则战争也可能延长。我们既不能因为胜利太快而无准备，也不要因为胜利稍慢而没有耐心。会议重申了城南庄会议的计划，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毛泽东对此解释说：“我们一时打不到江南去，不能很快向珠江流域进攻，也不要紧，如果在长江以北歼灭敌人兵力百分之八十，则五年左右还是一样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争取五年胜利，首先要“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到敌人身上，并且“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大的会战”。“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加”。“攻坚与野战相结合。攻坚敌必增援，造成野战的机会。”他还说：战争第三年的作战计划，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路，各战场的战役协同增加了，战争的计划性更增加了。[②]完成规定的歼敌任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要求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正规化，作战方式要由游击战争逐渐过渡到正规战争，要加强纪律性，客服无纪律状态和游击主义。会议同时提出，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是支援战争的重要环节。要求一方面设法从国民党统治区去获得战争所需要的大量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另一方面在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生产的同时，发展商业贸易，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会议认为，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必须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在前线注意缴获归公，爱护自己的有生力量，爱护武器，节省弹药，保护俘虏；在后方，减少国家机构的开支，减少不急需的人力和畜力的动员，减少开会时间，注意农业的季节，不违农时，节省工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同时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使党工作重心逐步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在谈到社会经济时，毛泽东指出："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他最后特别强调："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但不能误解，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毛泽东在会议上作结论时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在发言中，就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基本经济政策和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主要途径问题，作了全面论述；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其成分由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经济、私营经济四种形态构成，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国内主要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私人资本家的矛盾"，"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经济竞争是长期的，首先就是反对投机资本。这种斗争的性质，是带社会主义性质的，虽然我们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这种竞争是贯穿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又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资产阶级要来跟我们争领导

权，要把国家引导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个斗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否则，领导权仍不能巩固。”

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机关要充分注意党的自身建设，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加强组织纪律性等党和军队的建设问题，并提出坚决反对党内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会议分析了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产生的原因和主要表现。指出：“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主要表现为：“擅自修改中央或上级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损害，极为巨大。”会议讨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问题，通过了两个重要决议，对扩大和健全党内民主作了明确的规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决议规定：

1. 在一切巩固的解放区，党的各级委员，必须遵照党章的规定从现在起，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讨论中央的指示和各种工作，并选举和补选党的各级委员会。

2. 对于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必须赋予党章所规定的一切权力，不许侵犯。

3. 党的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及代表会议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

4. 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将不同意见的争论，及时地、真实地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必须报告中央。

5. 各级党委会召集各级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以便缩短开会时间，获得完满结果。

6. 健全党委制，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决议强调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组织纪律



性，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以便达到全党全军在方针上、政策上、行动上的完全一致。

周恩来对于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人民解放军要“统一建制”，今后成立新部队要报告，不准擅自增编，番号要全国统一排列起来，还必须建立若干正规制度。要建立地方武装，精简后方机关。这些为加强军队纪律性是有力的组织措施。

任弼时在发言中强调了加强纪律性问题，指出：“由于地区趋于统一，党之威信高了，战争规模加大，兵力集中作战，更感需要加强统一集中领导，加强纪律。”“我们由乡村走向城市，更需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而且越前进越胜利，则这些问题，这种坏倾向越可能滋长。故需加强纪律性，统一集中，请示报告，服从纪律，不然，我们就不能战胜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

会议对将要建立政权的性质、名称提法及准备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中作了深刻的论述：“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我们要打倒他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又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她的。”关于政权的制度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要“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他说：“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会议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度，……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会议决定组织一切民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于1949年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以取代国民党政府。“政协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是要开一次，今年开始准备，战争第四年将要成立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叫做什么名

字，临时再定，其性质是临时性的中央政府。”

会议提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4万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 000万至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

对于执行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将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会议也作出了充分估计。在总结时毛泽东强调既要充分的估计困难，也要充分估计克服困难的可能性。

九月会议结束以后，1949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向全党通报了会议的主要情况。

首先，总结了两年以来各个方面的成就。在两年作战中，人民解放军歼敌264万人，其中俘敌163万人。缴获步枪近90万枝，重轻机枪64 000余挺，小炮8 000余门，步兵炮5 000余门，山野重炮1 100余门。两年中人民解放军由120余万人增加到了280万人。解放区现有面积23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9 597 000平方公里的24.5%；现已有人口168 000 000，占全国人口475 000 000的35.3%；现有县城以上大中小城市586座，占全国城市2009座的29%。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决领导农民实现了土地制度的改革，现已在大约一万万人口的区域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土地大致平均地分配给了农村人民，首先是贫雇农。共产党党员由1945年5月的121万，增加到了现在的300万。经过过去3年，特别是最近1年的伟大的激烈的革命斗争和对于自己错误的认真的纠正，全党的政治成熟程度是大进一步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这表现在各大城市中争取了广大的工人、学生、教员、教授、文化人、市民和民族资本家站在共产党方面，争取了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站在共产党方面，使国民党完全陷于孤立。在南方几个大区域内（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粤桂边区，桂滇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和浙江东部南部）建立了游击战争根据地，使这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发展到了3万余人。在人民解放军中，恢复了被取消的军队中的各级党委制和连队中的战士委员会制，这样就使军队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和自觉性大为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大为增强，感化了大约80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军战士，掉转枪口打国民党。两年内，从解放区动员了大约160万左右分得了土



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多的铁路、矿山和工业，共产党正在大规模地学习管理工业和做生意。两年内，我们的军事工业有了相当大的增长。但是还不足以应付战争的需要。我们缺乏若干重要的原料和机器，我们基本上还不能炼钢。我们已在华北4 400万人口的区域建立了统一的党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人民政府，并决定由这个政府将华北、华东（有人口4 300万）和西北（有人口700万）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事工业的领导和管理工作统一起来，以利支援前线，并且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将东北和中原两区的上述工作也统一起来。

其次，关于从1946年7月算起，以5年左右的时间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问题。早在1946年11月，毛泽东就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对整个解放战争做了轮廓的描绘，指出人民解放军可用半年到一年粉碎国民党的进攻，然后转入反攻，用3到5年时间结束战争。随后在1947年7月的“小河会议”及1948年3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指示电报中，又提出了用5年左右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全军、解决对蒋介石的斗争问题。在这次的九月会议上，又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做出论证，正式作出了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500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100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750万人左右（平均每年150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决策。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每年歼敌正规军100个旅（师）左右，5年共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再次，指出国民党现有全部军事力量365万人中的70%是在第一线（长江和巴山山脉之线以北，兰州和贺兰山脉之线以东，承德和长春之线以南），在其后方者（包括长江和巴山山脉之线以南，兰州和贺兰山脉之线以西）仅有大约30%。国民党现有全部正规军285个旅，198万人，其中在第一线者249个旅，174.2万（北线99个旅，69.4万，南线150个旅，104.8万），在其后方者，仅有36个旅，23.8万，并且大部分是新建立的部队，缺乏战斗力。因此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为着执行歼敌任务，除有计划地谨慎地从解放区动员人民参军外，必须大量利用俘虏。同时会议还提出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会战性质的战役，要准备闯两个关，一是准备一举攻占有国民党守军10万以上兵力守备的大城市这一关；二是准备一次歼灭国民党军10万人以上兵力的强大增援兵团这一关。

第四，加强解放军的建设。一是3年内解放军总兵力要扩建到500万人。会议认为，我军现有280万人，今后3年准备收俘虏参加我军170万人，动员农民参军200万人，除去消耗，5年作战，我军可能接近500万人。二是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用最大努力克服无政府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三是使作战方式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有计划地走向正规化，走迟了就要犯错误。为此目的，必须尽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

第五，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干部的准备，虽然大部分应当依靠老的解放区，但是必须同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国民党区大城市中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的文化水准较之老解放区的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我们应当大批地利用。解放区的学校教育工作，必须恢复和发展。

第六，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团结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共产党周围。组织国民党区域的这些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1949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第七，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这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中央会议认为，必须一方面使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区域发展胜利的进攻，将战争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大量地从国民党方面和国民党区域去取得；另一方面，必须用一切努力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使之较现有的水平有若干的增长。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则需要有较好的组织工作，很好地领导解放区内部的市场和管制对外贸易，解决某些机器和原料缺乏的问题。首先是解决交通运输和修理铁路、公路、河道的问题。目前解放区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主要是供应战争的物资和兵员不足，通货膨胀已到了相当大的程度，而我们的组织工作特别是财经方面的组织工作不够，则是形成这种困



难的原因之一。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必须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在前线注意缴获归公，爱护自己的有生力量，爱护武器，节省弹药，保护俘虏；在后方，减少国家机构的开支，减少不急需的人力和畜力的动员，减少开会时间，注意农业的季节，不违农时，节省工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全党动员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做生意，尽可能地将各解放区的经济加以适当的组织，克服市场上的盲目性，并同一切投机操纵的分子进行必要的斗争。

第八，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

第九，提出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又拟定了两个重要的计划：第三年解放军的作战计划和全军的建设计划。

作战计划规定：战争第三年要歼灭国民党军 115 个师（不久扩大为 128 个师），其中，西北野战军担负歼灭 12 个师，牵制胡宗南集团，使其无法以强大兵力增援中原战场或其他战场；华北第一兵团歼灭太原阎锡山集团 14 个师，攻占太原；中原野战军担负歼灭武汉白崇禧集团 14 个师，并攻占鄂豫皖 3 省若干城市；华东野战军担负歼灭徐州刘峙集团 40 个师，并攻占济南和苏北、豫东、皖北若干大中小城市；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二、第三兵团担负歼灭沈阳卫立煌集团和北平傅作义集团 36 个师，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 3 点以外的一切城市；华北第一兵团担负歼灭 14 个师，并攻占太原。计划还规定，主要作战方向，在南线是中原地区，在北线是北宁路锦州至唐山段。要求凡具备条件的野战军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敢于夺取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

建军计划规定：战争第三年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针是充实野战部队，发展特种部队（主要是炮兵），统一全军编制，健全各种制度，精简后方机关，整顿地方部队，为第四、第五年达到建军 500 万人的大发展奠定基础。关于兵员补充的问题，早在“九月会议”前，中共中央就有明确指示“前线兵源全部依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今后各区扩兵、征税，编组新部队、新兵团，供给标准，脱离生产人数与当地人口之比例等事，均需获得中央批准，方许施行，严禁各自为政，以利持久。今后攻城野战所得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

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提起全党注意。11 月 1 日，中央军委又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明确规定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部队的纵队改称军，旅统一称师，军以上设兵团、野战军两级指挥机构，军以下一般按三三制实行编组。团以上各级番号按全军统一顺序编排。地方部队以旅为最高战斗单位，隶属各军区。军区分为一二三级和军分区。游击部队仍称纵队、支队。

注释：

①《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集（1949-195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0 ~ 11 页。

②《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 786 页。



华北金融贸易工作会议和扩大健全党内民主

在国统区经济全面崩溃的同时，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局已经着手解放区内经济政策的调整和规划。解放战争发展到第二年，解放区面积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解放的城镇不断增多，经济政策和金融贸易、货币斗争被提上日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已经不能仅仅在于在战场上打败国民党，更需要解决好解放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针对国民党腐朽的统治进行全方位的反击。

早在 1948 年 3 月，华北财办就主持召开了华北金融贸易会议，会上各解放区交流了本区金融贸易工作经验，具体研究讨论了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稳定物价和统一发行货币的问题。中央机关到达西柏坡后，着手协调各解放区之间的物价和货币发行，周恩来指示要搞统一政府，取消财办，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货币。5 月华北财办正式被财政部所取代。同时总结形成了《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的综合报告》提交中共中央。

1948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转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综合报告》，并告东北局，热河分局，中原局和豫皖苏分局，“华北、东北、西北各地党财办及一切财经机关即遵照该报告所提之金融贸易工作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努力实行”。该综合报告，由中财部印成密件发给有关各方。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情况下研究解决城市和金融经济问题。

《金融贸易会议综合报告》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第一部分提出了未来金融贸易工作的基本任务。随着战争形势日益好转，和后方工作进步，解放区的金融贸易工作也有显著进步。首先表现在对政策方针上有了较明确的认识，“我们的经济阵地逐渐巩固，对敌经济斗争渐从被动转入主动”。[①]在发展生产上满足了军民生活和作战部分必需的物

资。其次在于解放区的金融贸易工作，已经渐从各自为政走向统一。建立了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机关，开始了军用器材采购和食盐运销的统一管理。报告同时也指出了几个待解决的问题：第一，提出今后的中心工作有两个，一是发展生产，二是支援战争。要求各解放区除了在进行战争的地区以外都应以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我们的各种政策（如土地改革中的满足雇贫农的要求，照顾中农和新式富农，及保护工商业等）都是为着发展生产"。[②]第二，提出要打破地区分割状态，统一和扩大市场。过去独立自主争取地方性自足自给的分割状态的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严重障碍。商品经济逐渐发展，要求撤销内地关税壁垒、统一货币制度等。第三，提出保证战争供给不单纯是财政问题，金融贸易工作也要负担重任。要求各解放区应当迅速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更要加紧建设，提高生产，准备充分的力量去支援人民解放战争"。[③]

其次根据环境和工作任务分四个部分，作了关于金融工作的部署。

第一、货币政策。会议报告指出当前货币制度存在着两大缺点：不稳定和不统一。货币政策的中心关键之一，便是调节发行数量，使我们的物价保持相当的稳定。货币发行应当首先保证生产建设，其次保证战争供给。提出货币政策兼顾战争、生产和物价的平稳要遵循的原则：（1）战争供给是必须保障的，但应尽可能多依靠人民的直接负担，少依靠货币发行。（2）生产建设也是必须保障的，必须节约资金；并尽可能多吸收社会游资，少依靠货币发行。（3）调节发行数量，保持物价平稳。要求在战争的胜利进展中，迅速扩大本币流通范围；并在一定范围以内调节本币发行数量，以保持物价的相当平稳。

第二、货币斗争。报告明确指出："货币斗争的主要任务，是跟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努力扩大本币的阵地（流通范围），压缩蒋币的阵地，并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而调剂蒋币外汇，掌握蒋币比价。用这乡办法来巩固本币，打击蒋币，以保护人民财富，保证生产发展。"[④]货币斗争有阵地的斗争和比价的斗争（外汇管理）两种形式。阵地斗争不但是为驱逐蒋币，而且是为争夺物资。要求外汇管理必须统一领导以加强对敌经济斗争。九月会议后，1948 年 10 月 6 日，中共中央就与国民党进行货币斗争的问题再次做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停止收兑法币，新解放区宣布停用法币，协助商人把法币迅速排挤出去，争取换回我们需要的物资。必要时可特许以法币换回茶叶，红白糖及洋纱，洋布颜料火柴等禁入物品，但需防止投机。各地均应严密检



查，规定携带大批法币（一亿起）入境者予以没收，在新区，允许金元券暂按一定比例与本币共同流通。

第三、信贷工作。信贷工作存在的严重问题："农业贷款名义上是为着发展生产，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变质作为救济贫苦人民的款项。地方党政机关在分配贷款的时候，往往把贷款作为救灾、优抗、发动群众（用贷款去鼓励群众）等的工具，而把发展生产放在次要地位。"提出意见规范信贷工作的管理："政府对于新解放的城市和某些灾区，为着解决人民生活上的严重困难，发放一批救济粮款是应当的，但必须与生产贷款明确分开。救济粮款可以不收回，贷款则必须收回，还要保持原本。"银行的生产贷款应该合理划分比例，一部分用作农业贷款，一部分用作工商业贷款。为使贷款保证用于生产，可以发放各种生产资具。生产贷款同样必须掌握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可以试验"实物信贷"（如贷粮还粮，或贷农具还粮食等），"贷款折实"（贷款货币折成实物计算）等类办法；合作社除"贷实"、"折实"外，还可以采取"劳资分红"（如贷款经营运销或采购，所得利益资本劳力二八分红）等类办法。同时也提出"想办法去吸收社会游资，组织民间的相互借贷"。对于银行利息的问题，适应形势发展，进行了纠正，奖励信贷。

第四、城市金融工作。在解放了众多城市以后，城市金融工作成为我党面临的不可避免的重要任务。银行首先扶助各种工业生产，应把发展工业提高到与发展农业同等重要的地位。除军工生产外，应当首先发展纺织、造纸、火柴等类争取生产自给的工业和煤铁生产、工具农具制造等发展生产所必需的工业 。

报告的第三部分是关于贸易工作，包括物价政策、对外贸易，内地贸易，和私营工商业的发展等。

第一、物价政策。战争时期的物价是否平稳，主要决定于战争和财政收支状况，以及货币发行数量。提出平衡物价的过程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1. 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重要物资，有计划的吞吐调剂，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以保持物价的相当平稳。2. 调剂供求、平稳物价之重要关键，是掌握产销季节，和各地物资流动的规律，来实行有计划的调剂。3. 为了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方利益，应当掌握各种商品价格间的适当比例，尤其要掌握粮价和棉价与布价间的比例，以保证一定的生产收益，及保持适当的生活水平。4. 依照经济建设方针，来适当提高或降低某几种商品的价格，以指导

生产发展的方向，使之合于我们经济建设的要求。5. 依照对敌经济斗争的需要来掌握物价。输出应当争取高价，但不要因此妨碍剩余土产品的推销。输入应当争收低价，但不要因此妨碍军用必需品的采购。

第二、对外贸易。解放区内部对外贸易的主要任务，是推销各种剩余土产，采购各种军用器材，重要生产资具和一部分民用的必需品，争取有利交换。根据各地经验，对外贸易必须努力争取出超，获得有利交换。粮食和棉花是敌我均需要的，必须严密掌握。粮食主要供给自己军民需要，如果有剩余首先调剂邻区，再有多余才能特许输出，换回军用器材。输入物资亦应分别处理，首先保证战争所必需的军用器材的采购，其次采购发展生产所必需的工业器材，再次则可酌量输入一些人民的日用必需品。对外贸易必须有统一的税则税率，共同的进口出口计划，并在一定范围内的统一领导。还决定，在天津、济南等地外围，分别成立出入口管理委员会，在中财经部领导下吸收各地代表参加。

第三、内地贸易。所谓内地贸易，就是指解放区领域内的商业贸易行为。内地贸易的主要任务有三：一为调剂供求，平稳物价；二为组织各地区的物资交换，使各解放区结合而成一个整体；三为保障供销，扶助生产发展。

第四、私营工商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所有权，经营自由权，及正当的营业利润；撤销各解放区之间的关税壁垒，统一各解放区货币，取消内地物资交流中的各种不必要的限制；改善新解放城市的接收工作；没收官僚资本应有明确界限，且应当由高级党政机关决定；慎重处理私营工商业中的劳资关系，适当规定工商业税及其征收办法，应使一般工商业者纳税以后仍然有利可图。

第五、组织能得工商业者信任的商会成工商联合会。

第六、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间的关系。公营经济处于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它应扶助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私营经济，扶助群众生产促其向前发展。

革命根据地货币，是在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封锁的情况下产生的。随着对国民党金融贸易斗争的发展和解放区经济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统一货币的时机已经来到，决定马上统一货币。1948 年 11 月 15 日，周恩来电告给董必武："必须赶紧动员一切力量发行全国统一的人民币。"中央成立中央财政部，董必武被任命为部长。

"九月会议"做出的一项重要决议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和领



导机关要充分注意党的自身建设。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到300万党员，政治上更加成熟，但是党内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和中央在“九月会议”前后，通过四项措施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扩大和健全党内民主。

第一，健全党委制。1948年9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文件《关于健全党委制》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委员会又须分为常委会和全体会两种。同时也强调，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

第二，军队内部的民主。1948年9月4日，新华社社论《军队中的民主制度》中指出，人民解放军的基本特点及胜利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在它的部队中有集体领导下的民主。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目前在我军部队中热烈进行的三查、三整，就是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方法，达到前两项目的。经济民主，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军事民主，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同时在必要时，士兵有从士兵群众中推选他们相信的干部的权利。

第三，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修改党的章程，规定了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但是一方面党内存在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和在政府工作中的民主生活的不足，已经使我党的组织及政府机关产生了某些严重的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另一方面在展开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后，又常常发生极端民主现象或者无政府现象。使得党内某些错误的主张、不正派的宗派主义的作风和无纪律状态得以暗中流传和滋长，党内民主生活并未得到

落实。

“九月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决议要求：在一切巩固的解放区，党的各级党委，必须要遵照党章的规定，从现在起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讨论中央的指示和各种工作，并选举和补选党的各级委员会。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不能用普通的干部会议去替代。在军队，根据军区和野战军的不同情况有所区别。各军区直属的党组织，参加当地地方同级的党的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同时召开自己直属的机关学校和部队的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野战军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经过上级批准，有限制地召开这些会议。对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必须赋予党章所规定的一切权力，不许侵犯。必须保障一切代表在会议上有完全的发言权和完全的表决权，以便能够展开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干部和群众。但同时，必须严格的执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规定，以保持党内的统一和纪律。党的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及代表会议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党内各种不同的争论可能增多，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将这些不同意见的争论及时的真实的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必须要报告中央。各级党委会召开各级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必须有充分的准备。预先收集材料，制定切合实际的报告及决议草案。健全党委制是良好的实现全党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重要问题均经党委集体讨论和作出决定的制度，而不应当由个人决定重要问题。

第四，健全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即各地党组织和军事机关党组织把各自的情况向中央进行事前请示或者事后报告的制度。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指出：“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指示要求从当年起，“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同时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5]指示还对报告和请示的内容作了规定。3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对报告制度作了补充规定。5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中强调：“必须坚决地克



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⑥6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共有8项内容，其中还规定了宣传纪律。6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事项》，具体规定税收政策等18项内容，必须在事先或事后报告中央。7月26日，毛泽东发出党内指示，命令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彻底消灭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正确态度，彻底纠正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毛泽东指示各兵团及军区负责人："在战争第三年内，我们将要求你们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同时对于报告的内容做了规定：对于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内容，必须是有分析有结论的，而不是空洞无物的；必须是既说优点长处，又说缺点错误，而不是只说优点长处不说或少说缺点错误。次日，他批评林彪，指出林在中央规定请示报告制度6个月以来，仍未向中央作出综合报告。

"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又强调了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指出：现在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中央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建立和健全请示报告制度，开展反"双无"斗争，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加强了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也使军队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进一步提高，进一步提高了党和军队的威信，更好地团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注释：

①②③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280页，第281页，第283页，第287页。

⑤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4～1266页，第1332页。

攻济打援战略的形成

根据“九月会议”的决议和中央军委的第三年作战计划，人民解放军利用雨季进行休整以后，从九月开始，先后在东北、华北、中原、华东和西北战场上，对国民党军发动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秋季攻势中，对战局影响最大的是华东站场的济南战役。济南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敌人坚固设防重兵把守的大城市的一次攻坚战。济南战役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时把秋季攻势引向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队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连续发起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个战略决战。济南战役是中国革命战略决战的序幕之战。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经过一年的作战，整个解放战争的形势，向着更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着。在中原和华东战场，华东野战军，遵循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坚持内外线作战的方针，内线和外线兵团与中原野战军紧密结合，相互策应，协同作战。在完成掩护刘邓大军展开战略进攻以后，连续取得了平汉路，洛阳，豫东以及焦济铁路西段（周村张店），中短（潍县）津浦铁路中段（兖州）等战役的胜利，歼敌24余万人，恢复并扩大了解放区，打通了中原与华东两个解放区的联系。在山东境内，除青岛、烟台、临沂、济南等孤立据点尚为国民党军队所盘踞外，其余已全获解放。此时，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第八纵队位于亳县、涡阳地区，第三、第六、第十、两广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位于济宁、嘉祥、金乡地区，苏北兵团第二、第十一、第十二纵队位于沭阳、涟水地区，山东兵团第七、第九、第十三纵队及渤海、鲁中南纵队位于莱芜、泰安地区休整；中原野战军主力位于宝丰等地区休整，准备雨季后对敌开展更大规模的攻势作战。部队的战斗力，特别是对城市攻坚作战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能够集中兵力进行大规模的攻坚作战。

军事上的失利，经济上的危局，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统治面临危机。为挽回局面，国民党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投靠美国，加紧对统治区人民



的镇压和掠夺；在军事上由分区防御被迫改为重点防御方针，裁剪绥靖区，扩编新的机动兵团，并加强各战略区重要城市的设防，妄图据守要点，争取时间，恢复其军事力量。1948 年 5 月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鉴于华东局势的发展，曾飞往南京面见蒋介石，报告军事情况并建议放弃济南，将在济南一带的军队撤到兖州及其以南地区，与徐州一带的部队连成一片，巩固徐州至兖州的铁路交通，以利而后作战。蒋介石表示对济南必须确保不能放弃。理由有三：其一，济南是山东省省会和华东重要的战略要地，济南至徐州的铁路已经修好通车。为了不让华东及华北的“匪区”打成一片，不让他们掌握铁路交通，必须守住济南。其二，为了不使住在青岛的美国海军陷于孤立，也必须守住济南。否则，不但在军事上，政治上对我们不利，而且将影响美国对我们的援助。其三，我们有空运大队，随时可以增派援军。在空军的优势条件下，济南并不孤立，没有后防也可以作战。同时也表示了，如果济南被围攻，蒋介石当亲自督促主力部队迅速增援。蒋介石为了支援济南作战，夹击解放军，同时为了巩固陇海线东段，以作南京之屏障，在济南战役之前，将其华东地区的主力编成三个兵团：第二兵团邱清泉部集结于商丘一带；第七兵团黄百韬部集结于新安镇一带；第十三兵团李弥部集结于宿县固镇地区，从事整理补充，准备作战。

1948 年 8 月，国民党徐州“剿总”和华中“剿总”依据南京军事会议决定重点防御的战略方针，将其华中剿总白崇禧和徐州剿总刘峙所属的六个兵团，分别集结于陇海，津浦，平汉铁路沿线，进行应援机动。进一步加强了各战略要点的防御工事和兵力，将原来的整编军改为兵团，连同原有的兵团共辖 7 个兵团，并进一步加强了几个主力兵团的兵力，分别配置在以徐州、信阳为中心的地区，以加强中原的防御。其中，徐州“剿总”共辖 6 个绥靖区、4 个兵团，连同特种兵及保安团队共 70 万余人，其部署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九、第十一绥靖区共 15 个整编师 42 个旅分别防守淮阴、济南、台儿庄、菏泽、海州、青岛等地；第七兵团 3 个整编师 6 个旅位于徐州以东新安镇地区，第二兵团 4 个整编师 13 个旅位于商丘、砀山地区，第十三兵团 2 个整编师 6 个旅位于固镇、蚌埠地区，第十六兵团 3 个整编师 6 个旅位于郑州地区。另“剿总”直辖 2 个整编师位于徐州。一方面加固徐州以及济南的防御工事，另一方面加速补整集结于徐州周围的机动兵团。

第二绥靖区王耀武也同期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战局。分析得出结论：济

南遭受解放军进攻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解放军的炮兵及工兵的力量大为增强，并具有一定的技术和攻坚能力；解放军正在进行攻城先攻心的瓦解工作，为解放济南准备条件。据此，王耀武做出备战布置：电请蒋介石将整编八十三师空运济南增加防务；请求增屯弹药及11万人两个月所需要的粮食；命令各部增加工事，挖掘外壕和陷阱，架设铁丝网等；鼓励士气，对军民进行精神讲话，灌输反共思想，破坏共产党的攻心战术；修筑千佛山飞机跑道，以备西郊机场被占后使用；城北五柳闸加宽加高蓄水，以备攻城时防水阻敌；加紧训练民众，防止共产党地下活动。同时国民党南京国防部也对济南守备作出指示："增强守备力量，确保济南，控制强有力的预备队，采取机动防御，加大围攻济南共军的伤亡，削弱其力量，而后配合进剿兵团内外夹击，打败共军""并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黄百韬，邱清泉，李弥三个兵团与陈毅部的主力作战，以解济南之围"。

济南是津浦铁路（天津至浦口）和胶济铁路（青岛至济南）的交会点和连接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也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第二绥靖区所在地，北靠黄河，南倚泰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是国民党军残存在山东省腹地的最后一个坚固设防城市，人口70万。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整编第九十六军（辖整编第二、第八十四师，独立嵌）、整编第七十三师等部，共3个整编师部、9个正规旅、5个保安旅及特种兵部队约11万人，控制着东自韩仓，西至长清，南起中宫、张夏，北迄泺口、齐河之间地区。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津浦路中段战役后，济南城已处在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防御阵地，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以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外围阵地，各阵地内筑有众多永备型和半永备型强固工事，形成能独立作战的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蒋介石以徐州为屏障，隔断共产党华东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的联系，并钳制华东野战军不能全力南进，拒绝了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关于"退出济南，把军队撤至徐州"的建议，决心确保济南。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敌我力量发生较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实力不断壮大。蒋介石集团则每况愈下，不仅兵力锐减，能用于一线作战的正规军仅剩下一百七十余万人，且士气低落，战斗力大为下降。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战时机已经到来。"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式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



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因此，为了持续大量的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人民解放军就必须要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强大兵力的机动兵团作战。所以，敢不敢打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国民党的强大重兵集团，敢不敢夺取战略决战的胜利，已经成为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战略决战决策的重大和关键课题。战略决战是决定战争双方命运的严重斗争。因此，及时地把握决战的时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往往是在数量上装备上处于优势的军队应该主动寻求处于劣势的军队进行决战，以取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但是毛泽东对战争全局做了科学预见性的分析，打破战争的一般规律，不待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和装备都超过国民党军，就大胆地创造性地做出了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英明决策。

1948 年 7 月，华东野战军主力胜利结束豫东战役，山东兵团攻克兖州、泰安等城市，刚结束津浦路中段战役，毛泽东就于 14 日指示华东野战军准备攻取济南，相机歼灭部分援敌，并指出：“如能在 8、9 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可于 10 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要求华野首长据此考虑下步作战方案。16 日又连发 4 电指示华野粟陈唐张和许谭，对攻济打援提出具体方案，如：抢占济南机场，准备攻克济南，准备打邱清泉和黄百韬兵团的援济部队，对于攻打济南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17 日，粟陈唐回电，基于华野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急需休整和补充，马上打济南是不合适的，建议休整一个月，得到军委同意。华野部队休整期间，7 月 26 日，毛泽东又发电指示粟陈唐张等华野指挥员，指示华野于休整后打邱清泉之 5 军。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依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华东地区敌情，于 8 月 10 日提出了下步作战的 3 个方案：（一）集中华野全力进入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地区，切断徐蚌铁路，孤立徐州，着重求歼徐州出援的敌人；（二）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以必要兵力阻击徐州可能北援的敌人；（三）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实施，但有重点地使用兵力，第一阶段先以一部夺取济南机场，主力求歼徐州援敌一部。第二阶段以一部兵力阻击援敌，主力转攻济南。通过比较，粟裕认为以执行第三方案为有利。鉴于徐州至济南间有公路与津浦路相平行，地形较开阔，滕县、邹县间及泰安以北各有一片山区，商丘北至济宁、汶上间全为平原，自徐州以北的利国驿向西北经济宁

直达东平，有运河及微山、蜀山、东平等一连串湖泊，加上徐州敌军的部署，粟裕判断徐州之敌可能分两路沿津浦路及经鲁西南北援，因而准备将打援战场选择在汶河以北、泰安以西、肥城以南地区或邹县、滕县间地区，阻援战场选择在鲁西南金乡、巨野、嘉祥地区。8 月 12 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实行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并指出作战结果预计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即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歼灭战，即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又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①]同时又指出，依中原作战经验，要估计到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即我不真攻济南，徐州援敌必缓缓推进，并不真援，使我无战机可寻。因此，"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②]在阻援、打援部署方面，军委指出：应将兵力全部置于嘉祥、巨野、兖州、济宁及其以南地区，"夹运（河）而阵"，以便随时转移兵力用于阻击或歼灭援敌。随后，粟裕依据军委指示，对战役的实施和兵力使用问题，作了初步部署。

8 月 20 日粟裕前往曲阜，与山东兵团谭震林、王建安等会合，这是华野两大集团自 1947 年"7 月分兵"以来的重新会合。8 月 25 日，华野军事会议在山东曲阜召开，粟裕、谭震林主持讨论攻济打援问题。参加人员还有华野前委委员，参战部队纵队以上干部，是华野最大的一次军事会议。粟裕指出：济南战役将是一场严重的艰苦的战役，济南是徐州的屏障，敌人会死守济南，增援也会猛烈。战役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攻占济南飞机场，歼敌 5-6 个旅，第二阶段攻济打援。曲阜会议上，对如何攻济打援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战役的关键在于能否在短时间内迅速攻克济南。毛泽东曾在 7 月 16 日的电报中指出争取 10 天内夺取济南。

26 日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对即将发起的济南战役必须预先估计三种结果："（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③]要求华野应争取第一、第二种可能，在第三种情况下，即应临时改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待打胜援敌后再攻城。提出攻城应留出必要的预备兵力，阻援、打援集团更应留出强大的预备兵力，以便在第三种情况下能够消灭援敌。同时要求阻援打援集团构筑多道坚固阻援阵地。

8 月 28 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再次电文："攻克济南之时间不能预先只规定一种，而应预先规定三种，即二十天、一个月、两个月。这三种时间中，



我们固然要争取第一种，其次是第二种，但这在战役发起之前只是一种理想，是否能实现要依攻击过程中敌之防御能力如何才能确定。或者二十天左右即可攻克，这样我阻援兵团是有把握阻得住援敌的（包括歼敌一部分）；或者要一个月左右才能攻克，这样我必须歼灭援敌几个旅，虽然不一定是六个旅，但歼其三至四个旅是完全必须的，否则就不能阻住援敌，我攻济必功败垂成。但最重要者是一个月左右还不能攻克济南，必须大量歼灭援敌，例如六个旅、八个旅或更多些，根本停止了援敌前进，给我以所需要的一切攻城时间，例如一个半月，两个月，或更多些（打临汾曾费去七十二天）才能克城，你们的根本出发点应放在这种情况上。”[④]同时又强调指出：此役关系甚大，战役计划应以能应付最坏的情况为出发点，准备用 20 天到两个月的时间完成。战役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住援敌并歼灭其一部，因此在兵力使用上，应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方向。整个攻济打援战役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统一指挥。为策应华东野战军的攻济作战，中央军委确定中原野战军继续集结于豫西地区休整，待敌人在济南、徐州吃紧，第三、第十六兵团被迫增援时，歼击其一部，使其不能东进参战。

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因病没有参加曲阜会议，毛泽东特别指出：“此次攻济是一次严重作战，请考虑在许世友同志身体许可情况下请他回来担任攻城主要指挥员，王建安同志辅之。因王初到东兵团，不如许之熟悉情况。据饶漱石同志说许休息若干天是可以回部工作的。攻济任务完成，他仍可去休息。”[⑤]9 月 11 日许世友前往济南前线，并电报给军委：“以现在情况打下济南是有把握的，但从部署上看，我们兵力不集中，没有重点的使用，这样很容易造成对我不利，尤其是攻济南的兵力已布置好，不能变动，第一步就这样，但第二步我一定集中使用兵力。”[⑥]同时表示，人民解放军对于打下济南有很大的决心与把握，只要能挡住援敌，请求打援部队坚决挡住援敌，以争取时间解决济南。毛泽东回电：“你已到前方，甚慰。你所说的有重点地使用兵力，是正确的。此次作战部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即目的与手段应当联系而又区别。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而以 1、4、6、7、8、11、韦吉等共八个纵队担任打援，以其余各纵担任攻城。这种部署，在

下列两种情形下是准备予以改变的，即：（一）在阻援与打援有出乎意料的顺利（歼敌甚多，敌已停顿），而攻城尚未得手之时，应当从打援方面抽调兵力参加攻城。（二）攻城已有把握，但尚不能最后解决战斗，而援敌则因被阻难于急进之时，亦可从打援方面抽调一部兵力参加攻城。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应准备作和上述调动相反的调动，即在攻城第一阶段中，已经证明不能短期解决战斗，而援敌又已大举进犯，非歼灭援敌不能继续攻城，在此种情况下则应坚决由攻城兵团中抽调一部至半数兵力（除占领飞机场及其他必要部分外），加入打援。此点，你们亦应预先作精神准备。至于攻城部署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此点甚为重要，并应迅即部署。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整个战役应争取一个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发点。饶政委大约三天后即可由中央所在地动身回山东，并先到粟处及你处。”⑦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野战军前委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定下了以攻占济南为唯一目的，并求歼援敌之一部的战役决心。至此华野攻济打援的战略方针正式形成。

注释：

①②③《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版，第 577 页，第 578 页，第 578 页。

④《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579 页。

⑤⑥转引自刘统：《华东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52 页，第 456 页。

⑦《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6 页。



华东野战军部署具体方案

在人民解放军研究济南战役战略方针的同时，国民党进一步加强了济南守备兵力。蒋介石于8月上、中旬令青岛的整编第三十二师的第五十七旅和徐州的整编第八十三师的第十九旅空运济南；9月15日又令整编第七十四师于17日开始由徐州空运济南。同时还拟定了一个所谓27万人的“会战计划”，即在济南遭到攻击时，以第二绥靖区王耀武部10万余人坚守济南，消耗疲惫的人民解放军攻城集团，以第二、第七、第十三兵团主力约17万人由徐州北援，企图在兖州、济宁间击破华东野战军主力，解围济南。为加强防御力量，蒋介石还决定以济南、青岛为主基地，北平、徐州为辅基地，集中战斗机162架进行空中支援，另以重轰炸机42架对解放军攻城、打援部队及后方运输线进行轰炸。

王耀武根据上述企图与济南北靠黄河，南依泰山，东有茂岭山、砚池山等高地，西面开阔的地形条件，确定了尽量缩小防御圈，加强要点守备，控制强大的预备队，适时进行反击的“防守要领”，具体部署是：以黄河南岸之泺口镇至城南马鞍山为分界线，分成东西两个守备区。西守备区由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指挥整编第二师、第八十四师、独立旅及保安第八旅、特务旅、青年教导总队（相当于旅）等8个旅防守；东守备区由整编第七十三师师长曹振铎指挥该师及保安第六旅等3个旅守备；以第十九、第五十七旅及拟由徐州空运来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为总预备队。另以保安第四旅等地方保安团队防守长清、齐河等据点。

整个防御阵地，由外围防御地带与基本防御地带构成，在日伪原有工事的基础上，筑成支撑点式的半永备型的城市防御体系。外围防御地带以齐河、长清、张夏、王舍人庄等地为警戒阵地，并沿鹊山、华山、茂岭山、砚池山、回龙岭、千佛山、马鞍山、腊山、药山之线构筑主要阵地，纵深达10余公里，由160余个支撑点组成。基本防御地带，以商埠为第一线阵地，外城为第二线阵地，年城为核心阵地。在各阵地上，都储备了大批粮食、弹

药，准备长期坚守。

8 月 29 日，曲阜会议的最后一天，华野商定济南战役的部署，决定以攻占济南为主要目标，力争短期内攻克，将部队分为攻城和打援两大集团。

以总兵力的 44%，约 14 万人组成攻城兵团。即：以第三、第十纵队及鲁中南纵队主力组成攻城西集团，由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指挥。首先攻占机场，断敌空援，并抓住一切有利战机攻占商埠，而后在东集团协同下攻城；另指挥两广纵队及野司警卫团围攻长清之敌，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围攻齐河之敌。以第九、渤海纵队为攻城东集团，由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指挥。首先肃清济南东郊之敌，而后协同西集团攻城；另指挥渤海军区部队攻占泺口，控制黄河铁桥，尔后向南突击。以特纵炮 1 团（欠 1 个营）、炮 3 团（欠两个连）及各纵队炮兵团组成东、西两个炮兵群，分别隶属东、西集团，支援攻城作战。以第十三纵队为攻城预备队。

以总兵力的 56%，约 18 万人组成阻援、打援兵团。即：以第四、第八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位于金乡、城武、巨野、嘉祥地区，构筑若干道防御阵地，坚决阻击可能由商丘、砀山地区北援之敌；以鲁中南纵队 4 个团及第七纵队一部于官桥至滕县之间地区，构筑防御工事，节节阻击可能由徐州北援之敌；以第一、第六纵队、第七纵队主力、中野第十一纵队及苏北兵团第二、第十二纵队配属特纵炮兵第二团、第三团两个连，分别集结于济宁、兖州和滕县以东地区，待机歼击沿津浦路北援之敌。以第十一纵队和各军区地方武装在广大民兵配合下，积极向当面之敌出击，破坏津浦路、陇海路，牵制敌人，配合主力作战。

东西两兵团通归许世友、王建安指挥。根据军委指示，由许世友任攻城集团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司令员，以山东兵团领导机关作为攻城集团的领导机关。

战役发起前，华东野战军全面地开展战役准备工作。全军进行了战局学习，贯彻“三查三整”，建立与健全了各级党委制，普遍成立了战士委员会，进行了缴获归公、军事民主、城市政策等教育。组织了供给、卫生、兵站、运输等后勤工作。对战时政治工作，宣传鼓动、火线入党、火线整编、火线评功、火线政治攻势、战役报道及思想指导等一系列工作，都在事先进行了研究并深入传达布置，使每个指战员了解作战意图，了解如何为解放济南与歼灭敌人而战，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物质上准备大规模的连续



持久的艰苦作战。战前详细地侦察了敌情、地形，加强了对吴化文部的策反工作。早在津浦路中段战役结束后，华东局便指示济南市委（地下党）广泛收集济南的军事、政治等情报。山东兵团根据这些情报和各部队侦查的情报，编写了《济南蒋匪部队调查》、《济南工事情况研究》、《济南守备情况研究》等文件，下发给各部队。9 月 11 日，纵队政治部发出《济南战役动员材料》，9 月 12 日发出《济南战役政治工作指示》，纵队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进行动员教育，要求参展指战员“不怕牺牲，不怕伤亡，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必须战斗到底，为人民立功。为了做好城市接管工作和对城市进行军事管制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华东局在 7 月 18 日就确定了济南市的党政机关领导成员名单：以曾山为市委书记，张北华为副书记；郭子华为市长，徐冰为副市长；袁仲贤任警备司令。准备在战役发起时正式宣布。随后华东局又决定成立以谭震林、曾山、许世友、谢有法等 7 人组成的济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谭震林为主任，曾山为副主任。此外，为保证济南战役攻击部队严格执行城市政策纪律，还向参战部队下发了华东军区制定的“约法七章”和山东兵团关于执行“约法七章”的“十项规定”。各参战部队据此深入学习了形势任务和政策组织纪律，在加强思想政治素质的同时加强军事素质。“同时广泛开展战前大练兵活动。各部队根据自身的任务，布置沙盘作业，选择近似实战的地形，模拟敌人工事，反复进行演练。炮兵部队统一指挥，集中使用，进行抵近射击为主的训练”，“担任打援和阻援的部队，一面构筑多层的防御阵地，一面组织干部勘察战场，根据各自的任务和地形特点，制定作战预案，进行演习”[①]在战役发起前，打援部队陆续隐蔽至运河两侧的邹县，腾县，巨野，嘉祥等地区，随时准备阻击和歼灭援敌。

与此同时中共山东各级党政机关，全力以赴，严密组织群众支前工作。至战役发起前已经动员 50 万支前民工，充分作好了粮弹供应、伤员治疗转运等后勤保障工作。

注释：

①《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版，第 585～586 页。

济南战役的胜利

济南战役从1948年9月16日开始，至24日结束，历时8个昼夜。华野攻城集团经过四个阶段的作战顺利拿下济南城。

第一阶段突破外围防线

根据战役的部署，攻城西集团9月9日自济宁、汶上，东集团13日自泰安、莱芜、章邱等地，分别向济南隐蔽开进。15日，两广纵队扫除长清西南地区国民党保安部队，并包围了长清城。此时，王耀武判断华东野战军主攻方向在西面，遂将其预备队第十九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机，将第五十七旅由张夏、崮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于西郊。

16日午夜，济南战役全线打响。攻城集团从东西两面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外围防线。经一天激战，西集团歼灭长清齐河守敌后迅速迫近济南西郊。东集团一举攻克茂岭山、砚池山及回龙岭等制高点，歼灭济南守军第七十三师以后直扑外城。王耀武判断华野主攻方向在东面，急将第十九、第五十七旅东调，并以第十五旅及刚空运抵济的整编第七十四师7个连，自七里河方向反击，另以一部增援燕翅山。随后，又将飞机场以西的整编第二师之第二百二十一旅调入市区，以增强机动兵力。17日，蒋介石命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第二兵团准备经鲁西南北援，第七、第十三兵团分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集结，准备沿津浦路北攻。粟裕获此情报后，当日即令攻城兵团继续猛攻，令打援、阻援兵团迅速进入阵地，做好歼击援敌的准备。同日，攻城东集团在炮火支援下攻克窑头、甸柳庄等地。攻城西集团也继续分路猛攻，至18日，攻克古城、玉皇山、簸箕山、党家庄等地，并以炮火封锁了济南机场，迫使国民党军中止空运。攻城兵团为扩大战果，以攻城预备队第十三纵队加入西集团作战。19日晚，济南守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在中共政治工作的争取下，率整编第八十四师等部3个旅约2万人起义，撤离战场。攻城西集团趁势猛攻，至20日拂晓，占领商埠以西阵地。同时东集团攻克燕翅山等要点，主力迫近外城，积极做好攻城准



备。国民党的外围防线 4 天时间被华野突破，中野严密监视中原战场国民党军，有利的策应了华野的攻城作战。

第二阶段占领商埠

攻城集团的连续猛攻和吴化文部起义，打乱了王耀武的防御部署，动摇了国民党军坚守济南的信心，王耀武向统帅部请求突围，但遭蒋介石严词斥责，并令其坚决固守支援。王耀武再次调整部署，除留 1 个营守千佛山，1 个团守马鞍山，以 3 个旅又 1 个团守商埠外，将主力撤入城内。南线之敌 3 个兵团，在蒋介石督令下，正分别向商丘、徐州集结中。

20 日，中央军委指示：王耀武部可能突围，应从各方面布置，不使漏网。同时指出：刘峙已令邱清泉兵团集结临城待命援济，应迅速集结打援兵团全力于邹、滕地区，准备歼击北援之敌。华东野战军随即令攻城兵团迅速向商埠以东和城垣攻击，并部署兵力防敌突围逃跑。同时又详细研究了徐州之敌北援情况，进一步修订了作战方案，以便随时迎击援敌。攻城兵团依据军委和粟裕的指示，决定以两集团立即向商埠实施突击，以东集团继续肃清城外残敌，积极进行攻城准备。20 日黄昏，西集团经 40 分钟的炮火准备和连续爆破，即多路突入敌阵地，至 22 日午，完全占领商埠，歼敌两万余人。东集团也肃清了城东残敌，直逼城下。

第三阶段夺取外城

华野攻占商埠后，济南守军将 3 个旅集中内城，以 4 个旅图置外城，积极加修工事，准备顽抗。为了不给济南国民党守军以喘息的机会，攻城兵团决定立即对外城发起攻击，并作了如下部署：东集团第九纵队配属坦克 4 辆于城东永固门正面及东南角突击；渤海纵队一部向城东北角佯攻，另一部位于城东北地区准备堵击可能突围逃窜之敌。西集团第十三纵队由城西南永绥门及其以北实施突击；第十纵队由城西普利门及永镇门、小北门实施突击。第三纵队集结商埠为预备队。22 日晚，攻城兵团各突击部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进行连续爆破，勇猛突击，经 1 小时左右激战，分别突入外城，与敌展开激烈巷战。至 23 日，除个别据点外，东西两集团攻占外城。

第四阶段总攻济南

退守内城之敌第十五、第十九、第五十七旅等部，妄图依托高厚城墙和坚固工事，作垂死抵抗。蒋介石也下令空军对我所占市区施行区域轰炸，投掷大量炸弹和燃烧弹，使得商埠和外城大片民房被炸起火。居民死伤和财产损失甚重。华野为迅速彻底歼灭济南守军，决定即刻对内城发起总攻。以第

九纵队、渤海纵队由东南方向，第三、第十三纵队。由西、西南方向实行突击。各攻城部队调整部署，开展火线军事民主，严密组织炮火、爆破、突击三者的协同和后续部队的跟进。于 24 日 2 时 25 分，第九纵队攻占城东南角，拂晓第十三纵队亦攻上城头，主力及第三纵队亦跟随入城，向纵深发展攻击。战至 21 时，全歼守敌，济南宣告解放。马鞍山、千佛山守军分别于 25 日、26 日缴械投降。王耀武化装逃至寿光县境，被地方武装俘获。各接管机构和卫戍部队，紧随作战部队之后进入济南市区，进行接管和担任警备，作战部队也一面作战，一面协助接管和警备，在战火弥漫中，积极地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博得了各界人士的同声赞誉。

由徐州北援之敌，虽经蒋介石严令督促，但因察知华野打援兵团严阵以待，惧怕被歼，因而行动缓慢，至攻城集团攻克济南时，敌第二兵团方进至城武、曹县地区，第七、第十三兵团尚在集结中。济南攻克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守敌，纷纷弃城逃窜。山东境内除青岛及南部边沿少数据点尚为国民党军占领外，其余全获解放。在此期间，中原野战军辗转活动于南阳、确山间及大洪山、桐柏山和许昌、漯河以西地区，有效地钳制了白崇禧集团各部，有力地策应了攻济作战。华东各军区及豫皖苏、冀鲁豫军区武装也积极向当面之敌发动进攻，攻克沭阳、泗县、民权等城镇 10 余处，破铁路百余公里，截歼逃敌 4 700 余人，积极有力地配合了华野主力攻济作战。

此次战役，国民党共出动战斗机 375 架次，轰炸机 71 架次，战斗轰炸两用机 50 架次，实行狂轰滥炸，另以运输机 27 架次空运部队及物资，但终未能挽救济南守军的覆殁命运。华东野战军攻城兵团经过 8 昼夜连续作战，以伤亡 2.6 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 104 290 人（其中俘敌 61 870 人，起义 2 万余人，毙伤 23 420 人），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 23 名，缴获各种炮 800 余门，坦克、装甲车 20 辆，汽车 238 辆，进一步削弱了国民党军士气，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

济南战役中，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第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率所部 3 个旅 2 万余人举行战场起义，为济南战役的胜利和济南的解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吴化文起义不是偶然的，吴的转变是中共政策的感召和中共地下党组织艰苦细致工作的结果。早在 1947 年秋，中共济南市委根据华东局的指示，通过已经打入国民党军队的地下工作者，针对吴化文的特点，积极开展



工作。

1948 年 8 月初，华东局根据济南市委和胶东西海地委统战部李昌言的汇报，对争取吴化文起义作出指示：首先要从政治上揭发吴过去的罪恶，使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接着说明只要起义，就可以宽大待遇。同时也提到起义必须做出实际功绩，才能根据这一功绩请求人民的原谅。还为吴化文的起义设计了三条道路，上策是单独起义，解放济南；中策是里应外合，待解放军靠近时配合行动；下策是顽抗到底，最终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华东局要求市委努力进行这一工作，并争取建立电台，促其迅速行动。济南市委遵照华东局的指示，决定成立由市委副书记蒋方宇、华东局统战部科长王徵明、市委敌工部长曾定石 3 人组成的争取吴化文起义工作领导小组。由此，争取吴化文起义工作全面展开。

吴化文，字绍周，山东掖县人，1920 年投奔冯玉祥的西北军，抗战前任韩复榘的手枪旅旅长兼任济南警备司令。抗战期间，吴化文走蒋介石的“曲线救国”路线，投降日寇。日本投降后，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五路军，任总司令，后改编为八十四师，任师长。

1948 年 8 月 12 日，李昌言返回济南继续做吴化文的工作。14 日，李昌言见到吴化文，向他说明中共的政策，请其权衡利弊，不要贻误良机。吴化文听后表示要走第一条路。但对于建立电台联系等具体问题，由于吴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则避而不谈，曲意应付。18 日，李昌言向济南市委汇报工作，请示行动方案，市委提出对吴化文的三个要求是：1. 在时机有利，条件具备时，则占领敌人的重要机关；2. 解除敌人武装；3. 整顿部队纪律，保护城市；并要求吴建立电台联系，提供密码，尽快将家眷从南京接回。19 日，李昌言返回济南，继续做其思想工作，并约定将密码 25 日带出。但此期间吴化文并未践约。

吴化文的妻弟林世昌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他通过姐姐林世英做吴化文的思想转化工作，促使吴化文认清形势，了解共产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28 日，吴化文召见李昌言，表示于 9 月 3 日前与华野沟通电台联系。29 日，李昌言将密电码送至济南市委驻地，但直到 9 月 3 日，吴化文仍在动摇、观望和敷衍，并没有按约定时间通电。

为了更有把握地做好吴化文起义工作，济南市委向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作了汇报。谭震林政委对争取吴化文起义问题作了明确指示：1. 吴化文系军阀出身，富有社会经验，善于应付，但在我强大军事压力下，起义或配合

我军行动是有可能的；2. 设法转告吴化文，济南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就能打开。要多站在亲戚的地位上，为其着想，引导启发吴化文，争取早日行动；3. 对吴化文的要求，能大就大，如扣住王耀武、占领飞机场等，否则让其让出一条路也很有利，对整个战局亦有很大影响；4. 要讲明政策，给予其生命财产保证，对其所属部队，起义后按解放军原则实行改编。

根据谭政委的指示，市委总结前段工作经验，决定立即派原已打入国民党军内部的黄志平、辛光去吴部开展工作，与李昌言组成一个内部工作小组，黄志平任组长。黄、辛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吴化文副官处的副官，带有敌谍报人员工作证，可以直接在吴身边工作，行动方便；李昌言则以吴之亲戚兼副官的身份，周旋于吴化文亲属之间，三人互相配合，开展工作。9 月 6 日至 12 日期间，吴化文仍然顾虑重重，举棋不定。除了对蒋介石还抱有某些幻想外，主要顾虑自己历史上对人民犯有罪行，担心共产党和人民不能原谅。针对这一点，中共内部工作人员多次对吴进行说服教育，阐述共产党的一贯政策，明确表示，党的政策向来宽大为怀，只要弃暗投明，不但可以既往不咎，而且还能立功受奖。在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教育和敦促下，吴终于与济南市委开通电台联系。12 日，吴化文向济南市委发出第一份电报："一切事项已大致就绪；眷属因交通关系尚需时日；请上级再稍缓，待到达后即行联系。"13 日前后，济南市委对内部工作小组做出全面具体部署：战斗打响后，万一电台联系不上，内部人员可灵活掌握情况，随机应变，慎重处置，要严密掌握吴化文的态度和行动，如其持消极观望、保存实力的态度，要坚持说理教育，部队发起进攻后，一旦与吴部接触即要求其下令撤出阵地，不使发展为战斗行为；注意吴的安全，严密防止国民党特务将其扣押或暗杀，设法阻止其参加任何各级会议。

15 日，吴的父母从徐州安全来济，消除了吴的后顾之忧，成为其下决心走起义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9 月 16 日晚，济南战役打响。但吴化文一再借口敷衍，继续拖延观望，已妨碍华野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为了促使其早下决心行动，18 日晚 9 时，攻城部队奉命以猛烈炮火向吴部簸箕山一带阵地发动进攻，仅 20 分钟，即歼灭一个营。在强大军事压力和内部工作人员的严密配合下，吴化文不得不请求停火。解放军西线部队停止进攻，为吴化文起义再一次创造了有利条件。

19 日拂晓，黄、辛、李等人返回吴部，向其转达了兵团首长指示，希望其明察大义，归向人民，走光荣起义的道路。晚 9 时，吴化文召开紧急军



事会议，会上宣布举行战场起义，率2万余人撤离战场。解放军攻城部队向商埠胜利挺进。20日午前，吴化文起义部队全部集结于铁路北及洛口以南地区，25日，吴起义部队到达禹城地区进行整顿。经过整军，吴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吴化文任军长。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及华东野战军陈毅、饶漱石、张云逸、粟裕、谭震林等相继致电祝贺。

吴化文是全国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起义的第一位军以上将领，在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正如朱德总司令所说："吴化文的起义，我们不能过低估计，对我们打下济南起了相当作用。今后的作战，就是需要有这样的起义。"①

济南战役比预想提前结束，济南战役的胜利是必然的，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济南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正确战略指导的必然结果。在胜利粉碎了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后，积极转入反攻。毛泽东、中央军委根据济南守敌兵力较多，工事坚固，援敌较多的情况，预先估计了三种情况和三种结果，多次指示华东野战军必须从最困难处着眼，精心进行战役部署和准备，争取最好的结局。遵照这些指示，华东野战军在攻城和打援、阻援两方面都留置了强大的预备队，预筹了各种情况下转用兵力的措施，认真地选择了打援、阻援战场。针对敌军行动的新特点，制订了正确的战役方针。我不真攻城，敌即不真增援；只有在我真攻城，而且在敌坚城之下受到相当损失之后，敌才会组织重兵增援，迫我在不利情况下进行决战，这是1948年上半年华东、中原战场上出现的敌人的新的行动特点。针对这一新特点，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正确地规定了以夺取济南为主的战役目的，并制定了攻城打援分工协作的战役方针，以及以一半以上的兵力用于打援和阻援方向的兵力部署原则。华东野战军坚决贯彻了上述指示，在以足够的兵力用于攻城的同时，集中更大的兵力于打援、阻援方向，从而保障了战役的胜利。这种作战目的与手段是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原则的灵活运用和发展，对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将士任命，战术有力是济南战役胜利的保障。新式整军以后，人民解放军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广大指战员觉悟空前提高，有旺盛的战斗意志，能团结协同，服从指挥，英勇作战，特别是攻坚能力有显著的进步。根据济南城高墙厚、工事坚固、多道阵地、防御纵深较大等特点，华野

军在战役部署上，组织了东、西两个突击集团紧密协同配合，实行有重点的多路攻击与连续突击，使国民党守军无法判明攻城部队的主攻方向而适时调整防御部署，陷入极度混乱。在战术手段上，充分发挥炮火和炸药的威力，实行有重点的多面攻击和连续突击。主要采取火力、爆破、突击相结合，利用强大炮火，辅之以大量炸药，在高大城墙上打开缺口，突击队适时投入战斗，迅速占领突破口，掩护二梯队向纵深和两翼发展，接应友邻突入城内，实行多路分割穿插，在巷战中逐批歼敌。

第三，济南战役的胜利离不开中共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的正确领导，离不开华东党政军组织和广大人民的支援，离不开各战略地区军民与各兄弟兵团的密切配合。各地方兵团积极配合作战，破坏铁路交通，歼灭与牵制国民党援军，使其无法迅速向济南增援，尤其是冀鲁豫及豫皖苏广大军民直接配合作战和全力支援前线，对此次战役贡献极大。

第四，华东解放区的人民支前，是战役胜利的有力支援和保障。人民的支前工作不但为前线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保障而且其表现出的高度的组织性和革命热情同样为战役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共中央华东局于8月中旬全面部署支前工作。华野副政委山东兵团谭震林亲自动员，号召华东解放区人民支援前线，提出“打下济南城，解放全山东”的口号。成立山东省支前委员会，进一步充实健全支前组织。据统计，战役期间，鲁中南、渤海和胶东三个地区，加上华北地区的支援，共动员50万余支前民工、1.4万副担架、1.8万辆大小车辆，筹备粮食1.4亿斤，并筹集大量构筑工事的物资，供应前方大量副食品。同时设立几百个转运站，担负火线运输和转运伤员的任务。人民的支前是济南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第五，中共济南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中共济南地下党组织在济南市内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并在各行业包括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特机关中发展党员，形成了一批地下工作队伍。5月初，济南市委召开部长联系会议，对室内工作进行部署，要求加强情报工作，掌握与推动群众斗争，布置必要的武装内应和加强市内外武工队活动。5月17日发布《调查提纲》对敌人防御系统，工事构筑，地形水系、地质层等，经过两个月的时间，进行详细确实的调查，还对济南市政治、经济、文化、党派、社团、特务、社会名流等进行调查。对官僚资本、地方财产、工厂、仓库、公司、商店等进行了调查，对解放以后的接收工作准备了条件。地下党组织通过派出人员长期努力对吴化文做思想工作，争取其在战场上起义。地下组织还临时组织纠察队保护工厂，



企业、学校等，维持社会秩序，减少乱抢现象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作为战略决战的序幕之战，济南战役的伟大胜利意义重大。

济南的攻克，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津浦路徐州以北至天津以南段及胶济路青岛以西段全部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从而大大地改善了支援前线的条件。同时，华东野战军也能全部南下，协同中原野战军在陇海路以南进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逐次歼灭徐州地区的敌人。中共中央在9月29日致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首长的贺电中指出：济南战役“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济南战役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国民党军重兵坚守的大城市的先例。济南战役后，国民党军队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开始崩溃，华北地区，只剩下北平、天津、唐山、太原、大同、张家口、青岛等十几个孤立的据点，士气涣散。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

济南一战，华东野战军攻打国民党重兵防守的大城市，及时地改变战法，将围城打援变为围点打援或阻援打点，为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作了一次探讨性的军事实践，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意义深远。济南战役的模式搬到东北辽沈战场以后被林彪所灵活运用，取得了又一个伟大胜利。

周恩来后来说：“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济南战役也是蒋介石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体系总崩溃的开始。美联社9月26日也发表评论说：“自今以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也没有什么阻挡了”“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也不例外。从围攻大城市的角度讲，济南战役也就成了伟大的战略决战的序幕之战。随着济南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因势利导，及时地将攻势引向就地歼灭国民党大军团的战略决战，中国革命史上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战略决战就此展开画卷。

注释：

①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毛泽东军事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3]《毛泽东传（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4]《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6]《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集（1949－195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7]《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10册。

[8]《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9]《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10]《周恩来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1]《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12]《朱德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3]《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14]《粟裕战争回忆录》，粟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15]《郭汝槐回忆录》郭汝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6]《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17]（美）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



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8]《华东解放战争纪实》，刘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9]《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郑维山，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20]《济南战役回忆录——攻克济南》，济南市出版办公室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1] 王俯民：《蒋介石传》，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22]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4]《济南战役》，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

[25] 蒋方宇：《吴化文起义始末》

决策辽沈战役

战略决战的第一仗选在哪里？这至关重要。毛泽东历来“慎重初战”，尤其是关系到两军胜败的战略决战。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对战略决战的方向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斟酌，最后认为把战略决战的第一仗放在东北战场比较稳妥可靠。这是因为就当时的全国局势来看，东北战场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更为有利。

1947 年东北野战军发动三次大规模攻势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 38.8 万余人，扩大解放区 30.7 万平方公里。至 1948 年 3 月解放军冬季攻势结束，东北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北各解放区基本上连成了一片，东北地区 97% 的土地和 86% 的人口已经获得解放。解放区，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方比较巩固，群众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农业播种面积达 1 亿亩以上。工业生产逐步恢复，城镇工商业得到大力扶植和迅速恢复，尤其是军工生产发展更快。解放区拥有铁路 1 万余公里，占东北铁路的 95%。东北人民解放军也迅速壮大，到 1948 年 8 月，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 12 个步兵纵队、1 个炮兵纵队、1 个铁道纵队、15 个独立师、3 个骑兵师，共 54 个师 70 万人，另有地方武装和二线补充兵团 33 万人。部队武器装备得到改善，全军拥有步兵炮、迫击炮、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 2 300 多门，高射炮 116 门。东北野战军主力大部位于沈阳、长春之间，两个纵队位于沈阳、锦州之间，一个纵队位于唐山、昌黎附近，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休整和军政训练，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都大为提高。

与东北人民解放军相反，到了 1948 年春夏，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部遭到人民解放军连续打击后，处境非常困难。其总兵力虽然尚有 4 个兵团 14 个军 44 个师（旅），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 55 万人，但已经被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孤立地区内，所控制的面积还不到东北总面积的 3%，欲守无力，欲撤难舍。由于北宁铁路若干段及营口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长春、沈阳通向山海关内的陆上交通已被切断，

补给全靠空运，物资供应匮乏，士气低落。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上，东北被描述为“饥饿的沈阳，垂死的长春”。

整个形势表明，东北战场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的军力和经济实力均已超过国民党军，军队在数量上，特别是质量上都占据优势。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决战条件已经成熟。

鉴于以上形势，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和李宗仁等都提出放弃东北，将部队撤入关内。但此时在国际上，蒋介石正全力帮助美国共和党的杜威竞选总统，杜威声称当选后将给予国民党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所以蒋介石必须守住现有地盘，坚持到杜威当选，得到援助后再图发展，如果此时不战而放弃东北，不仅给人以国民党脆弱不堪一击的印象，不利于杜威的竞选，而且在杜威当选后再要夺回东北也要付出更大代价。在国内，蒋介石刚在 1948 年 4 月 19 日当选中华民国总统，达到政治统治的高峰，如果不战放弃东北则会大失人心。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不愿也不能不战而放弃东北。在军事上，如果放弃东北，长春的 10 万守军势必覆没，那么他将失去军心士气。即使东北的数十万军队能够顺利撤入关内，固然可以加强华北、华东的兵力，但同时也要看到东北的人民解放军就会全力入关，首当其冲的就是华北的国民党军将同时面对东北、华北解放军的联合打击。因此蒋介石也希望能利用沈阳、长春来牵制共产党在东北的几十万大军。守，无必胜把握；撤，面临政治风险。是守是撤，蒋介石举棋不定。

1948 年 7 月 19 日，蒋介石在总统府召开有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参加的作战会议，确定了一个在东北“暂取守势……长春仍固守，北宁路暂不打通”的维持现状的方案。8 月初在国民党军事检讨会上又决定采取“集中兵力、重点防御，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的战略方针，企图“固守沈阳、长春，打通辽西走廊，确保热河、辽东，以巩固华北”。根据这个方针，蒋介石要求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将主要兵力集中在以锦州为中心的北宁路上，切实保持关内与东北的陆上通道畅通，同时等待机会撤出长春，以一部兵力控制沈阳，达到吸引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的目的。蒋介石的这一部署，不但向国共上下表明了他死守东北的决心，同时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又可以依托北宁路将东北兵力转移到华北战场。

死守东北，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一是兵力不足，靠现有的 50 万部队，想要坚守东北是比较困难的。当时在全国各战场，国民党军到处都面临着兵力不足的问题，1948 年 5 月从山东调到东北地区的国民党第八军、第九军，

仅仅过了三个月就因华东吃紧而又被重新调回徐州。二是粮食不足，特别是长春，全靠空运。如果沈阳也被包围，空军根本无法维持对其的空中补给。三是士气低落，将士多无斗志，人心涣散，战斗力极为有限。

撤往关内，东北“剿总”卫立煌和众将领又有自己的顾虑：一是长春距离沈阳300多公里，其中间区域均为东北野战军所控制，在东野团团包围之下突围通过解放区，极可能在途中被歼灭；二是沈阳、锦州之间同样300多公里，沈阳守军主力转移锦州，实属“侧敌行动”，危险性同样很大。如果国民党东北军顺利撤到关内，他可能是挽救国民党将士的英雄也可能是丢失东北的罪人，一旦他在撤退中遭受损失，自然是“党国的罪人”，“难辞其咎”。所以，卫立煌等坚决主张固守沈阳、长春和锦州，争取时间，征召训练更多的军队。最终蒋介石批准了卫立煌的方针。国民党东北“剿匪”司令卫立煌为固守东北，维持现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补充兵员，整顿部队。重新组建了在1947年冬季作战中被消灭的新五军，新编成新八军，使正规部队达到十四个军约四十八万人。

第二，是调整部署，先将原由华北剿总和东北剿总共同指挥的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改称锦州指挥所，并划归东北剿总单独指挥。由范汉杰任指挥所主任，指挥第六兵团共四个军十四个师，连同地方部队约十五万人，防守义县至山海关一线，重点防守锦州、锦西、葫芦岛，保障东北与华北的联系。由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指挥第一兵团两个军六个师，连同地方部队约十万人守长春，牵制解放军主力。卫立煌自己则坐镇沈阳，直接指挥第八第九兵团所属8个军24个师，连同机关保安团共30万人守御沈阳，并作为整个东北的防御枢纽，伺机南北应援。

第三，对所占城市加修加固防御工事，一律都改建成钢筋水泥的永久性工事。

第四，加紧筹集粮食，卫立煌命令沈阳、长春部队到外围四处抢粮，在长春曾号召官兵种粮。

第五，大力争取美国援助。1948年5月巴大维还亲率顾问团成员，到沈阳、抚顺视察机场和仓库设施，以便大举进行空运。

同时加强同华北剿总的联系，卫立煌派参谋长参加华北、东北联防会议，要求华北方面对锦州、山海关地区给予兵力、装备、补给上的援助。而东北方面则尽力牵制东北解放军，减轻华北的压力。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早在1947年就已经开始筹划东北战局。1947年5月



20日毛泽东致电给林彪、高岗并告朱德、刘少奇就指出："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目前你们以八个师南进，希望能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①]毛泽东认为夺取长春、沈阳、北平、天津四城，长沈、北宁两路的条件有三：第一就是在北满建立根据地，第二向南满作战，建立根据地，第三需要解决冀热辽根据地问题。"聂萧罗[②]军上月正太作战歼敌三万余，缴枪一万五千以上，现须休息半月，约下月中旬拟打津沧线，配合你们作战。纵观全局，目前大部分地区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二个胜仗，即可转入全面反攻。"[③]7月，中央军委再次电告林彪、罗荣桓、高岗：战争第二年，"北线我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④]第三年"东北、五台我军，除留必要兵力攻击平、津、沈及其他第二年尚未占领之城市，并守备本地外，即可以相当数量之兵力加入西北及长江以南作战。"[⑤]这两份电报透漏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重要的战略意图：一是以东北人民解放军为主，东北、华北两军协同解决两区的国民党军；二是东北野战军作战重心南移，准备解决"两路四城"。

1948年2月7日，毛泽东致电正在进行冬季攻势的东北野战军："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该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⑥]林彪完全同意毛泽东歼敌于东北的战略。2月10日，林彪致电毛泽东，表示"同意与亦认为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极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⑦]并提出东北野战军下一步作战应考虑以主力转至北宁线，截断国民党军由陆上撤向关内的退路，并在该线寻找战机。

4月中旬，冬季攻势结束后全军修整，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再次研究国民党军队"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防守方针。对如何解决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大要点的国民党军队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但由于东北解放区的战略重心一直在北部，南部的大片新解放区还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巩固和建设，东野和东北局的领导机构和主要的人力、物力储备都在松花江以北地区。东野的注意力也主要放在长春方向，部队主要部署在长春周围和四平地区，采取一面包围长春一面整训的方针，没有考虑主力

尽快南下的问题。而且当时对毛泽东提出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设想认识不够，认为在实施上存在较大的困难。“即攻城又打援”的大战斗吃不消，而且南下作战道路和补给均有困难。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负责干部会议讨论东北野战军下一步作战问题，确定了先打长春的作战方案。4 月 18 日，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主要领导人致电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明确提出拟于 5 月中下旬集中 9 个纵队的兵力，实施攻打长春和阻击援敌的作战方案，并“力图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而认为打其他方向，南下北宁线或入关作战，道路和补给均有困难，而且国民党集中兵力把守大城市，东野主力南下或到处扑空或遇敌而无力消灭。同时“建议晋察冀以四个纵队或三个纵队兵力开到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地区歼灭和钳制范汉杰集团”。4 月 22 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审慎研究了东北领导人的电报以后，复电：“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但同时指出：“同意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也强调对南下作战的困难不能估计过高，明确指出：“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⑧

当时担负长春守备任务的是国民党军郑洞国指挥的新七军、第六十军。尽管长春守军相对孤立，但因与沈阳距离较近，便于沈阳军队实施地面增援，而且与沈阳保持着空中联系，城内也还有一定的粮弹储备。所以郑洞国企图坚守长春这个战略要点，牵制东北野战军部分主力。为了达到长期坚守的目的，国民党军在长春地区构筑了坚固工事，形成了纵深防御体系。

5 月 24 日，东北野战军发起攻打长春的外围战，奔袭长春西郊大房身机场。歼灭了机场守敌 6 000 余人，自己伤亡也高达 2 000 余人。这次外围战之后，东野领导人发现部队对坚固设防的大城市还缺乏攻坚作战的经验，部队在战术和技术上都存在不少问题，全力攻城无成功把握。随后，东野领导决定暂停对长春的进攻。5 月 29 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长春外围战的情况和改变作战决心的理由：“长春城敌防御工事据查甚为坚固，除城周围布有强固工事外，城内则密布纵深抵抗的巷战坚固工事……我军攻长春即会付出最重大的伤亡，最后仍可能无法解决战斗……因此我们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兵力久困长围，准备在敌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以我主力转至北宁线，承德、古北口之线一带作战的方针。”⑨这是东北野战军在决策上的一次重大变化。



此时，毛泽东从战略全局考虑，希望东北野战军主力采取南下作战的方针，以便封闭东北敌军的退路，但也考虑到大军南下将带来的后勤保障困难，需要预先解决交通运输、后勤补给等重大问题。所以，毛泽东在5月31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的电报中，就要求充分准备大军南下所需要的粮食，并保障交通运输问题："为准备东北主力出至锦、榆、津、平线及平、张、绥、包线作战，你们必须精心筹划由东北运输粮食至该两线之各项技术问题……以上各公路铁路情况如何，望查告。"[10]这表明，中央军委对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持慎重态度，要求积极创造南下作战的条件，努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6月5日，林罗刘就部队行动问题向中央军委提出3个方案：一是目前即正式进攻长春，但认为无把握，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小；二是以少数兵力围住长春，主力到北宁路作战，但认为南下作战可能扑空，或因敌集中不好打，粮食极为困难，同时长春之敌可能乘机逃回沈阳，造成两头都无战果的结局；三是用2～4个月的时间，对长春实行久围长困，然后攻城，并认为"目前以采取第三个方案为好。"[11]两日后毛泽东再次电告林罗刘，对长春围城打援部署进行了详尽指导，同时指出："在攻长春的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内，你们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12]

六月中旬，东北野战军在吉林市召开野战军师级以上干部会议，着重研究围困长春的方针部署。决定由第一兵团萧劲光、萧华指挥第十二纵队和6个独立师共十万人对长春实行"长困久围"，在军事封锁的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促使长春国民党守军弹尽粮绝，然后攻城。其余主力则集结在沈阳长春沿线准备打援。但是国民党军队在一个多月中，沈阳援敌并未出动，而沈阳同样难攻，一旦沈阳守军弃长春于不顾突然转移锦州，我军则无力阻止。

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局7月重新研究东北战场的形势，认为长春守敌10万以上，设防坚固，如攻击长春又有可能遇到由沈阳、锦州北上的20万增援之敌的威胁，所以打长春带有勉强性和冒险性；如攻长春不成，则对今后作战将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南下作战为好，不宜被动攻长春。20日，林罗刘将上述意见报告中央军委：决定"大家均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击长春"并建议"东北主力待热河秋收前后，8月中旬时，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首先以第十一、第九、第四纵队用奔袭手

段包围和歼灭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五城之敌，然后迅速向承德前进，即进行夺取承德和打援的战斗。”[13]7 月 22 日，中央军委同意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复电东北局“你们的政治动员和准备粮食等项工作，必须加紧进行……你们指挥机关似宜先期南下和程子华罗瑞卿诸人会面为适宜”。[14]“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15]“关于具体作战计划，希望你们详加考虑，拟出全般方案电告。”[16]30 日，军委又指出：“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17]在同意东北野战军执行南下作战方案的同时，中央军委命令华北军区以第一、第二（欠第四旅）、第六纵队组成第三兵团，由杨成武、李井泉分别任司令员、政治委员，向绥远出击，威胁傅作义的老窝；以华北第二兵团出击平古（北口）路和平张路，以钳制傅作义部，使其不能抽兵增援东北。

此时，东野领导对南下作战的困难仍有顾虑。8 月 6 日，东北野战军首长致电中央军委，建议以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先向绥远行动，迫使傅作义部主力西调绥远，“以便我们和杨（得志）罗（瑞卿）部队开展战局，和更迟（进）一步与杨成武部会合，歼灭傅作义调到了西线的力量。”并在 8 月 8 日致中央军委的电中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18]8 月 9 日，在致军委的电中又反映：现在南下，大军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需待郑家屯运粮道路修复，雨势稍减即可随时出动，但目前仍无法肯定出动日期。对于东北野战军首长因上述原因而不能迅速定下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的决心，中央军委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强调：应从战争的全局利益出发，迅速下决心以主力南下北宁线。东北野战军首长根据军委的上述意图，于 8 月 24 日致电中央军委：“近两日水势似在开始下降，被冲毁之铁路桥梁，一星期左右可能修好。我们拟待铁路桥梁修好后，以三天时间运粮屯集在阜新一带。我部队大约可于本月底或九月初出动，在九月六日前后，即可在北宁线各城打响。”9 月 3 日，东北野战军首长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如下的计划：“以靠近北宁线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



下之敌。”[19]5 日，中央军委复电着重指出：东北我军“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20]7 日，中央军委进一步指出：应将主力使用于锦州至唐山之线，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如果你们以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一方面长、沈之敌可能不出来，另一方面锦、榆、唐诸点及其附近之敌（十八个旅）则因你们去的兵力过小，可能收缩于锦、唐两点，变为不甚好打而又不得不打，费时费力，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21]中央军委预计，从 9 月至次年 6 月的 10 个月中，为求全歼卫立煌集团，应准备进行三次大的战役，要求东北野战军首长在作战指挥上注意掌握以下三点：“（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22]

至此，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路作战的方针最终确立。这个方针的基本点是：东野主力南下，首先截断北宁线，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然后采取攻锦打援的手段，争取将卫立煌集团就地各个歼灭。

战役方针确定以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部队南下的攻击重点和全盘部署。南下北宁线，对东北、对华北而言都具有重大影响。因此中央军委在 7 月 23 日就电令华北军区聂荣臻，薄一波指出：杨成武部组成西进兵团，取道大同以南，准备 8 月 25 日在归绥、包头一线发起进攻，占领整个绥西产粮区，或向归绥以东机动，吸引北平傅作义部西援，以利东面之作战，余部由杨得志、罗瑞卿指挥“准备 8 月 20 日左右直接接受林罗刘的作战任务”，形成“东北打，华北牵”的局面。

1948 年 9 月 10 日，东野最后确定了主力南下的具体作战计划：以 6 个纵队、3 个独立师、1 个骑兵师和炮兵纵队的主力，夜行晓宿，长途奔袭，包围锦州及北宁线上各点；以 4 个纵队及 1 个骑兵师位于锦州以北的新民县西北，监视沈阳之敌；以 1 个纵队在开原地区准备阻击长春之敌突围；以 1 个纵队、6 个独立师和炮纵一部继续围困长春。另以少数部队向长春方向佯动，公开提出“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以迷惑敌人。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⑧⑩⑫⑭⑮⑯⑰⑱《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78 页，第 79 页，第 134 页，第 135 页，第 391 页，第 455 页，第 470 页，第 481 页，第 542 页，第 541 页，第 542 页，第 548 页，第 563 页。

②聂萧罗，指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⑦《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 年版，第 50 页。

⑨《辽沈战役》，第 72 页。

⑪⑲《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 年版，第 66 页，第 97 页。

⑬《辽沈战役》，第 75 页。

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 322 页。

㉑㉒《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335 ~ 1336 页，第 1336 页。

战役前的准备

东北野战军在和中央军委商榷辽沈战役作战方针的同时，为适应即将到来的大规模作战的要求，迅速组织投入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第一，加强领导、调整指挥关系。为了适应东北大规模作战和下一步战争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对东北解放军的领导进行了调整。8 月 14 日，军委决定：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委，刘亚楼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谭政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兵团：第一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第二兵团程子华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大量繁杂的地区性、事务性工作交给了高岗等东北军区领导，林彪等则移师辽西，专务作战。9 月 5 日，根据大兵团作战的特点，东北野战军就作战指挥关系问题做出新的规定，并经中央军委 9 月 7 日批准。决定：遇大规模攻城战役，由野战军担任战场指挥；凡两个以上的纵队一起作战时，由兵团司令部统一指挥，兵团司令部来不及赶到时，则临时指定某一纵队领导担任战场指挥；在必要时野战军可直接指挥到师，同时通知兵团和纵队；野战军有时将派人前赴某一战场协助指挥某一战斗。以上领导关系和指挥关系的调整，对把握战机，有效地加强领导保证战役指挥的集中统一和及时迅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及时处置紧急情况，保证胜利，提供了条件。

第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948 年 9 月 7 日，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向部队发出《北宁线作战政治动员令》，指出：在利用围困长春和准备攻击长春的机会中，我野战军主力已取得了两个月的紧张练兵，大大的提高了对攻坚战与运动战的战斗力，这对今后作战有极重大的实际意义。但我军新的作战行动是暂时放弃攻击长春，只以部分兵力围困长春，而以最大主力南下，向北宁线前进，以奔袭的动作，坚决歼灭分散于北宁线上守备的各处敌人，切断与摧毁东北敌人与华北的联系，使两处敌人彼

此完全陷于绝望的孤立中。并求引出长春之敌突围，而在突围中歼灭该敌，由此求得加速全东北解放之早日到来。而且预见东北国民党军现在所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将必然因敌人的逃走或兵力减少而为我人民解放军所一一收复，如过去收复吉林（逃走）、收复四平（兵力减少被我攻下）一样。南下北宁线，“对于打通与华北解放区联系与更有力的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皆有重大意义。要求全军必须从思想上动员起来，懂得新的行动作战之重大意义与有利条件（敌分散，便于我各个击灭）”。[①]

根据中央军委第三年战略任务的安排和东北战局的实际，在干部中指出下列动员内容：（一）人民解放战争过去一年中的伟大胜利，首先是由于坚决的执行了向敌后方作战的正确方针（即外线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去年夏季、秋季和冬季三次攻势的巨大胜利，皆是由于避免攻击敌人正面，而采取了大胆向敌后进攻的方针。在国民党统治区及军事后方联络线上实行截断分割敌人，而获得了各个围歼敌人的结果，因而改变了东北局面，使我解放区占有全东北土地百分之九十七。（二）东北敌人在一连串的失败之后，已不得不放弃面和大部分线的防御，而龟缩到重点的防御，并企图借此达到旷日持久的对抗我军的进攻和迟滞我军的南下，而求得协助华北敌人，巩固对平、津、保三角地区之控制与暂保北宁路之锦平段。敌人的这些企图，将在东北人民解放军与华北人民解放军的密切配合作战打击之下遭到粉碎。（三）新的作战行动，是东北人民解放军在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的开始，是在关内人民解放军五路大捷后的再起。我们完全相信东北人民解放军有过冬季攻势的严重考验，军力更加充实与又经过二个月的紧张练兵，必定能够继续争取自己的荣誉，必能英勇的吃苦耐劳的作战，求得歼灭大量的敌人，完成全东北的解放，打通对华北解放区之联系，与积极地配合全国各战场继续扩大战争胜利。（四）新的作战行动，还会遇到新的困难，在人数众多之大兵团实行大的机动，由后方供应补给将可能发生间断。尤其当进入我新解放区，是必须严格执行党所规定的政策。只有这样，才会达到大量歼灭敌人和解放更多的人民，并把敌人的人力物力变为直接支援自己的人力物力。因此，干部应更好的学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坚持已经颁布之编制，同任何浪费人力物力的倾向作毫不宽恕的斗争，这是打破困难，争取胜利的重要因素。（五）野战军在整训时期仍然存在严重的非战斗减员，大批的清洗，表现要求精兵主义的倾向，对大批的逃兵和疾病亦未加以重视。这里基本的错误思想是没有懂得战争是大规模的，还是较长期的，对解放区人力物



力不作全盘打算，而认为补充是易为的。这在新的行动作战中，如不引起最大警惕，将会造成加倍的严重的非战斗减员。因此，要求各地党委及军事政治指挥机关有计划的加强连队党的支部领导作用与提高连队干部的管理教育能力。（六）新的行动作战对全军、对各兵团皆是一新的考验和巨大的锻炼，这一战略机动的胜利，将决定我们各级党委的领导和军事指挥上的艺术及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英勇精神，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不怕挫折和忍受困难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以适于连续作战的需要，必须把全军的觉悟提高到最高，并以积极的精神去运用战术与技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定能获得伟大的胜利，给全国以重大的配合。全军在传达上述动员令的同时，还进一步指出，这次行动“沈阳敌人将被迫出来策应长春敌人突围或策应锦州敌人作战。因此，我们有求得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人的机会”[②]。要求各部队结合所任战斗任务，认真深入的进行动员教育。

东野领导人尤其注意做好纵队一级干部的思想工作，向他们阐明先打锦州的战略意义，然后再动员他们向下级宣讲，一级一级向下传达。罗荣桓给第三纵队副司令员曾克林做思想动员时说：“东北敌人的态势从地图上看是个‘人’字形。长春是头，沈阳是肚子，北宁线是一条腿，从沈阳经辽阳到营口的中长路南段是另一条腿。现在如果打长春、沈阳，敌人拔腿就跑。砍掉敌人两条腿，它光剩下头和肚子，就只能束手就擒。毛主席坚决主张先打下锦州，同时把长春围起来，沈阳的问题就好解决了。”[③]

第三，进行大兵团攻坚战训练和战术技术大练兵。早在冬季攻势前，东野召开参谋会议，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根据东北战场的形势发展，把“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作为当时的工作方针。林彪作了形势报告，罗荣桓作了《今后建军及正规化问题的报告》。冬季战役结束以后，东北部队转入大规模的整训，以提高军事技术水平。3 月 25 日，东北野战军召开参谋长会议，着重对“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强调司令部应掌握打阵地攻坚战、大纵深战的组织保证，确定掌握炮兵及各兵种的协同作战，真正成为有科学头脑的、能干的指挥机关。4、5 月间，又召开了由高级干部参加的为期一个月的军事会议，着重解决高级干部对大兵团作战的认识，具体研究攻坚的特点，纵深战斗的战术和炮兵的配属使用问题。6 月还召开了军事训练会议，部署研究军事训练任务。在训练中强调将攻坚战和运动战两个科目的战术均做具体详细的研究，使指挥员战斗员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以便今后的攻坚和打援。在围困长春以后，部队采用在实战中练兵，在围困中练兵的方法。至辽沈战役正式打响，东北野战军拥有强大的军

工生产，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铁道兵、第一支装甲兵、第一支炮兵，拥有上千门重炮，各兵种的协调作战能力也大大提高。

第四，积极做好后勤保障与群众支前工作。1948 年 4 月，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召开后勤工作会议，按新的作战要求调整组织，统一编制和供给制度。7 月，再次召开后勤工作会议，解决人力、物力、财力的统一集中和调度使用问题，规定各供应线后勤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军需、卫生系统也先后召开专门会议，制定措施。8 月，又决定将后勤系统划分为前后方两个机关，即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和东北军区后勤部。同时明确规定各自的职责，即野战军后勤部由钟赤兵任部长，领导各后勤分部实施对作战部队所需物资的供应；军区后勤部由李富春兼任部长，负责作战物资的筹集、加工制作和前运。先后将原东西北线 3 个后勤司令部改为 5 个后勤分部，将冀察热辽军区后勤司令部改为第六分部，划归东北野战军后勤指挥部。此外还将东北地区的 58 所医院统一编号；扩建汽车运输部队，后勤系统共拥有 1408 辆汽车，编成 5 个汽车团，一个汽车队，另有 4 个辎重团，这就大大提高了军运能力。

中共东北局，东北各级行政机关和地方各级党委组织，对支前工作都做出了周密的研究和部署，并发出指示：一切为了前线，动员人民群众支援战争。辽宁、吉林、辽北、热河等省成立了支前委员会，负责支前动员和组织指挥。先后在前线地区设立 6 个供应站，25 个供应分站。军工、邮电等战线上职工和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均积极行动起来，加紧生产武器弹药，抢修运输道路和通讯设施，筹集粮食和被服，从而为决战的胜利提供给了坚实雄厚的物质保障。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和东北铁路总局联合组成军事运输委员会，并在梅河口，郑家屯设立运输分委会。铁路纵队和广大铁路工作人员奋力抢修通往前线的铁路。战役前，已经修复通车线路 9 818 公里，修复机车 885 台，集中车皮 1 224 节，为保障野战军迅速南下和支前物资的运送做出了充分的准备。

战前准备工作已经充分落实，各参战部队按照东野的作战命令，于 9 月上旬迅速隐蔽的向指定作战地域进发，辽沈战役即将打响。

注释：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06 页。

②《辽沈战役》，第 105 ~ 106 页

③朱文峰编著：《罗荣桓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84 页。



辽沈战役的第一阶段　攻占锦州

1948 年 9 月 12 日，辽沈战役拉开帷幕。夺取整个战役主动权的关键在于迅速攻克锦州，断绝东北与华北国民党军之间的联系，封闭卫立煌集团于东北，形成“关门打狗、瓮中捉鳖”之势。

北宁路是国民党军连接关内关外的最重要的陆上通道，锦州又是这一条交通要道上的咽喉，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锦州四周环山，南有小凌河、女儿河，地势险要。国民党守备锦州的兵力有：范汉杰指挥的第九十三军，新八军各两个师，新六军一个师及原属六十军的一个师，共六个师，连同特种兵，后勤和地方部队约 10 万人。国民党军凭借炮台山、双子山西北、罕王殿南山、紫荆山等高地，以永久性工事为骨干，构成若干支撑点的独立坚守据点，作为外城阵地；依托两河和城垣构成主阵地；以城内高大建筑构成核心据点。为拱卫锦州，同时将九十三军一个师位于义县，新八军一个师位于高桥。第五十四军位于锦西、葫芦岛和兴城，新五军位于绥中、山海关、秦皇岛和北戴河一线。此外，华中剿总所属第六十二军等 4 个师位于唐山至昌黎一线。

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指挥第十一纵队及冀察热辽军区 3 个独立师，最先出击昌黎至兴城诸点，于 9 月 12 日包围了绥中、兴城的国民党军，并于 9 月 14 日攻克昌黎。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的北线部队迅速奔袭北宁线。其中，第四、第九纵队于 9 月 16 日突然包围义县国民党守军，使其来不及向锦州方向收缩，在后续部队到达后，又继续向锦州方向前进。9 月 25 日，第九纵队与第八纵队配合攻占了锦州以北的葛文碑、帽儿山等要地。9 月 27 日，第七纵队攻占高桥和西海口，第四纵队一部进占塔山，截断了锦州与锦西、葫芦岛的联系。蒋介石紧急布置以空运增援锦州，首先从沈阳空运了第七十九师两个团到达锦州。9 月 28 日，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一部逼近锦州机场，用炮火封锁了机场，致使国民党军向锦州增援的通道被彻底切断。9 月 29 日，第四纵队攻占兴城。10 月 1 日，第三纵队和第二纵队第五师攻克

义县。至此，东北野战军已歼敌2万余人，切断了北宁路，锦州外围据点全部肃清，锦州完全孤立。

东北野战军在北宁线上发起强大攻势之后，蒋介石深感形势严重，于10月2日飞抵沈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从华北和山东海运葫芦岛7个师（华北林伟俦的第六十二军3个师、黄翔的第九十二军1个师、罗奇的独立第九十五师、烟台王伯勋的第三十九军2个师），加上葫芦岛阙汉骞的第五十四军4个师，共计4个军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华北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以沈阳地区的5个军11个师（潘裕昆的新一军2个师、李涛的新六军2个师、龙天武的新三军3个师、向凤武的第七十一军3个师、郑庭笈的第四十九军1个师）和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准备东西对进，以解锦州之围。当晚，蒋介石又召集师长以上将领会餐，蒋发表讲话说：“你们过去要找共匪主力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匪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机会。我相信你们能够发挥过去作战的精神，和关内国军协同一致动作，一定可以成功的。”①

在沈阳，廖耀湘曾请教蒋介石为什么在5月初就决心撤退沈阳主力以避免决战，而现在又下定决心要与东北共军决战？蒋告诉廖这是从战略全局考虑的。顾虑到整个局势，在撤退东北主力之前，一定要给东北共军一个大打击，一定要来一次决战，否则华北就有问题。蒋介石接见东北诸将领以后于3日即匆匆离开沈阳。

而在蒋介石离开沈阳的前一天，东北野战军前指机关乘专列离开哈尔滨，到达郑家屯以西隐蔽。当日下午，林彪得悉国民党军海运4个师到达葫芦岛，担心被沈阳、锦西、葫芦岛之敌夹击。他判断葫芦岛之敌必大举援锦，锦西至锦州之间仅相距50公里，且无险可守，担心阻援部队不一定能抗住援敌，故于当日22时起草了致中央军委的特急电报，提出继续打锦州或者回头打长春的两个作战方案，表示“……在战斗未解决之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在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目前如攻长春，则较6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林彪签发这一电报后，攻锦部队仍按原部署继续向锦州推进，东总列车亦于深夜继续南进。

林彪对贯彻辽沈战役方针的犹豫和徘徊，使东野再次经历了战场决策的



变化。10月3日清晨，前指列车到达彰武以北的冯家窝棚，罗荣桓经过反复考虑后，认为应该坚持打锦州，在同刘亚楼商量后两人一同去见林彪。罗荣桓建议林彪仍然执行打锦州的决定，最后林彪同意了罗荣桓和刘亚楼的建议，决定由罗荣桓起草致中央军委的电报，表示决心“仍攻锦州”，并报告了基本部署：从沈阳以西的狙援兵力中再抽调两个纵队到北宁线，使集结在北宁线的兵力达到八个纵队，另一个主力师。其中，以两个各纵队进到锦州以北的塔山，虹螺岘一线狙击锦西葫芦岛援军；以一个纵队位于高桥任预备队，以五个纵队另一个主力师会同炮纵主力共25万人攻夺锦州；以三个纵队位于彰武新立屯以东狙击沈阳援锦的国民党军队；以十一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继续围困长春；将原任围攻长春任务的一个纵队南调通江口准备南北机动。

毛泽东直到收到由罗荣桓起草的电报后，才感到放心，并于10月4日6时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林、罗、刘并告东北局，表示同意10月3日9时电报的决心与部署，同时指出“从这件事你们应取得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你们的指挥所应先于部队到达所欲攻击的方向去，（这一点我们在很早就向你们指出了）由于你们没有这样做，致使你们的眼光长期受到限制；第二个教训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而不要平分军力。”[②]明确要求：“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③]并指出攻击锦州的时间越快越好。中央军委的指示，进一步坚定了东北野战军攻取锦州的决心。

10月5日，东野“前指”到达位于锦州西北、距锦州30多里的牤牛屯。并在帽儿山设立野战军司令部攻锦指挥所，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6日进入指挥所，开始组织部队进行攻城准备，并召开攻锦部队军事工作会议和政治工作会议。拟定了总攻锦州和打援的具体作战方案：以第二、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之第十七师，以及炮兵纵队主力和坦克营，组成北突击集团，由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指挥，由城北向南突击；以第七、第九纵队及一部分炮兵，组成南突击集团，由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指挥，从城南向北突击；以第八纵队及第一纵队炮兵团，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第八纵队司令员段苏权指挥，从城东向西突击；以第四、第十一纵队及2个独立师位于打渔山、塔山和虹螺岘一线，由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阻击葫芦岛和锦西方向的援敌；以万毅第五纵队、黄永胜第六纵队（欠第十七师）、梁兴初第十纵队（附第一纵队第三师），位于新民以西、以北地区，狙击由沈阳出援的敌

“西进兵团”；李天佑率第一纵队（欠第三师）位于锦州和塔山之间的高桥，作为战役总预备队，既可北攻锦州，也可南援塔山。

塔山不是山而是位于锦西与锦州之间，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周围是平缓的起伏坡地，东临渤海，西靠虹螺岘山和白台山。村东面是铁路，通往锦州的公路从村中间穿过。村南有一条干枯的滩河，宽约 30 米。塔山这个小小的村庄，注定将在辽沈战役中载入史册。其原因就是：它是锦西至锦州的必经之道，是国民党军西进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也是东北我军堵住国民党援军的必争之地。林彪强调指出：“攻击锦州最重要的保证，是要把锦西方面的敌军挡住。两锦相距约 50 公里，万一堵不住敌人，攻锦部队就要受到很大威胁”10 月 5 日，林彪致电 4 纵：“你们必需利用东自海边西至虹螺岘山下一线约 20 余里的地区，作英勇顽强的攻势防御，利用工事大量杀伤敌人，使敌人在我阵地前尸横遍野……而使我军创造震动全国的光荣的防御战。”

10 月 6 日，蒋介石乘“重庆”号巡洋舰到达葫芦岛第五十四军军部，部署锦西、葫芦岛国军增援锦州的作战任务。他对众将领说：“这一次战争关系重大，等华北一个军及烟台一个军运到后，协同沈阳国军包围攻锦州的共匪，然后接应沈阳国军主力到锦州。各将士的任务重大，几十万人的生命，都交给你们负责。要以杀身成仁的决心，击灭共匪。”[④]蒋并交代以后葫芦岛部队归侯镜如司令官指挥，在侯未到以前，由阙汉骞统一指挥向塔山、锦州攻击。同时指定海军司令桂永清及第三舰队司令马纪庄指挥海军以舰炮击毁塔山解放军阵地，协助陆军攻击。10 月 10 日起，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在 7 架飞机、两艘军舰舰炮和数十门重炮掩护下，3 个军 9 个师，轮番向塔山附近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阵地发起正面强攻。

在东进兵团进攻塔山的同时，10 月 11 日，廖耀湘占彰武，切断东北野战军铁路运输线，国民党军上下都以为切断了东野的补给线大动脉，但东野在地方党委的配合下，已经在彰武以西发动群众建立起一条新的补给线，廖耀湘兵团徒劳无功，白白浪费了时间。依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领导的部署，对“西进兵团”采取了纠缠扭打、滞留钳制的方法。这样，不仅迟滞了“西进兵团”援锦行动，有力地配合了主力攻绵作战，也为围歼该敌创造了有利态势。西进兵团在彰武整整呆了一个星期，十万余敌人无用武之地。

至 13 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连续猛攻均被打退，塔山阵地屹立不动。10 月 14 日凌晨 6 时，侯镜如指挥部队向塔山解放军阵地发起狂冲，双



方展开了几天来最为惨烈的阵地争夺战。东野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向“东总”报告，战斗异常激烈，部队伤亡很大。此时，总攻锦州的命令尚未下达，塔山阵地已9次易手。如果在攻城战斗突破阶段塔山失守，敌“东进兵团”将在一个小时内直逼锦州，攻城部队将腹背受敌。这样一来，不但整个辽沈战役的总计划被打乱，东北野战军主力也将受到极端严峻的威胁。这时，东野攻锦主力部队的外围战斗已结束。当天深夜，刘亚楼电话通知各攻锦部队：“攻城准备就绪，明天上午总攻锦州。”蒋介石感到锦州城已岌岌可危，连夜电令侯镜如：“拂晓攻下塔山，12时占高桥，黄昏到达锦州！”10月14日10时，刘亚楼下达了总攻令。东野炮纵集中500门大炮向锦州城内预定目标猛烈轰击。11时30分，各突击队发起冲击。至10月15日18时，攻克锦州城，全歼国民党守军十万余人，生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上将和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中将。侯镜如闻锦州失守，也暂时退回了锦西、葫芦岛。

在锦州破城之日令锦州守军副司令难以理解的是：“从塔山到锦州不过三十多公里，就是爬也爬过来了”，可是东野8个师顶住国民党军11个师的进攻，激战6昼夜，击退“东进兵团”数十次猛烈进攻，坚守住了阵地，涌现出了“塔山英雄团”“塔山英雄守备团”等英雄战斗集体，为攻克锦州赢得了时间。

当晚，林彪在指挥所接见范汉杰、卢浚泉。林彪询问范汉杰对锦州一战的看法。范汉杰沮丧地说“打锦州这一着，非雄才大略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锦州好比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扁担断了。”又说：“贵军炮火猛烈，出乎意料。我们的炮火全被压制住了。”接见卢浚泉时，林彪要卢浚泉给镇守长春的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通个电。第六十军与卢浚泉的第九十三军同属滇军，卢浚泉同曾泽生有袍泽之谊。卢浚泉当即起草了劝曾泽生率部起义的电报。

在锦州战事吃紧之时，10月15日上午，蒋介石偕杜聿明又飞抵沈阳。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说要办到三件事：“一为商决规复锦州之计；二为督促长春守军限期突围南下；三为严督沈阳与锦西葫芦岛两兵团赴援锦州，以期救护我范汉杰卢浚泉等忠勇将士。”但是就在蒋介石到达沈阳的这天下午六点钟，锦州失守，所谓的忠勇将士“范汉杰，卢浚泉”成了俘虏。

关于锦州解放的巨大意义，当时的《东北日报》在庆祝锦州大捷的社论里说：“锦州的胜利对于东北人民的全部胜利和最后胜利是有决定意义

的。敌人失去了锦州，其实际意义，就等于失去了全东北。孤守长、沈之敌，从陆上逃跑的后门，从此被紧紧地关闭起来了。东北敌人的最后歼灭，以及东北的最后解放，已经为期不远了。”

围困长春是辽沈战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从1948年5月23日长春外围战结束到10月21日长春和平解放，历时5个月。长春位于东北腹地，是贯通京哈、长图及东北境内各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1947年起，国民党军事当局动用10多万人力，耗费巨资，环城修筑了很多钢筋水泥碉堡和暗堡群。仅中央银行周围修建的永久性工事就有150处之多，整个城区变成一座军事要塞。

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东北人民解放军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在长春城外方圆50里的地面上，形成一个封锁区。解放军10万围城部队，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国民党军成了“瓮中之鳖”。

除了严峻的军事包围，最尖锐和直接的斗争还表现在经济方面。解放军在通往长春的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禁止粮食、蔬菜、燃料等一切生活物资和牛、马进城，严禁一切走私分子入城，重点实行粮食封锁。郑洞国率10万军队要在城内生存下去，吃饭活命是起码的条件。围城之初，他们经常在长春城外的村庄里抢粮抢柴，储存起来以备后用。后来，随着解放军围城部队日益向前压缩，国民党军队不敢轻易出城，只好依靠空投。然而，空投飞机遭遇解放军炮兵和高射机枪的射击后，有时来不及空投就掉转机头仓皇回逃，有的被迫从高空漫无目标地乱投，很多粮食落在解放军的阵地或封锁区内。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军加大了对长春市50万无辜百姓的搜刮，他们组织了军政警合一的“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将城内的粮食搜刮起来，“统一分配”。1948年6月到9月间，长春市的粮价上涨了700倍。为了缓解城内缺粮的压力，国民党开始采取“杀民养兵”政策，他们将骨瘦如柴的长春市民成群结队地驱赶出来。为此，解放军围城部队专门设立了数十个难民收留所，向百姓们发放粮食。

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使长春成为一个孤岛。此时，人民解放军又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如广泛的阵地喊话，做土喇叭，后来还发明了“弯形长话筒”，用长竹筒绑成弯曲的形状，一直通向国民党的阵地前沿；又如散发宣传品，创造打宣传弹、在护城河放宣传木船等办法，将宣传品送到国民党阵地上；有的缝制慰问袋，将食品和宣传品同时送给国民党军。强大的政治

攻势使国民党军队军心涣散，不断有人逃出城来投诚。国民党内部开始分崩离析。对60军上层军官的争取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60军原属云南滇系，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几位共产党员在这支部队中工作。为了争取策反，朱德总司令亲自给60军军长曾泽生写信，要他们发扬滇军护国的光荣传统，站在人民一边。60军内部的几位共产党员也有计划地开展了工作。1948年10月，策反工作终于取得了进展。10月16日，60军军长曾泽生与解放军商定了起义的具体计划。17日下午，曾泽生出城与解放军具体确定了交接防的时间、口令、办法。17日午夜，解放军接防部队进城，60军同时撤出城外休整。19日，新7军军长李鸿率其军部及所属3个师投降。

长春守将郑洞国，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曾参加过长城古北口战役、平汉路保定会战、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昆仑关战役，曾任中国远征军新1军军长，参加收复缅北要地密支那攻坚战。周恩来、林彪等以黄埔旧谊写信给郑洞国劝降。沈阳也派出飞机去长春空投蒋介石手令给郑洞国，要其率部立即突围南撤，否则将受到“严厉之军纪制裁”。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情况下，郑洞国决定投降，派人与解放军接洽，要求允许他再“抵抗”一两天，并发布一个他受伤被俘的消息。郑的要求获得解放军同意。21日4时，郑洞国率部放下武器，长春终于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

长春解放，辽沈战役的第一阶段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解放长春，共歼灭国民党军队20余万人，为下一步全歼沈阳守军，解放东北全境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④李勇，张仲田著：《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

②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

锦州、长春解放后，东北的国民党军只剩下锦西葫芦岛和沈阳两个据点。沈阳30万守军入关通道完全被切断，陷入绝境。蒋介石为挽救东北局势，打通通向关内的退路。于15日、18日两度偕杜聿明飞临沈阳与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等研究“紧急部署”。蒋介石判断，锦州之战东北野战军虽然取得了攻城的胜利，但是自身伤亡一定很大，短时间内已无再战之力，至少须经月余整顿补充。同时获悉东野一部正向山海关方向运动，认为东野不会固守锦州。据此命令卫立煌速将第五十二军的两个师和青年军二百零七师的3个旅加强给西进兵团，由廖耀湘统一指挥，迅速向黑山、大虎山、锦州攻击前进，与锦西、葫芦岛地区侯镜如指挥的东进兵团合力夹击，乘东野疲劳之机夺回锦州，而后东北国民军退入关内。

9月17日，杜聿明赶到位于新立屯的廖耀湘西进兵团司令部。由于东北的国民党军在与林彪部队几年的交战过程中，吃尽了围点打援的苦头，一支支国军在救援途中遭到伏击，有去无回。卫立煌担心廖耀湘西进兵团通过辽西走廊的过程中“侧敌侧水”，难逃被东野在运动中歼灭的命运，认为沈阳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城市，军工发达，依托沈阳组织防御是东北国民党军的最好战略。主张廖耀湘兵团经黑山退回沈阳，集中东北的国军主力坚守沈阳，先求自保。廖耀湘判断，共军回师速度很快，最多不过10天，既不同意经辽西走廊攻锦州，也不同意困守沈阳成为第二个郑洞国，力主西进兵团向南撤退营口，然后逐批经营口从海上撤往天津、青岛。杜聿明则提议廖耀湘兵团出锦州以北的北票，绕过义县、锦州，再转向葫芦岛。10月18日，蒋介石与东北国军主帅卫立煌研究西进兵团究竟应当西进、还是东返。杜聿明虽不主张廖耀湘兵团重夺锦州，但又不敢违背蒋介石，于是变通提出折中方案：由国军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率第五十三军、青年军第二百零七师等部留守沈阳；廖耀湘兵团向黑山、大虎山攻击，进攻得手后继续向锦州前进，否则，改向营口撤退；另以第五十二军主力抢占营口，并在天津等地征集船

 

只，以备廖耀湘兵团和沈阳守军从海上撤退。蒋介石接受了这一方案，蒋介石因卫立煌与其意见分歧重大，抗命不遵，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负责统一指挥东北国军撤退。

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对国民党军队的方针是“就地歼灭”，所以攻克锦州后，林彪就开始计划围歼廖耀湘兵团。10月16日，《阵中日记》记载了林彪的决心：“我决乘胜回头，围歼沈阳西援之敌。”10月17日，毛泽东致电林彪：“你们下一步行动，我们认为宜打锦葫，并且不宜太迟。”10月18日，侦察获悉廖耀湘西进兵团一部已占领新立屯并有继续南下的动向后，林彪认为沈阳国军有经锦州或营口总撤退的可能。同日，林彪致电军委建议：放弃攻打锦葫，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新立屯、黑山、沟帮子一带打大歼灭战，以各个击破，全歼正准备总退却的廖耀湘兵团。中央军委则指出：敌东西对进，对我有利；同意东野不打锦、葫，集中主力全歼廖耀湘兵团，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要求东野必须部署有力兵团于营口及其以西、以北地区，堵塞敌人海上退路。

10月20日，蒋介石采纳杜聿明的折中建议，命令廖耀湘第九兵团首先应夺回锦州，夺锦不成时方可转向营口撤退。同日，林彪下令攻锦主力挥师东进，采取“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的分割包围战法，在辽西新立屯、黑山、沟帮子地区，围歼廖耀湘兵团。具体部署是：锦州地区的二纵、三纵、七纵、八纵、九纵、一纵主力、六纵十七师和炮纵主力立即日夜兼程向新立屯、大虎山、黑山方向秘密疾进，从南北两翼迂回包围廖耀湘兵团。原在辽西地区牵制廖耀湘兵团的十纵、一纵三师、骑兵第一师，由新立屯东北地区后撤到黑山、大虎山地区构筑工事，隐蔽待命。敌不动，我亦不动。若敌西进，坚决迟滞敌军前进；若敌东退，则插到新立屯以东，切断敌军退路，争取时间，等大部队到来。五纵由彰武西南移至阜新东北，六纵主力进至彰武东北，拖住西进兵团的尾巴。四纵、十一纵和冀察热辽各独立师继续在塔山地区阻击侯镜如的东进兵团，保障主力的行动安全，并虚张声势佯装东野主力欲南下，诱使西进兵团向西前进。十二纵及5个独立师和骑兵第二师由长春地区进至铁岭、抚顺地区，钳制和包围沈阳的国军。独立2师配属1个重炮营以4天行程赶到营口，以切断国军海上的退路。命令指出：“此次大战全局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截断新立屯、彰武之敌的退路。”命令还明确：如廖耀湘第九兵团转向营口撤退，则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即在沟帮子迅速东进跟踪追击，在营口、牛庄一线歼灭撤退的国军。四野的攻锦主力旋即

转身调头分左右两路，迅猛扑向廖耀湘第九兵团。

廖耀湘的第九兵团下辖五个军，其中的新一军、新六军都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全部美械装备，是东北乃至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军最精锐、战斗力最强的野战兵团。东野各纵队先是急行军，后是强行军，不顾疲劳，不怕掉队，以日行70~80里、甚至上百里的速度向黑山疾进。10月21日，林彪给各纵发电：“我军决定全力乘敌撤退中与敌决一死战，以连续作战方法力求全部歼灭敌人。此战成功，则不仅能引起全国军事形势之大变，且必能引起全国政治形势的大变，促成蒋介石迅速崩溃。我全体指战员须振奋百倍勇气与吃苦精神，参加此一光荣的大决战，不怕伤亡，不怕疲劳，不怕遭受小的挫折，虽每个连队遭受最大的伤亡，对全国革命来说，仍然是值得的”。

辽西地区，地形复杂。河流纵横，流向多变，难以徒涉。黑山至沟帮子之间，有东北西南走向的山地丘陵，北宁与大郑两条铁路从中间穿过，两线交接处的黑山、大虎山北临高山，南接水网沼泽，是辽西走廊的门户，是西进兵团增援锦州或南撤营口的必经之地。10月21日，西进兵团在得到来自沈阳的重炮、装甲部队和青年军第二百零七师第三旅的加强后，廖耀湘采用逐次用兵的添油战术，开始向南攻击。10月23日，西进兵团的先头部队在黑山、大虎山以东与十纵交战。廖耀湘低估十纵这支新组建部队的战力。面对坚守黑山、大虎山地区的十纵和一纵三师，第九兵团当时拥有10倍的火力，3倍的兵力，但廖耀湘当日仅将部分兵力投入战斗，以向凤武的第七十一军2个师担任主攻，由北向南攻击黑山侧面；以青年军第二百零七师第三旅担任助攻，由东向西攻击黑山正面。遇到十纵和一纵三师的顽强阻击，攻击均告失利。

同日，林彪决心采取：“拦住先头，拖住后尾，攻其中间”的方针全歼廖耀湘兵团。24日，廖耀湘指挥第七十一军2个师、新一军1个师、新六军1个师和青年军二百零七师共计5个师，在200多门重炮和数十架飞机的支援下，向西起水泉子，东至高家屯，南到四台子，约25公里的弧形阵地展开猛攻，企图夺占黑山、大虎山两点之间9公里的通道。林彪电令十纵坚守3天；又电令五纵、六纵以强行军进至新立屯以东，切断西进兵团的退路。廖耀湘兵团以绝对优势，经连日苦战，伤亡1.5万余人，竟然未能越过黑山防线。

10月24日夜，廖耀湘获悉东野主力已经逼近两翼和国军第五十二军2



个师已于24日占领营口，后续部队控制了鞍山、辽阳，故放弃沿北宁线西进的计划，下令部队改由大虎山以东经台安渡辽河向营口撤退。25日，廖耀湘以新六军、第二百零七师第三旅和第七十一军继续进攻黑山作为掩护，以第四十九军、新三军第十四师、新六军骑兵部队为先头，经大虎山以东向营口迅速前进。

为打破廖耀湘兵团南下营口的企图，林彪命令：以七纵、八纵、九纵从右翼迂回至廖耀湘兵团的南侧，与左翼的五纵、六纵对廖耀湘兵团实施钳形夹击；以一纵、二纵、三纵、十纵从正面突击，采取边合围、边分割的手段，歼灭廖耀湘兵团。因得到国军第五十二军第二师已经到达新民的错误情报，林彪认为独立二师"已无去营口之必要"，令其回头北进参加围歼廖耀湘兵团。

25日拂晓，正向营口撤退的国民军第四十九军、新六军骑兵部队在行至台安县西北魏家窝棚、六间房等地时，遭到奉命由盘山北上的独立二师和从锦州赶来的八纵二十三师的突然截击。东野阻截部队大胆冲入国民党军队形中穿插分割，随独立二师行动的重炮营也投入交战。战至25日黄昏，歼灭第四十九军前卫团的大部。重炮的轰鸣声和激烈的交战使廖耀湘等将领误认为东野主力已经封堵了第九兵团前往营口的道路，廖耀湘遂决定停止南下，命令部队按卫立煌的命令转向沈阳方向撤退。其中，新一军、第七十一军沿北宁线以北退向新民；新三军、新六军、第四十九军沿北宁线以南退向沈阳。西进兵团在仓促之间由南下的纵向长队突然变成横向东退，陷入混乱状态。

为阻止西进兵团向东退回沈阳，林彪早有部署，20日即电令：五纵"秘密移至广裕泉西南，敌进则进，敌停我亦停。如发现敌有撤退征候，即迅速插至新立屯以北，将新六军退路截断；"六纵"应暂在彰武东北隐蔽，准备待命突然包围彰武之敌，但如发现该敌撤退时，则应机断包围彰武"。命令强调："十纵、五纵、六纵及第三师的动作切不可疏忽与犹豫，切不可让新立屯、彰武之敌逃走，否则会放过伟大胜利的机会，故该三纵队须时时准备大胆冒险坚决行动。"24日，林彪又电令："五纵各师应强行军赶到新立屯以东六合屯、康家屯一带"；"六纵各师应以强行军插到半拉门以西郭家窝棚、靠山屯、刘家窝棚一带，防敌向西南撤退。"25日，林彪电令六纵："途中遇小敌歼灭之，遇大敌则首先将敌退路切断。"六纵司令黄永胜统一指挥五纵、六纵迅速向指定地域急进。

10月25日夜，六纵第十六师、第十八师进至黑山、大虎山以东北宁线上的厉家窝棚、姚家窝棚一带时，恰巧插入西进兵团退向沈阳的前卫新三军第十四师的队伍中，十六师利用村庄与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展开激战，第十八师从厉家窝棚的左侧向国民党军展开猛攻。国民党军为打开逃生通道，不惜代价强行突击，六纵展开了一场不亚于黑山、塔山的阻击战，在一天内击退国军14次冲锋，使西进兵团陷入了绝境。26日晨，五纵赶到新民西南加入战斗，阻止了国军绕过新民突向沈阳的企图。26日上午，东野主力部队10个纵队陆续赶到战场并加入交战，十纵拦住头，六纵截住尾，东返主力从两翼往中间夹击，以乱制乱，猛打猛冲，将廖耀湘第九兵团包围在黑山、大虎山以东，绕阳河以西，无梁殿以南，魏家窝棚以北约12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其中，西进兵团的9个师被合围在黑山以东，厉家窝棚、半拉门以西沿铁路、公路两侧地区；另有3个师被合围在大虎山以东，义和庄、康家庄地区。26日，林彪命令东野主力全线出击，对西进兵团展开围歼。其中，以一纵、二纵、三纵、十纵、六纵十七师和炮纵主力，由黑山正面，自西向东攻击；以七纵、八纵、七纵由大虎山以南，自南向北攻击；以五纵、六纵主力，独立二师跨北宁线守住厉家窝棚、二道境子、绕阳河一线，阻止西进兵团东逃，并适时出击，由东向西攻击。

东野各纵队按照林彪打退却之敌“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战法，不怕疲劳，不怕伤亡，猛打猛冲，果敢插入西进兵团各部队之间，割裂其队形，打乱其部署。26日夜，七师第十九团、第二十团沿胡家窝棚以南突击，插入敌军纵深，乘夜暗一举将西进兵团指挥所和新一军、新六军和新三军的司令部击溃，廖耀湘和各军、师指挥官均无法继续控制和指挥所属部队，夹在溃散的乱兵之中东奔西跑，廖耀湘第九兵团的5个军全部陷入散乱之中。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新三军军长龙天武丢弃部队只身逃回沈阳。

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局势，东野前指果断命令部队采取边合围，边分割、边歼灭的战法，穿插敌后，猛冲猛打，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建制和指挥体系，东野各部队以团、营、连为单位，猛打、猛冲、猛追，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战至28日拂晓，战场寂静后，东野的许多纵队找不到师，师找不到团，团找不到营连。两军都乱了，但两军的结局不同。短短两天时间，国军最精锐的廖耀湘第九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兵10万人全部被歼灭。国军新1军、新6军这两支享誉中外的抗日铁军，国军“五大主力”中的主力，一战即告消亡。新1军军长潘裕昆在混战中化装侥幸

逃脱。

在东野主力围歼廖耀湘“西进兵团”时，锦西、葫芦岛的国民党军队从26日开始，向我塔山阵地再次发起冲击，塔山一线是肩负防御作战的阻援部队，第十一、第四纵队进行了顽强的抗击。成功狙击了“东进兵团”，避免了东野主力被两面夹击，为成功迅速的围歼廖耀湘创造了条件。在“西进兵团”被歼灭后，这一部分国民党军立即缩回锦西、葫芦岛固守。

东野历时52天，以伤亡69 000余人的代价，歼灭国军东北“剿总”司令部，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3个师又14个团，合计47万余人，国民党廖耀湘、郑洞国、范汉杰等一大批名将被俘、被击毙。国军将领们普遍感到大势已去，军心、民心不在。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大部丧失，国共两军的总兵力的对比发生逆转。

攻占沈阳、营口，解放东北全境

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全军覆灭后，沈阳的国民党守军深知败局已定，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对防守沈阳已不抱任何希望，遂于10月30日偕少数亲信和部分高级将领，从沈阳乘最后一架运输机仓皇逃离沈阳。卫立煌出逃后，由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在沈阳统一指挥第五十三军两个师，整编207师两个旅，新一军一个师及四个守备队，三个骑兵旅还有部分地方保安部队，总计14万人，妄图继续顽抗或伺机营口突围会合第五十二军从海上南撤青岛、天津。

在围歼廖耀湘之时，中央军委和东野东北局就已经开始研究部署进攻沈阳和营口的战斗。毛泽东在10月27日23时30分电告林罗刘：“当面敌人解决后，望以有力兵团（不少于三个纵队）星夜兼程东进，渡辽河，歼灭营口、牛庄、海城一带之敌，阻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①]“如果在目前数日内，沈阳一带敌军已经或正在向营口逃跑，则你们全军须迅速向营口、海城方向进击。”[②]28日零时30分又指示林罗刘立即抽调几个纵队渡河东进，合围歼灭沈阳敌军。与此同时，林彪也主动做了相同部署，并指令辽东军区立即在辽河上架起浮桥，“以便我大军迅速向鞍山，海城方向前进，继续歼灭沈阳南下之敌。”

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东北野战军命令铁岭附近之第十二纵队除以一部围歼铁岭地区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一百一十六师外，主力会同在长春国民党军队被歼灭后即以南下的东野各独立师（5个独立师、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二师）和辽西战场上的第一、第二纵，以及本溪地区独立第十四师等部，向沈阳急进；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和独立第二师、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一师，向鞍山、辽阳、海城、营口急进；同时辽宁军区部队也着手在辽河架桥，接应主力东渡。各部队迅即分头向沈阳、营口挺进。第三、第二纵队在台安以北、巨流河等地东渡辽河，于10月31日进抵沈阳西郊。会同已进至沈阳以南苏家屯的第十二纵队的进抵沈阳北郊、东郊的6个独立师，对



沈阳形成合围态势。与此同时，沈阳外围的铁岭、抚顺、本溪、苏家屯等地国民党守军均被解放军迅速歼灭。沈阳以西的国民党军3个骑兵旅也向解放军投诚。

11月1日，东北野战军进抵沈阳四周，各部向沈阳城区发起总攻击。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政治委员吴法宪指挥第一、第二纵队由沈阳以西、西北向市内突入；第十二纵队由城南向北攻击；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政治委员肖华指挥各独立师由沈阳以东和以北向市内突击。陷于绝境的沈阳守军，除整编第二百零七师和第五十三军的部分部队在城市边缘若干地段组织一些抵抗外，其余大部官兵已无心恋战，纷纷投诚。为减少对城市的破坏和维持城市秩序，东野同日发布通告《约法六章》，中国共产党派遣的敌工人员及民主人士大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与东野部队联系，交涉投诚、起义。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也于当日在城内大西门里世合公银号放下武器。攻城部队进展顺利，至17时，全部解决市区守军。在郊区据守的国民党第二百零七师残部仍做绝望顽抗。11月2日，攻城部队予以坚决攻击，当即将其歼灭。

至此，东北野战军解放了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歼灭与起义、投诚国民党军计有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及其所属1个兵团部、2个军部、7个师（旅）、3个骑兵旅及地方部队共13.4万余人。缴获大炮1 658门，装甲车114辆，坦克43辆，汽车841辆。陈云率军事管制委员会的4 000余干部随部队进入沈阳，进行接管。从11月3日起，军管会按军、政、市、财、经、公安、铁路、后勤各系统，自上而下，完整接收，市内秩序迅速恢复。沈阳接管的成功经验，对而后其他大城市的接管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在解放沈阳的同时，东北野战军第七、第八、第九纵队等，在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指挥下，也正日夜兼程急速前进追歼逃敌。东北“剿总”为打通海上退路，趁东北野战军全神贯注于辽西鏖战之际，曾令其第五十二军于10月24日占领营口。廖耀湘兵团走台安受阻企图回退沈阳时，卫立煌曾令第五十二军回返沈阳，但第五十二军顾虑北返途中被歼，并未执行。廖耀湘兵团被歼后，该军在营口急切催船，企图由海路逃走。为追歼该敌，10月28日，东北野战军第七、第八纵队和独立第二师在辽中以西渡辽河，31日相继解放了辽阳、鞍山、海城等地，截断了沈阳国民党军的退路，接着迅速向营口逼近。第九纵队则先期于26日由台安以南

地区取捷径向营口急进，10 月 31 日进抵营口外围，抢占了周围要点。11 月 1 日，第五十二军为掩护其在海上逃路，对第九纵队发起 7 次猛烈反击，均被击退。当日夜，第五十二军仓皇登船。11 月 2 日晨，第九纵队与独立第二师发现第五十二军有从海上逃走迹象，当即向敌人发起攻击。解放军一面集中火力轰击海上逃敌，一面趁敌混乱之际，迅速插入市区。战至上午 10 时，市区国民党军即被全歼。正在混乱中企图逃走的国民党军运输舰一艘、军用商船 22 只，均为解放军炮火摧毁，3 000 余人落水溺死。除刘玉章率第五十二军军部及所属第二十五师等几千人乘船从海路撤逃外，其余 14 000 余人全部被歼。

沈阳、营口解放后，杜聿明指挥葫芦岛和锦西的部队从海上撤退。其中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之二十一师、独立第九十五师海运秦皇岛，归还华北剿总建制，第三十九军、五十四军海运上海、南京，开赴蚌埠，投入徐州作战。11 月 9 日，解放军占领葫芦岛、锦西。12 日，又收复承德。至此，东北全境和热河均获解放。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蒋介石把丢失东北的责任全推在卫立煌身上。11 月 26 日，蒋介石下令对卫立煌撤职查办，原令说："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随后将卫立煌软禁于南京家中。1949 年李宗仁总统任期期间卫立煌获释，随即出走香港，后拒绝去台湾。1955 年 3 月卫立煌夫妇回北京，并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是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在东野发动辽沈战役期间，华北军区为配合东野作战，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第二、第三兵团发动了察绥战役。9 月上旬。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首先向平古路南段和北平以北山区挺进，吸引傅作义集团 3 个军、10 个师。第三兵团和北岳军区乘机向绥远进击。当傅作义组成 10 个师支援归绥时，第二兵团又于 9 月向平谷，平张线发动攻击。当傅作义支援兵团返回时，第三兵团 10 月再次向绥西绥北攻击。如此，华北军区成功的拖住了傅作义集团，使之无力增援东北，为东北野战军胜利全歼国民党军、解放全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注释：

①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37 页。

辽沈战役重大意义

全局分析辽沈战役，东北野站军取得胜利有其必然性。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是“关门打狗”，将东北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消灭在关外。要达到这一目标，东野的首攻方向指向何处，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从东北的局势看，长春孤立，且被东野长期围困，是国民党东北战场最薄弱的环节，攻打长春故可消灭敌军，又可占领大城市，但势必将沈阳、锦州的敌人逼回关内，几十万国民党精锐加入华北中原战局，对全国战局的发展将造成很大的影响。且蒋介石本就有打算以长春孤城牵制东野主力，争取时间或守或退，东野若先打长春则正合敌意。锦州守军兵力强于长春，且锦州可直接获得国民党海上和陆上的支援，攻打锦州我军将同时面临四个方面的战斗，锦西葫芦岛的援军，沈阳辽西的援军，还有顽抗的锦州守敌以及可能出现的长春守军突围。但是锦州位于北宁线上，是东北连接关内的咽喉，攻下锦州不但能够切断华北与东北的军事联系，而且能够完成封闭卫立煌在东北的“关门打狗”之局面，同时能诱使沈阳守军出城援锦，“围城打援”变攻城战为运动战。林彪开始不敢集中优势兵力攻锦州，主张攻打长春。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预见性的指示东野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主力迅速南下北宁线，首先攻占锦州咽喉。历史证明英明的战略是辽沈战役取得胜利的前提。

战役的胜利离不开领袖的战略决策，同样也离不开将士的英勇战斗。辽沈战役中我东野将士浴血奋战的镜头数不胜数。正是他们的顽强保证了战局按照预想的局面发展，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在总攻锦州之前，国民党“东进兵团”在飞机、军舰舰炮和数十门重炮支援下，3 个军 11 个师，轮番向塔山阵地发起正面强攻。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以 8 个师顶住敌军 11 个师的进攻，激战 6 昼夜，击退“东进兵团”数十次猛烈进攻，这一“与阵地共存亡”的生死之战，东野阻援部队伤亡 3 774 人，歼灭国民党军 6 549 余人，更重要的是为东野主力攻打锦州创造了条件，争取了时间。塔山无塔，四纵

就是塔；塔山无山，四纵就是山。黑山大虎山狙击战中赵家窝棚一战，国民党以密集的炮火向六十五团一营阵地打来，10 小时激战，敌军王牌师部队在我防御阵地上，投下炮弹数千发，连续6 次冲击。战斗结束了，阵地仍牢牢掌握在我军手里。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证明了英勇的战斗是辽沈战役取得胜利的基础。

辽沈战役的一个基本战术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围城打援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但是在不同时期不同方面，林彪能灵活把握，犀利指挥。开局东野以半数兵力围攻锦州，各以两到三个纵队分别狙击和牵制沈阳葫芦岛的援军，对长春之敌则以一部围困防止南逃。这一战术部署，使我军不仅能够短时间内攻克锦州，而且能够狙击和迟滞敌军南北来援的重兵；并且能够在锦州之战结束以后迅速组织连续作战，合围廖耀湘，乘胜解放沈阳，追歼营口逃敌。在集中优势兵力的同时，还善于分割和各个歼灭敌人，猛攻快插的打法，打乱敌人阵脚，既保证了全歼，又实现了速决。同时将大规模的阵地攻坚战和大规模的阵地防御战，以及大规模的运动战巧妙地结合。在锦州攻城的战斗中，做到了充分的准备，运用大规模的迫近作业逼近敌防御阵地，在周密侦查的基础上，实行多面、多梯队，有重点的攻击部署。战术的合理灵活运用是辽沈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从 1948 年 9 月 12 日至 11 月 2 日，52 天的时间里，东野参战兵力高达百万之多，战场辽阔，规模巨大，军需物资是一个真正的天文数字，伤员的救治转移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整个战役中，据不完全统计，共筹集到粮食 1.1 亿公斤，油料 8 000 桶（每桶 141 公斤），各种炮弹 20 万发，手榴弹 15 万枚，各种枪弹 1 000 万发，炸药 2.5 万公斤。共收治伤病员 6.1 万人，包括一部分国民党伤员。庞大的物资，筹集很重要，运送到前线更重要。一部分依靠汽车和火车，其中仅 1948 年 9 与 12 日到 10 月 20 日，38 天的战斗中，共开行列车 631 列，调用车厢 1.9 万个，运送物资 58.7 万吨。9 月 12 日到 21 日的 9 天中，由长春以南经由火车运送到北宁路锦州附近的战斗人员达到 10 万人，随军装备更为庞大。随后又有大批物资经由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吉林等地运到前线。国民党在空军的支援下大肆破坏我东野的运输线路，后勤保障面临危机。广大铁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发扬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日夜奋战，克服了器材不足、粮食缺乏等种种困难，抢修铁路，复活机车和车辆。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解放区的铁路线也逐步延长，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加快解放战争的胜利步伐，铁路员



工们提出："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然而军需物资的绝大部分，却是依靠人力运输。辽沈战役前夕，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和各省党政机关，对支前工作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和部署，及时发布了动员人民群众支援战争的指示。在土改中分得土地的广大农民，支前积极性高涨。在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中，有经过多次战斗考验的北满 、西满、南满根据地的民工队伍；有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中生产、支前"一肩挑"的辽北、冀察热辽地区的常备民工；有新收复区刚刚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有在以往支前中立过功、受过奖的英雄模范。他们抬着担架，赶着大车，带着乡亲们的嘱托，怀着"全力支援前线，一切为了决战胜利"的信念，投入了艰苦紧张的支前活动。整个战役中，据不完全统计，共动用民工 183 万人，担架 13.7 万副，大 车 12.9 万辆，抢修公路 2 185 公里，架设桥梁 383 座，运送粮食 5 500 万公斤，豆油 2 000 桶，食盐 100 万公斤，棉衣 100 万套，拆洗血衣、血被 10 万床。广大人民的支援，为战役的胜利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为保障决战胜利作出难以估量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极大的鼓舞了东野将士的斗志和信心。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是在东北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中取得的。后勤保障的到位，人民支前的无私，是辽沈战役取得胜利的保证。

充分的政治思想动员是战役胜利的重要因素。战前部队普遍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激发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求战杀敌的热情。在战役进行的每一个阶段，都适时的做出政治动员令。毛泽东在东北野战军的电报中也强调"大军作战，军令要加严"。军令森严，能够保证中央军委始终掌握着战争的指挥权，保证全局战略意图的顺利实现。东野各级军政领导都深入部队检查执行纪律的情况，严格了组织纪律性，保证了部队的步调一致。同时开展军事民主，集思广益。凡属重要决策和方针性问题，中央军委都首先要求东北野战军领导提出意见，反复磋商，然后再作出决定。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大量往来的电报就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略意图下进行民主协商的精神。各级指挥员也都注意采用军事民主的方式，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发动群众和总结经验教训。在队内做好整治动员、激发斗志、协调规划的同时，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也高度重视对敌开展政治攻势，以瓦解敌军。毛泽东说："我们的胜利，不但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东北野战军在对国民党军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不失时机的积极开展争取工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自写信做好郑洞国、曾泽生将

领的工作，使长春得以和平解放。在整个辽沈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者多达9万余人。

辽沈战役自9月12日至11月2日，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参战部队为：两个兵团部、12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纵队以及独立师、骑兵师等，约70余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和补训部队约30万人，战役投入总兵力约100万。国民党军先后投入5个兵团、16个军、51个师（旅），连同特种兵和保安部队，共约60万兵力。战役历时52天，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司令部、锦州指挥所、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6个师（旅）以及非正规军9个师（总队），共计歼敌47.2万人。其中毙伤5万8千6百人，俘虏32.43万人，起义、投诚9.9万人。战役缴获：各种火炮6 546门，轻重机枪16 293挺，长短枪支203 971支，飞机9架，坦克160辆，装甲车180辆，汽车2 261辆，战马23 595匹，大车1 062辆，电台353部，炮弹27 018枚，枪弹2 435万发。至战役结束，东北人民解放军共损失人员69 213人，其中阵亡10 401人，负伤53 329人，失踪1847人。

林彪指挥共产党军队在东北黑土地上与国民党军队较量3年，相继歼灭国军杜聿明、陈诚、卫立煌三员名将麾下108万兵力，解放东北全境，使得共产党手中有了一个资源雄厚的战略区和一支实力强大的战略预备队。11月3日，中共中央电贺东北野战军：“热烈庆贺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并从而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一百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土地和三千七百万同胞，……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全东北军民表示感谢和敬意。”①

这一胜利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巩固的战略后方和强大的战略预备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双方总兵力的对比，对于平津战役和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重大意义。辽沈战役及在此期间其他战役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国民党军总兵力下降至290万人左右，人民解放军则增至300余万人。使中共中央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②

辽沈战役战局震惊世界。路透社11月1日电：“国民党在满洲的军事挫



折，现在已使蒋介石政府比过去二十年存在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了崩溃的边缘。"《泰晤士报》评论说："占领东北，又将出现一个由北向南的征服形势……现在看来，中国如果要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情绪悲观地指出："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到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美国驻华使馆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称，东北的失利，是"国民党军最后一连串军事失败的开始"。美国政府认为："满洲的丧失对政府是一个大悲剧，因为满洲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这亦是原来吸引政府到那里去的原因，军队和资源的损失，尤其值得注意，没有军队和资源，在华北的安全的抵抗就成为不可能。"蒋介石后来也检讨说"我国军精锐主力调赴东北，陷入一隅，而不能调动自如，争取主动，最后东北沦陷，华北相继失守，而整个形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 455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361 页。

国共淮海战役战略决策部署

1948 年秋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

军事上：两年来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 264 万人。国民党的兵力已由战争初期的 430 万人下降到 365 万人。而其中除了刚征召入伍的新兵和地方保安部队，能用于第一线的作战部队只有 174 万人，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国民党基本上没有了战略后备力量。在北线，东北全境解放。华北傅作义集团 50 余万人，呈“一字长蛇阵”分布在张家口、北平、天津、唐山诸点，正面临东北、华北解放军的联合打击；山西阎锡山集团 10 余万人困守孤城太原。整个华北地区国民党军仅剩太原、保定、大同、承德、归绥、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等互不相连的孤立据点。南线，也已不能构成完整的防线，仅在徐州、汉口、西安 3 个地区尚存 3 个主力集团，其中徐州“剿总”刘峙集团虽有 70 万人，但随着济南、郑州的解放，原先济南、徐州、郑州三足鼎立的防御体系已土崩瓦解，正面临着华东、中原解放军的联合打击。华中桂系白崇禧集团 20 余万人，正准备退守长江但还没有形成完整防线。西安胡宗南集团 25 万人，被西北解放军牵制在西北地区，既不能东援华东，又不能南下华中。战局不利，军队的士气低落，厌战情绪高涨。

政治上：国民党内部反蒋倒蒋活动加剧，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在美国的支持下加紧了反蒋活动。社会舆论更是公开抨击蒋介石及其政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

经济上：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形势从 1948 年秋开始急剧恶化，迫使蒋介石于 8 月 19 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实行币制改革。但还不到三个月，11 月就宣布放弃限价政策，撤销金圆券最高发行限额，币制改革彻底失败。物价随即飞涨，社会动荡，罢工、罢市此起彼伏。

外交上：美国拒绝了蒋介石增加经济援助、派遣高级顾问团指挥作战的请求，甚至拒绝发表支持蒋介石的声明。将一直推行的扶蒋反共的政策改为

援助地方实力派。

综上所述，蒋介石的统治面临严峻危机，但蒋以为，只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其他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于是改分区防御的战略方针为重点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战略上视中原战场为其全部战局之枢纽，分别以徐州的刘峙集团，武汉的白崇禧集团，西安的胡宗南集团控制各个战略要点，互相呼应，以图稳定其中原地区的防御体系。

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在5年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总任务和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战争第三年作战计划，发动了强大的秋季攻势。四个月的战斗，先后取得了济南战役和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歼灭国民党军100万。到1948年11月，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首次在数量上获得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万人增加到280万人，而且军事、政治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解放区的面积已占全国总面积的1／4，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以上。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工业、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解放区更加扩大巩固，商业、交通运输等方面大大增强，进行战争的资源更加充分。济南战役以后，山东全境除青岛和南部边缘地带存在少数敌军据点以外全部解放，华东解放军获得了更大的行动自由，可以集中全部兵力南下作战，求歼以徐州为中心的敌人。华中，中原两大野战军也能够在更大规模上直接配合作战，具备了在南线与敌人进行大规模战略决战的条件。

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场位于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4省交界地区的黄淮平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它介于黄河、长江之间，北上济南直通平津；南下长江宁沪是南京的北大门。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纵横贯穿，有利于大兵团作战。掌握了徐州和淮河以北的平原也就控制了长江以北，大军可以渡江直取南京、上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中原野战军于10月上旬根据中央军委攻击郑徐线，配合华东野战军的指示，由刘伯承、李达指挥第二、六纵队，在豫西牵制黄维、张淦兵团；由邓小平、陈毅指挥第一、三、四、九纵队和华北第十四纵队，于10月18日发起郑州战役。10月24日，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放弃开封东撤，中原野战军随即兵不血刃解放了开封。至此平汉、陇海两大铁路均为解放军控制。毛泽东在1948年10月31日指出，原先制定的5年建军500万，打倒国民党政府的计划，因为战争的迅速发展，有望提前一年实现。

1948年8月，国民党统帅部决定将作战重点放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

地区，加强具有战略意义的主要城市守备部队和防御工事，并组成以精锐部队为骨干的机动兵团作为应援力量。南线以郑州、济南、徐州构成三足鼎立之势，以徐州为重点，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与解放军决战。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以加强徐州方面的指挥。

当解放军攻占济南，打乱了国民党军南线的防御体系后，国民党方面认为华野、中野将在陇海线以南、津浦路两侧发动大规模攻势，直取徐州，威胁南京。9 月 25 日，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济南失守后的作战。国防部作战厅提出两个方案：（一）从徐州出动两个兵团向鲁西出击，求歼华野一部；或从徐州抽调两个军转用于郑州，连同在郑州的第十六兵团，配合华中“剿总”部队与中野决战。（二）徐州主力监视华野，以一部肃清徐州以南、运河地区的解放军。蒋介石主张先集中兵力攻击中野。杜聿明认为解放军经过济南战役的消耗，必须休整一段日子后才能再战，而徐州国民党军 4 个兵团，20 个军，兵力、装备都占优势，而且在济南战役时没有损失，无需休整就可投入作战。所以主张先发制人，变被动为主动，制定了《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计划乘华野、中野分离之际，以华中国民党军牵制中野，以徐州主力采取奇袭战术攻击华野，收复泰安、济南，并决定于 10 月 15 日开始行动。但就在即将发起进攻的 10 月 15 日凌晨，杜聿明被蒋介石紧急召往东北，此计划搁置。

10 月下旬，中野占领郑州、开封以后，国民党统帅部判断华野下一步将南下苏北，中野则将东进，然后联合攻击徐州。但统帅部与徐州“剿总”在关于徐州主力撤守问题上争执不断，直到 10 月底才确定“守江必先守淮”的方针，并根据这一方针制定出《徐蚌会战计划》。徐州主力放弃陇海线上各次要城市，仅以一至两个军守徐州，集中主力在徐蚌线两侧实施攻势防御，与解放军决战。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部第三、第十二兵团向南阳以东桐柏山区发动攻势，钳制中原野战军于平汉路以西；将郑州第十六军团（辖 3 个军，司令孙元良，亦称孙兵团）东调，该归徐州剿总序列，由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指挥第二兵团（辖 4 个军，司令邱清泉，亦称邱兵团）、第七兵团（辖 4 个军，司令黄百韬，亦称黄兵团，后又增加一个由海州东撤的一个军）、第十三兵团（辖 2 个军，司令李弥，亦称李兵团）以及第一、第三、第四、第九等四个绥靖区的部队总共 25 个军约 50 余万人，加强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津浦两路十字架防御。当发现华东野战军有南出苏北，中原野战军有北出郑州的企图以后，蒋介石又命令刘峙向徐州收缩兵



力，同时加强蚌埠、淮阴等城市的防御工事，企图以“攻势防御”的姿态“巩固徐州而确保之”。蒋介石本准备以白崇禧统一指挥徐州、郑州两个剿总所属部队，但为白崇禧所拒绝。

11 月初，蒋介石为避免刘峙集团重蹈东北卫立煌集团全军覆没的命运，又决定以白崇禧所部 2 个兵团，3 个绥靖区部队约 20 万人控制平汉路南段，扼武汉、信阳、宜昌、襄樊等长江中上游地段，将白崇禧部第十二兵团（辖 4 个军，司令黄维，亦称黄兵团）向确山集结，准备经新蔡，阜阳津浦路徐蚌段加强十字架的防守总兵力。同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飞赴徐州，在 11 月 5 日召开徐州剿总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徐州剿总所属各机动兵团进一步向徐州蚌埠间收缩集结，实行备战退守，即：一面集结兵力准备迎战，一面向蚌埠撤运物资，以备必要时将主力撤守淮河，巩固江防，拱卫南京、上海。

11 月 6 日，蒋介石下达调整部署命令：孙元良第十六兵团（三个军）由商丘转移到蒙城，保障徐蚌线西侧安全；邱清泉第二兵团（四个军）在砀山、永城集结；刘汝明第四绥靖区（两个军）由商丘转移到临淮关；李弥第十三兵团（两个军）由碾庄撤向灵璧，担任机动任务；黄百韬第七兵团（四个军）由新安镇撤到运河以西；冯治安第三绥靖区（两个军）放弃临城、枣庄，退守韩庄、台儿庄；李延年第九绥靖区撤销，所属第四十四军原计划从海上撤退因无船只改由黄百韬指挥沿陇海路西撤；周喦第一绥靖区（四个军）守淮阴、扬州；徐州剿总直接指挥的 4 个军守徐州、睢宁、五河、蚌埠；原属华中剿总的黄维第十二兵团开往阜阳、太和，加入徐州作战。空军驻徐州、南京的 126 架战斗机、轰炸机和 32 架运输机，全部投入徐蚌会战。蒋介石还担心兵力不足，决定将东北战场剩下的 3 个军 11 个师全部用于徐州，但在傅作义的强烈反对下，只得将这 11 个师一分为二，5 个师归还华北剿总；6 个师海运浦口，于 11 月到达蚌埠。就这样蒋介石共集结了 7 个兵团、2 个绥靖区、34 个军、82 个师共 80 万人，在淮海地区形成了一个头在徐州，尾在确山的弯弯曲曲，尾巴很长的“长蛇阵”部署。

徐州“剿总”刘峙集团部署以徐州为中心的“一点两线”防御计划，防御加强的同时，兵力集中了，也更为孤立和突出了。对于人民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给予打击和歼灭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心抓住已经出现的有利时机，扩大同国民党军的决战规模，在南线发起淮海战役，消灭徐州的刘峙集团，以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

华东野战军在攻打济南时，曾部署强大的打援兵力于徐州、济宁之间，准备阻击并歼灭徐州援济南的国民党军队，而中原野战军在平汉路，桐柏山区作战，钳制武汉白崇禧集团。济南迅速解放，徐州刘峙主力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路东段和津浦路徐蚌段，未敢北援济南。此时，华野领导就曾考虑过济南解放以后部队的下一步动向。一是回师中原，二是出兵苏北。华野代司令员粟裕认为：回师中原将同时面临刘峙集团和白崇禧集团的主力决战，出兵苏北，可以取得苏北苏中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吸引国民党徐州集团机动兵力，能够改善中原战局，能够和中原野战军一东一西孤立津浦路，同时迫使国民党退守长江，以减少其机动兵力。粟裕、谭震林、陈士渠等在8月23日联名向中央军委建议："两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路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淮阴、淮安）及高邮、宝应，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开展。"

在济南战役结束之时，根据全国的战场形势和中央军委在1948年冬春夺取徐州的战略意图，华东野战军及时召开前委会议，展开讨论，决定进一步依靠老解放区，打几个大仗，乘胜扩大战果，并初步确定了由鲁南南下，出苏北、战淮海，然后攻略徐州的作战方针。粟裕于9月24日晨，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提出为了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并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如果"全军即进入休整，如此对部队有好处，但易失去适宜作战——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于敌人之精神压力"。认为华野在济南战役中攻城集团有一定伤亡，打援集团则因徐州之敌未来而毫无损失，国民党方面在陇海路沿线兵力单薄，并进一步提出了3个设想的实施建议（一）先以苏北兵团攻击两淮，主力准备迎击徐州援敌；再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而后全军转入休整。（二）只以一部进行海州作战，主力以备战姿态休整。（三）全军向南，寻歼徐州援济之敌。其中第一个建议得到了刘伯承、陈毅、李先念的首肯，同意在攻克济南后，乘胜进行淮海战役，并且一致认为第一战役攻两淮并吸引打援敌为最好，如能配合一部分国民党杂牌部队起义或投诚则收效更大。同时还表示，中原野战军采取分散歼敌的方针，争取在江汉地区歼敌一部，以吸引西边的国民党军，配合华野在东边的作战。

军委接到建议后，对淮海战役的作战方向表示赞成，但对战役目标仍感到不能满足。9月25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华野关于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同日，中原野战军表示赞同粟裕的建议，电告中央军委并告粟裕："济南攻



克以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并表示：“攻两淮并吸引打援敌为最好”。[①]毛泽东起草的军委对粟裕建议的复电，肯定了粟裕在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休整的计划，也考虑到部队战斗力并未充分发挥的事实，因此，除粟裕提出的两淮、海连战役目标之外，增加了一个超越粟裕设想目标之外的严重任务，即“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②]而且要求粟裕于10月10日左右开始行动。

黄兵团即黄百韬所率第七兵团，下辖三个军，是国民党军徐州“剿总”所属的四个兵团之一。徐州是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的屏障，攻击黄兵团，必然要遭到徐州各兵团的反击，非常可能发展为南线的战略决战。粟裕自己提出的是一个一般性的、为以后的大战作准备的战斗任务，而毛泽东给他的确是一个战略性的任务，毛泽东把粟裕的攻城略地的战斗改变成歼灭敌有生力量的战斗。两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随后毛泽东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9月28日对华野的指示中指出：“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③]华野如不进行休整，进行充分的准备，显然是很难完成的。为此，毛泽东指示前线将领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并机动地推迟了出动的时间，指示华东部队休整20天左右。

中共华野前线委员会于10月5日起在曲阜举行了为期20天的扩大会议，在会上对中央军委提出的严重任务，进行了多次反复的研究。直至9日晚各纵队主要干部会议后，才放弃了在华野原淮海战役方案基础上提出的两个方案，下决心采纳第三方案，即中央军委提出的方案，首先分割包围歼灭黄百韬兵团，并于12日上报中共中央军委。

10月11日，毛泽东向华东野战军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明确规定：“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为达到这一目的，应以两个纵队担任歼灭敌一个师的办法，共六个至七个纵队，分割歼灭敌二十五师、六十三师、六十四师……第二阶段，以大约五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④]针对刘峙集团主力集结于徐州地区，随时可能增援的情况，毛泽东在《方针》中着重指出：“为达成第一阶段的任务，应以一半以上兵力担任牵制、阻击和歼援敌一部，使丘清泉、李弥两兵团不敢全力东援。”[⑤]同时做出指示：“你们以十一、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一月休整。三至七月同刘邓协

力作战”。[6]

14 日，毛泽东又致电华野指出：担任打援的部队，应放在援敌侧面，即徐州的北面、西北面、南面，造成围攻徐州的态势，使徐州之敌“第一个感觉是我军似乎有意夺取徐州，而不能确切断定我军并非夺取徐州，而是歼灭黄兵团。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解除南北两侧威胁，则很难赴援，这样就给我军以必要的时间歼灭黄兵团。”[7]同时又预计战役的规模将大于华野以往的任何战役，为保证胜利，毛泽东还决定中原野战军主力在淮海战役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除投入华野全部兵力外，还要求中野在战略、战术上进行密切配合。因此他命令中野立即举行郑州战役以牵制孙元良兵团。并要求中野在郑州战役后，全军东进，直出徐蚌线，切断刘峙集团的退路。“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同日，华野司令部召开第二次作战会议，研究确定了具体作战部署，决定于 11 月 5 日开始攻击，并于 15 日上报军委，17 日即得到军委的批准。至此，解放军完成了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主要目标的淮海战役的决策。

10 月 22 日，中原野战军主力在陈毅、邓小平的指挥下，歼敌万余，占领郑州，24 日再克开封，并乘胜东进。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开始考虑集中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于一个战场的作战思路。毛泽东于当日致电陈邓：“三纵、广纵及鲁西南两个旅应于三十日以前进至商砀线以北地区，距敌大约一百华里左右，摆成一字形阵线”，“目前极好的形势是白部黄张两兵团被我二、六、十纵吸引到桐柏山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回头进到黄泛区威胁东北面我军之行动，有利于我陈邓在攻郑胜利后，以一部或大部或全部向东行动，协同三广两纵，不但牵制孙刘全部，而且可能牵制邱李一部。”[8]“我们预计是以一部留在郑州淮阳之线，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县，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9]

11 月 2 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粟裕判断徐州之敌有退守淮河的可能，为此致电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抑留徐州的刘峙集团，将其全歼于长江以北的建议。次日陈毅、邓小平也根据当面国民党军的调动判断徐州之敌可能南撤，要求华野在敌撤退时组织追击。毛泽东在接到前线有关徐州之敌可能撤退的电报后，依据辽沈战役胜利后出现的全国军事形势的巨大变化，不失时机地决定在原淮海战役计划的基础上扩大战役规模，作出同国民党的这个最大最



强的战略集团就地进行决战的决策。“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华野三、广两纵的任务，是对付邱清泉，但应位于萧县地区从南面向黄口徐州线攻击，以便与宿县我军联结，如敌向南总退却时，则集中六个纵队歼灭之”，[10]“粟陈张应令谭王集中七、十、十三纵及由南向北之十一纵，以全力向李弥兵团攻击，用迅速手段歼灭该兵团的全部或大部，控制并截断徐州至运河车站之间的铁路，运东主力则歼灭黄兵团。”[11]“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12]

当时徐州地区国民党军兵力多、装备好，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将其形象比喻为“一锅夹生饭”。就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来消灭黄百韬兵团，攻击两淮、海州、连云港的“小淮海”发展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黄海，西至豫皖边，北自陇海路，南到淮河的广大区域同国民党最大最强的徐州刘峙集团决战的“大淮海”，这一变化过程是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前线指挥，审时度势，根据“进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所作出的。

淮海战役正式打响以后，中央军委根据全国战局的发展和淮海战场的国民党军仓皇向徐州收缩的情况，于 11 月 7 日，致电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领导人，提出了扩大淮海战役规模的初步构想。指出：“第一仗估计需要十天左右时间，力争歼灭黄百韬十个师（包括四十四军），李弥一个至两个师，冯治安四个师（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刘汝明六个师（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以上共计二十一个至二十二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即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进，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13]当日，鲁中南纵队歼灭郯城王洪九部队后，黄百韬立即放弃新安镇开始向运河以西撤退，华东野战军展开猛烈追击。

预见到淮海战役已经能够成为国共双方在南线的一次大决战。为了更好的协调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为了各项支前保障工作的密切配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充实和加强淮海战役前线司令部的领导。11 月 16 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陈邓，粟陈张及中原局，华东局等，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

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14]总前委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淮海战役前线工作，一般问题不需要请示，一切军机大事由常委决断，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作战。

注释：

①《淮海战役》第 41 页。

②③④⑤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9 页，第 26 页，第 66 ~ 67 页，第 66 页，第 67 页。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 391 页，第 413 页，第 414 页，第 471 页，第 471 页，第 472 页，第 461 页，第 491 页。



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
中野攻取宿县

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局，中原野战军和中原局，都进行了紧张的准备。中央军委要求华东、中原、华北三地区，全力做好后勤准备和政治工作，认真完成战役各项准备。

第一，在军事部署上，按照中央军委确定的作战方针和中原野战军领导的意见。从10月9日起，先后3次召开作战会议，统一指导思想，研究首战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部署。10月28日向中央军委呈报了作战计划获得批准。并得到指示：各处一起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在军事行动上，首先是清扫外围，做牵制敌人兵力的部署，孤立徐州地区的敌人。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六纵队、陕南十二旅、汉江军区、桐柏军区主力继续牵制白崇禧第三兵团和第十二兵团，第一、第三、第四、第九纵队在华北野战军第十四纵队的配合下解放郑州开封。此举既军事上打乱敌人的战略布局，又取得了对敌机动兵团作战的经验。华中、江淮、冀鲁豫、豫皖苏军区之地方武装，在战役发起前，即开始击破陇海、津浦铁路，截断国民党军队的后方补给线，迟阻敌之增援部队，配合主力作战。

第二，在思想政治上，华东方面10月上旬在山东曲阜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集中进行整军整党。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无纪律无组织无政府状态的决议》、《关于建立与健全报告制度的决议》、《关于贯彻加强纪律性的指示》3个文件，使全军的政治思想、领导作风、政策纪律等方面大有进步。为使全军做好打大歼灭战的思想准备，野战军政治部发出《关于目前部队政治工作重点指示》、《目前部队思想指导》，要求各部队加紧进行临战动员。11月9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发出《关于全歼黄百韬兵团的政治动员令》，指出：此战为我主力在江北大量歼灭敌人有利时机，各部应克服疲劳，克服困难，不为小敌迷惑，不为河流所阻，坚决的实行敌人

跑到哪里，我们追到哪里，直到将其歼灭为止。号召广大指战员发扬“三猛”精神，不让敌人喘息，已达到全歼敌人之目的。动员令号召“大规模的歼灭战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坚信在毛主席正确领导下，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活捉黄百韬，全歼黄兵团，并继续向徐蚌进军”。中原方面，于10月上旬在宝丰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整军整党加强了组织纪律教育。9月颁布政治动员令和指挥工作命令，要求树立大规模歼灭战的思想。“配合友邻兵团，歼灭大量敌人，全部解放中原”的号召。并动员各级党委迅速开展以反对无政府状态和反对地方主义、游击主义为中心的教育，以进一步增强部队组织性、纪律性。

第三，在部队组织上，华东方面先将济南战役中数万解放战士经教育后补入部队，再吸收大批翻身农民参军，充实了部队，还调配了战斗骨干，开办干部短期轮训。10月中旬召开“全军代表攻坚战术技术研究会”有356名代表出席，会上介绍了典型战例，演练了城市攻坚、村落作战、步炮协同等战术。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中原方面的战前练兵是根据“以战养战”的方针，在发动郑州开封战役同时边打边进行的，并在取得胜利以后，大量收集战场缴获的物资，补充部队。组织任人力修复铁路、公路，收集汽车和机车，以加强运输力量，为参加淮海战役奠定了基础。华东和中原军区还抽调地方武装10余个团，随时准备在战役过程中根据需要，升级补充野战军。

第四，在后勤保障上，华东方面颁布了《淮海战役支前工作计划》，协调了支前方案，成立了华东支前委员会。中原方面的后勤支前，主要由中共豫皖苏分局全权统筹，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并在豫西、豫皖苏组建了支前司令部。中原局和华东局都在群众中广泛进行了支援淮海战役的发动工作。中原局提出：“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华东局提出了“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口号。另外还抓紧城市的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管理，使工业生产为前线服务。农村开展耕战互助。这一切都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充分的准备。

在进行上述准备的同时，还加紧了对冯治安、孙良诚、刘汝明等部队的策反工作。

淮海战役的第一仗，是集中兵力消灭黄百韬兵团，砍断徐州集团的右臂，为下一步彻底消灭徐州之敌创造条件。歼灭黄兵团不仅有利于人民解放军进行南北夹击，切断国民党军海上补给线，而且有利于人民解放军南下进



行下一步作战。首歼突击对象确立后，为确保其顺利实施，中央军委根据华野的处境同时指示中野，“蒋匪重兵守徐州，其补给线只一津浦路，怕我截断”，“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截断徐宿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1]中央军委向中野作出的这一作战指示，目的是为了使中野能够有效地配合华野对黄百韬兵团的作战。根据中央军委的作战精神，战役第一阶段，人民解放军不仅把国民党军在海上补给线和陆上的补给线同时掐断，而且中野与华野声东击西的配合使敌人一时无法判断人民解放军队的主攻方向，无法聚集有力兵力进行打击，使首歼黄百韬兵团的计划能够得以实现。

11 月 5 日，徐州剿总发现华野主力有南下迹象，即开始实施徐蚌会战计划，下令各部于次日向徐州和津浦路两侧收缩，准备与解放军决战。只有黄百韬第七兵团因等待从海州西撤的第四十四军，其撤退时间推迟到 11 月 7 日开始。

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主力，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于 1948 年 11 月初开始调整战略部署。5 日华野主力进抵临沂、藤县一带。6 日开始全线出击，淮海战役拉开序幕。根据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的指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制定了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第十一纵队及江淮军区两个旅由宿迁向北疾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以华野第一、第六、第九、鲁中南纵队、苏北兵团第二、第十二纵队以及中野第十一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向新安镇、阿湖地区实施主要突击，围歼黄百韬兵团；以华野第四、第八、第十一纵队和江淮军区 2 个旅围歼邳县、官湖、炮车、运河车站地区的李弥第十三兵团一部，控制运河以东阵地，阻击李弥兵团东援；以华野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指挥，自临枣以北地区直出临城、台儿庄、贾汪，歼灭冯治安第三绥靖区部队，而后强渡运河，自徐州以东、以北进逼徐州，切断陇海路，阻击徐州之敌东援；以第三纵队、两广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协同中野主力作战，钳制邱清泉第二兵团，尔后从西面、南面进逼徐州。这样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密切协同，从东北西南四个方向，完成了对徐州的包围。这种攻击姿态，是以宽正面出击，造成了围攻徐州之势，使国民党军在华野中野军挺进徐州，对黄百韬完成合围之前，不能判断出其真实意图。极大的迷惑了蒋介石及其前线将领。到战役的第四天，蒋介石国防部作战厅，面临徐州四处受敌的状况，既想集中兵力防守徐州，又怕黄百韬兵团被围，摸不清解放军的主攻方向，举棋不

定。战役第六天华东野战军已经包围了黄百韬兵团，此时蒋介石才想到要增援，可是徐州南北两翼和西部已经被我野东战军牵制和分割成好几块，徐蚌线也被切断，无法抽调兵力增援了。

黄百韬第七兵团是蒋介石固守徐州的主力部队。此次会战被安排在徐海线上妄图阻止华野南下，分割山东和苏北两大解放区。11 月 7 日，黄百韬第七兵团五个军十一个师共约十二万人开始向西撤退。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发现敌人全线向徐州撤退的信息以后，立即向中央汇报。中央军委要求一定要把敌人消灭在长江以北，不能让其逃掉。为了抓住敌人，中央军委强调："我军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②]根据中央军委的要求，华东野战军立即将各纵队进行了调整，开展猛烈的追击和截击。黄百韬兵团在华野进逼新安镇以后，丢弃铁路据点，向运西岸逃窜。11 月 9 日，到达运河。由于事先没有在运河上架起浮桥，主力第二十五、四十四、六十四、一百军经运河大桥撤退，第六十三军则经窑湾渡运河西撤，担任兵团侧翼掩护。数万部队和由海州撤退的数万军民都要从运河上唯一的大桥通过，人员、车辆、马匹连绵百余里，秩序大乱，严重拖慢了过河速度。

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歼灭黄百韬兵团，仍采用攻济打援部署的原则，即至少以六至七个纵队分割歼灭黄百韬兵团，而以更多的兵力部署于打援和阻援方面"。粟裕在查明了黄百韬兵团的西撤行动，又获悉何、张即将起义后，立即下令各部分头追击，切断敌向徐州退路，对黄百韬兵团展开多路迂回包抄和尾击侧击。华野担任突击任务的第一、四、六、八、九纵队分路南下，向运河东岸挺进；第七、十、十三纵队穿过第三绥靖区起义部队防区，直取曹八集、大许家；第二、十二纵队南越陇海路，向徐州东南攻击前进，迂回堵截西撤之敌；第十一纵队及江淮军区两个旅，经皂河向大许家前进，与突击集团协同堵截西撤之敌。这样就形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南北对进，阻敌与截击。

华野山东兵团迅速南下。十纵消灭韩庄之敌，七纵攻打万年闸大桥，直逼第三绥靖区。8 日，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中共秘密党员，何基沣、张克侠按预先计划率第三绥靖区两个军三个半师共 2.3 万人在台儿庄、贾汪起义，通电接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防区立即移交给华东野战军。何、张的起义，使得国民党军的运河防线出现了大缺口，为华东野战军的三个纵队迅速渡过运河，切断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粟裕回忆说："当时只要我们在贾汪多待四小时，战机就失去



了。”毛泽东称赞何、张起义是淮海战役第一个大胜利。

11月9日，毛泽东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指示华野、中野：“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③并要求中野：“你们勿须不顾一切，集中4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路。……至要至盼。”华野也于当天发布《关于全歼黄百韬兵团的政治动员令》，号召全军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寒，不怕伤亡，不怕打乱建制，不为小股之敌迷惑，不为河流所阻，坚决追击，奋勇作战。特别要求各级指挥员在总作战意图下，机断专行，灵活指挥，不失战机组织作战。与此同时，苏北兵团向西南迂回，以强行军的速度从黄百韬南侧向前赶超。在宿迁皂河一带汇通十一纵队向东南急进，13日消灭向徐州逃窜的一百零七军。最终插入陇海路，和山东兵团一起把黄百韬兵团逃向徐州的路卡死。

华野主力的多路推进，何、张的起义，南京震惊。11月10日，蒋介石获悉黄百韬兵团在撤退途中遭追击，对刘峙先巩固徐州，再策应黄百韬兵团的作战方案做出调整，决定黄百韬兵团就地固守待援，集中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迅速东进与黄百韬兵团夹击运河附近解放军。同时催促黄维兵团兼程急进，务必于13日前到达阜阳、太和地区，参加徐州作战。蒋介石要求“一定要解黄百韬的围”，同时派杜聿明亲去徐州，又派顾祝同徐州督战。黄百韬部队随转入防御，修筑工事准备坚守。兵团部在碾庄，以此为中心，二十五军在北，六十四军在东，四十四军在南，一百军在西，形成环形防御体系。此前一天，原在距碾庄以西二十里曹八集的李弥之第十三兵团，奉徐州“剿总”司令刘峙的命令，不等黄百韬兵团到来就匆忙撤往徐州，导致黄百韬失去了侧后的掩护。

10日下午，华野第十三纵队歼灭黄百韬一百军四十四师，占领曹八集，完全切断了碾庄与徐州之间的联系，将黄百韬兵团与徐州主力分割开。这一天，北路的第七、十、十三纵队与南路的第十一纵队和江淮军区两个旅在东大庙、侯集会合，完全切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第二、十二纵队和中野十一纵在宿迁渡过运河，从东南逼近徐州。11日，黄百韬兵团主力四个军部7个师被合围于碾庄为中心的数十个村落里，南北约三公里、东西约六公里的狭窄区域里。由新安镇绕道西撤的一个军2个师则被追歼于窑湾地区。

黄百韬兵团被围，蒋介石严令其利用原李弥兵团构筑的工事固守待援，同时命令刚由涡阳地区到达宿县的孙元良兵团北移徐州，加强徐州防御；将

由海州撤到蚌埠的第九绥靖区司令部改为第六兵团司令部，原绥靖区司令李延年改任兵团司令指挥由葫芦岛撤到蚌埠的第五十四军第三十九军向宿县挺进，加强津浦路的防御；限令正由确山东进的黄维兵团15日前进到阜阳，而后向蒙城宿县挺进。同时派出杜聿明重任徐州“剿总”副司令员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实际指挥徐州集团各部，进行徐蚌会战。

杜聿明到徐州后立即提出两个方案：（一）以黄百韬坚持7到10天，在这期间，以李弥兵团守徐州，以邱清泉、孙元良兵团会合东进的黄维兵团，计9个半军先攻击徐州西南的中野主力，再回师向东，解黄百韬之围。（二）以孙元良兵团守徐州，集中邱清泉、李弥兵团全力向东解黄百韬之围。刘峙认为第一方案太冒险，所以决定实施第二方案。以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及“剿总”直属第七十二军守徐州，邱清泉、李弥兵团共5个军16万人附坦克40辆从团山展开，向碾庄攻击前进，以第七十四军和独立骑兵旅位于9里山为总预备队。各部于11日集结完毕，12日开始行动。上午邱清泉兵团展开3个师于陇海路以南，李弥兵团展开2个师于陇海路以北，共5个师在14辆坦克、20余架飞机掩护下，向碾庄猛攻。

此时徐东8个纵队，不仅要截断黄百韬兵团西逃，而且要阻击徐州国民党东援。华野为保障主力消灭黄百韬兵团，以第十纵队司令宋时轮、政委刘培善统一指挥第七、十、十一纵队在徐州以东大许家地区沿陇海路两侧组织防御，抗击邱、李兵团；另以苏北兵团司令韦国清、副政委吉洛统一指挥第二、十二和中野第十一纵队，在徐州东南攻击邱、李的侧后，协助宋、刘的正面防御。11月13日，邱、李兵团投入了六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华野采取正面顽强抗击，侧翼积极出击的战术，与邱、李援军逐村逐地争夺，双方伤亡都很惨重，邱清泉电告黄百韬：“连日猛攻，匪顽抗异常，每山每村均死守不退。”要求黄百韬向西出击，在曹八集会师。同一天，由韦国清、吉洛指挥的第二、十二、中野十一纵，从东南面逼近徐州，在大王集包围了孙良诚的第一百零七军，一举消灭第二百六十一师，迫使孙良诚率军部和第二百六十师投诚。

黄百韬被围的碾庄圩位于陇海路以北，运河以西，拥有10多个自然村落，房屋建在高两三米的地基上，村庄四周还有两三米高的土围墙和外壕，村落、台子之间则是布满水塘、洼地的开阔地，地形易守难攻。这里原是李弥兵团防区，筑有工事，黄百韬兵团到达后，迅速改进、加强了原有工事，每个自然村落都成为具有独立防御能力的坚固支撑点，交通壕纵横交错，兵



力、火力相互支援的集团式环形防御阵地。华东野战军在完成了对黄的包围以后，以第四、六、八、九、十三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的大炮、坦克组成突击集团，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渠统一指挥，担负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任务。而以第七、十、十一纵队为正面阻援集团，第二、十二、鲁中南纵和中野十一纵为迂回打援集团，从这一部署来看，打援兵力大于攻坚，一方面是敌增援部队战斗力较强，阻击地形平坦也不利于打援，需要布置较多兵力；另一方面碾庄地区狭小，难以展开更多部队。粟裕于当晚召集攻击部队的纵队司令会议，研究战况。针对黄百韬兵团中第二十五军、六十四军战斗力较强，第四十四军、一百军较弱，决定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为减少伤亡，实行土工作业迫近敌军阵地，插入各村之间，再逐一消灭。并将特种兵纵队和各纵的重炮共八十门，集中编为三个炮兵群，分别支援三个方向的攻击。攻击集团由山东兵团副政委谭震林，副司令王建安统一指挥。

根据徐东战场的形势发展，中央军委于13日、14日连续四次电示粟裕，要求留下黄百韬兵团残部作诱饵，宋、刘阻击部队稍向后撤，引诱邱、李兵团深入，再以韦、吉的迂回部队切断邱、李退路，而后消灭邱、李两兵团。为实现这一作战意图，粟裕于当日黄昏命令攻击黄百韬兵团的主力暂停攻击；宋、刘阻击部队向后稍撤；韦、吉所部也暂停攻击，进一步诱使邱、李兵团向东，以便断其退路。

毛泽东鉴于淮海战局的迅速发展，战役规模已经扩大，于11月16日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④

11月15日，根据中央军委诱歼邱、李兵团的部署，攻击黄百韬的部队暂停攻击，乘机抓紧这一时间，整顿部队调整部署，组织火力，并加紧近迫作业，准备新的攻击。此时，黄维第十二兵团已进至蒙城地区，刘汝明兵团进至固镇以北。据此，中央军委、淮海总前委慎重研究，决定放弃诱歼邱、李兵团的计划，部署对黄百韬兵团的最后总攻。16日晚各主攻部队集中火力兵力，以碾庄以西、以南各村落据点为目标发动猛攻，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顽强奋战，逐村逐屋展开争夺战。18日，全歼国民党第一百军、第四十四军。第一百五十师师长率残部2 000余人投诚。11月19日晚开始对黄百韬兵团部发起总攻，至22日，全歼残敌，生俘第六十四军军长。黄百韬

兵团的5个军10个师约10万人马全军覆没，黄百韬走投无路，举枪自杀。黄百韬临死时对25军副军长杨延宴说："我有三不解：一、为什么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待44军两天。二、我在新安镇等两天之久，为什么不知道在运河上架设军桥。三李弥兵团既然以后要向东进攻来援救我，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西撤。"⑤

自11月12日至11月22日，邱、李两兵团先后投入5个军12个师16万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下，连续猛攻11天，伤亡万余人，损失坦克34辆，消耗炮弹12万余发，前进仅20公里，日平均不到2公里。11月22日，邱兵团经激战占领大许家，距碾庄仅十公里。但碾庄方向枪炮声渐渐稀疏，黄百韬兵团已被全歼。由宋时轮、刘培善指挥的华野第七、十、十一纵队在徐东地区进行的阻击战，是整个淮海战役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场阵地防御战，对于华野主力消灭黄百韬兵团，起到了重要的保证。

就在华东野战军做第一阶段作战部署的时候，中原野战军也从战局出发作了相应的部署：由陈毅、邓小平指挥的中野第一、三、四、九纵队和华野第三、两广纵队及华北军区冀鲁豫军区的两个独立旅，从西、北两面攻击商丘之敌，然后兵分两路，中野四个纵队向徐蚌线出击，切断津浦路；华野两个纵队和华北两个独立旅攻击黄口、徐州，吸引敌邱清泉兵团回援。刘伯承指挥中野第二、六纵队和陕南军区之第十二旅，在平汉线沿线侧击、扭击由确山东进的敌黄维兵团。同时规定各军区地方部队的任务如下：中原军区之桐柏、江汉军区部队破击平汉铁路信阳至汉口段；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津浦铁路徐州至蚌埠段；华东军区之江淮军区部队破击陇海铁路徐州至运河车站段；苏北军区部队牵制两淮之敌；华北军区之冀鲁豫军区部队破击陇海铁路徐州至商丘段。11月7日，陈毅、邓小平率中野主力在张公店地区歼灭了刘汝明的第四绥靖区后卫部队第六十八军之一百八十一师。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首要的是直接攻取宿县。在徐蚌铁路线上宿县是要害之地。津浦路徐州至蚌埠段，是徐州同南京的陆上交通线，在海州、连云港被解放，陇海线被切断，徐州失去了海上交通后，更显重要。徐蚌地处淮河南岸，是蒋介石的第二条防线和供给基地，而宿县正是蒋介石兵力和军需的中转站，有许多弹药库和粮库。宿县北距徐州七十五公里，南距蚌埠九十公里，正扼徐州、蚌埠之间南北要冲，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徐州之敌难逃必经宿县，蚌埠之敌北援也是必经宿县。攻下宿县就切断了徐蚌线，将会有力的牵制徐州和拖住东援的第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对蒋介石整个军

事部署和心理都是打击。

中原野战军于11月10日转入徐蚌作战。刘伯承率中野司令部赶到永城，与陈毅、邓小平会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野司令员刘伯承针对国军的“长蛇阵”，采取“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死地而后已”的战法，以中野第四纵队和华野第三纵队、两广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钳制邱清泉第二兵团，而后从西面进逼徐州，与东面的华野山东兵团一起夹着“蛇额”；以中野第一、第三、第九纵队攻击宿县，斩断“蛇腰”，并阻击有可能由蚌埠北援的李延年、刘汝明部队；以第二、第六纵队和陕南军区第十二旅侧击和尾击由确山东进的黄维兵团，紧紧揪住“蛇尾”。

11月13日，三纵、九纵包围宿县。11月15日凌晨，三纵开始攻击，迅速肃清外围，于17时总攻城垣。守军凭借又高又厚的城墙，又宽又深的护城河和坚固的防御工事，负隅顽抗。三纵以连续爆破作业炸开城墙，突入城内，战至次日3时，全歼守军，俘虏津浦路中将护路司令兼宿县最高指挥张绩武，缴获大批军需物资。与此同时，豫皖苏地方部队攻占蚌埠以北的固镇，还破坏了津浦路曹村至固镇铁路近300公里。至此中原野战军控制了以宿县为中心的徐蚌间的广大地区，切断了徐州与徐蚌之间的联系。

中野徐蚌线作战的胜利，尤其是攻占宿县，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切断了徐州国民党军唯一的补给线和退路，彻底孤立了徐州主力，将徐蚌线国民党军分割为南北两股，有利于以后逐个消灭。毛泽东称赞攻占宿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至此徐州国民党军海陆退路均被切断，为解放军就地歼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解放军淮海决战的胜利格局基本已经确立。

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从11月6日至11月22日历时17天，华野、中野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兵团部，8个军部，18个整师。毙伤50 500人，俘虏96 600人，投诚起义30 900人，合计178 000人。（其中华野歼敌约140 000人）而中野攻占宿县，更是取得了极为有利的战场主动。

注释：

①王玉彬著：《第二野战军征战纪实：第2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8页。

②③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72页，第471页，第490～491页。

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册，第320页。

双堆集围歼黄维兵团　陈官庄合围杜聿明集团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总前委根据当时的态势，就下一步作战，迅速做出了决策。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11月14日提出黄维兵团远道而来非常疲惫，又远离后方，兵力也只有12个师，中野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之。

总前委认为，华野在消灭黄百韬兵团后，如不进行休整接着打战斗力强于黄百韬的邱、李兵团，很难达到预期目的。而中野要阻击南线黄维、李延年、刘汝明3个兵团的两路推进，困难较大。这样北线攻邱、李不能速决；南线阻援又无把握，就会陷入被动。国民党第二兵团，第十六兵团，第十三兵团背靠徐州，紧缩在一起，不宜分割。第六兵团和第八兵团在津浦路的蚌埠任桥一线，主力又在淮河以南，不易抓住。只有黄维第十二兵团孤军远出，徒步行军500余里，中途又经过中野消耗，已经相当疲惫，且此时据徐州尚有200余里，距蚌埠40余里，比较孤立。且第十二兵团是国民党主力兵团之一，如果把该兵团消灭，徐州国民党军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第十二兵团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其第十八军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曾受美式、日式、德式训练。全部美械装备，装备精良，受法西斯教育很深，管理上实行连做法，具有很强的顽抗性。第十二兵团还下辖第十军、第十四军、第八十五军，另配属1个以美式15吨战车的1营为基干的快速纵队。总兵力12万人，上有飞机，下有坦克大炮。蒋介石本打算把这个兵团作为淮海战役的战略机动兵团，在黄百韬被包围以后，不得不派出第十二兵团前往救援。11月23日，由蚌埠北上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惧怕被歼，按兵不动。而黄维兵团则不顾兵疲粮缺，一路急进，已成孤军深入之势。总前委审时度势，立即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以中野全部及华野一部围歼黄维兵团，以华野主力阻击徐州和蚌埠的增援。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并指示总前委在情况紧



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决断处置，不必事事请示以免延误战机。

11 月 23 日，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即决定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任务是消灭第十二兵团。为了保证歼灭第十二兵团的胜利。总前委将兵力作了如下部署：中原野战军集中全力和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以及特纵炮兵纵队，参加围歼第十二兵团的战斗。华东野战军将兵力划分为南北两个集团：北集团由第一纵队、第三纵队、第四纵队、第八纵队、第九纵队、第十二纵队、鲁中南纵队，两广纵队和冀鲁豫独立旅编成，归山东兵团谭震林指挥，部署在津浦路三堡水口一线及其两侧，采取弧形大队纵深配置。任务是阻击徐东之敌南援或者西援，以保证中原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南集团由第二纵队、第九纵队、第十纵队、第十一纵队、第十三纵队编成，由华东野战军首长直接指挥，接替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和豫皖苏独立旅，南下迎歼第六兵团和第八兵团，使其不能西援。华野第七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一部，也归中野指挥，参加对黄维的作战。

同一天，蒋介石召集顾祝同、何应钦等讨论徐州战局，与会者都主张退守淮河。但要退守淮河，一要解决徐州主力如何撤退，二要解决徐蚌交通如何打通，第二天，国防部作战厅提出徐州主力、黄维、李延年 3 方协同，夹击宿县，打通徐蚌交通的方案。杜聿明认为兵力不足，蒋介石增加 3 个军，命令孙元良兵团将徐州防务移交李弥兵团，然后与邱清泉兵团一起向宿县攻击前进。同日，蒋介石以第十八军及快速纵队为右纵队，沿着蒙城宿县公路经板桥赵家集等地，向宿县推进。以第十军为左纵队，由山涧集经张家集等地进到宿县以西。兵团司令部及第十四军则沿着蒙城宿县公路在第十八军后面跟进。第八十五军在蒙城补给以后前往南坪集与主力会合。黄维为改变孤军深入的不利态势，急于渡过浍河与李延年、刘汝明兵团靠拢，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分 3 路向南坪集猛攻。这时，中野一纵、二纵、三纵、六纵、十一纵、陕南十二旅已分别到达郭家集、白沙集、孙町集、曹市集、胡沟集，口袋正在形成。黄维随即发现两翼有解放军主力集结，知道不妙，遂命令已渡过浍河的部队迅速撤回。当日晚，该兵团又撤回南坪集地区。黄维召集各军、师长商讨下一步行动，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认为只要到达固镇就可立于不败之地，退可往蚌埠，进可与李延年兵团合兵一处，同样可以执行攻占宿县的预定计划。

11 月 25 日 16 时，黄维兵团开始向固镇转移，由于黄维兵团机械化程度较高，编有大量汽车和坦克，而这一地区又没有像样的公路，车辆在夜间

难以行动，只得在双堆集宿营。就在黄维兵团脱离战斗向固镇转移时，中原野战军立即乘机对双堆集发起向心攻击，黄维兵团刚准备宿营，防御部署尚未形成，匆忙应战，至11月26日晨5时，中野各个纵队从几个方面迅速将黄维的第十二兵团4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围困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东西不到20里，南北不到15里的狭窄地区。淮海战役的第二个包围圈出现了。

同日，淮海前线开始进入紧缩包围圈攻击阶段。根据总前委的指示，中原野战军司令部立即进行兵力调整，从四面乡中心压缩：第四纵队、第九纵队、第十一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由北东两面向南向西；第六纵队，陕南十二旅在周庄以西地区，由南向北；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在马庄，任家等地由西向东。

蒋介石命令黄维“应不顾一切即以主力向东攻击，击破当面之匪，与李延年兵团会师。”[①]黄维也想趁解放军立足未稳迅速突围。企图集中第十八军的十一师、一百一十八师、第十军的十八师、第八十五军的一一零四师，于27日齐头并进，向南突围，但均被击退。第八十五军一百一十师原是西北军的第二师，师长廖运周是地下党成员，准备组织战场起义。25日晚，廖运周写了起义报告，详细介绍了黄维的军事部署，突围计划以及行动意向，送交第二纵队。为了麻痹黄维，谎报该师侦察人员已发现当前解放军的薄弱环节，可以乘隙取得突破。同时建议将齐头并进改为梯次行动，由一百一十师为先锋，首先突击，其他3个师随后跟进。29日晨起义开始，廖运周成功地将部队带到指定地点，受到百姓和解放军的高度赞扬和欢迎。12月21日，毛泽东、朱德联名致电廖运周和一百一十师起义官兵，高度评价他们的起义。廖运周的起义破灭了黄维突围的企图。但黄维仍坚持顽抗，每天以1到3个团不等的兵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支援下，不断向东南突围。蒋介石“察觉到黄维兵团赖其本身的力量不可能脱出包围圈，于是命令其扩大防守地区，固安待援”。

刘峙、杜聿明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以李弥兵团困守徐州，以邱清泉、孙元良兵团沿津浦路东西两侧攻击前进，以解救黄维，但是遭到华东野战军阻援部队的顽强抗击，30日仍滞留在孤山集、后官桥、四堡以北地区，无法前进。此时奉命由济南南下的渤海纵队已经进入宿山一带，归山东兵团指挥，靠近徐州。由蚌埠。固镇北上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发现华野主力南下，惧怕被歼，随于26日南撤淮河以南。华野5个纵队迅速追击，歼灭敌第三十九军后尾两个团于曹老集。至此蒋介石策划的3路大军会攻宿县，打



通津浦路的计划彻底破产。华东野战军南北两线的坚强阻击，有力地保证了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

11 月 29 日，黄维在四处碰壁的情况下，放弃突围计划，调整部署，采取环形防御。第十八军守平谷堆，做纵深防御；第八十五军守李庄，向西防御；第十四军守杨四麻子地区向东防御，第十军向南防御；兵团部在双堆集与金庄间构筑临时机场。如此部署就地等待蒋介石组织南北增援。黄维利用地形开阔，易守难攻的特点，构筑了大量地堡、隐蔽部、交通壕，以多道障碍物和三道地堡群组成外围阵地，以村庄为坚固支撑点，以数百辆汽车装满泥土排成一圈，构成纵深的核心阵地。另以 7 个团组成机动部队，每天向解放军阵地实施攻击，以扩大占领区，抢掠一些食物。

总前委为加快战斗进程，瓦解黄维兵团的斗志，请求中央军委以新华社广播，敦促黄维投降，并指出所有官兵只要放下武器，下至士兵，上至高级将领，一律保证生命财产安全。中央军委指出解决黄维兵团是战役的关键，要求将消灭黄维的时间放宽裕，集中火力、兵力，各个分割歼灭。并特别强调要掌握强大预备队，以应付意外情况。总前委决定将华野十三纵作为攻击黄维的战役预备队，以加强进攻兵力；以中野二纵、华野六纵和豫皖苏军区的 5 个团，监视、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华野第二、十、十一纵队为总预备队，集结于宿县地区，主要对付徐州国民党军可能向东或向西逃窜。还要求华野特种兵纵队的炮兵全部加入对黄维的作战。

中野在对黄维兵团进行逐步压缩的同时，加紧总攻的准备：进一步进行思想动员，克服急躁、轻敌情绪；加强打坦克、防毒气的战术技术训练；加紧教育解放战士，调配战斗骨干；加强组织后勤保障，做到粮食、油盐、担架等物资供应源源不断。各部队开展军事民主，推广了两项战术技术，一是炸药掷弹筒，由于制作工艺简便，很快被大量制造推广，大大弥补了火炮的不足。二是进行土工近迫作业，将交通壕一直挖到敌军阵地前沿，然后在火力支援下连续爆破，紧接着步兵冲锋，使国民党军的火力优势难以发挥作用。

眼看南北对进，打通津浦路的计划破产，徐州更难坚守。黄维兵团阵地日益缩小，形势岌岌可危。11 月 28 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蒋介石主张在徐州完全孤立的形势下，为挽救徐州主力，被迫决定放弃徐州。杜聿明则认为要撤就不能恋战，要战就不能放弃徐州。如果放弃徐州出来打，势必将徐州的三个兵团葬送掉。最后蒋介石同意了他的方案。决定由杜聿明

指挥邱、李、孙3个兵团经永城、蒙城南下，先救出黄维再一同南撤；刘峙则率“剿总”机关飞往蚌埠，指挥李、刘两兵团北上增援，并派次子蒋纬国率装甲部队随同行动，以提供支援。还调在湖北的第二十、二十八军前往蚌埠，命令第二军在沙市集结，准备用船运往武汉，再转往蚌埠。同时在上海集中大量船只，准备北上接运北平、天津的嫡系部队转用于徐蚌战场。

杜聿明认为选择从徐州西南方向撤退，既避开了华野在徐州东南的阻击防线，又离双堆集较近，可威胁中野侧背，支援黄维兵团。而他根据多年来的分析，判断在南京国防部里有解放军的间谍，为避免泄密，他处心积虑把经徐州东南向两淮撤退的假计划上报国防部。当晚，飞返徐州召集各兵团司令开会，传达撤退计划：11月30日，发动全面攻击，以迷惑解放军。然后各兵团均留小部队在徐州东南牵制当面的解放军，主力于黄昏后开始撤退。要求各部队带足七天给养，车辆携带可行驶一百公里的油料，在到阜阳前不进行补给。所有剿总保存的地图、档案均由主管参谋于12月1日前烧毁，武器弹药用火车运到徐州以西的黄口车站，另候处理。带不走的物资一律破坏。

11月29日，中央军委将从隐蔽在南京国防部地下党所获取的杜聿明撤退计划，通报给总前委并指示粟裕对敌向东南方向逃跑要有所准备。指挥徐州以南阻击的谭震林、王建安根据徐州国民党军的部署重点在东南面的情况，也认为其将向东南撤退。但粟裕凭借其出色的军事才干，感觉到徐州之敌将向西南撤退，所以未按中央军委指示部署兵力，将一大半兵力部署于徐州西南。将华野第二、十、十一纵队调到宿县地区的机动位置，作为预备队，既可根据情况加入打黄维，又可适时出击截断徐州之敌的退路。

当天黄昏，杜聿明以第九军第一百六十六师两个团和第三师两个团组成的先遣部队，向萧县攻击前进，为主力的撤退提供掩护。集团主力和徐州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及被裹胁的群众约三十万人一起撤退。由于事先准备不充分，加上有的部队不按照计划规定行动，使得撤退一开始就陷入混乱。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是反对从徐州撤退的，虽然他受命掩护全军撤退，但他却并没有按照计划而是率主力先于杜聿明独自撤退。

华野侦察部队发现国民党军正在破坏徐州的工厂、仓库，还发现有部队向西运动，同时电台监听到敌军向阜阳开进的消息。华野前线部队也发现邱清泉兵团向徐州西南运动，不待命令就开始追击。华野代司令粟裕，对南窜的敌人迅速做了充分的分析和追缴的部署。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和淮海总



前委的同意。以第一、四、十二、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两个旅为右翼，从东南方平行追击；以第三、八、九、鲁中南纵队为左翼，从西面平行追击；在固镇、宿县的第二、十、十一纵队由南向北迂回截击；渤海纵队沿津浦路进占徐州，然后以一个师守徐州主力跟踪尾追。粟裕要求尾追和平行追击的各部队以勇猛动作由敌侧后插入敌行军队形，将其截成数段，以利日后围歼；迂回拦截部队要以最大行军速度赶到敌前头，截其退路。根据这一部署，华野十一个纵队又两个旅，展开了淮海战役中最大规模的追击、堵截作战。另命令江淮军区两个旅出淮南，破坏津浦铁路，阻击从浦口增援的国民党军。11 月 30 日，华野发布《全歼当面之敌，夺取战役全胜的政治动员令》，要求全军指战员，不顾一切，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干脆全部消灭徐州之敌。

12 月 2 日，杜聿明中午到达孟集，与李弥兵团联系上，得知部队非常混乱。下午空军侦察机报告有解放军的大部队正从濉溪口向永城前进。杜聿明考虑到部队在撤退中凌乱不堪，担心在夜间行军被善于夜战的解放军所乘，所以决定当晚在萧县西南的红庙、孟集、青龙集、瓦子口地区休整一夜。次日上午 10 时，部队正在前进中，接到空投的蒋介石亲笔信，信中说向永城前进，是坐视黄维兵团被消灭，要求杜聿明迅速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解黄维之围。杜聿明见信，知道如按照信上所言，必将导致全军覆没。但又考虑到如果能到达永城，再向解放军攻击，救出黄维，尚可将功抵过，如果半路被解放军阻击不能救出黄维，淮海战役失败的罪责势必归咎于他，所以难以决断，只得召集各兵团司令商议。经过讨论，大家觉得信中语气严厉，只得遵从。于是杜聿明下令以邱清泉兵团向濉溪口攻击，李弥、孙元良两兵团担任侧翼掩护，采取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跟进的战法，能攻即攻，不能攻即守。然后电复蒋介石已遵令改变部署，请求督促李延年兵团向北积极进攻，黄维兵团部队转取攻势，空军空投粮弹补给。

粟裕觉察到杜聿明正集中全力向东南推进以求与黄维会师的企图，决心乘其立足未稳，由第三、十、鲁中南纵队在南面实施阻击，而第一、二、四、八、九、十一、两广纵队在东、西、北三面实施猛烈攻击。鉴于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战斗规模极大，为保持火力，粟裕要求后方急送 82mm 迫击炮弹 30 万发，75mm 山炮炮弹 5 万发，炸药 30 万斤并附足够导火索和雷管，以及全军两个基数的步枪子弹。

华野追击部队不顾国民党空军的袭扰、轰炸，不顾天寒地冻，不顾粮食弹药供应不及等困难，穷追猛堵，终于在 12 月 4 日拂晓，九纵到达永城以北薛家湖，八纵到达永城苗乔地区，鲁中南纵到达青龙集以南，三纵到达祖老娄地区，四纵到达张寿篓地区，一纵到达袁圩，两广纵到达张新娄，十纵到达大回村以南，二纵到达永城，十一纵到达涡阳以北地区，至此将杜聿明集团三个兵团合围在距徐州约 65 公里的李石林、陈官庄、青龙集地区。并于次日形成战役合围。尽管粟裕一再指示要乘其运动之际，大胆穿插分割敌军。但由于杜聿明采取滚筒战术，逐次掩护，加上道路少，部队多，难以展开。故无法打乱其部署，将其分割包围，使其三个兵团数十万人得以收缩集结成一个大集团，这给以后全歼该敌带来一定困难。

经两天激战，杜聿明与黄维会师的企图彻底失败，并在战斗中伤亡近两万人。在此情况下，杜聿明于 12 月 6 日中午，召集各兵团司令商议对策。孙元良主张立即突围。但是杜聿明惧怕突围失败，随取消计划。当晚，孙元良兵团抢先将重武器破坏，以师为单位分散向西、西南突围。由于孙元良事先根本未对突围路线进行侦察，只想依赖邱清泉兵团来开路。而邱兵团却未突围，所以部队刚与解放军接触就形成溃乱，其主力被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和冀鲁豫军区，豫皖苏军区地方武装分别歼灭于永成附近，整个兵团仅孙元良带数十人逃脱。孙元良兵团被歼灭后，杜聿明迅速以预备队填补孙兵团的防御漏洞。调整部署后决定各部队准备预备队以应付解放军的攻击，并将全面攻击改为重点攻击，即每天集中坦克、重炮支援一个军突击，以求突破。但是突围未能得逞，且伤亡不断增加，阵地逐渐缩小，不得已固守待援。从这天起，守淮阴、淮安等地的国民党第一绥靖区部队，在解放军连续胜利的震撼下，纷纷后撤，解放军华野所属地方部队随即解放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兴化等城。

总前委分析了战场形势，认为整个战役现在分为双堆集、陈官庄、蚌埠 3 个战场，兵力已感不足，其中阻击蚌埠李延年兵团方向，兵力尤其不足，如果无法阻止其北进，势必影响对黄维的作战。如果要同时歼灭黄维、杜聿明两处敌军，时间必会延长，而时间延长的话，一旦蒋介石从其他地区调来的援军赶到，就可能陷入被动，为确保主动，就只能先集中兵力、火力消灭黄维、杜聿明两处中的一处。为此总前委决定，从包围杜聿明集团的华野主力中抽调一部，会同中野先解决黄维。对杜聿明集团先取守势，待黄维解决后，由中野负责阻击李延年兵团，由华野集中全力解决杜聿明集团。也就是



先解决黄维兵团；对杜聿明集团暂取大部守势，局部攻势的围困；增加阻击蚌埠援军的部署。这一部署刘伯承风趣形象地称为“一个胃口很好的人上宴席，嘴里吃一块（黄维兵团），筷子上挟一块（杜聿明集团），眼睛又盯着一块（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消灭第十二兵团的阵地歼灭战，正是人民解放军从运动战转到阵地战攻坚战阶段。这种战术转换，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一度进展缓慢。

同时，中央军委发出对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的形势分析，以及完成第二阶段作战任务的指示。指出：在战术方面，必须不是依靠急袭，而是依靠充分的侦察和技术准备（近迫作业，步炮协同等），去取得成功。必须对敌军进行猛烈的有效的政治攻势。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各级党委立即认真教育部队，反复动员，同时根据国民党军防守特点研究歼灭方案。大力推广了“抛掷筒”，以加大火力输出，为了减少伤亡，采取“以地堡对地堡”、“以战壕对战壕”的战法，进行了工程浩大的近迫作业。根据黄维的环形防御特点，淮海前委也做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上的调整：以中野第四、九、十一纵队及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组成东集团，由四纵司令陈赓、政委谢富治统一指挥，担负主要突击，攻击沈庄、张围子、张庄之敌；以中野第一、三、华野第十三纵队组成西集团，由三纵司令陈锡联统一指挥，攻击官庙、马围子、许庄之敌；以中野第六、华野第七纵队及陕南十二旅组成南集团，由六纵司令王近山、政委杜义德统一指挥，攻击玉王庙、赵庄、周庄之敌，鲁中南纵队为预备队。华野特种兵纵队所属炮兵分为两个炮群，分别支援东、南集团作战。

12 月 5 日发起总攻命令，规定：总攻发起后，各部队应连续攻击，直到全歼黄维兵团，不得停止或请求推迟。各纵应不惜以最大牺牲来保证完成任务，并要及时自动协助友邻作战。对于临阵动摇延误战机分子，各部队首长有严格执行纪律之责，不得姑息。12 月 6 日 16 时 30 分，总攻开始，3 个突击集团集中火力、兵力实施有重点、多方向的连续突击。激战至 12 月 10 日，黄维兵团已被压缩在南北 5 公里，东西 1.5 公里的狭小区域里，而且粮弹俱缺，死伤枕籍，战斗力最强的十八军伤亡也已超过 1 / 3，能用的坦克仅剩 5 辆。蒋介石于 12 月 1 日用飞机送胡琏到双堆集前方协助黄维突围。12 月 7 日，胡琏前往南京面见蒋介石力陈双堆集的危机。此时杜聿明被围，李延年被阻，救援没有希望只能同意第十二兵团突围。胡琏决定使用毒气掩护突围，突围后的集结地点定在安徽的凤台县。

为了尽快解决黄维，华野抽调第三、十一纵队由参谋长陈士渠指挥，南

下参加对黄维作战。12 月 12 日，华野加强政治攻势，刘伯承、陈毅发布《促黄维立即投降书》，要求其不要再作绝望的抵抗，应爱惜部属的生命，放下武器。第五十八军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率部投降。但黄维拒不投降，拼死顽抗。12 月 13 日，总前委为最后解决黄维，再次调整部署。由华野抽调来的第三、十一纵队加入南集团，南集团由陈士渠统一指挥担任主攻，原担任主攻的东集团改为助攻。12 月 14 日，陈士渠指挥华野三纵、中野六纵攻击双堆集东北的集团工事，他以华野攻坚能力最强的三纵八师为主攻，将三纵炮兵团的 3 个炮兵连和 8 师炮兵营组成炮群，直接支援八师的攻击；将三纵炮兵团主力和华野特种兵纵队的重炮组成炮群，由第三纵队指挥负责压制双堆集敌军炮火。经严密准备，于黄昏时分发起攻击。至 12 月 16 日，黄维第十二兵团 4 个军和 1 个快速纵队，共 11 个师 10 万余人除零散人员逃脱外，近乎全歼，黄维被俘。

对于蒋介石宿县进攻，南北夹击，“打通徐蚌线”“要与黄维在宿县握手”的意图，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早有洞察和指示。淮海总前委也早有部署。即华东野战军将兵力分为南北两个阻援集团。就在中野围歼黄维兵团同时，华野在徐州以南和蚌埠以北进行顽强的阻击，保障了中野的作战。

北线徐州方面：11 月 21 日，位于徐州以南西起姚娄，东到潘塘一线的华野第一、三、十二、鲁中南、两广纵队开始构筑工事，部署火力，准备阻击邱、李兵团南撤。11 月 22 日，黄百韬兵团被歼灭，11 月 23 日起围歼黄百韬的部队陆续撤出战场，加入徐南阻击。11 月 24 日，华野第四、八、九纵队到达预定位置，展开防御。黄百韬兵团被消灭后，邱、李兵团即于 23 日起向徐州退却。邱清泉兵团于 11 月 25 日以主力配合原在潘塘地区部队，向徐南攻击，以加强南线兵力，便于日后向南撤退。11 月 25 日，粟裕调整华野兵力部署，以第一、三、四、八、九、十二、鲁中南、两广纵队及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共 8 个纵队 19 个师（旅）63 个团，由谭震林、王建安统一指挥，阻击徐州之敌南援，防御阵地从二陈集、三堡到孤山集，正面约 50 公里；华野第二、六、十三纵队及江淮军区两个独立旅，由韦国清、吉洛统一指挥，阻击蚌埠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北援；华野第七、十、十一和中野第十一纵队，参加攻击黄维兵团，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另以渤海纵队主力位于宿羊山，一部位于茅村镇、荆山铺，并派便衣侦察队在徐州附近活动。

11 月 26 日拂晓，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就在飞机、坦克、重炮支援下，开始全线攻击。邱兵团展开第十二、七十四军，沿津浦路以东向三堡猛攻；



孙兵团展开全部两个军第四十一、四十工军，沿津浦路以西向孤山集猛攻。激战至当日深夜，邱、孙兵团占领刘塘、白头山、光山、两半山、银山等解放军阵地。11月27日，邱清泉兵团增加攻击兵力，投入3个军，全力猛攻，相继占领官庄、刘庄、赵庄、观音堂、前后谷堆等10余处村庄。孙元良兵团也占领了搬井、孤山、沙帽山、马路山等地。粟裕鉴于第一线阻击力量相对薄弱，有必要增加兵力，就决定再做调整，将原在二线的四、八、九纵调到一线，将连日激战而伤亡惨重的鲁中南纵撤到夹沟以南休整。邱、孙兵团大规模进攻，各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集中兵力、火力，轮番攻击，逐村争夺。华野采取正面阻击与侧翼出击相结合的战术，顽强抵抗。自11月24日至30日，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在飞机、坦克配合下，连日猛攻，平均每日推进仅0.5到1.5公里，伤亡却达4000余，最终被阻止在孤山集、四堡、褚兰一线。随着12月1日，徐州国民党军主力放弃徐州向西南退却，徐南的阻击才告结束。

南线蚌埠方面：企图北进解围的是第六兵团和第八兵团。第六李延年兵团3个军都是中央嫡系，装备优良，是蒋介石守备淮河第二线兵力。第八刘汝明兵团下辖的3军，同为守备淮河的第二线兵力。11月21日，粟裕就南线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作出部署：中野十一纵进至王巷子、官沟、湖沟一线，并切实控制浍河大桥，割裂李延年与黄维的联系；华野二纵进至王巷子、花庄集一线，如敌沿铁路北进则坚决阻击，如敌向大店北进则布置侧翼阵地，待命出击；华野六、十三纵沿沱河两岸由东南向西北攻击；华野六、十一纵待割裂李延年兵团后加入作战；华野十纵为总预备队；江淮军区两个旅攻占灵璧后向固镇、蚌埠攻击前进。11月25日，黄维兵团陷入重围时，李延年兵团之第三十九、九十九军已到达花庄集、龙王庙、任桥集一线。刘汝明兵团虽经刘峙多次催促，其主力五十五、六十八军仍集结在固镇、淮南地区按兵不动。粟裕考虑到黄维兵团将在数日内被歼灭，李、刘兵团就会很快向蚌埠退缩，这样就容易丧失消灭这两个兵团的战机，于是向总前委建议集中南线现有的5个纵队对李延年兵团采取攻势牵制，进一步分割李、刘兵团联系，以便下一步歼灭李延年兵团。总前委于次日复电同意。

11月26日，徐州“剿总”发现华野数个纵队正由徐州以东兼程南下，对李延年兵团威胁极大，判断华野下一步将攻击李延年，而且认为在黄维和李延年两者之中，解放军一定是先攻击较弱的李延年，所以经顾祝同批准，命令已进至花庄集的李延年兵团之三十九、九十九军星夜南撤，蒋介石对这一变更也无可奈何，只得改发命令：李延年兵团撤到淝河以南布防，刘汝明

兵团固守怀远及淮南。11 月 27 日，粟裕下令以攻势牵制李延年兵团，但不久得到李延年兵团南撤的报告，立即改变计划，将南线部队分为两个集团，发起追击。华野二、六、十一纵，以任桥集、新马桥为目标，切断李兵团向蚌埠退路；华野十、十三纵协同 2 纵攻击任桥集；江淮军区两个旅切断固镇与任桥集的联系，并围攻固镇。12 月 1 日，华野第六纵队进入曹老集地区，在东起徐郢西到古城，南起曹老集北到张集，正面约 35 公里的地区，依托清沟河组织防御。12 月 2 日，黄维兵团正在被围歼中，杜聿明集团正被华野 11 个纵队追击中，形势危急。蒋介石严令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再次北进，以接应黄维、杜聿明。12 月 3 日，李延年在蒋介石、刘峙督促下，以第三十九、五十四、九十九军对曹老集地区的解放军阵地展开全线猛攻。蒋介石次子蒋纬国亲率战车第二团到达蚌埠协同作战。12 月 4、5 日，中央军委连电对阻击蚌埠之敌表示关注，要求组织多层防御，不可大意，彻底消除蚌埠之敌的威胁。5 日，中野二纵赶到，迅速在九湾集、新马桥、陆集、任家湖一线构筑阵地。8 日，粟裕考虑到六纵防御正面太宽，兵力又单薄恐有被突破的可能，请求总前委将就近的一些部队调往增援，这一请求随即得到批准。12 月 7 日，陈毅亲自写信给华野六纵司令王必成和政委江渭清，要求他们咬紧牙关，要有牺牲大部的决心坚决顶住李延年兵团北进，保障中野消灭黄维兵团。12 月 8 日，华野渤海纵队第十一师、豫皖苏军区 3 个团、豫西军区 2 个团赶到，使这一地区解放军总兵力达到 5.5 万人，改变了兵力对比上的劣势。从 8 日后，在这些部队的抗击下，李延年兵团每日推进仅 1 到 3 公里，有时甚至竟无法前进。到 12 月 15 日黄维兵团被歼灭时，李延年兵团付出 13 000 余人伤亡的代价才到达崔家圩、高王集、包家集一线，距双堆集还有 30 公里。

12 月 16 日，顾祝同电告刘峙，黄维兵团已脱离包围，为避免李延年兵团陷入被动，要求该兵团迅速与解放军脱离接触，然后以一部守淮河，主力位于淮河以南机动。根据这一命令，12 月 17 日，李延年兵团退守临淮关、怀远，刘汝明兵团退守蚌埠以南地区。华野在徐州以南和蚌埠以北的阻击，有力保障了中野围歼黄维兵团，打破了蒋介石南北对进，打通津浦路救出黄维的企图。

注释：

①顾祝同：1948 年 11 与 16 日至黄维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 3 卷，第 277 页。



全歼杜聿明集团

在黄维兵团被歼灭以后，蒋介石在淮海战场除了蚌埠守军以外，仅剩下杜聿明集团的两个兵团八个军被合围在陈官庄、青龙集为中心的约南北10华里、东西20华里的狭小地区，孤立无援，突围无望，全军覆灭的命运已经无可避免。

东野方面，立即组织对杜聿明集团的总攻，虽然取胜不成问题，但代价会较大。在该集团已孤立无援、突围无望的情况下，能利用战斗间隙休整部队，补充粮食弹药，再一鼓作气消灭该集团，自然更好。而且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从全国战局考虑，特别是平津战役，此时已进行了10余天，还不能完全达成对北平和天津的战略包围与战役分割，为了麻痹北平傅作义，使蒋介石不致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地区就地歼灭，除了命令东北、华北解放军采取种种有力措施外，中央军委还对淮海战场做出相应部署，于12月16日指示总前委及华东野战军，“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①]毛泽东也于当晚电告粟刘陈邓：“我包围杜聿明各部，可以十天左右时间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做者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三五天一次，依战场具体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修改播发”。[②]12月22日毛泽东又电示粟裕：“你们可集中华野全军兵并多休整数日，养精蓄锐，然后一举歼灭杜聿明。只要杜部不大举突围，你们应休息至下月初，约于子微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③]这一“围而不歼”的部署，从全国战局出发，充分利用了淮海与平津之间的战略关联，避免了杜集团被歼后，引起国民党军全局动摇，促使蒋介石将华北嫡系主力海运南京、上海。

总前委依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华野从12月16日开始，依托现有阵地，一方面继续围困杜聿明坚决抗击其突围企图，另一方面以10天为期转入战场修整后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再延长10天，直到1949年1月

5 日。中原野战军以小部分打扫战场，大部集结于宿县、蒙城、涡阳一带，转入休整，同时担任战役总预备队。为保证战场休整顺利进行，防止敌乘机突围。华野调整了部署，以第一、二、四、八、九、十、十一、渤海纵队为一线部队，对敌进行边围困边组织战场休整。第三、六、七、十二、十三、两广纵队、鲁中南纵队和第三十五军、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冀鲁豫军区基干团以及华野直属之骑兵团、总部警卫团为二线部队，分别位于铁佛寺、宿县、萧县、薛家湖、马村桥、会亭集、永城、山城集、酂阳集、夏邑等地区休整，随时准备配合一线部队作战。中野以豫皖苏军区 5 个团位于淝河沿岸，向蚌埠警戒，主力集结于宿县、蒙城、涡阳地区，担任战役预备队，以备战姿态进行休整，随时准备协同华野歼灭杜聿明集团或阻击由蚌埠再次来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以保障歼灭杜聿明集团能够顺利进行。

两大野战军在 20 天的战场休整中，全面进行了总攻准备：

华野、中野面临连日激战，人员伤亡较大，特别是营、连级干部伤亡太大，为解决这一问题，华野对各级机关进行了精简，从各级机关抽调出 1 000 余参谋、干事等到战斗部队任职；将各教导团的干部全部补入部队；从老战士和经过考验的解放战士中提拔了一批基层干部；华东军区还从鲁中南抽调 600 余干部、胶东抽调 500 余干部、渤海抽调 400 余干部共 1 500 多干部充实野战部队，这才基本解决了干部缺额的问题。

在兵员补充上，在休整期间除了将 16 个地方基干团近 3 万人升级编入野战军外，主要兵员补充来自俘虏，在战役第一、二阶段共俘虏国民党军 10 万余人，大部按照“随俘随补，随补随战”的原则立即补入部队，休整期间俘虏的补训溶化工作也就成为工作重点之一。正是地方部队升级和俘虏的补充，使华野总兵力由战役发起时的 42 万除去作战伤亡还增加到 46 万。

在政治上，各部队深入开展形势、任务、纪律教育，还广泛进行了火线评功、立功活动，积极发展优秀分子入党。这些活动普遍激励了战士政治思想上的团结互助、不怕牺牲等精神。同时针对敌防御特点，开展军事民主，集思广益，深入研究战术技术，并不畏天寒地冻，掀起阵前练兵。第一线部队积极开展近迫作业，构筑的交通壕距敌前沿仅三五十米，大大限制了敌军活动，也为日后的总攻准备好了出发阵地。

在后勤保障上，12 月 16 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报告部队因连日作战，而且经常吃不到油盐，非常疲劳。提议慰劳参战部队，平均每人香烟 5 包，猪肉半斤，举行会餐，恢复体力。次日周恩来就代表中央军委回电，批



准这一要求。并电示中共华东局、中原局：淮海战役已进行月余，前线将士浴血奋战，辛劳备至。兹决定凡参战部队前线人员，一律慰劳每人猪肉1斤，香烟5包，不吸烟者以其他等价物品代替。在经历了连年战争的年代，要调集这么多的猪肉、香烟、粮食，是相当困难的。但华东、中原解放区的地方党政机关和部队的后勤部门以最大努力在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下完成了这一任务，体现了党和人民对解放军的关怀和热爱。1948年12月31日，华野司令部、政治部向前线指战员发出新年慰问。1949年1月3日，总前委又向在战役中光荣负伤的指战员发出慰问信。各级政治部门纷纷组织部队文艺工作者到前线进行慰问演出，进一步激发指战员的斗志。

休整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展群众性的对敌政治攻心。总前委要求各部队，有组织有针对性进行这一工作，各部队以战场喊话、劝降、释放俘虏、打宣战弹、树宣传牌、送新年礼物等形式，展开了连续不断的、上下结合的政治攻势，以加速敌军的动摇和瓦解。12月17日，毛泽东亲自为华野、中野司令部起草《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广播稿，进行战场广播。1949年元旦，陈毅、粟裕再次向杜聿明等将领发出劝降信。一线部队用各种方式散发这些劝降信，并反复广播。对杜聿明等高级将领的劝降信，则是派专人送达。很多纵队、师、团都成立了“政治工作指挥所”和“投诚人员招待所”，前者负责具体领导政治攻心，后者负责收容、照顾投诚人员，并从中了解敌情，争取投诚人员、派出打入工作等。为鼓励更多的敌军来降，华野还公布了对自动携械来归者的奖励标准，阐明了对携械来降者的安排和处理，规定了所携各种枪械的具体奖励金额。

从12月20日起，陈官庄地区雨雪交加，气温骤降，国民党空军的空投也因天气而时断时续，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20余万人，每日需粮食30万斤，靠空投根本无法解决。在天气恶劣、空投中断的情况下，大批士兵冻、饿而死，尽管国民党军各级采取各种手段，仍无法阻止士气日益低落、军心日益瓦解，成班、成排甚至成连的官兵越过火线向解放军投降的现状。在20天中，投降者有1.4万，平均每日达700余人。杜聿明承认由于解放军采取的政治攻势，瓦解了士气，并使得国民党军内部上下狐疑，惶恐不安。刘峙也在回忆中说，解放军的内部策反和阵地喊话等政治攻心，等于无形中增加了10万兵力。

国民党方面，杜聿明集团被包围的有两个兵团8个军，计22个师20余万人。蒋介石虽想救援，但已无兵力实施了。他只好考虑收缩兵力，组织长

江防线，以确保南京、上海（的安全）。将第一绥靖区的部队撤至长江边，第六、八兵团守淮河，刚调来的第二十军肃清南山河地区的游击队，第二十八军控制浦口，第五十四、三十九、六十六军在南京集结，守备江防。12月16日，蒋介石命令杜聿明坚决突围。而杜聿明深知突围必定被消灭，所以并未执行，而是加强工事，准备持久固守。12月19日，舒适存和空军总司令部第三署副署长董明德一起飞回陈官庄，带回来蒋介石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的亲笔信，蒋介石在信中要求杜聿明在空军投毒气弹的掩护下，全力突围。王叔铭的信中则表示空军将尽全力来掩护突围，并由董明德商量具体办法。杜聿明随即与舒适存、董明德一起拟定了陆空协同突围计划。并与邱清泉商定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放弃武汉、西安，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部队，与解放军决战；中策是持久坚守，请蒋介石与中共和谈，争取时间；下策是照令突围。12月30日，蒋介石派来一架飞机，接杜聿明回南京治病。但杜聿明见没有书面命令，害怕日后担上临阵脱逃的罪名，成为淮海战役失败的替罪羊，同时也不忍抛下数10万部下只身逃走，所以未上飞机。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声明，提议和平谈判。杜聿明见援兵无望，突围又无成功的可能，也希望和谈成功，以保全他的部队，所以迟迟不实施突围。

1月3日，蒋介石再次电令从1月5日起，投足3天粮弹，然后突围。1月5日，空投开始。杜聿明深知突围必遭全军覆没，就以粮弹未足，将士饥疲无力为由，请求继续空投，以此拖延。蒋介石严令再空投3天，务必遵照实施。杜聿明至此不得不准备实施突围。当晚召开师、军长会议，部署突围行动。决定在空军轰炸并投毒气弹掩护下，以第五、七十四军带防毒面具打开突破口，随后扩张战果，以便后续部队跟进。每人带3天干粮。突围时间定在1月10日。各部队即根据这一命令开始准备。

1948年12月底，在北线的平津战场华北东北野战军已完全切断了傅作义集团的海上和陆上退路。南线的淮海战场缓攻杜聿明集团以配合平津战场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并在20的战场休整中做好了总攻的一切准备。粟裕据此认为总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于12月31日向中央军委建议，乘敌未得到充足的粮弹补给，而且疲惫动摇之际，发动总攻，先攻歼李弥兵团，再扩张战果，攻歼邱清泉兵团，取得战役全胜，并上报了总攻部署。中央军委于1949年1月2日复电同意。

华野随即下达总攻命令。具体部署是以10个纵队、27个师（旅）组成



东、南、北三个突击集团。东集团，由10纵司令宋时轮、政委刘培善统一指挥第三、四、十、渤海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三旅，共9个师又2个旅，担负分割围歼李弥兵团的主攻任务。北集团，由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副司令王建安统一指挥第一、九、十二纵队，共6个师又2个旅，由北向南攻击，协同东集团分割围歼李弥兵团。南集团，由苏北兵团司令韦国清、副政委吉洛统一指挥第二、八、十一纵队，共5个师又3个旅，由南向北攻击，牵制邱清泉兵团，并保障东集团侧翼安全。以第六、七、十三、鲁中南、两广纵队及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冀鲁豫军区基干团、华野骑兵团、总部警卫团共11个师又1个旅另6个团为外线堵截部队，集结待命，一旦敌人突围，立即配合突击集团截击消灭之。华野特种兵纵队除指挥各纵队炮兵团外，将直属重炮分为4个炮兵群，其中炮1团（美制105*mm*榴弹炮团）和炮3团的一个连（野炮连）部署于李石林以北地区；炮2团之1营（野炮营）部署于刘河地区；炮2团主力（野炮营）部署于苗桥以西地区；炮3团（野炮团）部署于耿庄、骑界沟地区。分别支援3个突击集团的作战。

1949年1月6日15时30分，华野发起总攻，在集中所有炮火实施30分钟的猛烈炮击后，3个突击集团同时发起攻击。经过两天的战斗，解放军共攻占36个村落，歼敌约14个团，近15 000余人。完成了原定3至7天攻击任务，歼灭了李弥兵团主力，并突破邱清泉兵团在鲁河以东的第七十二军的阵地。杜聿明眼看李弥兵团全线崩溃，邱清泉兵团防线也被突破，急忙收缩兵力调整部署，并请求空军于1月9日进行预备轰炸，1月10日投毒气弹掩护突围。

杜聿明与邱清泉商量后，决定以第五军为先锋，在空军掩护下杀开缺口。第五军是国民党军嫡系中的精锐部队，“五大主力”之一，是国民党军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曾参加过印缅远征军。杜聿明就是该军的首任军长，而现在的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也曾担任过该军军长。尽管连日战斗激烈，但邱清泉一直没使用第五军，就是为了保留这一骨干力量在最后关头使用。大批飞机轰炸，并投下毒气弹。但是解放军在几天前就捡到了空投下的毒气弹和防毒面具，对毒气弹进行了实验性爆炸，搞清了毒气弹的性质，所以使用毒气弹后并未产生预计的效果，第五军对的攻击遭到了华野第八、九纵队的顽强抵抗，仅攻占了左砦，没能打开缺口。计划多日的突围宣告失败。下午，解放军在坦克、大炮支援下，发起全线攻击。第一纵队攻占小朱庄；第三纵队攻占陈楼；第四纵队追击向竹安楼逃窜之敌，于途中接受了第八军四十二

师残部的投降；第十纵队攻占陆菜园，与四纵并肩向西攻击前进。杜聿明只得向蒋介石发出最后一封电报：“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9日这一晚，被粟裕称为“迅速、惊人、巨大的发展，是全战役最重要、最紧张、最精彩的一个阶段，也是接近最后一幕的最生动场面。”第三、四、十三纵队齐头并进，直逼陈官庄，解放军以11辆坦克搭载1个加强步兵连与骑兵团组成快速部队，追歼残敌。国民党军全面崩溃。当晚22时，杜聿明下令分散突围，他带着副官和随从数10人，向北突围，后被第四纵队俘虏。1月10日，十纵在三、四纵的配合下占领陈官庄，四纵占领陈庄。国民党军残部失去指挥，加上饥疲无力，整师整团放下武器，只有七十四军残部和第九军之第三师残部据守刘集、周楼，直到16时才先后被解决。至此，杜聿明集团一个剿总司令部前进指挥部，2个兵团部，8个军部，22个师又1个旅，共17.6万余人全部被歼。战役第三阶段胜利结束，华野伤亡约1.78万。

注释：

①②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页，第410页，第435页。



淮海战役全景分析

淮海战役，是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在总前委统一指挥下，由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具体组织实施的。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密切配合，赢得了战役的胜利。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国民党军先后投入7个兵团、2个绥靖区，34个军，86个师，共约80万人，出动飞机高达2 957架次。解放军参战部队华野16个纵队，中野7个纵队，连同华东、中原军区地方部队共约60万人。战役中共消灭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及其所指挥的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1个绥靖区，正规军连同其他部队共555 099人，约占其参战兵力的69%，其中俘虏320 355人，毙伤171 151人，投诚35 093人，起义改编28 500人。国民党少将以上高级将领被俘124人，被击毙6人，投诚22人，起义8人。以上战果还不包括其溃散和逃亡人数。主要缴获有火炮4 215门，轻重机枪14 503挺，长短枪151 045支，飞机6架，坦克装甲车215辆，汽车1 747辆，马车6 680辆，炮弹120 128发，枪弹2 015.1万发。解放军阵亡25 954人，伤98 818人，失踪11 752人，合计136 524人。敌我伤亡比为4.06：1。武器装备损失计有坦克1辆，山炮、野炮、榴弹炮共34门，迫击炮、步兵炮共219门，掷弹筒26具，轻重机枪1 884挺，长短枪14 588支，各种炮弹679 943发，各种枪弹2 014.9万发，炸药（缺双堆集战场统计数字）97 025斤。在大决战的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解放军的伤亡最大，超过其他两次战役伤亡的总和，占大決战总伤亡的53.8%，各种武器的损耗和弹药的消耗也最大，其中火炮损耗占总损耗的48.6%；长短枪损耗占总损耗的69.4%，轻重机枪的损耗占总损耗的61.8%，炮弹的消耗占总消耗的68.7%，子弹的消耗占总消耗的62.7%，炸药的消耗占总消耗的57.4%。歼敌总数也最多，占总歼敌数的35.8%，缴获则最少，淮海战役的激烈可见一斑。其中华野歼敌约44

万，约占淮海战役歼敌总数的80%；华野伤亡约9.1万，约占淮海战役解放军总伤亡人数的67%。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

一、中央军委的正确指导是取得淮海战役胜利的先决条件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中央军委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对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积极、准确、全面把握的基础上，中央军委相机而动，提出并制定了一系列战略目标和战略方针，为赢得这场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一）适时扩大战役规模，及时确立就地歼灭国民党军徐州集团的作战方针。“执行有利的决战，避免不利的决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放军兵力和装备处于劣势时力避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而抓住一切战机，通过战役上的胜利，分批歼灭，逐步削弱之，为进行战略决战创造条件。淮海战场战略决战条件已经成熟。一是辽沈战役后解放军总兵力已超过国民党军；二是华野、中野主力已经靠拢，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三是国民党军内部指挥不统一，主力兵团避战自保，虽众而孤，利于各个歼灭。据此，在徐州之国民党军有向南撤退的征候时，毛泽东以其非凡的胆略，决定扩大战役规模，把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重心的方针，发展为就地歼灭徐州刘峙集团的方针。

（二）宏观把握全局，积极捕捉战机，将帅协谋促成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淮海战役是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和广大地方武装及民兵，共同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协同作战。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是在中央军委的正确指导和前方指挥员的积极努力下，在全面把握战局，群策群力的基础上逐步确立起来的。中央军委在决策时积极、审慎、果断，总揽全局，在重大方略的决策上不武断从事，高度发扬民主的精神；尊重前方指挥员的建议、意见，及时采纳积极可行的作战方略，多方位、多渠道、多角度地了解前沿战况，使战役逐渐朝着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前方指挥员在正确理解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后，也能结合战场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总结，积极提出合理性建议，为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提供必要依据，最终使战役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确保了人民解放军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

（三）从实际出发，精心选择攻击目标，夺取战场主动权。恰当选择好首要突击方向，使兵力迅速切入战局，夺取先机，是打赢战役的关键。因



此，精心选择攻击目标，以夺取战场主动权，便成为打赢淮海战役首要思考的问题。淮海战役发起前，国民党军约60万人（战役发起后增加到大约80万人）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津浦铁路线上，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面对这种战局，人民解放军究竟从何方切入较为有利：首先，选择的目标应是敌人的薄弱环节；其次，它要有利于我们分割；另外 还要让它能牵动敌人的全盘动作。基于以上考虑，中央军委经过缜密研究，给华野的回电中指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把首歼黄百韬部确定为首要突击方向。中央军委确定战役第一阶段以黄百韬兵团为主要的作战目标，这不仅由于该兵团是刘峙集团中战力较弱的一个兵团，且态势突出，易为我分割围歼。胜利后，即可使山东、苏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有利于下一步作战。而攻占宿县，切断徐蚌路，就孤立了徐州，为分批歼之，实现就地歼灭刘峙集团创造了条件。战役第二阶段，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决定以歼击黄维兵团为作战目标。该部战力虽较强，但有长途跋涉、孤军冒进、兵疲粮缺、地形不利等弱点，而且还考虑到歼灭该部后，可以使徐州之国民党军陷于更加孤立的境地；华野主力也能获得必要的休整补充，以便养精蓄锐，准备下一步围歼徐州之国民党军。当发现杜聿明集团逃跑时，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又不失时机地将该部包围。当对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的攻击处于胶着状态时，又决定集中兵力首歼黄维兵团。战役第三阶段，中央军委从战略全局着眼，首先下达进行20天战场休整的命令，目的是为了配合华北地区平津战役的作战。在完成配合平津战役作战的任务后，1949年1月6日，华野开始对淮海战场上最后一股敌人—— 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中央军委高屋建瓴，对这一作战目标和时机的把握，不仅使战役第三阶段在破坏性小，伤亡少的条件下得以顺利结束，而且使全国战场形成了互相支持，互相呼应，环环相扣的良好局面。

二、机动灵活地运用多种战术，全面击败敌人。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直接指导下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这一军事思想贯穿于整个战役的始终。它不仅表现在对重大战略方针的宏观把握上，而且表现在对具体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上。

（一）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是人民解放军在转入战略进攻后采用的一种战术。淮海战役的三个阶段，解放军都是以大规模的运动战始，以大规模的阵地战终。对付运动中之国民党军，解放军指导思想上以"猛"为主，以穿插、分割、迂回、包围、追击、阻击等各种战

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歼之，使其无法收缩集结而被各个歼灭。对已转入集团固守之国民党军，则应以“稳”为主，进行周密侦察，在开展工程浩大的艰苦的近迫作业和步炮协同等基础上，集中优势兵力、火力，逐点夺取，逐次歼灭。

（二）贯彻“攻济打援”原则。“攻济打援“与集中优势兵力战术的并用。“攻济打援”就是用足够的兵力去攻击主战场的敌人，而集中更大的兵力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以此牵制敌人互相配合的意图，破坏敌人的合力，然后逐个歼灭敌人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是人民军队的军事法宝。淮海战役的每一阶段，人民解放军都将这两种战术进行了恰当融合，巧妙地实施运用。在第一阶段打黄百韬兵团时，除了用足够的兵力有效地钳制主战场敌人外，又以优势兵力组成了强大的阵容去阻击徐州李弥、邱清泉兵团的东援，牵制（中野的一部兵力）河南确山地区黄维兵团的增援；第二阶段，为保证人民解放军南线围歼黄维兵团的顺利进行，不仅用中野的全部和华野的一部兵力保证主战场的作战，还集中了优势兵力分别在徐州以南，蚌埠以北阻击徐州的邱清泉和孙元良兵团，以及蚌埠的刘汝明和李延年兵团的增援，从而不给主战场敌人以喘息机会，致使他们彻底丧失机动能力，确保人民解放军在主战场作战的进行，取得作战的全胜。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央军委的正确指导，使多种战术得以有机、灵活地运用，使人民解放军在人数、武器方面均劣于敌人的情况下，化不利为有利，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三）利用作战间隙休整部队，有效地组织连续作战。华东、中原野战军利用作战间隙，及时组织部队就地休整，有计划地实施轮番作战。并在伤亡大的情况下，及时进行火线整编，编并战斗单位，配齐干部缺额，补充解放军战士，使部队始终保持了坚强的战斗力。

（四）把握有利时机，组织国民党军起义。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组织了国民党军两次较大的起义，对战役的发展起了重大影响。一是战役开始不久，在解放军从徐州东西两侧发起攻击，造成围攻徐州之势，力争分割合围黄百韬兵团的紧要时刻，适时组织了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起义，迅速截断陇海路，切断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退路，为包围黄百韬兵团赢得了时间。二是在黄维集中主力4个师为第一梯队并肩拼死突围之际，总前委及时策动国民党军110师师长廖运周战场起义，有效地阻止了黄维兵团突围。整个战役，争取国民党官兵起义共达2.8万余人。



三、英勇善战、精诚团结、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是淮海战役胜利的根本。淮海战役是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在广大地方武装及民兵的配合下，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正确指挥下，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协同作战。这种“协同”表现在整个作战的方方面面。总前委在具体组织指挥两支大军并肩作战时，坚决贯彻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关于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指示，号召参战部队坚决服从命令，树立全局观念，加强团结协作，统一对国民党军作战。参加作战的不管是建制内的还是临时配属的部队，都能遵守纪律服从指挥。总前委还根据战局的变化，及时转变作战指导思想，调整作战部署，实现了两支大军密切协同。在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战役发起前，中野一部在豫西方向牵制国民党华中“剿总”所属张淦兵团和黄维兵团；主力在郑州、开封方向吸引了刘峙集团西顾，策应华野方向战前的准备工作。战役第一阶段，中野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宿县，切断津浦线，目的是配合华野的作战。中野在召开宿县战斗的预备会议上，邓小平政委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为了这个目的，在淮海战场上，只要歼灭了敌人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照样取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在中野用电报向中央军委报请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计划时说：“我一切须俟华野战况决定，请军委核示方针。”这充分体现了两大野战军以全局为重，服从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以保证人民解放军能在战场上发挥因合力而产生的最大威力，从而掌握战场的主动。战役第二阶段，中原野战军克服从大别山走出时丢掉重、大武器的困难，勇挑重担，决心全力围歼黄维兵团，这时华野也给予了中野大力支持。华野曾先后调主力纵队参加中野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另以一部为保障中野侧背安全，担负阻击蚌埠李延年、刘汝明部北援的任务。而在发现徐州杜聿明集团要西撤南下去解救黄维兵团，即将给中野以重创时，又立即抽调部队组成强大阵容围追堵截杜聿明集团。在时局紧张，调兵频繁的情况下，华野发扬了不怕牺牲，不怕打乱建制，绝对服从命令，积极配合兄弟部队作战的协作精神与全局观念。战役第三阶段，华野主力围歼杜聿明集团时，中野在完成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后，到达中央军委指定的位置，随时截歼逃敌和防止蚌埠之敌北援，配合华野作战。整个战役中两大野战军服从调配，团结协作，主动配合，识大体，顾大局，积极完成作战任务，充分发挥了整体作战的威力，发扬了团结奉献的革命精神，对战役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淮海战役胜利的重要保证。思想政治工作

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人民解放军的生命线，是完成作战任务的重要保证。淮海战役是一场战略性的大决战，切实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保证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

（一）中央军委、总前委和两大野战军前委要求各级党委，在努力搞好参战部队物质保障的同时，抓紧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战前，根据战役的作战任务和目标，思想政治工作也提出了相应的内容。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积极召开各种会议，对部队普遍进行了准备打大战、打恶战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广泛宣传毛泽东提出的再有 1 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的论断和全国胜利的形势。华野司令部于 1948 年 10 月在山东曲阜召开了有师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针对战役规模大的特点制定了关于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决议，迅速向各级传达贯彻。中野前委也及时召开了中原军区直属干部会议。动员各级党委要迅速开展以反对无政府状态和反对地方主义、游击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进一步增强部队组织性、纪律性。不仅如此，两大野战军的各级党委根据打大歼灭战的任务，对军队普遍进行了组织整顿，将济南战役中俘虏的数万名国民党军士兵经过思想教育改造及时补充到部队中，以保证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力量。

（二）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不仅在战前广泛开展，而且针对战役持续时间长、战况激烈、作战方向多变，后勤一时无法跟上等特点，深入贯穿到战役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政工人员同指挥员一道深入到主攻、阻援部队中去，深入到阵地战壕中去，做到边打边动员。开展了立功选模、火线庆功、战地诉苦等生动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加强群众性的思想互助活动，并以共产党员带头英勇作战的模范行动和战斗英模的光荣事迹激励斗志。各纵队政治工作部编印自己的战地报送到前线，通过报上的信息交流了解兄弟部队的战绩，互相鼓舞，增强团结。如华野第十三纵队编有《进军报》，中野第六纵队编有《战防报》，华野第二纵队印有《拂晓报》。追歼逃亡的国民党军时，发扬不顾疲劳、不怕伤亡、忍饥耐寒、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阻击国民党援军时，发扬人在阵地战中的英勇气概；攻击国民党军守军时，发扬前仆后继，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敢打硬仗。

（三）人民解放军充分利用思想政治工作瓦解敌人。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采用政治攻势瓦解敌人，是人民解放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面。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充分利用国民党军内部的分歧，将帅之间派系的矛盾，选好切入点，开展



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攻势。参战部队在对国民党军进行强大军事打击的同时，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应把政治攻势当作军事进攻一样重要”的指示，把开展对国民党军政治攻势作为重要的战役任务。通过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所做的工作，争取了国民党军绥靖区万人起义。随后，人民解放军通过政治工作又争取了国民党军廖运周、赵壁光等部共5次起义和投诚。这些具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瓦解了国民党军的士气，破坏了他们的战斗力，而且极好地保存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实力，加快了战役进程。战役第二阶段围歼部队在阵前反复播送刘伯承、陈毅司令员署名的《促黄维立即投降书》，在精神上对国民党官兵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尤其在围歼杜聿明集团时，利用国民党军正处于饥寒交迫、四面楚歌的困境，各部队连续广播毛泽东起草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并运用多种形式开展政治攻势，实施攻心战术，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士气。整个战役，解放军争取国民党军营以上成建制投诚者3.5万余人。

（四）重视改造俘虏，即俘即补，充实部队。各级政治机关坚决贯彻中央军委关于“随战随补，随补随战”的方针，认真抓好溶俘工作，做到“即俘、即查、即教、即补、即打”。中原局下达大力争取改造巩固解放战士的指示，要求各纵队建立俘虏的收容转送训练机构。华野设立庞大的俘虏管理处，各纵队设立相应的俘管机构。利用战斗间隙，通过谈心、诉苦、开展团结互助等活动，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对有技术、有指挥能力的来降士兵很快将他们提拔重用，做到了人用其贤，即俘即补，即教即战。如华野在战前为36.9万人，战役过程中伤亡10.5万人，战役结束时达到55万人，这期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是解放战士。

五、依靠人民支援，做好后勤工作，为战役胜利提供了可靠保障。“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不仅依靠广大指战员的无私奉献、舍生忘死、英勇顽强地与敌人殊死奋战，还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淮海战役是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农村进行的。战役规模空前，作战时间久、战区广、战况变化快，物资供应量和伤员转送量都很大。因此，组织好后勤保障，成为夺取战役胜利的关键一环。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原局和华北局紧紧依靠人民，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使解放军的后勤保障建立在广大人民全力支援的坚实基础之上。后勤支前工作在总前委的统筹指挥和精心筹划下，组织严密、机构健全、动作协调、反应灵敏，形成强有力的保障系统，对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

要的保障作用。

（一）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后勤支前工作。战役发起前，中央军委明确指出：淮海战役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包括后勤工作在内的作战所需的各个方面，一定要充分准备好，才能行动。中央军委还委派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参加华野召开的曲阜会议，筹划战役后勤事宜。中野供给部长刘岱峰、华野后勤部长刘瑞龙分别负责野战军的后勤工作。当战役规模扩大后，军委指示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解放军的供给。根据战役形势的变化，又指示总前委：必须会同战区地方党委统筹解决全部军队及民伕 3～5 个月的粮草、弹药，10～20 万伤员的医治。1948 年 12 月 26 日，总前委在徐州召开了华东、华中、中原、冀鲁豫四方面参加的联合支前会议，对于协调各地区的支前工作，圆满完成支前任务，以及支援部队而后的南下作战都起了重要作用。

（二）各级党政机关建立强有力的后勤支前领导机构，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军委、总前委关于后勤支前的指示，落实支前任务。中原局由邓子恢、张际春、李达负责中原区的后勤支前工作，成立了中原运输司令部、豫皖苏后勤司令部和豫西军区支前司令部。华东局建立了以傅秋涛为主任委员的华东支前委员会，以及华中支前司令部和鲁中南、渤海支前委员会。华北局成立了以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致远、政治委员韩哲一、副司令员袁子扬为领导的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等支前领导机构。各级支前领导机关制定了工作计划和各项措施，展开了紧张的组织动员工作，积极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全力以赴支援前线。

（三）周密计划，严密组织，科学调度支前大军。后勤保障根据人数多、地域广、任务重、运输工具落后、战线移动迅速的特点，统一制定了周密的支前方案、严格的工作制度以及完善的服务与管理措施。支前机构组织动员全体民工在辽阔的战场上建立了数百处民站、兵站、粮站，数十处后方医院和伤员转运站，开辟了 10 余条水陆运输线和许多条运输支线，从后方到前方形成了严密的运输网。他们按民工们服务期限和任务的不同将其分为随军常备民工、二线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 3 种类型，管理上实施“把支前民工队当成学校办”的方针，将他们按班、排、连、营组织起来，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四）广泛深入动员、调动广大群众的支前热情。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号召下，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认真执行了“耕战互助”、“人力合理负



担”等正确的方针政策，解放区和临近战区的广大群众以极大的革命热情，不惜“倾家荡产”、历尽艰辛，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自己的子弟兵。来自苏、鲁、豫、皖、冀五省的广大民工云集战场，支援子弟兵作战。后方群众不分男女老幼，积极参加冬耕生产，昼夜突击碾米磨面，加工军粮，赶做军鞋、军衣，筹集粮草，照料伤员。整个战役，动员了支前民工，包括随军常备民工、二线转运常备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共543万人（不包括后方碾米、磨面、做军鞋等广大群众），为参战部队的9倍。动用了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余辆、挑子35.5万副、船只8 500余艘、汽车257辆。向前线共运送了1 460多万斤弹药、9.6亿斤粮食等大量军需物资，并向后方转送了11万名伤员，出色地完成了艰巨的运输任务。广大群众一心一意支援前线，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给子弟兵以极大的支持与鼓舞。

（五）组织广大群众和民兵参军参战，支援主力部队。人民群众热烈响应党和政府“到前线去，到主力去”的号召，掀起了参军热潮。战役前后，仅山东省就动员16.8万名青壮年入伍，强大的后备兵团源源开赴前线。广大民兵，担负了保卫生产、护送物资、保护交通、清剿土匪、维持治安、捕捉散兵、看押俘虏、打扫战场等繁重的战勤任务，积极配合解放军作战。战役中，有40万地方武装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主力作战，成为支援主力部队作战的一支强大力量。“以战养战”，动员新区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参战部队坚决执行“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的原则和一切缴获要归公的纪律，有计划地使用缴获的物资，注意节约，爱惜民力，减轻人民负担。此外，还充分利用新解放城市的人力、物力和运输力支援前线。广大工人在“加强建设，支援战争”口号的鼓舞下，加紧恢复民用和军工生产，奋力抢修公路、铁路、桥梁，使津浦、陇海、平汉、胶济铁路逐段提前通车。及时修复电话、邮政线路，保证了前后方的运输和通讯联络。

淮海战役的失利，军事上使蒋介石在南线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尤其是嫡系部队中的骨干，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和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全军覆没，其中还包括被称为“五大主力”的第五军和第十八军（五大主力其他三支部队分别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歼的整编第七十四师、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歼的新一军和新六军）。从而也就失去了蒋介石赖以支持战争的中坚力量。淮河以北完全被解放，淮南大部也为解放军所控制，江北只剩一个重要城市安庆在国军控制下，解放军已直逼长江，下一步攻击矛头直指蒋介石统治的核心地区——江浙沪地区。就全国战局而言，辽沈、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五大战略集团中，最强大的战略集团徐州集团和东北集团已不复存在，

华北集团也危在旦夕，尚存的华中、西安两集团，在解放军不断打击下，也受到很大削弱，而新组建的京沪杭汤恩伯集团，实力很弱，这三个集团已构不成主力集团。黄河以北绝大部分已是解放区，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基本是解放区，国民党只得凭借长江天险占据江南半壁，但随着精锐主力的丧失，也已缺乏足够的兵力来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国民党政治上的危机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进一步加剧，派系间的权利争斗，趋于白热化。白崇禧利用国民党政权极为不利的形势，于1948年12月25日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并随即得到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参议会的支持。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提出与中共和平谈判。然而此时，要和要战的主动权已不在国民党手中了。行政院院长孙科未经蒋介石批准，就率行政院迁往广州，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并表示反对与中共谈判，号召继续与中共进行战争，企图在外国势力支持下，经营华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上海，已是人心浮动，惶惑不安。各轮船公司奉命在南京、上海集中船只，以供国民党政府紧急征用。各级政府官员，争相逃往香港、台湾。故宫博物院文物也开始撤离南京迁往台湾。就连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人员及家属也忙于撤退。李宗仁回忆到：徐蚌会战已近尾声时，中共全盘胜利已成定局，京沪震动，人心惶惶，国内外许多民意机关，甚至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都认为前途无望。淮海战役结束的第11天，因为军事上的惨败和政治上的孤立，蒋介石只得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经过精心策划和部署，于1949年1月21日，以“因故不能视事”宣布下野引退，将总统之职交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自己回到家乡浙江奉化溪口，在幕后遥控指挥。

淮海战役国民党主力兵团全部被歼，致使国民党军再无力与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达维将军在给美国陆军部的报告中说：由于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失败所造成的耻辱，纵令时间容许，国民党政府是否能在华南取得必要的支持，动员这一地区的人力，以重建其军队，实属极端令人怀疑。国民党的完全失败，已是不可避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则认为：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实际上是崩溃了。

淮海战役的意义正如毛泽东在战役结束后的第4天，即1949年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所说，现在，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和装备上均优于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至此，中国人民才开始吐了一口气。现在情况很明显，只要解放军向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攻击，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亡。



平津战役前敌我战略态势和作战部署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略决战，是由环环相扣的三大战役所组成，当淮海战役还在激烈鏖战之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及时组织了平津战役。

辽沈战役全歼卫立煌集团，东北全境解放，这对蒋介石、国民党和华北的傅作义都是一个极大的压力。面对极为不利的严峻形势，华北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是固守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地区，还是进行战略撤退，蒋介石于 1947 年 10 月决定放弃承德等次要城市，缩短战线集结五个军机动，准备必要时南下华中，后又改为集中兵力坚守北平、天津、塘沽等地。

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在华北人民解放军的不断打击下，到 1948 年秋，有 4 个兵团 12 个军 42 个师，连同其他部队共有 50 万人，据守在东起北宁路的山海关，西到平绥路的张家口一线约 500 公里的狭长地带内。控制山海关、唐山、塘沽、天津、北平、张家口、承德、保定等铁路干线及大城市。此外，华北地区还有太原绥靖公署的阎锡山 6 个军 16 个师，11 万人困守太原大同两城，董其武部 6 万余人控制绥远的归绥、包头等地，第十二绥靖区陈鼎勋第四十军守卫新乡、安阳。整个华北地区国民党总兵力接近 70 万人，其中主力是傅作义集团。傅作义所属 42 个师，其中 17 个师是傅作义的晋绥军系统，另外 25 个师是蒋介石的中央系。

到了 1948 年 11 月，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淮海战役的全面开始，卫立煌集团已全军覆没，刘峙集团正面临着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联合打击，自顾不暇。华北局势更趋恶化，南北两面的屏障已不复存在，而且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随时会入关作战，首当其冲的就是华北的傅作义集团，是向江南撤守还是固守平津，难于抉择。

11 月 3 日，南京国防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华北战局，国防部长何应钦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乘华东解放军主力正集结在徐州附近，济南地区兵力

空虚之机，傅作义部南下袭取济南，这样既可撤出华北部队，又可牵制华东解放军，减轻徐州刘峙集团的压力。但从平津到济南，沿途近千里都是解放区，一路上必会受到重大损失。二是傅作义全军轻装前进，由塘沽海运青岛，再海运江南。蒋介石基本同意华北部队南撤，但考虑到华北地区一直由傅作义全权主持，就于 11 月 4 日急召傅到南京，共商华北大计。蒋介石、傅作义以及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研究华北战局后。蒋介石认为虽然东北失利，但华北国民党军兵力、装备、指挥都占优势，只要加强兵力，整个战局就可保无忧。傅作义虽然意识到东北不保，华北也难独存，但自恃还有相当的实力，局势虽严重，还不至于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而蒋、傅对华北形势的判断，主要建立在东北野战军不会很快入关作战的错误估计上，他们认为东北野战军经过 50 多天的激战，非数月休整补充才能入关作战，而华北解放军的 3 个兵团，正分别围攻太原、西出归绥、南下平保线，兵力分散无法立即发起战役。所以认为在 1948 年内，华北地区不会发生战斗。

蒋介石主张：放弃平津，全军南撤。撤的方案有两个：一是海运上海，或布在长江防线或加强徐蚌战场，会同刘峙集团与解放军决战；二是自陆路南下，攻占济南，而后在山东地区配合刘峙集团作战。蒋介石曾表示，委任傅作义为“东南行政长官”统一指挥国民党全部军队。但傅作义深知蒋介石的为人，自己南撤以后华北丢失，东北卫立煌已“停职查办”，遭到软禁就是自己的前车之鉴。况且他对平、津防御是早有考虑的，在东北未解决前，他采取机动防御战术，以北平为中心，以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区为作战重点，以精锐主力兵团在北宁、平绥、平保铁路沿线往返机动作战。当辽沈战役开始后，傅作义感到危机，便已经和参谋人员拟定了作战方案：第一方案是适时放弃平津等城市，全军退往绥远。第二方案是放弃承德、张家口、保定，以一部控制北平，主力集中守天津、塘沽，确保出海口。第三方案是在必要时将傅系部队撤往绥远，将蒋系部队集中于天津、塘沽，以便各自行动。傅作义倾向第二方案。实际上，华北国民党军只有西撤绥远和南撤江南两条路。傅作义是不愿南撤江南的，因为一来其嫡系多为绥远人，很难将其带往江南；二来他担心自己虽然被蒋器重，握有华北地区军政大权，但毕竟不是蒋的嫡系，一旦离开起家的根据地，寄人篱下，不可避免将受到排挤甚至吞并。相对而言西退绥远是比较可行的，既可带走自己的嫡系部队，又可摆脱蒋的制肘。但退绥远也有困难，只能带走他的嫡系，带不走蒋系部队；而且绥远地广人稀，物资匮乏，补给困难，难以维持大军的长期生存；



再者还有西北的马鸿逵，双方还有矛盾，无法合作。

对于傅作义而言，最理想的是守住平津，尽量扩充实力，争取美国的援助，以待时局变化。而美国对蒋介石已失去了信心，为维护其在华利益，转而扶植地方实力派，傅作义则是美国比较中意的，为此作出了直接援助傅作义的决定，并于 1947 年 7 月向傅提供了价值 1 600 万美元的战略物资。这也增强了傅作义固守平津的信心。所以傅作义以主战派的姿态出现，力排众议，极力主张坚守华北，提出自己的“固守平津唐倚海作战”的方案。认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坚持固守平津，不到万不得已不应南撤。而此时蒋介石对于华北的撤、守决策，也是非常矛盾。一方面徐州地区的决战即将开始，倘若丢掉徐州，就会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南京、上海，所以急需向徐州增兵，而当时的全国战场上，只有傅作义所部是唯一还能调动的，因此蒋介石是很想将傅部南撤的。另一方面，放弃华北，不仅在政治上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如何将数十万部队安全撤出也是难题，从陆路撤，要经过连绵千里的解放区，其间还有黄河天险，成功的把握极小；从海路撤，一来没有足够的船只，二来渤海的封冻期即将开始，时间上也来不及。

蒋介石采纳了傅作义的意见，坚守华北地区，采取一部守北平，主力确保天津、塘沽的出海口，以便在必要时经海路南撤。为鼓舞傅作义坚守华北，蒋介石不仅将华北地区的党、政、军、财大权全部交给傅，而且将美国援助的 7 万支步枪和 2 亿发子弹拨给傅，并允许傅可不经南京批准直接接受美国援助。对蒋介石来说，可以牵制东北华北野战军，争取部署长江防线和训练新兵的时间，对傅作义来说，也可以争取时间取得美援，扩充军力。伺机西撤绥远。最后蒋介石决定：采取暂时固守平津地区，同时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时局变化的方针。即“暂收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

傅作义从 11 月中旬开始，先后收缩兵力，主动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全面调整部署：以第十七兵团率 5 个军 16 个师防守廊坊天津塘沽一线；以第四第九兵团所属 6 个军 18 个师守备北平、南口。密云、通县等地；以第十一兵团所属 1 个军 8 个师守备张家口、宣化等地。傅作义这个“一字长蛇阵”将中央军主要部署在北平天津塘沽一线，把自己的嫡系部队部署在北平到张家口的平绥铁路中段，一旦情况紧急，必须放弃平津时，中央军和傅作义部就可分头东西撤退。这样的部署也就形成了三个防

区：天津塘沽防区、北平防区、张家口防区。三个防区总共兵力50多万人。同时，派出一个军守卫归绥，一个师驻守大同。

解决华北国民党军的问题早已提上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议程。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并设立华北中央局，由刘少奇、薄一波、聂荣臻书记；组建华北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薄一波任政委；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由董必武任主席。9月，正式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10月，成立了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华北、华东、西北地区的财政经济、金融贸易和交通工作。华北解放区的统一和华北地区党政军最高领导机构的建立，不仅对加强华北解放区的建设，加速华北解放战争的进程，而且对统一组织调动华北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战争都有着重要意义。

华北解放区包括南到陇海路，东到津浦路以东，北到平绥路以北，西到同蒲路，面积23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63亿亩，县以上城镇176座，人口4 400万，其中党员100万。华北地区解放军的力量在两年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48年9月，已拥有野战军3个兵团，11个步兵纵队，共31个步兵旅，2个炮兵旅，约25万人。除野战军外华北军区还下辖7个2级军区，军区部队21万人，全区兵力合计46万人。1947年底到1948年上半年，在新式整军运动的基础上，普遍开展了整党与学习运动，进一步提高了全军的政治、军事素质。同时统一了军区部队的后勤组织，军分区以上设后勤司令部，县以下设后勤指挥部，以加强后勤供给和支前工作的组织领导。

在辽沈战役即将胜利的时候中央军委就于10月29日致电东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示以2个纵队，3个独立师组成先遣兵团，进到"玉田、蓟州、三河、宝坻地区，可以威胁平谷、平津、津榆三线"，[①]主力在辽沈战役结束以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②]

此时，东野主力正位于锦州、沈阳、营口地区休整。华北野战军第二、三兵团发起察绥战役，解放了绥远和察南的广大地区，正包围归绥，严重威胁华北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的后方。华北第一兵团于10月5日发起太原战役，包围太原，完全切断了傅作义与阎锡山两集团的联系。在北平以南地



区，华北七纵攻占固安，孤立了保定。华北十四纵包围新乡、安阳。这些作战，削弱了华北国民党军的实力。10 月 30 日，东北国民党军主力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华北局势更加不利。华北第二兵团到达定县、曲阳地区，东北先遣兵团到达蓟县、遵化地区，从南北两面对北平构成极大威胁。尤其是东北先遣兵团入关，大大增加了华北地区解放军的兵力，并为东北野战军主力的入关和以后发动平津战役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傅作义集团丧失屏障，面临华北、东北野战军的夹击，腹背受敌，如惊弓之鸟，随时可能西撤或南撤。然而无论是西撤绥远还是南撤江淮，都对未来的战局发展不利。11 月 7 日中央军委在给东北华北两军的领导人电报中分析傅作义可能采取的 3 种动向：一、固守平津；二、放弃平津，傅作义嫡系西撤归绥，蒋系南撤南京；三、全军撤至南京一带。军委认为，第一种方针对我们是有利的；二、三两种方针对我们有不利之处，但是可不战而得平津。因此要求华北东北各部密切注意平津、张家口、唐山、锦西、葫芦岛蒋傅两系军队的动态。还要求华北军区以一部分地方武装加强给东北先遣兵团，以使先遣兵团能单独对付傅敌一部，尤重在抑留傅敌于平津保地区，不使西退，亦不使其得由海上南撤。

11 月 16 日，中央军委要求林罗刘率部“你们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休整，则敌无从从海上逃跑。”[③]第二天又再次致电林罗刘进一步说明早日入关的理由：从全局来看，抑留蒋系 24 个师及傅系步骑 16 个师于华北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同时也认为，依华北现有兵力，无法完成抑留工作。因此要求林罗刘考虑东北野战军或仍按原计划休整到 12 月然后入关，或提前入关进到华北休整这 2 个方案以“何者为宜”，电复军委。18 日，军委未待林罗刘复电立即决定东北野战军“于 21 日货 22 日全军或至少 8 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入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隔断国民党军从海上南撤的退路。为了麻痹傅作义和蒋介石，毛泽东又命令：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停攻太原，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撤围归绥，以稳定傅作义集团，不使其感到孤立而早日撤逃；然后，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出击北平至张家口一线，隔断北平与张家口的联系，以便抓住傅系部队，拖住蒋系部队，为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争取时间；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以后暂停休整，立即秘密入关。11 月 20 日，毛泽东中央军委电告林罗刘、程黄、杨罗耿、东北局，就东北野战军入关的问题作了详细的部署：

以锦州新民营口地区部队先行秘密开动，主力部队夜行晓宿、行动十分隐蔽，并抄捷径不要走山海关、采取神速动作；在主力部队启程后，要求东北局及林彪、罗荣桓、谭政安排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同时要求林罗刘携带轻便指挥机构离开东北一星期左右，要特别在沈阳报上刊登出一条表示林彪尚在沈阳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

至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会同华北野战军联合作战，抑留并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张地区的战略部署形成。

人民解放军进行平津战役的部队有：东北野战军 12 个军、1 个铁道纵队和特种兵共 80 余万人，华北军区 7 个纵队、1 个炮兵旅共 13 万余人，连同驻察哈尔（今分属内蒙古、河北省）、绥远边界地区的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和东北军区所属冀热察、内蒙古、冀东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北岳、冀中、冀南军区等地方部队，总计 100 万余人。两大战略区三个兵团联合作战，在东北、华北地区还是第一次，为加强统一指挥，中央军委决定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入关前由军委直接指挥，在林、罗、刘入关后即由林、罗、刘指挥。12 月 6 日，又决定当华北第二兵团到达宣化地区后，华北第二、第三兵团由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指挥，当东北先遣兵团到达怀来后，以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七人组成平绥前线委员会，以程子华为书记，罗瑞卿为副书记，统一领导平绥线作战及粮食、弹药、俘虏等事宜，以全歼张家口、宣化、怀来地区国民党军十三个师并占领张、宣、怀为目标，力争一个月完成任务。1949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致电林罗聂平津前线各兵团，平津两市委，两军管会，华北局，东北局：为着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并于而后一个时期内（大约有三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为了一起工作起见，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同志组织总前委，林彪为书记，所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粮食、货币外交文化党务及其他各项重要工作均归其管辖，以一事权而免分歧。两市委，两军管会关于上述工作均直向总前委请示，由总前委向中央负责。

为保证后勤补给，中央军委要求东北局、华北局，东北军区和华北军区，密切配合全力组织。预计整个战役需五个月，规定由东北负担三个月，华北负担两个月。而平绥线作战两个月的粮食需要由北岳、热察两区负责，考虑到这一地区粮食比较困难，特别指示要用尽一切办法保障供应。根据这一部署，华北军区在平绥线东段建立了统一的支前指挥部，沿平绥线建立了

四条补给线，开设了一百多个供应站。华北局还制定了保障参战部队两个月的供应计划，由冀中、北岳两区组成平津战役联合后勤指挥部，全力支前，计划提供粮食 1.1 亿斤，食油 280 万斤，马料 6720 万斤，马草 1.1 亿斤。后来实际供应量大大超过计划。华北局号召全区党政军民紧急动员，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在支前过程中，要先东北部队，后华北部队；先野战部队，后地方部队。为迎接东北野战军入关，华北局组织广大群众在部队入关的沿途，抢修道路、桥梁，并组织了热烈的欢迎和慰问。而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为保障部队入关需要，建立了军区司令部运输部和后勤运输部，并以两个后勤分部先行入关，布置兵站线。铁道纵队加紧抢修北宁线铁路，以保障物资、粮食、弹药的运输。

注释：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平津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4 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 442 页。

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5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26 页。

分割傅作义 攻打新张

11月23日开始，东北野战军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10个纵队的主力分别从锦州、沈阳、营口地区，秘密地取捷径以最快的速度向关内进军。隐蔽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地区开进。在东野秘密入关的同时，中央军委又命令华北第二兵团、第三兵团，以及先期到达华北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进击平绥路，以吸引傅作义西顾。

11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并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华北局黄志勇、程子华、林罗刘电指出："成武率主力三个纵队于明二十五日由现地出发，以六天时间（愈快愈好）到达张家口附近，然后以两个纵队包围张家口西南周家河、怀安两地之敌（210师及骑11旅），以一个纵队插入张家口、宣化之间，隔断张宣两处敌人的联系""总之，以抓住一批敌人不使向东跑掉为原则。抓住并包围之后，不要攻击，等候东北主力入关（守秘）围歼敌人之后，再相机攻击。"①26日，毛泽东中央军委再次电告杨罗耿并杨成武、李天焕："令杨罗耿由曲阳进至涿县、涞水以西，必要时加至平张线，拖住几部敌人。"同日，致电林罗刘提出作战计划：东北野战军主力的"第一个作战应不是唐山，而是在平津线上之廊坊等地……达成切断平、津联系（一条铁路及一条公路）的任务。"②电报最后指出："在你们没有切断平、津以前去包围唐山，有调动北平敌人到津、唐作战或从海路陆路跑掉的危险。"③

27日，毛泽东中央军委致电林罗刘，程黄，杨罗耿，杨李并告华北局做出战役部署："吸引傅作义部几个军于平张线上，并歼灭该线各军之一部或大部，借此使林罗主力十二月进至冀东以后，顺利地切断平津、津唐诸线歼灭数部敌人打开主要地区的战局之目的……只要你们在十二月份内能抓住扭打上述步骑十六个师旅于平张线上，并歼灭其一部，打得该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极大的战略上胜利。"④

29日，平津战役开始，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对平、津、张守军实行"围



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原则，华北军区第三兵团突然首先向张家口外围国民党军发起攻击，至12月2日，先后占领柴沟堡、万全、沙岭子等地，对张家口形成包围态势。傅作义判断，华北军区部队对张家口的进攻是一次局部行动，决心乘东北野战军尚未入关之际，集中主力首先击破华北军区部队的进攻，然后以逸待劳，迎击东北野战军的攻势。遂令其主力第三十五军（欠1个师）及第一百零四军第二百五十六师分由丰台、怀来乘汽车连夜向张家口驰援；令驻昌平的第一百零四军（欠1个师）移至怀来，驻涿县（今涿州）的第十六军移至南口、昌平，以确保北平与张家口的交通联系。

中共中央军委鉴于吸引傅系主力西援的目的已经达成，于12月2日命令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率第三、第四、第八纵队由易县、紫荆关向涿鹿、下花园急进，切断怀来、宣化间的联系；命令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率第四十一军、第四十八军等部组成的先遣兵团，由蓟县向怀来、南口急进，切断北平、怀来间的联系。该两兵团到达后，协同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抓住平张线上的守军与援军，使其既不能西逃，亦不能东撤。

12月11日，毛泽东就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和具体部署问题，致电林罗刘提出“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原则：“现在唯一的或主要的是害怕敌人从海上逃跑。”指示，尤其不可将南口以西诸点都打掉，以免南口以东诸点之敌狂逃。“我华北杨罗耿兵团以九个师包围三十五军三个师，是绝对优势。他们提出早日歼灭该敌，我们拟要他们暂时不要打，以便吸引平津之敌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十二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数日内即取神速动作，以三纵（由北平东郊东调）、六纵、七纵、八纵、九纵、十纵等六个纵队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之敌……我华北杨罗耿兵团应于四纵移动之前歼灭新保安之敌。东面则应依情况，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

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敌，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为着不使敌人向青岛逃跑，我们准备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为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该鼓励部队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唐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⑤随后又指示华北军区抽调部队，控制保定、石家庄、沧州一线，准备搜捕由平津溃散南逃之敌。根据上述指示，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以防止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向东、向西突围为重点，构筑多道阻击阵地，待命攻击；东北野战军主力克服疲劳、寒冷等困难，乘机插入北平、天津和天津、塘沽之间。

傅作义发现人民解放军骤然逼近平、津，已陷入欲逃不能、欲守亦难的困境，于是匆忙放弃南口、涿县、卢沟桥、通县及唐山、芦台、廊坊等地，向北平、天津、塘沽收缩兵力。将第六十二军（欠 1 个师）、第八十六军由丰台、芦台开往天津，将第八十七军由唐山开往塘沽，并将北平和天津、塘沽划为两个防区，实行分区防御。随时准备应付可能迅速发展的变化。

根据中央军委"隔而不围"的部署，林彪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以迅速、勇猛的动作，插入北平、天津、塘沽之间，切断各点之联系，具体部署是：以第二、七、八、九、十二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主力左路，由林彪直接指挥，隔断天津、塘沽、唐山之敌联系。以第一、三、六、十纵队和华北七纵为中路，由第一兵团指挥，切断北平与天津联系，并从东、南两面威胁北平。以第四、五、十一纵队为右路，由第二兵团指挥，从北、西两面进逼北平。为激励全军英勇作战，林彪、罗荣桓于 12 月 11 日、12 日连续向各纵队、师下达《目前作战的政工动员》、《关于平津作战政治鼓动》，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人员，全力进行作战动员和鼓动。12 月 12 日，东北野战军按预定部署分三路，全力向平、津、塘地区挺进。左路各部队，九纵 13 日占领唐山，14 日占领芦台，19 日八纵占领天津以北重要据点杨村，九纵占领津、塘之间的军粮城，七纵已到达北塘、新河地区。20 日八纵攻占津北外围的北沟、北仓、宜兴埠等据点，随即南渡海河。同一天，九纵攻占津东外围的欢坨、范家庄、张贵庄及飞机场，进而占领塘沽以北的重要据点新河，并从军粮城强渡海河。21 日，八纵攻占津西重镇杨柳青，九纵进占咸水沽，切断了天津、塘沽之间的水陆联系。22 日 ，八纵进至白塘口、双港一线，切



断天津守军向大沽口的退路。第十二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也正加速向津、塘地区前进。至此，左路大军切断了津、塘之间的联系，并形成了对天津、塘沽的战略包围。中路各部队直插北平、天津之间，13日东北三纵进占北平以东牛堡屯、马驹桥一线，华北七纵占领房山、良乡。14日，第十纵队攻占平、津之间重镇廊坊。15日，华北七纵进占黄村、庞各庄、安定一线。16日，第六纵队占领永乐店、马头镇、张各庄、安平镇。17日，三纵攻占了北平以南的重要据点南苑机场，缴获飞机25架。19日，三纵击退了国民党军对南苑机场的反击，并乘胜逼近北平东南郊的五里店、马道一线。与此同时，一纵也已赶到。至此，中路大军切断了北平与天津之间的联系，并从东、南两面逼近北平城郊。右路各部队于14日到达南口、八达岭一线，其中五纵占领北平西南重镇宛平、丰台，十一纵占领西郊机场。15日和16日，第十一纵队相继攻占海淀、门头沟、西黄庄和石景山。17日，第五、十一纵队直逼西直门和德胜门，与中路部队一起构成了对北平的战略包围。同一时间里，华北军区将冀中、冀南军区部队部署于保定、石家庄、沧州地区，以防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经平汉线、津浦线南逃，并准备堵截从平津地区可能溃散下来的零星部队。当东北野战军主力对平、津、塘地区的国民党军实施“隔而不围”的同时，华北第二、三兵团对新保安和张家口的国民党军实施“围而不打”，组织严密包围，但不做攻击。

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在行进途中攻克密云，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三军1个师，而后主力继续南进；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进至涿鹿以南待机。傅作义得知密云失守后，感到北平受到威胁，急令第三十五军由张家口星夜东返；令第一百零四军主力及第十六军由怀来、南口向西接应；令第九十四军（欠1个师）及第九十二、第六十二军由杨村、崔黄口、芦台地区开往北平，加强防御。12月6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乘汽车东撤，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十二旅在冀热察军区部队配合下节节阻击，将其滞留于新保安地区。接着，第二兵团主力赶到新保安以东，并于8、9两日打退了第三十五军及第一百零四军主力的东西夹击，将第三十五军包围于新保安。9日晚，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前出到怀来、康庄、南口间。进至康庄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军指挥所及2个师，惧怕被歼，掉头向北平撤逃，10日被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所属第四十一军歼灭于康庄东南地区。国民党军第一百零四军主力发现腹背受到威胁，又得知第十六军已经东逃，即放弃接应第三十五军的计划，由新保安以东地区经怀来向北平撤逃。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各部队立即展开追击

和堵击，于11日在怀来县城以南的横岭、白羊城一带将其全部歼灭。与此同时，华北军区第三兵团解放宣化，并于7日在沙岭子追歼由宣化向张家口撤逃的傅系第一百零一军第二百七十一师，8日完成对张家口的包围。随后，由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指挥的北岳军区部队、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骑兵旅和内蒙古军区骑兵第11师等部攻克张北，歼灭守军一部，孤立了张家口。

在此期间，东北野战军主力第1梯队6个军，由喜峰口、冷口越过长城，到达河北省蓟县、玉田、丰润地区。东野指挥机关也到达此蓟县。此时，人民解放军虽已切断傅作义集团西逃的道路，但尚未切断其南逃的道路。同时，在淮海战场，人民解放军继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正在围歼黄维兵团，又在徐州西南包围了由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率领的3个兵团。

中央军委认为傅作义集团向西安、郑州、徐州、绥远撤退的可能极小，因为有西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一兵团可以阻止其向西安；华东、中原野战军可以阻止其向郑州；平绥路上有华北、东北野战军的八个纵队可以阻止其向绥远。向青岛撤退有一定可能，虽然在天津到济南、青岛之间没有解放军的大兵团，但因为由天津经济南到青岛，比徐州到青岛的路程要远，华东野战军完全可以赶到其前面实施截击，所以这一可能性也不大。该集团撤退的最大可能是从海路，因为东北野战军刚刚到达冀东，距平、津、塘地区还有数天的路程，而且平津铁路和津塘公路尚未被切断，塘沽这一出海口也控制在国民党军手中。如果南线的华东、中原野战军解决了杜聿明集团，必会引起国民党军全局动摇，极有可能将现集中在上海的数十艘船只北上接走平、津、塘地区的部队，因此，傅作义集团唯一的或者说主要的可能是从海路撤退。

为彻底消除其从海上撤退的可能，实现就地歼灭该集团于平津地区的既定方针，中央军委于12月11日提出了“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战略部署。也就是从12月11日到12月25日，对平张线上的张家口、新保安之敌，只作战役包围，不作战术攻击；而对北平、天津、塘沽等地之敌只作战略分割，隔断各地之间的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为在12月25日以前完成部署，东北野战军应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挨饥，在完成部署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与此同时，还采取了以下措施：为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各部南下，命令华东、中原野战军留下杜聿明集团余部，在两星期不作最后攻击之部署。为防止其向青岛撤退，命令华东军区集中一部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预作准备。为防止该集团沿平汉



路、津浦路南撤，命令华北军区集中一切可用的力量，进行阻击的准备。

至12月15日，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指挥第四十一军、第四十二军、第四十八军占领南口、丰台、卢沟桥，从北面和西南面包围了北平；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政治委员肖华指挥第四十军、第四十三军、第四十七军军及华北军区第七纵队占领通县、采育镇、廊坊及黄村（今大兴），从东北面和东南面包围了北平，17日又攻占南苑飞机场。至20日，东北野战军第四十六军、第四十五军、第四十四军占领唐山、军粮城、咸水沽、杨柳青、杨村等地，切断了天津、塘沽间的联系；东北野战军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九军及特种兵部队正由宝坻、汉沽、山海关向平津疾进。至此，人民解放军已将傅作义集团全部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等地，封闭了其西逃和南逃的一切道路，使傅作义集团的“长蛇阵”被切为数段，完成了对其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其由“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完全实现了中央军委提出的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就地歼灭的战略意图。

按照中央军委原定计划，在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后，即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原则，由东北野战军攻击平、津、塘、唐地区的国民党军，由华北第二、第三兵团攻击平绥线上新保安、张家口和归绥三处之敌。12月15日，中央军委获悉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董其武派新编第七师从归绥出发，准备接应张家口之敌突围。从全歼平绥线之敌，解放绥远全境的考虑出发，于12月19日制定了平绥线作战计划：当东北四纵到达张家口后，华北第二兵团即开始攻击新保安，争取五天解决战斗。然后休整10天，经大同以南隐蔽向归绥运动，以一部包围归绥，吸引新编第七师回援；另一部则消灭回援之敌，再全力攻击归绥。在第二兵团攻击归绥的同时，第三兵团开始攻击张家口。这一计划的目的是不使归绥的国民党军退往河套地区，增加以后作战的困难。只是东北四纵就无法参加平津地区的作战了，为此毛泽东特意征求了林彪的意见，林彪表示第四纵队可以不参加平津地区作战，同意这一计划。

新保安位于平张公路中间，面积仅一平方公里，是个有千余户人家的小镇。三十五军被围后，军长郭景云多次与部下研究突围方案，一是徒步向南，只要到达南山就可脱险；二是向大同突围，由于途中多河流、山地，也不能带汽车。但郭景云深知这四百多辆汽车是傅作义的心头肉，始终下不了轻装突围的决心。请示傅作义后，决定固守待援。随即加紧构筑工事，进行

防御准备。除依托城墙、房屋构筑碉堡、火力点外，还将所有汽车布置在各主要街道的路口，作为屏障。以二百六十七师守东半城，一百零一师守西半城。为协调各部防守，还成立了新保安防守司令部。在三十五军陷入重围后，傅作义组织的增援失败后，除了派飞机空投粮弹接济，发电报鼓励打气外，无计可施。

第二兵团尽管拥有兵力、火力上的优势，又无敌增援顾虑，仍进行了精心准备。首先大力开展土工作业，挖掘了长达数万米的交通壕，最近的距敌阵地仅数十米。其次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战地练兵，主攻部队各级指挥反复勘察地形，选择突破口。接着制定了周密的攻城计划，三纵从西南发起攻击，四纵从东面和东北发起攻击，八纵从西北攻击，以八纵二十四旅为总预备队，为加强炮火力量，东北四纵的炮兵团配属作战。最后进行了政治动员与政治攻心，提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以激发战士们高昂的士气；部队在阵地前采取喊话、写标语等攻心战术，第二兵团司令杨得志和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甄华分别写信给三十五军的军、师长，劝其起义或投诚，但均遭拒绝。林彪请示中央军委同意后，12 月 21 日，第二兵团按计划发起攻击，三纵攻占城西的水温泉、和尚庙据点，四纵占领东关和龙王庙，扫清外围。次日十七时，全部占领新保安，全歼三十五军两个师 1.6 万人，军长郭景云自杀，副军长王雷震和一百零一师师长冯梓、二百六十七师师长温汉民被俘。

三十五军是傅作义起家的老部队，装备精良，该军中上层军官都是傅作义一手培养的，是傅作义嫡系中的嫡系，此次被歼对傅作义打击极大。三十五军被歼的当天，中央军委即致电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对全歼新保安之敌表示甚慰，并要求仿照淮海战役中华东、中原野战军即俘即查，即补即战的原则，立即将俘虏补入部队，休整十天后向西攻击归绥。第二兵团随即在新保安地区进行休整。

张家口的守军从 1948 年 6 月起在外围山地共修筑碉堡五百余个。当被围后，更是每天征集五千多民工，日夜施工，加强纵深防御和核心工事，并储备了大量物资，声称足够坚守三个月。在第二兵团歼灭三十五军时，第三兵团已攻占了张家口外围的所有大小据点，特别是张家口西北的黄土岭、树儿山、帽儿山一线制高点，既可以居高临下观察到张家口守军的动静，又可以直接用炮火控制张家口市区北部。当东北四纵到达张家口后，杨成武当即调整了部署。以东北四纵接替一纵之第一、二旅在宁远堡、沙岭子的防务，该两旅则调到张家口西南的孔家庄，二纵位于孔家庄以北和以西，六纵和一



纵的第三旅位于张家口东北及以北，北岳军区部队部署于万全西南。整个部署的重点是防止守军向西和西南突围，而在北面和东北面也布置了部队依山据守。就在三十五军被歼的当天下午，傅作义就密令孙兰峰再守张家口已无意义，相机向绥远突围，并令绥远的董其武积极予以配合。孙兰峰接到密令后当即召开秘密会议进行商议，决定于12月22日分两路突围，步兵五个师以第二百五十九师为前卫出大境门，经张北到商都；骑兵两个旅从七里坊经孔家庄向商都突围，然后再向绥远撤退。

23日拂晓，第三兵团指挥所直接观察到大境门外的守军行动，又接到前沿部队的报告，立即判断张家口守军正全力向北突围，杨成武当即下达围歼突围敌军的命令：一纵第三旅坚守西甸子、朝天洼，坚决阻击敌军。六纵由朝天洼至大境门由北向南攻击。东北四纵之一个师从朝天洼东南由南向北攻击，与六纵形成南北夹击。东北四纵主力和二纵向张家口以北攻击。二纵和一纵第二旅从黄土梁向大境门出击。一纵第一旅、北岳军区部队和内蒙两个骑兵师插到五十家子、麻地营子、汉诺坝、甸门口、广土坝极其东南地区，构筑第二、第三道阻击阵地，并限定各部于23日晚10时到达指定位置。

孙兰峰、袁庆荣组织炮火掩护，以步兵、骑兵轮番攻击。于23日九时占领西甸子，12时占领朝天洼。解放军一纵第三旅和六纵十七旅扼守朝天洼、佛爷山、陶赖庙、黄土窑子一线，死守不退，堵住了守军突围的道路。十六时，二纵、一纵第二旅和东北四纵突入张家口市区，随即出大境门跟踪追击，并在大境门外追歼敌后卫部队万余人。24日拂晓，在解放军前后堵截下，孙兰峰所部被压缩在西甸子、朝天洼、乌拉哈达、黄土窑子之间长不到十公里，宽不足一公里的狭长地区，人马混杂，建制混乱。加上天降大雪，士兵饥寒交迫，陷入绝境。解放军各部全力展开围歼，大胆穿插。至16时，除孙兰峰率少数骑兵逃脱外，其余一个兵团，一个军，五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全部5.4万人被歼。

注释：

①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16页，第520～521页。

②③⑤《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第276页，第360～363页。

解放天津 孤立北平

1948年11月，解放军向平绥线的张家口和新保安进攻时，傅作义将驻天津的九十四军两个师西调平绥线，将第八十六军由秦皇岛调驻天津。当张家口和新保安相继解放，傅作义的嫡系部队被歼后，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迫近平津，傅作义又于12月10日急将第六十二军的两个师从北平、丰台调到天津。

12月11日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在平津交通被切断、北平形成孤立据点的情况下，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于是依据北平、天津和塘沽的现存残余部队，最后对华北地区作出一个“分区防守”计划：指定北平为一个防守区，以第四兵团司令李文兼任司令；天津和塘沽为一个防守区，以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兼任司令，陈长捷兼任副司令；又指定侯镜如兼任塘沽防守司令，第八十七军军长段法兼仟副司令；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兼任天津防守司令，第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兼任副司令。北平、天津、塘沽3个防守区约有50余万人，由华北“剿总”傅作义统一指挥。天津防守区的兵力部署如下：第八十六军3个师，第六十二军两个师，第九十四军1个师，河北省2个保安师，天津市警备旅1个旅；临时增编的有第六十二军第三百一十七师和第九十四军第三百零五师（人员武器不全），加上宪兵第四团、汽车兵团、警察等，共约13万余人。

东北野战军主力全部入关以后，中央军委部署，以四个纵队于北平、通县东南切断平津、通津的联系；以3个纵队包围塘沽，隔断天津、塘沽之间以及芦台、塘沽之间的联系。并随时准备接管平津。12月13日，中央军委任命接管平津两市的领导人员：“聂荣臻为平津区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市市委副书记、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为天津市长”。[①]而在此时，中央军委希望通过谈判争取平津国民党军放下武器，因此派出代表开始与傅作义代表谈判。



中共中央军委原计划先攻塘沽，后打天津。12 月 18 日，中央军委要求以 3 个纵队“从速集中兵力向天津军粮城之间举行攻击，控制该线，并占领军粮城，迅速切断天津与新河、塘沽等处的联系，使天津之敌不能向东集中。”[②]至 20 日，解放军先后攻克天津外围据点，切断国民党军南北西的逃路。天津塘沽完全陷于孤立。杨罗耿兵团于 22 日，24 日分别全歼新保安张家口突围之国民党军队。

塘沽是天津国民党军唯一的退路，东临渤海，其他三面为水渠盐池，不便构筑工事，炮火也很难封锁海口，无法截断其海上退路，既不能对敌形成包围，也不便大部队展开。中央军委判断北平、天津国民党军有突围的可能，因此，建议以少数兵力监视塘沽，集中兵力先打天津。

12 月 29 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计划“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③]并命令第四十一军迅速归建；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全部由平绥铁路沿线东调，协同东北野战军严密包围北平。

天津市有 200 万人口，东距塘沽 50 公里，西距北平 120 公里，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市区狭长，有海河经市区流入渤海，国民党军长期设防，工事坚固。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指挥第六十二军（欠 1 个师）、第八十六军等部 10 个师及非正规军共 13 万人，附山炮、野炮、榴弹炮 60 余门，企图凭恃“大天津堡垒化”的防御体系，进行固守。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决定集中 5 个军共 22 个师，连同特种兵总计 34 万人，附重炮 538 门、坦克 30 辆，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兵器夺取天津。1949 年 1 月 2 日，各攻击部队进至天津周围，至 13 日基本肃清了外围据点。

1949 年 1 月 4 日，刘亚楼在杨柳青召开攻津部队高级将领会议。东野 6 个步兵纵队及特种兵纵队的司令员、政委都出席了会议。刘亚楼在会上确定了作战方针：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东野领导林彪 1 月 7 日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关于攻击天津的作战部署，因“从东西两面能展开大的兵力，故主攻选择在中部”。[④]刘亚楼根据天津国民党军在部署上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坚固、中部兵力和工事均不很强的情况，以及天津地形南北长、东西窄的特点，决定其部署是：以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为西集团，从和平门两侧由西向东实施主要突击；以第四十四、第四十五军为东集团，从民权门两侧由东向西实施主要突击；以第四十六军附第四十九军第一百四十五师，从前后尖山由南向北实施助攻；以第三

十九、第四十五军各一部及东北野战军司令部警卫团从北面实施佯攻；以第四十三军第一百二十八师为预备队。另以第四十九军主力位于军粮城，监视塘沽守军。

为减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指挥夺取天津的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敦促陈长捷仿效长春的郑洞国率部放下武器，和平解放，可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但陈长捷拒不接受这一解决办法。8 日到 10 日，天津市参议会两次派出代表出城和谈，刘亚楼接见并提出四点要求：和平解决天津；一切国民党军队自动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保证国民党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及去留自便；人民解放军停战 24 小时等候答复；如天津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则人民解放军将发动进攻，天津守军的首脑将担负天津遭受战争破坏的责任。

11 日，解放军发出最后通牒，陈长捷拒绝接受和平，同时错误判断解放军主攻方向是北面，做出了防守部署：西北区以第六十二军担任，东北区由第六十八军担任，南区以第九十四军四十三师担任。

这次作战，解放军参战的炮兵和坦克，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多，工兵则是首次参加攻坚作战。各兵种的协同动作，是解放军有史以来攻坚作战规模最大的一次。由于很多部队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刘亚楼亲自写成《关于天津攻坚战的协同计划》，下发给连以上指挥员，对步兵与炮兵、步兵与坦克兵，以及步兵、炮兵、坦克兵之间如何协同作战做了详细的说明。

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命令 3 天内攻下天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在谈判桌上对林彪、聂荣臻表示解放军 30 天也未必能攻下天津！平津战役总前委书记林彪只限定 48 个小时，刘亚楼表态：辽沈战役攻打锦州，我们只用了 31 个小时。现在我有 1 300 多门大炮和坦克装甲部队，再加上 34 万钢铁战士，30 个小时内保证攻下天津。

1 月 14 日 10 时，对天津发起总攻。第三十八军（一纵）、第三十九军（二纵）、第四十四军（七纵）、第四十五军（八纵）、第四十六军（九纵）5 个陆军军、第四十三军（六纵）第一百二十八师（十七师）、第四十九军（十二纵）第一百四十五师（三十四师）共 22 个步兵师及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大部（野炮 4 个营、10 榴 4 个营、重炮 5 个营、重迫击炮 3 个营、高射炮 5 个连、坦克 29 辆、装甲车 30 辆、工兵 4 个营）约 34 万人组成东西 2 个突击集团对天津国民党守军发起总攻。西突击集团由第三十八军（一纵）、第三十九军（二纵）组成，自和平门南北两侧突破，向市区金刚



桥、金汤桥及其以南地区（今解放桥以北）挺进；东突击集团由第四十四军（七纵）、第四十五军（八纵）组成，自民族门、民权门突破，也向市区金刚桥、金汤桥、胜利桥（今北安桥）及其以南地区（今解放桥以北）挺进；南集团由第四十六军（九纵）和第四十九军（十二纵）第一百四十五师（三十四师）组成，在前后尖山、黑牛城、纪家庄和灰堆地段进行辅助攻击。第四十三军（六纵）第一百二十八师（十七师）为总预备队。各部队迅速在东西南 3 面 9 个地段突破城防，15 日晨东西主攻集团于金汤桥会师，将守军分割成数块。而后采取击弱留强，经过激烈战斗，至 15 时攻占这座坚固设防和重点守备的大城市解放天津。

整场战役只用了 29 个小时，全歼陈长捷守敌 13 万人，生俘将级军官 28 人，校级军官 44 人。随后，刘亚楼即令十二纵迅速逼近塘沽。翌日下午发起攻击，突破后即向纵深发展。攻至新港，侯镜如害怕被歼，率主力 5 万人登船南逃（至福建后率部起义），其后卫 3 000 人被全歼。17 日，塘沽遂告解放。

毛泽东接到攻克天津的电报后，高兴地说：华北的问题解决了一大半。他电令刘亚楼用汽车送陈长捷到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见面。天津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也是解放军炮兵、工兵、坦克兵等特种兵参战最多的一次战役。从战役的决心部署到战役的准备和实施，都取得了新的作战经验。天津战役，创造的“天津方式”——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

注释：

①②④《平津战役》，第 159～160 页，第 187 页，第 237～292 页。

③《天津战役》，第 229 页。

和平解放北平

天津解放以后，北平守敌两个兵团部，8 个军部，25 个师，连同其他地方部队，共计 25 万人，完全陷入了绝境。这样就使傅作义作战、守、逃的幻想统统破灭，只能在就地消灭与和平解决之间进行迅速选择了。

北平，拥有 210 万人口，是华北第一大城市。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辽、金、元、明、清及北洋政府均以北平为首都，名胜古迹很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著名的高等学府，国立北平图书馆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馆，藏书达数百万册。完全可以说，当时的北平集中了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尽量保全北平不被战火所毁，中共也希望能进行和谈。

北平守将傅作义，字宜生，早年投笔从戎，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历任天津警备司令、第三十五军军长、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九一八”事变后，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七七”事变后，率部在晋绥地区坚持抗战，先后取得过包头、绥西、五原等多次战役的胜利。1946 年 10 月率部攻占了晋察冀解放区的中心城市张家口，达到了国民党在华北地区军事上的巅峰。但到了 1948 年 10 月，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东北国民党军主力全军覆没，他认识到华北国民党军将面临东北、华北解放军的联合打击，华北国民党军危在旦夕，摆在他面前有三条路：战、和、走。在平津战役期间，傅作义既不愿意为蒋家王朝殉葬，但又不敢直接倒蒋，既不愿意承担破坏北京千年文明文化古都的历史罪人，但又顾虑重重怕在谈判中不为中共和人民所谅解。因此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中央军委分析这种矛盾心理，决定利用傅作义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在军事打击造成有利形势的情况下，争取傅作义率部起义，站在人民的一方。

中共华北局认为傅作义虽然反共日久，但他在抗日战争中与中共曾有过很好的合作，1933 年 6 月中共就派张经武到归绥动员傅作义抗日。1933 年

8 月又派南汉宸和彭雪枫持毛泽东的亲笔信与他会晤。抗战时期，周恩来、彭德怀也多次与他会晤，双方关系融洽，在作战中，多次并肩战斗相互支援。而且与蒋介石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在蒋介石政权即将崩溃之时，是有争取傅作义和平解决北平的可能。因此，指示北平地下党，利用有利的军事形势，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

中共北平地下党对傅作义所作的工作主要一下三条途径：

第一是通过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傅冬菊的公开身份是天津《大公报》的记着，为了开展对傅作义的工作，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指示天津地下党，通过关系将她和丈夫周毅之（中共地下党员）调往常驻北平的记者。1948 年 11 月初，傅作义从南京开完军事会议返回北平以后，傅冬菊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向傅作义正式转达了中共中央希望他放下武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意图，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之后，傅冬菊就以照顾傅作义生活为由，留在傅作义身边。傅冬菊不断劝说傅作义脱离蒋介石跟共产党走，并将傅作义各个方面的情况，包括每天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等及时准确地报告给地下党组织，再转告平津前线司令部和中央军委。这样为人民解放军做出正确的判断，适时制定正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第二是通过傅作义的老师，少将参议刘厚同。刘厚同曾参加辛亥革命，具有民主进步思想，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排除异己的政策非常不满。他与傅作义的私交很深，经常以世事相商。他对傅作义讲：政治是军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能胜利的。南京政府政治腐败，官员贪污腐化，蒋介石所作所为不合人民的愿望，失败是必然的。刘厚同的女儿是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成员，在女儿的影响下，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一定的了解和同情。因此，北平地下党选择刘厚同作为主要的工作对象，有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和杜任之等去做工作，再通过刘厚同达到影响傅作义的目的。随着平津战场形式的发展，刘厚同反复劝说傅作义顺乎人心，当机立断，切不可自我毁灭；一定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文化古都负责，不然将成为千古罪人。刘厚同的劝说对傅作义走和平道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三是通过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堂兄李腾龙做傅作义的工作。李炳泉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傅作义所创办的《平民日报》的记者，其堂兄李腾龙是傅

作义部联络处长。在李炳泉的工作下李腾龙明白了只有与共产党合作才有出路。1948 年 12 月中旬。傅作义让李腾龙找几个真正的共产党来，李腾龙就把李炳泉引荐给傅作义。李炳泉当时传达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意见："欢迎傅先生做出决断，进行和平谈判" 李炳泉便成为傅作义首次派出谈判代表与人民解放军进行谈判的引路人。

通过以上 3 人做傅作义工作的同时，中共北平地下党还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和平解放北平运动，和平解放北平问题成为当时北平人民和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呼声。12 月中旬，傅作义曾邀请徐悲鸿、周炳琳、马衡、朱光潜、黄觉非等 20 多名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到中南海座谈对时局的意见。到会人士一致认为只有和平，别无他途。徐悲鸿先生说："北平两百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战则败，和则安，这已是目前的常识问题。" 杨人楩教授更是慷慨陈词："内战已经给人民造成很大的灾难，仗不能再打，如果傅先生愿意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此义举，一定要大书特书。" 傅作义也曾感慨地说："我一向要好的朋友，现在都主张和平谈判，许多有才干的进步人士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

此外，中共北平地下党还给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政界头目邮寄散发通令传单，宣传中共的政策，策动和规劝他们起义投诚。蒋介石和傅作义两系的一些军长、师长、团长，甚至军统北平站站长都表示愿意起义投诚。但是傅作义对北平走和平道路解放这条道路却始终心存顾虑，他认为是自己冒着三个死的危险来做这件事的：第一，几十年来，傅作义不断对部署讲 "戡乱剿共" 而今天突然的秘密起义，部属的思想一时难以想通；第二，起义的事如果泄密，蒋介石会以叛变的罪名相加；三是与中共作战多年，多有胜绩，如今战局不利，想同他们和谈，担心共产党以战犯罪对待。为摸清自己嫡系部队将领对局势和前途的看法，傅作义采取个别谈话和小型会议的方式，秘密进行交流，统一内部思想。1948 年 12 月 15 日，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秘密召开了嫡系将领会议，会上傅作义就问：如果北平走和平解决的道路，愿不愿跟我走？与会者绝大多数表示支持和谈。随着战争形式的发展，华北局势的变化，迫使傅作义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试探中共对和谈所持的态度。1948 年 11 月，傅作义通过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致电毛泽东，表示对自己过去幻想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中心救国救民的目的认识不清；表明要和谈不愿内



战，请求中共中央派代表前来谈判，并报告了他在北平所能控制的陆军空军数量。接着在11月中旬，傅作义又通过民主人士彭泽湘和符定一到石家庄，直接探寻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态度。

傅作义当时的考虑是，中国共产党既然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他就可以以华北五省二市实力派的资格，参加联合政府。因此，他提出划平津保察绥为和平区，所部改为人民和平军，归联合政府指挥。其核心是在军事上保存实力。

中共中央毛泽东认为，傅作义企图在政治上与中共平分政权，在军事上保存实力，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是，为实现抑留傅作义集团与华北就地歼灭的战略意图，中共中央决定“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因此对傅作义愿意进行和谈表示欢迎。1848年11月18日，毛泽东电告林罗刘明确指出：傅作义经过彭泽湘、符定一和我们接洽。据称傅作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的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我们拟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

从1948年12月19日到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的代表与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代表举行了三次正式谈判。边打边谈，以打促谈。

第一次谈判：平津战役开始以后傅作义就已经陷人了被动。1948年12月24日前，人民解放军已经把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等地。并占领了南口，宛平，丰台，通县等地，直接进逼威胁北平。傅作义深感局势危机，和平谈判已是当务之急，遂于12月25日，派亲信《平明日报》报社社长催载之为代表在北平地下党代表李炳泉的陪同和引导下，携带电台一部，连同报务员，译电员，司机共五人，乘一辆吉普车出北平向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方向驶去。傅作义希望他们能直接见到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从张家口北平到天津唐山的全线问题。催载之、李炳泉等五人，经过河北省涿县时，当地驻军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司令部贺晋年，政委陈仁林接待他们。经请示后，派出该总队的警卫排负责将他们护送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12月16日晚，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长苏静，在八里庄接待了催载之、李炳泉一行。

与此同时，平津前线司令部向中央军委请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于12月26日16时，迅速向林罗刘复电，就谈判的基本原则和具体策略问题

作了明确的指示。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应该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一）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但是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运用某些策略。（二）具体策略现在不做决定，等候傅作义代表到三河与你们接谈后，将谈话内容电告我们，再行考虑。（三）傅作义主力三个军，一个被歼，两个被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城内傅作义仅有三十五军一个师，一〇一军两个师及一个骑兵师，北平绝对大部分敌军及天津、塘沽全部敌军，都是中央系（只有陈长捷是亲蒋又亲傅的），傅作义很难指挥这些军队。但在不损害本电第一条所述基本原则，亦即你们来电所说的争取敌人放下武器这一原则的范围内，我们应试图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大批干部，对于自己的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可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四）但我们第一个目的是解决中央军。你们应向傅的代表试探，傅是否有命令中央军缴械的权力，如果他没有此种权力，则可向他提出让路给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五）至于其他敌方可能提出的条件，待他们提出后再说。（六）李炳泉所说十四日晚傅作义的三个条件，不象是傅作义所提的真正的条件，很可能是因为我军十四日突然到了城边，傅作义仓卒布防不惜说出些好听的话，争取布防时间，其中第二条所谓‘两军后撤谈判缴械’可能就是这个目的。请你们注意研究。（七）李炳泉并非傅作义的亲信，这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①

从 16 日晚上开始，苏静就与傅作义代表催载之不断进行交谈和摸底，但这还不是正式谈判。12 月 19 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来到八里庄，和傅作义代表开始正式谈判。催载之如实传达了傅作义的想法：

——傅先生对谈判很重视，早有考虑，却有诚意。同时要求谈判绝对保密，以防止中统军统特务的破坏干扰。

——谈判期间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双方军队后撤，通过和平谈判达到平津张唐一线的全部和平解决问题。

——为了能得到美国援助的一部分大型飞机，希望解放军能够让出对南苑机场的控制。

——希望解放军能撤围新保安，放三十五军回北平，加强城内傅系军队



的实力，有利于制约蒋系部队。

——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实现和平解决，而后成立华北联合政府，参与联合政府

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傅作义自己设计的谈判蓝图，是保存实力走第三条道路，并举起和平的旗帜。

刘亚楼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向傅作义代表分析了全国战局与平津的形式和前途，明确表示：希望傅作义将军能拿出诚意及早做出起义的决定，应效仿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自动放下武器；在这个基本原则下，解放军可以保障傅作义及其部署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损失；如果傅作义控制和指挥不了中央军，可以让路给人民解放军，以解决蒋系部队。

由于双方条件距离太远，一方要保存实力，一方要解除武装，因而第一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时傅作义认为，他还有力量可以和人民解放军较量一下。

再和傅作义谈判的同时，东北野战军迅速挺进，至 12 月 20 日前后，已经完全割断了北平天津塘沽之间的联系，彻底堵死了傅作义集团向南和向西退的道路，在 12 月 21 日至 24 日，华北人民解放军先后向新保安和张家口发动进攻，这两仗基本上消灭了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尤其是王牌军三十五军的覆灭，使傅作义在军事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12 月 25 日中共中央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公布了“举国文明的头等战争罪犯”43 名。傅作义也名列其中；同时，又发表了一篇新闻报道，特别强调：像傅作义这样的战争罪犯，要想避免人民的惩处是不可能的，但要想减轻其惩处还是有可能的，那就是命令军队立即缴械投降，以立功赎罪！这就是说，在军事上给傅作义打架的同时，也要在政治上给傅作义以沉重打击。这样，使傅作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迫使其进行谈判，并接受人民解放军所提出来的条件。12 月 26 日，傅作义急电催载之立即返回北平；同时按照傅作义的意图，李炳泉和电台继续留在八里庄。

在谈判期间，平津前线司令部都将情况及时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详细汇报。12 月 27 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就对待傅作义集团的基本政策又向林彪做出了重要指示。

12 月 30 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 1949 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文中指出，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文章揭露了中国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的阴谋，指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②]12 月 31 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电："转来两次北平地下党来的电报已悉。请你复电北平地下党，转告傅作义派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和张东荪一道出城到你们那里来谈判。"

1 月 1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电，指出："（一）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我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二）你们应通过北平之党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甲、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亦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套做法，傅氏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是很危险的。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的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的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有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丙、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丁、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见崔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戊、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己、彭泽湘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期曾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其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



傅氏亦不要信任他。（三）上列六点最好由平市再派一个可靠同志，经过傅作义亲近的人（出城谈判之崔某如何）的引进，当面直接告诉傅作义，并告傅保守机密。如张东荪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③]这六点建议不仅代表了人民解放军进行谈判的原则，而且体现了对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关怀。平津前线司令部立即派李炳泉回北平向傅作义当面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傅作义表示愿意为保存古城文化要继续进行谈判。

傅作义再次派出的谈判队伍有他的同乡、高参，华北剿总土地处少将处长周北风和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燕京大学校长张东荪。1949 年 1 月 7 日，周北峰、张东荪一行来到八里庄。第二天，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林彪、聂荣臻、刘亚楼同傅方代表开始正式会谈。傅作义方提出的要求是：平津塘绥一齐解决。军队不用投降或者缴械的方式解决，可采取出城改编的方式解决。释放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的被俘人员，并不作俘虏看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政工人员给予出路。

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聂荣臻、刘亚楼给出的答复是：所有傅作义将军指挥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管辖的地方一律解放区化，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因平津处于战争状态，人民生活困难大，应首先迅速解决；平津守军限期开出城外，首先天津守军要开出城外，按人民解放军的编制进行改编。对傅作义将军不作战犯看待，保障他的私有财产不受损失，并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在对新保安和张家口作战中被俘的官兵一律释放，并不作战俘看待；对傅作义的军政官员一律既往不咎，凡愿参加工作的都可留下来安排适当的工作，凡愿还乡者，都发足路费，填发证明，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一致。刘亚楼整理好会谈纪要并规定：各项条款务必在 1 月 14 日午夜前作出答复。双方代表签字。

第二次谈判，虽然满足了傅作义的要求，但傅作义仍然能借口谈的问题不够具体，不愿意立即实施，实际上是拖延时间，拒绝会谈纪要。几天后，傅作义要求周北峰转告林罗刘聂"限于 14 日午夜答复，时间太仓促，不日你将偕邓宝珊将军再去。"

而在此时，蒋介石闻讯傅作义在和谈。便连续 3 次派人到北平进行阻挠破坏。第一次派了前军令部长徐永昌，第二次派了二公子蒋纬国，第三次派

了军统头子郑介民。夸傅作义“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并授予傅作义一等卿云勋章，劝傅作义迅速决定南撤。美国也在此时，派出了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也匆匆飞到北平，做傅作义的工作。何去何从，傅作义必将迅速作出抉择。

1 月 14 日。傅作义派出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将军协同周北峰前往平津司令部，进行第三次谈判。这时淮海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认为，傅作义仍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并有意进行拖延。于是一面通过多种渠道继续对傅作义进行争取工作，一面下命令攻击天津。同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谈判开始时就已经指出，攻打天津的命令已下，天津已经不在谈判之内，只谈北平。经过二十九个小时的激战，迅速解放天津，打破了傅作义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幻想，第三次谈判非常顺利。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同郑宝珊、周北峰于 16 日晚，就北平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的时间地点以及进行改编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全部达成了协议。

1 月 17 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长苏静，随邓宝珊一起进城。同日毛泽东起草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致傅作义公函，敦促傅作义尽快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条件。公函指出：“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上述两



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上午一时起，至一月二十日下午十二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

19 日，双方共同拟出《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经双方商定，22 日正式公布了这一协议。国共双方以此协议为基本点，解决北平的国民党军队，解放北平。

注释：

①③《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 年版，第 49 ~ 50 页，第 54 ~ 55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379 页。

改编国民党军与绥远方式

按照协议，从1月22日开始到31日，北平城内国民党所有的部队，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陆续开出北平城外，到达指定的地点接受改编。1月24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做好北平敌军出城改编工作。

按照解放军的建军原则和制度，改编二十多万国民党军队，这在解放军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中央军委和平津前线指挥部对这一改编工作极为重视，采取分步改编的方法来实施。

第一步，采取双方杂居。为防止出城的国民党部队出现混乱，解放军调整了部署，东北野战军一纵位于永清桥，二纵位于旧州，三纵位于马驹桥，四纵位于丰台、宛平，五纵位于涿县，六纵位于永乐镇，七纵位于天津以东，八纵位于王庆坨，九纵位于霸县，十纵位于固安，十一纵位于通县，十二纵位于天津、塘沽，炮兵纵队位于廊坊，华北第二兵团位于沙河镇，华北第三兵团位于孙河镇，华北第七纵队位于保定，并要求各部在备战状态下进行休整。1月22日至31日，北平地区的二十多万国民党军队全部出城开往指定地点：第十三军位于三河、夏店，第十六军位于黄村以南，第三十一军位于顺义以东，第三十五军位于香河，第九十二军和第一百零四军位于良乡与涿县之间，第九十四军位于新城，第一百零一军位于黄村，骑兵第四师位于邢各庄，剿总直属部队及特种兵部队位于顺义、怀柔。就这样在解放军的监控下，完成了第一步的工作。

第二步，出城的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合编。平津前线指挥部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进行彻底改编，并于2月9日拟订出改编办法和步骤；先将剿总、兵团、军机关取消，人员编入解放军，以师为单位分编，由解放军各部进行瓦解和争取。再将连至师的单位全部拆散，与解放军混编。改编方案经联合办事处双方代表多次协商，最后形成了双方都认为比较合理的方案。

2月21日，平津前线指挥部召开改编会议，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到会，联合办事处陶铸、郭宗汾主持会议，改编部队师以上军官出席，



会上陶铸宣布了改编方案：（一）原国民党华北剿总、第四、第九兵团及八个军部的三级指挥机构取消，所有人员分别编入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各兵团部、各军部，所属的二十五个师则改编为解放军独立师，特种部队则与解放军的特种部队合编。（二）原国民党部队中的政工人员愿意留下工作的，须经训练再行录用。各级军官凡愿意接受解放军分配工作的，本人和家属均按解放军同级军官和家属享受同样待遇，军官中愿意学习深造的，按工作职位，分班组织学习，学习期间，与在职干部享受同样待遇。（三）原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愿意回家的，一律按原薪发给三个月的薪饷，并由平津前线指挥部发给车票，在解放区沿途供给包括家属在内的食宿，除不许携带武器及公用资财外，一些个人财物均可全部带走，并可按照其工作职务需要，酌许带一二护兵同行，凡居住在解放区的，回家后可分得应有的一份土地，如是地主家庭的，则其土地与财产一律按土地法大纲第八条之规定处理，至于本人，只须遵守民主政府的一切法令，过去行为一概不加追究。所有回家的军官，一律发给"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证明书"，以后愿意来解放军工作，仍将受到欢迎。

2 月 26 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改编国民党军队，至此，北平的国民党军队正式结束了原有的指挥体系，隶属于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的建制，完成了与解放军的合编。

第三步，进行政治整训。在改编部队中建立政治机关，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从解放军各部队中选派大批优秀政工干部，担任各独立师的政委、政治部主任、教导员和指导员。重点对改编部队的广大士兵进行政治教育，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教育，一是时事教育，二是两种军队的对比教育，三是诉苦教育。对军官则将其分批调出，进行集中整训，既减轻对士兵教育的阻力，又可有针对性的促进军官的思想改造，然后依据情况留用或遣散。最后，将各部队分散溶编。改编工作基本顺利，大多数部队经半个月到一个月，即将士兵分散编入解放军，也有个别部队进行了抵制，甚至哗变，对此解放军立即予以镇压，强制缴械，强令编散。因为，东北、华北野战军即将南下和开往西北，各独立师的番号只存在了一个月左右，士兵分散编入解放军，其中，编入东北野战军约为五万余人，编入华北野战军约为五万三千余人，编入西北野战军约为两万四千余人。这项工作至 4 月 10 日全部结束。除编入解放军者外，还有约六万五千余人留在城里，由平津前线指挥部人事委员会根据改编方案，并按照个人意愿，或分配工作，或安排学习，或遣散回乡。

至此，和平改编20余万北平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圆满完成。

和平解放北平的同时，在中共和傅作义的共同努力下促成了绥远的解放。1月22日，华北剿总驻归绥指挥所主任、绥远省主席兼绥远保安司令董其武亲自飞抵北平，当面向傅作义表示愿意追随他走和平道路。中央军委从全国战局考虑，对董其武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表示积极欢迎，并决定对绥远采取比北平更宽松的政策。于1月23日致电林彪，对绥远方面应维持原状，停止战斗，恢复交通，建立联系。1月31日，又命令在归绥地区的华北第八纵队，停止作战行动，以缓和敌对气氛。2月12日，又致电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李井泉，应让董其武部照样存在，平绥路允许其通车，并在归绥与卓资山之间划一条界线，互不侵犯。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将解决绥远问题的方式概括为“绥远方式”即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大体不动，以便于我们集中力量解决其他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在一个时期后，再按照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3月末，林彪、罗荣桓、贺龙与傅作义、邓宝珊就绥远问题进行会商，通过谈判。双方签定了《绥远和平协议》。协议于6月18日正式生效。

9月19日，由董其武发表通电，绥远和平起义。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绥远成立军政委员会，原绥远的国民党军队改编为解放军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军和骑兵第四师。

平津战役胜利分析

一、平津战役的胜利是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高超、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的精彩展示。

平津战役是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分析权衡整个华北敌我态势的基础上，适时推出的一盘好棋。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东北野战军成为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随时可以入关作战。中央军委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根据傅作义集团在固守平津的同时，又有南撤西退的迹象，决定提前发动平津战役，并制定了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分割包围、就地歼灭的作战方针。为防止傅作义率部西撤，毛泽东主席电令华北 3 兵团撤围归绥（即呼和浩特）、华北 1 兵团缓攻太原、华北 2 兵团在阜平集结待命，阻敌西逃。同时命令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几处敌人，防止其从海上南逃。考虑到蒋介石、傅作义认为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刚结束后不会迅速入关这一心理状态，毛泽东主席决定将计就计，要求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但在入关行动上要隐蔽。

平津战役共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实施“围而不打”、“隔而不围”战略。“围而不打”是对已经包围的张家口、新保安两地之敌只做包围而不做歼灭，以使傅作义难下从海上撤退的决心；“隔而不围”是对北平、天津、塘沽等地之敌只做战略包围和分割，隔断其间的联系，而不做战役包围，待时机成熟再做最后歼灭。第二阶段，先打两头，逐次攻取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第三阶段，争取傅作义率部起义，和平解放北平。整个战局基本上是按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预定的战略部署进行的，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高超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

二、平津战役的胜利是各军团结协作、决战决胜精神的充分体现。

平津战役的胜利是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的结果。

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平津前线司令部，致电华北军区、华北局、东北野战

军，指出“攻击平、津、张、唐诸敌之作战业已开始。这是一个巨大的战役，不但两区野战军应归林、罗、刘、谭统一指挥，冀中七纵及地方兵团，亦应统一指挥”。平津前线司令部成为指挥平津决战的重要中枢，担负了整个战役的谋划和具体部署工作。

在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部队及地方部队发扬协同作战的精神，对华北国民党守军展开了全面攻击。华北2兵团一举歼灭了傅作义王牌35军，歼敌1.9万余人；华北3兵团、东北野战军4纵及内蒙古军区部队一部，合力围歼了张家口守敌5.4万余人。随后，华北2、3兵团移兵北平，从北面和西北面对北平守敌形成包围，而东北野战军则从北平的东南面实施包围。之后，两大军区主力部队又通力配合，共同切断了平、津间的交通联系，保证了东北野战军几大纵队顺利解放天津。在整个平津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共计伤亡38 508人，其中牺牲7 030人。受纵队奖励的英模和功臣共有148人。正是这些英烈们用鲜血赢得了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

三、平津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有力诠释。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军队必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平津战役的胜利，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广大人民的无私支援。

在“一切为了前线”精神的指引下，东北、华北两区人民誓以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平津战役。人民群众组织了担架队、运粮队、修路队等多个支前团队，冒着炮火到前线抢运伤员，运送军粮、疏通道路；同时大力恢复发展生产，保障作战物资供应；两大区群众还纷纷送夫送子上战场，掀起了拥军拥属的热潮。如遵化县组成的万人担架团，在平津前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出征前，立下了“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的铮铮誓言。正是东北、华北人民无私的支援，平津战役才能顺利实施，并取得决定性胜利。战役期间，支前民工共计154万余人，出动担架2万副，小车2万辆，大车38万辆，牲畜100多万头，船只1 800多条，运粮1.5亿公斤，副食品0.5亿公斤，柴草2.7亿公斤，修路7 000公里，架桥372座。人民群众的支援有效地保证了百万大军的作战需要，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

四、平津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人民解放军的生命线和克敌制胜的法宝。东北野战军入关时，向全部队进行了为解放全华北，解放全中国而战的教育，要求部队全体指战员明确平津战役的形势与任务，必须做到：第一，力戒骄傲。第二，主动团结友军，发扬友爱互助精神，团结至上，团结战胜一切。第三，严格执行城市政策。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都向部队进行了打大仗，打恶仗，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教育，激发广大指战员为解放华北英勇战斗。进入平津以后，部队纪律良好。干部以身作则，各级党委组织对官兵反复进行政策教育，他们严明的军纪，得到平津人民的称赞和拥戴，提高了人民解放军的威望。

五、平津地下党做出杰出贡献

平津战役基本肃清了华北国民党军的兵力，奠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基础。平津战役歼灭改编国民党军 52 万余人。这对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不仅仅是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有极大的决定意义。1949 年 2 月 2 日，中央军委贺电平津解放，高度评价这一伟大胜利。“凡此伟大胜利，都是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前后方军民协力奋斗和全国人民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一致赞助的结果，”“华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连同东北，华东，中原，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南方人民游击战争的胜利在一起，已经奠定了人民解放斗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①

平津战役创造了解决国民党军事力量的 3 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3 月 5 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作报告中说：“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识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他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②这是对平津战役的高度

概括和科学总结，是人民解放军对敌实行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原则在新形势下的重要发展。北平的和平解放，给国民党残存的军事力量指出了一条新生的光明大道，后来长沙、新疆、昆明等地区的问题，都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加以解决。为中共中央迁至北平和新中国建都北京准备了条件。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人民解放军总部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至北平，开始了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解放后的北平，短时间内出色地完成了和平接管，军队改编，新政权建设，社会秩序整顿，以及回复生产的艰巨的任务，为建设新北京并使之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准备了条件。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策组织、领导和指挥的伟大的战略决战。从 1948 年 9 月 12 日到 1949 年 1 与 31 日，历时 4 个月零 19 天。

经过战略决战中的三大战役，以及决战同时期里的其他战役，解放军的总兵力由决战前的 280 万扩大为 400 万，其中野战军由决战前的 149 万扩大到 215 万。而且由于大量缴获，装备进一步改善，炮兵更为强大，还组建了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并开始着手筹建海军、空军。至 1949 年 1 月，解放区已包括东北全部、华北绝大部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总面积达 261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 27%，人口约两亿，占全国人口的 42%。县以上城市 776 座，其中包括长春、沈阳、北平、天津、济南、徐州、郑州、开封等大中城市，解放区的工农商业发展迅速，拥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援战争。

在决战中的三大战役里，国民党军共损失了正规军两个剿总总部、一个剿总前进指挥部、12 个兵团、46 个军、140 个师，加上其他部队的损失，共 173 个师，154 万人。连同决战期间其他战役中的损失，高达 230 余万人，占决战开始时国民党总兵力的 63%。决战之后，国民党军总兵力经过补充才 204 万人，其中作战部队仅 146 万人，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被称为蒋介石嫡系部队中最精锐的“五大主力”中所剩下的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第十八军，都在决战中被消灭了。国民党军原先五大主力集团中最强大的东北、徐州、华北三大集团，几乎被全歼。所剩下的华中、西安两集团，也在解放军的打击下，实力大减。国民党军的全部精锐部队都在决战中被消灭了。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战线已经崩溃，在长江以南也难以再组织有效的战略防御。这对全国革命形势而言，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有着重大的决定意义。此后，华北东北两大解放区完全



连为一体，从而为渡江战役乃至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决战后的形势报告里指出，经过决战中的三大战役，国民党军的军事主力已被歼灭，就这一点而言，国民党政权基本上已被打倒。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认为，国民党军的完全失败已不可避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认为，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实际上已经崩溃。

国民党政府在军事失败的同时，财政经济也彻底崩溃。1948 年 10 月开始实施的最后努力——金圆券自由兑换，也宣告失败，物价暴涨，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国统区的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也更加积极地投身到推翻其统治的斗争中去。

政治上，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集团，乘蒋介石军事上的惨败之机，在美国支持下，加紧了逼迫蒋介石下台的活动，迫使蒋介石于 1949 年 1 月 21 日宣布下野，将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

在国际上，也宣告了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破产。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在扶蒋反共政策下，美国为国民党政府训练军事人员 15 万人，使用美军飞机、军舰运送国民党军 14 个军共 41 个师又 8 个交警总队，54 万余人到达进攻解放区的前线，为国民党政府援助飞机 934 架，使其能建立起一支比较强大的空军；赠送军舰 271 艘，使其海军拥有了相当规模。美国国会又接连通过《向中华民国提供军事顾问与军事援助的法案》、《援华法案》等法案，并根据这些法案，为国民党政府提供的军事与经济援助高达 59 亿美元。还向国民党政府派出总数达 2 000 人的军事顾问团，由陆军少将巴大维任团长，分为陆军、海军、空军、勤务及参谋顾问组，全面指导国民党军的军事行动。顾问团先以备忘录的形式向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长与参谋总长提出建议，再以联席会议的形式贯彻美方意图，成为参与策划指挥国民党军作战的实际决策机构。随着战争的发展，特别是决战之后，美国认识到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已下降到无法补救的地步，解放军在军事上将取得完全胜利。其推行多年的扶蒋反共政策已告破产，只得将对华政策进行必要调整。第一，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采取既不增加也不减少的政策，对援助国民党军的武器装备，则是采取既不停运，也不催运的措施。第二，由扶植蒋介石改为扶植李宗仁、马鸿逵、马步芳等地方实力派，一方面利用李宗仁与中共和谈争取隔江而治，一方面利用这些派别的军事力量继续抵抗解放军的推进。第三，运用政治、文化等手段，在中国革命阵营内部组织亲美派。第四，将对亚洲的重

点由中国转移到日本，同时加强对东南亚各国反共力量的扶植，以形成对共产党新中国的遏制与战略包围。

决战的胜利也改变了苏联对中共的态度，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过高估计了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可能与国民党的力量，低估了中共的力量，主张在承认蒋介石国家领袖的条件下组成国共联合政府，不赞成中共进行武装斗争。并直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不要反对蒋介石，不要打内战。1949年1月31日，也就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当天，斯大林的全权代表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阜平县西柏坡，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谈了整整三天。此后，斯大林不断为中共一些重大问题提出建议与帮助。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也是二次大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得到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进步力量的同情与支持，而中国人民在决战中的巨大胜利，无疑也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带来巨大鼓舞，增强了他们斗争的决心与胜利的信念。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4～1425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毛泽东军事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3]《毛泽东传（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4]《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邓小平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版。

[7]《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版。

[8]《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 年版。

[9]《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 年版。

[10]《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版。

[11]《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1985 年版。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

[13]《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集（1949-1952）》，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14]《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 10 册。

[15]《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16]《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版。

[17]《周恩来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18]《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版。

[19]《朱德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20]《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

[21]《粟裕战争回忆录》，粟裕著，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版。

[22]《罗荣桓传》朱文峰编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2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 年版。

[2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平津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版。

[25]《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

[26]《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美）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27]《华东解放战争纪实》，刘统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28]《第二野战军征战纪实：第 2 版》，王玉彬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

[29]《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 年版。

[30]《蒋介石传》，王俯民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年版。

[31]《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杨天石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32]《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年版。

[33]《军队整治工作历史资料》12 册。

[34]《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 年。

[3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七届二中全会的筹备工作

当历史进入一九四九年的时候，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已经确定无疑。为了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实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研究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途径，1949 年 1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在 1949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作了具体安排。会议上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指示中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 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 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 通过组成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4) 批准军事计划；(5) 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 决定外交政策；(7) 其他事项。"①1 月 10 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31 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解放战争经过三大战役后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国民党军队剩下的 100 多万人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根本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胜利。

2 月 11 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工作的负责同志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定于三月一日起在原驻地召开第二次中央全会，会期五天至七天。你们接电后，望即布置现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均应尽可能地按时到达，并即将到会的与留下主持工作的同志的名单，先行电告。"

同时，中央对能否来参加会议的人员做了初步估计：西北野战军因为作战在即，彭德怀同志是否能到会要加以考虑。徐向前同志身体生病，如果不方便车行，可不来参加。郑位三、陈少敏两位同志现在养病期中，请东北

局、华北局分别通知他们考虑是否能来，如果不便远行亦可不来。现在港、沪的刘晓、刘长胜同志因为路途遥远不可能参加。李井全、陈丕显两位同志不是中央委员，但由于他们各担任一个方面的工作，应邀他们参加此次会议。

2 月 18 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平津战役总前委、华北局和平津两市委的电报中又做了一个补充通知：中央决定罗荣桓、薄一波、彭真、叶剑英、黄克诚五同志不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留在原地主持工作，其他现在华北的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于 2 月 28 日前赶来中央开会。

筹备会议的工作由周恩来总负责，杨尚昆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受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的委托，具体负责此次会议的会务工作。

杨尚昆在 2 月 12 日约伍云甫、叶子龙、汪东兴共同开会商量会务事宜，安排分工，“住房和生活接待由伍云甫负责，机要文件的阅发由叶子龙负责，安全警备由汪东兴安排”。[②]

会场就定在中央机关的食堂内，这是中央机关到达西柏坡后新盖的，南北长 18.5 米，东西宽 4.5 米的普通房舍，面积不足 85 平方米。白灰砸顶，土坯垒就。屋内北墙上挂着一块酱紫色的幕布，上有两面绣有“中国共产党”字样的党旗，杨尚昆回忆说：“开会以前，我们讨论过，设计一面党旗，用红地衬金色镰刀斧头，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字样，开会时就这样布置的。会议期间，大家讨论，共产国际的旗帜是镰刀斧头，我们加上‘中国共产党’，不太合适，所以后来就不用有字的了。因此，中央领导讲话的照片一部分党旗上有字，一部分无字。毛主席讲话时无字的照片，应该是主席作结论时照的。”党旗上方是毛泽东和朱德的两幅挂像。杨尚昆记忆犹新地说：“会场是中央招待所所长陈心良等布置的，最初挂的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照片，3 月 5 日那天，毛主席一看便提出批评：开会不要挂我们的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第二天就挂上了四位国际伟人像，可大家议论纷纷，你一言，我一语，说法不一，就又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挂在了两旁，结果再次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幕布两侧悬挂着“我们永远作你的好学生”和“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两面锦旗。东西两侧窗户间的白墙上各悬挂了四面党旗。主席台是一张刷了又刷的旧长桌，上面一条花毛毯上铺放了一张林彪从东北带来的虎皮，为会场增添了一些威严。桌上放着笔架、蘸水笔，两侧是记录方桌。会场布置得十分简朴，没有扩音和录音设备。会场前面是两排双人沙发，后面是高低不



一的长条靠背椅、木椅。最南墙上挂有一张向大会做汇报的全国形势图。

会议的安全警戒部署得十分周密。当时的华北战争还在进行，西柏坡百里之外还有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为保证会议安全，杨尚昆指示第十九兵团政委罗瑞卿，派一个团到西柏坡为中央担任警戒。第六十三军军长郑维山派一百八十七师参谋长杨尚德于3月1日赶到西柏坡。杨尚昆和方志纯、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给杨尚德交代了具体任务："中央在此开会，你们这个团和高炮营担任外围警戒，准备对付敌人的空降、空袭，防止敌人来轰炸和捣乱，一定要保证会议的安全。"当即商定二中全会会场的防空阵地，设在东柏坡附近的山头上。

为保证这次会议的绝对安全，周恩来专门找到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要他汇报准备情况，并详细询问了警卫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以及出现情况的处理方案等等。周恩来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等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③周恩来听后，批评他们不能光有决心，还要有具体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周恩来不仅想到了敌人从地面来，而且想到了敌人的空降。对方志纯说："这次警卫工作很重要"，④因此，"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不要神秘。"⑤并且帮助他们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并从前线调来了几门高射炮，布置在西柏坡四面山坡上。

会议的摄像工作由晋察冀军区电影队的苏河清负责。3月初，接到任务后，他带着助手韩建文、韩德富坐着驴车拉着三角架、手摇拍摄机，整整走了一天半的时间才来到西柏坡。当时，他们用着一台法国机子，是手摇式的。为了拍摄会场下面的场景，他们费尽心思，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来，在开会以前，他们从会场后门进去，藏在幕布后面，把三角架稳固好后，把幕布拉了个口子，把镜头刚好从口子那儿探出去，来回摇着拍。当时屋里光线太暗，胶片感光太慢，便把速度由24改为16，借用西窗射进来的太阳光进行拍摄。

因为西柏坡的条件的确比较艰苦，会议期间的住房尤其紧张，只能在一个房间里摆几张床，住的很挤。陈心良回忆说："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政治局委员与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大都住后沟政策研究室及招待所。那时政治局委员一人一间，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两人或三人一间。"

3月4日下午，参加会议的代表齐聚西柏坡，所有筹备工作一切就绪。

注释：

①《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2 页。

②《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77 页。

③④⑤《周恩来传 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版，第 743～744 页，第 744 页，第 744 页。



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祖涵（林伯渠）、董必武、康生、张闻天、彭德怀、林彪、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张云逸、贺龙、陈毅、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三、聂荣臻、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陈绍禹（王明）、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共34人；候补中央委员有：陈少敏、王首道、邓颖超、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云泽（乌兰夫）、赵振声（李葆华）、王维舟、万毅、古大存、马明芳、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共19人。另有重要工作人员李井泉、杨尚昆、傅钟、罗迈（李维汉）、李涛、胡乔木、安子文、杨立三、陈刚、刘少文、高文华、廖鲁言共12人列席会议。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因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者20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这次会议的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

3月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了开幕会议。在宣布会议开始后，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报告了会议的议事日程。接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27人在会上也发了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全会批准了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全会批准了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毛泽东向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①]

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既是他个人的思考，也包括党内其他领导同志的研究和探索，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在 1947 年 12 月陕北杨家沟会议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和新中国经济构成的基础上，吸收了刘少奇、张闻天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和社会主要矛盾等重要思想内容形成的。刘少奇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由国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等 4 种经济成分构成，在这些经济成分中，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同时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认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巩固的同盟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在《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纲领》中指出，东北经济在解放后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 5 种经济成分构成。并系统地对各种经济形态进行了分析，认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这种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支柱；合作社经济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国营经济的最可靠的帮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要引导其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限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小商品经济向着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还要经过比较长期的教育与斗争过程。他指出在经济政策上必须实行一条明确的无产阶级的领导路线，即："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②]毛泽东关于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的方针，是对中国共产党



当时已接管城市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概括和总结。1948 年 2 月 19 日，中共中央工委总结了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还就此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发出指示，要求中央工委所述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要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随后，人民解放军又相继攻克洛阳，中共中央对于接管洛阳城市的政策问题作出九点指示。在接管沈阳时，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接管的最大的工业城市，主要的经验就是采取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办法，并解决了政治上、经济上有助于恢复秩序、稳定人心的一些重要问题，要求参加接管的部队和干部严格执行政策，使得接管工作进行的有条不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集中概括了这些经验，并及时用于指导全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工作。这些正是毛泽东形成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的重要内容之一。

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在会上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同时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报告。

3 月 6 日，朱德在会上发言，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说：“这是个大转变，从乡村转到城市。”[③]我们的工作要适应这个大转变，军队要由战斗队转变成工作队。我们的部队是一个学校，这个学校要培养出会做事的人。将来管理生产，搞生产建设，也要靠他们。他还强调今后进了城市，取得全国政权，就要搞好国防，实行征兵制，建立自己的海军、空军、炮兵、步兵等，建立和训练国防部部队。他说，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要把这样的国家建设好，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的科学知识不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

12 日，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发言。他主要强调了今后城市工作中的几个问题。首先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以城市工作为重心来领导全党工作，考虑好城乡关系等新问题。其次关于城市接管问题，他认为接收城市的问题已经大体解决，但接收后的城市管理问题现在还没有基本解决。提出要解决好私人企业复工和企业接收后正常生产这两个问题。最后在城市管理上要依靠工人，发展生产。为此要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对工人进行深入广泛地教育，组织工会，使“共产党依靠工人，工人也靠了共产党，相互依靠，我们与工人群众就结合起来了。”[④]

13 日，周恩来在会上发言指出：我们党的发展，不是突然而来的，而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我们党内过去有错误，但我们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他说，现在我们正处于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走向完全打倒国民党的过渡时期，正在由分散到统一。这不是几个月而是要几年才能走完的。[⑤]他还指出，现

在前方是打仗前进，后方搞生产，现在“后方生产，目的为发展，但第一步为恢复，争取全国胜利，今天还不是转入建设”这个时期。由于地区的不平衡，又产生了区域性的问题和分权的问题。中国不是联邦，但是带区域性的。这么大的中国，如果过分强调集中会办不好事，因此“在组织形式上，不能一下子都集权，一定要授权地方，才能发挥积极性”。但中央必须成为掌握政策的司令部。由分散到集中将需要较长时间，只能“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向全国统一”。他对于金融、交通、工业、城市接收、兵工生产等各方面工作也提出了系统的意见。

同一天任弼时也在会上发言时指出，“开始工业化，这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质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独立自主，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独立自主。在国防上独立自主就要有强大的机器制造业，还要有军事制造业，能够造飞机坦克、舰艇等等。他表示，新中国要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工业的比重至少要达到30%以上。同时，要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他强调为了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的新情况，必须加强城市党的工作，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对新党员要严格审查；加强教育，健全组织生活；经常检查党员的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执行纪律。他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和组织部门，不能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6]

李富春、王稼祥、彭德怀、邓小平、张闻天等许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参与了会上讨论毛泽东报告的过程，并作了发言。李富春、王稼祥主要讲了工业和城市工作的问题；彭德怀认为毛泽东的报告是争取新民主主义在全国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了防止左右的倾向，尤其是提出了不骄不躁特别重要。他总结了自己两年来在西北战场的领导工作和存在的问题，提议今后应动员全党着重学习毛主席的思想、著作，特别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战略思想。邓小平在发言中认为中央领导既高度集中又真正做到了高度民主，避免或减少了犯错误。这种领导方法很值得学习。并且提出要加强中央机构的意见。张闻天着重讲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问题。

在七届二中全会闭幕时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总结讲话。他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及经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2条等。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



这样提法较好，应该这样提，而不应该像王明同志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要先把中国的事情做好。他要求大家认真读12本干部必读的书，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如果在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关于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他说，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德、意、日帝国主义是第二个最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是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历史的次序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帝国主义要消灭我们，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关于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他说，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不用流血了，而是可能和平解决的。但“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因为在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在人民中已经臭了，我们不采用它，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但在内容上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相配合的还有党的代表会议制度。”⑦

毛泽东在结论中说，党的成分，组织教育等，值得好好研究。在谈到中央政府主要成员时，毛泽东向全会报告说，现在尚不能定，须与民主人士商量整个配备，但有两个人要报告：毛、周是否加入。周一定要加入，其性质是内阁总理；我不参加有好处，可以有时间想问题；但不参加有缺点，内阁上面要设主席团，总主席。请同志们看是否妥当。刘（少奇）、弼（任弼时）不加入，不要全加入进去，全加入是不行的。

3月13日，根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的工作报告以及其他同志的发言，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即《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定了迅速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完成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

决议指出，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被消灭。今后解决剩下的100多万人的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3种。“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仍然是人民解放军首先

必须准备的；"北平方式"即迫使敌人用和平方法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国民党军队；"绥远方式"即暂时维持国民党军队原封不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他们。决议认为，按照北平或绥远那样的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必须注意和学会这种斗争方式。只是必须认清，这仍然是一种斗争方式，不是不用斗争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毛泽东指出："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⑧会议还认为，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开展政治斗争，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都应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

为了适应革命的迅速发展，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决议中要求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已经解放和即将解放的广大地区需要大量干部去开展工作，建立新的政府机构，毛泽东指出，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必须把人民解放军看成培养干部的学校，必须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必须更充分地发挥它的工作队的作用。并且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

（二）决定了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情况下，要结束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决议指出，1927年以后，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我们工作的重心一直在农村，在农村聚集力量，采取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战略。历史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并且是完全成功的。但是现在实行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以后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但是，绝不可以丢掉农村，仅顾城市，而城乡必须兼顾，要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

决议还指出，如何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变的问题。城市与农村有着完全不同的领导办法，因此，党和军队必须用极大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的问题，首先是国营工业的生产，其次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



手工业的生产。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应当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决议强调只有将城市的生产事业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工业尽可能快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那就必然会使我们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为此，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而且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和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党在领导城市人民进行斗争时，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三）规定了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将采取的一系列基本政策。

决议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根据毛泽东关于全国胜利后两种基本矛盾的分析，会议制定了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

在政治方面，提出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党要认真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作为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在此基础上，还要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广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便结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并且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决议指出，由于我们党的历史上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的问题方面曾有过不正确的态度，对此，全党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应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全党必须在思想

上和工作上确立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自己的干部一样，和他们诚恳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问题，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同时，从团结他们的角度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给以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以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

在经济方面，决议分析了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基本状况和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纠正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抗日战争以前的中国经济，大约现代化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受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长期压迫的结果，这也是中国革命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对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决议认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将是构成新中国经济的几种主要成分。中国已经有了现代工业，这点是进步的。但是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这部分的经济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并且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当容许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但是，又要对它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即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采取限制措施。也就是所谓“节制资本”的政策。这是由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所处的地位和中国经济的落后状态所决定的。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是右倾的观点。但是，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很快地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的或冒险主义的观点。然而这是必然会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方式上的反抗的，尤其是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对内节制资本和对外统制贸易，是新中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他强调，党必须领导人民“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占国民经济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能改变它分散的、个体的性



质。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就要犯“左”倾的错误。但对于这种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经过合作社经济，引导它们向着合作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经济，中国共产党就不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能由新民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所以，这种合作经济，是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在外交方面，决议认为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使帝国主义国家竭尽全力地帮助国民党，消灭这个革命，这就激起了广大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者深刻的愤怒。而战后帝国主义制度的削弱和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力量的空前增长，使得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⑨毛泽东提出：对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⑩

毛泽东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作了展望。他说，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四）强调全党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以后面临的新情况作了深刻的分析。鉴于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即将到来，决议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便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说，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但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巩固这个胜利，“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决议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迎接新的更伟大的任务的到来。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为了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还通过了几条重要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前夜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制定了明确的方针；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思想上作了重要的准备。毛泽东在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以及根据这个报告通过的相应的决议，与他随后在6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于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理论和政策基础。这次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注释：

①《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题解，《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4~1425页。

②《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6页。

③《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7页。

④《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425页。

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等，1898年版，第816页。

⑥《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0~713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285页。

⑧⑨⑩《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5页，第1434页，第1435页。

中共中央进驻北平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地点由西柏坡迁往北平。会议结束后，即着手由西柏坡迁往北平的准备工作。为了做好保卫工作，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派人前往北平给中央领导选择驻地，选择了几个地方，都不是很理想。就在他们举棋不定的时候，1948 年 12 月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建议有关方面开一个会，集思广益，听一下大家的意见。在会上经过权衡，叶剑英同志认为香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址。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对北平进行接管。2 月 3 日，中央警卫团派出 7 个连共 800 多人，以“北平市公安总队”番号进入北平。这时的北平并不太平。由于是和平解放，傅作义的军队在城外进行了改编，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也趁机潜伏了下来。同时，旧社会遗留下的种种余毒依然充斥在北平的各个角落。北平的四十七军一六〇师担负了清剿北平郊区敌、特、匪，迎接党中央迁入北平，保卫党中央和北平的卫戍警卫任务。为确保党中央的安全，在叶剑英的建议下，中央社会部工作队对北平西郊的敌特和社会情况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中共中央又派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到北平进行全面调查。李克农来到北平，与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亲自到香山勘察后，感到这里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最终敲定香山为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驻地。为了保密，对外称“劳动大学”。

驻地选定以后，中央社会部便衣侦察队秘密进驻青龙桥，担负西直门至香山一线的便衣警卫工作。同时加强了对西郊公安派出所、检查站的领导，做好社会调查和控制，并用扫雷器对香山周围地区进行了全面的探查，扫雷器寻找到很多各式各样的地雷。这一切准备工作结束后，中央警卫团第二连进驻香山部署警卫，警戒区域内修筑了必要的警卫、防空设施。中共中央华北局、北平市委、市政府和北平驻军在北京饭店召开了迎接中央进驻北平会议，会上成立了以叶剑英、聂荣臻、程子华、刘亚楼、李克农五人组成的中



央迁平组织委员会。对沿途警卫、对空警戒、机场阅兵和城市庆祝，做了周密的部署和精心的安排。对中央机关的干部进行了入城教育，学习了城市的有关知识，进行了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教育，还制定了入城后的守则等等。

毛泽东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进城不是去享福，是要继续革命，说："我们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教育大家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在思想上打了预防针，使人们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党中央各单位，解放军各总部都以各种形式进行了入城前的教育活动，曾在西柏坡村中央工委秘书科工作的苏培良回忆了其所在单位秘书处党支部传达的入城初期的注意事项：一、把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光荣传统带进城市；二、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不准进人民家，不准随便进入戏院、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四、绝对保守党中央机关的秘密（中央机关进北平后对外称"劳动大学"，通讯为三〇二八信箱），不知者不应求知，自己知道的不得外传；五、出门不准携带武器，不准携带机密文件；六、进程三个月不准通信、会客、访友，不准外出游览名胜古迹；七、不许贪污浪费，不被金钱美女收买利用，不被阿谀奉承迷了心；八、手不许乱动，嘴不许乱说，脚不许乱走。

3 月 21 日，从北平调来第四野战军的汽车 200 辆，停放在郭苏河滩里有二里多长，按各部门人员多少，行李大小分配车辆。中央办公厅各部委，解放军总政、总参、总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外事组、工青妇、中央医院、文化学校、都由带队人去领车。每车选车长一人，清点人数，看好行李，注意行车安全，照顾年长者。

3 月 23 日，出发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①上午 8 点多，中央首长车队共 11 辆小、中型吉普车。第一辆是带路的小吉普车，第二辆至第十辆是中央几位书记和高级领导及家属乘坐。后边还有五辆是少数机关工作人员和装行李的卡车。还有五辆卡车拉的是中央警卫团的手枪连和步兵排，负责途中行车和保卫工作。首长坐的是汽车，大部分是从延安开来的小吉普车。虽然这些车已经很旧了，但跑这样的马路，还是比较适应的。

车徐徐离开驻地走出山村，奔驰在华北平原上。这天各村的干部、老大爷、老大娘、妇女、儿童都站在村口，给大家送行，老百姓已经和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老乡们留下了热泪。

形势的发展比预计要快得多，提前两年中央就从农村进驻北平了。这次中央搬家和1934年长征开始，1947年延安撤离的心情大不相同了。上至首长、机关干部，下至勤杂人员、战士，个个满脸笑容，心情喜悦，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平山县。因为这是一次胜利的搬家，是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

3月24日，闻保定将举行中共中央进入北平的庆祝大会。毛泽东认为不妥，嘱周恩来告华北局，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的庆祝活动。

3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以及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由中央警卫团护送，乘火车抵达北平。毛主席没有在前门火车站下车，而是在清华园火车站下车，不声不响地来到北平。直到新华社发了毛泽东和党中央来北平的消息后，北平才一下子沸腾了。

下车后，一六〇师师长吴烈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接到颐和园的“益寿堂”，作短暂休息。下午两点，毛泽东不顾旅途疲劳，同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从颐和园经海淀到西苑机场。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共1 000多人见面，并举行盛大的阅兵式。由叶剑英陪同，检阅了第四野战军的炮兵、坦克部队和第四十一军的部分部队，受阅部队几乎全部是美式装备。美式装备本来是美国用来武装国民党军队的，但在战争中被人民军队所缴获，用来武装了自己。而蒋介石，则被人们说成是给人民军队运送美式装备的运输大队长。这实在是一个极具讽刺意义的历史事实。毛泽东站在一辆敞篷吉普车上，频频挥手致意。大家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说：“同志们好，同志们万岁！”炮兵部队为了欢迎毛泽东，向空中发射了礼炮。50门六〇炮又陆续发射了500发照明弹，人们一齐鼓掌，欢声震天。毛泽东说：“不要打了，战争还没结束，留着打国民党吧！”

检阅完毕，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会见了北平各界人士各方代表，并与民主党派人士见面，随后入住香山双清别墅。

中共中央已经顺利进驻北平，留在西柏坡处理善后工作的由中央工委秘书长曾三和供给部长邓典桃负责。留下的还有刘华峰、沈义（曾三处长爱人、女儿曾晓前），曾三的秘书延永生，勤务员王登龙、周吉寿，机要译电员崔维德（和北平电台联络），随同干部田风起、苏培良，大家在曾三处长



的指挥下做些具体工作。成立检查组，分头到各村检查，凡有损坏的门窗家具物品，马啃了树皮的都要作价赔偿。借住的房屋有倒塌、漏雨的都要修缮，使房东满意为止。老乡们说："真是毛主席党中央教育的好，你们是执行三大纪律的模范，我们没见过这么好的干部和军队，我们还有什么说的。"把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住过的房子窑洞小会议室都交给地方。把带不走的通讯器材交给县政府使用，其他物资交给县和村里处理。一切善后工作处理完毕，留守人员胜利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于1949年4月2日，告别当地县、区、村干部和乡亲们，离开了西柏坡。至此，整个中央机关全部迁到北平了。

中国共产党机关进北平，标志着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临近。进驻北平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首先面临着两件大事：一是指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夺取全国的最后胜利；二是广泛联络民主人士，协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注释：

①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页。

国民党战败求和与中共的积极应对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将要领导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中国人民没有怀疑，甚至连美蒋反动势力也深信不疑。但是一切反动派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于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势力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喘息时间，保存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然后伺机卷土重来。

蒋介石政权的倒台已成定局，美国的决策者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美国政府中的许多有识之士看到，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并非美国的力量所能左右，即使美国直接出兵干涉，也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败亡。于是美国政府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力反共，转变为两面性政策，即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势力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策划“和平”阴谋，企图用政治斗争的办法从内部破坏中国革命，阻止革命前进。美国统治集团幻想有一天国民党会出现什么“新局面”，从而奇迹般地扭转潮流。1948 年 10 月，当形势更加恶化时，就再三催促蒋介石退居幕后由李宗仁代其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已较过去更加不负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他向国务卿马歇尔报告说：“人们如何普遍地盼他早早引退，这确实令人伤心。大部分政府各界官员都希望他引退，几乎全部有识之士也都有同感。”①11 月中旬，司徒雷登与李宗仁进行长谈。李宗仁表示，美国政府应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表示新的领导如果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为此，司徒雷登又向马歇尔建议发表一项表示支持新的非共产党政权的政策声明。与此同时，美国的舆论工具也日益加紧地放出关于国共“和谈”及“蒋介石下台”的空气。不难看出，美国统治集团急于在中国“换马”，是



迫使蒋介石下台的重要外部原因。

以蒋介石嫡系为主的国民党死硬派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更不甘心于蒋的下台。他们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币制改革能取得成功，梦想淮海决战能扭转战局，更企望美国能提供更多的援助。1948 年 11 月 9 日，蒋介石亲自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只公开发表一个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声明，以"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杜鲁门政府感到蒋介石已经"众叛亲离"所以三天后复函婉拒。11 月底，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赴美乞援，向马歇尔、杜鲁门提出一整套关于要求美国援助蒋介石的计划，但也被拒绝了。

以桂系为首的一些地方势力派，希望保存自己统治地区的独立性，就在美国的援助下企图利用对蒋不利的军事形势夺取国民党的最高统治权。从 1948 年底开始，桂系趁蒋介石"戡乱"失败，美援无望，身陷绝境之机，打起与中共和谈的旗号，大搞迫蒋下野的"谋和"活动。12 月 24 日，身为国民党桂系首领华中军政长官的白崇禧从汉口发出电文致蒋介石，力主："（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②]白崇禧还策划湘、鄂、豫、皖、桂五省联盟，促蒋下野。随后，李宗仁、甘介侯宣布五项和平要求："（1）蒋总统下野，（2）释放政治犯，（3）言论集会自由，（4）两军各自撤退三十里，（5）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并公开主张："总统下野后，由李副总统继承大任。"[③]白崇禧电文发出后，蒋介石无任何反应，于是又于 12 月 30 日对蒋发出电文，重申前电主张，"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④]同时，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和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等，都先后致电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与中共恢复和谈，并直接要求"总统毅然下野"，以利和谈的进行。可见，蒋桂日益尖锐的矛盾是迫使蒋介石下台的重要的内部原因。

1949 年 1 月 1 日，在内外交迫走投无路的形势之下，蒋介石公开发表新年"求和"声明《新年文告》，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其"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⑤]但是，蒋介石

在提出和平谈判建议的同时，公开提出了5个前提条件，即所谓（一）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三）宪法不由我而违反，宪政不因此而受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法统不致中断；（四）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五）人民能够维持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标准。蒋宣称：如此等条件不能达到，国民党“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这5项前提条件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蒋介石并非真正想与共产党“和谈”，而只是玩弄一个和平阴谋，以麻痹人们的革命斗志。因此，这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

1月3日，司徒雷登在对美国务院报告其对蒋介石新年文告的感受时说：“对此文告之初步印象甚佳。文告内容庄严，且有和解之倾向，对共产党之诋辱亦较平时为少，……但经研究后，该文告中显露严重之缺点。该文告为一过于冠冕堂皇之文章，含有一个强大的统治者以仁慈的口吻对待其厌烦叛徒之意味。是以忽略若干不愉快之现实：即军事力量几已全部崩溃，最近经济措施之失败，几乎举国一致对和平之祈求，与在蒋氏执政期内此种和平之不可能。另一缺点则更为严重，即在某一意义上，彼已表示让步，但并未给予充分之退让。”⑥司徒雷登在这个报告中，显露了蒋介石在两周前决定在元旦辞职，由李宗仁“自由采取”实现和平的“任何政策”，可是现在蒋又食言了。原因在于各方面的压力过于强大，其中也包括美国当局所施加的政治上的压力，蒋审时度势才不得以勉强表示下野，这就无疑表明蒋的所谓“引退”，只不过是一场假戏而已。

对于这场主要由桂系势力掀起的新的和平运动，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还极力劝说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接收蒋介石的“和平条件”切不可“除恶务尽”，否则就“不合国情”“不够伟大”。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曾寄予希望。他们害怕革命进一步的发展会损害自身的阶级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已经破产的“中间路线”的主张，又被某些地方实力派和民主党派的右翼分子重新提了出来。他们企图在和谈中造成同国民党、共产党三分天下的局面，或者建立区域性的地方政府以裂土自保割据一方。这样，中国人民再次面临历史的选择，中国革命再次走到关键时刻。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

针对这样的形势，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指出虽然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就要取得最后



胜利，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者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动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强调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由此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而决不允许使革命半途而废，让反动派养好创伤，卷土重来，使中国重新回到黑暗世界。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针对少数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模糊和动摇，他强调指出：“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动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还以“农夫与蛇”的故事，寓意生动地告诫人们决不能怜惜蛇一样的恶人。新年献词的发表对于揭露美蒋的阴谋，争取教育各阶层人士起到了重大的作用。1 月 5 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评战犯求和》，对蒋介石 1 月 1 日文告中提出的和谈条件的虚伪性和反动性进行了逐一揭露和批判。指出：一、蒋介石所谓的“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是说有害于“一切保护蒋介石反动国家的‘独立完整’的办法，那就一概不可以。”二、蒋介石的所谓“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是说“‘和平’必须有助于已被击败但尚未消灭的中国反动派的休养生息，以便在休养好了之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三、蒋介石的所谓“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是要“确保中国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府的统治地位，确保这个阶级和这个政府的‘法统不致中断’。”四、蒋介石所谓的“军队有确实的保障”，是指“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军队，虽然已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几百万，但是现在还剩下一百几十万，务须‘保障’而且‘确实’。”五、蒋介石所谓“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实质指的是“中国买办地主阶级必须维持其向全国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

中国劳动人民则必须维持其被人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这是蒋介石这名最大的“战犯”求和的终极目的。在评论的最后，特别一针见血地告诉全国军民：“蒋介石已经失去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重申党“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坚定立场，要求在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和人民群众中进行有说服力的教育和解释工作，继续揭露和打击国民党的“和谈”阴谋；指示还要求全党继续提高警惕，要“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因为最近三个月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使“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万一事变到来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只要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

蒋介石发出元旦求和文告后，尽管原则上已经决定“引退”，但他仍不甘心下台，继续大肆活动，对内派其亲信张群、吴忠信等多次与李宗仁商谈“引退”事宜，致电白崇禧，派人联络程潜，软硬兼施，幻想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但未能达到目的；对外，他在1月8日授意外交部长吴铁城分别向美、苏、英、法4国政府驻华大使馆递交备忘录，请求他们出面调停中国内战，协助完成国共和谈。但相继被4国政府拒绝。1月12日，美国政府在给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中表示：“美国政府殊难相信在当前情势下，按中国政府的建议，试图充当调解人，能达到任何有益的效果。”⑦

1月10日，苏共中央致电毛泽东，全文转达了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并提出了苏联政府草拟的复文，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复文称：“苏联政府一向坚持现在也仍然坚持在中国停止战争建立和平。不过，在答应同意居中调停之前，我政府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否接受苏联的调停。”⑧在给中共中央的建议中，斯大林明确主张不必坚持拒绝和谈，但有必要让国民党知道，中共反对任何外国参与调停。电报说：“如果贵方被问及，答案约可为如下所诉：中国共产党一向主张中国和平，因为挑起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后者应该对战争的后果负责。中国共产党主张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不能让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参加。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直接谈判，不需要任何外国人居间调停。”⑨

12日，毛泽东迅速就此作出答复。复电要求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的备



忘录做如下答复："苏联政府一向希望现在也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然而，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在中国内战交战双方之间调停是不可取的……"[10]毛泽东明确告诉斯大林：只有苏联在中国人民中享有极高威信，因此，如果苏联在对南京政府的备忘录的答复中，采取您1月10日电报中阐述的立场，美、英、法就可能认为，参加调解工作是应该的，国民党就会得到诬蔑我们的借口，说我们是好战分子；而对国民党不满并希望人民解放军很快取得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会感到失望。……他强调，中国革命目前已经胜利在握，不必再用迂回战术。国民党的和谈建议其实只是一种拖延革命胜利的阴谋。而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进行这样的谈判，只会推迟革命胜利的时间。因此，我们倾向于要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并充分揭露敌人的和谈阴谋。

1月14日，斯大林再度来电表示，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目前以不公开拒绝和平谈判为好，因为公开拒绝和谈会把渴望和平的旗帜送给国民党，好像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希望的；并且，公开拒绝和平谈判的倡议，也可能会给美国以借口，使美国更容易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就像当年帝国主义共同干涉苏维埃俄国一样。因此，中国共产党可以考虑提出这样一些条件：第一，在新政府成立以前，人民解放军不能停止它的进攻；第二，必须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其中共产党的代表要占3／5，总统和总理必须由共产党人担任；第三，此一联合政府必须经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宣布其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第四，一切中国武装部队必须宣誓忠于此联合政府。斯大林指出，这样一些条件国民党显然是不大可能接受的，因此它不会影响中国共产党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当然，斯大林特别强调说，我们的建议只提供你们考虑，绝没有强加给中国共产党的意思。你们即使不准备这样做，我们也仍然是你们的好朋友。对此，毛泽东于当天即复电斯大林，明确肯定：我们之间在与国民党谈判的问题上，以及在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1月17日，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约见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转达苏联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备忘录的复函。该复函表示："苏联政府始终不渝地恪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并认为承担上述备忘录中所提的居间调解是不适宜的。"并且认为："恢复中国之作为民主的与爱好和平的国家的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要得到这种统一，最好可经有关方面直接谈判，依靠中国的内部力量，无需外国的干涉。"[11]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政府也已作

出上述相同的表示。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具有重要意义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揭露了蒋介石要求和谈的5项条件“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理由，能够全部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为此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对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12]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条件之下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应当“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13]其目的是为了保存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解释八项和平条件的指示，指出“我方提出之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因此，它同1月1日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献词“毫无矛盾。它将给人民解放军及国民党区域被压迫人民一个打击国民党的武器，揭露国民党所提和平建议的虚伪性及反动性”。由于“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

毛泽东1月14日的声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海内外各界民主人士广泛的响应。22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表示彻底支持八项和平条件，指出：“我们希望全中国人民，全民主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务须一致团结，采取必要行动，坚决执行人民的公意，而使这八项和平条件迅速地全部实现。”[14]

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一出来，蒋介石即于15日下午召集张群、张治中、吴铁成、邵力子等召开紧急会议，对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进行商讨。会上决定，为求内部团结，对8项条件暂不表示态度，而征求各省党政人员的意见。当晚，蒋介石接见司徒雷登，告以共方条件和政府意见，希望其能有所表态，但司徒雷登所关心的蒋的个人进退问题，保持沉默。次日，蒋介石召见了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要求他们把两



行存在美国的外汇存入私人户头，以免将来和谈成功，民主联合政府成立时予以接收。这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长江北岸，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及其经济和金融中心上海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攻击之下。如上所述，美、英、法、苏4国政府也先后通知国民党政府，拒绝“调停中国内战”。至此，蒋介石不得不于1月21日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总统”职务。由于蒋的“引退”并非出于本心，而是形势所迫。所以蒋在他的家乡奉化溪口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中央军”。当时蒋的“中央军”仍然大于白崇禧所指挥的广西部队，而南京这一政治中心且在汤恩伯控制之下，介于这种情况，李宗仁自难握有指挥整个南京政府的统一权力。

李宗仁上台后，以积极的态度，大力展开“谋和”活动，和谈的空气显得更浓厚。1月22日，他发表代总统文告说：蒋介石“轸望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15]表示自今以后政府工作的目标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宣称愿以中共1月14日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为表明其和谈的姿态，他积极争取第三方面人士的支持，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沈钧儒等人共同策进和平运动；同时指示行政院作出决议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5人组成代表团，等候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此外又派邵力子、甘介侯先后去上海分别访晤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章士钊等民主人士，请这些中间人士前往北平帮助在国共之间斡旋。为了进一步表示其企求和平的诚意，李宗仁还于24日饬令行政院实行“七大和平措施”：（一）将各地“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16]27日，李宗仁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表示愿意停战和解。希望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指定谈判地点，并称南京政府已承认以贵方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李宗仁此时试图以自己的“法统”地位来对抗蒋介石的“党统”控制，所以承认以毛泽东所提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事前并未提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也未经孙科过目。

李宗仁还想方设法安排一些人士同中共方面直接洽谈，以进一步试探中共关于和平谈判的态度。1 月 23 日，他派黄启汉、刘仲华飞抵北平，通过傅作义与中共的联络，黄、刘二人到北平后很快见到了中共代表。刘仲华转告了李宗仁的意见，原则上同意毛泽东所提的八项条件，只是李仍是代行总统之事，并无多少实权，待劝蒋出国后，得到政权再与中共言和。2 月 12 日，白崇禧派私人代表李书城到达河南信阳，同刘伯承、陈毅会面。在李宗仁的促使下，2 月 14 日，由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等人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在黄启汉陪同下抵达北平。李宗仁让黄启汉带给毛泽东一封信，并向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转达 6 点意见："（一）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二）和谈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原则为基础，但战犯问题之处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后；（三）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只要答应进行和谈，可作公开声明；（四）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五）对蒋介石本人，如认为他留在国内于和谈有碍，可提出使之出国；（六）对国际关系，希望中国成为美苏有好关系的桥梁，不希望依附一国反对另一国，美苏两国的友谊，均须争取。"[17]

对于李宗仁的谋和活动，中国共产党也采取积极态度一方面揭露其和谈的欺骗性。1 月 25 日，中共中央就国民党政府决定派出代表与中共谈判发表谈话，表示："我们愿意在 1 月 14 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之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并且提醒大家："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放出了许多虚伪的装腔作势的和平空气，企图欺骗人民，以达其保存反动势力，获得喘息机会，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之目的。全国人民应有清醒的头脑，决不可被那些伪善的空谈所迷惑。"[18]同日，中共中央指示上海、香港等地党组织，将 1 月 22 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 55 位民主人士联合发表的坚决支持中共八项和平条件，反对蒋介石和平阴谋的声明及我党上述讲话，向国民党各大城市广为散发，使广大群众不受美国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

另一方面，中共又因势利导，有意争取桂系反蒋，以促使国民党内部的进一步分化。2 月 1 日中共中央就李宗仁派遣黄启汉、刘仲华飞抵北平向叶剑英转达其"求和诚意"一事致电彭真、叶剑英等，表明中共立场：如果他真有反蒋反美接受中共八项条件的诚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如此，"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如李、白托黄、



刘转告之言，纯系骗局，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19]刘伯承、陈毅在接见白崇禧派来的代表李书城时，以傅作义为例，反复说明如果白崇禧能以实际行动做出贡献，中共将予以欢迎和优待。

2 月 14 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达北平后，中共采取积极热情、诚恳坦白的方针。中共在北平的高级领导人叶剑英、董必武、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薄一波等领导人与代表团成员会见，并作了多次恳切的谈话。中央指定主要由叶剑英负责接待。并且还请傅作义、邓宝珊同他们接触。当了解到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想谋求国共两党以对等身份实行南北议和后，叶剑英坦率地指出：实现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从我们的愿望讲希望北平方式，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希望李宗仁认清形势，按照八条，同蒋介石真正决裂。22 日，代表团从北平前往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代表团成员，双方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邮通航等事宜交换了意见，最后达成 8 点秘密协定：“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一月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之。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20]2 月 27 日，他们带着毛泽东给李宗仁的一封信离平返宁，可以看出，代表团的努力已取得了圆满收获，为北平和谈铺平了道路，敲开了和平之门。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试探和平之举，大大帮助了李宗仁的谋和活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到国民党四分五裂，对李宗仁智慧和能力产生了质疑，但是经过邵力子、章士钊等多次解释，才最终决定以李宗仁为和谈对象。

经过此前国共两党的一番和谈前的接触，国共两党都已同意和谈，但在正式和谈前夕，双方却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制订了截然不同的和谈方针。

毛泽东在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和谈，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

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这个谈判是全面性的。如能成功，对于我们向南方进军和占领南方各大城市将要减少许多阻碍，是有很大利益的。不能成功，则待进军以后各个地方进行地方性的谈判……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净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21]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既表明了中共对和谈的诚意，又体现了中共为维护人民利益的坚定立场。

国民党对和谈也有既定的方针。蒋介石"引退"后，是想争取一段喘息的时间，以便在江南重整旗鼓，同中共进行最后的决战。李宗仁积极"谋和"的真实意图则在于通过和谈，实现"划江而治"，阻止革命继续前进，在中国建立"南北朝"。基于此，李宗仁在得知中共领导人同意同南京政府进行和谈的消息后，于2月25日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领导人开会，制定对中共和谈的基本原则："一、和谈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绝对不能让共产党以胜利者自居，强迫我们接受不体面的条件。二、鉴于铁幕后面的附属国形势混乱，我们不能同意建立以共产党为统治党的联合政府。我们应该建议立即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三、我们不能全部接受所谓八条，而只同意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次啊讨论八条。"[22]这个指导原则的要害，是提出了搞"划江而治"的雏形。

何应钦内阁组成后，对于如何进行和谈问题专门召开了4次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刘斐、李蒸外，翁文灏 、彭昭贤、贺耀祖亦参加，黄少谷也以行政院秘书长资格参加。经过几次会议研究，作出下列决定：（一）、为会商和谈的便利，建议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改在南京开会。（二）、为指导和谈适宜，请李代总统，何院长，并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公推委员三人，共同组织指导委员会。（三）、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作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

最后，把4次会议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了一个腹案共9条，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到北平商谈的依据。该腹案内容为：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拟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定，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二、同意重订新宪



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的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签订之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惟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进行商谈。在“和平腹案”出笼的同时，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也拟定了“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和谈腹案”和“最低要求”是李宗仁“和谈”方针的具体化。“和谈腹案”是在表面承认八项和平条件的基础上同中共讨价还价，使国民党能够在将来的联合政府中同中共平起平坐。“最低要求”则把“划江而治”的如意算盘和盘托出。总之，这两个方案都是为了在中国继续保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可以看出，国共两党关于和谈制定的方案是根本对立的。因此北平和谈中的斗争将是尖锐而激烈的，是国共两党在战场上较量的继续，也是中共为进一步分化国民党，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继续。

注释：

①《驻华使（司徒雷登）致马歇尔国务卿》，《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68页。

②⑥⑮⑯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第28页，第42页，第44页。

③《蒋金国自述》，第203页。

④程思远：《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

⑤《中央日报》，1949年1月1日。

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33页。

⑧⑨⑩《党的文献》1996 年第 1 期。

⑪《人民日报》，1949 年 1 月 21 日。

⑫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89 页，第 1436 页。

⑬《人民日报》，1949 年 1 月 15 日。

⑭《人民日报》，1949 年 1 月 24 日。

⑰黄启汉：《1949 年“和谈”的回忆录》，载《文史资料选辑》第 67 辑。

⑱《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 80～81 页。

⑲《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等，1989 年版，第 811 页。

⑳《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461～462 页。

㉒《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941 页。



北平和平谈判及其结局

1949年4月1日起国共两党在北平举行和谈。中共代表团成员为：周恩来（首席代表）、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聂荣臻，秘书长齐燕铭。南京政府代表团成员为：张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秘书长卢郁文。

4月1日，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被招待住在六国饭店。当晚6时，周恩来率中共全体代表看望并宴请南京政府代表团，宴会后分头同国民党代表接触。周恩来、林伯渠在同张治中、邵力子交谈时，周首先质问张治中："为什么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认为这完全是为了加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且证明蒋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大表不满，并说："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①]张治中对此不能不极力加以解释，说："蒋先生虽然下野，实力还操在他手上，我们虽然接受以毛先生所提8条为和谈基础，但蒋究竟同意到何种程度，我们不能不摸个底，才好进行商谈。而且，蒋虽不当总统，但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我是国民党员，也有义务去看望他。另外，最近京、沪一些人纷纷发表言论，提出许多主张，给和谈制造障碍，我去溪口并且回京后发表新闻，对这些人起到威慑的作用。"[②]中共对张治中去溪口一事有如此强烈的反应，这让南京代表团有些始料未及。这使得国共双方代表初次接触就闹得不太愉快，对双方情绪都产生了一些影响。随后，张治中提出未来政府的外交政策，主张"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说："如果亲苏而反美，则美必武装日本和用经济封锁来对付中国。"[③]由于受当时情绪影响，周恩来表示不能同意，双方只是泛泛谈了一些一般问题，便无结果而散了。

关于谈判的方法和步骤，周恩来向张治中提出：以中共八项和谈条件为基础，采取个别对话的形式进行，先充分听取国民党方面意见，然后提出成熟的方案供双方讨论。张治中表示同意。

事实上，当时蒋介石虽退居幕后，却仍然控制着国民党及其政府。北平

和谈尚未正式进行，4 月 2 日，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向迁至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了关于和谈的三条指示：“（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二）‘共匪’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负之。”④据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 7 日通过了关于和谈原则的决议，明确要求南京政府代表团务必遵行。这 5 项原则是“（一）为表示谋和诚意，昭信国人，在和谈进行开始时，双方应即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进行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其无谋和诚意，政府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告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共方；（二）为保守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之外交政策，应予维持；（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施行暴力之政策，对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约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双方互相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列（二）、（三）、（四）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⑤这为正在进行的国共和谈设置了新的障碍，表明国民党反动派要不遗余力地保住其政权，作垂死挣扎，这自然束缚了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手脚。因此，南京代表团的成员都感到此次和谈的希望变得很渺茫，他们认为这种作法中共绝对不能接受，而且必然增加了很多纠纷，使谈判工作更加困难。

从 4 月 2 日到 7 日，国共双方代表就各方面问题开始进行个别交换意见。南京代表团在交谈中对中共 8 项条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双方争执的焦点明显地集中在“惩办战犯”问题上。南京代表不能接受这一条，因为蒋介石名列战犯名单的第一位，李宗仁另列第二位。多数国民党代表提出，他们是第二号战犯派来的，第二号战犯怎么能办第一号战犯呢？这件事根本办不通。纵然签了字，不仅南京不会同意，而且他们根本就回不了南京。章士钊对林伯渠说：“如战犯问题不放松，则有两点顾虑：（一）在人情上说，此次六个代表除本人之外，均属国民党，如果一定要抓蒋介石，等于让儿子签字杀老子，恐怕五个代表决不肯签字。（二）从厉害观点讲，目前蒋介石尚有残余力量，美国和日本又窥视在侧，如逼得太紧，即是促成蒋系团结。”中共代表坚持必须惩治战犯，只是同意谈判期间军队暂不过江。鉴于此，张治中在给南京政府的电报中称：“就两日分别交谈所得初步印象如下：甲、战争责任问题，共方依然强调原来主张，但我们坚持取消此条。乙、军事行动问题，和谈期间共军不渡江。丙、军队改编问题，共方表示军



队着重在制度的改变，使军队民主化，尤其要使私人的军队，变为人民的军队，至改编期限和保留军队数字两点，可以从长商谈。”经过会商，南京代表团决定依据下述两点进一步与中共代表协商，即：（一）战犯应受处罚，但不必正式提名，如赞成和平条款及对人民作有益贡献者，可以酌情减少或撤销，反之，再列为战犯不迟；（二）渡江问题可并入中共八项条件的第四条，签字后不必马上渡江，但亦不必拖至联合政府成立后。

由于南京代表团对于中共八项条件的态度与此前的表现相差甚远，中共代表的态度也表现得十分强硬。为了揭露南京政府，4 月 4 日，新华社以《南京惨案与和平谈判》为题发表社论，指责南京政府制造的南京“四一”惨案，“充分表明了南京反动卖国政府的战争罪犯和杀人匪徒们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是什么。”[⑥]同一天，新华社还编发了自日本投降以来至 1949 年 3 月的大事月表《什么人应负战争责任?》，“编者按”指出：“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虽然在口头上说愿以中共八项和平条件为谈判基础，在事实上却至今拒绝与应对战争负最大责任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决裂，至今还继续担任蒋介石反动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工具。”4 月 5 日，新华社还发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社论，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任何第三条路是没有的。”[⑦]4 月 6 日，新华社又发表《要求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的社论，指出：虽然李宗仁政府“表示希望参与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但是他们和继续主战的蒋介石及其死党一样，反对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反对接受中共的八项条件”，“他们要把反动势力平等地‘光荣’地保存下来，以为卷土重来的资本”。社论指出，这是一种极荒谬、极反动的态度，是与立功赎罪的态度完全不相容的。

在中共政治攻势的压力下，为了提高自身的影响，4 月 7 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主要内容有三点：其一是表示谋和“诚意”。他自称将“排除万难，决心谋和”，“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其二是关于战犯问题。希望取消八项和平条件的第一项，电文称“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何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其三是针对八项和平条件的第二至第八项的，提出

所谓“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表面上谈的是两党合作的大政方针，实际是说：如果彼此都同意遵照孙中山先生遗嘱办事，则“宪法”与“法统”不必废除，政权不必接收，土地制度不必改革，官僚资本不必没收，反动军队不必改编，只要“国共合作”，“同守此义”，则其他问题可以迎刃而解。透过电文字里行间可以看到，这是向中共施加压力的一种表示。

毛泽东仍然本着宽大为怀的态度继续争取李宗仁。4月8日，毛泽东复电李宗仁，主要内容也有三点：其一是强调“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其二是提出宽大政策的标准，“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其三是建议“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的为奋斗”。[8]

为使谈判顺利进行，从4月8日起，毛泽东分别约见南京各代表谈话。8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了张治中，3人长谈4个小时。主要涉及的问题有以下几点：（一）战犯问题，在和平协定条款中可以不举其名，不提蒋介石3个字，但仍要有追究责任的字样。这是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困难表示理解，并同意将此问题拖到最后办。（二）改编军队问题，所有国民党军队的数额、番号、官长均可照旧不动，驻地问题可以研究。（三）渡江问题，共军必须过江，是否签字后马上渡江，或经过若干时日后再渡江也可以商量。（四）南京政府在和谈至新政协开会，即到联合政府之成立这一段时间内仍可维持现状，行使职权，免致社会秩序混乱。（五）和谈方案正在草拟，拿出方案正式谈判时，2个小时内便可解决问题。将来签字时须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童冠贤等都到北平参加。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使几天来始终处于极度紧张和不安中的张治中顿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张表示：“按毛主席精神，和谈是可以成功的，因为今天双方谈判距离不大，甚至于没有距离。”4月9日、10日、1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又先后接见了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卢郁文等。中共最高领导人亲自出面对南京和谈代表们做工作，使他们心悦



诚服，顾虑皆释，有力地促进了和谈的紧张，也坚定了他们以后选择新道路的决心。

为了使和谈取得成果，打破李宗仁“划江而治”的迷蒙，中共还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工作。谈判刚开始，周恩来会见李宗仁驻北平的联络代表黄启汉，说：根据两天来商谈的情况看，除邵力子外，都不同意“惩治战犯”这一条。“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了卦呢？”黄启汉表示要回南京向李宗仁问明白。黄临行前，周恩来让他转告李宗仁、白崇禧：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实现和平的一切障碍。李、白不应对帝国主义再抱幻想，不应对蒋介石再有留恋或恐惧，应坚决向人民靠拢。也只有这样，才是他们唯一的光明的出路。并要黄启汉转告他们：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但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留在南京更好。周恩来还建议：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赶来支援。4 月 11 日，中共中央为信守诺言，在长江汛期即将来临之际，指示渡江战役总前委将预定的渡江时间推迟一周。

国共双方代表进行了 12 天个别商谈后，从 4 月 13 日开始，双方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当日，毛泽东函告周恩来，在第一次正式会议上，除解释协定草案要点并征求对方意见外，还应向张治中表明：“4 月 17 日必须决定问题。18 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何、白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签，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叫他们全体留平。”[⑨]周恩来把中共方面起草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正式提交给南京代表团。该协定依照与南京代表团达成的妥协，确实没有提到战犯的名单；没有规定整编人数；同意成立整编委员会，中共四至五人，南京三至四人；同意南京政府待联合政府成立后再办移交；同意吸收南京政府代表参加新政协和吸收若干国民党人参加联合政府。协定甚至没有直接提到解放军过江的时间问题。但是，《协定》首先历数了国民党自 1946 年在美国帮助下破坏停战及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的罪行，然后分别依据毛泽东所提八条，具体提出了实现八条的二十四款办法，明确规定人民军事委员会有权命令过渡期内的南京政府。

4 月 13 日晚，国共双方和谈代表齐集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正

式会议。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详细说明。他开始简要回顾了南京代表团到北平后12天非正式谈判的情况及中共代表团起草这一草案的经过，然后明确战争的历史责任，指出："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文明确这个责任。"接着，对这个草案的各条各款加以说明。主要有：第一条是惩办战争罪犯。分两款，一款是规定在这次战争中主要的战犯必须惩办。在惩办原则之下，给予宽大待遇。第二款是关于日本战犯。南京国民政府放走了日本侵华战争最大的战犯冈村宁次及其以下260多名日本战犯。"对于这种措施，全国人民异常震怒。所以我们一定要求在签订协定以后，由政府要回来重办。"第四条是根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如何消灭反动军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武力消灭武力；另一种是以和平的方法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我们希望以和平的方式改编，而不用军事来解决。"第五条是没收官僚资本。指出："凡是在官僚资本中，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倚仗政治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或侵占的才没收。"第六条是改革土地制度。"我们不仅在原则上规定了在解放军到达的地区，先行减租减息，再行分地；就是在解放军还没有到的地区，也一样要实行土地改革。"第八条是"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一条是一个程序问题，必须明确规定。"周恩来最后总结说："如果上述这些和平条款都能实现。我们相信国内的和平就有了永久的保证，南京政府代表团及南京政府中的爱国分子，努力于这个全国人民的共同希求的和平事业，当然可以得到人民的谅解，也可以得到人民的赞许。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共代表团愿意在这里提出保证，当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以及在筹备开幕时，接受南京爱国分子的参加，同时也参加联合政府。"[10]

随后，南京国民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发言。他首先对中共方面给予南京政府代表团的十二分周到的接待，表示感谢和敬意。然后，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中不可能接受之点，进行解释。总的看来，南京代表团对其中大部分条款内容，没有提出更多原则上的歧见。其中意见较大者有三处：一是草案的"前文里有若干过于刺激的字句，我们希望在精神和内容能酌加删节。"而是第四条关于军队改编机构整编委员会问题，中共提出整编委员会要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成立，我们认为，军队改编的第二阶段，应由联合政府来办理分区改编军队工作，联合政府下自然有军事机构来掌管



这一事项，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本来是中共的军事机构，这点实应考虑。三是待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民主联合政府移交，在这之前，南京政府应照常行使职权。而在第十九款中规定：南京国民政府要“向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领导”，若是如此，“岂不是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变成了南京的太上政府？这点我要重申刚才所提同样的理由，认为不相宜，请中共代表团诸位先生再加考虑。”张治中最后十分感慨地说：“我今天固然代表我们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同时个人一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至少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对者。这次中共在战争中的胜利，可说已到了一个圆满的地步，如果现在这个明智的和平政策能贯彻下去，那么，中共就不仅是军事的胜利者，而且是政治上的大大的成功者。”“目前则我们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就是我们代表团同人向中共代表团同人所想表示的一点小小意见和希望。”[11]

在讨论协定草案过程中，南京政府代表团共提出了40多处意见，中共接受了20余条。最后，双方同意再作会外协商，然后定期举行第二次会议。

4月14日，周恩来和张治中就协定草案全部内容要点再度具体交换了意见。张治中说：“这个修正案和原草案最大的不同之点是：语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也有若干的修正。”[12]第二天早晨，双方代表又进行了分别交谈。

4月15日晚7时，周恩来同张治中会面，把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送给他。《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共八条二十四款。主要内容如下：

前言简要回顾了自南京国民政府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要愿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的历程，写道：“双方代表于北平集会，首先确认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于此次国内战争及其各项错误政策担负全部责任，并同意成立本协定。”

第一条：“双方确认，对于发动及执行此次国内战争应负责任的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战争罪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得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予宽大待遇。”“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凡属怙恶不悛，阻碍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不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或竟策动叛乱者，应予从严惩办。”（第一款）

第二条：“双方确认，南京国民党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召开

的‘国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应予废除。”（第三款）

第三条：“双反确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法统，应予废除。”（第五款）

第四条：“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力量（一切陆军、海军、空军、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地方部队，一切军事机关、学校、工厂及后勤机构等），均应依照民主原则实行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应立即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负责此项改编工作。……人民解放军向南京国民政府现时所辖地区开进和接收的一切事宜，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规定之。人民解放军开进时，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不得抵抗。”（第七款）

第五条：“双方同意，凡属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倚仗政治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或侵占的官僚资本企业（包括银行、工厂、矿山、船舶、公司、商店等）及财产，应没收为国家所有。”（第十一款）

第六条：“双方确认，全中国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应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后，一般地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第十六款）

第七条：“双方同意，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所订立的一切外交条约、协定及其他公开的或秘密的外交文件及档案，均应由南京国民政府交给民主联合政府，并由民主联合政府予以审查。其中，凡对于中国人民及国家不利，尤其是有出卖国家权利的性质者，应分别情形，予以废除，或修改，或重订。”（第十八款）

第八条：“双方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其院、部、会等项机构，应暂行使职权，但必须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处理，并协助人民解放军办理各地的接收和移交事项。待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民主联合政府移交，并宣告自己的结束。”（第十九款）

协定最后写道：“双方代表团声明：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我们特负责签订本协定，希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完满地实现本协定而奋斗。本协定于签字后立即生效。”[13]

15 日晚 9 时，国共双方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第二次正式会议。



周恩来把《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修正之点，即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所提修正意见加以说明。他说："在这两天接谈中，中共代表团尽可能吸收南京政府代表团许多意见，就是说凡是与推进和平事业有利，与中国人民解放有利的意见，我们尽量采纳。""在定稿中，最重要一个问题，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问题。……我们愿意让步，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双方成立的机构，还是用一种合作的办法，南京国民政府暂时行使职权，一直到自己宣告结束之时，也就是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同时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合作协商，以解决过渡时期一切问题。在军事方面，成立整编委员会，依照定案上所规定情形办理，上面不再冠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和指挥字样。这是我们一个重大让步。"但是，周恩来同时指出，有两点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第一是军队整编问题。"我们认为国民党一切武装力量应即改编"，"应该在和平协定签字后成立整编委员会，双方合作来解决这一问题，不必分联合政府成立前一段时期和后一段时期，而是一道来。"第二是人民解放军接收地方的政权问题。"在联合政府还没有成立以前这一段相当的时日，人民解放军必然要接收一些地区，才能保障地方秩序的建立，才能使该地的国民党所统辖的部队能交出来集中整理，才能使和平有确实保障。"周恩来强调说："以上两点我们决不能让步，若让步就失掉了毛泽东主席所提的八项条款的基本精神。"周恩来还指出，这个和平协定的修改，"我们总是尽量求取原则上的同意，与实施技术上的合理，以便利和平事业的推行，也便利南京代表团好说服南京政府，使协定能很快签字。"

中共代表团尽可能地吸收和采纳了南京政府代表团的许多意见，包括关于某些重大问题的意见，总计20多处。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问题。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双方机构采用合作的方法，南京政府暂时行使职权，直到联合政府成立移交为止。至于军事方面的军事委员会，亦不冠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指挥字样。就是说，军事整编双方合作，政权方面互相协商，这是我方的重大让步。接着，周恩来又说明了不能让步的两点，即双方的根本分歧。一是关于军队改编问题。南京政府代表团反复提出，希望划分为两个时期：即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国民政府所统帅部队由自己处理；联合政府成立后，再由整编委员会处理。我们认为国民党一切武装力量应即改编，全国军队必须编成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用意在使中国从此得到永久的和平，不能再敷衍。二是关于人民解放军渡江接收地方政权问题。我们是接受历史经验行事。辛亥革命是先由各省成立都督府、军政府接

收，然后才成立临时政府。大革命是先以北伐军的总司令部下辖的政务委员会行使职权，国民革命军是政权的先锋队。这次解放战争也是采用这种方式，由人民解放军接收地方政权。周恩来强调指出，以上两点我们决不能让步，若让步就失掉了毛泽东主席所提八项条款的基本精神。

周恩来对修正案作了说明后，郑重宣布："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则20日我们一定打过江去。"[14]随后，张治中简单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感想，并声明明天即派人到南京请示，再作答复。

会后，南京代表团经过充分讨论，一致认为，中共已经接受了他们所提半数以上意见，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问题，先后删去了"元凶巨恶"、"首要次要"等字样；关于军队改编，把南京政府和所属军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一句也改了，让步是大的。从全文看，虽然条件过高些，但如能了然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党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则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

南京政府代表团一致决定接受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并决定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于16日上午将《协定》带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周恩来闻讯后，特于当晚在六国饭店约见黄绍竑，鼓励他努力完成此次任务。并在第二天亲自赶往西郊机场面嘱黄、屈，请他们明确告诉李宗仁、白崇禧，中共希望他俩在修正案签字问题上自拿主张，不要请示蒋介石。

4月16日晚，何应钦主持召开行政院秘密会议，研究和平协定。李宗仁、吴铁成、顾祝同、黄少谷、阎锡山等参加。黄绍竑、屈武向李宗仁报告了全部谈判情况和代表团集体的意见。李宗仁显然不曾想到会有这样一种结果。白崇禧看完《国内和平协定》后，立刻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何应钦宣布："这个和平条款是不能接受的，由行政院作答复。"[15]随后，由张群带着《协定》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蒋看后，拍着桌子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匪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二十四条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余主张一方面速提对案交共匪，一方面拒绝其条件。"[16]

4月18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公布4月7日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和谈五原则，重申和平谈判必须以此五原则为依据。同时，蒋介石又对中共修正案拟定对策："（甲）提出具体相对条件复之。（乙）不提出对案，仅以不能接受其所提条件而愿先订停战协定，以表示和谈之诚意。如其在此和谈期间，进攻渡江，则其战争之责任，应由共匪负之。（丙）用党部名义驳斥其条件之前文与消灭行宪政府而实行其共产专制政府……之意。"[17]

4月20日，南京政府电传在北平的和谈代表团，对中共8条24款作出整体答复，认为："中共条款之基本精神不平等，不合理，非和谈态度，政府不能接受。"要求中共"重新考虑态度，先行停战，再继续和谈。"[18]当晚，李宗仁、何应钦致电南京代表团，命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而提出"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19]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广州发表《对中国共产党所谓国内和平协定之声明》，不承认《国内和平协定》，诬称："中共所提8项24款，按其内容完全失去协议和平条款的性质，直是对我中华民国全国人民与政府为残酷之处分与宰割。"[20]南京国民政府的答复和广州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声明，表明北平和平谈判的彻底破裂，至此，国民党假和平的面目彻底暴露。

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于4月20日晚发起了渡江战役。22日，中共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公布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以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和平阴谋，争取人民及国民党中主和分子及爱国分子的同情，以利人民解放军南进。

北平和谈破裂后，南京方面派专机到北平接原定24日回南京的和谈代表团，但在中共方面周恩来、林伯渠等的诚意挽留下，并且由于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努力，已将张治中的夫人、女儿都接到了北平。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全体和谈代表，在无奈之中决定暂时留在北平。

国民党反动派对南京政府代表团留在北平，既怀恨又无奈，只能极力造谣污蔑，在6月15日之后，国民党中央社接连发出电讯，说张治中受了中共的"唆使"，策动和平，离开北平，行踪不明，并对张本人进行人身攻击。6月26日，张治中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说："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这都不是过去我们国民党所表现于政治设施和党员行动所能做到的。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

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特别指出：“这次和谈破裂，在我们国民党内有些人认为条件太苛，类似投降。其实平情而论，这八条原则早为南京政府李代总统所承认的和谈基础，二十四款就是实行这八条原则的具体办法。……倘我们认识战败求和的必然情势，又能了然于政权更迭的历史常例，则革命大义，天下为公，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能的；自己既然无成，就应该让给有成的。”声明最后他明确表示：“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㉑这些发自肺腑的语言表达了一个最终同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一起的正直的国民党人的心声，也代表了全体留居北平的代表团同仁的共同思想和愿望。

同日，新华社以发表社评《评张治中声明》，指出，张治中声明表明了他对于目前中国形势的看法，也可以看作是南京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的共同意见，社评指出：“四月间在北平举行的和平谈判，如果当时南京国民党集团的首脑们尚有悔祸之心，本是他们的一条出路。但是甘受美国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首脑机关，最后还是拒绝和平，使他们自己派赴北平的代表团前功尽弃。”社论郑重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的出路就是“立即与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李宗仁匪帮决裂，投入人民和人民解放军这一边来。”㉒

北平和谈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进行的一场真假和平的政治斗争，虽然没有成功，但却有着深刻的政治影响，经国共双方代表一致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次谈判揭露了国民党发动派假和平的阴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为实现和平的坚定立场。同时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对于争取幻想走中间道路的同盟者不要相信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假和平。对人民解放军进行局部和平解放、瓦解敌人方面，以及配合解放大军南下进军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注释：

①⑤⑧⑩⑪⑫㉑《张治中回忆录》（下）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年版，



第798页，第798～799页，第800页，第805～816页，第817～823页，第824页，第849～851页。

②余湛邦：《1949年国共北平和谈始末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56～57页。

③张治中：《我与共产党》，第135页。

④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实践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页。

⑥《人民日报》，1949年4月4日。

⑦《人民日报》，1949年4月5日。

⑨《毛泽东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等，1989年版，第479页。

⑬《人民日报》，1949年4月22日。

⑭《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4页。

⑮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

⑯⑰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实践出版社，1985年版，第286页，第287页。

⑱《申报》，1949年4月21日。

⑲⑳《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016页，第1017页。

㉒《人民日报》，1949年6月27日。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毛泽东传（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4]《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邓小平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7]《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周恩来传 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版。

[9]《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416 页。

[10]《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11]《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1985 年版。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

[13]《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集（1949－195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

[14]《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 10 册。

[15]《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16]《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版。

[17]《周恩来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18]《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版。

[19]《朱德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20]《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

[21]《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22]《国共两党关系史》，马齐彬主编，杨圣清、何仲山副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年版。

[2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 年版。

[2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平津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版。

[25]《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



[26]《1949 年“和谈”的回忆录》，黄启汉著。

[27]《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美）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28]《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年版。

[29]《李宗仁先生晚年》，程思远著，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年版。

[30]《蒋介石传》王俯民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年版。

[31]《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杨天石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32]《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年版。

[33]《在大决战的日子里》，阎长林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年版。

[34]《1949 年国共北平和谈始末记》，余湛邦著。

[35]《我与共产党》，张治中著，文史资料出版社。

[36]《风雨中的宁静》，蒋经国著，(台湾）实践出版社，1985 年版，

[37]《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黄绍竑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

[38]《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 年版。

[3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国民党的垂死挣扎 人民解放军积极备战

国民党反动派一面提出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企图延缓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争取喘息时间，保存残余力量，达到“划江而治”的局面；一面还希望凭借长江天险重整军备，加强防务，阻挡人民解放军的攻势。

1949 年 1 月 21 日，蒋介石被迫“引退”到幕后指挥，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2 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长江防线的作战计划。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等主张，江防军主力应放在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原因在于这一段江面较狭，且北岸支流很多，解放军所征集预备渡江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中。江阴以下江面宽阔，江北又无支流，不易强渡，不必用重兵防守。然而由于奉蒋介石的旨意，掌握军事实权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坚持把江防军主力集中在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在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以作应付。于是，从湖北宜昌至江西湖口以西，由白崇禧指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所属 15 个军约 25 万人防守，其中 13 个军担任沿江守备，2 个军置于长沙、南昌等地作为机动；汤恩伯指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所属 25 个军约 45 万人守备从湖口以东至芜湖、南京、镇江、上海长达 800 公里的江岸，其中 18 个军用于江防，另以 7 个军控制浙赣路及浙东地区，作为机动部队。以第二十八军防守南京的北大门三浦地区（浦口、浦镇、江浦），第四十五军守南京；镇江以东至江阴沿岸，摆下了第四、第五十一、第二十一、第一二三共 4 个军；以第五十四、第九十九两个军分驻丹阳、龙潭作为机动兵团；上海地区由第三十七、第五十二、第七十五等 3 个军以及青年军第二 0 四师防守。而在湖口至马鞍山千里江防仅有 6 个军又一个师防守，防御力量十分薄弱。这一防御方针的实施，造成了东重西轻、纵深空虚、机动兵力缺乏的致命弱点。同时，以海军的主力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的舰艇约 130 余艘，空军 4 个大队所属飞机 280 多架分属白、汤两集团，



封锁江面，构成陆、海、空三军联合立体防线。此外，蒋介石还成立了12个编练司令部，企图利用和谈时机，在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内编练200个师，使国民党正规军扩充到350万至500万人。可以看出，国民党军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持淞沪，然后待机反攻。"①

3月31日，就在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赴北平的前一天晚上，李宗仁召开了军事会议，命令白崇禧、汤恩伯严密防范人民解放军南渡，加强海、空军的沿江巡逻和侦查；并计划从新疆等地调兵10万加强江防力量。尽管如此，国民党政府对于解放军渡江南进仍然忧心忡忡，在淮海战役结束后，更是慑于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力量，对防守长江及京沪已丧失信心，而现在将大部兵力集中在浙赣铁路，长江防线并不巩固。

截至1949年1月止，人民解放军总兵力达到358万余人，其中野战军188个师共218万人，而国民党的总兵力降至204万人，其中正规军只剩下71个军（227个师）115万人。这时，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和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的地区，已经获得解放。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总面积达26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7%；总人口约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42%。国民党正规军被迫退守到长江以南和边远省区，在战略上已丧失了实施有效防御的能力。解放战争的这些胜利，大大加速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灭亡和人民革命战争最后的胜利。

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指出："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提出："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特别提出："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②这表明，全国战争形势开始逐步从长江以北向江南转移，深入到蒋介石统治集团的腹地去。

在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人民解放军也积极准备渡江。渡江作战的最初设想，中共中央在1947年7月就提出来了。但因条件不成熟，未能实现。1948年10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部署淮海战役时进一步明确了渡江作战的大体构想。要求华东野战军（后改称第三野战军）在明年3至7

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大约在秋季主力可能就可以举行渡江作战。12月，中央军委在《对今后作战方针的意见》中更具体提出，中原野战军（后改称第二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于“三四两月休整，五月沿平汉南下，六七两月执行江汉战役，并完成渡江准备工作，八月渡江。”[③]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已经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提出本年度“到南方去作战”的任务。

渡江战役，又称“京沪杭战役”。中共中央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于2月初就提出准备渡江南进的战略部署。2月9日，渡江作战总前委召开会议讨论渡江作战的具体问题。会议认为：渡江时间以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原因是在政治上，国民党内部在军事部署上尚未求得一致，在其于守沿江南岸和京、沪、杭诸点与将主力撤至浙赣路沿线两策之间徘徊的时候，实行渡江，比较有利。在季节上，4月初水小雨少，便于作战。会议还明确了战役部署：确定以第三野战军4个兵团、第二野战军1个兵团，为第一梯队。第三野战军的4个兵团，一个在江阴、扬州段，一个在南京东西段，一个在芜湖东段，一个在铜陵、贵池段。第二野战军一个兵团在安庆东西段。第二野战军另外2个兵团，除以1个军进至黄海、宿松、望江段佯动外，其余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便于紧随首先突破的部队之后，适时渡江钳制。人民解放军预定的突破重点位置拟在芜湖、安庆地段。东北野战军以3个军约20万人迅速南下于3月底运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以保障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作战行动。中央军委同意总前委的渡江作战计划。

中共中央军委先后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的7个兵团24个军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准备于4月间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京沪杭地区，为而后向华东、中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条件，并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为了做好渡江准备，开辟渡江道路，可提早攻占敌长江北岸据点。以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率部第四十、第四十三军约10万人组成先遣兵团迅速南下，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会同中原军区部队钳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为了加强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2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位同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④]



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意图和敌人的江防部署，对人民解放军实施渡江作战的各种困难和有利条件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渡江作战是解放军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广大指战员多属北方籍，不习水性，存在种种顾虑；领导干部缺乏组织指挥大兵团强渡江河的经验，在无现代化渡江器材的条件下，要突破敌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将会遇到很大困难。但是，在解放军渡江正面担任防御的汤恩伯集团战斗力差，缺少核心力量；长江在5月桃汛之前水流比较平稳，利于我军渡江；南京以西江面较窄，敌防御薄弱，更利于组织渡江；芜湖至江阴段，江身逐步向北突出，沪宁芜铁路与江平行，利于对敌实施钳形突击和渡江后迅速控制铁路，限制敌机动，并达成对南京、芜湖、镇江地区之敌的合围和分割。这些都是解放军夺取渡江作战胜利的有利条件。

中共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即将召开，为了配合和谈，中央军委提出3月中旬或下旬应准备攻占浦口及炮击南京，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施加军事压力。第三野战军还认为：为直接准备渡江与配合和谈政治攻势，必须于主力渡江之前，使用一部兵力举行肃清江北岸沿线桥头堡守备之敌，以便控制渡口船只，开辟渡江交通道路，迫近江岸，遂行直接渡江准备工作。第三野战军决定以8兵团攻击浦口炮击南京作战为核心，第七、第九、第十兵团担负佯攻或策应。强调指出：此一战役胜利，敌失去江北屏障，其江南守备阵地，完全直接暴露于我打击之下，可能影响错乱其江防部署。随后，三野对渡江成功之后也作了周密安排，决定凡某部渡江成功，即迅速占领阵地，并立即接应左右友邻继续登录。同时，在全战局上于登录后，力求苏中登陆方面与皖南登陆方面迅速东西对进打通联系，集结兵力，形成对南京包围，对沪杭及赣东警戒。先争取解决南京问题，再逐步解决沪杭问题。

3月30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京沪杭战役作战命令》，命令说："奉中央军委电令及总前委命令，决按2月20日京字第一号预备命令内定于4月15日18时统一发起战斗。"对七、九、八、十兵团及特纵之战斗序列及各部任务作出区分和具体部署。并对此次战役作战指挥决定如下："奉总前委命令，为便东西两集团之作战指挥，除陈、饶、邓率总前委华东局机关于战斗发起前进至合肥附近统一指挥中野及华野全军渡江作战外，并决以谭副政委随七兵团行动负责统一指挥七、九兵团之渡江，粟副司令张参谋长率野司野政及后勤部大部（一部仍留蚌埠附近）于四月五日前进至泰州以南地区指挥八、十兵团之渡江，华野东西集团之各兵团于渡江后之作战统归野司

粟张指挥。”⑤

为加强渡江作战的组织领导，第三野战军建议：三野前委由粟（裕）主持，即东移苏中，统一指挥三野全部渡江作战，华东局、总前委与华东军区邓、饶、陈留合肥附近，统一指挥三野、二野，主持全局，并于必要时就近照顾巢、无王（建安）、宋（时论）两兵团（由震林同志统一指挥）。二野专门在桐城、安庆线上指挥，与总前委相距甚近，便利联络通报。

1949年3月31日，总前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与敌我双方实力的分析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提出京沪杭战役的目标是：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南京、上海、杭州，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了保证此次战役的胜利，决定将第二、第三野战军划分为3个作战集团，即东集团、中集团和西集团（又称东路大军、中路大军和西路大军）。东集团由第三野战军第八、第十两个兵团和榴弹炮兵第五、第六团以及苏北军区3个警卫旅、海防纵队、坦克团、炮兵预备队等组成，共35万人；中集团由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两个兵团和榴弹炮兵第二、第四团及第一团一个营，还有骑兵团组成，共30余万人；西集团由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组成，共35万余人。

《纲要》对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的具体作战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

东集团：由粟裕和张震率领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直接指挥渡江作战。渡江地段为黄港至口岸之间和三江营至京口之间。在发起渡江作战的同时，命令一部兵力积极佯攻两浦敌人吸引南京之敌，以保证渡江作战成功。渡江后，留一部分兵力歼灭沿江之敌，力求站稳脚跟，调整姿态，巩固阵地和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大战果。主力则对敌人作后方的迅速推进，控制宁沪铁路，会同中集团合围南京、镇江和芜湖的敌人；

中集团：由谭震林组织指挥，在裕溪口至姚沟段和姚沟至棕阳镇段实行渡江作战。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在芜湖和和县地段上进行佯攻，牵制和迷惑芜湖的敌人。渡江后，留一部分兵力配合西集团消灭当面之敌，主力则迅速东进截断宁杭公路，会同东集团完成对敌人主力的包围；

西集团：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在湖口和棕阳镇之间渡江。第三兵团在棕阳镇至安庆以东地段渡江，第五兵团在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第四兵团在望江至湖口段渡江。各兵团渡江以后，要以勇猛果敢的行动，消灭沿江之敌。得手后，第三兵团首先消灭殷家汇的敌



人，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向歙县挺进，截断徽杭公路，并沿徽杭公路东进杭州。第五兵团渡江后快速沿景德镇、婺源前进，占领衢县江山段铁路。要求该兵团抢在第三兵团之前完成此任务，以保证截断敌人的退路。第四兵团渡江后，则迅速沿江东进，接替第九兵团的任务，监视芜湖的敌人，并准备进攻和占领南京。

《纲要》对解放军渡江成功后可能产生的敌情变化作出了四种判断，指出只要解放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预定将战役区分为3个作战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并依据下一阶段的要求，实行战役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的任务，确实控制浙赣路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包围歼灭被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强调指出，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西线的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两个兵团除留必需兵力协同第二野战军歼灭当前的敌人外，主力应与东线的第三野战军第八、第十两兵团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

《纲要》对战役第一阶段作了布置：（1）由粟裕、张震两同志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三野八、十两兵团主力，共6个军，3个独立旅，由张黄港至龙稍港段及由口岸三江营、京口段实行渡江，另以八兵团之三十四、三十五两军，于战役发起同时，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钳制两浦之敌。渡江成功后，除留部队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应以主力迅速向京沪线上挺进，控制铁路一段，力求首先立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巩固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张战果，对敌人作有后方的、有秩序的进攻。（2）由谭震林同志指挥三野第七、九两兵团，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由姚沟至棕阳镇（不含）段实行渡江。渡江成功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并监视芜湖之敌外，主力应迅速东进，与八、十两兵团会合截断京沪杭公路，完成对京沪杭地区敌人之割裂包围，并协同八、十两兵团各个歼灭之。以上两路（4个兵团），归粟、张统一指挥。（3）二野由棕阳镇（含）至望江段实行渡江，渡江后除歼灭当面之敌外，应以一个兵团，以最快速度迅速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浙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二野主力则应迅速东进，接管三野留置部队的任务，担任歼灭芜湖地区之敌，并准备攻取南京。（4）各部队于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引左右友邻兵团渡江，各部应与友邻部队切取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此《纲要》，在宏观上

对渡江作战有了一个决策。4 月 3 日，中央军委批准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担任渡江任务的各部队于 3 月初至 4 月初，先后进抵长江北岸，全面紧张地展开了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要解决的是筹集船只，动员船工。在地方党和政府的大力协助下，积极筹集和修理船只，并自制部分机帆船。到渡江前，第二、第三野战军共筹集各型木船 9 400 余只，动员了万余名船工随军参战，同时培训了数千名部队选调的水手，以切实保证航渡的需要；然后进行形势任务和新区城市政策和纪律教育，使广大指战员明确树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在沿江地方党组织和江南游击队的配合下，对敌军的防御部署、工事情况和地形、水情进行了全面的侦查，并据此展开了强渡江河和水网稻田地作战的战术、技术训练等等。

人民解放军在完成渡江作战的一切准备之后，为争取国共两党谈判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曾数度推迟渡江的时间。4 月上旬，因国共和谈有了突破性进展，中央军委认为，如果和谈协定于 4 月 15 日左右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⑥]然而，总前委则认为：长江每年 5 月初开始桃汛大水，江面极宽，到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果过久推迟过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主张立即渡江。鉴于此，中央军委权衡利弊与谈判进展情况，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 15 日推迟至 22 日渡江。根据中央军委对于渡江日期的变更是出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时，总前委认为：“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和谈破裂，责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后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⑦]中央军委提出 20 日后人民解放军何日渡江将不受任何限制，完全由中共决定。总前委根据这一指示，经过反复研究，4 月 17 日向军委提出渡江作战“二十日可以开始，二十二日实行总攻，则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后，再考虑停顿。”而“二十日开始到二十二日总攻不能再停，主要原因是我军确已处于半渡状态，全军均已投入战斗，如加停顿，必陷于非常不利。”[⑧]由此，总前委从具体情况出发，实行中央军委规定的 22 日开始渡江，提前了两日。

18 日，中央军委复电总前委及第二、第三野战军：“完全同意总前委的



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卯哿）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⑨

注释：

①《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06页。

②③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472页、第474页、第476页，第383页，第546页。

④《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第322页。

⑤文中之陈即陈毅，饶即饶漱石，邓即邓小平，谭即谭震林，粟即粟裕，张即张震。

⑥⑦⑧《渡江战役》，档案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78页，第83～84页，第100页。

百万雄师过大江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当夜，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与此同时，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在肖劲光的率领下向白崇禧部在江北的汉川、孝感、黄陂、新洲地区展开了一系列进攻。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和西北进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还指出，“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①]

遵照毛泽东、朱德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共7个兵团，24个军，约100万人，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第三野战军在江阴至扬中和贵池至芜湖间作战；第二野战军在贵池至马当间，实施渡江作战。另以第四野战军2个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归第二野战军指挥，由平津地区南下武汉东北地区，在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钳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

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役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突破江防、占领南京。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分3路以雷霆万钧之势向长江南岸广大区域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大进军。4月20日晚8时，以谭震林指挥的人民解放军中集团（七、九兵团）7个军30万人，其第一梯队4个军（七兵团之第二十一、第二十四军，九兵团之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由石矶头至鲁港段首先发起进攻。一时万舟齐发，在数百里江面上扬帆疾驶对岸，迅速突破了敌军防线。据国民党军事机关称：“满江尽为船只，首尾相接，络绎不绝。”[②]《人民日报》当时报



道："一时红旗挥动，冲锋号齐响，炮火映红了的江面，突然扬起几千张白帆，迳向对岸的火光飞去。……对岸敌人开炮了，炸弹在中游掀起水柱，巨浪撞击着船身，而突击队依然破浪前进。"③国民党海军舰只太原、安东、楚同、美亨等赶往该处阻击，激战竟夜，但"顾此失彼"，"致均负伤，弹痕累累""乃被迫驶向芜湖下游"。④经过10个小时的战斗，至21日拂晓，人民解放军登上对岸，一举突破国民党第八十八军防线，占领荻港、鲁港地区，并向繁昌、铜陵地区扩张。中集团突破防线后，敌军呈现出溃乱的局面，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被拦腰斩断。国民党第七绥靖区司令官张世希慌忙告急，汤恩伯仓皇飞抵芜湖督战，指挥杨干才率第二十军堵击，并急令龙潭之第九十九军军长胡长青率2个师火速增援。援军未至，国民党军已全线崩溃。人民解放军顷刻全线向南岸纵深猛烈发展。至23日，已先后解放了铜陵、南陵、芜湖，国民党第二十、第八十八两个军大部被歼。

以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和参谋长张震指挥的人民解放军东集团（八、十兵团）8个军35万人，除以第三十四、第三十五两个军隔江钳制南京、镇江之国民党军外，另以6个军在三江营至张黄港之间分路渡江。21日晚，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等3个军分由圩塘镇至王坍镇、申港至夏港、长山两侧3个地段强渡长江。22日占领扬中、江阴县城，及扬中、镇江，江阴一线的广大地区。在常州以北，22日晨占领利港至桃花港一线，并向南猛进，切断了京沪杭路线。国民党军所倚仗的江阴要塞守备部队临阵起义，活捉了要塞司令官戴戎光，并掉转炮口，轰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阵地。解放军登陆后，迅速击退了国民党第二十一、第一二三军的反攻，并乘胜南进。江阴要塞起义为解放军顺利渡江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汤恩伯急令阙汉骞率第五十四军连夜向武进反攻，但被歼一个师，镇江、丹阳、武进等地先后解放。

4月20日晨，当人民解放军在镇江至江阴段渡江时，英帝国主义"紫石英"号等4艘军舰闯进长江人民解放军防区，不顾解放军鸣炮警告，强行溯江上驶，双方发生激烈炮战，"紫石英"号被击伤搁浅于镇江附近江面，其余3艘英舰逃往上海。在粉碎英帝国主义的武装挑衅后，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于4月30日发表声明，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要求英方道歉和赔偿损失，并要求英、美、法等各国的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⑤声明中也宣布，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当职业的外国侨民，愿意考

虑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各国政府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声明表达了中国人民不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它声明，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者依仗船坚炮利在中国领土上横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人民解放军西集团（三、四、五兵团）9 个军 35 万人，在强大的炮火支持下，也于 21 日下午 5 时起开始在马垱至贵池间 200 余里长的江面上，由华阳、枞阳等处分路渡江。渡江后，刘伯承下达命令，要求截断浙赣线、杭徽线，歼击这两线的敌人，准备随后进击杭州的目的。其中三兵团进击徽州地区敌人；五兵团进击衢州截敌；四兵团进击上饶地区敌人。22 日自贵池至彭泽间渡江的部队，占领了南岸沿江 200 里阵地，并解放了彭泽、至德两县城及贵池、东流、至德、彭泽之线的广大地区。自马当以东渡江的部队，攻占黄山、香口等要点。22 日已渡过 30 万人，击溃国民党军刘汝明兵团 3 个军。至此，70 万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

截至 4 月 22 日 13 时，第三野战军之第七、九兵团大部过江；第二野战军之第三、四、五兵团亦已过江；东集团之第二十九、第二十八、第二十三军 3 个军已过江。与第二、第三野战军横渡长江的同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解放了黄梅、浠水、汉川等地，有力地钳制了白崇禧集团，策应了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

4 月 27 日，解放军总前委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到达南京，总前委机关也从合肥移驻南京。这时，中共中央指定刘伯承为南京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华东局组织了 3 000 余人准备对国民党政府机构进行有计划的接管工作。对国民党的政治机构予以彻底摧毁，对官僚资本的企业由军管会派军代表监督，使其继续生产，并在接管中，适时地召开代表会议，保障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二阶段：合围歼灭芜湖、南京、镇江逃敌，占领浙赣铁路。

解放军 3 路大军渡过长江后，直插京沪杭、京杭公路与浙赣线，在渡江南进的百万解放军攻击之下，国民党江防军面临被分割包围的危险。4 月 21 日，李宗仁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高级将领商讨今后的战略。会上诸位倾向于白崇禧的计划，即放弃南京、上海，把汤恩伯的主力移到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 40 万国民党军互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阻止解放军进入西南。22 日，蒋介石邀约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人在杭州举行秘密

 

会议商讨对策，最后作出4项决定：“（1）关于共党问题，政府今后唯有坚决作战，为人民自由与国家独立奋斗到底。（2）在政治方面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3）在军事方面由何院长兼任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军之指挥。（4）采取紧急有效步骤，以加强中国国民党之团结及党与政府之联系。”⑥

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前，3月26日国民党统治集团为加强对京沪杭地区的控制，成立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政务委员会，由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兼主任委员。但当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后，千余里的长江防线一触即溃，沿江守敌纷纷向南退缩。22日下午，国民党军才仓促部署江防全线撤退：芜湖以西部队向浙赣路退却；芜湖以东、常州以西部队向杭州方向退却；常州以东部队沿京沪路向上海撤退。国民党军企图在浙赣铁路和上海地区组织新的防御。

4月22日，解放军第三十五军攻克了江浦、浦镇，23日占领浦口，南京的北大门洞开。南京城内一片混乱，抢劫事件多有发生。国民党政府各院、部、会机关纷纷撤离南京，迁往广州；其总统府也撤往上海；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等军政要员亦于23日逃离南京。国民党军第四十五、第二十八军残部以及军、政、警、宪人员沿京杭公路仓皇南逃。国民党军撤离南京时，放火焚烧了城内的许多房屋。23日下午，解放军前哨部队第三十五军进抵南京东部，由和平门入城。当天深夜，人民解放军大部队由下关经挹江门，开入市区，解放了南京城。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仅3天时间，便攻占了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中心——南京，标志着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

4月25日，《庆祝南京解放》的社论在《人民日报》刊登，指出：“南京的解放正式地表示了国民党统治的灭亡。”5月1日，中共中央为南京解放发出的贺电说：“南京迅获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并指示“现在整个形势对于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极为有利，尚望前线将士继续进攻，后方人民努力生产，各界同胞齐起协力共同为消灭反革命残余力量，解放全国人民，建立统一的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⑦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后，挥笔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

沧桑。

这首诗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由于解放的大城市越来越多，毛泽东适时地提出要学习城市政策的问题。4 月 1 日，第三野战军颁发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作为全军指战员进入城市后的行为准则。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后，为了使城内的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到处张贴了安民告示，负责维持城市秩序。4 月 25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工作的提纲（草案）》，并以此为基础同时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了人民解放军解放江南，解放全中国的“约法八章”。这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争取人民群众以及瓦解敌人起到了重要作用。28 日，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正式成立布告如下：“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电令：南京已获解放，为保障全体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决定在南京市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市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军事民政等管理事宜。并任命刘伯承为该会主任，宋任穷为该会副主任。本会遵即于 4 月 28 日宣告成立，本主任并于同日到职视事，奉行中国共产党所指定的城市政策，遵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实行军事管制，特此布告周知。”[8]随后，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即派出军事代表队国民党在南京的统治机构按照军事、行政、财经、公安、文教、交通、国家企业等各个系统，进行接管。截止 5 月底，接收工作已大致完成。

当人民解放军东路大军胜利渡过长江时，4 月 23 日，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所属舰艇 25 艘在南京东北约 8 里的笆斗山江面光荣起义，加入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受到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的欢迎。同时，镇江江面上的国民党海军舰艇 23 艘，也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同一天，人民海军的前身——华东军区海军在白马庙宣布成立，这一天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诞生纪念日。5 月 1 日，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奉命成立，张爱萍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后，总前委依据国民党军纷纷向浙赣线及杭州、上海撤退的情况，迅速调整了进攻部署：令渡江东集团和中集团主力不顾一切疲劳，不为小股敌军钳制，分别沿丹阳、金坛、溧阳及太湖西侧之线和南陵、宣城、广德之线向长兴、吴兴地区疾进，切断宁杭公路，完成战役合围，歼灭镇江、南京、芜湖地区南逃之敌；以中集团一部迅速向杭州挺进，



第八兵团部率第三十五、第三十四两个军担任南京、镇江地区的警备任务，第十兵团的第二十九军东进攻取苏州，向上海方向警戒；解除西集团第四兵团之沿江东进任务，改为与第三、第五兵团并肩向浙赣铁路挺进，追歼逃敌，控制浙赣线，确保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保障第三野战军歼灭包围之敌，同时以第三兵团的第十军担任安庆、芜湖等地的警备任务。

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接到命令后，不顾疲劳，不待辎重到达，克服阴雨连绵、道路泥泞等困难，向浙赣铁路和京沪杭铁路展开全线进攻。

东集团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八军、二十三军、二十军、三十一军等各部迅速猛进，阻击与歼灭敌人。4月23日到25日，连克武进、丹阳、宜兴、溧阳等重要城镇。26日至27日又占领长兴、吴兴，完全切断了京杭国道交通。第二十九军全力东进，23日占领无锡，27日解放京沪杭路与苏（州）嘉（兴）路的连接点苏州，30日进占吴江。第二十六军在句容以南追击逃敌。第三十四军、三十五军担任南京、镇江警备任务。

西集团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军、三十三军、二十四军3个军主力合围广德、吴兴一线之敌，配合十兵团主力完成包围向杭州溃逃之敌。26日，二十七军占领广德。27日，二十五军攻占郎溪。沿京杭国道及其以西向杭州溃逃之敌8个军，除五十四军、九十九军先期逃向上海与浙赣外，其余二十军、六十六军、二十八军、四十五军、四军及五十一军共6个军分别于26日、28日、29日3天中在溧阳附近及广德以北附近地区遭全歼，被俘2.7万余人，基本上结束了这次大规模的追歼战。此外，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三十军在23日至24日分别攻占了芜湖、当涂，包围歼灭逃敌二十军、九十九军两个军的大部。七兵团第二十一军、二十二军配合东集团的第二十三军向杭州方向进军；二十一军在22日、23日分别协同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占领贵池、青阳，25日攻占泾县，28日占领宁国，5月3日占领余杭，4日下午抵达杭州；二十二军也于4日抵达杭州北郊；二十三军在参加追歼战后向杭州挺进，30占领吉安，5月2日攻克武康、德清，率先于3日下午进入杭州市区。解放军陆续进入杭州，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杭州解放后，二十一军又相继攻占萧山，解放绍兴；二十三军占领海宁；二十七军占领桐乡，解放嘉兴。

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孝感、黄陂，进逼武汉，牵制了白崇禧集团。第二野战军不顾疲劳，奋勇向浙赣线进攻。4月22

日至26日三、四、五兵团先后由棕阳至望江强渡长江后，向浙赣铁路全线进攻。22日晚第三兵团第十军进占长江北岸国民党军的强固据点安庆。第三兵团占领贵池、青阳后，26日第十一军占领祁门。同日，十二军占领太平，29日占领徽州。30日第四兵团第十四军、十五军抵达乐平，5月4日第十五军攻占上饶，5日占铅山。十四军于5月6日占金溪。十三军在5月4日占贵溪。第五兵团第十六军在23日占领玉德，5月2日占领婺源，6日占领衢县及江山。第十七军在6日攻占玉山。第十八军在6日继续向常山开进。由此，第二野战军完全控制了浙赣线，5月7日在诸暨与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胜利会师，完全切断了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随后，全线长驱南进连克浙赣线东段的金华、义务、永康、丽水、松阳、遂昌等15座县城，越过武夷山进入福建省境。

26日，中集团之第九兵团主力及第七兵团一部通过广德，东集团一部进抵天王寺、宜兴一线，并在溧阳以西、以南地区歼敌一部。中集团之第七兵团主力沿安吉、武康之线向杭州挺进。接着，人民解放军对被围之敌发起攻击，经2日战斗，于29日将国民党军8万余人全部歼灭。5月3日，第七兵团主力占领杭州。4日，西集团第二野战军之第四兵团，占领浙赣线之上饶、贵溪、横峰，至7日，第三、第五兵团亦分别占领金华、衢县，其中第三兵团一部与中集团第七兵团一部会师诸暨。在上述追击作战中，先后歼国民党军第六十八、第八十八、第一〇六、第七十三军等各一部，其残余势力纷纷向福建、浙东逃窜。人民解放军控制了义乌至东乡段400余公里的浙赣线。西集团的这一行动，不仅割断了汤、白两集团的联系，粉碎了国民党军在浙赣线组织抵抗的企图，而且扩大了预定的战役范围，为下一步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了孝感、黄陂，逼近武汉，完成了钳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4月28日，先遣兵团归还第四野战军建制。

在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胜利渡过长江，追歼逃敌，并且控制了浙赣铁路杭州至东乡一线，割断汤恩伯与白崇禧两集团联系的情况下，国民党军慌忙收缩兵力，企图进行垂死的挣扎。驻守武汉、宜昌地区的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共有15个军25万人，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忠告，拒绝以和平方式解决华中问题，以一部分兵力拖延第四野战军渡江，掩护主力向湘赣边、湘中、湘鄂西地区退却，以保存实力，在汨罗江以北、长沙以东和大巴山地区组织新的防线，以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湘、赣、粤、桂和西进四川。



为粉碎白崇禧集团，中央军委、总前委决定：第三野战军以第七兵团继续向浙东、浙南地区进军，解放浙江全省；第八兵团以一部兵力继续担任南京、镇江地区的警备任务，并肃清苏浙皖边境溃散之国民党军；集中第九、第十两兵团及第八兵团一部共8个军攻取上海，歼灭该地之国民党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在浙赣路金华、东乡段休整，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保障第三野战军围歼上海之国民党军；以一部兵力向闽北、赣中进击，并相机进占南昌。同时，中共中央军委也指示第四野战军首长，以先遣兵团伺机渡江，占领武汉三镇，为第四野战军主力此后进军中南创造条件。

5月6日，第十二兵团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等兵团首长召集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及湖北军区首长会议。经过研究，决定遵照中央局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以第四十三军在韦源口、龙坪地段强渡长江，迂回武昌，以第四十军从武昌正面的团风至韦源口地段实施渡江。

5月14日晨，各师按照预定部署向长江北岸国民党桂系的第四十六军、四十八军和第一二六军的江防部队据点发动猛烈攻击。第四十三军在连续夺取团风、黄冈、兰溪、浠水等地后，控制了西起团风、东至武穴100多里的江北沿岸地段后，于15日晨从兰溪及其东西地段发起渡江作战。官兵冒着敌人的炮火，迅速突破敌军江防阵地，顺利登上南岸，随即向敌军防御纵深发展进攻，直插黄石港、石灰窑、大冶地区。16日，占领了大冶、黄石、鄂城等长江以南的鄂东地区。17日，占领了江西瑞昌、九江，并继续沿南浔路突击前进。

第四十军在兵团副司令兼军长韩先楚、军政治委员卓雄的率领下，于15日向汉口外围之敌发起攻击，肃清了标子湾、刘家庙地区的国民党军。16日晨，进至武昌、汉阳市郊的滠口附近。武汉之敌已弃城南逃，随即向市区急进，于17日占领整个武汉市区，全歼武汉保警部队及警察局所属武装。17日第四十军一五三师进占武昌。至此，武汉三镇宣告解放。同时争取了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部约2万人起义。

渡江以来到5月11日，第二、第三野战军的战绩如下：

第二野战军：全军歼敌六八军、九六军、一〇六军之主力及一七四师全部，七三军一部及第九编练司令部等，共俘敌达四万余人。第三野战军：歼敌6个军之全部，即二十八、四十五、二十、六十六、四、五十一军，2个军之大部，即二十一、八十八军，3个军之一部，即九十九、一二三、五十四军，俘敌12万余人。第二、第三野战军共计歼敌20万余。

第三阶段：发起淞沪战役，攻占上海，歼灭汤恩伯集团主力。

随着南京的解放，上海的处境便危在旦夕。4 月 23 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召集顾祝同、汤恩伯、周至柔、陈大庆等人举行军事会议，部署保卫上海的任务。蒋介石也在 26 日抵达上海后召集了顾祝同、汤恩伯、周至柔、陈大庆、桂永清、谷正纲等高级将领，研究部署上海的防御战略。在郎（溪）、广（德）地区围歼战后，退守上海市及其周围地区的汤恩伯集团 8 个军 25 个师共约 20 万人，以第二十一、第五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四、第七十五、第一二三军 20 个师，配属坦克、装甲车各一部，守备黄浦江以西市区及外围之太仓、昆山、嘉兴、金山等地；以第十二、第三十七军共 5 个师守备黄浦江以东地区。全市的防御重点，置于浦西市郊之月浦、刘行、大场和浦东之高行、高桥地区，借以屏障吴淞和市区，保障其出海通路。另以海军海防第一舰队和空军协助陆军防守。其中五十四军完全是美械装备，是上海守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五十二军、七十五军、三十七军、二十一军、九十九师都是半美械装备，有相当的战斗力。此外，还有军舰 30 余艘，飞机 120 余架。国民党军企图凭借上海丰富的资财和 4 000 多个永久工事继续抵抗，以及海军空军的支援，负隅顽抗，以争取时间，抢运物资，并准备大肆破坏城市，阴谋挑起国际事件，促使帝国主义武装干涉。

国民党在淞沪地区的防御工事分为外围阵地、主阵地和核心阵地 3 道地带。主阵地有：月浦、杨行、大场、真如和浦东的高桥、高行等地，主阵地的前沿，距市区 3 至 6 公里。核心阵地工事包括国际饭店、四行仓库、百老汇大楼等 32 座建筑。整个上海，密布钢骨水泥的碉堡 5 000 个，美式水泥活动碉堡 3 000 个，卫星工事半永久性野战掩体万余处。这些工事有些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请美国人、德国人修筑的，后来日本人，国民党军又加修的；有些则是 1949 年初起国民党军加工赶修的。汤恩伯等为了构筑阵地，将市郊数 10 里内的村庄房屋与树林砍光、拆平、烧毁，成为一片杳无人烟的瓦砾。上海四周还布满了地雷阵、铁丝网和纵横交错的河沟，加以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以阻止解放军前进。

为了达到既要消灭敌人，又要完整地接管上海，以利今后建设之目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首先明确了攻克上海的指导思想："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而又不能把城市打烂了，要争取把上海基本上完整地接管过来。"⑨中央军委向总前委、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首长先后发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认真迅速地作好占领上海的一切准备，以便在击败国民党军之后，能够主动地



有秩序地接收上海。在军事部署上，“请粟（裕）、张（震）即行部署于五月十日以后，五月十五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逃走……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为了防止敌军有可能过早从上海撤退，同时做好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4 月 30 日，总前委向中央军委建议：应该退出进占浏河以及进入上海的时间。这一建议得到中央军委的采纳。中央军委于 5 月 3 日指示：“上海在辰灰（五月十日）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十天时间作准备工作。在辰灰以后，则应作两方面的计划：甲、即去占领上海，这是假定汤恩伯在十天内由上海退走，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迫使你们不得不去占领。你们的准备主要地应放在这点上，否则，你们，将陷入被动。……乙、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二十天或一个月再去占领。只要汤恩伯不走，就应如此。占领浏河的时间亦可推迟。我们前已电告你们，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10]

为了阻止国民党军劫运物资，中央军委 5 月 6 日又作出指示：“辰灰以后，（五月十五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逃走（据上海吴文义几次报告，汤恩伯正在运走物资），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领上海。你们的准备工作愈快愈好。”[11]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5 月 10 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决定以第九、第十两个兵团并第二十六军首先采取钳形攻势，从浦东、浦西两翼迂回，进逼吴淞口，先断国民党军海上退路，封闭上海物资之窃运，而后围攻市区，分割歼敌。具体部署是：以第十兵团首长指挥第二十六、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三军附特纵炮兵一部，由常熟、苏州地区向昆山、太仓、嘉定地区攻击前进，歼灭该区之国民党军，直插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截断敌之海上运输及退路，然后由上海西北地区协同第九兵团向市区进攻；以第九兵团首长指挥第二十、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一军附特纵炮兵一部，首先以第三十、第三十一军由南浔、吴江等地迂回浦东，向奉贤、南汇、川沙攻击前进，进逼高桥，协同第十兵团确实封锁吴淞口；以第二十、第二十七军由松江以南和嘉兴及其以东地区向松江、青浦

攻击前进；而后该兵团由东、南、西三面与第十兵团会攻上海市区之国民党军。

淞沪战役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5月12日夜间至24日下午，为外围作战，中心任务是钳击吴淞，断敌海上通路。

第三野战军解放杭州之后，即分成东（九兵团）西（十兵团）两路于5月12日向上海发起进攻。

西路十兵团由苏州河及京沪铁路以北向东进攻。5月12日第二十六军占领昆山，14日连克安亭、黄渡、南翔3个车站，距离上海仅35里。同日，第二十八军攻占太仓、嘉定、罗店，14日晨包围刘行迫进杨行。第二十九军在12日占浏河后，继续向月浦、杨行、刘行之敌发起猛攻。敌军凭借钢骨水泥的子母碉堡群阵地为依托，在军舰、飞机的支援下，以坦克、装甲车为掩护，与进攻月浦、杨行、刘行的人民解放军发生激烈交战，人民解放军进展缓慢。从15日起，各部队遵照总前委和野战军首长的指示，加强了敌前侦察，调整了部署，总结了经验，改以小分队行动为主，实行火力、爆破、突击紧密结合的攻坚战术，逐个夺取敌碉堡，加速了战斗进程。至19日，相继攻占月浦、国际无线电台，肃清了刘行残敌，直逼吴淞。

东路第九兵团沿沪杭铁路、黄浦江及海岸长途急速前进。5月12日，第二十军攻占平湖，13日占领金山卫。第三十七军在13日攻占松江，14日占领青浦，距离上海仅有40公里。第三十军在14日占领奉贤、南汇，15日又占领了川沙。第三十一军在16日攻占了周浦，随后又协同第三十军主力会攻高桥，国民党军被迫于22日将第七十五军增调高桥，以保障吴淞口出海通道。至此，人民解放军已将国民党军主要兵力压缩于吴淞口两侧地区，为攻取市区，歼灭守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23日晚，人民解放军猛攻上海西南郊主阵地，开始了市区作战。24日，第二十七军攻占虹桥，继而由徐家汇梵王渡一线向市区攻击前进。同日，第二十军占领浦东市区。23日下午攻占龙华镇及龙华机场的解放军也一并向市区挺进。截止24日下午，人民解放军在上海外围作战中，先后解放县城12座，共前进200余里。歼敌第五十一军、第二十三军等部2万余人，占领了敌人的外围阵地，部分突入了敌人的主阵地，完成了对大上海的包围。取得了淞沪战役决定性的胜利。在上海陷于解放军重重包围的情况下，蒋介石拟定了“退台计划”，决定“以定海、普陀、厦门和台湾为训练干部之地



区；建设则以台湾为着手之起点。”[12]并且于5月16日离开上海赶赴台湾。上海守敌汤恩伯等也于23日登舰逃出上海，在吴淞口外指挥退却。

第二阶段：5月24日至27日，市区作战，中心任务是向市区发起总攻，解放上海。遵照军委和总前委的命令，第三野战军首长随即增调第七兵团之第二十三军和第八兵团之第二十五军分别配属第九、第十兵团。5月24日第七兵团第二十三军先头师投入市内。第九兵团第二十军主力也于24日夜从高昌庙龙华一带西渡黄浦江，至午夜1时，各路大军即在市中心跑马厅会使，占领大部分市区。25日上午10时已经全部控制苏州河以南市区，并占领苏州河上的3座桥梁，攻人河北地区。苏州河北之敌恐慌混乱之极，负责指挥敌军作战的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表示愿意接受投诚。5月25日晚7时，刘昌义及其随行人员乘车来到约定的谈判地点，第九兵团地二十七军聂凤智军长当即向刘昌义宣读了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命令：“令刘昌义所辖部队，自苏州河至吴淞一线，限五月二十六日晨四时前，分别交出各阵地，于江湾、大场一带集合待命。对各重要建筑和仓库，不得故意破坏，所有物资设备，均原封不动交人民解放军接收。而其个人的生命财产，人民解放军完全负责妥加保护。上项命令如有不遵守者，由人民解放军解决之。”[13]刘昌义表示完全同意，遂于25日和26日率其所部第二十一、第一二三军等各一部向解放军投诚。

25日晚东西两兵团对吴淞要塞发起总攻。第十兵团直逼吴淞，第九兵团强渡苏州河指向江湾杨树浦地区，以共同会歼敌人的主力。第二十六军也于25日晚至26日晨先后攻占真如、大场、江湾、江湾车站、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等重要据点及广大市区。26日，第三十、三十一两军全部肃清高桥地区的敌人，同时第二十九、二十五两军也占领了狮子林炮台，攻占宝山县城和吴淞镇，俘虏敌人约13 000余人。第三十三军攻占杨行，第二十七军在杨树浦受降最后一批大股请降之敌二三0师。到此，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全部解放，淞沪战役胜利结束。

人民解放军用不到10多天的时间就攻占了上海外围阵地，并迅速突进市区，粉碎了国民党一切近代化的工事阵地，取得了渡江战役以来最伟大的胜利。要与上海“共存亡”的蒋介石和汤恩伯顿时慌了手脚，蒋介石慌忙从复兴岛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而汤恩伯也于5月24日下午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转移到吴淞口的军舰上，准备随时逃跑。由于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要员已经逃走，代市长赵祖康遂率领市府人员高悬白旗，向解放军投降。蒋介

石得知上海全部解放后，于5月28日乘飞机由定海飞抵台湾冈山，再转高雄寿山。

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模范地执行了城市政策，露宿街头，不进民房，保护外侨，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爱戴。目睹解放军进入大上海的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政府虽已更易，而人民可说毫无骚扰。""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他看到"沿途如霞飞路、南京路、福煦路均人山人海如上元、元旦、假日状态"。他确认："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14]美国《生活》杂志据此也认为："各项消息指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是国民党的时代已经结束。"[15]

上海，位于东海之滨，濒临长江入海处，人口约500万，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也是近百年来沦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主要基地，各种反动势力猬集，政治情况十分复杂。所以，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中共中央在给上海解放的贺电中说："我人民解放军在此次作战中俘敌十余万众、纪律良好。上海各界人民积极与我军合作，使蒋匪破坏计划大部失败，全市秩序迅速恢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上海前线人民解放军、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和上海全市的人民致热烈的祝贺，向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的人民致热烈的祝贺。上海解放以后，上海的共产党员、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就是团结一致，与进步的产业界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通力合作，克服困难，恢复生产，恢复城乡联系和内外贸易，并与反动势力的残余作继续斗争而取得胜利。我们相信，有长久革命传统和高度政治觉悟的上海人民，在全国人民的援助之下，一定能够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16]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也随即成立，陈毅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粟裕任副主任。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为上海市长，曾山、潘汉年、韦悫为副市长。在人民群众的热情协助下，开始对上海有秩序地进行接管。中共上海地下党也积极组织和领导广大工人、学生及市民开展护厂、护校的斗争和瓦解敌军的工作，对解放和接管上海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央接管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经过接管人员的积极努力，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胜利完成了接管任务。

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阵亡10 553人，负伤35 448人，其他减员3 877



人，共计49 878人，损耗山野炮、步兵炮5门，轻重迫击炮68门，轻重机枪412挺，长短枪2 433支，各种炮弹164 577发，各种枪弹7 579 084发，手榴弹88 655枚，炸药26 559千克；毙伤国民党军28 144人，俘虏322 313人，起义投诚者达85 558人（1个军部，9个师，江阴要塞守备总队，1个自卫总团，2个自卫团，6个保安团），全歼国民军正规部队8个军部、3个师部、32个师，大部歼灭4个军部、5个师，一部歼灭13个师，歼灭非正规部队10个交警总队，2个保安旅，12个保安团以及联勤总部警卫团，伪政府警卫团，第九编练司令部荣誉2团，京沪杭护路队军官教导团，江宁要塞守备总队等，并缴获要塞加农炮17门，山野炮286门，步兵战防炮226门，高射炮4门，轻重迫击炮2 426门，轻重机枪14 356挺，长短枪179 771支，火箭筒318具，枪榴、掷弹筒2 084具，各种炮弹359 835发，各种枪弹28 793 732发，坦克、装甲车123辆，汽车2 171辆，舰艇（船）220艘，马匹6 250匹，电台160部；击毁击伤飞机3架，坦克、装甲车11辆，汽车9辆，舰艇（船）37艘。

渡江战役，是一个大规模战略性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在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的条件下，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由陆、海、空三军组成的长江防线，攻克了其坚固设防的上海等重要城市。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合围并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部，46个师，约43万人的重兵集团，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企图盘踞长江以南半壁江山，重振旗鼓，伺机反扑的阴谋。解放了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和江西、湖北、福建3省部分地区，为人民解放军而后继续向福建及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注释：

①《人民日报》，1949年4月22日。

②④《戡乱简史》，第262页。

③《人民日报》，1949年4月28日。

⑤《人民日报》，1949年5月1日。

⑥《申报》，1949年4月23日。

⑦《人民日报》，1949年5月1日。

⑧《人民日报》，1949年4月29日。

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22页。

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73页。

⑪《占领吴淞嘉兴等地应注意的问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75~576页。

⑫《蒋经国自述》，第258页。

⑬聂凤智:《上海激战三昼夜》，《解放战争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第378页。

⑭《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5~1256页。

⑮转引自:《中国元帅陈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453页。

⑯《人民日报》，1949年5月31日。



解放华东地区

渡江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地，虽然国民党军队主力被大部歼灭，但仍有150多万残余军队，主要盘踞在东南沿海、中南、华南、西南、西北等地区，负隅顽抗。其战略态势是：退守湘桂一线的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集团与据守广东的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集团，在湖南、广西、广东联合布防，企图依托湘江、永乐江、资水，背靠滇、桂、黔，组成一条东起乐昌、西至湘西芷江的“湘粤桂联合防线”，以阻止解放军南下；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集团和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集团据守川陕鄂边境，沿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组成“西南防线”，企图阻止解放军入川；卢汉、谷正伦、罗文广等部据守昆明、贵阳、雅安、宜宾、成都、重庆等地，担任守备任务。蒋介石的算盘是：占据两广，盘踞西南，建立以四川为中心的“反共复兴”基地，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持久对峙，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如防守失败，则向西康、云南退却，再迫不得已，退往国外，准备卷土重来。

为了彻底歼灭国民党残余势力，迅速解放全国，针对国民党军的上述防御态势，中央军委向各野战军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三野战军除以主力位于京沪杭地区，准备对付可能的美国出兵之外，以有力兵团进军福建，完成解放东南沿海的任务，并建立攻台的基地；第二野战军在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协助下，进军西南，解放与经营川、黔、康、滇四省；第四野战军并指挥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进军中南，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等省；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完成解放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西北五省任务。为了防止国民党残余军队一触即溃，退向台湾或逃窜国外，中央军委要求各野战军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以围歼战为主，争取将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聚歼于各个战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各野战军以雷霆

之力，发起解放全国的最后进军。

在渡江战役即将胜利结束时，青岛国民党军于 1949 年 6 月 2 日撤逃。国民党在华东地区北面仅剩长山列岛少数人盘踞，其余 18 万人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陈诚指挥下，退守福建和舟山群岛等沿海岛屿，重新组织防御，企图控制上述地区，作为台湾的屏障，待机反攻。其中舟山防卫司令石觉指挥 3 个军 6 万人退守舟山群岛，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指挥 3 个兵团 10 个军约 12 万人，退据福建及其沿海地区。

早在 1949 年 5 月 23 日，中央军委就指示第三野站军："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同时指示第二野站军："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①]为迅速消灭残敌，解放福建和沿海岛屿，建立攻取台湾的基地，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第三野战军决定由福建籍，对福建民情、军情、地形、气候非常熟悉的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率所属第十兵团 10 万大军，进军福建；同时命王建安第七兵团攻取舟山群岛。

第十兵团在上海战役结束以后，便全部进行入闽作战的准备工作，经过紧张的山地作战训练和充分的思想政治动员，7 月 2 日，第十兵团 10 万大军南下，月底抵达福建建瓯、南平、尤溪、古田等地区。根据福建的敌情和地形特点，10 兵团司令叶飞，和政委韦国清决定以两个作战阶段完成解放福建的任务：第一阶段，集中全力歼灭福州地区之敌，控制民众；第二阶段，南下泉州，再歼漳州、厦门地区之敌。同时根据福州地区国民党军随时可能南逃的情况，决定采取钳形攻击战法，首先由两翼插至国民党军侧后，封锁闽江口，切断福厦公路，切断国民党军海陆退路，然后聚歼。

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指挥的 10 个军共 27 个师约 12 万人。其中第 6 兵团 5 个军 6 万人防守福州地区，第 8 兵团 2 个军 3 万人防守漳州地区，第 22 兵团 3 个军 3 万人防守泉州、厦门、金门地区。蒋介石得知解放军南下入闽，特飞到福州，召集高级将领会议，严令朱绍良等死守福州。8 月 6 日，人民解放军分三路向福州开进，11 日发起战斗，此时，福州及附近国民党军队，早已军无斗志，虽有蒋介石严令，仍然一触即溃。至 16



日，解放军相继攻占马尾、长乐、福清，完成对福州的合围。当日晚，朱绍良，不顾蒋介石死守命令，下令福州守军自行向漳州、厦门一线撤退，自己乘飞机逃往台湾。17日晨，负责攻取福州的第十兵团第二十八、三十一军不战而入福州，之后马不停蹄，追击南逃之敌。至23日，敌除一部逃跑外，其余均被歼灭于福清、永泰以北、马龙江以内地区。此役第十兵团仅以伤亡1 500余人的代价，取得歼敌4万多人的辉煌战果。

福州战役结束后，第十兵团一部在闽中游击队配合下，于8月底至9月中旬，解放了平潭岛、南日岛及循州岛等沿海岛屿，歼敌9 000余人。主力休整，司令员叶飞和政委韦国清同时筹划主力歼灭防守漳州、厦门、金门地区的汤恩伯集团。汤恩伯自上海战役败逃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指挥约6万残兵防守漳、厦、金地区，其中以第八兵团两个军约3万人防守漳、厦地区，以第二十二兵团3个军3万人防守大小金门。

9月17日，第十兵团以第二十八、三十一军主攻，第二十九军助攻，发起漳厦金战役。19日，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七、二七八团攻克漳州外围县城同安，漳州守敌不战而逃。解放军开始扫清厦门外围的战斗，至25日相继攻占了同安、长泰、南靖、漳州及马巷、澳头、集美等厦门外围阵地，歼敌1.2万人。随后，解放军征集船只630多艘，调运船工1 600余人，担负进攻厦门的第三十一军部队同时进行紧张的渡海作战训练。10月15日，我军开始渡海进攻厦门。至17日，大部队先后渡海进入厦门，汤恩伯海路逃脱。当日，厦门解放。此战，解放军以微小代价，歼灭守军约2万人。整个漳厦之战，共消灭敌军4万多人。

厦门解放后，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等开始忙于厦门接管工作，命令第二十八军担任解放金门的任务。金门位于厦门以东，距大陆最近处约5.5海里。大金门岛面积为124平方公里，小金门岛面积为15平方公里。大金门东部山高岸陡，不易攀登；西半部地势较平坦，利于登陆，是国民党军的防守重点。大小金门原有国民党军李良荣第二十二兵团全部、青年军第二〇一师及第十二兵团第一一八师防守，共约两万人。厦门岛解放后，金门守敌受到很大威胁。蒋介石为固守金门，于10月10日后，又陆续将潮汕地区的国民党精锐胡琏第十二兵团的第十八、十九军增防金门。至10月24日，金门

敌军的总兵力已增至4万余人。

10月15日厦门解放后，18日，叶飞决定以第二十八、二十九军各一部共7个团的兵力，在第二十八军首长指挥下，担任攻取大金门的任务，以第三十一军一部攻取小金门，20日发起攻金战役。由于船只严重不足，时间推迟到23日。21日，第十兵团发现国民党军胡琏第十二兵团抵达金门湾，其部队由潮州、汕头开始船运。23日，又侦悉该敌第一一八师已抵达大金门，后续部队正在海运途中。第十兵团首长认为，必须乘敌增援部队未到达金门之时，抓住战机，发起渡海作战，攻取金门。因此，决心于24日夜发起战斗。战斗部署是：以第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第二四四团、第八十四师第二五一团、第二十九军第八十五师第二五三团共3个团为第一梯队，在大金门岛北部湖尾乡至古宁头段登陆突破，首先攻歼该岛西半部之敌，而后会同后续梯队攻歼东半部之敌。预定3天解决战斗。

但因轻敌和组织指挥失误，后续部队又无船可渡，登陆部队与国民党守军苦战3昼夜，终因兵力不足失败。进攻金门岛的战斗，共毙伤国民党军9 000余人，但登岛部队共3个多团9 086人（内有船工、民夫等350人）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这是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一次重大损失。

战后，第十兵团专门召开会议进行战役检讨，总结出这次战斗失利的主要教训是：在胜利的形势下，高级指挥员轻敌麻痹，战斗任务尚未全部完成，就过早地转移了工作重心，忙于城市接管，把攻打金门的指挥责任交给了第二十八军；对渡海登陆作战的特点和困难认识不足，船只准备不充分；对敌情掌握不准确，对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两个军增援金门，敌我力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未及时察觉，只强调抓住战机，仍按原计划发起战斗；战斗组织指挥不严密，不同建制的3个团没有统一指挥，仓促发起战斗，这就难以避免造成严重的损失。进攻金门岛战斗虽然失利，但登陆作战的指战员们顽强拼搏、英勇献身的战斗精神是永不磨灭的。

10月29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亲笔拟写《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援》的电文，致电第三野战军和其他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要求各大单位转发各兵团、各军负责同志一起严重注意，指出："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此



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②]

11 月 14 日，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就金门战役失利后的政治工作等问题，致电第十兵团政治部，要求正确向兵团将士解释金门战役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战役指导思想上重厦（门）不重金（门），轻敌急躁，缺乏细致的组织工作与技术上的充分准备，受气候变化及地理条件的影响，等等，要求部队树立信心，加强军事准备工作，争取下次战役的光辉胜利。

在第十兵团解放福州厦门攻打金门的同时，第七兵团担负解放舟山群岛的重任。舟山群岛是国民党防守的重点，是国民党借以巩固台湾，进窥大陆的前哨基地。但是随着华北西北，西南各地的相继解放，舟山群岛已经陷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人民解放军采用"先取外围，后取本岛"的作战方针，于 1949 年 8 月 18 日，开始向舟山本岛的外围岛屿发动攻击。在舟山危急之时，蒋介石亲往舟山，为守岛官兵打气，并召见桂永清等"研究定海防卫，收复金塘、六横岛之计划"[③]国民党为加强舟山守卫，从台湾、金门等地增援部队，连同舟山守军共 12 万人。11 月 3 日，第七兵团 22 军攻击登步岛失利。毛泽东指示三野："须严重注视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④]三野根据这一指示，决定增援部队，兵力由 4 个师增至 12 个师又 10 个炮兵团。在战斗发起前，蒋介石鉴于海南岛守军被歼，为确保台湾，决定将国民党守军 10 万余人，从 5 月 13 日起从舟山秘密撤退。5 月 16 日，三野浙江前线部队在人民支援之下，登陆舟山本岛，解放定海，进而于 18 日解放舟山群岛。21 日，中央军委贺电舟山战斗胜利时指出：这个胜利，打破了台湾残敌利用舟山群岛为根据地对华东进行封锁骚扰的计划，进一步造成了解放台湾的条件。

1949 年 8 月至 1950 年 5 月，第三野战军在进军东南过程中，歼敌 10 万余人，解放了福建省及沿海大部岛屿。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以武力保护台湾，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攻台任务随之解除。

注释：

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591 页。

②《解放战争战略追击·华东地区》，第 349 页。

③《蒋经国自述》，曾景忠、梁之彦选编，团结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96 页。

④《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42 页。



解放中南地区

国民党在长江防线被突破和华北西北连遭败绩以后，尚存的150万人分布在中南、西北、西南和沿海台湾地区继续顽抗。盘踞在中南地区的有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和广州绥靖公署（后改为华南行政长官公署）余汉谋部共28个军73个师总兵力40万余人。其部署是：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6个军于宜昌沙市地区；长沙绥靖区程潜部和第一兵团陈明仁部4个军于长沙、湘潭地区；江西绥靖公署方天部4个军于遂川赣州一线，两个军位于桂林常德一带；余汉谋部7个军21个师11万人主力沿粤汉路扼守粤北，屏障广东。国民党企图以此部署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以控制湘赣粤桂等省；如果处境不利则退守鄂西、湘南、粤北以保四川两广安全。

1949年4月中旬，第四野战军主力70万人自平、津地区南下，5月6日解放新乡、安阳，歼灭和接受和平改编的守军共3万余人。中央军委指示四野："拟有提早渡江时间的必要，并且不必等全军到达北岸然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办法"。[①]中央军委同时部署任务："四野主力于7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8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9月休息，10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11月或12月可能占领两广。"此外"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以后，应以一部经白色进入云南"。[②]

为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49年5月决定，以中原局为基础成立华中局，以中原军区领导机关与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合并，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12月又改称中南局和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以林彪任华中局第一书记，兼野战军和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兼野战军和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邓子恢任华中局第三书记，兼野战军和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肖克、赵尔陆分别任野战军和军区第一、第二参谋长，谭政任野战军和军区政治部主任。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和压力下，国民党军将领纷纷率部起义。5月中旬，国民党前徐州绥靖区副主任及华北剿总副司令吴奇伟与爱国军人曾天

佑在粤东闽西起义；国民党华中军政副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领4个师于5月15日在汉口前线起义。这些起义造成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至6月上旬，四野各部队已经进抵长江以北襄阳孝感一线。

1949年7月，第四野战军在西起湖北宜昌东至江西赣江沿岸的前线上，发起肃清华中国民党军残部的强大攻势，重创妄图依托鄂湘川黔负隅顽抗的宋希濂部，并在鄂湘黔地区内驱逐了白崇禧集团参与的军事力量，为解放大西南开辟了条件。

7月8日，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指挥集结于鄂东南、赣西北及赣江中游东岸地区的第十二、十五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的第四兵团，共10个军，约43万人，发起湘赣战役。白崇禧发现解放军重兵出击后，立即下令据守该地区的约15万兵力全线撤退。解放军随即展开多路追击。至19日，湘赣战役结束，解放了江西省全部和湖南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7月9日，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程子华指挥所部4个军和两个独立师约25万人，向以宜昌、沙市为守备重点，据守鄂西地区的国民党军宋希濂部约10万人发起宜沙战役。双方刚一接触，宋希濂即令所部全线撤退，逃入湖南、湖北的西部山区。18日，宜沙战役结束，湘鄂大部解放。

湘赣、宜沙战役结束后，白崇禧将所部11个军共20余万人，重点部署在衡阳至宝庆、乐昌一线，东与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组成湘鄂联合防线，西与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相呼应。第四野战军主力转入休整，一部进行了赣西南战役，解放了江西全省。在休整期间，中央军委根据白崇禧的作战特点和部署，及时对各参战部队发出指示，1949年7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四野林彪、邓子恢、萧克的电报，电报指出："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③]毛泽东从全局考虑，还调二野一部，配合四野作战，准备全歼白崇禧部主力。接着又致电二野领导人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电报中说："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④]并具体指出：应以第



十三兵团2个军为西路军，取道沅陵、芷江，沿湘桂边直下柳州，切断白崇禧部西退滇、黔的道路，以第四、第十五兵团共5个军和两广纵队为东路军，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歼灭余汉谋集团，占领广州。而后第四兵团由广州西进桂南，切断白崇禧集团退往海南岛和逃往国外的通路，和第十三兵团形成对白崇禧部的大钳形包围；以第十二兵团3个军组成中路军，经湘潭、湘乡首先攻击宝庆地区之敌，而后尾白崇禧部进入广西，会同第十三、第四兵团歼灭白崇禧部于广西境内。第四野战军前委根据上述指示，具体确定了三路大军的作战计划，另以1个军位于湘西北的永顺、大庸以南地区，监视宋希流部，保障湘桂前线我军翼侧安全，并掩护第二野战军入川前的集结。

9月13日，林彪、邓子恢指挥第十二兵团6个军、第十三兵团3个军和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两个军，总兵力约40万人，发起衡宝战役。为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湘赣、宜沙战役的击溃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采取大迂回动作，先以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1个军留在湘西，牵制宋希濂部，另两个军攻击前进，于10月3日攻占湘西要地芷江，切断了白崇禧退往云南、贵州的道路，另以第十三、十五兵团发起广东战役，攻击余汉谋部，切断白崇禧退往广东的退路。第十二兵团6个军则于10月3、4两日在衡宝正面发起攻击。白崇禧最初企图正面决战，10月7日发现解放军向其两侧迂回，侧背均受威胁后，立即下令所部向广西撤退。人民解放军迅速发起猛攻，至16日战役结束，歼灭白崇禧部4.7万人。与此同时，10月2日，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兼政委陈赓指挥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和解放军两广纵队，以及粤赣湘边纵队，总兵力22万人，发起了攻击余汉谋集团的广东战役。6日，解放军占领粤北地区，随后大军直驱广州，由南京迁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连忙迁往重庆，余汉谋也下令主力向粤西撤退。14日夜，第十五兵团进占广州。15日，大军向粤西追击。至11月4日战役结束，歼灭余汉谋部6.2万人。

衡宝战役后，国民党白崇禧集团5个兵团12个军约15万人退入广西，连同逃往粤桂边的余汉谋残部，总兵力近20万人，企图作最后挣扎。并准备在必要时由海上逃跑或由陆上逃往国外。第四野战军为不给国民党以喘息之机，于11月6日发起广西战役。西路第十三兵团由洞口、武冈向百色方向挺进，断敌西逃云南道路；南路第四兵团由阳江地区向博白、玉林前进，阻止白部经雷州半岛逃往海南岛；中路第十二兵团则待上述两路断敌退路后

由湘桂边南下，围歼白崇禧部于广西境内。白崇禧为保持逃往海南岛的通路，于24日以两个兵团在余汉谋部的配合下，向进至信宜、茂名一线的第四野战军南路第四兵团发动“南线攻势”，但遭到顽强阻击。27日第四兵团发起反击，至12月1日，将白崇禧部两个兵团围歼于博白地区，余汉谋残部亦大部就歼。白崇禧“南线攻势”失败后，即全线向钦州、防城方向逃窜。7日，在钦州、小董圩地区歼灭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及其直属部队及两个兵团残部共5万余人，俘中将级军官20名，缴获李宗仁、白崇禧的座车及李宗仁当代总统时佩带的宝剑等大批军用物资。衡宝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7.3万人，至12月14日，白崇禧部除两万人逃入越南外，其主力已全部被歼，中南大陆基本解放。

中南解放以后，在广西战役中，负责切断广西敌军海上退路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第四十军和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在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指挥下，进驻与海南岛隔海相望的雷州半岛，准备解放海南岛。当时，海南岛设有“海南防卫总司令部”，由盘踞在海南岛的国民党海南保安司令薛岳和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以及逃到海南岛的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组成，薛岳任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司令，为总指挥。三部分军队计有陆军5个军，共19个师，另有海军第三舰队及海军陆战队1个团，配备有各型舰船50艘，空军有第一、三、五、二十大队所配备的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42架，总兵力约为10万人。蒋介石指令薛岳凭借琼州海峡天险，利用海空军优势，实行立体防御，固守海南，与万山、金门、舟山诸岛构成防卫台湾的屏障，以便日后以海南岛为基地，使用海空军袭扰大陆，并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薛岳自恃有琼州海峡作为屏障，又占据着海空军优势，把岛上的兵力作了立体防御的部署：以第三十二军为主编成第一路军，重点担负琼东区的防卫任务；第六十二军、暂编第十三师、教导师和琼北要塞纵队编为第二路军，担负琼北区的防卫任务；第四军、第六十四军编为第三路军，担负琼西区的防卫任务；第六十三军、琼南要塞纵队和海军陆战团编为第四路军，担负琼南区的防卫任务。海空军用于环岛巡逻和海上封锁，主力大部配备在琼北地区，任务是封锁解放军的进攻通道——琼州海峡。为了保证“后方安全”，薛岳还命令岛上守军加紧清剿琼崖纵队，摧毁该纵队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免除后顾之忧。

薛岳在海南岛部署了环岛立体防御体系后，指令各部加紧构建环岛立体防御工事，以图长期固守。同时，薛岳也做了情况不利立即“主动撤离”



的准备，在海南岛的南部集结了大批船只，一旦情况危机，就下令紧急撤往台湾。薛岳部署完毕，用他的字号“伯陵”将这个防线命名为“伯陵防线”，声称其“固若金汤”。

金门战斗失利，毛泽东异常关注四野的解放海南岛之战。12 月 18 日，毛泽东依据金门作战失利的教训，就海南岛战役问题致电四野：渡海作战完全与我军过去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和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4、5 万人）的全部兵力与 3 天的粮食，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过去第三野战军一部在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 9 000 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 3 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1950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四野：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2 月 27 日，毛泽东再次指示：发动海南岛战役，必须以运输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损失。

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第四野战军决定以第十五兵团部及所辖第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政委张池明）和归属第十五兵团指挥的第十三兵团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政委袁升平）为主力，配属野战军直属加农炮第二十八团、高射炮第一团和工程兵一部，以及从其他 5 个军抽调的反坦克炮兵、通讯兵，总计 10 万大军，组成渡海作战兵团，由第十五兵团司令邓华和政委赖传珠指挥，在拥有 1.5 万多战士的岛内琼崖纵队（归属第十五兵团指挥）接应下，实施海南岛战役。

渡海兵团根据海南岛的具体情况，吸取金门作战失利教训，进行了精心而细致的准备：第一，吸取金门作战敌情、海情不明即仓促发起攻击的教训，用三个月时间，参战各部队进行了登陆和海上战斗的训练，研究了对付敌军军舰和登陆作战的各种办法。第二，吸取金门作战船只不足即实行登陆的教训，在广东全省大量募集船只，先后征集到 4 000 名船工和 2 100 余艘船只，保证了一次运载 10 万人以上的登陆部队还绰绰有余。第三，吸取金门登陆部队上岸后立足不稳的教训，先以小部队实行偷渡，和岛上的琼崖纵队会合，使大部队一登陆就得到有力的接应，能站稳脚跟并稳步发展。第四，吸取金门作战第一梯队只以少数兵力登陆，以寡击众的教训，正式开始强渡时第一梯队就使用 5 万兵力，带足弹药粮食，准备不依靠后援独立发展。第一梯队上岸后与接应部队一会合，就同岛北面守敌兵力相差无几，从而确保了陆上战斗的胜利。

1950年3月5日19时，渡海作战兵团按照“派出少数兵力携带电台偷渡一次，取得渡海经验”的计划，抓住岛上敌守军抽调兵力“清剿”琼崖纵队，两翼防卫力量相对薄弱的有利时机，派遣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三五二团一营组成渡海先遣营向琼西北白马井登陆点偷渡。次日14时，在琼崖纵队接应下，强行抢占滩头，击溃守军一个营，登陆成功，归入琼崖纵队。3月10日13时，由第四十三军第一二八师三八三团一营，配属九十二步兵炮连，组成第二个渡海先遣营，分乘向琼东北赤水港地区偷渡成功。第一先遣偷渡团成功登陆后，3月31日22时，由第四十三军第一二七师三七九团和三八一团一营组成的第二先遣偷渡团，自雷州半岛东南端的博赊港出发，登陆琼岛海口市以东的铺前港。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渡海作战兵团两批4支先遣偷渡部队均登陆成功，积累了渡海作战经验，加强了岛内接应力量，为迎接大兵团强攻海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4月10日，渡海作战兵团指挥所决定，兵团主力分成第一、第二梯队，实施大规模强攻海南岛作战。4月16日19时30分，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共5万余人，分乘350只战船，分成东路、西路两编队，自雷州半岛南端各港湾同时起锚，进军海南岛，强攻海滩。岛上的琼崖纵队和先遣偷渡部队赶来策应，至4月17日早上6时，第一梯队全部踏上预定登陆地域。第一梯队上岛后，各部队按战役预定方案向守岛国民党军防御体系的纵深扩大战果。至19日，琼北地区沿岸各要点完全处于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部队的控制之下。至23日清晨，登陆部队和琼崖纵队占领了海口。23日19时，渡海作战兵团第二梯队开始启渡。24日凌晨1时至4时左右，在海口市以西的天尾港沿岸登陆。至此，参加渡海作战的10万大军全部登上了海南岛。

薛岳眼见其所谓的“伯陵防线”土崩瓦解，岛上守军溃不成军，下令全线南撤，同时致电台湾，要求火速派舰船来琼接运残部撤离海南。部署完毕，自己与岛上的军政要员们乘坐飞机，首先逃往台湾。薛岳残部分路南逃后，从4月24日开始，渡海作战兵团分东、西、中三路展开追击战。至5月1日上午，岛内国民党军队不是被俘被歼，就是登船逃往台湾，海南岛全境获得解放。

整个解放海南的渡海作战，历时近两个月，人民解放军以伤亡不足5 000人的微小代价，歼灭国民党军3.3万人，其中俘虏2.6万人，缴获火炮418门、飞机4架、坦克和装甲车7辆、汽车140辆，击落飞机2架，击

沉军舰 1 艘，击伤 5 艘。海南岛登陆作战的成功，开创了人民解放军用陆军乘木帆船大规模渡海作战，摧毁国民党海陆空立体防御的先例，为解放沿海岛屿作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海南岛登陆作战的成功，给台湾的蒋介石和国民党舟山群岛守军以极大震撼。蒋介石决定收缩兵力，固守台湾。

至此，除台湾和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外，沿海地区全部解放。

注释：

①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580 页，第 591 ~592 页。

③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 379 ~380 页，第 456 ~457 页。

进军大西南

西南地区包括川、黔、滇、康、藏5省区，地形非常复杂。北有大巴山脉横亘川陕边界，东有巫山山脉和武陵山脉纵贯川鄂湘黔边境，构成西南诸省北部和东部的天然屏障。长江自万县以东穿巫山流入鄂境，形成西起奉节，东至宜昌，长达200公里的峡谷区，此为川鄂交通咽喉，地形极为险要。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国境线蜿蜒于该省西部和南部，长达3 000多公里，是我国西南门户。西藏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 000米以上，系藏族聚居区。整个西南5省区，除四川盆地外，其余多为山地和起伏连绵的丘陵，山陡路窄，崎岖弯曲，交通极为不便。另外，云贵川三省雨量充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烟稠密，这又为军事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

盘踞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武装，主要有川陕甘边绥靖公署胡宗南部第五、七、十八等3个兵团，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部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九、二十等5个兵团，连同新组建的部队在内，总计37个军，约45万人。此外尚有地方保安部队和大批土杂武装约45万人。在这近90万反动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是蒋介石的亲信胡宗南部，均为训练有素的国民党正规军，约17万人。其他大多为新组建的人马，军事素质极低，许多甚至连短期培训都未经过，没有起码的作战能力。

因为西南具有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势和军事割据的物质基础，所以，蒋介石企图依靠以胡宗南为首的残存的几十万武装力量，利用西南的险要地势，阻住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与人民解放军打持久战，以便争取时间，组建新军，等待国际局势变化，然后与驻台湾和东南沿海的国民党军队相配合，进行反攻。

胡宗南和宋希濂认为，目前解放军士气正旺，战斗力正强，而国民党军军心涣散，全无斗志。因此，二人向蒋介石建议：避免与解放军决战，在解放军大举进攻西南之前，将川康滇黔各省主力迅速转移到滇缅边境，甚至直



接退人缅甸，整训军队，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但蒋介石坚决反对胡、宋二人的计划，痛斥二人对党国丧失信心，顽固地坚持固守西南。蒋介石认为：一、两广恐难保持，在大陆上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与台湾和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二、如果大陆完全放弃了，国民党将偏安于台湾一隅，国际地位将完全丧失。三、西南地区地势险要，物资丰富，人烟稠密，人力、物力均甚充足，完全可以支持国军长期割据，成为理想的复兴根据地。

1949 年 8 月底，蒋介石在重庆召开了有西南地区军政要员参加的军事会议，制订了阻住共军进攻，固守西南，等待时局变化的西南防御作战计划。为了促使部下为固守西南卖命，蒋介石还特地在成都举行了招待川省绅耆及各界人士茶话会，并大肆渲染固守西南的伟大意义，强调“我们要加强反共的力量，要迎接国际局势的开展，都必须确保西南，尤必须以四川为根据地”。另外，在 7、8 月间，蒋介石还亲自乘飞机穿梭于广州、重庆、成都和昆明等地，进行“督导”，不断给部下打气，要求各部下摒除彼此歧见，“同心同德，与党国共存亡”。为了鼓舞士气，蒋介石甚至指使胡宗南、宋希濂分别向汉中一线和湘西地区实施反攻。

蒋介石在听取了关于西南地区的军事报告之后，认为人民解放军最大的可能是从北面，由陕西经秦岭人川。川东是大山，多险山恶水，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不利于大兵团运动；湘西有白崇禧把守，且路程遥远；只有川北，交通方便，有陇海铁路可以运兵、运粮食，又是解放军的老根据地，而且离四川盆地距离较近，是入川的捷径。为此，蒋介石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决定以陇南陕南为决战地带，以川陕边为守备重点，并沿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组成“西南防线”。其具体部署是：以胡宗南部第五、十八兵团等部所辖的第二十七、三十六、三十八、一、六十五、九十、三、九十八等共 8 个军，约 17 万人，沿秦岭主脉成县、徽县、留坝、佛坪、镇安一线构成第一道防线。以新组建的第七兵团等部的第十七、三十、五十七、六十九、七十六、一一九等共 6 个军，沿川陕边的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一线构成第二道防线，阻止解放军由陕甘入川。以张群部所属的川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部第十四、二十两个兵团的第十五、七十九、一一二、二、一一八、一二四等共 6 个军，部署于鄂西建始、恩施地区，与位于巫山、万县地区的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孙震部第十六兵团的第四十一、四十七军及暂归其指挥的第一二七军相配合，屏障川东门户，阻止解放军由湘鄂西入川。以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所属第十九兵团的第四十九、八十九

军，沿贵州境内湘黔公路沿线布防，阻止解放军由湘西进入贵州。以第四兵团罗广文部第一〇八、一一〇军及暂归其指挥的第四十四军于四川大竹、达县等地区机动。此外，云南绥靖公署卢汉部第八、二十六、九十三、七十四等4个军，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部第二十四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属的第七十二、二十、二十一、九十五军，分别部署于昆明、雅安、宜宾、成都、重庆等地区，担任守备任务。蒋介石认为只要守住秦岭、陕南、川北，整个西南就是安全的，所以在其布置的防线中，兵力较强的胡宗南集团全部扼守在秦岭一线。

1949年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一举攻下广州。从南京逃亡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再次迁到重庆，蒋介石也亲自飞到重庆。声称要使重庆成为“反共产主义中心”，使西南变成国民政府的复兴基地。

中央军委的大西南作战方针，是将以胡宗南为首的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就地全歼，避免其逃到边远省份或逃至国外，彻底解放大西南，不给人民共和国留下丝毫后患。中央军委决定：“争取在（1949）年底前解决西南问题”，消灭大西南蒋军残余，解放2 700万西南人民。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中央军委在西南方向部署了强大的兵力。在湖南常德邵阳一线，集结了第二野战军主力兵团30万人；在湘鄂西地区，为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第四野战军集结了第四十二、四十七、五十三3个军及湖北军区独立第一、二师等9个师，共20万人；在秦岭一线，则配置了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及第七、第九军各一部，共10万人；进军大西南总兵力达4个兵团共60万人。

为了将大西南的国民党反动残余武装就地全歼，而不是打击溃战，让其逃亡云南甚至国外，毛泽东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气魄和智慧，决策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的主要方向不是从北面，而是从东南面。

从1949年5月到10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指示。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①]人民解放军“应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②]这就确定了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总战略。其具体部署是：以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暂归第四野战军指挥，在攻占广州后迂回广西，而后西出昆明。以第二野战军主力待广州解放和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在四野发起广西战役的同时，以大迂回动作，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挺进叙府



（今宜宾）、泸州、重庆一线，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敌军退往云南的道路。以位于宝鸡地区的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在贺龙、李井泉指挥下，佯攻秦岭、大巴山一线，以吸引和抑留胡宗南部于秦岭地区，待二野迂回部队断敌退路后，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会同二野主力，聚歼胡宗南集团。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通过多层次的大迂回大包围，迫使西南数十万国民党残余武装彻底陷入包围圈中，再也没有逃脱的机会，只有被歼灭的命运。为了更好地完成解放大西南的战略任务，1949 年 10 月 13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只是西南局做出分工：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任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经营滇黔川康及西藏。

1949 年 9 月初，解放大西南的参战部队开始执行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计划。按照预定的战略计划，位于秦岭北麓的第十八兵团和陕南第十九军，在贺龙和李井泉的指挥下，分别进攻秦岭、大巴山胡宗南部守军。同时，湖北军区所属部队也在鄂西积极活动，摆出一副准备强攻入川的架势。攻占了平利、安康等地后，但并不攻破其防线。这样既吸引和抑留了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又稳定了蒋介石坚守四川的信心，此举彻底迷惑了蒋介石和胡宗南。

就在第十八兵团等佯攻秦岭、大巴山，吸引了蒋、胡二人注意力的同时，新华社又发布了关于第二野战军的消息：刘伯承、邓小平将军等在河南郑州召开群众大会，准备进军四川。报道说："第二野战军主力是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由江苏南京和安徽芜湖等地出发，经徐州到达郑州的。"蒋介石又判断：郑州是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汇点。解放军转车西进，看起来一定是要从北面入川。

其实第二野战军的 3 个兵团中，只有第三兵团随野战军总部到达郑州，其余两个兵团即第四、第五兵团，早已秘密执行进军大西南的战略迂回任务。其中第四兵团在第四野战军指挥下，由赣南向广东进击。第五兵团则直接由江西上饶秘密挺进湘西。而第三兵团和第二野战军总部也在召开大会后，立即秘密转而向南，折回湖北、湖南，经孝感抵达武汉。到 1949 年 10 月中旬，第五兵团到达了进军西南的指定区域——湘西，第三兵团和二野总部也到达了进军西南的指定区域——川东。

11 月 1 日，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和第三兵团在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四十二、五十等军的配合下，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约 500 公里的

战线上，向西南国民党军队发起了多路攻击。第五兵团和第三兵团的第十军，在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和政治委员苏振华指挥下，分别由湘西的邵阳和常德、桃源出动，以突然动作经芷江进入湘黔边境，向布防于波州、晃县、锦屏等地的敌第十九兵团第十九军及白崇禧部第一〇〇军的西南中段防御线发起攻击。第三兵团主力在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的协同下，以钳形合击之势，发起对宋希濂部的突然攻击。位于川东鄂西黔东的国民党孙震、宋希濂部和何绍周部慌忙向后撤退。第三兵团各部勇猛急，迫使孙震、宋希濂部无法实施有计划地撤退和进行有组织的抵抗。第五兵团直趋贵州，向防守贵州的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发起追击作战。国民党十九兵团司令何绍周命令各路守军全面撤退，放弃贵阳，退守黔西毕节、盘江等地。14 日下午第五兵团解放贵阳后，乘胜进军，于21 日解放了黔北重镇遵义。第三兵团第十一、十二军和四野第四十七军协同，在“与敌人争速度，抢时间”的口号鼓舞下，昼夜兼程，向宋希濂集团攻击。第十二军解放了湘西永绥、川东南边沿秀山和贵州酉阳，第十一军和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逼近鄂西、来凤、咸丰以及湘西北边沿龙山之线。11 月 16 日，彭水解放，第三兵团追击部队进至乌江东岸。11 月 19 日，第四野战军部队将西逃的国民党第十四兵团主力围歼于咸丰东北地区。另外，执行和第三野战军第三兵团夹击宋希濂任务的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二、五十军，从右翼包抄进攻，相继解放了恩始、建施。这样，国民党西南防线被拦腰截断，对川境敌军逃往滇黔构成了很大威胁。

当第二野战军以大迂回方式割断了宋希濂与胡宗南的联系，抄了大西南的后路之后，在重庆坐镇指挥的蒋介石终于察觉了人民解放军由鄂湘西进军川黔迂回重庆和成都的战略企图，急令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大巴山一线南撤入川，并以其第一军乘车火速奔赴重庆增援，并令孙震第十六兵团由万县西撤。同时还令罗广文部第十五兵团和宋希濂部第二十二兵团在南川及其以东布防，以迟滞解放军进攻，掩护胡宗南部撤退。

国民党川湘鄂边防线被人民解放军五路大军冲击得支离破碎之后，国民党川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决定不顾一切撤退。11 月 23 日，宋希濂在南川召集部属，下达了“不管一切，不顾一切，走，快点走，走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不要被共军包围消灭”的命令。企图首先退到西昌，再退到滇缅边境，然后再集中抵抗。11 月末，宋希濂部主力和罗广文兵团被包围在南川北部山区，到 11 月 28 日，人民解放军协同作战，将宋、罗两部主力 3 万多人歼灭，并乘胜解放了重庆外围的涪陵、江津等地。



11 月 29 日晚，蒋介石率领从广州逃来的“国民政府”，再次急慌慌逃亡成都。第二日，即 11 月 30 日，西南重镇重庆解放。

重庆解放以后，各路部队立即向成都方向急进。到 12 月 3 日，担任迂回任务的第五兵团和第十军，占领了纳溪、泸州，进而出击自贡、荣县。至 12 月 8 日，第三兵团主力和四十七军，分别进军到内江、铜梁、广安、完县一带。至此，胡宗南部和川康诸敌，向黔滇的主要退路已被切断。到 12 月 16 日下午，第五兵团主力渡过岷江，进占乐山，逼胡宗南守军两个团投降，随后于 17 日奔袭歼灭峨嵋之敌，19 日，进占丹棱夹江等地区。同日，前卫部队渡过大渡河，全歼逃至沙坪的宋希濂残部，活捉宋希濂本人。20 日，第五兵团占领浦江和眉山等地区，逼近成都。

鉴于胡宗南有可能经成都附近的新津、乐山、邛崃、雅安等地向滇缅边境逃窜，第三兵团主力快速进军，火速抢先占领乐山、荣县、彭山、邛崃、大邑、新津等地区，彻底切断胡宗南南逃的一切路线。12 月 9 日，川北重镇南充解放。19 日，人民解放军占领成都通向彭山和西昌的公路，一部向新（津）邛（崃）公路之太平场进击。21 日，占领了邛崃、大邑、新津、双流等地区。至此，胡宗南和川境所有残余国民党军队共三四十万人，彻底被包围在成都地区。

继重庆、贵阳解放以后，滇康川国民党将领，在全国进军胜利的强大攻势压力下，在中共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下纷纷宣布起义。毛泽东在部署大西南围歼战之初，就曾经指出，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必须兼用政治形式，即以“北平方式”去争取敌人起义投诚。这种方式在敌军主力被歼灭或敌人被彻底包围的形势下，是必然要出现的，这也是避免伤亡和破坏，有利于人民而又深受人民欢迎的方式。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前线各部队，对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和潘文华、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郭汝瑰等，做了大量的政治争取工作。12 月 9 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同一天，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分别在雅安、彭县等地发表起义通电。贵州西南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及八十九军军长张涛，四十九军军长王锦源分别率部先后起义。

12 月 11 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致卢汉嘉勉电庆贺云南和平解放：“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

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③]12 月 13 日，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致电卢汉表示起义部队各级官长一律仍就原职，准备按人民解放军方式改编。12 月 24 日，朱德总司令复电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对他们的起义行动表示嘉勉，并鼓励他们改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建立革命秩序而奋斗。

蒋介石得知起义消息，急召集顾祝同、胡宗南、张群等计议，决定“国民政府”再由成都迁往台湾。同时，改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任命顾祝同兼长官，胡宗南兼参谋长，共同坚守成都，如成都不保，则退往西昌，在西昌设立大本营，统率残余部队，坚持斗争，以观时变。昆明、雅安、彭县、宜宾等地的起义，给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以更加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封闭了国民党逃往国外的大门。同时，在卢汉等人起义的影响下，被围困在成都的国民党残余武装，也萌动了投降之意，这就为人民解放军顺利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条件。各部队在加紧做好总攻准备之外，同时加强了对成都守军的政治攻势，以争取更多的敌人放下武器，减少人民的损失。12 月 21 日，被围困的国民党“川陕绥署”副主任董宋珩率第十六兵团在金堂地区宣布起义。这是川境残敌全部瓦解的开始。

12 月 23 日，胡宗南仓皇乘飞机逃往海南岛。12 月 24 日，刘、邓、贺向聚集在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发出最后忠告：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以来，未及两月，已歼敌 10 余万，收复贵州、川东、川南、川北、陕南广大地区。云南、西康、四川将领相继起义。对于起义与放下武器人员，无论他是中央系或地方系，无论他是高级将领或中下级干部，都一律从宽处理。对于部队，可以按人民解放军方式进行整编，享受和人民解放军一样的待遇。对于个人，可以作妥善安置，给以生活上的照顾，愿回家就业的，可以资遣回家，不使流落异乡。

12 月 25 日至 27 日，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率其残部在彭县起义。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率部在德阳起义，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在成都地区起义。聚集在成都地区的 6 个兵团，有 5 个兵团，先后起义，只有第五兵团司令李文仍在顽抗。26 日拂晓，人民解放军向被围在新津地区的敌第五兵团总部发起全线攻击，歼敌五万，生俘李文。成都战役胜利结束了，蒋介石的最后一支精锐部队——胡宗南集团的数十万人，除起义者外，全部被消灭在成都地区。

与此同时，解放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滇桂黔边区纵队协同



下，于滇南的蒙自、个旧等地，歼灭了企图向国外逃窜的李弥第八军和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并活捉了刚由台湾飞到滇南指挥作战的敌陆军副总司令汤尧。西南军区主力一部，在成都解放以后，迅速挺进西昌地区，全歼敌贺国光部万余人，于 27 日解放国民党残敌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西昌城。

至此，退集西南地区的 90 余万国民党军队已全部被歼灭，进军大西南取得伟大胜利。整个西南地区，除西藏外全部获得解放。

大西南的解放是在全国总胜利的前提下实现的。这一伟大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军政兼施政策的光辉结晶；也是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领导全军坚决而又精确地执行毛主席指示的结果。在战役进行中，由于各兄弟野战军的将紧密协同，主动配合，全国人民特别是西南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全力支持，更加速和保障了这一伟大战役的胜利”。④

注释：

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592 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第 456 ~ 457 页。

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60 页。

④李达：《解放大西南之战》，《星火燎原》选编之 10，第 475 ~ 476 页。

放开手脚打太原

太原解放战役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持续时间最长、参战人员最多、战斗最激烈、伤亡最惨重的大城市攻坚战。

1948年3月7日，人民解放军发起临汾战役，在一面练兵一面战斗中攻坚作战，历时72天，全歼守敌25 000人，俘虏23 000余人，晋南获得解放，吕梁太岳两解放区连成一片。阎锡山只保有晋中地区北起忻县南到灵石的15座城市及附近乡村。共计5个军14个师，3个总队及22个保安团，21个报警大队，总兵力约为13万人，另外还有3万人的民卫军。阎锡山极力加强以太原为中心的以同蒲路为骨干的防御体系，以维持残局。另以主力一部，组成闪击兵团，准备机动作战，以阻止解放军的进攻，并大量抢麦，以解决军粮危机。6月，为消灭阎锡山有生力量和保卫麦收，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晋中战役。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八纵队、第十三纵队，华北军区炮兵第一旅，太岳军区，吕梁军区、北岳军区、太行军区、晋绥军区以及陕北警备共49个团，6万多人参加。至7月21日结束，共歼阎锡山部10万余人，同时完成了对太原的合围。

此时太原城内守军正规军只有一个军，其余均为被歼后只保留番号，没有战斗力的部队和地方武装守备军。中央军委7月16日电示："太原空虚，有乘胜夺取可能，你们决心甚好。望首先控制机场，以尽可能短促时间完成攻城准备，即行攻城"。[①]鉴于晋中战役连续作战，部队十分疲劳。又由于晋中战役以少胜多，所有部队全部投入战斗，部队伤亡消耗较大，继续进攻太原有困难。所以各路部队行至太原城下，休整补充，军事练兵，加紧做好攻打太原的准备。

太原城周约12公里，成正方形，东北西三面都有高山拱卫，市区如置瓮低。整个外围山区，筑有大小碉堡3 000多个，每个山头都有一个碉堡群，有10个左右的钢筋水泥构成的各式碉堡，拱卫在外围劈坡上。各个山头碉堡群之间构成严密的火力网。这些要塞是阎锡山3年多的时间经营而成



的。太原的“百里防线”东起罕山，西至石千峰，北起周家山，南至武宿。在这方圆百里内有各式碉堡五千余个，既能独立作战，又能相互支援，城周还修环城铁路，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具有坚固而又完整的防御体系的设防城市，被中美反动势力誉为“反攻模范堡垒城”。

在不断加强工事的同时，阎锡山一面令太原绥靖区副主任杨爱源，亲到南京找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通过司徒雷登恳请陈纳德将军派 B25 型轰炸机来太原助战；一面派彭士弘等前往青岛，恳请美军第七舰队司令白吉尔出兵应援；还派出高参原日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东去日本，策划成立“东亚同盟志愿军”，空运太原作战。其结果是，除了美军在青岛烟台等地拼凑了一个假名经济考察的军事组织来太原以外，余者皆为泡影。但阎锡山并未灰心，一面致电蒋介石求援，一面整补残余部队。恢复了晋中战役中被重创的六十一军军部，重建了晋中战役中被歼灭的第十九，第三十三，第四十三，第三十四等 4 个军部和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等 10 个师。同时还组编为铁血师、铁干师、神勇师、迫击炮师和被俘返回人员组成的忠贞师。新编工兵师和机关枪纵队。阎锡山集中 11 个师 21 个保安团在城外组成东西南北 4 个城防区：东防区，以十九军军长温华光为总指挥、西防区，以六十一军军长赵恭谦为总指挥、南防区，以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为总指挥、北防区，以三十三军军长韩步洲为总指挥。城东南的双塔寺专设要塞司令，城内设特务团、宪兵团、装甲团，设中心防区，另留 7 个师作为预备队，并任命第十兵团司令王靖国为太原守备副司令，全局指挥。

晋中战役结束，太原孤立，阎锡山提出“总体战”主张。这一主张不仅是军事行动，同时又是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9 月成立了“山西太原总体战行动委员会”；10 月又提出了建立太原战斗城的十二项行动纲领：1. 战斗城以太原区的要塞圈为起点，其范围内的所有男女老幼成员，均需组编起来，直接间接向战斗目标努力，建立起地利上的工事坚固的阵地，与人的坚强意志的团力。2. 战斗城的成员，要养成亲爱互助，精诚团结上下一致的整体团力。3. 彻底划清国家与国家的敌人，坚决地铲除国家的敌人，使战斗城的范围内，皆为国家的成员，没有一个伪装。4. 实行精兵政策，整训部队，加强杀敌战术，紧密军中政治空气，提高杀敌企图，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支援部队。5. 实施兵农合一政治，组成生活生产战斗合一的体制。6. 战斗城范围内的成员，无一人不劳作，且无论精神劳动体力劳动，均需每人每日服两小时的建设劳动。7. 战斗城内实行历史上的战时经济。8. 在战斗

城内，尽量实行建设工作，购置机器，加大工业制造。扩大水利建设，实行机器耕作改良种子，开垦荒地建立合作农场，实行集体生产增进生产效率。9. 实行人物管制，凡有害于战斗城的人物往来绝对管制，无益于战斗城的人物往来相对管制。10. 普遍实施军训，同意戡乱认识，集中戡乱力量，加强杀敌技能，以适应战斗城的战斗需要。11. 加强青年及儿童的战时教育，培植革命新生力量。新闻报章以报道激励剿匪杀敌，推崇战斗英雄，劳动英雄。12. 凡需救济的人，实施工作救济，自养不足的人，施行分润救济。为了实现上述的“行动纲领”阎锡山还制定了《战斗城男女成员编队实施办法》，把所有的男女一律按照年龄编为甲级参战队，乙级参战队，老年助战队，少年助战队，儿童助战队，妇女助战队。这些组织或直接参加战斗，或协助军队作战或担任后勤保障。为了限制人的行动便于检查，特用漂白布制作圆形三角形等各式符号，并分别冠以甲乙老少童幼妇等字样。阎锡山还规定了《文武干部参展办法》《战斗城参展指挥部简则》等。蒋介石支持阎锡山固守太原，以保持他在长江以北的军事实力，特调来第三十军两个师增强太原守备力量。

参加太原战役的有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所属第八、第十三、第十五纵队，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晋中军区各独立旅，陕甘宁警备二旅等。太原战役由徐向前统一指挥。各部队经过补充兵员之后，战前开展了以阵地攻坚战为主要内容的大练兵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大大提高了部队攻坚作战的能力。练兵运动中，干部训练，以检讨运城、临汾攻坚战及晋中战役运动战中的村落攻坚的实战经验为主，以提高干部的战术素养和指挥能力；部队训练，以爆破、投弹、土工作业为主，着重针对太原及其外围地形、地物、敌之工事和战术特点，加强部队的训练。

8 月 4 日兵团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徐向前就如何攻打太原问题，作了具体指示。要求太原前线各部队，要在思想上，战术技术上，在政治工作和后勤物质保障上，作好充分准备。指出：“不打无把握的仗”。9 月 28 日，兵团发出《进攻太原的战术指示》。指出：“当我在兵力、弹药器材、民力、思想、战术技术等充分准备之后，在战役战术上予以突然攻击，迫敌混乱，使敌无喘息之机，来不及应付，我们即在确定的突击方向进行有计划、有把握的连续攻击。”

太原战役原定于 10 月 18 日发起。9 月中旬，兵团前委讨论作出攻打太原的作战方案，于 28 日上报军委。其要点是：一、战役指导方针，以围困、



瓦解，攻击逐步削弱敌人，然后一举攻下太原，全歼敌人。二、进攻步骤：第一步，突破第一道防御阵地，以火力控制南北机场，断敌外援，便于瓦解工作。第二步，攻占东南、东北攻城必经之据点。第三步，攻城。三、攻击方向选东南、东北两处，而以东南为主要方向。四、对于攻城妨害不大之据点，战术上力求连续攻击，分割包围，结合政治瓦解歼灭敌人。徐向前就攻打太原作战方案，给华北军区领导和毛泽东同志复信说："前委九月二十八日电中计划，分三个步骤作战，很好，但主要精神是连续一直打下去，直到夺取城垣为止。假如情况允许的话，这样做是最好的，但假如第一步计划或第一、第二两步计划都完成了，而到实现第三步计划时那就比较好打了，但仍存在一个兵力对比问题。假如第一步计划完成后，实现第二步计划时即遭到较大障碍，不能按预期计划进行，即只有先围困使敌更疲惫后再猛攻之。总之，首先争取一直连续的打下去，在最快时间内全歼敌人是上策，先打再围带打而下之即消耗较大是中策，下策即必须增加力量再攻下之，即影响别线作战，只是最后之一途"，"我仍本着不急（急躁）不缓（紧张的工作着）的精神去工作，一定坚决的完成任务，请放心。"②这点，军委表示赞同，并指示："连续一直打下去，在最快期间全歼敌人直至夺取城墙是上策。"

9 月 24 日，济南解放的消息传到太原，阎锡山决定以攻代守，妄图破坏解放军的战役准备同时完成外出抢粮抓壮丁。10 月 1 日，阎锡山骑个步兵师，分三路沿着汾河东岸、同蒲路西侧向南进犯。太原战役指挥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提前发动太原战役。10 月 4 日，解放军开始了太原战役的外围清扫作战。至 11 月 14 日，太原四大要寨全部被人民解放军占领，阎锡山妄想"凭此三千堡垒，足底百万精兵"破灭了。同时晋中军区也相继攻占了太原南北据点。

为了配合正在运筹中的平津战役，11 月 16 日，中央军委致电徐向前周士第："估计到太原攻克太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下列方针是否可行：（一）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二）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杨罗耿部即在阜平休整，暂不西进。"③一兵团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自 12 月 1 日至 12 月 26 日，以第八纵队在东面攻占了松鼠坡；第七纵队在北面攻占了苏村

等4据点；第十三纵队及晋中军区攻占了汾河以西并火力封锁了红沟机场。这样就把阎锡山守军压缩在以太原为中心的一个长宽不到30里的狭小地带。

平津战役结束以后，1949年1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北平和平解放后，太原亦有和平解放之可能。华北第一、第二兵团的大休整，应放在夺取太原之后"，"杨罗耿、杨李待林罗派出接替所任防务之部队到达后，即开至石家庄附近休整半个月，即向太原开进"，"东北临时配属之两个炮兵团，即直接向太原开进，受徐周陈指挥，控制太原一切机场，迫使阎匪谈判，和平接收太原。如阎匪顽抗，则待华北二、三兵团到达后，实行攻城"。[④]

3月底，中央军委决定，将解放平津的第十九兵团、二十兵团及第四野战军炮一师开赴太原，由此使得太原战役成为华北3个兵团第一次大会合，并有西北、东北野战军参战，多兵团、多兵种开展的一次联合作战。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以徐向前、罗瑞卿、周士第、杨得志、杨成武、陈漫远、胡耀邦等组成太原总前委，徐罗周陈胡为总前委常委，徐向前为书记，胡耀邦为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三个兵团及一野第七军和晋中部队。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在西返途中于3月28日来到太原前线，中央军委同意他与抱病工作的徐向前一起指挥太原战役。就在彭德怀抵达太原的当天，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电邀阎锡山赴南京商讨国共和谈中的山西问题，阎锡山于次日飞离太原。

4月1日，国共和谈正式开始。4月5日，中央军委致电太原前线："阎锡山已离太原，李宗仁愿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我们已告李宗仁代表（本日由平去宁），允许和平解决，重要反动分子许其乘飞机出走，其余照北平方式解决，部队出城两星期至三星期后开始改编等语。你们应即派人进城，试行接洽，求得于十五日前谈妥。进行情形望告。"[⑤]据此，太原前线司令部决定派遣原阎军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等人入城试谈。要他们转达解放军的攻城力量和决心，阎军寄希望美援和坚固工事是靠不住的，如愿意和平解决太原问题，采取长春或北平方式都可以。8日，赵承绶等三人携带信件进入阎军61军阵地，要求入城谈判和平解放太原，王靖国在电话中以"会长不在，无人负责"，拒赵入城，令其原路退回。

4月11日，中央军委再次电称："（一）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进行了十一天，颇有进展。如南京方面同意，可能于十五日或十六日签字，但



破裂的可能仍然存在。（二）请将攻击太原的时间推迟至二十二日。那时，如能签订和平协定，则太原即可用和平方法解决；如和谈破裂或签订后反悔不执行，则用战斗方法解决，对我亦无多大损失。”[⑥]

太原前线接中央军委电报以后，于4月15日，致电中央军委表示，“敌方封锁更严。我炮兵增加，均已进入阵地，侦查及各种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按目前条件，争取在外围切断歼敌几个师，而乘胜攻城，把握是最大的。如十六日南京谈判无大效果，可否提前攻击太原”次日，中共代表在北平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宣布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中央军委两日后回电：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有利，即可动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

1949年4月20日，太原围歼开始了。太原前线按照预订部署，分10路攻打，猛插分割，狠打巧取。敌军防线迅速瓦解。至22日，外围作战全部结束，歼敌五个军部，13个步兵师和一个工兵师，约占太原兵力的80%。为减轻太原百姓的生命财产破坏，当天太原前线司令部，向太原城内守敌发出放下武器的最后通牒。

就在这一天，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次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而太原前线在这个命令发布前一天就已经提前行动了。

1949年4月24日清晨，解放军1 300门大炮向太原城垣同时开火，25万解放军兵分12路攻上城头，在歼灭阎军13万余人、解放军付出了45 000余人的伤亡之后解放太原。太原的解放最终是通过惨烈的战争手段完成的，但自战役准备至发起总攻前，毛泽东、中央军委和前委始终没有放弃和平的努力。1948年7月16日和21日，中央军委两次致电徐向前、周士弟，提出完成太原包围后实现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并承诺任何人肯早日自拔，将保证本人及其家属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1949年1月24日，在北平和平解放大局已定的背景下，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解决太原的部署，再次提出和平解决太原的可能性。此后，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或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连续6次提出争取照北平方式和平解决太原问题，但都被阎锡山所拒绝。太原解放六天之后，大同守军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山西全境宣告解放。

解放太原战役的巨大胜利，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太原是敌人在华北残留

的一个据点，国民党重要的军事要塞。阎锡山经过十余年经营的要塞工事，19个步兵师的兵力，“固若金汤”的“钢铁堡垒”在人民解放军攻击下，仅4天时间，就外围尽失，5个钟头，就被人民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了”。

太原之战是典型的阵地攻坚战。战役初期作战和进攻堡垒时的中期作战，也都暴露出我军战术方面的许多缺点，致使部队伤亡较大。后来，越打越“巧”，终于攻占护卫太原屏障的4大要点。锻炼了部队，提高攻坚作战能力。战役后期，各兵团部队紧密配合，步炮密切协同作战，在最后攻克太原一战中，充分发挥出大兵团实施攻打太原大城市坚固设防作战的强大威力。

太原战役的胜利，是和战役中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分不开的。战前，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政治动员，致使全体指战员勇猛顽强，不怕流血牺牲，为解放太原而战。徐向前、周士第、胡耀邦签署发出的《攻取太原紧急动员会》指出：“我们打下了太原，不仅最后彻底歼灭了阎军，解放了全山西人民，而且夺取了一个巩固的大工业大兵工厂根据地，对全国革命战争的支援有很大的帮助，对于我们战斗力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这就是说，攻取太原的意义是多么伟大，也很艰巨，凡是参加作战的人都非常光荣，牺牲的烈士将要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因此，我们全体指战员同志一定要不惜自我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立功，顽强战斗，坚决打下太原城！”战役中，有西北野战军、东北炮兵部队的配合作战，有晋中军区部队参加作战，有华北兄弟兵团部队会师太原前线并肩作战，搞好协同作战，成为太原战役中政治工作上的一大课题。前线政治部专门颁布了《太原战役政治工作要点》，要求所有参战部队必须大力提倡与发扬高度的互助互让的阶级友爱精神。战役后期，各兵团部队并肩作战，步炮兵密切协同作战，团结一致，共同战斗，彰显了团结协作的精神。

太原战役中的政治工作，不仅在于对参战部队的思想动员，而且在瓦解敌军的工作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在争取阎锡山集团上层和平无果的情况下，太原前委并没有停止过政治攻势。1948年11月，兵团之下，各师成立政治攻势委员会，团、营设政治攻势中心指导小组，连设政治攻势小组，通过散发宣传单、阵前喊话等形式进行攻心战，对阎军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对于被俘人员，一律实行优待俘虏政策，尊重其人格；对于投诚起义人员，均为其发立功优待证。上从前线司令员徐向前、政治部主任胡耀



邦，下到成立对敌宣传喊话小组，发动前线每一个战士，动员俘虏和敌军亲属，人人做瓦解工作。整个太原战役期间，共瓦解敌人近3万人。

太原解放战役胜利的关键在于军民的紧密团结。在整个太原解放战役期间，人民群众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后勤保障任务。在长达半年多的战役中，晋中、太行、太岳、晋察冀、冀鲁豫等解放区人民和后方机关，紧密配合部队作战，支援参战民工达1 000万工以上，为前线运送弹药及作战器材3 000万公斤，运送粮食燃料2亿公斤。军民合作，共同开辟与修补了300公里公路，构筑了数万窑洞，为部队渡过严冬，完成围困太原提供了坚强保障。无怪乎徐向前把太原解放的第一功，归功于后方供应，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前线。

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者也是解放太原的重要方面军，他们配合支持人民解放军，为太原的解放和接管发挥出特殊的作用。在谦益信自行车行工作的地下党员张全禧，配合情报站搜集城防图，在阎锡山长官部侍从参谋张光曙的协助下，绘制50多幅城防图，将其藏在自行车轮胎和大梁中成功送到了情报站。为太原前线制定作战规划起到了重要作用。

注释：

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521页。

②罗英耆、铁竹伟《共和国十大元帅徐向前传》，2003年版，甘肃人民出版社，第443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89页。

④⑤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9页，第530页，第535页。

关中解放

1949年春，西北地区国民党总兵力约40万人，而第一野战军只有15.5万人，单单依靠第一野战军现有的兵力，要消灭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完成中央赋予的解放大西北的任务，存在较大困难。彭德怀将自己关于这方面的考虑向中央作了汇报，请求华北部队增援。

1949年1月中旬，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说：华北部队参加西北作战问题，等你们来中央时面商。2月8日，彭德怀在赴中央开会前致电中央军委，报告西北敌军动态和野战军概况，提出本年春、夏的作战方案，并说明：如3、4月间在山西的第一野战军部队能归还建制，徐向前、周士第部能入陕西夺取潼（关）渭（南），并进逼西安，则一野四五月间即可攻击西府、宝鸡。如此，胡宗南必弃西安，退汉中，我军可乘敌撤离之际，在追击截击中歼灭其主力。

中央军委12日复电说：先拿下太原，太原解放后，华北3个兵团中，至少2个兵团17万人可以用于西北。中央军委的意图是待华北问题解决后，即调两个兵团加强第一野战军，再彻底解决胡、马，占领潼关、西安、汉中、天水、兰州，解放大西北。

而此时盘踞西北的胡宗南在继续经营西北战场的同时，已经做好逃跑的准备。1948年11月下旬，他将兵团部撤到蒲城，调整军队部署：第一军和第三十师驻蒲城，第九十军扼守蒲城东北高地，第十二师防守在蒲城东10公里的孙镇。同时开始将后方的仓库物资，非战斗人员向汉中大量迁移。12月底，胡宗南又将兵团部撤到咸阳，再一次对部署作了相应的调整。留下第九十军等部守备蒲城地区，并作了向高陵互相掩护撤退的计划。

为了在华北两兵团入陕之前，牵制胡宗南，并积极配合全国战场的战略进攻，第一野战军决定发起1949年春季攻势。此时彭德怀、王震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出席七届二中全会，春季攻势由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阎揆要负责指挥。1949年2月18日，战役开始，第一野战军先以第四军向铜



川之敌第七十六军第二十师、耀县敌第六十九军攻击，吸引敌主力西援，继以主力第一、第三、第六军围歼蒲城、兴市地区第三十六军第三十师及陕西保安第四旅。20日，第四军扫清铜川外围据点，歼敌一部。铜川守敌，逃至三原。21日进占耀县城。截断蒲城至富平公路，然后以主力向蒲城进攻。战斗至22日2时，全歼守敌陕西保安第二十六团、蒲城自卫团等，俘第十一专署专员、保安第四旅少将旅长赵国珍以下千余人。胡宗南主力退守西安至宝鸡一线，企图保存实力，待机反扑。第一军退至泾阳以南，第六十九军撤至泾河以西，第六十五军及十八兵团司令部退到泾阳，第九十军主力退至永乐镇，还有一部留守三原及其附近地区。

根据战场敌情的重大变化，第一野战军对准备撤退之敌采取大胆深入、迂回敌后、断敌退路、突然袭击的战法；对胡宗南地方武装据守的城镇，采取速战速决的方法。2月22日，张宗逊、甘泗淇、阎揆要致电中央军委，报告追歼胡宗南部的行动部署：拟以一、二、三、六军于明日向富平推进，首先歼富平地区之敌，得手后看情况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以四军向淳化追击，首先歼灭该地区分散之第十四师，得手后威胁西兰路，以骑兵旅活动于下邦、孝义、关山、交口、渭河北岸地区，消灭团匪，摧毁保甲，掩护地方工作。23日，中央军委批准了一野的这一计划，并指示张宗逊等要依当面情况酌定之，强调应告诫干部不要轻敌，防敌反击。第一野战军按照作战部署向富平、淳化、口头镇之敌发起了进攻。2月24日下午，解放淳化。25日晚，进至富平攻占县城后，继续连城堡攻击，26日全歼敌富平自卫团。胡宗南急调南撤之第七十六军二十师连同第十四师四十团残部，在淳化西南地区布防，企图阻止解放军南进。

青海马步芳集团惧怕胡宗南集团被歼后自己孤立，同时也企图向陕西扩展，积极请战，出兵配合。胡宗南得马增援后，于3月5日集中主力第一、第三十八、第六十五、第六十九、第九十军等部共11个师向一野反扑，主要突击目标是铜川、美原镇地区。青马出动第八十二军第二四八师四个骑兵团向淳化发起猛攻。一野第四军经过当天8个小时的战斗，把胡部第九十军吸引到耀县附近后，迅速北进隐蔽起来，同时转移兵力到耀县西北地区，伏击第二四八师。青马部伤亡惨重，向耀县方向逃窜，逃回了陇东。马部骑兵师撤走后，胡宗南派了第一三五师进驻耀县，归第九十军指挥，向铜川推进。3月16日，第九十军到达铜川后，以第六十一师占领铜川城西高地，构筑工事阵地；军部率第五十三师占领铜川以东约30华里的陈炉镇构筑阵

地。敌第一军、第六十五军位于在富平、蒲城之间，三个军互为犄角。

一野在达成预定战役目的后，于3月5日至19日，主动撤离淳化、耀县、富平、铜川、蒲城等城，尔后转至黄陵、白水、澄县及大荔以北地区休整去了。

春季攻势作战，第一野战军经渭河以北、泾河以东、洛河以西的广阔地域连续作战，共歼敌（不含地方部队）约7 000人，再次解放并巩固了大荔、朝邑、平民地区，并一度解放了铜川、耀县等城，打击了这些地区的地方武装。胡宗南集团第七十军第二十师、第十四师四十团、第八十四师二五二团第二营全部被歼，并给企图奔袭关中地区的青马第八十二骑兵部队以沉重打击。春季攻势，打乱了胡宗南的退却部署，打击了国名党的地方武装，扩大了解放军的影响，为以后作战和更好地发动群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春季攻势期间，第一野战军前委于2月28日召开了第五次扩大会议，由张宗逊主持。会议就部队作战、休整问题和开展地方工作等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会议决定：（一）派第六军执行攻取大荔、平民和朝邑的任务，另派小部队袭扰三原地区敌人。（二）各军分片负责开展地方工作，主要任务是：筹集粮食，肃清反动武装，登记民间枪支，建立区乡政府，以秘密形式建立游击队。（三）迅速稳定物价。物价以地方市价为准，粮食交易由贸易局负责，各军不得进行。（四）筹备设立西北军政大学分校。地址设在蒲城，方仲如任校长。（五）部队整训以政治为主，继续深入城市政策纪律教育。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各军一面进行休整，一面抽出人员开展地方工作。第六军和骑兵第二旅协同东府分区部队开始攻歼大荔、朝邑、平民地区之敌。4日，一野第十七师攻克大荔。先后占领朝邑、平县。至此，石川河以东、渭河以北地区全部解放。

春季攻势后胡宗南是走是留，举棋不定。如果继续苦撑下去，则主力在渭北地区被歼灭的可能性很大；想保存实力向西南逃跑，但又考虑到关中地区是西北门户，西南的屏障，若关中失守，西北大门敞开，也使西南局势更加困难。4月23日，第三野战军一部占领国民党首府南京，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逼近武汉，太原解放，全国形势十分有利。在此情况下，胡宗南集团慑于被歼，终于定下决心实行战略退却，从铜川、蒲城、耀县等地后撤，企图与青宁“二马”相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确保西北，屏障西南，迫不得已时则退踞陕南、川北。

4月下旬，胡宗南命令部队放弃蒲、富、同、耀地区，撤到三原一线。



第十八兵团部及六十五军驻径阳；第九十军占领高陵、三原到淳化口头镇一线；第十七军留一部分部队在渭河北岸担任警戒，其余部队陆续撤到径河以南地区。这样，胡宗南又摆成一个掩护撤退、放弃关中的态势。

早在太原战役总攻前夕，4 月 23 日，彭德怀考虑西北战场的作战部署。致电中央军委称：太原战役发展甚速，已歼敌十三个师，我伤亡约五千，二十四日拂晓攻城，如无意外过失，当日即可拿下。得手以后，十八兵团拟位于徐沟、榆次休整，准备从陕西潼关线渡黄河。十九兵团，七军拟位于太谷及其以南休整，准备从荣河，韩城线入陕。二十兵团等希望同往。如三个兵团全部入陕，估计今冬可占南郑、兰州、西宁相机解决宁夏。明年分两路入川入疆。惟看守绥远，攻取大同，巩卫华北，似嫌兵力太弱，可否以杨成武部一军，姚喆、王平两部公约四五万人，暂归唐延杰，李井泉统帅担任上述任务，杨成武帅两个军入陕。警二旅三千人，稍加修整即回绥德米脂、准备接受榆林三边。前与李先念同志商定，以鄂西北刘金轩部约两万人，配合入陕作战。如军委同意，请告其五月底准备毕。该部行动所取道路从山阳镇安宁陕夺取石泉，阶段子午谷及安康敌之退路，最为有利。如有困难不可能绕道，亦应取道竹溪、安康出石泉。

为了在关中地区歼敌一部，同时打乱胡宗南的战略撤退计划，尽量截缴其军用物资并使西安不致被破坏。一野不待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到达，就发起陕中战役。作战部署是：第一步，以歼灭三原地区之敌为目标；第二步，视情逐次夺取咸阳、西安、宝鸡。这一战役计划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5 月 8 日，中央军委就队中战役的部署问题致电中原局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等：我第一野战军（三十五万人）六月间开始举行夺取潼关、西安、宝鸡、汉中、天水及陇南地区之战役，希望我陕南刘金轩部沿汉水向汉中方面行动，最好能直取汉中区域，切断胡宗南向川北的逃路。

第一野战军 5 月 17 日在富平召集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进一步研究作战部署，决定抓住胡宗南撤退的有利时机，追歼其主力，同时解放西安。拟以第四军向乾县及其以西地区追击前进，准备打击二马可能之增援；第一军向临平镇、岐山之间，第二军向咸阳、武功，第六军向西安，分路攻击前进；第三军为预备队。如敌仍据守西安、咸阳，我军即就地集结进行进攻准备。第一军抢渡径河后，经咸阳、武功、扶风以北攻击前进，20 日到达岐山、横水镇地区。第二军第五师在永乐镇以南之径阳塔全歼敌九十军五十三师之一五七团，第四、六师在永乐镇歼敌第一五八团两个营大部。顺利进占

泾阳，并渡过泾河，18 日进占咸阳、兴平，歼敌第九十军五十三师一五九团及骑兵第二旅四团一部，俘敌 1 200 余人。19 日解放扶风。第三军进至武功以北之临平及其以西地区。第四军克礼泉、武功、乾县，占领监军镇，沿途消灭敌大批地方武装。

解放古都西安，是陕中战役的重要目标。西安是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之后，西安成了国民党反共的重要基地。因此，解放西安不仅有广泛的政治影响，能打击国民党军的士气，而且对第一野战军而后大兵团作战所需物资及运输保障有重大作用，并为进军甘肃、宁夏、青海歼灭二马创造条件。胡宗南走后，守卫西安的部队是第十七军。第一野战军第六军于 5 月 18 日下午从三原县渡过径河，急速向西安挺进，第十六师攻击咸阳以东林场，第十七师攻击咸阳以西五陵。5 月 20 日凌晨，第六军击破河防守敌暂编第二旅第六团渭河南岸之防线，歼敌第四十八师一个营及暂编第二旅第六团，乘胜占领西安。

五月发起的陕中战役，解放了古城西安及陕西中部广大地区。给胡宗南集团以重大打击，歼敌第五十七军、第三十师、第五十三师、二十二军补给团等全部，歼敌十七军、三十六军、九十军六十一师各一部及非正规部队，歼敌兵力总计 27 000 多人，并争取了部分敌军起义或投诚。



扶眉大捷

陕中战役以后，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撤至凤翔、宝鸡、及渭河以南之五丈原一带，企图凭借有利地形，争取一个喘息时间，在川陕甘作最后挣扎。他的作战方针是：第一线部队保持机动，避免决战，以逐次抵抗手段，争取时间，消耗我军，待机转入进攻。

1949年5月26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①]同日，第十八兵团自驻地出发，经风凌渡过黄河，进入陕西。6月5日，第十九兵团从驻地出发，经禹门口过黄河，进入陕西。

为了阻挡解放军解放大西北，由南京逃亡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紧急召集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举行"西北联防会议"，拟制了"兰州会战计划"，以马步芳集团依托兰州固守，吸引和消耗解放军主力，会同马鸿逵、胡宗南两集团，夹击第一野战军于兰州外围。马步芳放出狂话，"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彭德怀胆敢进攻兰州，本署以诱敌于有利地形与之决战，凭天然屏障与既设阵地，举全力一鼓而歼灭之"。

按照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决策，第一野战军采取"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首先集中力量与胡宗南主力决战，然后集中主力与青、宁"二马"集团决战。彭德怀将详细的作战计划报给毛泽东，中央军委复来指出："你们应当集中王周两兵团全力及许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②]毛泽东对负责执行钳制"二马"任务的杨得志十九兵团如何使用极为关注，特意给彭德怀打来电报，说："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

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③毛泽东还不放心，次日又致电提醒彭德怀：“如青宁两敌只作小撤退……而不是向彬、长、泾、凉作大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王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王为费力……如两马彬、长、泾、凉作大的撤退，距离胡王较远，十九兵团只须负担钳制两马任务（仍要小心），则午齐（或午灰）开始作战是可以的。”④

1949年6月，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马步芳、副长官马鸿逵等部联合向进军陕西省中部的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反扑，在咸阳、西安地区受挫后，被迫西撤转入防御。胡宗南以所属第十八兵团部指挥第六十五、第三十八军位于扶风以南、渭河以北陇海铁路两侧，以第三十六军、第九十军位于渭河以南郿县、金渠镇、槐芽、哑柏镇地区，以第五十七军一部守备宝鸡，以第十七、第三十六、第六十九军各一部控制西安以南土地岭至宝鸡一线秦岭北麓诸要隘。马步芳部第一一九军位于武功至扶风一线，第八十二、第一二九军位于长武、邠县、永寿地区。马鸿逵部第十一、第一二八军位于崔木镇、麟游地区。胡宗南、“二马”两集团企图凭借有利地形，联合作战，阻止第一野战军西进和南下。胡宗南把五个军部署在扶风、眉县地区渭河两岸，其意图是作战中可以南北呼应，无论是进攻、坚守或退却，兵力都相当集中。

此时，人民解放军总部直辖的第十八、第十九兵团改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先后入陕，使第一野战军总兵力增至40万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针对胡宗南兵力集中但没有战役预备队的弱点，决定采取以一个兵团的兵力迂回敌侧后，两翼牵制，大胆插入敌纵深，断敌后路，然后包围分割歼灭敌人的战术，使敌无兵可援，无路可逃，更无法形成有组织的抵抗。

7月6日，彭德怀在咸阳主持召开有各军党委书记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执行“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彭德怀说，消灭胡宗南和“二马”这两股敌人，不是一个战役能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力争于漆河、千河之间歼灭胡宗南的主力。会议确定以第十九兵团钳制两马，集结第一、第二兵团全部及第十八兵团主力，实行大迂回大包围，歼灭胡宗南部主力，再集中全力歼青马。其部署是：以第二兵团由醴泉经乾县、青化镇迂回至益店镇、罗局镇，切断武功、扶风地区国民党军西退通路，而后向午井镇、扶风发展进攻；以第十八兵团（欠第六十一军）附第七军，由咸阳、兴平沿渭河北岸西进，歼灭武功、杏林镇一带守军后，



向午井镇发展攻击，会同第二兵团聚歼罗局镇地区守军；以第一兵团（欠第七军）由鄠县地区西进，攻占盩厔、郿县，歼灭渭河南岸守军，策应渭河北岸作战，然后向益门镇、宝鸡发展进攻；以第十九兵团附骑兵第二旅由三原进至醴泉、乾县地区，牵制"二马"所部；以第六十一军警备西安，并以一部兵力向西安以南子午镇方向出击，保障主力侧翼安全。

7月10日，扶眉战役打响。第十九兵团为迷惑敌人，掩护主力运动，于10日进入西安西北的乾县、礼泉以北高地修筑工事，以一部逼近"二马"所部，形成将对"二马"部队开展进攻之势，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卫戍西安的第六十一军向西安南的子午镇地区之敌发起进攻作战，使胡宗南无法判明第一野战军总的作战意图。

野战军主力部队于11日拂晓开始进攻。第二兵团由集结地区越漆水河绕道西进，从胡宗南、"二马"两集团之间楔人，迂回至胡宗南所部第十八兵团部侧后，截断其退路。同时，第十八兵团分路由东向西实施攻击，相继占领武功、杏林、绛帐等城镇，歼灭国民党第六十五军第一八七师大部和第一一九军第二四四、第二四七师各一部；第一兵团一部在盩厔以南黑山寺歼灭第三十六军第一二三师一部，尔后主力沿渭河南岸西（安）益（门）公路西进，在哑柏镇、横渠镇及其以南地区歼灭第九十军大部，并向郿县急进。至此，第一野战军从东、西、南3面完成了对扶风、郿县地区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部及第三十八、第六十五、第一一九军的战役包围。该地区守军仅第三十六军和第九十军残部自郿县撤入秦岭山区。至12日中午，国民党军3个军被压缩在午井镇以西、罗局镇以东、高王寺以南的渭河滩上。12日15时，第一野战军各兵团对被围之国民党军发起总攻，激战至20时，歼其大部，余部南渡渭河，被第一兵团歼灭于郿县地区。随后，第十八兵团进至罗局镇一带，准备迎击"二马"集团反扑。第一、第二兵团乘胜西进，至14日，先后攻占蔡家坡、岐山、凤翔、宝鸡和益门等城镇。退守永寿、彬县、崔木镇等地的"二马"集团未敢出援，后撤平凉地区。一野乘胜西进和南下。西进大军7月16日第二次解放了千阳，25日占领了陇县县城。南下大军8月29日突破胡宗南的秦岭防线解放凤县7个乡，11月27日解放了凤县县城及县南地区。至此，宝鸡地区全境获得解放。

扶眉战役经4天战斗，共歼敌4个军4.3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80余门、轻重机枪960余挺、骡马1 500余匹，解放扶风、眉县、凤翔、宝鸡等8座县城，控制了秦岭以北广大地区。胡宗南主力被重创，残部退守秦岭。

青宁“二马”为保存实力，继续往西撤退至平凉地区。胡马之作战联盟实际已被粉碎，“二马”彻底孤立。

毛泽东在扶眉战役发起前，于6月26日曾电告彭德怀：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准备从广东迁往重庆，为使伪政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以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里几个月似较有利。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一野在消灭了胡宗南主力以后，暂不肃清陕西境内残敌，而是乘胜发起了对青宁二马的围歼战。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02页。

②③④《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2页，第622页，第624页。



决战兰州　解放西宁

扶眉战役以后，西北战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胡宗南的主力被歼灭，其残部退守秦岭，集结于凤县、佛坪、东江口一线，控制着四川及陕南、陇南地区，青宁“二马”退至陇东平凉地区。人民解放军由相对优势变成了绝对优势。已经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此时的国民党政府为阻止第一野战军主力南越秦岭、巴山，向四川进军，极力策动“二马”与第一野战军决战，把一野拖在西北。

蒋介石于7月间派贺衷寒、顾希平到兰州“慰劳”。贺、顾二人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召集的师、团长会上强调：“苏联和美国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时候，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当前要务，在于团结，在于坚守。拖延时间，就是出路，赢得时间，就是胜利。”

7月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在马继援的驻地静宁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青、宁二马分析当前形势：

首先，从战略上看：自淮海失败，西安相继不守，解放军声势大振，敌我力量对比越来越悬殊。目前局势，只有按照中央指示，固守原防，保存力量，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相机转守为攻。

其次，就西北地理条件而论：甘、宁、青偏处西北一隅，地瘠民贫，兰州以东，山峦重叠，到处可以择险扼守；河西走廊，非军事必争之地；嘉峪关外，戈壁千里，实不利客军深入，有利我军固守。综上所述，有足够条件赢得时间上的胜利。

再次，以当前敌情分析：四川本天府之国，出产丰饶，曾作抗战基地，现在中央部队，正在相继转进中，共产党是不会容许中央军立足的，所以共产党“二野”不分日夜，跟踪穷追。“一野”也必定迅速南下合围，以图消灭我之主力。这是战略上的至当行动，解放军决不致违背这个原则。

会议的结论是：解放军在甘、青地区暂时只会派少数部队，于陇东南地区择险扼守，同二马保持接触，而主力将在消灭胡宗南残部之后，大举

入川。

据此，静宁会议制订了三套作战方案。

第一案：集中优势兵力，以陇南兵团在天水、秦安占领阵地，马继援指挥的陇东兵团扼守六盘山，马敦靖指挥的宁夏兵团凭借固原一带有利地形，阻止解放军西犯。各部为了保持主动，避免决战，应采取逐次抵抗手段，诱解放军深入，把握战机，相机转守为攻，夹击取胜。

第二案：为了保持主力，避免胶着，必要时向临夏、定西、同心一带转进。以华家岭为轴，在该线占领阵地，以逸待劳，轮番夹击，歼击解放军。

第三案：如果解放军西进，对己不利时，则继续向兰州转进，占领皋兰山一带既设阵地，控制强大预备队，围攻解放军，确保兰州。

在这三套方案的基础上，青、宁二马还制定了与人民解放军在平凉决战的具体计划，即：以宁马第一二八军和第十一军置于平凉以南的四十里铺、安口窑、华亭一线，第八十一军位于固原至西峰镇一带，进行正面抗击；青马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与第九十一军位于平凉以西六盘山地区策应，企图依托有利地形，在平凉地区挫败第一野战军的进攻。

7月中旬，彭德怀针对敌人的战略企图，在虢镇北文广村召开军以上指挥员作战会议，总结扶眉战役经验，讨论确定下一个战役目标。彭德怀说："胡宗南虽然还有10多万兵力，但已无进攻关中的能力。未受我军歼灭性打击的青宁二马退守陇东地区后，估计凭借平凉六盘山一带天险进行抵抗。西北地区雨季逼近，陇县南北山高路险，人烟稀少，我军战役行动应尽量提早。"这次会议决定，以第十八兵团主力位于宝鸡、西安一线钳制胡宗南部，集中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和第六十二军共10个军的优势兵力，进行陇东追击战役，歼灭二马主力于平凉、泾川地区。会后，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了扶眉战役情况和平凉战役部署。1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以三个兵团追歼两马是否足够。我们觉得似应从十八兵团抽四至五个师西进，作为预备队。如这样做，便须该兵团集中主力攻占凤县、留坝，威胁褒城（但不可占褒城），迫使南山敌军后撤，然后该兵团可以抽出四至五个师西进助战。是否应当如此，请酌办。

20日，彭德怀就准备打平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在扶眉战役中，胡宗南部损失共4万余人。现马步芳、马鸿逵部各3个军退守平凉、泾川、陇县地区，配备相当分散，有各个歼击可能。我以10个军，准备26日开始攻击。进而解放甘、宁、青三省全部，准备今冬入四川，明春夏入新疆。"23



日毛泽东复电说："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热天乘胜举行打马战役是很对的。打完这一仗应休整一短期，然后再进，惟休整时间亦不宜太长，以恢复疲劳，整顿队势，补充缺额为原则。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照我想，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①

7月下旬至8月上旬，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进行了气势宏大的陇东追击战。参战各部先后由乾县、礼泉、凤翔、宝鸡地区出动，向青、宁"二马"发动攻击。马步芳、马鸿逵虽事先有"平凉会战"计划，但实际上他们都想让对方在第一线作战，以保存自己实力，因而在一野主力尚未迫近时即各奔东西。马鸿逵为保其老巢宁夏，遂命令他的一二八军军长兼前线总指挥卢忠良，率部向宁夏撤退。马步芳见马鸿逵溜了，也急忙下令马继援率领陇东兵团向兰州后撤。

根据这一情况，彭德怀断定二马已放弃平凉决战计划，分向老巢回窜，便及时修正作战计划，将追击聚歼改为各个击破。第十九兵团继续追击宁马，占平凉后，向固原、海原方向追击。第二兵团由安口窑、华亭向西，经莲花镇向通渭进攻。第一兵团由陇县经固关向天水、陇西发展进攻。在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素来不和的青、宁"二马"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勾心斗角，都不愿当"出头鸟"，因宁马提前脱逃，"二马"平凉决战计划胎死腹中。鉴此，彭德怀随即改变策略，分头追击"二马"，8月3日，占领六盘山，割断"二马"的联系，使其各成孤军。

一野三个兵团像三股铁流，长驱直入。至8月10日，解放了陇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天水平凉，并相继解放陕西、甘肃20多个县市。陇东追击战役胜利结束，这次千里大追击，虽因敌提前撤退，未能形成决战而歼其主力，但在任山河和固关两地歼二马主力一部，挫败了二马的锐气。这一战役毙伤敌2 500余人，俘敌骑兵第十四旅副旅长马继奎、伪国防部少将部员杨殿克以下近6 000人，起义2 000多人，共歼敌1.2万人。这一仗，造成进军兰州、银川各个歼敌的有利态势。

第一野战军根据这一有利形势，不失时机的决定立即发起兰州战役，在甘肃境内一举全歼青宁二马，不使之逃亡新疆和境外。马步芳认为青海是自己的大本营，人熟地利，便于部队机动作战；而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劳师远

征，补给困难。认为“保住西北大局惟在于同解放军决战一场，而兰州有南山屏障、黄河天险，是决战的好地方。”此时的蒋介石也深知，如果西北保不住，西南也就很难保住，决定利用青、宁“二马”的所有力量与第一野战军拼个鱼死网破。为此，委派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阎锡山，召集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等在广州召开了“西北联防会议”，策划了兰州决战计划，决定马步芳部队由华家岭退守兰州，吸引一野至兰州城郊；马鸿逵部队退出固原一带，折向兰州参战；令胡宗南部进击陇南、天水，对一野部队实施侧击。同时，还欲让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部进行东援。

关于兰州决战的问题，中共中央进行了认真慎重的研究部署。毛泽东指出，解决青、宁“二马”应区别对待，其核心是打击马步芳。一方面，青马与我解放军长期对抗，残杀红军无数，十分疯狂反动，政治争取没有可能；另一方面，青马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在军事上比宁马强大，歼灭了青马，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而马鸿逵是傅作义将军的拜把兄弟，曾派人向傅作义将军表示有向我求和之意，即使不投诚，只要歼灭了青马，宁马必然无心抵抗，可达一石二鸟之功效。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指出，如果兰州一战能歼灭青马主力，大西北的解放便指日可待。这样，新中国宣告成立就更具条件了。

8 月 4 日，彭德怀、张宗逊等向各兵团发布了进军兰州的作战命令：以二兵团之三个军和十九兵团之两个军分两路包围进攻兰州；由一兵团附六十二军突破敌右翼向马步芳青海老窝迂回，以动摇其军心，并拦阻和歼灭从兰州逃窜之敌。而后西渡黄河，直取西宁。另以十九兵团的六十四军在固原一带向宁马佯动，并准备阻击来援之宁马；以十八兵团主力及第七军等 3 个军沿川陕公路前进，以钳制胡宗南部。第二天，又下发了《解放大西北的政治动员令》，增强全体指战员敢打必胜的信心。

8 月 6 日，中央军委指示第一野战军首长：据一般了解，青马残暴，在其主力未被歼前，对我敌意甚深，故对深入青马老巢寻其主力作战，必须谨慎行事，大意不得。第一野战军首长遵照军委指示，决心以一部兵力钳制马鸿逵、胡宗南部，集中优势兵力歼灭马步芳部主力于兰州，而后再聚歼马鸿逵部。具体部署是：以第十八兵团的第六十、第六十一军以及第一兵团的第七军留驻宝鸡、天水地区，继续钳制胡宗南部，保障野战军主力左侧与后方的安全；以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进至固原、海原地区，钳制马鸿逵部，保



障野战军主力右侧安全；以第一兵团部率第一、第二军附第十八兵团的第六十二军为左路，由秦安、武山经陇西、渭源、临洮、临夏，尔后北渡黄河攻取西宁，截断兰州之敌退路，并随时准备参加兰州作战；以第二兵团部率第三、第四、第六军为中路，经通渭、马营镇、内官镇和洮沙县向兰州城南、城西攻击，如敌先退西宁，即尾敌追击，协同第一兵团歼灭之；以第十九兵团部率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为右路，沿西兰公路及其以北向兰州城东攻击，协同第二兵团歼灭兰州之敌。

8 月 19 至 20 日，第二兵团和十九兵团顺利进抵兰州城郊，从东、西、南 3 面包围了兰州。兰州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的交通枢纽，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是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兰州 3 面环山，北有天险黄河、白塔山可依托，南有南山作屏障。国民党军在抗战期间就修筑了坚固的工事，青马又不断将其构筑加固。主阵地修有钢筋水泥碉堡，形成碉堡群，通向城里的环山公路与各主要阵地相连接。阵地外斜面有环形人工削壁 1 至 2 道，高 6 至 10 米，削壁腰部有暗藏的侧射机枪火力点，削壁外有一两层 3 至 6 米深的外壕，各壕间又有暗堡和野战工事。阵地前埋设大量地雷及铁丝网。马步芳部凭借坚固工事，既便于使用火力，又便于组织反扑。

青马把兰州决战看成是自己生死存亡的关键，周密地研究对策，布置兵力，拟定了详尽的作战方案：（1）以陇东兵团主力（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附榴弹炮一营）在狗娃山、皋兰山、东岗坡一带既设工事占领阵地，部署强有力的机动部队于四墩坪迄七里河间地区。该兵团的骑兵部队，配置在兰州、河口间黄河北岸，担任沿河守备。（2）陇南兵团的第九十一军、第一二〇军，配置在兰州、靖远间黄河北岸，以巩固兰州左翼。（3）韩起功骑兵军守备洮河，巩固兰州右翼，并看守青海大门。以上部署的作战意图是：（1）部署有力骑兵部队于榆中、甘草店一带，迟滞敌军前进，以赢得防御准备时间。（2）敌军主力直扑兰州时，兰州守军藉工事以炽盛火力，予以杀伤，当敌我兵力接近平衡时，断然转移攻势，此时北岸骑兵部队支援骑兵军，努力击破当面之敌，向内官营、定西挺进，兰州左翼部队向巉口附近挺进，包围敌人于榆中地区歼灭之。（3）倘敌军主力向洮河方面进攻，兰州及其东北地区守军应断然出击，向敌军主力侧背攻击之。（4）万一敌军主攻指向靖远方面，该方面宁军应极力阻其渡河，同时兰州及同心城部队应构成钳形攻势，乘敌军半渡歼灭之。（5）宁夏及兰州两方面部队，应积

极准备，互相策应作战。

一野部队抵兰州外围的第二天，向古城岭、营盘岭、狗娃山等几个兰州外围阵地发起试攻。敌军充分发挥了兵力火力，第一野战军攻城部队在外围攻击受挫，并有不小的伤亡。第一野战军虽然试攻受挫，但摸清了敌人的部署、战术特点和地形情况。当晚 10 时，彭德怀、张宗逊向中央军委报告："本日试攻兰州外围，十九兵团 5 个团，二兵团约 4 个团，结果未攻下一个阵地，守敌顽强，工事很坚固。"

鉴于此，彭德怀要求各兵团总结经验教训，仔细侦察敌情，充分做好战前准备。22 日起，第一野战军各部认真学习野战军司令部《关于进攻兰州的战术指示》，深入进行思想政治动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实克服轻敌思想。发扬军事民主，研究进攻战术；认真侦察地形，反复夜摸道路，并挖壕沟接近敌人阵地；大力组织骡马和勤杂人员，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运输物资器材。

8 月 21 日，第一野战军司令部给各兵团发出指示，对战斗中火力组织、战斗队形和战术应用等提出了明确要求，还特别强调：青马匪军为今日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我们对他须有足够的估计，并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急性。进攻时，须仔细侦察，精密计划，充分准备，作正规的进攻。任何疏忽大意与侥幸心理，都是错误的。

彭德怀指示王震："青马匪军现决心固守兰州，工事又相当坚固，夹河而阵，地形亦有利于守，在左兵团进占临夏后，可能动摇其固守决心，但亦可能促进其不顾一切决心死守，甚至放弃西宁撤守大通河东岸及享堂新城湟水北岸保障凉、甘、肃州退路。在我攻兰州六七天不得手时，宁马主力可能车运增援兰州（青宁两马汽车据云二千辆以上），似此我将集中三个兵团于兰州会战。你们占领临夏、永靖两城后，须休息两天补充粮食，弄清情况，再定行动。"

根据这一部署，在第二、十九兵团进行强攻兰州准备的同时，担任截击兰州战役中可能西逃之敌的左路军第一兵团正急速行军。第一兵团的迅速挺进，使兰州守敌右侧安全和马步芳老巢西宁受到严重威胁，马步芳不得不抽调骑兵第八旅和骑兵第十四旅回西宁担任守备任务。第一野战军三路大军包围兰州并且击破敌一翼后，胡宗南并未出兵解兰州之急，援兰州的宁马被我第六十四军钳制在海原不得前进，实际上形成了青马孤军困守兰州的局面。

8 月 23 日，中央军委指示第一野战军首长："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



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动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②

青马主力集中在南山，而东西两翼薄弱，北面的黄河铁桥是敌人唯一退路。占领南山就成为攻打兰州的重点，而能否夺取黄河铁桥是能不能全歼敌人的关键。围绕这一重点和关键，彭德怀适当调整了作战部署。

8 月 24 日 21 时，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二兵团、十九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军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的准备工作看，攻占兰州有六七成把握，故决定在 25 日晨开始攻击。"毛泽东在 26 日复电：如 25 日攻城得手，则局势起了变化。如不得手，则作为侦察性质之作战，按来电确定先打援，后攻城。

第一野战军作了充分准备后，于 25 日拂晓发起总攻，沈家岭主阵地上的上、下狗娃山，首先被第四军攻占。下午，第六军攻克了南山最高峰营盘岭的主阵地三营子；六十三军攻占敌另一主阵地豆家山，六十五军于黄昏占领古城岭、马架山。至此，兰州的"锁钥"已全部掌握在我野战军手中。在总攻兰州之前，野战军左路第一兵团于 8 月 22 日解放了临夏。马步芳深感后方空虚，老巢危急，不得不由兰州抽调骑兵第八、第十四师回援西宁。马步芳急派亲信赴宁夏求援，但马鸿逵为保存实力，虚与委蛇。马步芳又于 24 日急电国民党政府：请火速分催陕署、宁夏友军行动，也是没有回音。马步芳当天自兰州飞回西宁。行前叮嘱其子马继援说："如马鸿逵、胡宗南及空军再不来援，则迅速撤守青海。"在兰州作战的同时，担任钳制任务的一野第十八兵团，乘胡宗南集团向西和、宝鸡、虢镇进攻之机，向其展开猛烈反击，先后歼敌 3 700 余人，迫其南撤。第六十四军在海原地区钳制住了宁马集团的增援，使其先头部队到达海原以北后不敢前进。

25 日下午，马继援秘密从阵地上撤走部队，想通过黄河铁桥退至北岸。第二兵团三军七师发起追击，26 日凌晨攻占西关，抢占铁桥，堵死了敌军的唯一退路，并越过铁桥占领白塔山。26 日被国民倚为金城汤池的兰州宣告解放。这是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也是西北战场上最后一次大战役。这次战役，共歼灭马步芳主力 2.7 万

余人。

一野第一兵团担任向敌后迂回并解放西宁的重任。8 月中旬一兵团连克临洮、东康、临夏，9 月初进入青海境内，迅速解放民和、甘都、乐登、永登。当马步芳残部 9 月 2 日逃到西宁以东的西滩湾时，解放军左路大军已经逼近西宁城。9 月 5 日，西宁解放。9 月 11 日，青海全境解放。

兰州战役的胜利，毁灭性地打击了国民党在西北赖以维护其统治的军事支柱马步芳集团，极大地震慑了西北地区企图顽抗的国民党势力，迫使大批敌军起义投诚，为和平解放西北各省铺平了道路。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第一野战军在兰州取得了歼灭青马主力的胜利之后，解放甘、宁、青、新，基本上就是一个接管和走路的问题。

兰州战役的伟大胜利离不开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战略领导，离不开一野将士的浴血奋战。兰州战役更加依靠后勤保障和人民支前。西北地广人稀，自然条件差，部队后勤保障困难更大。为此，经党中央、中央军委研究决定，由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政治委员习仲勋负责第一野战军解放大西北的后勤保障工作。从陕西到甘肃的几千公里的道路上，奔走着数不清的支前队伍。据统计，解放区先后动员民工 700 万人，筹备大车约 100 万辆，牲畜 200 万头，各种小车不计其数。进行兰州战役时，仅从山西、陕北、陇东等地区就动员了 15 万群众伴随保障，这个数目相当于此时兰州市的总人口。兰州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特别是皋榆工委对兰州的解放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大力进行策反的同时，兰州地下党组织还千方百计地搜集情报。兰州西宁的解放，与人民解放军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十分不开的。

注释：

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644～645 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第 428 页。



解放宁夏

第一野战军在进军甘肃河西走廊的同时，于9月初分3路由甘肃大举进兵宁夏。中央军委指示："一野应该靠自己的力量，用打拉两种方法争取迅速解决宁夏问题"。

宁夏也有"二马"马鸿逵和马鸿宾。马鸿逵长期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在宁夏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以军治政，兵源主要是宁夏，经其亲自选训，军官由其亲自教导培养提拔，高级军官都有亲戚乡里历史渊源。兰州战役青马主力被击溃之后，蒋介石便将最后希望寄托在马鸿逵身上，于8月底电召马鸿逵去重庆，要他鼎力西北，牵制解放军，一是作西北的垂死挣扎，二是争取时间，使汉中的胡宗南部南下四川，部署据守西南大计。为鼓励马鸿逵，蒋介石拿出数百万银元作为酬劳。马鸿逵表示只要有一兵一卒，就要拼杀到底，"死守宁夏"。

马鸿宾与马鸿逵则不完全一样。抗战期间，他曾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在绥西一线同傅作义共同抗击过日本侵略军。马鸿宾当时内受马鸿逵的刁难、限制和威胁，外受解放军的重大压力，心情十分矛盾，思想斗争激烈。他曾飞到绥远去见傅作义和邓宝珊，傅邓二人以自己亲身经历劝其弃暗投明，马鸿宾由此产生了率部起义的念头。宁夏的马家军，主要有两支部队，主力是以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为司令的宁夏兵团（马敦静还是整个宁马的总指挥）；另一部是以马鸿宾之子马淳靖为军长的第八十一军。在兰州、西宁相继解放，青马主力被歼，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他们都犹如惊弓之鸟。

兰州决战，歼灭了西北地区敌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宣告了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奠定了解放大西北的基础。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解放军完成解放整个大西北的任务中，再没有严重的战斗，基本上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了。当然，要"走"得好，"接管"得好，也还要费一些周折。在解放宁夏过程中，第一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从始至终坚持

做两种准备，用两种方法解决宁夏问题：一是充分准备以军事力量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敌人；二是在军事压力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宁夏。用和平方式解放宁夏，可以避免战争的破坏和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同时，对于陷入穷途末路的宁马来说，也是唯一的一条光明出路。根据宁夏二马的具体情况，第一野战军的基本方针是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一打一拉分化二马，迅速解放宁夏。

马鸿逵从重庆返宁后即制定了所谓“打光、烧光、放水”的对策，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随即在吴忠堡召开有各军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破坏青铜峡公路，并占领牛首山阵地，必要时执行马鸿逵的放水计划。同时，重新调整了各军建制，设置了三道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北进。第一道防线——以骑兵第二十团守同心，第九军一部守靖远，新编骑兵第一旅守景泰；第二道防线——以贺兰军守中宁，第八十一军主力守中卫；第三道防线——以第一二八军守金积，第十一军守灵武。

第十九兵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针对宁马的防御部署，决心首先突破第一道防线，截击中宁之贺兰军，争取中卫马鸿宾部八十一军起义。再集中力量歼灭金积、灵武、银川之敌。9 月 1 日，第十九兵团下达作战命令，具体部署了第一步以截击中宁之敌为目的的进军作战计划。9 月 2 日，第十九兵团在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的率领下，兵分三路向宁夏挺进。左路第六十三军第一八八师，由兰州沿黄河左岸向宁夏急进，6 日攻占靖远，15 日攻占景泰突破第一道防线，随后进抵中卫。中路第六十三军（欠第一八八师）和第六十五军，于 9 月 5 日由兰州、定西沿黄河右岸与第一八八师夹河并进，16 日进至中卫以南黄河右岸的常乐堡、高家疃地区。右路第六十四军和陕北三边独立一、二师，于 9 月 10 日、11 日分别由固原、海原、黑城等地出发，向宁夏中宁县进军突破第二道防线。第十九兵团 3 路大军近 10 万人控制了黄河南岸的中宁、中卫地区，第一八八师则从北岸威逼敌第幼军驻地中卫。敌第八十一军和退守金灵。银川的马鸿逵父子所属之宁夏兵团，均陷入孤立无援之困境。

一野大军兵临城下，驻中卫的宁马第八十一军军心大乱。此时，马鸿宾父子虽有率部起义的意向，但又疑虑重重。争取马鸿宾起义是西北解放军的既定方针。早在 1949 年 5 月西安解放后，当时第十九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长甄华，安排马鸿逵部驻西安办事处的少将交通处长孟宝山，向其交代了中共和解放军的政策，令其回到银川，以合法身份进行秘密争取马鸿宾的工作。



兰州解放后，第十九兵团联络部又安排素有声望的甘肃伊斯兰教上层进步人士郭南浦先生等人抵达宁夏，传达第十九兵团和平解决宁夏之诚意，规劝“二马”认清形势，弃暗投明。9月初，郭南浦、马守礼、马季康等人经平凉、固原北上，先于解放大军到中宁县见马鸿宾及第一军军长马淳靖，双方开始和谈。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关注着宁夏“二马”的动向，希望尽一切努力争取宁夏问题的和平解决。早在兰州战役之前，毛泽东就在1949年8月6日，就关于用战斗方式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敌军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指出：“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需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①并具体指出：给马鸿逵部以歼灭性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河套，然后用政治方式解决。当第十九兵团向宁夏进军的时候，毛泽东于9月4日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针对马鸿逵残杀陕北人民甚多，从来没有做过好事，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虽未丧失，但实际执行仍有困难的情况，要求第一野战军对宁马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并指出：“请考虑利用马鸿宾，派人向马鸿宾做些工作，争取大部和平缴械，一部改编的局面。”19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张宗逊：“宁夏马鸿宾到包头，说第八十一军军长系其子马淳靖，与马鸿逵部系属两事；无论何种方式，只要解放军不打，能使其成为人民的军队，他均乐于接受，请先停止作战，以便商谈。中央军委请彭、张即考虑处置办法电告。”同时，毛泽东为薄一波起草复傅作义电说：“我们可以将马鸿宾部与马鸿逵部分别看待，但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前线而不能在北平。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宁夏不能独异。无论马鸿宾或马敦静如欲解决问题，应速派代表至兰州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找彭德怀司令员接洽，或到固原第十九兵团司令部找杨得志司令员接洽。如马鸿宾能亲去兰州或固原一趟，则更好。彭德怀将军已知马鸿宾为人是和马鸿逵有区别的，他正想找马鸿宾接洽。如马能亲自去，或派代表去，必被欢迎，不会有任何危险。请傅宜生速为转知，以免误事。又西北前线对宁夏进军的时间已很迫近，宁夏代表应速去固原或兰州，不要再迁延了。”23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你们应尽可能解决马鸿逵部，越彻底越好。酌量保存马鸿宾部，照我军制度改编。”

为力争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第十九兵团遂令第六十四军各部原地待命，

停止前进，以利郭南浦、孟宝山一行顺利抵达银川向“二马”再次研究和谈。

9月19日，曾思玉军长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马淳靖代表国民党第八十一军进行谈判。为了保存国家人力物力财力，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和平解决八项原则，经双方代表数度协商做出如下协定：（一）国民党第八十一军遵照指定地点集结，听候按民主制度和原则整编军队，并由人民解放军派政治委员、政治工作人员进行工作。（二）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应保护一切武器、物资和仓库，不得破坏和转移、隐藏、盗卖，应准备点交。（三）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应将莫家楼船只于二十日二十二时移交申家滩解放军，石空渡船只二十一日八时移交解放军。（四）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应立即停止中（卫）、银（川）公路之运输。为保证以上四项条款迅速执行，特作以下具体规定：（一）第八十一军应立即将部队集结在中卫以东至李家营子、中卫以西至张家营子。城北王家营子以北地区给解放军驻防。（二）第八十一军应立即让出人民解放军东进宁夏路线——经中卫镇乐堡以北通过。在国民党第八十一军确实履行上项条件后，人民解放军保证该军全体官兵生命财产安全，允许部队不放下武器，但第八十一军不得有任何损害人民利益和破坏交通的行为。当天下午协议正式签字，宁夏中宁解放。

中宁解放以后，为了阻止解放大军直下银川，马敦静又将留在黄河以东的兵力进行了重新调整，将第一百二十八军、贺兰军保一师、骑二十旅共11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分布在四个防御区：第一防御区为青铜峡和牛首山等制高点；第二防御区为金积及其以南马家嘴子至郑家大庙地区；第三防御区为吴忠堡地区；第四防御区为灵武城，企图与解放军在金积、灵武、吴忠地区进行决战。

针对敌情变化，第十九兵团决定首先消灭第一百二十八军于金积、灵武地区。以第六十四军配属兵团机械化营和坦克战车队，并指挥第一百九十五师、独立第一、二师共5万余人为主攻部队。同时命令第六十三、六十五军从中宁等地北渡黄河，攻击贺兰军，配合金、灵地区作战。第六十四军的部署为：第一百九十一师首攻牛首山，尔后由西、南向金积进攻，力求迅速分割围歼；第一百九十二师指挥兵团野炮营经滚泉由南和东南向金积进攻，协同第一百九十一师攻歼金积守敌；独立第一师及第五十七十一团沿豫（旺）灵（武）公路攻击前进，迂回吴忠堡，协助主力歼灭金积之敌。第一百九十、一百九十五师为第二梯队，随后跟进。18日，第191师占领青铜峡，



并跟踪追击逃敌，打垮了金积以南西滩村顽抗之敌。与此同时，第一百九十二师在前进途中击退敌骑兵第三十八团的阻击，逼近金积县城外围，将敌第三百五十六师围困在城内。历时三天四夜，金灵之战胜利结束，马家军在河东的部队被全部歼灭，共计歼灭敌第一百二十八军军部、第二百五十六师、保一师、保三师、骑兵二十旅。共俘 7 337 人，缴获各种炮 120 余门，各种枪 7 000 多支（挺），各种弹药 110 万发，汽车 23 辆，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情况全如毛泽东所料，当人民解放军突破宁马最后一道防线、金灵之战即将胜利、首府银川完全暴露于解放军攻击之下时，马鸿逵、马敦静父子先后乘飞机逃离银川，宁马高级将领完全丧失了再战的决心。9 月 20 日，贺兰军军长马全良、第一百二十八军军长卢忠良。第十一军军长马光宗及省保安司令部所属保安师长等高级军官，共同发出停战求和的通电。9 月 22 日，领衔通电起义的贺兰军军长马全良，派他的少将参谋长郑毅民东渡黄河到中宁第十九兵团司令部进行联系。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以五项和平条件提交宁夏当局，规定必须于 24 日中午 12 时，派出正式代表来中宁签字，以和平方式解决宁夏问题，否则即以武力坚决歼灭之，并严正声明：“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进银川，一定要解放宁夏，这一任务是不能变更的。”9 月 23 日，渡河战斗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第六十三军主力也做好了在中宁石空堡渡河北取银川的准备。在这种局势下，马鸿宾以马家“家长”的身份，召集宁夏军政高级官员，提议以第一百二十八军中将军长卢忠良，宁夏保安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马光天、宁夏省政府秘书长兼代民政厅厅长马廷秀三人为代表与十九兵团和谈。卢忠良三人于 9 月 23 日赶到中宁，同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副司令员葛晏春、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和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等进行会晤。在谈判中，人民解放军代表首先提出五项协议草案，请宁夏当局代表们商讨。这五项协议的内容是：（一）所有宁夏部队迅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 19 兵团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在此期间内，不得擅自移动。否则，发生任何冲突事件，人民解放军概不负责。（二）宁夏一切党政军机构、市政机关、公管企业、牧场。公共财产和建筑及所有武器。弹药、仓库物资、公文、档案等，立即造具清册，听候点交，不得破坏、隐藏、转移、盗卖；所有监狱犯人，听候接收处理；曾经俘去之我方人员，不准杀害，应全数释放交出；蒋系特务机关人员，一律不准放走。（三）凡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之地区，原宁夏当地军政机关、部队应负

看管物资、维持治安之责，不得发生任何破坏损失事件。（四）在宁夏部队方面执行以上三项条款时，人民解放军方面保证宁夏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五）为了切实执行以上四项协议，决定双方在银川组织联合办事处，处理以上事项。该办事处由九人组成，解放军方面五人，并指定一人任主任；宁夏方面四人，并指定一人任副主任。

9月23日下午2时，解放军方面代表杨得志、李志民，宁夏方面代表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在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协议书上正式签字。24日至25日，解放军进驻宁夏省会银川市。

宁夏战役从9月2日开始到23日结束，历时22天。由于采取了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对马鸿宾与马鸿逵部区别对待的方针，进展顺利。共计歼敌4万余人，其中，毙伤、俘虏敌人2万余人，起义和投诚2万余人。解放军仅伤亡7 000人。至9月底，宁夏全境16个县、市、旗全部解放，蒋家王朝及马氏家族对宁夏几十年的封建统治终于结束。

注释：

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4页。



和平解放新疆

在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新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考虑到新疆的实际情况，为使新疆免受战争创伤和损失，作出了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决策。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解决国民党军队的3种方式，并对解放全中国作了周密的部署。国共和谈期间，4月16日，周恩来同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长屈武谈话说："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决裂了，你要赶紧回到新疆，策动那方面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和少受损失。"5月23日，毛泽东在《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中要求第一野战军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青海，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

6月下旬至8月中旬，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在与苏共高层领导会晤、谈判期间，斯大林提出，据可靠情报，美国人企图将盘踞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等国民党军队撤到新疆，与当地反动势力相结合，组织大伊斯兰共和国。该计划一旦得逞，将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困难，对苏联也极端不利，因此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加速向新疆前进。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鉴于此，决定改变原定的"明春开始经营新疆"计划，提前到冬季占领迪化。6、7月间，毛泽东多次电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政委习仲勋，进一步对进军西北作了具体部署，并指出：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需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欲求彻底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同时还提出：如能于8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9月西进，10月占领兰州、西宁及武威、张掖、酒泉，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解决，往后占领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

8月4日，毛泽东在转发彭德怀关于进军新疆时间安排的电报中说：

"八月底或九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对西北敌军除用战争方式解决外，尚需兼取政治方式解决，以为战斗方式之辅助。8月19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在我攻占兰州、西宁、凉州（武威）后，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争取某一部或大部放下武器和平改编的可能性是增加了的。9月上旬，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军新疆的计划。拟在占领玉门以后，由王震率二军和六军向新疆进发，争取在12月底以前分驻于南疆和北疆。毛泽东于10日复电指出：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今伊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乌鲁木齐），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

早在兰州战役前，毛泽东曾致电第一野战军首长并告贺龙、习仲勋，部署集中3个兵团全力攻取兰州时，要求"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①]

军委和第一野战军前委决定第一兵团率第二军和第二兵团的第六军进军新疆。9月4日，向河西走廊追歼逃敌的第二兵团，开始沿兰（州）新（疆）公路西进。相继占领武威、永昌和山丹等地。17天推进700公里。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于9月10日由西宁地区北进，迂回河西走廊，越过祁连山，攻占民乐，歼敌骑兵第十五旅等部，19日至20日，在张掖地区歼敌5个团，21日，与第二兵团会师于张掖。河西地区之敌在野战军威逼下，在兰新公路截断后，纷纷起义和投降。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后方联合勤务第八补给区司令部、第九十一军、第一二〇军等残部在酒泉宣布起义。随后第一野战军第三军一个快速部队抢占和保护了玉门油矿。第二军一部乘汽车进驻酒泉、玉门、安西等地。与此同时，国民党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周祥初率5个团起义。至此，河西地区追击作战胜利结束，起义、投诚和被歼的敌军共4万余人。除陇南一隅外，甘肃全省均获解放。马步芳、马鸿逵在甘、青、宁三省的反动统治被彻底摧毁。

9月10日，毛泽东亲自约见正在北平的前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将军，希望他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要他们认清形势，顺从民意，率部起义。"我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你去电，他们是一定照办的。"张治中随即拟出电文告陶峙岳："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



领导。”随后，张治中因想到许多应该讲清楚的问题，又于9月11日致电陶峙岳，详细询问马步芳、马呈祥、黄祖勋、周嘉彬、王治岐等国民党残部的情况及态度，并指出了调度安排和处理办法。

张治中曾经营西北多年，给新疆省留下了一个倾向于和平民主的领导班子。在军队方面有：陶峙岳，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整编第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等；在政府中有：包尔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屈武和外交特派员刘泽荣等。但是新疆国民党中也有坚决的反共分子，骑五军军长马呈祥、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罗恕人这三人是胡宗南和马家军的嫡系，反对和平主张，与人民解放军决战。

这时，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已兵临玉门关下，紧叩新疆大门；加上省内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的民族军的长期斗争的配合；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争取工作，使已经势孤力单的7万多国民党驻新疆军队，内部发生了剧烈分化。普通官兵倾向和平，主和占据上风。陶峙岳抓住时机对主战的三人做思想工作，劝其和平起义接受改编。9月9日，包尔汉邀集各族耆宿及社会名流30余人举行座谈会，详细阐明了全省目前的形势及省政府保证和平的决心。9月11日，迪化市商会、市总工会、伊斯兰商会、市参议会、县参议会等各族群众团体举行座谈会，一致表示竭诚拥护省政府的和平号召，并酝酿成立了全省性质的拥护和平促进会。

9月24日，骑五军军长马呈祥、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以及钟祖荫、罗恕人等反动分子，于9月下旬离开迪化，经南疆出走国外。陶峙岳于9月25日凌晨召集新疆警备总部紧急会议，宣布了人事命令，决定莫我若任整编第七十八师师长，韩有文任整编骑一师师长，刘抡才任整编第一七三旅旅长，罗汝正任整编第一七九旅旅长。并要求各尽其职，约束部队，防止变乱。下午，由陶峙岳领衔发布了新疆警备总部起义通电。次日上午，包尔汉召开省政府紧急会议，决定成立省临时政府，并领衔发布了省政府起义通电。与此同时，陶峙岳、包尔汉还主动派人赴兰州与彭德怀磋商了有关事宜，并积极部署做好迎接人民解放军进疆的有关工作。彭德怀复电陶峙岳：“将军等率部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

10月6日至8日，彭德怀、王震、许光达、甘泗淇在酒泉同陶峙岳举行会谈。9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与陶峙岳会谈的结果。准备将陶部整编为步兵4个师、骑兵1个师，实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供给制度。

自10月10日起，王震率领第一兵团二、六两军，在陶峙岳派来的“欢迎解放军入疆代表团”的前导下，由酒泉、玉门、安西地区向新疆进发。10月20日进驻迪化。当天，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新疆陶峙岳、包尔汉来电，“希望迅速进军全疆维持秩序”。

11月下旬，彭德怀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财经委员会主任贾拓夫陪同，自兰州飞往迪化会同中共新疆分局书记王震等，同陶峙岳、包尔汉、赛福鼎等座谈协商整军、整财、整政三大问题。随后，彭德怀又主持召集各有关人士研究讨论，并在省政府委员会上通过了《新疆目前施政方针》。

12月20日，中央军委命令新疆起义部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赵锡光，副政治委员饶正锡，参谋长陶晋初，政治部主任李铨。下辖：第九十军，军长赵锡光，政治委员张仲翰，第一副军长王根僧，第二副军长陈德法，参谋长李祖唐（后叛变）。该军辖第二十五师，师长刘振世，政治委员贺振新；第二十六师，师长罗汝正，政治委员王季龙；第二十七师，师长陈俊，政治委员龙炳初。兵团直辖骑兵第七师，师长韩有文，政治委员于春山；骑兵第八师，师长马平林，政治委员张献奎。

新疆和平解放和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是新疆历史上乃至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壮举。由此基础上结束了新疆各族人民数百年来受压迫和奴役的历史。这对于民族团结和巩固国防，建设大西北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华社为此发表评论：“这个辉煌的战绩是西北前线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团结一致英勇作战的结果，也是西北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协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共同奋斗的结果”。②

第一野战军从1949年7月至12月，历时不到半年，经过7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战斗，形成约9 000公里，歼敌30万人。西北五省全部获得解放。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广大指战员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在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彻底干净地消灭了数量上占优势的国民党军。至1950年3月，二、六军先后进驻南疆、北疆，胜利完成了进军新疆的任务，新疆全境即告和平解放。

注释：

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8页。

②《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4日。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2]《毛泽东军事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

[3]《毛泽东传（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

[4]《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5]《邓小平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6]《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版。

[7]《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版。

[8]《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 年版。

[9]《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 年版。

[10]《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版。

[11]《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1985 年版。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

[13]《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集（1949-195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

[14]《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 10 册。

[15]《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16]《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版。

[17]《周恩来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18]《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版。

[19]《朱德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20]《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1]《粟裕战争回忆录》，粟裕著，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版。

[22]《罗荣桓传》，朱文峰编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84 页。

[2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 年版。

[2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平津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版。

[25]《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

[26]《国共国民党将领谈》，中国文艺出版社 2007 年。

[27]《向西北西南进军》，吴林泉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年 9 月。

[28]《第二野战军辑西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资料选编》。

[29]《从延安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

[30]《蒋介石传》，王俯民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年版。

[31]《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杨天石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32]《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年版。

[33]《解放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年。

[34]《解放宁夏》，陈宜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年 8 月。

[35]《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 版。

[36]《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 版。

[37]《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 版。

[38]《中国震撼世界》，(美）杰克·贝尔登，北京出版社，1980 年。

[39]《胡宗南部 1946—1949 年反共军事活动》，中国文艺出版社，1992。

[40]《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

[41]《从华北到西北》，郑维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5 年 7 月。

[4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